

# 序

习仲勋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出版问世了，这是作者在他耄耋高龄、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写成的一部力作，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维汉同志在他的晚年，不仅奋不顾身地完成党分配给他的任务，而且倾注极大的心力于回忆录的写作，并把它当作为党的工作作出的最后努力。几年来，他竭尽余力，争分夺秒，以超人的毅力坚持工作，直至病逝前三个月，还插着氧气管在病榻上修改文稿，他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精神感人至深。可惜的是，终因心力交瘁，他未能把回忆录全都写完；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宗教工作部分，他没有来得及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宝贵的经验写出来，这对他确是一极大的遗憾，对我们党也是一大损失。

维汉同志是我们党建党时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德高望重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毕生的精力，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为党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壮大、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各民族的大团结、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他的一生，经历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联系在一起。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担任过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的领导职务，参加领导过党的组织、宣传、教育、工运、农运、群工、统战、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工作，亲历了党的历史上一些重要的过程和转折。《回忆与研究》记述了作者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六四年共四十六年的主要经历，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是学习、研究党史的一部珍贵资料。

维汉同志生前，曾向我谈过他撰写回忆录的几条原则：一是以集体为主，着重写集体的活动，适当联系自己，反对突出个人，突出自己，正确处理个人同党、同群众、同所在单位集体领导的关系；二是实事求是，真实第一，力求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三是重视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的、有益的经验，也包括反面的、需要引为鉴戒的经验；四是对个人的活动持分析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在这部回忆录里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这也是这部回忆录的鲜明特色。尤其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从不隐讳，并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精神，我深为敬佩。

今年六月二日，是维汉同志诞辰九十周年，出版《回忆与研究》以飨读者，是对维汉同志最欣慰的纪念。

一九八六年

李維漢是一位為共產主義  
事業奮鬥終生的老同志  
值得大家怀念

陳有年  
一九八七年六月



李經傳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工学世界社”成员在法国蒙达尼合影。第三排右五是李维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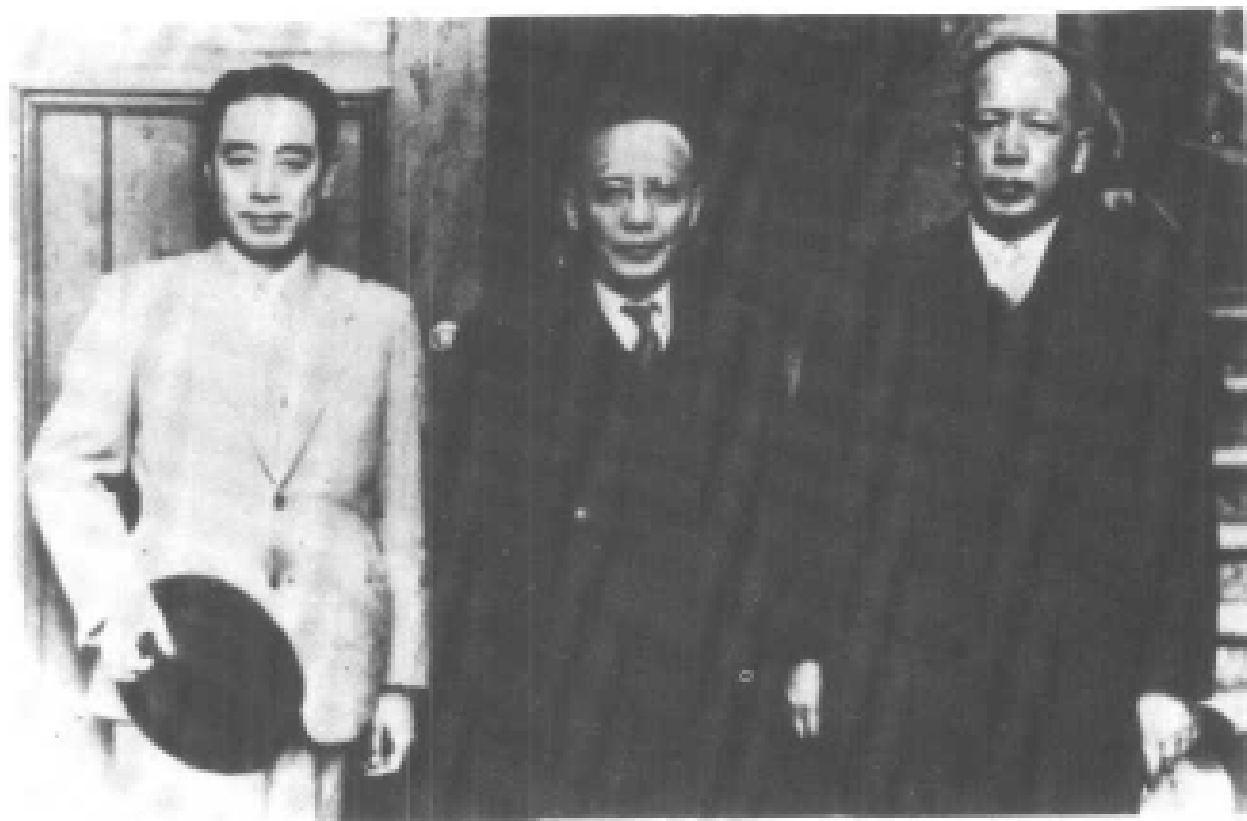


四、  
一九三八年  
在陕北公学  
分校李维汉  
(后二排左  
成仿吾(后  
二排左五))  
和学生们在  
一起。

李维汉一九四四年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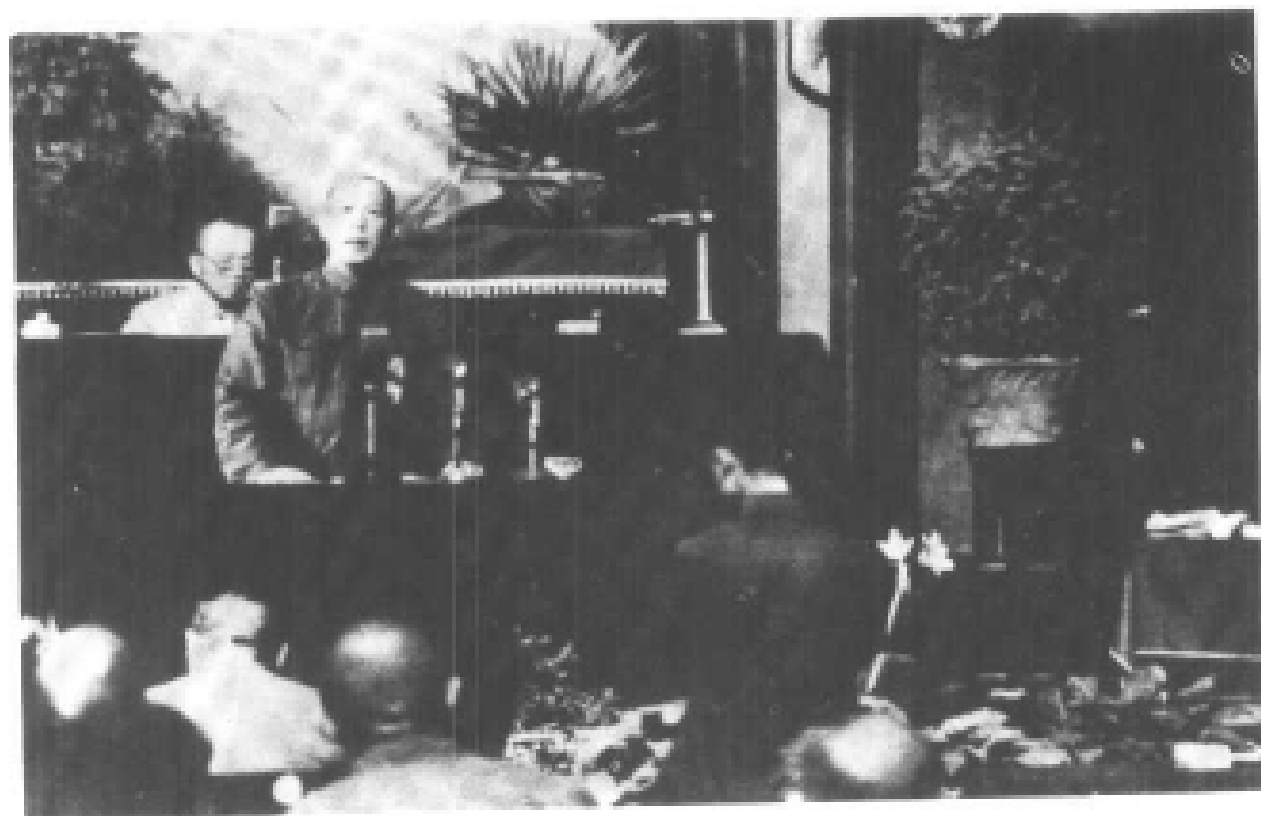
在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李维汉(左二)和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合影。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李维汉(右一)和  
周恩来、郭沫若合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时与民主同盟负责人留影。左起：周恩来、邓颖超、罗隆基、李维汉、张中府、章伯钧、沈钧儒、董必武、黄炎培、张君勱、王炳南。



一九四九年六月，李维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报告大会筹备经过。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李维汉亲切交谈。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右一）在协议上签字。



一九六〇年二月，李维汉（右二）、黄炎培（右一）、陈叔通（左一）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会上。

一九六一年李维汉在庐山



一九六六年李维汉(左)、徐特立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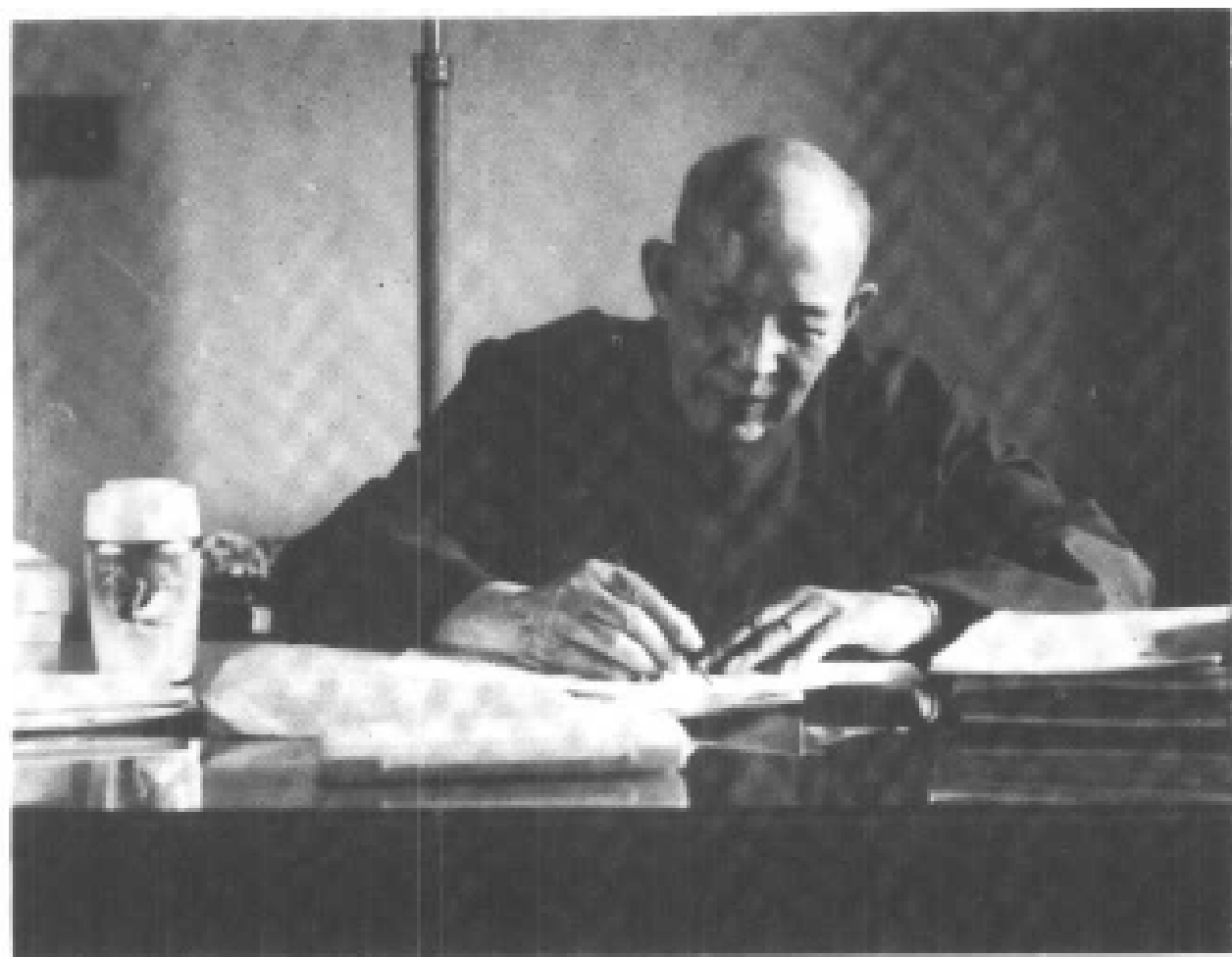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五月，李维汉在武汉「八七会议」旧址和工作人员座谈。



一九八一年五月李维汉在上海参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时题词。

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和邓小平亲切见面。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李维汉在出席



一九八三年春，李维汉带病撰写回忆录。

# 目 录

序 .....	习仲勋
回忆新民学会 .....	( 1 )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 .....	( 31 )
(一)建党时期 .....	( 34 )
(二)北伐战争的准备时期 .....	( 43 )
(三)北伐战争时期 .....	( 79 )
(四)大革命的失败 .....	(108)
(五)经验教训 .....	(121)
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 .....	(146)
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 .....	(156)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	(170)
八七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所做的主要工作 .....	(170)
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召开和我对几个决议案的看法 .....	(180)
盲动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和我去两湖巡视的情况 .....	(203)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和“左”倾盲动主义的基本结束 .....	(220)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 .....	(227)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	(238)

回忆江苏省委(一九二八年十月——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	(272)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	(321)
在中央苏区 .....	(335)
回忆长征 .....	(343)
初到陕北 .....	(369)
回忆中央党校 .....	(385)
回忆陕北公学 .....	(394)
中央干部教育部和延安干部教育 .....	(427)

## 目 录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少数民族工作 .....	(451)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 .....	(472)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	(498)
(一)毛泽东的嘱咐.....	(498)
(二)精兵简政 .....	(500)
(三)审干和“抢救”.....	(509)
(四)政权建设 .....	(516)
(五)自力更生，建设边区 .....	(537)
(六)文化教育 .....	(565)
(七)土地改革 .....	(590)
(八)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 .....	(601)
附件一：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一九四四年六月).....	(608)
附件二：罗迈秘书长的谈话.....	(618)
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 .....	(625)
真假和谈的斗争 .....	(653)
——记北平和谈	
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 .....	(67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任务和党对统一战线 工作的基本方针.....	(674)

一、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会议	(675)
二、巩固发展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	(683)
三、开展政权机关、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	(698)
四、筹备建立全国工商联,开展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工作	(701)
(二)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努力	(706)
一、为三大运动的胜利而努力,在三大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707)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726)
三、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729)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和基本经验	(731)
一、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733)
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赎买方针的制定过程	(737)
三、全面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749)
四、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和党的方针政策	(766)
五、我国和平改造的基本经验和几个问题的探讨	(771)
(四)过渡时期的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组织	(784)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785)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安排	(788)
三、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基本特点	(792)
四、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召开	(797)
(五)过渡时期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工作	(802)
(六)一九五六年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812)
一、召开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制定《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	(814)
二、普遍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	(817)
三、处理好两种类型的合作共事关系,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818)



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战政策的检查，大力改进党与非党 人士的关系·····	(819)
五、进一步贯彻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822)
六、继续贯彻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	(824)
(七)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827)
一、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827)
二、党外人士的整风运动和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	(845)
三、贯彻缓和阶级关系的方针。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 运动·····	(852)
(八)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的三年(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二年)·····	(856)
一、采用神仙会方式，大抓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	(859)
二、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关系·····	(864)
三、在精简、下放和副食品供应方面适当照顾·····	(869)
四、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870)
五、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帽子·····	(870)
六、一九六二年四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871)
(九)两场错误的批判(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	(875)
附件：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 意见(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889)
<b>编者的话</b> ·····	(894)

## 回忆新民学会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王的统治，使久受专制奴役的人民在精神上得到一次解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又没有得到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支持，这次革命的首要果实——国家政权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二八页）。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所豢养和扶植的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不断，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乡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愤于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新民学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部分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留法勤工俭学的革命活动和建党建团的准备工作中，也部分地起着骨干作用。现在，就我的记忆并参考当时的一些文献，将新民学会的情况，作一简要的回忆。事隔六十年，记忆的人和事情可能有所漏误，尚望了解情况的同志予以补正。

## (一)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一九一六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一九一七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一九一三年考入第一师范，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与毛泽东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昇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一九一七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

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昇）、萧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十四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议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

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八月，罗学瓚（云熙）、周世钊（惇元）、熊楚雄（瑾玕）、熊光楚（焜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同志平日所主张，而为一九二〇年七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一九二一年一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学会讨论会员向外发展的一个主要措施。

留法运动始于一九一二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等人发起，吴玉章同志也是发起人之一。留法学生包括官费、俭学和勤工俭学三部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的不多。战后，发展甚速。法国巴黎和国内的北京、上海都建立了华法教育会，有的省如四川、广东建立了分会，主持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民学会成立后，会员深感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必要。一九一八年六月，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子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在此之前，

已有湖南学生罗喜闻等在进行留法的准备，互通一些消息。新民学会的这次会后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赴北京和蔡元培、李石曾联系赴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则进行号召和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湖南也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分会。是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同我们准备留法的二十几个人到北京。在北京的会员至此增至十二人，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萧子璋、陈绍休、熊光楚、张昆弟、曾以鲁、邹彝鼎、李维汉、罗学瓚、罗章龙。同来北京的青年还有李富春、贺果、任理、侯昌国、唐灵运等。我们二十几个人从汉口乘火车北上，到了河南郾师（今郾城），因郾师以北铁路被大水冲断，在郾师城郊停留一天一夜，第二天步行到许昌，再搭车到北京。在郾师耽搁的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和有些同学三三两两的在附近和老乡们交谈，了解风土人情。到北京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是住在豆腐池九号杨怀中先生家里，后来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和蔡和森、罗学瓚等八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过着清苦的生活。杨怀中先生来北大教书前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和高等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思想开明、进步，为人刚正、真诚。新民学会的成立以及我们思想的“向上”，都同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关。对于留法运动，他也十分赞助，亲自出面联系，帮助筹措费用。

毛泽东同志当时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工作。其他会员除罗章龙在北大学习外，则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的留法预备班学习。萧子昇、萧子璋、陈绍休、熊光楚、邹彝鼎、罗学瓚在北京班；蔡和森在布里村班；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与李富春、贺果、任理等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保定的同学一面学习法语，一面学习机械学、机械制图。每人学一种工艺（钳工、木工、铸工等）。机械学和制图课的教员是刘仙洲。我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只学习半年。一九一九年初，邹

彝鼎病重，我和张昆弟护送他回湖南，不久，就病故了。他也是学会发起人之一，曾和毛泽东同志一起起草新民学会章程。他和后来留法，于一九二一年病故的陈绍休都是极好的同学。他们的夭折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和张昆弟送邹返湘后未再回保定。我自己是在为筹措赴法用费和安家奔走（我们一九一九年赴法的一批全是自备用费。我主要靠第一师范教员朱炎先生帮助一百元）。这时，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湖南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情绪异常激昂，纷纷起来响应，声援北京学生斗争。已于四月返湘的毛泽东同志和在长沙的会员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长沙各校学生罢课游行，抵制日货，进行爱国宣传，并在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改组旧学生联合会，建立以彭璜（后为学会会员）为会长的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来又由学生联合会发起，建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包括各阶层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个运动遍及全省。许多学校组织了“救国十人团”、“讲演团”。男校学生在街头，女校学生进入居民住宅进行宣传。有的学生还组织了贩卖国货团，上街卖国货，凡购买者随赠国货物品单一张，告诉市民哪些是日货哪些是国货。在长沙，有一次学生查获培德厚绸布店私运的二十匹日布，非常气愤，便联合各界组织了焚烧日货游行大会，将布匹当众烧毁。

以新民学会会员和非会员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湖南的五四运动中是个最活跃的组织，起着先锋带头作用。毛泽东同志当时主编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在湖南以至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北京的《每周评论》、《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湖南》月刊，四川的《星期日》，都曾介绍过它或转载过它的文章。它以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五四运动，宣传了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歌颂了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起来向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它在政治上对湖南地区的五四运动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刊物的许多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如萧子暲、陈书农、蒋竹如等所写，毛泽东同志写的尤多。毛泽东同志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提出以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实行社会政治改革，对抗强权者、贵族和资本家的主张，提出由分业“小联合”达到各界“大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指出“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代表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章。这个刊物发刊时，我尚在湖南，和张昆弟一道同毛泽东同志见过两次面，了解当时运动的情况，听取他对勤工俭学的意见。我曾按照第一师范第二部毕业同学录上的地址把《湘江评论》分寄给各同学，并介绍一点我所知道的运动的情况，希望他们在当地发动这个运动。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在湖南又吸收了一批会员，其中有：罗宗翰（耻迂）、张国基（颐生）、夏曦（蔓伯）、蒋竹如（集虚）、易克繻（闻灰）、向警予（俊贤，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翩（承德）、张怀（伯龄）、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钦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璧（韞厂，女）、劳君展（启荣，女）、谢南岭（维新）、徐瑛（女）、刘修秩（继庄）、钟国陶（楚生）、张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刘明伊（望成）、欧阳泽（玉生，玉山）、杨润余（女）、陈纯粹、萧业同（道五）、李云杭（舜生）、黄胜白、任寿鹏、熊梦飞、匡日休、萧青野、钟秀（雄轩）等。随后，易礼容（润生）、任培道（振予，女）、吴家瑛（德庄，女）、贺延枯（女）、吴毓珍（女）、郭亮（靖筵）、谢觉哉（焕南）、陈子博、蔡畅（咸熙，女）、熊季光（作莹，女）、熊叔彬（作璘，女）、刘清扬（女）、许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大多在国内，个别在法国，多数在学会中期，个别在学会末期，先后入

会。在长沙的会员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对会章略有修改，决议学会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等部，并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等为评议员。此次会后，正值驱张高潮，多数会员即离长沙。

湖南地区的五四爱国运动兴起后，军阀张敬尧始则严密控制，继则实行暴力镇压。一九一九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张敬尧带着马弁前来镇压，胁迫彭璜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彭璜不畏强暴，严词拒绝。张敬尧竟悍然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张敬尧的暴行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规模甚大的驱张运动随之兴起。张敬尧是安徽人，是北洋军阀皖系段祺瑞的走狗。他于一九一八年二月湘桂联军战败后，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及接近直系的冯玉祥一起进驻湖南，被段祺瑞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十分暴虐。人民对他早就十分痛恨。他对学生爱国运动的镇压，便成为驱张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在驱张运动中，学会开了会，决定联合各界一面进行驱张宣传，一面组织各界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活动，争取全国的同情。许多会员都参加了代表团。毛泽东同志和会员李思安、张怀、陈绍休、罗宗翰等联合湖南在京各界，组织了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作驱张机关。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湖南绅界、政界、军界、工商界以及湘籍国会议员，联合的人十分广泛。毛泽东同志等在北京办了一个“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的活动。彭璜、易礼容、何叔衡、夏曦等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先后分赴上海、武汉、衡阳活动。彭璜等在上海办了《天问》杂志，驻衡阳学生请愿团办了《湘潮》杂志，宣传驱张。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商专校长汤



松，楚怡学校校长陈凤荒，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斋务兼庶务主任赵鸿钧、《民治日报》主编张效敏以及北京国会议员陈嘉言，湖南绅界熊希龄、范源濂等对于驱张都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最后，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张敬尧于一九二〇年六月被赶出湖南，湘军谭延闿和赵恒惕控制了湖南。驱张运动的消息传到法国，湘籍勤工俭学生莫不称赞。及至传来胜利消息，更是雀跃不已。

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进驻长沙的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发出一个宣布实行“湖南自治”的通电，虚伪地表示要“施行地方自治”、“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一九二〇年四月，毛泽东同志为驱张事从北京到上海时，就和彭璜等讨论过驱张之后如何在湖南造就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促进湖南向较好的方向发展，并曾拟过一个《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文件，提出废除军阀统治，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见《天问》周刊第二一期，一九二〇年六月二十日）。谭、赵通电的发布，带来一个复杂的局面。谭、赵以驱张实力派的身份顺利地取得了湘南全省的统治地位，好象理所当然地也取得了代表三千万湖南人民的发言权，这是一。一九一三年反袁独立失败以来，湖南人民受尽军阀战争和北洋军阀暴虐统治的痛苦，张敬尧赶走后，惟恐北洋军阀再来，于是，“湘人治湘”的呼声四起。谭、赵举起的“湖南自治”的旗帜，正是利用人民的这种愿望，这是二。谭、赵的“以湘政分之湘省全体人民”的口号，本质是欺骗，但是为了装饰“自治”门面，在民众压力下，也将不得不采取某些极为有限的民主措施，这是三。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事情的两重性，新的军阀统治形式的矛盾性。面临这种复杂局面，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方针来对待谭、赵提出的“自治”呢？毛泽东同志不赞成采取笼统的反对态度，也

不赞成消极的抵制态度，而主张采取积极态度，参加到“自治”运动中去，利用矛盾，进行斗争，启发民众，揭露统治者，尽可能地争取扩大民主因素。新民学会会员们发起建立一个“湖南改造促进会”，提倡“湖南人民自决”，自下地发动争取真正“民治”的群众运动，同谭延闿、赵恒惕的“官治”相对立。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二〇年九、十月间，曾连续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说明“自治”必须是人民的“自治”，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自治”不过是只具外形，其内容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洞的（毛泽东《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见湖南《大公报》，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和在湘会员还联合湖南各界人士发表了一个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直接平等普遍地选举人民代表的建议书。十月，各界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解散旧的省议会，并发生扯下省议会旗子的事件。事后，谭延闿、赵恒惕就暴露了他们假自治的面目，诬蔑请愿代表“轻信游词、盲从暴动”（谭延闿一九二〇年十月十二日发的布告，见《湖南省志》第一卷第四一三页）。赵恒惕赶走了谭延闿，独揽湖南政权之后，炮制了一个“省宪法草案”，并于一九二二年一月正式公布施行。赵恒惕统治集团迫于民众自治运动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把某些资产阶级性的民主自由权利写进省宪里。因此，这部“省宪法”后来被毛泽东同志和湖南党组织利用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在进行驱张运动的前后，特别是在北京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据他后来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说，到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当毛泽东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到上海时，准备赴法的会员陈绍休、熊光楚、萧子璋、张怀、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刘明俨、欧阳泽等也先后到上海，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瓚、李思安，共有十二个会

员。他们曾在上海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为赴法同学送别。实际上，这是一次讨论新民学会会务的会议。这次会议决议学会应有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作风，并主张会员要多组织学术谈话会，使学会养成好学的风气。吸收会员要谨慎严格，会员要有诚恳互助虚心的态度（《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一九二〇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他和在湘会员在参加和领导湖南地区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团结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发起留俄运动。任弼时、肖劲光就是在这个运动中去苏联学习的。在传播新思想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湘江评论》、《天问》、《湘潮》以外，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参加主编过一段时间的《新湖南》周刊，以何叔衡为馆长，谢觉哉、周世钊、邹蕴真为编辑的湖南《通俗报》，龙兼公主编的湖南《大公报》等，都起过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而影响最大，与建团建党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则莫过于创办“文化书社”这件事。

“文化书社”于一九二〇年九月由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办，书社的《发起缘起》和《社务报告》都为毛泽东同志亲自撰写。书社经理是易礼容。书社不仅是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且是我们留法会员与国内会员，湖南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与国内其他省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络站。它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在全国也很有影响。参加发起和投资的除新民学会许多会员外，还包括教育等各界许多上层人士。书社销售的书有一百六十余种。营业后的半年中，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就有六十家，书社除在长沙设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设分社，在一些学校设贩卖部，负责人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和新民学会有联系的进步分

子。书社一直办到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被许克祥封闭为止。

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一系列活动中都联系着考虑和酝酿建党建团的问题。随后，在新民学会的会议上和国内外会员的通信中对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一九二一年，在长沙的会员一连开了三天会，讨论学会的目的、达到目的须采取什么方法以及如何即刻着手进行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报告了上年五月上海半淞园会议以及七月我们在法会员召开的蒙达尼会议的情况（蒙达尼会议的情况，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论述）。这次会议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问题上展开了和我们在法国蒙达尼会议相类似的争论。一部分会员如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彭璜、陈昌、易礼容等主张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另一些会员则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主张用温和的教育的方法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有的会员犹疑动摇于二者之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革命道路问题的争论。由于它在学会生活中还是初次出现，矛盾还未展开，故没有影响学会在组织上的统一。这次会议还决定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学会的一项活动。这种思想信仰的分化，随着前进的运动而日益加深，最后引导到学会会员在组织上的分化，以至整个学会（包括留法部分）的消亡。事实上以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只有一部分会员；而当时由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则已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代表它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此后，新民学会实际上就停止了活动。

## （二）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新民学会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活动，在

中国革命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形成一个空前的热潮。这两年中，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一千六百余人，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最多。湖南就去了三百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的提倡，以及熊希龄、章士钊、杨怀中等的赞助；另一方面也是军阀张敬尧摧残湖南文化教育事业，逼得学生走投无路的结果。日后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张督军‘恩赐’的机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有十八人，占会员总数三分之一左右。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二十多年、当时已经四十三岁的徐特立，年过半百的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还有贵州教育界的黄齐生（王若飞的舅父）都参加了赴法行列。同学们同他们见面时都称呼徐先生、蔡伯母、黄先生。

我和张昆弟等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到上海，和许多湖南学生一起住在静安寺路民厚里，候船赴法。位于霞飞路的上海华法教育会，人来人往，大都是到这里来办理手续，请购船票，打听消息的准备赴法的学生。报纸的“要闻”栏里刊载许多有关勤工俭学的报道，称赞赴法青年为“探险远征队”。我们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国邮船“宝勒加”号自沪起航。同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内有湖南青年四十二人，张昆弟、李富春、李林、贺果、余增生、任理、张增益等在内。我们坐的号称四等舱，实际是底层无等统舱。在海上航行了近四十天，许多人因船身颠簸、震动，头晕呕吐，食量锐减。尤其臭虫多得吓人，扰得我们夜夜不得安宁。一些人只好把袜子套在手上，把裤角扎紧，用毛巾把脸和脖子包住，只露出鼻子和眼睛，以求睡个安稳觉。随我们一起出国的领队人是勤工俭学发起人之一、上海华法教育会会长以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张继。他乘的是官舱。十二月七日，我们到达马

赛。华法教育会派人接我们到巴黎，把一些准备勤工的学生安置在巴黎西郊哥伦布的华侨协社里住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平促进会等几个华侨团体都设在里面。我们住的是一座活动的军用帐篷，据说是大战后美国人留下的。长四丈宽丈半的一块地方，住有三、四十人，都自愿地结成伙食单位，自己弄饭吃。我和李富春、张昆弟、李林、贺果、任理、张增益等人结成一个单位，凑钱买了一个煤油炉子。吃的主要是空心粉、马铃薯、面包，有时炒点卷心白菜或买点熟的肉食吃。

我们一边候工，一边学法文，看书报。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华法教育会的李石曾、吴稚晖都标榜笃信无政府主义。华法教育会办的《旅欧周刊》、以及旅法华工会办的《华工旬刊》也宣传这些思想。这些书刊对我们有很大影响。

我们在一九二〇年二月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励进会（简称工学励进会）。参加成立会的有李富春、张昆弟、任理、李林、贺果、张增益、李维汉等，当时在蒙达尼的罗学瓚随后也加入了。

我们都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国经过勤工达到升学的目的，便想尽办法奔向这条路上来。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它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但是，由于我们在出国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象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头脑里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

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但是，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没有能进一步探讨，以为走勤工俭学的道路就能达到这个目的。工学励进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状况下创立的。成立工学励进会的时候，我们订了几条约章，曾寄回国内在《时事新报》上刊登过。宗旨的大概内容是：“在积极方面，想联络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储金，定书报，互相勉励，疾病救助，工学交互，及为将来别种建画之预备。在消极方面，可以免除孤独生涯之烦苦，及环境诱惑之堕落，及懒惰之预防等事。”（罗学瓚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第二集）所谓“在积极方面”的几句话，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可是，我们究竟是有进取精神的青年，在以后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中，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

一九二〇年初春，华法教育会介绍我们到施乃德钢铁厂作工。这是个大型军火工厂，设有好几个分厂。李富春、贺果、李林和我在法国西北部的勒哈佛尔分厂，张昆弟、任理、欧阳钦、刘明伊在圣伯尼分厂，罗学瓚在法国南部的克勒佐总厂。我在工厂里做铸工（我曾在长沙湘军工厂艺徒学校学过一年半铸工），他们几个当钳工。当时铸工除吊车外都是手工，劳动强度很大。做了不到半年工，我的身体支持不住。大家劝我离厂。我应邀到张昆弟、欧阳钦他们那里，休息了一段时间。

在勒哈佛尔时，我们仍然住在一个军用帐篷中。早晚工余之暇，大家自学法语，有的勉强看点法共《人道报》和共产主义小册子，有时也共同讨论研究勤工俭学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工人生

活，我们都感到经过勤工很难达到俭学，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管制方法有了初步认识。五一节，看到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共和著称的国家，工人也无真正的民主自由。我自己自幼过着贫农家庭的生活，对于无钱无权无势的劳动人民受欺压的痛苦境况，有些感性认识。这时又看到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同样的情形，并亲自尝到这种滋味。我在一篇研究勤工俭学的论文中曾写下这样的认识：“现在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带着十分或九分的经济压迫的原因”，“布尔塞维克的俄国，凡是封建的遗物，如那些军阀、地主、资本家一概扑灭之，以组织世界经济，这样的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实现”。我曾呼吁“中华民族的男女学生打破智识阶级，牺牲着部分时光，做那些农人工人的解放事业。”（李维汉《勤工俭学研究发端》，见《湘潮》杂志，一九二〇年四月）可以说，我们在此短短的实践和自学中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只是一些感性认识，没有深入和展开，没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没有悟出工人农民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以暴力战胜暴力，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因而还没有跳出“工学主义”的幻想。新民学会会员中，毛泽东、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和森在出国前的一年半时间里，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一九二〇年二月，和森等到了法国，住在蒙达尼公学。和森没有上课，“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以“蛮看”报章杂志为事。在短时间内他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当时我和他相隔很远，仅有通信联系。工学励进会的情况就是由我告诉他，他又写信回国告诉毛泽



东同志的。和森是学会领导者之一。他到来后，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中心很快就移到了蒙达尼。他和在国内的毛泽东同志有密切的通信联系，使国内国外两部分会员联成一个整体。

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前后分批抵达法国以及在法入会的新民学会会员已有十六人，有的在克勒佐、勒哈佛尔、圣伯尼等地工厂做工；有的在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地学校补习法文。刚刚到法国的萧子暉、陈绍休等从国内带来半淞园会议情况的消息。根据半淞园会议关于“巴黎等会员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召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意见，我们商定在蒙达尼举行一次聚会。七月五日，会员从各地来到蒙达尼。从六日至十日，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开了五天会。与会者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暉、张昆弟、罗学瓚、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以及萧子昇（当时在华侨协社任职）等十三个会员。一些外省的工学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这个会，共二十余人。

这次会议最主要的成绩是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会上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同志，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和森在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详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地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

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蔡林彬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和森是我们留法会员中的先驱者。如前所述，我当时虽已经初步认识到改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改造的道路，还没有跳出小资产阶级工学主义的幻想。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要以革命暴力战胜反革命暴力，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还缺乏认识。我在会后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俄国式的革命，我基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反映了当时对这一根本点缺乏认识。接着又说：“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它，说来很长，且待研究……要多读书，多考察，多与友人研究后，再说”（李维汉给毛泽东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二四页），表现出思想的可变性。

蒙达尼会议开得很活跃，在辩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和道路之后，还谈论了个人感想、会务进行和求学方法。从人生观到宇宙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差不多都说遍了。最后一天更进行个性的批评与介绍。大家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各自并互相谈了个人的优缺点，思想和个性的极强处和极弱处，以互励互勉，取长补短。对于留在国内的会员，也由相知者向新会员作介绍。毛泽东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欣赏。他来信说：“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做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毛泽东给萧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

集》第三集)

会后，有些在其它地方勤工或俭学的会员搬到了蒙达尼。在校会员采取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两个方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我和几个迁来的会友在附近一个胶鞋厂做工，在工余学习。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同年八月，“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社员发展到三十多人。鉴于“工学主义”是工学世界社社员中带普遍性的倾向，我同和森商定召集全体社员到蒙达尼开会，请他出席并参加讨论。约在九、十月间，工学世界社开了三天会，住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大都参加。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记得出席会议的社员有：张昆弟、李富春、罗学瓚、李维汉、贺果、李林、颜昌颐、张增益、任理、萧子暉、唐灵运、陈绍常、傅烈、王人达、侯昌国、郭春涛、欧阳钦、刘明俨、汪泽楷、尹宽、萧拔、薛世纶、郑延谷、成湘等三十多人。此外，李慰农、余增生等个别社友因事未能参加，后来对于会议决议也都表示赞成。至此，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的宗旨已趋一致。它和新民学会一道很快成为勤工俭学生的领导力量之一。和森没有参加工学世界社，但他对于工学世界社宗旨的改变起着相当作用。

毛泽东同志得知上述蒙达尼会议的争论后，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写了数千言的长信给我们，对两种意见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在今天行不通；用平和的手段、教育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也做不到，而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第三三页）并在随后给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还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引者）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毛泽东同志不仅希望我们留法会员继续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而且在一九二一年新年时，与何叔衡一起召集长沙会员聚会三天，进行了郑重而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同志旗帜鲜明的主张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更加坚定了我们大多数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参加蒙达尼会议的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为例，后来就有八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萧子昇则继续沿着错误的道路滑下去，最后堕落为反动官僚。

蔡和森接读毛泽东同志来信后，曾和我们商谈，打算联络新民学会会员、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工学世界社社友等开一讨论会，如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两点上取得一致，则准备成立一个共产党。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

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新民学会的本身不多作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在他得知工学世界社成立的消息后，寄予关怀。他给罗学瓚写信说：“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毛泽东给罗学瓚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工

学世界社成立后，除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外，还组织了一个工学世界通信社，由罗学瓚负责，向国内发稿，报道留法勤工俭学和华工运动的情况。蔡和森、李富春、向警予以及其他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工学世界社社员都曾经往国内报刊投过稿。大部分稿件都经毛泽东同志转递。毛泽东同志很赞扬工学世界社这种形式的活动。他在一九二一年十月的一次欢送留俄学生的会上说：“我们总要有主义的进行，在法同学组织的工学世界社——革命团体——那办法很好”（见《谢觉哉日记》，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以蒙达尼为中心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两团体，在一九二一年曾经参加了勤工俭学生两次大的群众斗争的领导。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学运动”；一次是九月二十日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关于这两次斗争的情况，已有不少同志撰写过文章或回忆录，大体翔实，我不再重复。这里只就我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做些回忆。

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学运动”，习惯称为“二八运动”。先是，二月初，在巴黎近郊（华法教育会附近地区）有数百勤工俭学生在那里候工不得，靠领每日五法郎的救济金生活。我们和他们中的一些活动分子逐渐发生了联系。他们告诉我们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声明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诬蔑勤工俭学生“既无做工之志趣，又无做工之能力”，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拒绝资助，使同学们沦于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并声称要将学生“遣送回国”。他们希望给以援助。蒙达尼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一起，集会讨论巴黎近郊同学的要求。我们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发起一次求学运动。于是蔡和森、张昆弟、向警予、蔡畅、贺果、李维汉等大部分会员、社员去巴黎参加斗争。我们住在华侨协社不远的—

兼营咖啡馆的旅馆内，连日同近郊四百多同志的代表开会商讨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代表会作出进行求学运动的决定。提出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向军阀政府要求生存和求学的权利。斗争的具体目标是要求进入即将开办的里昂大学求学，发给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的补助，以四年为限。代表会向全体勤工俭学同学发出通告，向公使馆和法法教育会发出请愿书，向旅法上层人物发出请求援助书，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发出电报。二月二十八日，组织近郊四百多同学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箴请愿，相持大半天，群众被警察驱散，代表十余人被囚禁于警察局两小时左右始释放。“二八运动”没有实现原定目标，但迫使公使馆延长发放三个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济费，法法教育会答应继续为失工学生找工作。我们的斗争也并未就此停止。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由向警予、蔡畅、熊季光、熊叔彬、魏璧、劳君展等新民学会女会员联络其他女生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出致女界的公开信，要求里昂大学招收女生。同年九月，又发展为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

“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例如以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为首的“劳动学会”是一个进步团体，但当时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王若飞等一部分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他们都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他们提出“甘做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去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

“二八运动”教育了我们，迫切希望勤工俭学生内部加强团

结。我们请劳动学会派代表到蒙达尼出席工学世界社的会议，相互加强联系和了解。世炎、立三都到过蒙达尼交换意见不只一次。若飞则来蒙达尼和我们一起在胶鞋厂做工。通过交谈，我们双方的观点和认识迅速取得一致，并且共同行动起来。世炎在加强勤工俭学生不同力量的团结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劳动学会”为核心，组织了“勤工俭学同盟”，又进而联合“勤工俭学互助团”、“勤工俭学互助组”、“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劳人会”、“工学实践团”等勤工俭学生团体，组织了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一边力求自救，一边学习社会主义。他们在克勒佐工厂边劳动边在华工中进行工作，深受欢迎。到九月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之前，勤工俭学生中不同力量的许多部分逐渐趋于联合，以至能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采取统一行动，共同组织“勤工俭学生代表大会”的最高领导机构。

当时，代表大会决定分别通知各厂各校的勤工俭学生派代表组成一百一十六人的“先发队”，分头赴里昂集合。并决定我和萧子暉、向警予以及巴黎近郊和其它地方的同学代表组成十人代表团留驻巴黎，负责联络和争取声援。“先发队”同学到里昂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勾结法国政府将他们囚禁在一个兵营里面。十人代表团分途寻求支援，但都没有发生积极效果。我曾去里昂兵营向同学们报告巴黎活动情况，并提出另派代表去巴黎，我留兵营。后来依和森及同学们的意见，仍回巴黎参加十人代表团的活  
动。不几天，“先发队”中一百零四人在囚禁了二十八天之后，被法国政府武装押送回国。世炎在同学们协助下机智脱险，跑到法国北方靠近比利时的地方去做苦工，打扫战场。这次被押送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已查明的有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瓚、贺果、刘明伊、颜昌颐、唐灵运、肖拔、郭春涛等人。向警予随后也回了国。

这次斗争是从勤工俭学运动内部矛盾发展中爆发出来的。从它的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是从它留下的影响和收获的果实来说，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使法国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中国青年从五四运动以来迸发出来的一派不怕军阀统治，不受洋人欺侮，力争掌握自己命运的气势。它结束了似潮流般的勤工俭学运动。一切好心好意提倡这个运动的人，由此知道此路已经不通。至于那些企图借这个运动捞取政治资本的有野心的人，就只好自己去感受幻灭和悲伤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另外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在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回国后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这次运动本身是有缺点的，实际上居于领导地位的人冲在第一线的太集中；也不懂利用上层内部的矛盾，对蔡元培、李石曾与陈策等人没有区别对待，对于敌人的狡猾也认识不清。这次运动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〇年底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勤工俭学生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他。事后才知道他对这两次斗争甚为关注。他考察了运动的情况，写了很详细的报道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越到后来，报道的倾向性越鲜明，代表了勤工俭学生的呼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自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领导的觉悟社，已与李大钊同志和北大的先进分子有联系。一九二〇年，他在斗争实践中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赴法后，曾到英国伦敦一个短时期。一九二一年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纶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各用一个代号，叫乐生、伍豪、罗迈。党部设在巴黎意大利路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从工厂接受选云母片的工作，维持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延年还负责编辑过《工余》杂志。经世炎等的工作，我记得先是乔年后是延年陆续参加了少年共产党。延年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编辑机关刊物《少年》。他俩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反对陈独秀主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若飞在蒙达尼胶鞋厂工作时，和我多次在运河岸上散步并畅谈。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积极从事华工运动。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一月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我则由毛泽东同志和蔡和森介绍转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派回湖南工作。回湖南前曾给世炎、恩来去信告知结果，以后就再未同旅法组织发生联系。

当时已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都已加入了党或团的组织，参加了实际工作。留在法国的会员、社员后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在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从事学习和工作，并大都经过去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至此也结束了它们的活动。

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旅欧组织的创立者。我回国后不久，恩来和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回国以前，一直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慰农、王人达、任理、萧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端、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本立、范一、傅汝霖、戴坤宗、钟汝梅、吴平地、周贡植，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同志等，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这是一个初步查明的很不完全的名单，还可能有错误，待以后查实改正）。

### (三)

新民学会的成立和活动，处于中国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因而在它身上就必然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就革命阵线来说，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兴起于一九一九年，结束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它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姿态。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出现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和个人。由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就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是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形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新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是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在文化上的反映。它在一定条件下为“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六五七——六五八页）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是，五四运动的阵营是由不同的政治力量组成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政治战线的分化，也发生思想战线的分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八九页）毛泽东同志在这里说的“改造”，就是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既是对五四运动历史发展的总结，同时也包括了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新民学会建立于五四运动前，活跃在五四

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它的成员们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抱负，研究和探索革命的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跟随着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先锋毛泽东同志不断前进，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忠贞战士；一些人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影响下，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少数人则走向这面旗帜的反面，被革命风暴抛入浪底，成为沉渣。

当时，在我们同辈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际家。”这种评价，现在看来并不确切，只看到毛泽东同志当时重视革命的实践，没有看到他同时重视革命的理论。现在回忆起来，毛泽东同志从五四运动起，就表现出他是一个注意认识和实践相一致的先进战士。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历次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决果敢，势不可当的气概。对于革命理论（当时我们称为“主义”）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的。他指出，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给罗璈阶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学会初成立时，我们一班年青人不满现状，要求向上，讲求改造，有爱国思想，但是认识上还很朦胧，很空泛。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通过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明确学会的共同目标和达到目标的共同方法。我们留法的会员和在国内主要是在长沙的会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把学会的宗旨统一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标之下，并且在讨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时，使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倾向，抛弃了小资产阶级工读主义幻想，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我自己在勤工俭学时期，就是从爱国主义经过大约十个月这样的空想和幻想之后，在毛泽东

同志和蔡和森的影响下经过学习进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同志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很重视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重视参加当前的实际斗争。在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凭借和依靠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和领导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活动，如五四运动、勤工俭学运动、驱张运动以及省自治运动等，都取得一定的成绩。对于留学运动他是赞成的，因为它有助于开阔眼界，解放思想，从外国汲取革命的经验。但他总是把立足点放在中国，重点又首先放在湖南。他重视“留洋”（留法留苏）求真理，但更重视脚踏实地地在中国这个地盘的工作。对待问题，他既是从全局从长远着眼，又是从局部从当前出发。他曾说过：“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进行驱张和自治运动时，有的会员对这类运动曾有怀疑，认为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无需顾及这些当前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以为然，他一方面说明，类似驱张和自治运动，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都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它只是我们“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又是我们“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为易礼容信加的按语，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因此，不能迷恋当前的具体斗争而忘掉斗争的终极目标，也不能空有一个斗争的远大理想而不去参加和争取领导那些有利于人民的当前的实际斗争。事实上，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使湖南人民受到了教育。在实际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注意抓住时机，发动群众。一九一九年底，长沙发生了一个“新娘”赵五贞因反抗旧式婚姻在花轿里用剃刀自杀的事件。从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起，毛泽东同志连续写了十多篇评论，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这个事件的社会背景，从而在

长沙社会上掀起了一个反封建的宣传和控诉运动。

对于学会会务，毛泽东同志主张采取“潜在的态度”，注重“打基础”，“不张扬”，“不标榜”，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要“象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毛泽东给欧阳泽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毛泽东同志的深入社会，深入实际，埋头实干的好作风，对学会很有影响。在会员间形成了“言必及义”，不标榜不浮夸的好风气。毛泽东同志亲自编订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对于团结会员，探求真理，活跃会务起了极好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舆论的作用，注意抓舆论工具，湖南学生联合会一成立，毛泽东同志负责主编学联刊物《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封后，又主编第七期以后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刊，并通过学会会员在长沙掌握湖南《通俗报》和“通俗讲演所”。驱张运动时，在北京、上海、衡阳办刊物，办通讯社，并且重视利用如湖南《大公报》这样的社会舆论工具。以后又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同志通过这些阵地，揭露旧制度，传播新思想，聚集革命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对于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对于一切事物都主张采取分析态度，深恶那些“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以一时概永久”，“以主观概客观”的“论理的错误”（毛泽东给罗学瓚的信，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他在五四时期写的评论文章，都层次鲜明，有说服力。他给我们在法诸会友关于讨论共产主义的信，就是一篇有分析的说理文章，道理说得十分浅明、中肯、透彻。

在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很注意团结多数，包括团结社会上层

分子，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减少斗争的阻力。在驱张运动中，通过学生联合会，团结了反对张敬尧暴虐统治的各界人士，利用了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取得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接近直系的冯玉祥的一定程度的支持，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张敬尧。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投入了一个又一个斗争，这些斗争之所以取得不同程度的成绩，固然是多数会员努力工作的结果，而上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路程以后，来回忆毛泽东同志当年的活动和思想，倍加感到亲切，更加体会到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和作风，源远流长，放之四海而皆准。

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会员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许多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瓚、郭亮、夏曦等，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社员李林、颜昌颐、林蔚、李慰农等在后来的革命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一起，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

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后，立即投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担负起领导这一伟大斗争的历史重任。从党成立至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是这个斗争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党还处于幼年，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很缺乏。但是年青的中国共产党人，抱着英勇献身的精神，勇于革命实践，到工人、农民中去，到知识分子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大风暴，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空前未有的高潮。

湖南党组织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极领导湖南人民英勇斗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有一些失误和错误。湖南是我的故乡，在大革命时期，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同受英、日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反复争夺的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自一九二三年四月起，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党的“五大”前，担任了四年湖南党的主要领导职务（开始称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后称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五大”后称湖南省委员会，改由夏曦任书记），对湖南的工作负有主要责任。我的这篇文章，对这个时期湖南的革命作一简略回顾，记录史实，试图重新认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其中也包含了对自己的再认识。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旅欧少年共产党委派我回国向党中央汇



报工作，要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这时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也来信约我回国工作。十一月，我自法国启程。

到上海后，找到接头地点，原来是《向导》发行处，负责同志叫张学琅。他告诉我党中央已迁北京，我随即前往。过天津时，下车将恩来托带的信及画片交给正在达仁女校当教员的小超（即邓颖超），并把恩来的情况告诉了她。我到达北京，已经是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初了。我向中央汇报了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情况和要求，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邓中夏等在座。中央当即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支部，并决定将此事函告巴黎。同时，中央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蔡和森和毛泽东。中央还决定我去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接替即将调至中央的毛泽东的工作。我当即表示，我在法国三年，其中将近一年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转到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有两年，学习很少，水平和能力都远不及润之，担任这个职务是不胜任的。经中央同志再三向我说明，使我不得不接受这项任务，决心到工作中边做边学习。我在中央停留的短时间里，看了些文件、资料，和张国焘、邓中夏等谈了工人运动和其他运动的一些经验。中夏还带我参加了在北大红楼召开的民权运动大同盟的会议。我住在张昆弟（芝圃）处，当时他是交通部派驻京绥路的密查员，利用这个合法职务进行工会活动。我同他谈得比较多，他还给我三十元作为我给父母的赡养费。

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汉铁路开始总同盟罢工后，中央命我南下，先去南京、武汉，将中央关于声援罢工的指示信，以及给湖北区委的活动经费带给津浦铁路工会的王荷波和湖北区委的项英，然后再回长沙工作。我在南京浦镇机车厂的一个工人集会

上，找到王荷波，将中央的信交给了他。我到达武汉时，二·七惨案已发生，江岸站的罢工工人遭到军阀肖耀南的镇压和残杀，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壮烈牺牲，施洋被捕（不久也被杀害），一些比较客观地报道过工人罢工消息的报馆被迫停刊或遭到封闭，人心惶惶，形势紧张。党中央曾给我两个在汉口的接头地点，一个是《真报》报馆，一个是施洋律师事务所。我先找到《真报》报馆，看见大门上贴着封条，上面写着“扰乱地方，鼓动工潮”八个字，显然是出了事，我急忙去施洋律师事务所，敲门没有人应，推开大门，只见一个士兵在里面看守。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是来找施洋律师接谈关于诉讼的事。他说，施洋到督军署去了。我看势头不妙，赶紧说：“那我改日再来。”他不让我走，要我也去督军署一趟。我看只有他一个人，就掏出一张钞票给他，说：“你方便一下吧！”他接过钞票喊声滚，让我走了。在汉口既已无法接头，我只好将中央给湖北区委的指示信烧掉，乘火车去长沙。在长沙，碰到了项英，我把中央给湖北区委的经费交给了他。

我在长沙自修大学找到毛泽东。他见我回来，十分高兴，要我先回乡省亲，春节后再接交工作。从乡下回来，湘区党委安排我在船山学社附设补习学校当教务主任，作为公开的社会职业。

在交接工作的过程中，湘区党委开过两次会议，由毛泽东向我介绍全区工作情况和组织情况，青年团和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作了补充，并回答了我的一些询问。毛泽东在介绍工作经验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利用赵恒惕政府省宪法中的民主条文，进行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一是接近群众的方法，如在工人中办夜校、读书班，在学生中办刊物或组织社团，从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扩大成为建立工会、学生会的核心。毛泽东还单独同我谈了两次话，介绍湘区党委和各方

面负责干部的情况，并陪我到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李六如家里，一起谈了湖南上层人物的情况。

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四月底或五月初，毛泽东离开湖南去中央。

## (一) 建党时期

为了反映我在湖南这段工作的历史延续性，先大致追溯一下湖南建党时期的一些情况。

### 1. 湖南人民的光荣传统

早在十九世纪末，谭嗣同、唐才常等就积极在湖南开展维新运动，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湘报》，提倡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运动失败后，湖南人民参加了唐才常于一九〇〇年在武汉领导的“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的自立军起义。一九〇二年，邵阳、衡阳、湘乡、新宁、武冈等地哥老会，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竖起“大汉灭洋军”的旗帜，举行起义。这是一次具有反帝性质的反教会斗争。一九〇四年，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积极筹划长沙起义。一九〇五年，华兴会与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合并，联络光复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次年，在同盟会的推动和影响下，爆发了湖南浏(阳)醴(陵)以及江西萍乡的大起义。在辛亥革命中，湖南人民首先响应武昌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革命党焦达峰、陈作新联络湖南立宪派，运动新军在长沙起义，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结束了清朝政府对湖南的统治（焦、陈后来被立宪派首领谭延闿勾结新军五十标二营管带梅馨阴谋杀害）。一九一五

年，蔡锷（湖南邵阳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湖南人民奋起响应，进行了反对袁世凯称帝和驱逐军阀汤芑铭的斗争。上述斗争，由于历史的局限，缺少正确的领导，都失败了。但是它们不同程度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锻炼了湖南人民。

## 2. 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湖南人民的觉醒。在五四运动前一年，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等一批先进青年，在长沙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们怀着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理想，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发起并推动了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民学会会员、湖南学生和知识界的进步人士积极投身运动的洪流，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驱逐军阀张敬尧斗争的高潮。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出版的由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宣传民主思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对于推动湖南的反帝爱国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长沙其他一些学校学生会出版的刊物，如湘雅的《新湖南》、周南的《女界钟》、高工的《岳麓周刊》、明德的《明德周刊》、长郡的《长郡周刊》、楚怡的《体育周报》等，在宣传新思想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二〇年八月，在湖南文化教育界和社会知名人士朱剑凡、赵鸿钧、左益斋、易培基、姜济寰、王季范等人的赞助下，由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陶毅等新民学会会员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特别交涉员毛泽东。书社销售的新文化书刊有二百余种，半年内，全国与之发生联系的书报社和文化团体有六十家。书社除长沙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建立了分社，在第

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楚怡小学、修业学校设立了贩卖部。此外，新民学会会员黄醒在长沙储英源二十三号创设了健康书社。文化书社和健康书社经售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劳动界》、《建设》等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进步的书刊。文化书社在党成立以后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七年间，一直是我党传播新文化的阵地，对湖南革命运动和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二〇年八月，由易培基、姜济寰、方维夏、何叔衡、彭璜、毛泽东、包道平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并组织留俄勤工俭学，要去苏联寻求真理。同年冬，长沙《大公报》转载了上海党的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月刊上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介绍苏俄革命和列宁生平的文章。所有这些，都为湖南建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一九二一年初，在长沙，实际上已经形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共产主义组织。他们在上海党的发起组的推动下，开始在湖南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们回到湖南，正式建立湖南的第一个党支部，这个支部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从此，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阶段。

根据中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通告中关于上海等五地至迟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前成立区执行委员会的要求，湖南在党的“二大”前夕建立了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毛泽东，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郭亮。此时党员已发展到三十人，数量仅次于广州和上海，居全国第三位。在我主持湘区工作前这个时期的党员，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有：李立三、刘少奇、罗学瓚、陈子展、傅昌钰、

陈昌、刘春仁、夏曦、余盖、郭亮、彭平之、任树德、李涤生、萧石月、陈子博、谭影竹、杨庆兴、刘昌炎、袁达时、朱少连、朱锦棠、蒋先云、谢怀德、蔡增准、周怀德、毛泽民、周镜泉、黄静源、邹觉吾、李佳竹、宁秉钧、王禄生、罗君强、曹典琦、廖锡瑞、陈佑魁、戴晓云、王基永、萧述凡、李六如等。从湖北到安源工作的党员有李求实、陆沉、陈潭秋、余江涛、吴化之等。

自修大学是湘区党组织的一个宣传文化阵地，也是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的一个地点。它创办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校址设在船山学社（这是民国初年湖南一部分文人学士为讲述王船山学术思想而设立的一个机构，总理仇鳌，社长先是贺民范，后为何叔衡）。自修大学分文科和政治经济两科。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李达自沪回湘，在湖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任职，由毛泽东建议聘他担任自修大学学长。陈子展、黄衍仁、傅昌钰、陈昌、何叔衡、罗学瓚、曹典琦、夏明翰、廖锡瑞、刘春仁、易礼容、夏曦、贺果、毛泽东都是学员。一九二二年九月，船山学社内附设一个初中程度的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教育训练革命青年，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我一九二三年回湘后，在自修大学补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也是自修大学的学员。当时自修大学学员一面自修，一面在补习学校或其他学校兼课，同时参加党和团的工作。湘区党委的会议有时也在船山学社叔衡居室召开。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修大学被赵恒惕政府封闭，我们在犁头街租了房屋，供补习学校上课，以后成立湘江中学，迁至浏阳门外识字岭。湘江中学校长初为易礼容，后为何叔衡、仇鳌，教务主任曹典琦，姜梦周任训育主任，实际主持校务，教员有夏明翰、罗学瓚和我等人。湘江中学是继自修大学之后党培养干部和进行秘密工作的一个据点。

### 3. 湖南团组织的建立

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开始筹建，在湖南正式建党前，已有三十多人参加。他们是：晏远怀、李代鄂、唐自刚、欧阳晕、龙起庚、杨骏、杨韶华、周毓明(女)、谭克定、唐鉴、彭章达、李英、熊凤腾、傅昌熙、周逵、张俊学、周济、余映高、萧光球、刘大身、向以礼、彭平之、吴俊岭、何汉、向杰、廖振华、石镇寰、罗光续、尹希、姚士纯、刘成熙、周辅芝、傅由秋、萧述凡、李仁、李日孚等。

湖南正式建党后，团的组织进一步发展。党员一般都兼做团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五月，易礼容和陈子博代表长沙地方团组织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正式建立团的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书记。全省团的工作，由长沙地方团组织兼管。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团员已发展到三百余人。他们活跃在学生和工人中，并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湖南的党、团组织，特别是团的组织在学生中发展很快。党、团的工作基础，以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和衡阳的省立第三师范最好。夏曦、郭亮、萧述凡等都是一师学生。蒋先云、黄静源、黄春圃(江华)、黄克诚、戴晓云、张平化、张际春等都是三师学生。常德省立二师、周南女校和长沙稻田女师也有相当的工作基础。

### 4. 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

张敬尧被驱走后，湖南地方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相继以“湘省自治”、“湘人治湘”为号召，企图以此阻止外省军阀势力向湖南的扩张。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由于内部矛盾，谭延闿被迫辞去

湖南督军、省长、湘军总司令等职，由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和临时省长。赵独揽湘省权力之后，制定了“省宪法”，湘区党组织利用赵恒惕“省宪”中言论、结社自由的条文，以合法形式为掩护，在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中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二二年八月，由湖南省学联发起，组织了包括商会在内的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提出“拥护人民权利，发扬平民政治，完全实施宪法”的宗旨。它实际上是我党团结湖南各阶层人民向赵恒惕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由于采取了这个正确的策略，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得到比较顺利的开展。

在湖南党组织建立前，湖南工业学校毕业生黄爱、庞人铨，联络同学，以湖南第一纱厂为基础，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长沙发起组织湖南第一个工人团体“湖南劳工会”，其宗旨是“改造物质生活，增进劳工知识”。参加劳工会的有机器、电力、铁路、纺织、印染、印刷、理发等十几个行业的工人。劳工会会章规定凡工业学校毕业或有专门技术特长者皆可入会，因此参加劳工会的成份就比较复杂，既有工人也有监工和职员。一九二一年二月，湖南劳工会发动第一纱厂工人反对赵恒惕政府将纱厂租予私商经营的运动，两次举行游行示威，还准备由工人自筹资金，自行管理纱厂。这次斗争，遭到赵政府的武力镇压而失败，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和王光辉被捕入狱月余。同年“五一”，劳工会又参加发起了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湖南党组织建立后，对劳工会进行了争取、团结的工作。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劳工会的刊物《劳工》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针对劳工会的弱点，提出三点希望：(1)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手段赢得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胜利，“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2)工会组织要有民主产生的全权



办事机构，劳工会之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甚不妥当。(3)为加强工人对工会的组织观念，工人应该养活自己的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工人必须缴纳最低限度的会费。黄爱、庞人铨在湘区党组织和毛泽东的帮助下，改组了劳工会。他们二人于一九二一年底，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领导劳工会参加政治运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劳工会发起工界游街大会，反对美帝国主义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大会由黄爱主持，庞人铨任游行总指挥，参加会的有长沙各业近一万工人。这次活动反映了劳工会的进步。次年初，第一纱厂工人为要求年终(农历)双薪举行罢工，受到镇压，劳工会向赵恒惕政府提出抗议，纱厂资方同赵政府勾结，以协商为名，诱捕黄爱、庞人铨，并于一月十七日将他们杀害于浏阳门外，劳工会也被封闭。黄、庞牺牲后，部分劳工会会员在上海组织了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继续活动。湘区党组织对劳工会继续实行争取团结的政策，曾派何叔衡同劳工会代表一起赴广东韶关向孙中山请愿，揭露赵恒惕惨杀黄、庞的罪行，要求孙中山讨伐赵恒惕。以后，由于革命逐渐深入，劳工会的领导人开始分化，有的参加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同国民党右派合流，组织黄色工会，把劳工会引上了错误的方向。尽管如此，湖南劳工会在湖南早期工人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发生的影响，在湖南工人运动史上所占的地位，仍然是很重要的。

湘区党组织建立后，为加强对工运的领导，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工运的重点在长沙和安源两地(安源属江西，当时由湘区党组织领导)，以后逐渐向湘省各属发展，主要是领导各业工人进行争取建立工会，改善生活条件，保障劳工基本权利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底，毛泽东和刚从法国回国到湖南工作的李立三(当时叫李隆郅)等去安源煤矿进行调查，随后，党派李立三等以开

展平民教育的名义在安源建立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当局勾结驻军阴谋封闭俱乐部，驱逐负责人，镇压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九月，李立三同后来陆续派到安源工作的蒋先云、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由于领导策略得当，工人团结奋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岳州铁路工人要求革除监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举行罢工，徐家棚、长沙、株萍铁路工人纷起响应。铁路当局勾结湖北军阀萧耀南进行残酷镇压。郭亮当时任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领导了这次罢工，带头卧轨拦车，被捕入狱。这次罢工在粤汉全路工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南各业工人、全国铁路工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事后，粤汉全路工人进一步组织起来，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长沙新河建立粤汉铁路总工会。

水口山在湖南常宁，为我国当时最大的铅锌矿。一九二二年冬，受安源工人斗争胜利的影响，在湘区党组织派去的易礼容、蒋先云、谢怀德和该矿工人积极分子刘东轩等的领导下，该矿工人为要求矿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津贴俱乐部费用、增加工资、均分红奖也于年终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蒋先云被选为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主任。

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中，泥木工人和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有较大的影响。一九二二年五月，长沙泥木工人提出增加工价的要求，受到压制，湘区党委即领导泥木工人组织自己阶级的工会，脱离封建性的行会组织——鲁班庙。为了争取社会舆论支持，李立三在长沙《大公报》上撰文，说明工人要求的合理。一九二二年九月，经过泥木工人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任树德、袁福清、仇寿松、朱有富、杨福涛、舒玉林等的努力，正式成立长沙泥木工

会。十月，泥木工会罢工要求增加工价、争取营业自由。毛泽东和易礼容直接领导了这次斗争。毛泽东为工人起草了致省长的请愿呈文，并亲自充任谈判代表与官府谈判。由于工人团结一致，斗争方式灵活适度，又有各方面的声援，罢工取得胜利。

长沙的人力车工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车主都是恶霸，由于车行要营业必须先向警厅行贿取得车照才行，因此他们对工人的剥削压迫特别厉害。人力车工的劳动很分散，有些还是季节工，组织他们比较困难。湘区党组织先后派罗学瓚、谭影竹去做发动、组织工作，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才成立长沙人力车工会。五月，进行了要求改良待遇的斗争，取得胜利。工会很得工人信任。

一九二二年，还发生过织造、缝纫、理发、铅印、笔业、鞋业、洗衣业工人的罢工，在其他各业工人的支援下，都取得若干胜利。可以说当时长沙市的行业工人全有组织，但工作不是都做得很好。

一九二二年九月，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联合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发出通电，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会提出的保护劳工法案，并联合其他工人组织成立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开展了劳动立法的宣传运动。

在各业工人已经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长沙正式成立湖南工团联合会，毛泽东、郭亮分任正副总干事，任树德、罗学瓚等为各部正、副主任。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一个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统一的领导机构。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湖南工团联合会发动工人援助，发起募捐，召开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举行游行，向全国发布了声讨吴佩孚和肖耀南的通电。由于赵恒惕标榜“省宪自治”，不敢骤然依附直系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加之湖南工运在湘区组织

领导下，经过年余奋斗，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因而在全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的形势下，湖南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尚在继续发展。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株萍路转运局，以及常德的水泥、缝纫、石业工人，都先后进行了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虐待开除工人、要求集会结社自由的斗争，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此外，长沙的茶居、电灯、粪码头、箩码头（搬运）、店员、油漆、铜匠、划夫、邮务、碾谷、水夫（挑卖河水的工人）等业工人，以及湘潭锰矿、新化锡矿山、醴陵窑业、铜官陶业等工人都组织了工会。到一九二三年五月，全省参加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已达到三十余个。湖南工人已经形成一支相当坚实的革命力量。

## （二） 北伐战争的准备时期

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至北伐战争前，湖南党的主要工作有几方面：一、帮助国民党改组，恢复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发展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二、开始农民运动，逐渐建立工农联盟；三、在赵恒惕放弃省自治假面目、湖南统治集团向南（孙中山）北（吴佩孚）分化时，领导了驱赵反吴运动；四、组织民众反帝。这些工作，推动湖南革命运动日趋高涨，为北伐战争的到来作了准备。

### 1. 北伐战争前湖南统治集团的概况

北伐战争前，湖南处于南北争夺的局面。一九二〇年谭延闿被迫离湘后，即依附南方的孙中山，被任为大元帅府建设部长。赵恒惕则打着“湘省自治”的招牌，以巩固其统治，表面上独立于南北之外，实际上倾向于北京的北洋政府。一九二三年六月，沅醴镇守使蔡钜猷指责赵恒惕甘心附北，背叛西南，组织讨赵军，

反对赵恒惕。六月二十六日，孙中山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组织湘军，联蔡讨赵，于八月七日在衡阳通电就职。同月，赵恒惕组织“护宪军”，发表通电，同谭对抗，谭、赵战争爆发。八月三十一日，赵部第二十五团团团长朱耀华在湘潭响应谭军，引谭军袭取长沙，赵恒惕仓惶逃走。九月一日，谭军进入长沙，这就是湖南的“九一政变”。十月，赵恒惕得吴佩孚援助，向谭反攻，重占长沙。此后，赵恒惕即进一步依附吴佩孚，吴要赵取消湘省自治，赵也有此意，但担心所属各军和湖南人民反对，于是伪造民意，修改“省宪”，将“省宪”纳入北洋政府的“国宪”之内，实际取消自治以附北。因而赵恒惕政府成为湖南国民革命的主要对象。

当时，湖南实权操于援赵的直系将领马济之手，株洲以北，皆驻有吴佩孚的军队。拥护广东革命政府的谭延闿、程潜的湘军退踞粤北。湘西则驻有川军熊克武的部队，也时常与赵军发生冲突。谭、赵战争后，赵恒惕将部队改编为四个师：第一师贺耀祖，驻洪江；第二师刘钊，驻长沙；第三师叶开鑫，驻宝庆；第四师唐生智，驻衡阳。其中以叶、唐力量最为雄厚。唐生智早有取代赵恒惕统治湖南的念头。一九二五年南方革命政府经过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平定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变，以及一九二五年底和一九二六年初南征讨伐广东南部军阀邓本殷的战争，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次年一月，国民政府同桂系李宗仁、黄绍竑达成统一两广的协议。在这个过程中，唐生智为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曾经南北逢源，既同吴佩孚联络，也同国民政府联络，但总的态度日益倾向国民政府，声言不反对共产党，同意打倒军阀，对民众运动表示支持。

## 2. 湘区党委组织概况

一九二三年四、五月间，我接手湘区党委工作时，党委委员仍是何叔衡、易礼容、郭亮。郭亮负责工运；易礼容负责经济管理工作，掌管长沙文化书社、长沙织布厂，并任船山学社事务主任，一九二三年初，他一度去安源筹建并负责工人俱乐部的消费合作社；何叔衡负责组织；我兼任宣传；曹典琦、廖锡瑞分别为宣传、组织干事；戴晓云为区团委委员长，其后直至党的“五大”以前，杨福涛、夏明翰、缪伯英、戴晓云、萧子璋（萧三）、张汉藩、萧石月、陈佑魁、李涤生、夏曦、萧述凡、朱少连等都曾先后担任区党委委员或常委；继戴晓云之后，萧子璋、夏曦、萧述凡先后担任区团委书记。缪伯英于一九二五年初任妇委书记，一九二六年，她离开后，由熊季光继任。对于基层组织，湘区党委曾商定我和郭亮分工联系的办法。我负责联系粤汉路、铅印、第一纱厂、泥木、缝纫等支部以及面粉公司、黑铅炼厂等尚无支部的个别党员。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和党的长沙市委建立以前，湘区党委一般每周开会一次，必要时临时集会，大事情都是集体讨论决定。

当时，区党委尚未设立机关，开会经常是在船山学社何叔衡的住处，文件则存放在我家中。自修大学被封后，区党委在学宫街一所房子设立机关，以后秘书处迁往戴子桥一条巷一号，学宫街仍保留作为开会的地方。

## 3. 党的“三大”和“四大”

北伐战争以前，湘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三大”和“四大”的决议，即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进行农民运动；领导各阶层人

民，同帝国主义在湘势力、北洋军阀和赵恒惕政府积极开展斗争。

实行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的一项重大决策。孙中山经过辛亥革命、讨袁护法之役，累遭挫折、失败，深感过去依靠军阀武力的“革命”没有希望，深感国民党组织涣散，党员革命之“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见《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他开始寻求新的道路，逐渐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可以借鉴，同俄国革命党可以联合。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了国民党同苏俄以及中共的关系问题，认为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同他的民生主义不谋而合，而他的民生主义就包含了共产主义。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以后，他又多次同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接触，进一步商讨国共合作的问题，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二大”决定同国民党及其他革新团体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二大”以后，党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建议。当时，中央虽然尊重国际的建议，但大多数人只赞成同国民党建立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参加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这次会议以后，只有很少几个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就国共合作问题又专门作了决议，指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引自《共产党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

关系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同年五月,共产国际在给  
我党的指示中,又强调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要议程仍然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三大”接受了国际的决议,  
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第一  
步应该先实行国民革命。大会分析了国民党的状况,认为“中国现  
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正式决定同国民  
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大会认为,国民党有  
较长的历史和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威望,较之我  
党有更大的号召力,运用国民党的旗帜,有利于团结各阶级民主  
力量参加国民运动,也有利于我党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开展工  
作。大会所作的关于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策,对于中国革  
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会也正确地指出,国民革命  
虽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是在这个革命中间,无产阶级却是一  
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应该保持自己  
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大会还指出了农民在国民革  
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  
大会通过了较之“二大”制定的更为具体的民主革命政纲,作为全  
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和袁达时作为湘区党员代表,参加“三大”。“三大”以  
后,毛泽东留中央工作,袁达时大约在八月回湘,向区党委和党  
员传达了大会决议和大会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的争论情况。袁  
对我说,毛泽东让他带话给我,他认为安源工人应集体加入国民  
党,张国焘在会上反对工人参加国民党,估计张有可能来湖南活  
动,要我注意。后来张并未来湘,湖南的产业工人也没有全体加  
入国民党。

“三大”以后,在共产国际和我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于一九二



四年一月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宣布了政纲，实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最近，有同志对我说，在国民党“一大”文献中，有一个参加大会的湖南代表名单，其中有我。实际上我完全不知道被选为代表的事，也没有去广州参加过会议。代表湖南参加国民党“一大”的是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和林伯渠。

“三大”以后，党内曾发生忽视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而只集全力于国民党工作，忽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和国民党内左右派斗争的偏向。为此，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湘区党委派代表参加。代表是谁，我已经忘了。这次会议强调我党在国民党工作中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要“在国民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指摘右派政策的错误”，“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左翼”，要促使国民党不断加强反帝反军阀，要求民权原则的宣传，使之赞助农工运动。会议还强调加强党对工人的工作，说今后“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引自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会议决定在中央和各地方委员会的工农部内设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这次会议使我们对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和在统一战线中注意保持阶级斗争观念的认识，提高了一步。

对于产业工人是否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是，既然规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国焘的反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它不利于通过国民党的组织以推动革命运动。但也不必要全体产业工人都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应根据工作需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或以个人身份加入，或集体加入均可。扩大会议认为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很大错误”的说法，未免有些片面。后来，“四大”在这个问题上作了一些规定，说：“为在国民党中央发展劳动群众的左派势力起见，到必要时在一定区域内我们亦须领导大产业工人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特别的革命化。……民族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危险，还不在于工人加入国民党，却在于共产党在真正工人群众中没有势力及没有独立的职工运动”（引自中共“四大”《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这样，在工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上，“四大”改变了扩大会议的决议。

一九二五年一月，我在上海参加党的“四大”。记得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王荷波、邓中夏、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陈潭秋、张太雷、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等以及国际代表吴廷康（魏金斯基）。吴廷康和党中央委员长陈独秀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四大”通过的《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是由吴廷康起草，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它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个决议案和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将农民问题同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强调不解决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我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议决案》草案的审查小组，组长是瞿秋白。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原稿上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无

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由于考虑到国共合作关系，议决案上没有明确写上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字句，但以肯定的语句指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在政治上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而“那时的世界政治状况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这个分析是很可贵的。

“四大”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和我等九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棠等五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五人组织中央局，实际就是政治局。五个人的分工是：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农工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现在看来，党的“三大”和“四大”所制定的总的路线和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虽然还没有认识到统一战线中的既团结又斗争的辩证关系，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对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完全认识清楚，但是，“三大”正确制定了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四大”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可以说，在理论上已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但还没有形成一定的思想体系。

“三大”和“四大”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准备。

#### 4. 帮助湖南国民党重建组织， 同国民党右派的冲突

我接手湘区工作时，国民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实际已不存在，后来在湘区党委的帮助下，它才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

一九二三年三、四月间，湘区党委根据中央杭州会议精神，讨论如何推动国民运动的工作，提出一个从组织国民党入手进行政治运动的计划。国民党中央党部派覃振自广东来湘活动，他带来毛泽东给我的一封信，要湘区党委协助覃开展筹建国民党的工作。覃介绍当时湖南的老国民党员邱维震同我们相识。邱是律师，在长沙胡家花园有一座公馆，挂有律师事务所牌子。我和何叔衡、夏曦，以中共湘区党委名义同覃振、邱维震商量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的事宜，决定设立筹备处，由何叔衡负责。覃振在商谈后即离去。覃去后，国民党总部又委派夏曦、刘少奇在湖南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同年九月，毛泽东回湘一次，适值我去安源参加工人俱乐部举行的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活动，未能见到。他在长沙同夏曦商议了湖南筹组国民党的步骤，计划先在长沙、衡阳、常德建立支部，然后建立湖南总支部。我们参考这个意见，按照中央的方针和同覃振、邱维震商议的办法，动员党、团员加入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在长沙加入国民党的我党、团员已有易礼容、戴晓云、夏曦、夏明翰、李六如、罗学瓚、萧述凡、廖锡瑞、何叔衡、周毓明、谭克定、萧光球、唐自刚、杨人杞、曹典琦、傅昌钰、陈昌和我等。一九二四年三月，国民党中央委派夏曦在湖南筹组临时省党部，办理党员登记，宣传国民党“一大”的决议案。当时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达二百六十余人。四月一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湘区党委为了加强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曾设立国民运动委员会。大

约于一九二五年，又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由国民党省党部中的我党、团员组成党团，领导国民党的工作。

四月十七日，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创办机关刊物《新民》周报，以“科学的宣传文化和发扬真正民治”为宗旨。报社总经理是邱维震，经理是李六如，主笔由我担任。夏曦、廖锡瑞、杨人杞、罗学瓚、曹典琦、黄衍仁等经常为该周报撰稿。

湖南区委还在各县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组织。一九二四年我先后去宁乡、衡阳、衡山、湘潭等地巡视党的工作，同时视察国民党的工作，参加了衡阳、宁乡两县国民党党部的成立会，并讲了话。到五卅运动以前，湖南国民党组织共有正式县、市党部七处，临时县党部四处，县党部筹备处三处，直辖区分部五处，区党部二十六处，区分部一百三十六处，党员二千七百多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在长沙秘密召开中国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此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逐渐由秘密转为半公开。赵恒惕政府畏于国民革命的潮流，尚不敢公然进行镇压。我党对唐生智等的争取和同各方面上层人物的联络，也以国民党的名义出面。一九二六年三月，在打倒赵恒惕斗争的高潮中，国民党省党部完全公开。

湖南为了培养国民党工作的骨干，一九二四年起，陆续选派人员去广东参加国民党中央举办的政治讲习班学习。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中央为了加强北伐沿途的工作，还专门举办一届以湖南学员为主的政治讲习班，职员都是湖南人，理事有谭延闿、程潜、林祖涵、鲁涤平、陈嘉佑、毛泽东和李富春。由李富春担任讲习班主任。学员毕业后或随军或派回湖南工作。

湖南也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活动，但能量不大。一九二六年一月，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上海中央派黄英、杨伯隽来长沙，建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所”和湖南孙中山主义学会，

后来另组织了一个临时省党部，同国民党左派的省党部对抗。他们的主要人物有彭湃（不是海陆丰的彭湃）、杨伯隽、易家铨等。在长沙，受他们影响的只有赵恒惕御用的省农会，以及商业协进会、湘西学联会、湖南大学法科、湘西公会等少数几个团体。此外，在湘西也有一点影响，常德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主要是常德二师的学生。两个国民党省党部有时在长沙的报纸上同时登出启事，相互指责。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清厘党籍事务处紧要启事》，宣布开除夏曦、郭亮、王基永、萧述凡、陈佑魁、易礼容等国民党党籍，解散国民党省党部，重新改组。次日，左派国民党省党部也登出启事，给予反击。为对付国民党右派组织，我党、团区委同左派的国民党省党部合组了一个行动委员会，对他们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公开的群众场合批评其反动言行，揭露其首领的面目，对其所属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同时计划派党、团员打入其组织进行活动。前项工作颇有成效，后项工作因无机会，未果。我们还根据中央指示，组织湖南三民主义学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抗，陈昌、熊瑾玎、罗学瓚、姜梦周、曹子恒等都在其中任事。在常德以及长沙的一些基层，如第一师范，也建立了三民主义学会。同国民党右派的一次较大冲突，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中，右派组织雇用流氓数十人，到纪念会场捣乱，与到会群众殴打起来，群众游行路过其临时党部所在地伍家井三十一号时，愤而将其党部捣毁。

## 5. 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在湘区党委的领导下，通过国民党，以及公团联合会、省工团联合会、学联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赵恒惕的斗争。

抗议“六一惨案”运动，是这个时期湖南反帝反军阀斗争的第一个浪潮。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旅(顺)大(连)二十五年租借期满，中国政府照会日本大使要求收回。日本政府以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条约将旅大租借期限延长九十九年为借口，拒不归还。为此，全国人民掀起要求收回旅大的反帝运动，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以示抗议。三月底，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省教育会、商会等公团，发动群众，举行游行，并向驻长沙日本领事递交“警告书”。四月五日，由工团联合会发起，省城各公团组织湖南外交后援会，推郭亮为主席，进行广泛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六月一日，湖南外交后援会、省学联人员和长沙学生在日本租界码头宣传，正遇戴生昌公司日轮武陵丸、金陵丸靠岸，他们就在码头检查日货，向搭船的中国人进行爱国宣传。日本水兵开枪并上岸刺死群众二人，伤二十余人，造成“六一惨案”。陈赓在场，也被刺伤。

“六一惨案”激起了湖南人民更大的愤怒。当日，外交后援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罢工、罢课、罢市，提出撤换日本领事、惩办日本军官、惩办凶手、撤退日军、收回码头、令日使道歉、抚恤死者、赔偿伤者等八项条件交赵恒惕政府向日人交涉。六月二日，长沙人民举行抬棺游行，各工会、学校组织讲演团，上街宣传。有的商人、市民在门首贴挽联哀悼死者，还有人将“誓不购日货”标语贴于自己的长衫上以示反帝决心。岳阳、常德、衡阳、宁乡、湘潭、湘阴、浏阳、祁阳等市县也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赵恒惕政府和北京政府在群众的压力下，同日方进行交涉，但对高涨起来的群众运动又十分惧怕，借口群众在激愤情绪下产生的一些诸如剪日本布做的衫裤和拘“洋奴”之类的行动，于六月五日颁布戒严令，禁止学生出校。八日，又将外交后援会解散，逮捕该会临时干事刘士奇，并四处捉拿郭亮、夏曦、

夏明翰等。一场湖南人民的反帝斗争，暂时被赵恒惕以武力镇压下去，“六一惨案”的交涉也无结果。但赵恒惕的武力镇压并未能扑灭革命的火种，一九二三年冬，谭（延闿）、赵（恒惕）战争后，外交后援会又恢复活动。

一九二四年初，长沙人民进行了反对武汉日租界警察诬告华人田仲香行窃非刑致死的斗争。此外，还进行了追悼被日人惨杀的旅日华侨的活动和抗议美国天主教堂唆使教民侵占湘西十县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校址的斗争。群众反帝情绪越来越高。五月，湘区党委通过各公团在长沙组织了纪念“五七”和“六一”的游行大会，发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号召。七月，外交后援会等发起组织湖南反帝国主义大联盟。宗旨是“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各帝国主义侵略主义，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亲善，保全中国主权”。由包道平任委员长，毕承庚、郭亮任副委员长，罗学瓚、熊亨瀚、萧述凡、罗毅、毛懋勋、李泽、吴家瑛、蒋兆骧、方克刚、杨宗熙、黄惠君、凌炳、贝允昕、罗教铎、王莘聘、周薰瑕、李况松、谭影竹、周方、朱勉、蒋育寰、陈努力、龚饮冰、龚心印、欧阳刚中、朱伯云、伍芋农等为执委和候补执委。湖南反帝大联盟成立时，我写了《我所希望于反帝国主义大联盟者》一文，发表在《新民》周报上，希望“要以革命手段作废约运动”，不能依靠和平请愿，希望能将宣传和组织工作“扩大到民间去”，并且“勿存避免军阀压迫的苟且观念”。

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初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湖南人民反军阀的民主斗争。一九二四年十月，奉直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迫曹锟下野，吴佩孚退居汉口，直系失败。冯玉祥、张作霖等拥段祺瑞为临时总执政，入北京应付时局。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等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孙中山决定北上，在我党的影响下，于十月十三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



召集国民会议和国民预备会议的主张。正当孙中山离粤赴京途中，段祺瑞提出召集各省区代表开善后会议，解决时局问题，与我党和孙中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所谓善后会议，不过是军阀、官僚、名流政客会议，根本不能代表民意。我党号召反对善后会议，指示各地党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掀起一个包括劳动群众、中小商人在内的要求召集国民会议的广泛群众运动，并在运动中注意增强工、农、学生、妇女等组织的群众基础。后来，中央考虑到当时革命力量还弱，没有可能立即召集人民的会议，决定改变策略，主张参加善后会议，以批评揭露“善后会议”的真面目，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又向段政府提出国民会议促成会得派代表参加善后会议，人数要占善后会议总人数的三分之二的要求。如果段祺瑞拒绝人民的要求，就举行示威、抗议、罢工等表示反对。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中山致书段祺瑞，主张在善后会议中增加人民团体代表；涉及军事、财政的决定权属于国民会议，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国民党中央即通电反对善后会议。我党领导下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也掀起反对善后会议，促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在此期间，湘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通过外交后援会发起召开各公法团体联席会议，决定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建立“国民会议湖南促成会”，郭亮、谭影竹、龚饮冰、廖锡瑞、熊亨瀚、曹子恒等均在其中任职。十二月二十日，还成立了“国民会议后援会”，与促成会共同推动这一运动。后来这两个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合并。促成会曾派出代表到外地宣传，帮助建立组织，王基永去常德，罗学瓚、贺尔康去湘潭。常德、湘乡、湘潭、平江等市县都建立了促成会的分会。一九二五年一月，陈为人作为孙中山派出的国民会议宣传代表来长沙，曾同湘区党委接头。湘区党委安排他同长沙各公团接洽。我记得教育会曾组织过一次各公团代表参加的会议，由陈为人作了宣传国

民会议的演讲。

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湘区党委遵照中央通知，发动群众团体，掀起一个宣传孙中山遗囑，宣传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并通过追悼活动，在进步分子中征求国民党员，壮大国民党左派力量。长沙各公团组织了“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处，总务主任熊亨瀚，宣传主任王基永，庶务谭影竹，文书田波扬、陈佑魁、郭亮、刘春仁，会计杨福涛、缪伯英，编辑干事李亚农、曹子桓、龚饮冰，我也是编辑干事之一。四月十八日，在长沙教育坪举行追悼仪式，萧子暉、王基永、易礼容、周方和我都作了演说，宣传孙中山的革命历史和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十九日，长沙举行追悼游行大会，各学校、工团都来参加，游行群众手持“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小旗，高呼口号，景况十分热烈。长沙各学校还以湖南省民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宣传部名义，组织九十多个讲演队，在城乡内外宣传，印发大量宣传品，并演出了新剧。

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之后，湘区党委又组织纪念“五四”、“五五”、“五七”的活动。我在五月三日，曾以《“五四”后之反动与进步》为题作了演讲，记得徐特立、周方、易克嶷也在那一天作了演讲。

通过追悼孙中山和五月初的宣传运动，扩大了革命的影响，这对于推动湖南的革命运动，开展工运、农运、青运、妇运，起了很好的作用。

下面，我将分别叙述湖南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各方面的活动和工作情况。

## 6. 工人运动

一九二三年湖南的工人（主要是长沙和归湘区党委管理的安

源工人)已大多组织起来。他们在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除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外,还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过多次斗争。其中比较大的有:长沙造币厂反对厂长宾步程开除工人、拖延不发饷的斗争,第一纱厂要求加薪、逐年按成分取红利的斗争,以及长沙筲业、理发业、人力车工人和湘潭炭塘子锰矿运输工人的经济斗争等。少数斗争遭受挫折,大多数则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湘区党委为了组织工人,特别是组织分散的手工业工人,通过省工团联合会举办过多期工人补习夜校。手工业工人中的党、团员大半是从该校学员中吸收。我也到该校讲过课,对工人能较快地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深有感受。此外,省工团联合会还举办过职工运动训练班,培训工运骨干。泥木工会也办过工人补习夜校。

工会工作中,成绩比较显著的还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二年九月大罢工胜利之后,它得到工人的信仰和爱戴,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和很高的权威。俱乐部通过了工人自治条规,建立了安源矿区从未有过的社会秩序。路、矿两局对于有关工人权益的问题,必得通过俱乐部才能有效地实行。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俱乐部设立七处工人学校,五处工人读书处,工人学校还设有子弟部和工人家属妇女职业班。工人俱乐部消费合作社的股金曾达到二万元(一人一股,每股一元)。

在外县,平江工运发展较好,一九二三年就建立平江县工会,在纸业、制衣、鞋业、编业、木业等行业中开展了宣传和组织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平江反帝运动高涨,平江工会实际上成为平江革命民众的领导机关。工人在援助沪案、对英经济绝交、反英驱赵等斗争中起了中坚作用。此外,郭亮家乡铜官对河靖港的麻石工会也是组织得比较好的,大革命失败后,那里的党支部

一直坚持下来，一九三八年还派代表到延安同党取得联系。

到一九二五年五月，湖南省在我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四万余人。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培养教育，这个时期涌现出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分子。如湖南电灯公司的学徒廖去恶（即高文华），就在自修大学的补习学校上过课，后来入了党。还有第一纱厂的肖石月、邹觉吾、李佳竹、张维桢，理发工会的曹福生，电气工人俱乐部的黄玉阶，铅印工会的冯庚杰，造币厂的王子祥，石印工会的朱菊和，黑铅炼厂的宁希七，人力车工会的谭汉镇，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的刘东轩以及安源路矿的朱少连、谢怀德。谭震林也是攸县的工人干部。

此外，自一九二四年以后，青工运动也有所加强。是年底，萧子暉调任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后，加强了青工工作，在团区委下设立青工运动委员会，发起成立湖南青年工人互助团，并在湖南铁工厂组织艺徒补习学校学友会，以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共谋福利相号召，团结教育青年工人。这在青年运动中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湖南工运遭到反动政府的一次大镇压。水口山工人因反对赵恒惕所支持的新任矿局局长宾步程的所谓“整饬”和驻军强占俱乐部，包围了占据俱乐部的驻军，要求军队撤出。驻军悍然开枪，当场打死工人一人，伤二人，酿成惨案。俱乐部当晚开会，向矿局提出保护俱乐部、抚恤死伤工人、撤退军队、惩办凶手、发给欠饷等九条要求。宾步程进一步勾结驻军封闭俱乐部和水口山砂船、运输工会，搜查俱乐部职员，悬赏通缉俱乐部总代表蒋先云、赵白诚等十人，强迫工人上工，并解雇二千多工人。

俱乐部被封后，湘区党委曾多次派人前往重新组织，屡遭失败，直到北伐军进湖南后，工会才得到恢复。

## 7. 农民运动

在党的“四大”以前，湘区党委已开始进行农民运动，主要是通过乡村教师以及号召学生和工人利用寒暑假或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作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在乡当小学教员의党、团员，更要求他们用办夜校的方法，接近农民，发现积极分子，组织秘密农会。湘区党、团区委同他们经常保持通讯联系。湘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曾就发动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工作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号召学生“到民间去”从事乡村运动，注意了解社会环境，考察社会事实，进行农村状况的调查，并拟制了一个调查表，内容包括：所在地方地主有多少户，各类农民有多少户，各类农民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项目。

一九二四年，湘区党委决定由党、团员发起组织一个农民通讯社，宗旨为进行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交流各地农运情况。为了培训农运骨干，又于一九二五年选派了一批党、团员和优秀工人、学生去广州第四、五届农讲所学习。第四届学员有郭屏襄、李佳竹、徐鹤、杜克明、赵松德、黄志高、陈俊杰、龚泽湘。第五届学员有陈显谟、彭振卿、罗严、胡启霖、彭维生、葛东霖、陶汰、雷晋乾、庞叔侃、周振岳、傅恕、薛卓汉、易子义、蔡协民、卢子云、戴桔秋、李中和、易礼耕、舒玉林、朱友富、袁德生、宋岳灵、谢福初、龚泽民、张玉英、毛泽民、黄福生、宋友和、李渭璜、廖去恶、周玉昆、贺尔康、刘琦、余本健、张明生、萧韶、袁秀珊、袁福清、沈仲昆、隋清梅、王寿激、胡衡亮、夏明震等。四届学员黄志高、陈俊杰继续留在五届学习。一九二六年，又派罗哲、王芳、易慎斋、喻东声、吴谦、萧晃、胡祖舜、黄益善、何茂春、谭天民、朱子和、周振汉、谭思聪、陈炳瑾、熊熙才、王首道、隋水、罗章凤、杨子春、张志卿、向

回乙上

鹏、李敏树、李紫初等三十六人去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学习。我们还在湘江学校办了一个农村师范部，培养乡村教师以及农村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自治运动的指导者。广州农讲所和湘江农村师范部学员学习结业后，一般都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分派各县（以县为单位派遣一个），先到有小学教师活动和有关系、能立足的地方去工作，由点推广到面。我们还曾计划在湘江学校和育才学校内办农民补习学校，招收长沙郊区农民入学，加强长沙郊区的工作。后来因为农民没有时间来上课，计划未成，改为不定期举行农民同乐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湘江学校办过一次同乐会，到会农民二百余人，由党、团派人演讲，夹以游艺活动，反应甚好。湘区党委还通过团组织发起成立了一个农村补习教育社，办了十余所补习学校。这些工作，对以后开展农民运动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湖南农民运动中最早成立的农民组织是衡山的岳北农工会。一九二三年五、六月，水口山工人党员刘东轩利用回家机会，同衡山、衡阳、湘乡交界的白果地方的农民接触，工作颇有进展。刘曾几次给湘区党委写信要求派人协助。同年九月，戴晓云赴衡阳、水口山传达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湘区党委决定由戴颀道去衡山视察。据戴报告，白果地方已经组织了岳北农工会，加入者达三千多户，一万余人，还发展了团员，建立了团支部。九月十六日，农工会开成立大会，通过关于改良农民和农村妇女生活、农村教育及对政府的态度等问题的决议案，并通过宣言。农工会成立后，领导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谷米棉花出境的运动，斗争了地主廖利元。衡山是赵恒惕的家乡，农工会的发展引起赵恒惕和衡山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以“岳北遍地皆匪”为借口，派驻军捣毁农工会，并捕去刘东轩、谢怀德和积极分子数人。农民聚集七、八百人在白果抢救农工会领袖，被反

动军队杀一人，伤数人。因谭、赵战争，赵部从衡山退走，农民乘机将刘、谢营救出狱。不久，谭延闿败退粤北，赵恒惕重占衡山，又于十一月中旬派军队一营勾结土豪进一步摧残工会，枪杀农民七十余人，焚毁农工会会址和农民房屋二十余所。

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回家养病时，在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创办农民夜校，建立党、团和国民党的组织，组织秘密农协，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平粵阻禁斗争。到十月，已经组织起来的乡农协有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

一九二五年五月，根据湘区党委的指示，汪先宗在他的家乡株洲和湘潭东一区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向当地土豪汪孝逵进行平粵斗争，并且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废除“省宪”等口号。

## 8. 学生运动

湖南学生在革命斗争中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参加了历次重大的群众运动。五卅运动以前，有过三次较大的斗争，即一九二三年三月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驱逐校长宾步程，五月衡阳三师驱逐校长刘志远和一九二四年底维护教育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前两次斗争由于没有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学生，特别是那些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学生，引起学生内部分裂，形成驱宾拥宾和驱刘拥刘的对立派别，最后都因遭到镇压而失败。高工开除学生二十八人，三师开除学生五十三人，在三师任英文教员的衡阳地委负责人张秋人也被迫离校。

维护教育主权的斗争，具有全国的性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上海、湖北、四川、江西、山东、山西、河北、广东、浙江和湖南等省的学生先后组织“非基督教同盟”，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十一月，益阳教会学校信义中学发生

为抗议学校当局侮辱中国学生的百余学生退学事件；十二月，长沙雅礼大学和雅礼中学因反对学校当局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不准学生参加社会活动、逼令学生读《圣经》和美国教师无理侮辱中国学生，全体学生三百余人相率退学，开始了湖南各地反教会学校的运动。随后，雅各中学二百多学生为反对外国人在中国办学不向中国政府立案，损害中国主权而退学。醴陵、湘潭的教会学校也发生类似事件。湘区党委通过青年团和学联、工团联合会推进了这一运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时，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散发了《为非基督教运动节敬告同胞》的传单，提出“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取消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制止丧失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等口号。这次斗争持续了近五个月，虽然没有达到取消教会学校的目的，但提高了湖南学生的反帝热情。在这次运动中，我们注意团结教会学校同学，一是发动教育界组织“最高主权维持会”，帮助安排退学学生转学；二是原来学联议决拒绝教会学校参加全省运动会，后来改为准许教会学校学生以个人名义参加，使教会学校学生不致产生误会和对立。这些做法，都比一九二三年的学运有所进步。

## 9. 妇女运动

一九二一年三月，长沙即有湖南女界联合会的组织。第一届湖南女界联合会的负责人为陈俶、童锡桢、周天璞、吴钊、陶毅、黎群铎、魏振立。湖南党组织成立后，最早发展的一批女党员有许文煊、张琼、杨开慧、何宝珍、毛泽建、李灿英、罗向哉等，党通过她们在女界开展工作。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设立女工部，负责女工工作。一九二五年三月，湘区党委设立由党和团的妇女部联合组成的妇女运动委员会，加强对妇运的领导。妇委委员除缪伯英、罗向哉等女同志外，还包括青年团等方面的负责



人，如萧子暲、萧述凡、彭平之等。书记由缪伯英担任，她的公开职业为省立第一女师附小主事。国民党湖南临时省党部成立后，设立妇女部，我党、团员参加该部工作。一九二五年后，常德、衡阳分别成立湘西、湘南女界联合会。妇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和女界联合会，动员妇女参加国民会议运动。长沙团地委建立了青年妇女学艺社，这是长沙团地委团结女学生和青年女工的群众性外围组织，起了较好的作用。有的团员即是从学艺社中发展的。团区委曾通知各地也建立与学艺社性质相近的组织。此外，长沙团地委还出版了《青年妇女》。

一九二六年“三八”节，湘区党、团妇委会决定进行一次广泛的女子争解放的运动，由省女界联合会、妇女学艺社和长沙女师、第一女校及周南女校等发起纪念游行，提出保护女权、男女平等要求。同日，省女界联合会发刊《妇女先锋》，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女权运动应与国民革命相结合，指出“目前中国政治上的要求，正是急须继续完成辛亥革命”，“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必须在国民革命之后。故今后觉悟的妇女，应努力把妇女群众号召与团结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在革命的目的中谋得全体妇女解放的条件。”这个将妇女运动同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结合的方针的提出，是湖南妇运工作的一大进步。女界联合会同工团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一起在打倒赵恒惕政府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 10. 五卅运动在湖南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和五月二十八日青岛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湘区党委得知后，当即召开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声援上海和青岛的工人、学生、市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六月二日，由全省工团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发起，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有工人、学生、市民二万余人参加

的集会，议决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六月三日，长沙召开市民代表大会，选出张汉藩、熊亨瀚、曾三等四十一人为雪耻会执行委员，决定自六月四日起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六月五日举行示威。会议提出“不卖粮食与英、日人”，“不与英、日人作事”，“不买英、日货”，“不吸英国纸烟”，“不搭英、日轮船”，“工人退出英、日工厂”，“学生退出英、日人所办学校”，“不用英、日银行钞票”等对英、日经济绝交的办法。还提出“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军阀”，“收回海关”，“收回租界”，“参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等口号。六月五日，长沙举行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大会，各学校学生几乎全部参加，各团体亦纷纷加入，其中以工人为最多。参加游行的学生赤足草履，秩序井然。队伍经过省议会和省长公署时，雪耻会派代表持请愿书请愿，提出上海英捕房释放被捕学生；解除英、日巡捕武装，行凶者抵命；解除英、日在华武装；撤换英、日两国公使；惩办英、日驻沪领事；抚恤死伤者；没收英、日在华所办工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等要求。

对于高涨起来的反帝群众运动，赵恒惕十分恐惧。他软硬兼施，多方防范镇压。六月三日早上，满城贴出告示，宣称如有乱党“借端煽惑”，“一律拿获就地正法”。六日宣布全城戒严，切断各校电话，不许学生出校，街巷遍贴“四斩”布告：“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造谣生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十七日，水口山矿停工示威，即遭军警镇压，湘区党委特派员彭平之等二十余人被捕。赵恒惕在实行武力镇压的同时，又采取怀柔政策，企图缓和群众情绪，控制运动。他授意商会和教育会提出改组雪耻会，并指使其亲信组织募捐处，伪装对青、沪惨案群众斗争的支持。但是，无论是赵恒惕的高压政策还是怀柔政策，都不能动摇湖南人民昂扬的反帝斗争意志，改组后的雪耻会仍继续

为工团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所掌握。雪耻会通电要求全省各市、县组织雪耻分会，并决定将运动扩大和深入到农村中去。长沙学生有的自带旅费赴各县宣传，雅礼、雅各、福湘等教会学校学生纷纷退学以示抗议。六月六日，衡阳的“湘南对沪惨案雪耻会”正式成立，八日举行数千人的游行示威，并罢市、罢课、罢工一天。接着，安源、常德、湘潭、宁乡、安化、新化、益阳、沅江、湘阴、岳阳、平江、湘乡、醴陵等地都成立雪耻分会，举行了游行示威。赵恒惕的倒行逆施，使五卅运动在湖南不仅具有鲜明的反帝性质，而且逐步同反对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使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形成更大的浪潮。

## 11. 与赵恒惕高压政策的斗争

五卅运动后，赵恒惕加紧镇压湖南的革命运动，首先是镇压安源工人。

安源路矿工人自一九二二年罢工胜利后，曾取得一定的优势。但汉冶萍公司历年积欠日债甚多，公司实权已为日本人所把持，公司一面以廉价钢铁、煤交付日本抵债，一面拼命压榨工人，经常拖欠工人工资数月不发，还取消年终双薪。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不断进行斗争。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工人因向厂方索取欠饷，曾罢工多次。

汉冶萍公司的买办集团和湘、鄂、赣三省军阀，早就蓄谋伺机镇压安源工人运动，只是碍于工人俱乐部的力量强大，无机可乘。五卅惨案后，帝国主义利用奉直军阀镇压各地群众运动，上海、青岛、天津、汉口、南京等地的工人组织都遭到摧残，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恩颐也乘此时机到安源进行“整顿”。九月六日，盛到长沙，同赵恒惕策划镇压阴谋，并得到江西军阀方本仁的支持。十四日，盛到安源，先以发一个月欠饷麻痹工人，同时和赣

西镇守使李鸿程密商，请方本仁下令镇压安源工运。二十日，方本仁下达解散安源工人俱乐部，“拘拿首要，如敢抗拒，格杀勿论”的密令。二十一日晨，李鸿程派军队二营协同矿警突然包围工人俱乐部、合作社、学校，大肆搜捕，捕去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以及吴景中、刘忆然、郝云、许建人等二十余人，打死工人四人，伤十余人。随后开除工人一千二百余人，以武力押送出境。又宣布煤矿完全停工，失业工人达一万余人，安源顿时成了恐怖世界。十月十六日，黄静源即遭杀害。

惨案发生前，我党安源地委主要负责人陆沉曾作为工人俱乐部代表去汉口和盛恩颐交涉萍乡矿的经营及发清工人欠饷等问题。盛表面敷衍，以麻痹陆。陆回安源说：盛主张劳资调和，以缓和工人对矿局的斗争，我们须准备，以防其小进攻才好。安源地委据此分析盛“大的进攻，或者不敢”，思想麻痹，未作应变准备。事件发生后，领导人或被捕或仓皇撤离，群龙失首，斗争顿遭挫折。

黄静源被害后，安源工人异常悲愤，由朱少连组织三十余人，将遗体连夜背至醴陵之八十里坳地方正式殓殮，然后将灵柩经株洲运至长沙。湘区党委鉴于当时在安源事实上已不可能进行有力的革命反击，乃决定通过追悼活动，以揭露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罪恶。十月十九日至二十日，黄静源灵柩运往长沙途中，党组织发动沿途各界群众迎送，长沙还派出迎柩代表团赴醴陵迎接。二十日傍晚灵柩运抵长沙车站时，前往迎灵的有几十个团体的群众和市民数千人。群众抬着灵柩游行示威，经东墙湾、浏正街、柑子园、司门口、走马楼、府正街至教育会坪，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恢复安源俱乐部，黄静源精神不死等口号，情绪十分激昂。黄的灵柩停在教育会坪，当晚我曾去看过，被一个叛变了青年团员李济告密，赵恒惕反动政府派

人来抓，幸而我时已离开。

为了扩大追悼活动的影响，湘区党委向各地发出通告，要求于二十六日和长沙同时举行追悼大会。据事后报告，当天召开追悼会的有安源、醴陵、株洲、湘潭、衡阳以及粤汉路等地方和单位的广大群众。长沙的追悼活动，不顾赵恒惕的高压，按时举行。群众冲破反动军警的把守，进入教育会坪追悼会场，开会讲演，散发传单，继以游行。那天散发的传单多达数十种，其中有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共青团长沙地委署名的。群众送灵柩赴岳麓山安葬时，我也随队前往，至江边而还。

广大群众在悼念黄静源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昂革命激情，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深感安源工人运动遭受挫折，同湘区党委和安源地委工作中的缺点有关。主要有三：一、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以后，工人俱乐部在政治上取得合法地位，在经济上也得到一定利益，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二七”罢工时，赵恒惕打着省宪自治的幌子，对我党和群众运动没有肆意公开破坏，而当他从谭延闿手中重占长沙后，就加强了镇压手段。区委对这种形势的转变缺乏足够的认识。二、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一九二三年九月，我去安源参加罢工胜利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干部如李求实、吴化之等都曾向我反映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工作只注意合法的公开活动，什么都要厂方同意，不注意非法的秘密工作。我把这些意见向刘少奇讲了。一九二四年春，少奇离湘去广州路过长沙，我和何叔衡、郭亮又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少奇不以为然，因而发生了争论，无结果而散。此后湘区党委也没有进一步讨论和采取具体的改进措施。三、安源地委领导在一九二二年罢工胜利后，和平麻痹观念也有所滋长，缺乏应变准备。因

此，惨案发生后，中央指示反攻，执行已有困难。湘区党委虽然决定通过对黄静源的追悼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扩大革命影响，但工作作得不充分，争取各地和各界的声援也不够，这是一个失误。

我于十月十五日写了《安源工人之惨劫》一文，发表在《向导》周报第137期上。这篇文章在分析了安源惨案发生的客观原因之后，还指出：一、这次事件说明；在没有得到整个的最后的政治胜利以前，一切和平的建设事业，都保持不住；二、这次事件的教训不限于安源，全国被压迫民众都应认识其意义。这也大体反映了湘区党委的看法。

在农民运动方面，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株洲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员达五千余人。土豪汪孝逵为了破坏农运，勾结当地驻军叶开鑫部将农协领袖汪先宗杀害。株洲民众组织了汪案鸣冤委员会，向长沙、湘潭各方面请愿，揭露赵恒惕政府的罪恶。长沙、湘潭的工人、学生也举行追悼活动，并联络各界派人去株洲，将汪先宗烈士的遗体改葬。汪先宗是湖南农民领袖的第一个牺牲者，他同黄爱、庞人铨、黄静源一起受到湖南人民的爱戴和悼念。

株洲农民协会的建立，标志着岳北农工会被解散后湖南农民运动的重新兴起，虽然它遭到赵恒惕反动政府的镇压，但广大农民的革命斗争已势不可当。一九二五年十月湘区党委扩大会议以后，农运的纲领和政策更加明确，各地秘密农协组织发展很快。据一九二六年四月统计，全省有农协组织的已达二十八个县，有组织的农民达三万八千人。随着赵恒惕逃离湖南，唐生智进驻长沙和北伐军入湘，农民运动遂在全省各县更加猛烈地开展起来。

在学生运动方面。五卅运动以后，长沙长郡公学和兑泽中学学生的斗争，是学运中一次较大的事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长

郡公学四年级学生因筹组学生会，受到校长张有晋禁止，举行罢课。学校开除曾三、钟伟剑、康祖藩等人，学生提出质问，又被省教育司下令开除十八人，接着警厅还将曾三、杨孔万、钟伟剑等逮捕。与此同时，赵恒惕借口兑泽中学学生会会刊上提出辞退不称职的教员的要求是受共产党鼓惑，是赤化，下令开除段潇等九名学生，并派军队进驻长郡、兑泽两校，激起长沙广大学生的愤慨。十一月九日，省学联组织各校学生近万人赴省教育司请愿，提出政府须按月发足教育经费；学生得请求撤换和辞退不称职之校长、教员；学生得组织学生会，得派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开除学生须得学生会同意；学生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通讯之自由；军警不得干涉教育，撤退进驻长郡、兑泽之武装警察；恢复长郡、兑泽被开除学生的学籍；释放被捕学生等十一项要求。请愿学生在教育司露宿两日，秩序井然。我曾去那里看望，并同负责同志谈了话。赵政府对学生要求不予置理，并逮捕代表十余人。十二日，省学联决定举行全省总罢课，支持长郡、兑泽两校学生的斗争。常德、衡阳等地的学生立即响应省学联号召，罢课声援。

学生罢课期间，赵恒惕害怕学潮扩大，下令各报馆不得登载有关消息，并令各印刷厂不得排印学生的宣传品。区委即发动铅印活版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赵又以武力镇压，派兵封闭铅印活版工会，捕去工会代表易云卿等人。事后各报馆当局借助赵恒惕反动势力，拒绝罢工工人上工。湘区党委发动学生募捐，援助铅印工人。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长沙泥木工会等十一个工团发表抗议宣言。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为反对赵恒惕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封闭铅印工会发来声援电报。这次学潮，因为赵恒惕坚持高压政策，出动军警，并镇压声援学生运动的铅印工人；加之运动发展迅速，学生行动未能完全一致。区委据此形

势，认为罢课斗争难于长期坚持，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因而改变策略，决定复课。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有一个鲜明特点，即工人学生联合反对赵恒惕政府的政治压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次学潮带动了全省，边境县城也有罢课的。学生在斗争中注意联合教职员，提出代表教职员利益的口号如按月发经费等，获得教职员的同情。这些都是使赵恒惕虽取镇压手段，但又不敢过于凶残的原因。

## 12. 中共中央北京扩大会议 和湘区十月扩大会议

一九二五年九月，中央为总结五卅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工作方针，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地点在苏联大使馆。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十几个决议和《告农民书》。京、粤、湘区和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方组织在会上都作了报告，并分别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会议根据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坚决革命性，以及资产阶级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妥协性，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并根据在中国南部和中部逐渐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的事实，指出实现“耕地农有”是使农民拥护革命的根本政纲。会议通过的《告农民书》，提出了作为当前奋斗目标的农民的最低要求，主要是组织农民协会代替劣绅包办的农会，由农民选举乡村自治机关，由农协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和最低谷价，反抗苛捐杂税及废除陋规，由农协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等。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领袖，“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阶级——能够有所根



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见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在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会议强调要尽量扩大我党的组织，加强我党独立的政治宣传，使我党成为群众化的党。会议认为过去的国民党右派早已公开反动，离开了国民党，中派也已分化为左派或反动派，划分反动派和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应以他们对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动派和工农运动、联俄联共政策的不同态度而定，指出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尽力赞助国民党左派，与之结成密切的联盟，反对包括戴季陶在内的国民党右派。在职工运动议决案中，会议根据天津、唐山、安源、上海、香港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指出做“长时期的秘密组织的准备”的重要性。在组织上，会议决定撤销工农部，改设职工运动委员会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增设军事部，以加强对工农运动和武装工人工作的领导。中央这次扩大会议，由于有五卅运动以来四个月的经验，对于一些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较之“四大”时，又有发展和提高，而且比较具体。

我代表湘区党委在会议上作报告，汇报了九月二十日发生的安源惨案并作了自我批评。由此，会议在湘区报告议决案中，批评湘区党委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有规避争斗而习于和平发展的倾向。”中央扩大会议的这个批评是很严厉的。现在看来，当时区委在领导群众运动中，还是注意了将工农青妇为争取自身的切身利益的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注意了引导群众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同学生运动日益结合，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赵恒惕反动政府，斗争的政治色彩愈益鲜明。但是，正如前面所述，湘区党委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对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认识并不清楚。当时湘区党、团组织是秘密的，区委的组织、宣传、秘书、军委等组织均不作公开活

动。区委成员中仅郭亮、夏曦公开了党员身份。我在北伐以前，党外叫李维汉，党内叫罗迈，北伐后我才公开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党内仍用罗迈这个名字。由于区委及党的负责干部，大多数都从事公开活动，共产党员的面貌事实上是公开了。历史地看，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群众运动需要有威信的领袖来领导，领袖人物或者是从外面派进去的党员，如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或者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如泥木、缝纫等工会领袖，他们同时担任了支部书记。在反动统治下，我们应该适应公开活动与秘密活动又分开又联结的需要，在党支部和支部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内准备好公开活动与秘密工作的两套干部班子。而我们基本上是一套人马，组织虽然秘密，干部却大部分是公开的，这就使我们在一旦发生事变时无法应付。少奇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写的《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完全采取不同的方法，并完全由不同的干部来作，同时又使两者联系起来，配合为党的整个工作。”关于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区分和联系，我们党经过大革命和内战两个时期的实践，才逐步认识清楚。少奇的这段话概括了这方面的经验。

为了贯彻这次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湘区党委于十月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中央扩大会议的情况和决议精神。湘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决议精神结合湖南具体情况，着重讨论了五卅运动以来湘区党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通过了关于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问题的决议。现在可以找见的只有一个《农民运动议决案》。这个议决案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认为佃农、雇农是农村中的革命派，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同盟军；自耕农是农民中之中立派，在政治斗争中我们应联络之，在经济斗争中应中立之；地主阶级则为农村中之反动阶级，目前对

其恶劣者应攻击，对无大恶者可暂取缓和态度。《议决案》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提出了一个十四条要求的政纲，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农协和乡村自治政权机关应由农民选举，不得绅士包办；取消团防地主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由农协及乡村自治机关规定最高租额、最低谷价，反对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土地交给农民等。这个议决案说明湘区党委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较前有很大提高。会议决定在区党委下设农委，以夏明翰为书记。

这次湘区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安源惨案问题。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区党委根据中央扩大会议和湘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作出《关于安地事件的决议》，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安源惨案发生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勾结镇压安源工运的必然性，以及安源第一次大罢工胜利后领导思想中的和平麻痹观念。

### 13. 反英讨吴驱赵运动

中央北京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出现了一个反奉战争的革命高潮。一九二五年十月，直系浙江督军孙传芳发动讨奉战争，吴佩孚通电响应。奉军郭松龄部同当时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国民军联络，反戈讨奉，直逼沈阳。一时，在北方出现了客观上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我党中央于十月二十日与共青团联名发出《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反奉战争不纯是军阀之间的战争，由于反奉运动是全国民众的，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不仅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反对奉军，而且北方的国民军也同情民众的爱国运动而反对奉军，因而，在“直系动兵的旗帜上，不得不染点民族运动的色彩”，反奉战争“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战争。”宣言号召爱国民众“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的参加战争”，“集合全国所有反奉

的力量，在帝国主义者助奉或助直的政策尚未确定以前，在直奉的关系尚未有新的变化以前，肃清奉系军阀的势力，确定革命的民主政府之局面”。宣言指出此次反奉战争的目的，从全国民众的角度来说，是要求实现包括释放政治犯，解除奉系和安福系武装，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自由，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关税自主，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举行以反对关税会议为导火线的反奉倒段的集会示威，提出打倒段祺瑞政府，召开国民会议，建设国民政府的口号。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日发出通告，要求各地响应北京人民的示威运动。湘区党委接到通告后，即通过工、学团体组织反对关税会议运动示威大会筹备处。十二月七日，大会通过扫除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打倒一切军阀，建设人民委员制政府等五项决议，要求赵恒惕政府释放由于长郡、兑泽学校事件被捕的学生，启封铅印活版工会。示威群众行经《大公报》、《通俗报》馆时，因这两家报馆攻击过学生运动，压迫印刷工人，愤怒地打碎了它们的招牌。示威群众还撕掉戒严司令部贴在铅印活版工会门上的封条。到省长公署向赵恒惕请愿时，示威大会代表对其压迫民众运动的倒行逆施一一提出质问，赵惶然不能对答，群众高呼打倒赵恒惕的口号。这次行动后，十一月份被捕的学生、工人曾三、易云卿等被释出狱。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根据湘区党委的决定，由国民党省党部出面，在省教育会幻灯场召开各团体代表会议，到会千余人。王基永（当时为我党在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党团书记）报告开会宗旨，说明北方政局的变动，正是国民运动发展之日，民众应一致奋起，团结奋斗，夺取政权。会议通过了反对奉系军阀及一切卖国军阀；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反对关税

会议：迫段祺瑞下台，召集国民会议，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等决议。这次运动证明，赵恒惕政府未能把日益高涨的以学生、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斗争镇压下去，他的反动统治的危机正在加深，已经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

反奉战争中，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出兵援助下组织反攻，郭松龄战败被杀，吴佩孚从反奉转向联奉，破坏反奉联盟，使革命的有利形势受到挫折。这就使湖南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军阀的真面目。二月二日，湖南雪耻会纠察员在福兴门外阻止英、美烟草公司卖烟、抽彩时，被英人打伤，更加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怒，从而掀起了一个反英讨吴的群众运动。二月十日，省学联出面召集长沙各公法团代表开会，议决组织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推举熊亨瀚、张坦然、潭因、杨纯一、曹子桓、王东亮、曹羽仪等七人为委员，警告赵恒惕政府不得偏袒英人，并通电讨吴，请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三月三日，反英讨吴行动委员会召集省垣各界三千余人举行集会并示威游行，谢觉哉等四代表至省署向赵恒惕请愿，赵未敢出见。八日，早有取代赵恒惕统治湖南之意的唐生智，乘势以“郴宜米贵，给养困难”为由，令所部一个团自宜章、郴县开赴衡山，向长沙逼近。赵恒惕十分恐慌。湖南人民也已经从赵恒惕政府的反动统治中认识“省宪”的虚伪性。区委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群众的觉悟，认为在反英讨吴的群众运动中提出废除“省宪”的口号，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三月九日由国民党省党部出面召集长沙市民大会，号召反英讨吴驱赵。这次大会通过了二十四条政纲，提出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取消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恢复被封之一切民众团体、请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及督促湘政府北伐等口号，并议决组织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以为督促实现这些要求的机关。宁乡、衡阳、平江、常德都开展了这一运动。长沙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

群众大会一个接连一个，街巷贴满了标语。湘区党委还以共产党的名义印发揭露英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之新计划、吴佩孚卖国真相等传单。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周年日，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广泛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我党、团负责人都在长沙公共体育场公开讲演，“均各发挥尽致，听者为之动容”（据当时长沙《大公报》）。

赵恒惕迫于广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唐生智势力的逼迫，湖南群众的压力，于三月十二日出走。行前发去职通电，委唐生智为内务厅长，代行省长职权。至此，统治湖南五年之久的赵恒惕反动军阀政府宣告垮台。

#### 14. 争取唐生智，迎接北伐

在反英讨吴驱赵运动前后，我们利用唐、赵矛盾，进行争取唐生智的工作，这是区委准备迎接北伐的一个重要步骤。当时，唐生智为巩固权位，壮大实力，一面敷衍赵恒惕，一面秘密联络广东国民政府，曾托黄绍竑表示输诚之意；对于群众运动，他也采取比较开明态度，以求民众支持。因此，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衡阳学生的罢课斗争进行较为顺利。湘区党委采取利用矛盾建立反赵联合战线的策略，曾以国民党名义派人同唐生智、叶开鑫、夏斗寅、熊克武等联络。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派夏曦去湘西争取熊克武，不成。年底夏又去衡阳同唐生智联络。其间，夏曾用五倍子水写密信给我，报告联络情况。一九二六年一月，又派王基永去衡阳，向唐提出七项最低条件：①发通电主张速开国民会议；②通电讨伐吴佩孚；③政治上与国民政府取一致行动，与国民军合作；④立即表示与人民共同反赵；⑤保障人民自由，恢复水口山工人俱乐部；⑥反对联省自治；⑦军队中施行政治训练。区委的政策是逼唐参加联合战线，若唐不承认这些条件，即揭破其假面具。王同唐接洽结果，唐对我们所提条件大体赞同，并进

一步表示支持广东国民政府之意，还送二千元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作活动经费。三月十六日，唐自衡阳到长沙，对时局持观望态度，不肯就任代省长职务，表示要维护赵恒惕的“省宪”，保护省议会，并电请第一、二两师师长贺耀组、刘鏊赴长沙共商善后；对三月九日长沙市民大会通过的二十四项要求，态度暧昧，不许雪耻会查禁日、英货物，也不许提反对吴佩孚的口号。但对工农青妇等民众运动，尚能允许相当自由，不加压迫。

三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代表陈铭枢、白崇禧来湘，湘区党委决定由国民党省党部和长沙各界出面组织欢迎活动，并以国民党省党部名义制定“欢迎国民政府代表来湘宣传纲要”，借此扩大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进一步促唐左倾。唐生智与陈铭枢、白崇禧会谈后，达成了初步协议，同意与广东国民政府联合反对北方军阀，接受国民政府任命，改编所辖军队为国民革命军。三月二十五日唐宣布代行省长职权，诱捕了亲赵的第二师师长刘鏊等，并令所部进击驻在湘阴、新市、桃林及岳州一带的叶开鑫师。

唐生智进驻长沙后，吴佩孚纠集豫、鄂、赣军及湘军叶开鑫，粤军谢文炳组织所谓“讨贼”联军，企图阻止广东革命势力的发展。四月下旬，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助赵恒惕攻湘。叶、唐两军战争全面展开。四月十二日，国民党省党部出面召开市民大会，仅长沙近郊农民就有两万多人参加，夏曦、徐特立在会上发言，号召人民起来支持反对吴、叶的战争。长沙学生和工人组织慰劳队和救护队赴平江、湘阴、汨罗前线，慰劳和支援唐生智的部队。叶军在吴军支持下，打着“讨赤”的旗号，于五月二日重占长沙，唐生智退走衡阳。湘区党委决定夏曦也随唐退走，以便继续对唐进行工作。

长沙在吴、叶统治下，一片黑暗。吴、叶军队搜查学校，殴辱学生，摧残工农组织，勒索商人，封闭雪耻会和国民党党部，

奸淫掳掠，无所不为，激起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怒和反抗。湘区党委开会讨论对付这次事变的政策，认为贺耀祖对广东国民政府有过输诚表示，他与唐生智虽有矛盾，但对吴、叶也不满，参加讨唐是被吴、叶所逼迫。因此，确定争取贺耀祖，集中力量反吴、叶。

唐生智在吴、叶军的压迫下，政治态度有好转表示，六月二日在衡阳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职务；正式宣布废除赵恒惕政府的“省宪”，解散赵之省政府，设湖南临时省政府，自任省长，并宣布解散各县议会，取消赵政府颁布的“工会规程”，代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会法，还公布湖南农民协会暂行总章，取消旧农会组织。唐并致函鲍罗廷，表示联俄愿望，说第八军是“世界革命的军队”。六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奉国民政府命令，自粤、桂出发援助唐生智北伐，反击吴、叶军，从此湖南政局进入北伐战争的阶段。

### （三）北伐战争时期

一九二六年六月，国民革命军自广东、广西入湘，会同唐生智军进行北伐。北伐军在湖南节节胜利。以国共合作为中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民主势力特别是农民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出现了两重政权。湖南处于大革命的高潮中，到处热气腾腾。与此同时，在革命阵营内，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民主势力与没有经过民主改造的唐生智控制的武装力量和政权机构间的矛盾也逐渐发展。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它成为影响湖南革命发展的主要矛盾。革命在发展，又潜伏着严重危机。这个时期，根据两大势力各自力量的发展和变化，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九



二六年下半年，是双方以联合为主和各自力量迅速发展的阶段，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是双方矛盾日益激化直至分裂的阶段。

## 1. 北伐军进占长沙

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唐生智率部自衡阳出发，会同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军进攻赵恒惕军，八日克湘乡，九日克醴陵，十日克湘潭，十一日占领长沙。北伐军每到一地，都得到工人、农民和学生广泛的支援。各地学联组织宣传队随军宣传。醴陵的工人、学生组织的平民救国团和农民武装队三百余人直接参战，配合第四军攻克醴陵。平江、岳阳、临湘等县农民组织了冲锋队、暗探队、疑兵队、运输队、宣传慰问队、向导队支前参战，出力甚大。北伐军攻占长沙后，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三千余人的工人运输队，分批随军出发。八月下旬，北伐军乘胜向湖北推进。

## 2. 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全会和湘区“六大”

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旬，党的四届三中(扩大)全会在上海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他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中山舰事件的经过，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这个事件的详细情况。这次会议召开于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至湖南，革命迅猛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党的工作有重大的影响。会议决议对于一些问题的分析，有正确的方面，也存在比较严重的缺点。

会议分析了革命阵营的几种势力，并结合社会阶级关系分析了国民党内的各种派别，指出：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共产党是他们的代表；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在客观上“有倾向革命之可能”，“想利用工农群众势力，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得

到他们的要求。”但“一旦得到些小胜利，稍稍能够安慰其阶级的要求，便立刻发挥其妥协根性，离开民众，背叛革命而与敌人合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要“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会议提醒全党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既要防止“左”的偏向，又要防止右的偏向。

会议再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议决案》），并根据农民运动发展情况，提出当时全国农民急切的几项政治和经济的要求，即减租减息和集会结社自由等。对地主，主张区别对待，中立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只攻击极反动的大地主。对于农村中的其他群众，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要取联合策略。对地主土豪劣绅用以压榨平民的民团，要逐步加以改造，把权力转到农民手中。

对于军事工作，会议主张我们党“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要从政治上加强对工农武装骨干的训练（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军事运动议决案》）。

会议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实际指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以及根据当时客观条件，分阶段、分步骤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策略思想，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是，这次会议存在着严重的缺点：（1）关于革命任务，强调反帝，不强调反封建，没有提出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任务。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尽管实现这一任务需要分阶段进行,特别在战争成为当时一切任务的中心的时候,更应如此。但是会议没有理直气壮地强调指明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战略任务,没有明确指出对于地主阶级中暂时可以联合或中立的部分暂取联合或中立的策略,正是为着实现这一根本任务。(2)关于革命前途,存在很大的不彻底性。会议认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引自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3)把中等商人划为小资产阶级,实际上,它应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4)把中小商人作为小资产阶级划作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和组织基础,主张将他们交给国民党左派去领导,以造成共产党领导工农,国民党左派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局面。这样做,实质是同国民党左派分割领导权。(5)对当时已成为我党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主要对手蒋介石缺乏认识,特别是在“三二〇”事件之后,蒋介石实际已经代表豪绅买办阶级,却仍把他看作国民党内的中间派,称之为“武装的中派”或“新右派”。主张联合左派并中派,有时还需要扶助中派,向反动的右派(指老右派)进攻。没有认识蒋介石已经是较之西山会议派更为危险的同盟者,因而在实践中,仍将北伐军事权系于蒋之一身,害怕同他分裂,不作可能分裂的准备。(6)对于军事工作,只提出在敌军中,即在北洋军阀的军队中组织我们党的兵士支部,对由南方地方军阀掌握实权的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只提出派人去做政治工作,不敢争取获得统一战线内部的军权。对于农民武装,规定“不可有常备的组织”,“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议决案》),小心翼翼地唯恐引起误会和冲突。联系到会议通过的对于时局主张中所重申的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的

主张，如说“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说“只有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之各阶级的民众，首先在各地方集中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各团体的力量于各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进行自动的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之实现，一面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抗苛税苛捐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方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受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由此会议建立全国的人民政府，解除人民自己的痛苦”（引自《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等，说明会议对于我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的认识仍然是很差的。会议的上述缺点反映的是右的倾向，它不能不对即将兴起的军事斗争和群众斗争的高潮发生不利的影响。

开会期间，从报上看到北伐军进占长沙的消息，我未等会议结束，也没有参加各项决议的讨论，在会议通过了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后，即赶回长沙。临走时，我向陈独秀请示工作，陈说了两点：一、大力支援唐生智军北伐；二、可以组织工农自卫武装，共产党不独立搞军队。八月六日和十八日，区委根据党的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对于时局主张的精神和北伐军进入湖南后的新形势，两次发表对时局宣言，宣布政见，强调湖南革命政府应该维护民众利益，革命军必须和民众结合，号召民众起来结成工农商学各界的联盟，召集乡民、县民、省民会议，发布政纲，伸张民权，为召集全国的国民会议，接收政权作准备。宣言还提出停止预征钱粮，废止陋规苛税，没收逆产，铲除贪官污吏，限制高利贷，制定工人最低工资、农民最高租额，保护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民主政纲。

十月一日至十三日，区委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此时，全

区已有党员三千七百十四人，党的地委十五个，通讯处九个，特别支部三十二个，五十六个县都有了党的组织。大会讨论了加强党的独立主张的宣传、商民要求、省民会议运动、党的发展等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和大会宣言。会议认为湖南已经结束“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一面是反动的封建残余势力，一面是革命的民众势力，民众势力战胜封建残余势力，湖南就将走上升的民主政治的轨道，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关键在于以唐生智为首的省政府的意向和民众自身势力的发展。因此，会议要求唐生智政府站在革命民众一边，扶植人民团体的发展，促进人民设立自治政府，将地方政权交还人民。会议特别强调发展民众势力的重要，认为这是实现民众政权的保障。会议议定了一个包括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抗租自由，工农武装自卫，制定劳工、农民保护法，大产业公有，乡村政权交乡民会议，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高租额、最低工资等共五十五条工人和农民的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要求，作为发动工农群众为自身利益奋斗的目标。

区委八月的两次宣言和区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区委对湖南政局的主张和政策。它在实行联合战线，注意团结同盟者，贯彻民主政纲，以及发展工农基本民主势力，建立工农自卫武装，建立城乡民众政权等方面的主张，都是正确的。它提出了当时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这一迫切问题。但是区委同党中央一样，对于建立城乡民众政权的途径，认识上存在着片面性，即片面地重视民众运动，而忽视对武装的争取和掌握。而无后者做支柱，民众政权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不可能维持。后来长沙市民代表会议以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建立的市民代表会议的流产就是证明。

### 3. 统一战线的扩大及其内部斗争

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在一九二六年初打倒赵恒惕的高潮中即已公开活动。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它成为我党推动革命的一面公开旗帜。区委下设“民校运动委员会”（民校，是当时党内对国民党的代称）管理国民党工作，书记夏曦。在国民党内设我党党团，书记周以栗。我党的政治主张一方面通过工、农、青、妇群众团体贯彻，另一方面主要通过国民党省党部推动省政府去实施。后者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因而更为有力。

我参加四届三中全会从上海回长沙后，唐生智要求同我会见，经过夏曦的联络，我们见了面，夏曦也在座。我们向唐表示，希望他实行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支持工农运动，对于北伐，我们当尽力发动群众支援。唐对于我们的要求，满口应允，并主动表示工农运动的经费可由省政府补助，要求我们对省政府的工作给以帮助。还提出请我们派几个共产党员到下面去当县长。对于他补助工农运动经费，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他要求我们支持省政府的工作，也表示无问题；但对于他要求我们派党员当县长的事情，我们婉言谢绝了，因为党中央没有规定，我们自己也认为县长素来是直接压迫人民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官吏，我们不能去干。当时，我和区委的同志还没有利用机会改造旧政权的认识。

谈话间，唐生智将他的智囊省政府的建设厅长邓寿荃介绍给我，说在他随军北伐期间，由邓负责同我们联系。邓后来也向我表示，希望我们派几个党员去当厘金局长，帮助他整顿一下腐败混乱的税收工作，我托辞很难找到适当人选，谢绝了。这次同唐生智见面谈话，实际上是一次同湖南的国民党实力派达成协议的政治协商。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初，唐生智本人及其核心领导人物邓寿荃、邓介松、张翼鹏是执行了协议的。其主要表现

是：1、驻在各县市的留守部队（主要是何键所部）对工农群众运动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态度，大大便利了工农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开展；2、谈话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决议，基本上反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3、一九二七年二月，唐生智因处理常德兵变事从前线回湘，区委通过他与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以及各群众组织协商，制定了一个《湖南省行政大纲》，计分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军事、司法、土地、农工等共一百一十二项，规定筹备县区乡自治，废除团防，废除苛税杂捐，统一财政、税收，实行减租，保障工人利益等要求。实际上，这是国共合作下湖南省政府的一个施政纲领；4、以邓寿荃为首的省政府建设厅支持工会和农协的工作，月拨经费二千和三千元给工会和农协，并另拨湖田溢田项下二万元给省农协，在各县办农民训练班。

对国民党的工作，区委贯彻了中央关于壮大左派，与之结成密切联盟，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的方针。争取唐生智，就是一项重要的争取中派的工作。区委还同李荣植、雷铸寰等左派谈话，鼓励他们大胆领导国民党工作，欢迎左派到群众中去，造就他们自己的下级干部，整顿县党部，还表示共产党并不想代替左派、包办国民党的工作，打消了他们对我们的疑虑。左派逐渐活跃起来。

国民党省“二大”以后，共产党员在省党部的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中约占三分之一，有夏曦、凌炳（他是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周以栗、王基永、易礼容、谢觉哉、黄颀、刘春仁、戴述人、何叔衡、熊亨瀚等。省党部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长分别由凌炳、易礼容、周以栗、黄颀担任，商人部的秘书是姜梦周。省党部执监委员中，李荣植、吴鸿骞、雷铸寰、董维健、谢骥、李燮治、鲁子源、易克疑等左派国民党员占优势。廖维藩

和谢晓峰比较右，仇鳌则以中派自居，实则中间偏右（马日事变时成为反共的反动派），后来成为右派的刘岳峙，开始表现也尚好。凡是我們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各县、市的国民党部，负责人大都是党员和非党的左派分子，主要是知识分子，能站在工农运动方面。后来，根据中央七月和十二月会议关于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要努力加强我党独立主张的宣传，扩大我党的社会影响，加强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工作基础的决定，区委认为工、农、青、妇团体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国民党省党部有关职务可以让给左派。是年底，省党部农民部长即由刘岳峙接任，当时我们对刘岳峙的真实面目是认识不清的。一九二七年初，工农运动猛烈发展，湖南国民党开始新的分化，刘岳峙结合其他右派分子组织了一个新的右派组织——“左社”。他还以省党部农民部的名义拟定了一个以致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之改良进步”，反对农村阶级斗争的农运计划。他们赞成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要求改组湖南省党部，散布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言论。他们与蒋介石勾结的阴谋被国民党长沙市党部的左派党员揭穿，省、市党部将刘岳峙等开除出国民党，省政府通告缉拿“左社”分子，并查封其活动基地三湘、纯德、晨光等学校。这是湖南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一次重要分化。这次斗争对于湖南总的政局并无大的影响，说明湖南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左派势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不能起多大作用。严重的问题是在唐生智部队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内的有权有枪的右派头子，这些人后来在马日事变中与特别党部以外的右派头子结合起来，控制了湖南的局势。

#### 4. 继续深入的反帝斗争

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直系军阀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帝国主义、特别是支持直系军阀之英帝国主义，以“反赤化”为名，派军



舰来华，向中国人民示威。一九二六年七月初，英、美、日帝国主义派军舰停泊长沙城外之湘江中。七月十日，英、意帝国主义又增派军舰来长沙。帝国主义的挑衅激起湖南人民的愤慨。七月下旬，“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改为“雪耻会”，恢复活动。九月七日，长沙各界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游行示威，宣言“我们欲求民族独立与富强，唯有联合世界上的平等待我之民族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努力向帝国主义进攻”。九月二十五日，“湖南农、工、商、学大联合”成立，有二百三十多个团体，三万余人参加大会。大会提出：“反对英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反对英帝国主义进攻革命军”，“反对英帝国主义勾结陈炯明扰乱后防”，“反对英舰擅自行驶内河，撤退驻华英舰”，“继续扩大对英经济绝交”，“为万县惨案死难同胞复仇”，“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当日，长沙各界还举行了反英示威游行，抗议九月五日英舰炮击万县的暴行。游行队伍派代表向驻长沙英领事署送了通牒。此后，全省各地都开展了反英运动。长沙群众焚毁各店英烟。衡阳雪耻会没收并拍卖英美烟草公司存货，封闭英商行栈。长沙雪耻会禁止英商亚细亚煤油公司管理处营业。郴州、永兴群众拍卖亚细亚煤油。宝庆群众焚毁油栈。常德雪耻会击毁英商洋行，封闭英货管理处。湘潭、安乡也都发生焚毁英油和其他英货的事件。湖南省政府支持群众的反英行动，拒绝了英领事的抗议。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英水兵又在长沙水陆洲及湘江北岸登陆，打伤工人纠察队员。当日，湖南各界举行反英示威大会，组织了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长沙的洋务工人宣布罢工。英商在湘营业几乎完全停顿。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英水兵在长沙水陆洲打伤菜农，二十四日，发生英、美军舰炮击南京的惨案，湖南的反帝斗争由此更进一步扩大。四月，长沙各界群众联合行动，收回基督教青

年会，改为湖南人民俱乐部。四月六日，组织了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收回长沙和岳州海关。

湖南人民的反帝热情是极其可贵的，它反映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在反帝斗争中，以工人、学生为基干，注意联合女界、教职、商会等各阶层群众，并争取到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支持，因而能够形成波澜壮阔的浪潮。但在这个运动中，注意策略不够，例如焚烧英油，使群众用油遇到困难，还影响到武汉市面煤油的供应，使经售英货的中小商人受到损失，引起他们的不满。

## 5. 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北伐军克复湖南后，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工农群众运动迅速发展，形成高潮。受赵恒惕和叶开鑫摧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和新化锡矿山矿工会先后恢复。一九二六年八月，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改为省总工会，提出统一全省工人运动的口号，实际取得全省工会领袖的地位。至十一月，长沙、岳阳、浏阳、衡山、宜章、醴陵等十八个县市也建立了总工会。产业工会除安源、水口山、锡矿山外，还有炭塘子锰矿、第一纱厂、粤汉路、株萍路、汽车路、海员等。各县成立工会筹备处的有永兴、新田、常宁、澧县、安仁、石门、零陵、新化、攸县、湘潭、平江等二十六处。省总工会所属的工会组织有近六百个。工会会员由八月的十一万发展到三十二万余人。各工会参加政治运动二百三十五次，进行经济斗争一百零八次，许多都取得了胜利。省总工会举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培训工运干部。

湖南工人过去受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痛苦非常。北伐军入湘后，他们在政治上得到省政府的相当支持，长期被压抑的革命热情迸发出来，积极参加各种反帝反军阀的政治

运动，要求政府惩办工贼，打击破坏工运的反动分子，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长沙工人开展了驱逐破坏工运的劳工会原领导人王光辉和请政府惩办粤汉路工贼梁汉英的斗争。新化工人拘办了破坏工会的县署污吏贺召霖。桂阳工人在政府派兵协助下镇压了捣毁工会、县党部，惨杀工人的劣绅李容巨。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工人声援汉口工人、市民收回英租界，举行对英总罢工，联合各界组织湖南人民对英罢工委员会，扩大对英经济绝交的运动。

这个期间工人的经济斗争有长沙人力车、平江纸业、长沙靴鞋、湘雅、甲工工厂、铅印活版、贫民工厂、长沙染织、织袜、茶陵、宝庆印书、宝庆泥木、长沙石印、烟作工人、常德泥木、常德烟业、长沙码头等工会的加薪运动，邮务工人为改良待遇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这些斗争有的经总工会和省府建设厅或省党部的调停，得到不同程度的胜利。湖南邮政大权掌握在美帝国主义手中，因而邮务工人的斗争涉及反帝问题。湖南邮务总工会为改良待遇，向邮务管理局提出十二项条件，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遭到拒绝。省府建设厅长邓寿荃、省总工会委员长郭亮、省党部农民部长易礼容出面调解，邀集双方代表谈判，邮务长以自己无权承认条件为由，全部拒绝。邮务工人乃将会议厅包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邮务长、收回自办”的口号，经十三个小时的斗争，邮务长才勉强签字。最后议定工人加资数额，部分由邮局承担，部分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筹拨。

为检阅湖南工运力量，总结经验，制定今后方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至二十八日，在长沙同时召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大会开幕那一天，还举行了湖南民众公葬黄爱、庞人铨、黄静源、汪先宗四烈士的仪式。区委为两个大会的召开和四烈士公葬分别发表了宣言，号召湖南的工农群众

努力实现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工人农民的最低要求，并将它分别函送两个大会。两个大会经过讨论均予接受，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区委虽然在领导工运中注意了工人利益和国民革命的关系，但是群众发动以后，难免出现一些“左”的偏向，主要是在加薪运动中，工人、店员提出一些过高的要求；不经政府即拘捕厂主、店主；对外商企业，有盲目排外情绪。

区委对工运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于一九二七年初曾连续发出通告，指出“工人的经济要求，不能超过现在商人（包括厂主、店主等）的经济能力所能担负的范围”，“须知不顾客观的情势而一意孤行，则商人必被逼而反动，工人更有失业之虞，痛苦将更不堪，所以不问已得未得，今后遇必要时，可以退让的还要退让一点才行。”提出工人应对商民运动加以辅助，说“这正是巩固联合战线，领导国民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分内之责。”（见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乡村工人运动的原则》的通告）区委指示的这些精神现在看来是正确的。因为它涉及民主革命联合战线问题，涉及工人阶级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且当时北伐战争正在进行，工人斗争也要服从战争的需要。

## 6. 青年、妇女运动的发展

这个时期，青年运动也有很大发展。据一九二六年十月统计，全区青年团员共有二千二百九十一人，建立了长沙、衡山等九个团的地委和衡山、水口山、锡矿山等地数十个团的特支。团区委书记肖述凡是一位很称职的同志，不幸于十月病故，后由蔡增准代理。委员除蔡外，还有李铁梁、史训川、田波扬。区委下设学委（书记田波扬）、妇委（书记沈凤音）、青农委（书记蒋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蔡增准）、宣委（书记史训川）、儿童运动委

员会(书记蔡增准)。出版物有《湖南青年》。青年团在动员各界青年，特别是学生，支援北伐战争，参加各项政治运动的活动中，作出了很大成绩。

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团区委发出“湖南青年目前应有的要求”，分别提出青工、青农、学生、青年店员、青年士兵的民主要求。九月五日，在长沙举行纪念国际青年日大会，通过了包括拥护国民政府；速开国民会议；召集省民会议，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廉洁政府；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统一青年运动；青年与童工同工同酬；青工每日工作八小时；改良学徒制，缩短从师年限，禁止为私人服役；发展农村教育；政府不得削减教育经费，停办学校；学生会得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有表决权等内容的二十二项提案。随后，省学联于十月七日至十八日召开全省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组织问题、学生本身利益运动、文化运动、时局问题、拥护国民政府、巩固革命战线等议决案，要求教育厅采纳实行。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大约有三十多个县成立了学联组织，其中衡阳、常德、岳州、醴陵、湘潭等地方的学联组织比较健全，能够领导当地学生在政治运动中发挥作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浏阳教会学校学生要求取消宗教课。十二月，长沙教会学校成智中学和小学学生要求不读圣经，不做礼拜和祷告，许多教会学校学生纷起响应。十二月十四日，省学联联合省教职员联合会、国民党省党部、长沙市党部等团体召集各公法团代表开会，议决成立湖南反文化侵略大同盟，并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圣诞日举行宣传运动，开讲演会，演出新剧。夏曦、周以栗、朱剑凡和我都去讲了话。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对于教会学校学生常取排斥态度，使他们站在运动之外。这次，纠正了这种偏差，教会学校学生也以“努力

革命”相号召，积极参加社会运动。对于岳阳、益阳、浏阳等县教会学校学生在斗争中提出的一些过高要求，团区委学委曾去信纠正。

团区委的青工、青农工作主要结合在工、农运动中进行，提出青工、青农的特殊要求。在青工工作中又把学徒作为主要的工作对象，并注意青年工作特点，除发动他们参加政治经济斗争外，还注意加强文化娱乐活动，以此团结教育他们。

此外，团区委还开展儿童工作。通过省农协印发《怎样组织农村童子团》的小册子，着手在农村组织童子团。同时制定工会的劳动童子团组织法，作为各工会进行儿童工作的根据。已成立儿童团组织或进行筹备工作的有长沙、湘潭、岳阳、浏阳、耒阳、常德、南县、安源、醴陵等地，城乡童子团约有三万人。

这个时期党区委的妇委工作，因缪伯英调走，曾一度由我兼管，后来中央调熊季光回湘担任妇委书记。国民党省党部的妇女部长先后由我党党员黄颐、廖世劭、魏振立等担任。在长沙有影响的两个妇女组织，一个是省女界联合会，由我党党员罗问哉负责；一个是青年妇女学艺社，由我党党员谭国辅负责，它们在北伐战争中，发动妇女参加慰劳、宣传、救护工作，起了不小的作用。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武冈、茶陵、永兴、攸县、湘乡、沅江、岳阳、衡山、澧县、石门、蓝山、祁阳、东安、新宁、宜章、醴陵、新化、宁乡、郴县等县都建立了女界联合会或妇女解放协会。各县的女界联合会都是公团联合会的成员，它们提出妇女的要求，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反封建道德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在长沙稻田女师召开湖南全省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有五十七县一百四十一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发表宣言，提出男女平等，制定劳动妇女保护法，加强劳动妇女教育，禁止虐待妇女，结婚离婚自

由，男校开放女禁等妇女的最低要求和口号。许多县向大会报告妇运情况，相互交流经验。这次大会，检阅了湖南妇女运动的力量，规定了全省妇运的计划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对劳动妇女的工作，建立各阶级妇女联合战线的任务，在湖南妇运史上有重要意义。

这个时期，区委对于妇女运动，要求将工作重点从女学生转到劳动妇女方面来，并要求将妇女的特殊利益同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结合起来。随着湖南农村革命高潮的出现，农村妇女积极投入了反封建的斗争。湖南农村劳动妇女在农运高潮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很生动的描述。

## 7. 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

### 毛泽东回湘考察农运

北伐战争中，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更为迅猛，成为革命发展的一个中心问题。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国民党省党部通告各县农运特派员，遵照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组织新农会。九月十五日，省政府建设厅颁发整顿旧农会的四项办法：1、各县农协符合新章程者，保护提倡，与新章程抵触者，不准成立；2、取消旧农会及依据旧农会章程成立之农协；3、未组织农协各县，由省党部农民部商同省农协派特派员前往组织；4、旧农协房屋财产及经费，均由各级农协承接。这样，由于得到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支持，农运得以公开进行，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二六年上半年，广州农讲所五期毕业的部分湘籍学员回湘，由省党部农民部派往各县。同年九月，中央又派广州农讲所六期三十名毕业学员返湘，也陆续往各县开展工作。他们的回湘，大大推动了各县农协的成立和农运的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国民党省党部派至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二百零三

人，其中共产党员一百八十二人。一九二六年底至一九二七年初，省农协、湘江学校和国民党省党校开办了农运讲习班，招收市、县的学员，培养农运干部。不少的县，如衡阳、衡山、宁乡、岳阳、宜章、湘乡、常德、醴陵、安化、攸县、新化、临澧、麻阳、浏阳、宝庆也都开办了农运讲习所或训练班，为本县农运培训干部。到十一月，湖南已有五十四个县建立了农协和农协筹备处，农协会员由十月的四十万人猛增到一百一十余万人。湘东南、湘北和湘中各县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斗争。湖南的农运已经由与北伐军合作进攻军阀的时期进入进攻封建阶级的时期。

在政治上，有些乡村的农协已经取得政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有些地方，农协同教联、商协、工会的联席会议，实际起着乡村政权的作用。许多地方，农民建立了挨户团的自卫组织，多数为梭标队；少数县，如平江、浏阳、安化、醴陵、湘潭等，农民从溃军或地主团防手中夺得少数枪枝。一九二七年初，省农协发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筹建农民自卫军，设常备队。

在经济上，由于收租期已过，一般都准备着明年减租的斗争，只个别地方，如衡阳，因一九一六年借口水灾和增加教育经费，全县加了租，这次全县农民提出了复租要求，即恢复一九一六年以前的租额，取得了胜利。在这次运动中，衡阳农民加入农协者，约七万人。安化、岳阳、湘阴等县有减息运动。安化由月息七、八分减为四、五分。浏阳、岳阳等县有减押运动。攸县、醴陵、宜章、安乡等县有减税运动。比较普遍的斗争是开展平粵阻禁谷米运动，以解决荒月贫农缺食、粮价暴涨的问题，有的由农协议决谷价，有的不准或限制谷米出境，有的发展到禁止酿酒熬糖。此外，诸如禁赌、禁烟、禁坐轿、禁演花鼓戏、剪发、放足、



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改良封建宗教习俗的斗争，也在农村展开。这样，在湖南农村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革命高潮。

这样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反抗。农民与土豪劣绅及其团防武装的冲突时有发生。一九二七年二月，湘阴发生土豪劣绅任德纯、任觉樵、彭伯藩煽动农民六百余人围攻农协，杀死农协会员的事件。三月二十日，省政府派军逮捕凶手，次日，土豪劣绅煽动农民将凶手抢回，军队被迫开枪，打死农民六人。事后土豪组织抬尸游行向省农协“请愿”。省农协曾为此事发表“为湘阴惨案告农友”书，号召农民勿受土豪劣绅挑拨，相互化除成见，联合向反动派进攻。这个事件既说明土豪劣绅对农民的仇视，也反映了农村斗争的复杂，要求我们必须十分注意策略。

为镇压各县土豪劣绅对农运的反扑，南县、沅江、浏阳等二十四县旅长沙人士组织了反劣绅运动大联合，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向省政府请愿，要求严惩各县劣绅。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向省党部、省政府第二次请愿。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区委决定通过国民党省党部会同省政府组织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省党部推定谢觉哉、易礼容、邱维震为委员。我也曾两次找县长商谈，催促长沙县成立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一九二七年一月，省政府公布了湖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这些措施都是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支持，也是力图使这场农村革命有秩序有纪律地进行的一种尝试。一九二七年初，许多县如长沙、浏阳、祁阳、城步、临湘等也建立了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各地掀起了一个镇压土豪劣绅的运动。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庞人健率人将杀害黄爱、庞人铨的主谋李佑文（赵恒惕政府的军务司长）捕送至总工会转卫戍司令部，经省审判土豪劣绅法庭判决，于四月五日处死。四月十一日，省特别法庭判处湘潭著名劣绅、袁世凯

称帝时的湖南筹安会会长叶德辉死刑。四月十六日，长沙县枪决劣绅、“保产党”首领朱葆生。对土豪劣绅中的首恶分子和民愤极大者实行严厉镇压是完全必要的，不这样，不能发动广大农民，不足以平民愤。叶德辉是一个极为反动的劣绅，对他的处置，有利于推动外县依法惩治豪绅。由于他在知识界有声望，被处死后，社会上议论颇多，反应强烈。如果当时我们采取依法惩办，但免其一死的策略可能比处死他更为适当。

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作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对谷米的平糶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省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

区委于十月下旬就已觉察到这些问题，十月三十日和十一月十五日，区委给中央的报告在指出土豪劣绅反动势力攻击农运的同时，也指出了这些偏差，认为有使贫农陷于孤立的危险。针对农运中的问题和土豪劣绅的反扑，区委决定的政策是：促使国民党左派加入农运，要在农运中与左派合作，并通过国民党促省政府镇压破坏农运的反动势力；将农运实情公诸社会，打破土豪劣绅的造谣中伤，对国民党内不大反动的右派作必要的让步，以减少农村革命的阻力，使团防局的不作恶者中立，择作恶者进攻；在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对农运的领导，矫正左倾幼稚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总结前一

阶段农运经验，揭露各地土豪劣绅压迫、破坏农运罪恶，支持农民革命行动，确定进一步开展农村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对于平糶阻禁问题作出了政策上的限制，规定在保障当地民食需要的前提下，余谷准予流通，不限价格，并规定煮酒熬糖，非特殊情形不可禁止。当时区委认为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农协角度检查，主要是由于成分不纯，混进不良分子所引起，因而在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中，规定了各地农协必要时可“进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会后，省农协专门为此发出布告，规定“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的农民。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区农协的执行委员，五分之三需属真实农民充当，专营手工业或体力劳动者亦可，五分之二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在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地痞性的人严厉制止，以免扰乱农民的组织”（见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湖南《通俗日报》）。区委于一月十六日发出通告，指出因绝对阻禁所引起的经济政治后果：“（1）从前自耕农、佃农等，都是用谷米兑换油、盐、棉花等杂货，以调济其生活。现在谷米不能出境，谷价低落，各地商店都拒绝不要谷米，都要现钱才有货卖，农民无现钱就不能购买货物，就感觉十分困难；（2）……现在因各地阻禁平糶的结果，谷价日见低落，金融闭塞，自耕农、佃农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将有脱离农协之趋势。现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变成了一个贫农运动，这个运动如果不急谋救济的办法，在农村中要变成‘广东的三月二十日’，在农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的空气，使农民运动发生绝大的危险”。通告规定：“1、即时督促省政府通令各县、各地团、保，会同农协迅速巡仓，决定留谷数目，余流通。2、省农协再出布告，要各地农协不要死阻禁，说明谷米应当流通”。通告并说明省政府为此所发通令中和省农协布告中所列办法，都是经

区委赞同的。为加强农村中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店员的团结，区委在二月六日发出的通告中规定乡村手工业工人不单独组织工会，而加入农民协会，农协设一手工业部，管理乡村手工业工人的工作。农村中商店也不成立商民协会，店员不组织店员联合会。区委所作的这些规定，都是为了纠正前述农运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以达巩固和扩大联合战线的目的。但是，在执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简单发布告限制农民行动；对农会以“洗会运动”的形式进行整顿，有的地方在洗会运动中采取捕人、关人办法，挫伤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且给土豪劣绅破坏农协以可乘之机。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应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邀请，自汉口至长沙参加大会。工、农两个大会举行了欢迎会。他在会上讲话，强调工农商学联合战线的重要意义，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并根据国民革命的进程，指出“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一月四日，毛泽东由戴晓云陪同下乡视察。下乡前，国民党省党部召开常委会，对这次视察作了安排。原定视察的县，除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外，还有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后因时间关系，后面的几个县没有去。毛泽东还曾应区委之邀，在区委举办的、由参加农民代表大会的党、团员参加的训练班上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在视察湘潭、湘乡、衡山三地后，区委又请他向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视察醴陵、长沙后，又在区委作了一次报告。我记得，有一次报告是在湘江学校楼上作的。作报告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报告大纲。二月五日视察结束，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向

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大纲。在这个报告大纲中，他提出，党应当（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他认为农运应分三个时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而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以改变乡村中无政府为有政府状态，具体的建立农民联合战线。他还提出要立即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在农村中要大力发展党，以应付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三月五日，在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上发表了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全文。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一篇经典性著作。它指出：（1）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农民革命是挖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统治墙脚的基本力量；（2）贫农是农民革命的领导力量；（3）农民武装问题的重要；（4）共产党应当站在前面领导农运。报告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农民运动，有力地批驳了对农运的各种攻击，用充分的事实说明革命的农民不但能够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治统治，而且能够建立自卫武装，掌握政权，对反动势力实行专政；并动员群众对乡村经济文化等公益事业进行力所能及的建设，进行可能的移风易俗的改革。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后来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展成为建立工农联盟、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成为以后完整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和给中央的报告大纲，由于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党内和统一战线内一部分人的右倾思想，以及来自阶级敌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诬蔑的，因而在一些具体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

带有当时形势的具体特点，存在着某些不足。譬如：（1）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2）认为组织时期、革命时期的农村中本来就无统一战线，只有到第三阶段才进入建立联合战线的时期；（3）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

关于第一点，农村中确实有一些游民（或称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有革命性，在农运兴起的地区，打先锋的常常包括这样一些人，但是对他们需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因为这是一个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易为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虽然参加革命，也要在革命中对他们进行改造，防止他们的破坏性。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初，毛泽东在一些文章中也曾对游民无产阶级作过分析，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要“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引自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九二六年一月）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游民的两面性。但在《报告》中，为了要回击对农运的反动叫嚣，就只强调了他们革命性的一面，忽略了另一面。记得毛泽东在区委作报告后，征求我的意见，我提出了上述看法，他表示接受。后来《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就把“踏烂鞋皮的……”一段话删去了。

关于第二点，当农民发动起来猛烈向封建势力冲击时，当然不能要求群众的每个行动都符合政策。但是，我们党应当努力引导贫雇农团结大多数，建立最广泛的农村革命统一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事实上，当时在乡村农协中，普遍有手工业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形成三者的联盟，个别还有不带封建剥

削的富农参加。我的家乡即有这样一个富农在马日事变后被杀害。毛泽东在《报告》中也谈到有富农参加农协的事。有的哥老会分子也加入了农协。须知在北伐胜利的形势下，一切受军阀、豪绅剥削压迫的各阶层的人们中，会有许多卷进高潮中来的。

关于第三点，“矫枉必须过正”是有条件的，不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熟铁弯曲可以过正，生铁弯曲，过正就要折断，这是自然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反“左”如果必须过正，就变成右，反右过正就变成“左”。毛泽东在口头报告时，还讲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话，一时流传甚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

对于《报告》中的这些缺陷，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都加以纠正了。他在抗日时期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就没有再把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而是专门写了一节“游民”，对之作了具体的分析。到抗日时期，他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就发展得十分成熟了。

我和区委的同志对《报告》的总精神是完全赞同和接受的。区委还专门开会讨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改变了前一阶段认为农运过左和纠正农运过左的观点和作法。一九二七年二月，我们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报告又说：“不过现在乡村之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小地主，已日

渐离开我们而有与土豪劣绅结合共同向我们进攻之势，故此时不能不劝告贫农让步”。（引自中共湖南区委《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一九二七年二月）这反映了区委已接受了毛泽东《报告》中的观点，但对农村斗争中中间势力日渐离开我们的现实又未得到科学解释的矛盾心理。区委的这个报告把富农、中小地主划为小资产阶级也是不妥的。同年三月，区委还发表了一个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并于四月组织了一次农运宣传周的活动，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驳斥了对农运的“怀疑派”和“稳健派”的所谓“惰农运动”的议论，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随后，省农协及一些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和农协也出布告、发通告，停止洗会运动。但这些布告和通告又赞扬并支持了包含许多“左”的偏向的农民行动，称之为“完全革命的行动”。（引自《湖南省农民协会省字462号训令》一九二七年四月）

一九二六年底和一九二七年初，当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迫切需要党从指导思想上划清正确和“左”、右偏向的界限，注意争取中间势力，扩大联合战线，区分革命步骤，制定具体措施，引导革命走向正轨。区委并未作到这点，而在应该怎样看待农民革命斗争中发生的“左”倾偏向问题的指导思想上摇摆不定，在开始纠正群众运动“左”的偏向时，又有过如洗会运动中出现的右的失误。

中央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和十二月，曾两次在报告中表扬湖南区委，“对付各种问题的策略”“稳当周到”。（引自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局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报告》）上述情况说明，对这个表扬，区委是受之有愧的。

## 8. 中共中央十二月特别会议

我在参加了湖南省工人、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在以



后的几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中国共产党与工农阶级等三次讲演之后，大约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上旬离湘去汉口参加党中央的特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任弼时等。会前，湖南区委曾经讨论湖南的农民运动，认为从湖南农运的发展趋势看，应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会上，我汇报了区委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赞同湖南区委的主张，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马上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不成熟，说目前主要是要满足农民的减租减息，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的迫切要求，并且认为不应以赞成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是否左派的标准。会议基本上按照陈独秀和鲍罗廷的主张通过了决议。这次会议还讨论了北伐战争的形势，联合战线和湘鄂赣三省工农运动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党务议决案》等文件，强调要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取得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和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群众的支持。

如果说七月召开党的四届三中全会正值革命高潮开始之际，革命形势如何发展尚属未知，各方矛盾也未充分暴露，那么十二月中央会议时，革命高潮已经形成，北伐战争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占领了长江中游几省并正在向下游发展，统一战线中的矛盾也暴露得日益明显。这时革命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深入发展、巩固胜利的阶段，同时也是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主要的任务，一是实行土地革命，巩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二是纠正忽视革命两手准备的错误，千方百计创立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如果我们党能够制订指导革命的正确方针，革命发展可能比较顺利。但是十二月特别会议既不吸取“三二〇”事件以来的教训，不提创立党的军队，又完全主观

地否定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说明陈独秀投降主义已经开始在党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以后每况愈下，终于造成在反革命突然袭击时无力还击的局面。

## 9. 湖南的土地问题

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的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初，在农民革命已经推翻豪绅统治的地方，农民以各种方式提出了土地要求。

当时，湖南农村带普遍性的斗争是阻禁和平粜，“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十之七、八”都存在此现象。这也反映了农民——主要是贫农要求改变没有土地，常年吃红薯、少见谷米的穷苦状况。有的地方，如过去长沙市郊，因为土地没有丈量，照通常计算只要交一石租的田，却要收四石租。因此，农民要求按实际地亩交租，开始了丈田活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但是，清丈田亩只对有田可耕的佃农有利，许多无田可耕的失业农民仍是毫无办法，所以，失业农民要求“平均佃权”，将田土的耕种权重新分配。

一九二七年初，中央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发至各地，要各地党组织进行讨论。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对于迅速发展的中国革命形势作了分析，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应当承认‘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纲之基本要求，但在现时，必须按照中国各地的特殊经济政治情况而分别的应用农村策略”。会议提出了农村革命的具体政纲十一条，除提出减租、废除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杂税、武装农民等外，还提出要“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

主、劣绅等之土地”，也就是先实行政治没收的办法。湖南区委在长沙学宫街的区委机关开了三次会讨论共产国际的决议，一致赞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应准备将土地革命作为重点的意见，认为农民已在量地、插标，要求分田，从湖南农运的发展趋势看，也应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区委积极支持农民的“平均佃权”的行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区委发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说：“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贫农问题。这些贫农有的是一家耕地太少、不足自给的佃农，有的是雇农，……他们的困难是缺乏耕作的土地和资本，现在贫农中流行的思想是‘平均佃权’，他们觉得每个农民应该有两亩地的耕种权。……必须于最短期间使这些贫农能够满足这一低度的要求”。三、四月间，湘潭、醴陵、长沙、浏阳等地的农民开始自动起来分地主的田。首先是长沙附近的霞凝乡，农民按人口分田，成年人每人分产谷八石面积的田，未成年的依年龄大小，给以产谷四石至六石的土地，这说明解决土地问题已日益迫切了。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写了《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提出：“湖南革命已发展到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要求我们确定新的策略。这个时期的中心问题，便是土地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便是解决了我们革命的出路问题。”认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推翻封建阶级的最后胜利，是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土地问题的解决，农民问题、财政问题才得着真正解决，工商业才得发达。……才能将封建残余、封建思想兜底打破。农民已从各方面提出了土地问题，我们不起来解决这个问题，便不能领导国民革命成功”。提出目前应即“(1) 确定实现耕地农有的具体方案。(2) 要解决土地问题，武装农民是最紧要的工作，应于最短期间采用各种方式——缴团防的械，由政府发械——使农民至少得到三万支枪。有很好的训练和组织……(5) 实现民众政权——乡民会议、区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

议、省民会议接受政权，选举各级政府，反革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上内容大体上反映了区委的观点。我们认为土地问题解决了，阻禁平粜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我们还认为，湖南的财政因为战争的关系，仍旧继续过去的旧政策，并未实行改革。这种旧政策与革命已发生矛盾，许多人不缴田税，苛捐杂税也不能再收，致使湖南的财政入不敷出，造成很大困难。如果解决土地问题，即便土地税略增一点，农民也会踊跃缴纳，财政困难也就可以解决。

“五大”前，湖南代表团在长沙集中开了几次会，经过多次讨论，拟定了一个土地问题决议的提案，准备向大会提出。提案的内容大体是：“（一）先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先没收一百亩以上的，一百亩以下的不没收，自耕农不去扰及他。（二）到明年实行平均地权”。（引自夏曦《在国民党土地会议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也向大会提过一个土地问题的提案。这两个提案都未交大会讨论。我们曾向大会秘书长蔡和森查询原因，他说，国民党正在召开土地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关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应与他们通过的决议一致，因而要等他们作出决议，所以湖南代表团的提案就不必在这次大会详加讨论。“五大”会议上，对土地问题的解决大体有三种意见：1、先实行政治没收，即只没收反动军官和反革命的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2、没收除小地主和革命军官以外的土地；3、没收一切土地。最后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决定“没收一切所谓公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及“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属于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不没收”。当时，我们和中央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重要分歧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包括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认为，解决土地问

题要以国民政府颁布的法令为遵循，因而主张等国民政府公布土地法令后再进行工作。而毛泽东和湖南代表团则主张不要等法令公布，就可以在湖南立即实行自下而上的插标分田。我记得，在“五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就发生了这一争论。会上，李立三为武汉工人运动中的一些“左”的偏差作解释，国际代表罗易批评了他。我在会上又提出，秋收后湖南应实行插标分田，也受到罗易的批评，他说，农民自己动手插标分田，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末了，争吵一顿，无结果而散。

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从四月上旬开会，直到五月六日才原则上作出没收反革命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在目前还只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以上的规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决议，后来送交国民党中央讨论，也决定暂不公布，只是同意湖南可以搞个单行条例，可以先走一步进行经济没收。这些都未及实行，不久，湖南就发生了马日事变。

#### (四) 大革命的失败

##### 1.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湖南人民奋起反蒋

一九二七年春，在全国革命猛烈发展的同时，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化。四月十二日，蒋介石集团终于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广州也相继发生“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对于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政变，湖南人民十分愤慨。区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和群众团体组织了声讨运动。四月二十六日，长沙各界举行讨伐蒋介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我和谢觉哉、

徐特立、鲁子源、张翼鹏、黄德安、李荣植、邱维震等在会上讲了话，揭露蒋介石叛变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四月二十八日，长沙又举行追悼沪、赣、皖、川被蒋介石等反动派惨杀的死难烈士大会。平江、浏阳、常德、桂阳、湘潭等县、市国民党党部及群众团体也都发出讨蒋的快邮代电。这些活动，在湖南群众中形成了浓厚的反蒋气氛。

##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 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 题的决议》和党的“五大”

在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刻，一九二七年初，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传到中国，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案所指出的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等要点，“经过详细讨论和辩难之后”，决定接受，并检讨了我党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所以，“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和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政治局确定今天要“更扩大更强固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要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在“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引自《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

中央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的解释发至各区委、地委和特区讨论。前面说过，湖南区委为此开

过三次讨论会，一致赞同国际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的解释，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见当时区委文件或负责人的文章），认为，国际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认为“现在是国民革命时期，不是社会革命工农专政时期”（引自《中共湖南区委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分配土地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完全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需要，“农民运动绝不是超过国民革命的运动”（引自《中共湖南区委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宣言》一九二七年三月）；“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推翻封建阶级的最后胜利，是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引自李维汉《湖南革命的出路》一九二七年四月）

全党这次对国际决议的讨论，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它对肃清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的在党内普遍存在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增强全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自觉性，确有一定作用；缺点是在批判“二次革命论”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偏差。它支持了在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情绪。此外，无产阶级要真正能够夺取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手中有枪杆子，对于这个在客观上虽然为时已晚的根本问题，当时党在主观上可以说仍然没有什么认识。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的政治形势，回顾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过程，指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忽略这个斗争，以及过去忽视或不重视土地问题和乡村民主政权的错误。大会提出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必须在农民中得到同盟者”；党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建立雄伟的革命军队，并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又“非有农民自己的武装和政权不可”。大会认为土地问题的解

决和乡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深入革命、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政策，会后必须落实。大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它较之党的“四大”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又有了进步。

但是，这次大会并未能根本纠正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右倾错误，仍然坚持了只注重群众运动、忽视掌握军队领导权的错误方针。注重群众运动，无疑是正确的，但不掌握军队，就是大错了。尽管在“四大”以后，我们有过在北伐战争中革命武装为工农群众运动打开道路的正面经验，也有过中山舰事件，特别是刚刚发生的蒋介石叛变的惨痛教训，但是“五大”并没有真正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此，大会决议虽然提出了农民自卫队可以“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工人纠察队“是保障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武装之一”，也提出要改变军队成份，派工人去当兵，促进军队革命化的任务，却没有把它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任务联系起来，对于建立我党直接掌握的军队的重要性、紧迫性仍然缺乏认识。在政权问题上，大会虽然主张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和省政府，同国民党共同担负责任，共同担负政权，但同时又表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并非是以竞争者的态度要夺得政权。”这仍然是将自己置于在野党的地位，重复过去的错误观点。对于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权内部的阶级关系及其斗争，缺乏科学分析，仍然坚持联合的一手政策，没有被迫破裂的另一手准备。这些右的错误是继续导致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五大”存在着上述右的错误的同时，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也开始滋长“左”的情绪。它没有把叛变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虽处于动摇中而仍然应该尽可能争取的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将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认为蒋介石叛变后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只包括工、农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联盟，确定职工运动的方针



是“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在这个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五大”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去了，而这个“冲破”和“直接走到”也就包含了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内容。

当时，我党把中等商人同小商人一起，划入小资产阶级的范围，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指从买办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同外资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的民族企业家，即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五大”将中等商人划入小资产阶级，并将小资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混同看待，这种阶级划分是错误的。蒋介石主要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由于战争，特别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加之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偏向，一般已处在动摇中，其中小部分正在向右靠拢，但是它们尚未完全倒过去，仍然是应该和可能争取团结的对象。

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历程的分析，有一个“三阶段论”。第一阶段，大体是“五卅”运动以前，革命动力是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力之一”。第二阶段，大体是从“五卅”运动开始，上述四个阶级联盟的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出现在中国舞台上”。第三阶段，“运动的主力，将是一个更有革命性的结合——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离开一大部分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将日益落在无产阶级身上。”（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这第三个阶段。共产国际把蒋介石集团叛变后的武汉政权看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把汪精卫等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共产国际的这

个分析，我党是完全接受的。事实上当时武汉政府并不仅仅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联盟的政权，汪精卫等也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代表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有些人代表豪绅、买办阶级。在武汉政府及其所属的军队中就包括了暂时还赞成北伐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于武汉政府中的这种阶级关系，无论是共产国际或是我党中央，认识都过于简单。当时，如果我们党对此认识得比较清楚，对同盟者有一套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手中又有能够使这些同盟者感到我们有可以依靠的力量，那么争取这些同盟者留在统一战线里面的可能性就会增大。但是，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五大”所作的上述分析以及制定的笼统地反对资产阶级的“左”的方针，从主观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五大”是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武汉国民党也即将分共的前夜召开的，政治局势已经十分险恶。“五大”不但没有对险象环生的局势作出清醒的估计，甚至有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脱离革命，不但不会削弱革命，反能减少革命发展的障碍。这种观点，导致我党中央把希望寄托在以唐生智等武装力量为支柱的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身上，给以信赖和支持，到后来更是节节退让。“五大”以后，我党仍然不作两手准备，没有大力去抓武装，特别是不抓军队，而只是单纯地片面地强调纠正工农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以维持同武汉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事首脑的联合。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的这种片面的纠正“左”倾幼稚病的观点，从上年十二月中央特别会议起一直在继续发展。甚至到马日事变后还发出指示继续纠“左”。这些都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表现。

### 3. 马日事变

我在“五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届一中全会后，中央

决定调我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由夏曦接任（“五大”后湖南区委改称省委），并要我回省做两件事：一是向夏曦交代工作；二是帮助省委根据国民党土地委员会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拟定一个湖南土地问题的单行条例。

行前，我从汉口过江到徐家棚买了车票，返回住处时，有一个中央的交通员在等我，说中央同国民党代表正在开联席会议，要我去参加。当我赶到时，会已散了，只陈独秀和瞿秋白还在。陈独秀对我说：你来晚了，夏曦参加了会，会议讨论的事他都知道，我们和国民党将要联合组织考察团去湖南考察农运，你马上打个电报告诉省委，要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农运的过火行为。我说：我们采取过措施，也报告过中央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回省，可在省委内讨论以后再说。陈独秀很焦急地一定要我马上发电报。我还是坚持回去经省委讨论后再说。陈发了脾气，我也生了气。瞿秋白出来调解。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我才知道电报早已由夏曦打回去了。

大约在“五大”闭幕后十天，我回到长沙，把省委书记职务交给夏曦，移交了工作，并帮助省委按照国民党土地委员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起草了一个土地问题单行条例。约五月中旬，我任务完成正准备回汉口时，发生夏斗寅叛变，武长路中断，无法成行。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

夏斗寅事变发生后，长沙风声紧张，我见到邓寿荃，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形势紧张，有可能出事，要我外出时最好有人保护，晚上不要出去。我和省委估计湖南也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因此省委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并指定了四路总指挥。“马日事变”前一天，五月二十日晚上，省委开会，书记夏曦提出，如发生事变，几个公开活动的负责人郭亮、戴晓云、李维汉和他本人，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地方。我同意他

的提议，但主张：（1）省委几个负责人分四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记不清是否已决定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同时派人到中央报告请示，我自己则设法回中央。（2）在长沙成立秘密临时省委。大家同意这样办，决定薛世纶、王则鸣、林蔚为临委成员，薛世纶为书记。并给准备转移的几个人和我发了用费。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早餐后，接到报告，知道夏曦没有告诉省委就走了，只在国民党省党部办公室留了一张条子，说是同凌炳去武汉向中央报告工作。当天，国民党省党校举行开学仪式，原定夏曦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出席讲话，临时只得由我代替。我在讲话中宣传了土改的必要性。下午，我又出席长沙市委活动分子会，报告形势，提出要准备应变，领导机关要作转入地下的准备。

由于夏曦出走，晚上省委又开会，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当日已得悉夏斗寅被击溃，但省委会上分析形势时，估计反动事变仍有可能发生，决定原先确定的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成立秘密省委等准备应变的方针和措施继续有效，并要抓紧向中央请示。散会不久，约在十时左右，枪声四起，事变发生。驻长沙的三十三团团团长许克祥、三十五军教导团长王东原、三十五军留守处主任陶柳、三十六军留守处陈其祥等率兵千余人，分途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党校，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总队缴械，捣毁特别法庭，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不久，国民党右派分子彭国钧、仇鳌、萧翼铨等即在长沙组织了包括许克祥、陈其祥在内的反共的“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政府，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并通令恢复全省的地主团防武装，在全省范围内恢复反动政权，在各县实行反革命的“清乡”。

事变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凌晨，我转移至长沙近郊离城约二

十里左右黎瑾(党员)的家里隐蔽。黎瑾的父亲是地主，同徐特立友好。后来徐特立也来他家，和我同住一室。我住黎家期间，同省委有过三次通信，彼此用的都是代号。通信内容记得有：(1)建议省委尽可能同中央取得联系，报告请示；(2)建议那个土地单行条例作废，准备秋后动手插标分田；(3)省委来信计划组织长沙城区郊区暴动(并非后来的各路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我不赞成，认为工人纠察队武装已被缴械，省农协武装已转移或溃散，搞城郊暴动，实属冒险，而且此事关系全局，应当请示中央。当时不知省委是谁在主持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经了解才知道郭亮于二十二日即离长沙去湘阴，二十四日到武汉。薛世纶临阵逃跑，只林蔚和王则鸣在长沙坚持，临时省委由林蔚主持。

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黎瑾报告浏阳农民自卫军来了。我感到突然(因为不知有外县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当即前去联系。在路上看到自卫军正向小吴门前进，妇女宣传队走在前头，后面男自卫军有背枪的，有肩梭标的，还有挑炊事用具的，行列混杂，不象要攻城打仗的样子。我在离城不远处，找到县委书记潘心源，我问他们怎么来的？他说是三天前，柳直荀自株洲打来电话，要他们五月三十一日来长沙会师。他问柳直荀来了没有？我说不见来。我问他农军开来多少？他说动员仓促，只通知各区如期开拔上路，未能总集合，数目不知多少。谈话间，忽闻小吴门方向有枪声，农军随即退却。潘心源问我城内敌人有多少，我告知大约有三千，他说那攻城没有把握。又问我政治形势，我说报上登载以谭平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要来湖南，可见国共两党中央合作关系没有发生问题。他问我现在农军怎么办？我说可以退回原地自卫，听候中央指示。潘未再说什么，就赶队伍去了。

以上总括起来，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主张的方针和措施，可

以归结为三点：（1）工农武装就地自卫，省委负责人分四路指挥；（2）总的方针应等候中央指示；（3）党组织应转入地下。至于马日事变后临时省委决定发动各县农军进攻长沙以及后来又奉命停止等情节，我并不清楚。

中央对待马日事变的方针，现在根据一些材料分析，是和平解决。如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的《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五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议决的《农民运动策略大纲》中，都体现了这个方针。

五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介松组织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军队与农工冲突事，鲍罗廷也随行。他们提出处理湖南问题的五点意见是：（1）改组湖南省政府；（2）改组湘省党部及农协、工会；（3）裁判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4）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执行；（5）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讨论马日事变的解决办法，根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记载，国民党中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式，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会上吴玉章也赞成和平解决。当时毛泽东是中央农委负责人和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吴玉章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他们赞成和平解决的方针不可能只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而是贯彻中央的方针的。

中央所以对马日事变持和平解决方针的原因，在五月二十六日的决议中说得很清楚：“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

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避免之进攻。”（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六月十九日，中央在给上海的信中说：“如湖南反许的问题，……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同上）所谓“中间的路”、“新的道路”，就是和平解决，把希望放在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身上。

当时，对于唐生智来说，存在着两个矛盾：一个是唐生智和何键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唐生智同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的矛盾。马日事变系由何键主使发动，唐生智曾有借此除许压何之意，对此事变，初取中立态度，既限制军队，又限制工农。六月二十日，他在汉口总指挥部孙中山纪念周上的讲话，还表示了这种态度。但是唐、何之间的矛盾，是他们内部的矛盾，唐与共产党的矛盾，则是阶级之间的矛盾。何键主力当时不在湖南而在武汉——河南一带，对唐有威胁。唐鉴于何势大难除，又为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左右，乃决心舍小就大，决心反共。唐在回长沙后，态度急剧右转。他在七月五日湖南省政府纪念周上讲话，将马日事变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说：“兄弟奉命回湘查办长沙事件，结果认定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在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在湖南做工作的共产党要负完全责任的。”直到七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湖南问题时，仍然主张联唐反蒋解决何键的方针，但是中央的这种希望落了空。中央自己既没有一条应付事变的具体措施，所以中央号召湖南农民“应当努力去推翻在长沙的反动军阀”，应当“帮助国民政府重新在长沙建立政权”，也仅仅是空喊而已。

我于六月下旬回到武汉，向中央汇报了马日事变的情况，当

时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都没有说什么，更未作什么具体指示。我也见到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也未向我说过其他任何意见。

#### 4.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 叛变，大革命失败

我到武汉时，武汉的局面已十分混乱，金融阻滞，汇兑不通，物价高涨，日用品缺乏，工商业衰落，厂主店主畏祸潜逃，工人失业现象严重，民心极为浮动。被蒋介石压迫以及被朱培德从江西“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各党部的左派分子、各军的政治工作人员，纷纷来到武汉，他们带来各地如何反动的消息，使人们更加重了对时局的严重威胁感。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内，由于蒋介石的压力，冯玉祥的向右转，反动倾向也日益严重。共产国际代表和党中央的首脑部在复杂的形势面前，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已经难以控制局势。

一九二七年六月，共产国际关于应即自下而上地发动土地革命；以工农新领袖补充到国民党中央里面去；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两湖的五万群众编组新的革命军队；严厉镇压反革命的五月指示传达到国内。国际代表罗易私自把它交给汪精卫过目，使汪精卫最后下了分共的决心。六月八日，国民党中央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成员去郑州同冯玉祥会议，达成四军、十一军回防武汉，北方战线由冯的第二集团军负责的协议，同时交换了对付工农运动和共产党的意见。

当时，武汉政府表面上虽然仍维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已危机四伏，随时有发生事变的可能。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陈独秀控制的党中央却仍然没有作统一战线破裂的准备，一味的委曲求全。六月三十日，我在武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



国共关系问题，通过一个包括十一条内容的决议。这个决议虽然在一些条文中也提出注意工农运动中的政策问题，但在总的精神上是一个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文件。它仍然把维持同国民党的合作作为最高原则，没有讨论党如何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应付国民党可能的背叛，避免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反而重申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否认武汉政府实质上是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的性质，继续把自己放在在野党的地位。会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表示不同意见，并向陈独秀提交了团中央的书面意见。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上，用脚踏上。任要求发言解释，也遭拒绝。当时党中央领导核心已处于混乱涣散状态，参加扩大会的恽代英就曾提出现在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的问题。

陈独秀在参加这次常委会后，即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中央组织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组成的五人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主持工作。这次改组，虽然还谈不上对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一味向国民党妥协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等主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活动，命令在武汉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这都是我党开始改变政策的表示。

此期间，武汉国民党中央也在为其叛变革命作舆论准备。汉口《民国日报》连续登载汪精卫、顾孟余、孙科的文章，强调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并非党中有党，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国民党的政策、纪律，攻击工农运动不听国民党中央指挥。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分共”。这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的最终失败。

在“八一”起义前，武汉政府尚未大规模的公开逮捕屠杀共产

党人，七月十六日，还曾发布过保护共产党员个人生命财产和工农运动的训令。随后，武汉政府陆续公布共产国际于五月给我党中央的五点指示，进一步作反革命宣传。八月二日，武汉政府明令对共产党员“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露出了狰狞面目，开始了公开的反革命屠杀。

## 5. 准备起义，开始新的历史时期

“七一五”后，党中央机关即转入地下筹划反击。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了三件事：一、将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四人组织起义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二、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起义；三、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此后，我党即担负起独立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担。

### （五）经验教训

#### 1. 大革命的失败和陈独秀的 “二次革命论”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不幸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二是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还很幼小，主要犯了右的错误，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了主导地位。对于陈独秀的错误，党内虽然有过批评和抵制，但未能制止，更未能克服。

这里，我仅就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谈点看法。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导思想是“二次革命论”。他在

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各阶级作了错误的分析，形成了他的“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很弱，不可能也不应该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它的胜利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帮助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权利，等中国资本主义发达以后，再去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不懂得十月革命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否认当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坚持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而不重视争取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把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

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一个重要地位，他的“二次革命论”对党产生了影响。尽管党的“四大”、四届三中全会以至“五大”都提出了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任务，但对无产阶级要争取领导权必须掌握武装和夺取政权这个根本问题在认识上并不明确。例如在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陈独秀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说：“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是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的手段达到民族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我们的责任，就在努力扩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拿住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始终能够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则中国民族运动便有由第一条道路之可能。”中央政治局虽然在一九二七年初的《对国际第七次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相当深刻地检查了“二次革命论”的认识，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即……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

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以为“我们的革命还在将来，现在只是参加或帮助他们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实际上，中央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未能找到克服这个根本错误的方法。因此，党在中国革命已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所召开的“五大”，仍然没有同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思想。这说明大革命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党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革命应区别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认识虽在逐步提高，但仍很模糊，没有找到症结所在。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反映在政治上是对握有实权的国民党右派，只联合，甚至依靠，节节退让；对工农运动则加以层层限制，把他们当作是抬上层轿子的苦力。具体表现为：（1）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主要方面是以退让求团结，害怕破裂。“三·二〇”事件后，让蒋介石轻易地夺去了军权、党权、政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又把实际上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暂时赞成国民革命或对北伐采取中立态度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和地方军阀联合的武汉政府，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政府，只联合，不作必要的斗争。（2）不争兵权。规定工农武装不准超过自卫，更不准建立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3）对土地革命抱消极态度。（4）对统一战线不作联合和破裂的两手准备，直至马日事变发生仍不组织还击，幻想和平解决。甚至到了六月三十日，还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搞什么国共两党关系议决案，说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要把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的领袖去监督等等。

对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我们应给予严肃的批判！但对他这个人，要作具体分析。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担任党的负责人达六年之久，对党对革命是有过贡献的。但他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他写信给中央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的一些盲动主义的做法和后来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是对的。但他唯独不批判自己的旧民主主义和投降主义。他向来固执己见，是有名的“家长”。由于他坚持右倾取消主义理论并进行托派小组织活动，中央对他一再进行批评教育无效后，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将其开除出党。

## 2. 掌握政权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

要克服“二次革命论”的错误，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要明确地提出政权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应力争掌握政权的领导权，把政权逐步从国民党手里，从右派军人手里，转到共产党手里，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掌握政权的领导权，关键要有自己的武装。这一点我将在下面再谈。这里我仅就国民党及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改造问题谈一些看法。

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参加，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至暂时还支持北伐战争或对北伐战争保持中立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内的成份复杂的政党。其中央和地方政权则主要为右派或偏右的军人所控制。我党要掌握对政权的领导权，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国民党“一大”制定的新三民主义的政纲，根据三大政策，理直气壮地参加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和国民政府，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改造国民党及其中央和地方政权，使之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由于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

的工作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帮助国民党在一些省、市地方建立组织，在这些组织里共产党员担任着重要的职务，这对于改造国民党是很有利的条件。但我们怕当主人，认为当了主人就将破坏联合战线。正如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说的，房子本来是空着的，我们不进去当主人，而是让给了别人。湖南的国民党省党部是中共湘区党委帮助建立的，“三·二〇”前，省党部的主要工作由共产党员担任，那时湘区党委对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并不认识，以为我们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只是因为“在严重的压迫的环境之下，C.P.不包办便无人来办”。“三·二〇”事变后，湖南国民党开始分化，湘区党委就按中央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请一些纯国民党员参加国民党省党部工作。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中共湘区党委便“渐次退到在野党的地位，把国民党的重要工作交给左派”。只是“因为国民党左派还未能站起来”，湘区“六大”才决定：“我们对县、市党部的工农委员还有担任的必要，但须不妨害我们的独立工作。至常委、财委、财务、组织等委员，务要设法交给左派或找好一点的分子担任”。（引自《关于湘区C.P.与K.M.T.关系的决议案》一九二六年一月）这里说的“不妨害我们独立工作”，就是指独立地领导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后，根据中央特别会议决议，湖南区委又决定将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工农委员让给了国民党。我们要独立地抓工、农运动，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是把独立地领导工农运动，同改造国民党的工作对立起来，就不妥当了。它反映了我们党片面注重群众运动的思想，没有把改造国民党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上，总是想扶植国民党出来执政，我们从旁赞助它。“让位”也是应该的。改造国民党，并不是需要占有国民党领导机关的一切职务，即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也不需要如此。占有一切席位，反而易引起纯国民党员的误解和不满，抓对

政权的领导权，也并非要共产党员清一色。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实行的“三三制”政策，就是要纠正清一色的偏向。问题在于指导思想，在于我党有没有争取获得政权的领导权的思想。大革命时期，我党在这一点上是不明确、不坚定的。在政权问题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总以在野党自居，迟迟不肯参加政府工作，把参加国民政府工作视为做官，是“腐化堕落”，是“机会主义倾向”，是做“蠢事”，会因此“在群众中失去说话的地位，失去群众的信仰”，主张只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因此，我们在国民革命联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退居参谋或客人的地位。就湘区区委的认识来说，则处于矛盾的、不坚定的状态中，即有争取改造旧政权的思想，但又不坚定，缺少具体办法。当时，我们的策略应该是两手：一手是自上而下，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联合左派对右派进行必要和适当的斗争，同时利用这个合法讲坛，通过报纸等宣传渠道将我们党员在政府中的提案和主张，择其要者进行适当的传播，这样既可以监督政府，又可以分清面目，教育群众。另一手是领导群众自下而上地（通过人民团体或国民党部出面）向政府提出要求和提议，同时参加政府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在政府内部予以支持。这就是公开的、合法的、自上而下同自下而上结合的、里应外合的两手，而不是只在国民党和政府外面领导群众斗争。

改造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把对政权的领导转移到无产阶级手里来，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这个问题，在大革命时期，没有任何经验可资遵循。湘区党委曾经有过改造湖南的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尝试，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进占长沙，八月，区委连续发表两篇对湖南政局的宣言，根据中央关于要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的指示，提出应迅速召集省民会议，以促进县民会议、乡民

会议的实现，建立由省、县到乡村的革命民众政权，并由此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十二月六日，成立了省民会议筹备处，开始制定省民会议组织法。十月以后，农民运动猛烈发展，在湘中、湘南等农运开展比较好的地区，“平日压迫农民之地主，土豪劣绅，无不恐惧，不再敢把持乡村政治，乡村已成无政府状态，或为农协专政（农协中主持者多贫农，实为贫农专政）。”（引自《中共湖南区委关于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一九二七年四月）所谓“乡村已成无政府状态”，是指封建政权已经瓦解，新的政权尚未建立的这个时期的状况，而在农民有力量的镇、乡，几乎是一切权力归农协，农协已成为政权机关，形成农协专政。区委曾主张将农协专政改为统一战线的，即不仅是贫农，还包括工、农、商、知识分子等除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买办阶级及现行反革命的区乡自治政权，召开乡民会议、区民会议，以此为基础，再扩大到召开县民会议，接收县政权，最后召集省民会议，自下而上的接收省政权。为此，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在区委的推动下，由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起草了《湖南区、乡自治条例草案》，二月十八日，由湖南各团体联席会议通过。三月，又组织人着手制定县、市自治条例。二月十六日，区委发了《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指出要在两、三个月内将农协专政改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区、乡自治，改变乡村无政府状态或贫农专政的局面，以革命的联合战线，摧毁反革命的联合战线。区委还要求各地不必等着省政府公布实施区、乡自治条例，就“可立即照此草案，建筑乡村自治机关”，先干起来，然后“民众”就可“接收一县政权”，再过若干时间，就可能“接收一省政权”。

区、乡自治条例颁布后，乡村中无政府状态有所改变，有些县，在四乡农民取得政权的基础上，“全县性质的民众团体，大都具有很高的能力和权威，能解决许多县政府所不能解决的纠



纷，几乎是所有农民问题交农协，工人问题交总工会，学生问题交学联……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引自《中共湖南区执委为召集省民会议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需要县政府解决的问题，则经由县长召集工、农、商、学各公团及国民党联席会议解决，初步形成县联合政府的形式。“由此可以见到人民要求参与并管理政治”。（同上）于是，在农运发展的地区，出现了两重政权对立的局面，上面是我们对它不能起决定作用的省政权，下层是我们已经取得领导权的县以下的农民协会形式的农村政权以及部分县政权，这部分县政权已经发展到以公团联合会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是不可能持久的，如不作适当处理，对立势必越来越尖锐，统一体必然被打破，或者是革命的打破，或者是反革命的打破。区委认为此时已具备实现省民会议的基础，四月初，即发表《为召集省民会议宣言》及《为建设民主的新湖南问题》的宣言，主张召集省民会议，提出“人民自动召集乡民会议、县民会议，及市民会议、省民会议，实行选举政府，接收政权”的口号。

区委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方针和方案，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大致没有错。

从全局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政权领导的阶级关系上，有没有和平转变的可能？我认为，在“三·二〇”事件前有这种可能，但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国共两党间始终象合作初期那样真诚合作，坚决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和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办好以共产党和左派分子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武装工农，逐步改造旧军队。我相信，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廖仲恺等左派不被打击排斥，这些实施是能够继续下去的。二是我党手里有相当数量的可靠武装，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三·二〇”事件后，这种可能就不存在了。正确的策略应该是放手发展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

准备一旦发生突然事变，我们可以独立领导人民继续作战。

从湖南看，湖南的革命自“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党以来，在湘区党委领导下，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们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展了以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联盟为基础的广大的群众运动，有力地参加和援助了北伐战争，在湖南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这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北伐初期，唐生智集团在政治上采取中左的态度，支持工农运动。在这种条件下，湖南是否有可能对乡、县、市、省各级政权进行和平的民主改造呢？我想如果我们自己掌握了武装，就有可能在一些群众运动发展较好的地区进行政权改造工作。可惜当时我们不懂得抓军权，没有武力作后盾，尽管马日事变前夕，长沙召开了市民会议，选举了左派担任市政府委员，马日事变一来，就被冲垮了。

### 3. 武装力量是政权的生命线， 要争军权

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无论是以战争、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还是以改造旧政权，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权，都必须掌握武装力量。武装力量是任何政权的生命线，夺取政权要靠它，维护政权也要靠它。军权是政权的一部分。革命党掌握了军权，就有可能改造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新政权。在个人军权第一的情况下，它就成了政客、野心家谋取和控制政权的手段。在大革命时期，由于国民革命军各部都没有经过必要的改造，其军事长官在北伐战争期间随着革命势力的发展，招兵买马，壮大了他们个人的军事实力，谁的枪杆子最多，谁的发言权就最大。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他们的发言权有多少，要看军队首领之间的纵横捭阖的政治气候，决定权和否决权实际上是没有的。在湖南，军权集于唐生智集团，决

定权也就集于它。湖南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大革命高潮中形成了包括工、农、商、学、兵在内的广泛而强大的统一战线，成为北伐军能够胜利占领长江上游的有力杠杆。唐生智集团是乘北伐东风而起的暴发户。北伐初期，后方秩序尚不稳定，北伐也未定局，唐生智由于利害之所在，一度执行三大政策，他的在湘留守部队对工农运动采取不干涉态度；等到北伐基本胜利，他的势力扩张了，能腾出手来了，利害关系变了，就逐渐转向反面。军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一旦反动，民众运动一瞬间就遭击溃和镇压。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大革命时期是认识不清的。

我党从成立起就千方百计发展工人运动，争取对工人的领导；积极从事学生运动，争取对学生的领导；后来又积极开创农民运动，在南方各省争取了对几百万、几千万农民群众的领导，但是却唯独没有积极争军权，只抓了很少一点点军队。是不是因为对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军阀武力割据局面的特殊国情认识不足，不懂得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时，需要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呢？我看不是。无论从全党或湘区工作看都不是。事实是，我们党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官学校，选派党员到黄埔和湘、鄂、赣军分校受训，派了许多党员去任教官，还派了大批优秀领导干部和党员去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工作，尤其是在北伐进程中，我们党动员了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给了北伐军充分的援助。我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在提高士气和改善军民关系两个方面，做得很出色。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我们党上述各方面的工作，单凭数量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特别是没有脱离军阀军队素质、互相猜忌的各部国民革命军，是决不能战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孙中山几次北伐无成和蒋介石在第一次攻打南昌战斗中的失败，就是明证。

在湖南，我们也做了不少军事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扩

大会议决定在中央设军事部，大约在同年底，区委就设立了军事委员会，由杨福涛负责。北伐军入湘后，中央军事部的聂荣臻随苏俄顾问加伦到长沙，参加并指导区委的军事工作。大革命时期，先后参加区军委工作的还有颜昌颐、魏依真、贺果、李子骥、李植等。

区委抓的军事工作主要有：

(1) 选送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赴黄埔军校（一九二六年三月后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蒋先云、王尔琢、刘畴西、张际春、赵自选、蔡宗熙、左权、陈赓等都是。仅黄埔一期中的湖南籍学员就有一百七十多人。

(2) 作争取军阀军队的工作。前面说过，自一九二五年起，我们先后派人同熊克武、唐生智联络。北伐军入湘后，区委从派赴湘西的、由周逸群领导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队取得经验，作争取贺龙的工作。宣传队的三十余人皆为我党团员。在长沙，区委曾同贺龙派来的秘书长接头，劝贺归向国民政府，并帮助贺在常德办政治讲习班，训练政治干部。

(3) 同进湘之北伐军中我党同志接头，调查搜集各方军事情况，向中央报告。

(4) 组织工农武装。在北伐军进军沿途，组织工农收缴吴佩孚、赵恒惕溃军枪枝，建立自卫武装，如华容加入义勇队者九百余人，皆奋不顾身，积极配合北伐军作战。北伐军攻长沙时，区委通过工团联合会建立了一支千余人的工人保安队，从溃军中夺得枪枝，分守各城门要道，维持秩序，使长沙城在叶开鑫军逃走时未受蹂躏。

参加四届三中全会回长沙后，因陈独秀指示共产党不独立组织军队，我曾设想将工人保安队编入唐生智部队，也建立一支类似叶挺独立团的队伍。为此，郭亮同唐商定，编了一个独立营，

并由区委派李子骥和贺果分任营长和副官。后来，唐把这支工人武装编入留守的何健所部，何将其编散，工人十分气愤，纷纷弃枪而回。我们的设想不错，但实际的做法是幼稚的。

(5)推动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长沙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校长石醉六，教务长李达，夏曦、陈昌等都在该校任教官。

(6)派党员去做唐生智属下部队的政治工作。中央派彭泽湘任唐生智的八军和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区委商定由李亚农、谭因、王基永分别担任第八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皆由国民政府委任。

(7)一九二六年冬，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总队部，并请省政府发给枪枝弹药。一九二七年四月，省总工会和省农协合办了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训练队委员有郭亮、易礼容、谢觉哉、王则鸣、杨人杞、袁晓煦。训练主任兼总队长为陈曙华。总工会首批送学员五十名，省农协送一百五十名。浏阳在名额外又附送一百名。有少数县如浏阳农民协会接收团防枪数百枝组织农民自卫军，醴陵农协中武装会员占三分之一，均在县集中军事训练。临湘还聘请黄埔军校毕业生任教。湘潭各区自卫军设有常驻队，每队三、五、十人不等。

但是无论是中央，还是湖南，都没有认识到要争兵权，要大力抓自己领导的军队。从根本上说，还是“二次革命论”在作祟。这种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是陈独秀、彭述之的，也是魏金斯基、鲍罗廷的。共产国际在实践中把注意力集中于国民党身上，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当然更不会有夺取军队领导权的思想准备。前面说过，一九二六年七月，我从上海启程返长沙前，曾向陈独秀请示关于唐生智进长沙后我们应取的方针。他说，要支持唐，要发动群众支援北伐。这个指示无疑是对的。但

当我因在会上听到有关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提出我们应寻找机会组织自己的军队时，他却说，我们要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要组织工农自卫军，但不要组织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他的回答也反映了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军事运动议决案》和《农民运动议决案》的精神，主张农民武装不要超过自卫范围，不要有常备组织，以及不要消灭民团等等。这些限制说到底就是不敢独立抓枪杆子。陈独秀的指示和这次会议的决议对我们产生了影响，直到南昌起义前，尽管湖南区委在抓军事方面做了上述许多工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建立由我们党独立领导的正规武装的设想。

怎样争取兵权？主要要做两项工作：一是建立新的、由我党领导的军队；一是改造旧军队。可以从三方面入手：（1）放手武装工农，从中建立、训练基干队伍；（2）建立正规部队，参加北伐战争；（3）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实现上述第二方面的可能性虽小，但如果能利用时机，在北伐战争胜负未定的期间搞一下，也不是完全不行。北伐开始时，湘区党委想借重唐生智搞叶挺式部队，未成，造成一次失误。但以后如能借重叶挺、贺龙是可以做到的，仍没有去做，再一次失误，丧失了时机。第三方面很重要，并有可能。对于一切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即有爱国和民主思想的军官，无论上、中、下，都应该一个一个地向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尽可能争取一部分成为忠实的朋友以至同志。这种可能性在上层很小，但中下层是存在的。如果我们能结合着纠正工农运动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幼稚病，对他们做耐心的工作，就有可能从他们中争取一些人，在紧急关头带着队伍投到工农方面来。对唐生智部队，我们曾输进大量经过初期革命风暴锻炼的农民去当士兵，如果我们在他们中间建立秘密支部，进行适当的政治工作，他们就会成为掉转枪口打反革命的武装。上述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基本的、最重要的，也是可能性最大的。当时湖南如能对建立

工农武装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一一落实，湖北、江西也尽可能这样做，大革命就可能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

既然没有夺取政权、夺取军权的思想准备，我们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只有和平合作的一手，没有被迫同豪绅买办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分裂时实行武装斗争这一手的准备。在蒋介石凭着他手里的枪杆子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把我们从黄埔军校和他的部队中赶出来，接着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的紧急时刻，形势已是十分险恶，我们党的当权者却仍然书生气十足，只有以退让求团结的一手，而不准备武装回击的一手。“中山舰事件”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曾一度“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见陈独秀《告全体党员书》），要求国际代表鲍罗廷拨五千枝枪武装广东农民，但在遭到拒绝后，就不再坚持了，后来甚至作出共产党不要搞独立武装的决定。要不要争兵权，要不要搞独立武装，这在当时是我们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中谁胜谁负起决定作用的一着，也是革命能不能取得胜利起决定作用的一着。一着错，满盘输。正是这一着错了，到头来，被打倒在血泊之中，这才清醒过来，从此走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道路。

有一个问题，即在“中山舰事件”后，我们是否还有条件准备武装还击的一手？我认为有的，在湖南更是有的。第一，我们有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可以作准备；第二，我们有群众基础。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比较顺利地进行了农民自卫军的工作，我们在留守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三分校的工作没有受到明显的阻碍，我们还有效地进行了贺龙部队的工作。这些说明我们是有准备武装还击的时间和客观条件的。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和全党一样，头脑不清醒，没有争兵权的觉悟，不懂得这关系到党和革命的生死存亡。军事工作也做了不少，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却成

了为他人作嫁衣裳。对农民自卫武装也是积极发展的，却又接受了“不能超过自卫”的限制，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才公布《湖南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和训练工农自卫军，但已为时太晚了。加以农民的武装主要是梭镖队，只少数几个县夺了民团武装改为常备队，还有几个县由叶挺部队给了些枪弹，力量也不足。可以说，我们既没有建立新的由党领导的军队，也没有改造旧的军队，丧失了至少半年的大好时机。

武汉政府叛变前夜，六月初，中央接到共产国际来电，要求动员两万党员，加上五万革命的工农，组织一支自己的军队，这算是武装革命的一手，可是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来不及了。组织五万农军可能做到，但我认为，按照当时打正规战和占领城市的指导思想，如果真的集中几万军队，其后果也将和“八一”起义军一样，徒然损失尔后进行游击战争的一部分精华。

#### 4. 深入土地革命才能巩固 革命的胜利

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要使民主革命获得成功，必须发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参加，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大革命时期，北伐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北洋军阀，即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走狗。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坚持三大政策的旗帜，共产党动员和组织了千百万群众支持军队，和在军队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苏联也给了支持和帮助，不到半年就占领了长江中游，基本打垮了北洋军阀，可以说国民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基本完成。要进一步扩大胜利、统一中国，就必须在取得胜利的南方各省深入土地革命，挖掉帝国主义的墙脚，武装千百万主力军——农民，建立强大、巩固的后方和前进阵地。



湖南党在整个革命高潮中，对于组织、发动和发展农民运动，是全力以赴的。到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湖南农民斗争发展迅猛，势不可当，成为整个高潮的中心。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同国民党各派军阀特别是占有地盘的军阀发生严重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以前，当农运兴起，土豪劣绅被打得昏头昏脑，乡村政权已开始转移，北伐胜利尚未完全定局，唐生智集团还需要湖南人民的援助和支持的时候，就积极宣传土地革命的必要性，抓紧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制定出有步骤地进行土地革命的计划，我们就不仅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也可能解决当时因战争和帝国主义封锁所造成的财政困难，使农业税收有着落。我们可以采取边斩边奏，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自下付诸实现，不必等候国民政府制定法令。这样做了，整个形势就会起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缺乏积极的态度，想等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并且想等到全国胜利之后再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丧失了大半年的良好时机。

解决土地问题应该有步骤，应该有干部和政策方面的准备。根据当时的战争环境，第一步，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对地主实行政治没收的政策，经过乡村统一战线的自治政府，有准备地先作出范例，然后推行。第二步，在主客观条件比较成熟时，再普遍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党的“五大”虽然通过了一个比较好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但为时已晚，未能付诸实施。湖南党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是坚决的，最后争得了制定单行条例的权利，我在《湖南革命的出路》一文和马日事变发生的那天上午在国民党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都公开宣传土地革命，但也为时晚了，来不及了。

## 5. 争取中间势力要政策恰当

北伐战争时期存在着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极为广泛的统一战线。它的总的旗帜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豪绅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北洋军阀。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它的基础是工人、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没有剥削的其他劳动人民）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联盟。同时，它不仅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了同北洋军阀有矛盾的，暂时赞成国民革命或对北伐采取中立态度的某些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和地方军阀，也混入有豪绅买办阶级分子。就以武汉政权的组成人员看（包括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既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苏兆征，坚定的左派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彭泽民，也有暂时处于中间派的汪精卫、徐谦、宋子文、陈公博、唐生智、冯玉祥、朱培德，还有右派蒋介石、李济深、何应钦、谭延闿，甚至还包括从北洋军阀行列中投诚过来的陈调元。但这个政权在“四·一二”以后就激烈分化，在武汉政府的基地——两湖地区——相继发生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最后到“七一五”全部公开叛变革命。

湖南革命统一战线的规模同全国大体相同，就阶级关系和政治态度说，也分左、中、右三翼。

一、左翼，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忠于三大政策，是彻底的革命民主派，当时的徐特立、方维夏、张唯一、罗宗瀚、董维键、李荣植、黄衍仁、查夷平、朱剑凡等，都是湖南相当著名的非党革命知识分子。

在县、市和学校中，有大批非党左派分子，他们是青年团员、国民党员和其他积极分子，在我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大

多数同群众有相当联系。

二、中间力量，又大体分三类：（1）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个阶级，在政治上有两面性。作为剥削者，他们同劳动人民有矛盾，害怕工农大革命，当他们感到革命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容易被豪绅买办阶级拉过去，因为他们本来同后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他们长期身受帝国主义、豪绅买办，特别是军阀的压迫，有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对军阀的要求，所以他们表现积极拥护和支持北伐战争，并且出现了一批比较有远见的政治代表，如邓寿荃、狄昂人、姜济寰等，政治态度属于中左。姜济寰后来参加“八一”起义，转到左翼阵营。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势力，其地位十分重要，应该是我们在经济上加以保护、政治上尽力争取的一个阶级，一个重要的同盟军。

（2）不属于豪绅之列的富农、中小地主、北伐军内中下级军官和其他中上层人物。

（3）是所谓“三分资本，七分封建”，即基本上代表封建势力的上层政治活动家。这种人野心和投机性都很大，当革命高涨和革命对他有利或尚不威胁其根本利益时，可以采取中左政治态度，容许三大政策，反之，就急速右转。

上述三类只是大致的划分，对其政治态度，要具体分析。按照当时的具体情况，又可分为中左、中中和中右。中左与左翼相联系；中右与右翼相联系；中中不左不右，又左又右。总的说来，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左倾或右倾，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

唐生智集团也有左、中、右。唐生智在大革命时期，从北伐战争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为止，他在政治上是中左态度，因此，他的属下何键所

部三十五军留守部队在这段时间里对工农运动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此后，一方面由于农民革命继续高涨和深入，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直接间接的威胁和利诱，唐生智集团（武汉政府的主要支柱）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何键部对工农运动就由中立转到敌视，“四·一二”以后，首先与蒋介石勾结，制造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唐生智本人则由于与蒋介石争夺北伐军总司令交椅，在“四·一二”后的短时间里仍继续表示支持工农运动，但六月郑州会议后，作为南北两个主力兵团的统帅，唐生智和冯玉祥，即先后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

三、右翼，是在北伐旗帜下，留在或混进统一战线中豪绅买办阶级的代表，如何键、许克祥、彭国钧、王凤喈、刘岳峙之类。

无论就全国或就湖南来说，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力是农民。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实现在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一点上面已经讲了。这里着重讲一讲对中间势力的争取问题。

争取中间势力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能否战胜右派的关键问题。中间势力是一个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转化的动摇不定的力量，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都在争取他们，谁能争取到他们，谁就能在相互斗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在抗日时期对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作过如下正确的论述：“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引自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

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这个正确的论述，既是根据抗日时期的实际情况，也是根据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这里讲的第一个条件包括革命军队和广大的左翼群众的力量。第二个条件讲的是政策问题。第三个条件则是力量和政策相结合，胜利地对右翼势力作斗争的问题。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虽有力量而无正确的政策，或虽有正确的政策而无力量，都不能完成争取中间势力的任务，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关于力量问题，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当时存在很大的缺陷，没有自己掌握的军队。

对中间势力的政策，根据毛泽东思想和抗日时期的经验，应该包括：（1）在政治上给以适当地位，并给以教育；（2）在经济上照顾他们的利益；（3）对于他们的动摇性，本着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进行必要的批评和斗争。

对于城乡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小商贩、手工业主，要实行政治上联合，经济上保护的政策。政治上联合，就是要让他们参加联合政府，同时推动和鼓励他们赞助北伐、拥护三大政策。经济上保护，就是政府的税收要公私兼顾，劳动者的要求要适当，要本着劳资两利的原则，保证民族工商业者的企业能够有利可图，能够继续发展，至少能够维持生产和经营，能够城乡交流。如果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处理不当，要求过高，致使他们无利可得，不能继续生产经营，那么，无论对于政府和劳动者都是自杀政策，都不应该采取。出现这种情况时，便应适当调解，使之避免。这些都是抗日根据地成功的经验。至于大革命时，应当怎样对待民族工商业者（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工、农劳动人民的关系，这对于区委完全是陌生的事情，既无经验，也无现成的政策可资遵守或参考。

在农村革命中，也有正确对待中间势力，即不属于豪绅之列

的富农、中小地主的问题。我们应该在经济上先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和政治没收的政策，并保护资本主义和个体性质的工商业（包括小商贩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吸收那些中小地主中赞成北伐，比较开明的代表参加农村联合战线的政权，这样，便有可能使一般地主在农村革命中多数中立，少数联合到我们方面来。

当时，在对待城市中间势力的问题上，存在着缺陷。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于民族工商业者有提出过高要求的事实，甚至出现封闭厂店，要求自己管理的个别情况；在农村，也有打击小商小贩、手工业主和北伐军官家属的现象发生。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种的：第一、伟大的群众革命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自发的左稚行动；第二、工人（包括店员）、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工商业者之间长久存在着一定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在要求改善生活的斗争中，难免提出过高的要求；第三、有些工商业者采取顽固态度，招致激烈的反抗；第四、运动的领导者自然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加之上面缺乏政治指导，就不免支持群众的左稚行动；第五、少数基层组织中有作风不正派的分子占据领导地位。

工农运动中的过左缺点，侵犯了城乡中间阶层的利益，使他们感到畏惧和恐慌，不利于我们团结大多数，纠正是必要的。但是，区委缺乏对情况的具体调查，对纠正的政策和方法更没有认真研究，主要是没有认识到：（1）对劳资双方争议不决的事件，应采取调解政策，调解无效，则由政府加以合理的仲裁；（2）对工农劳动人民的缺点，应采取内部教育说服和其他适当的处理方法，而不应采取任何带有泼冷水性质的处理方法。因此，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区委给各县委发出通告，纠正农运中某些“左”的偏差时，没有指出应该注意的政策和方法，以致有的县农协采取公开布告的方式，规定农民不准这样，不准那样。有的县还搞了“洗

会”运动。这都是错误的，它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责任在区委。

作为社会阶级关系在国民党内的反映，由我党领导和影响的左翼力量同国民党右派和中间派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我们对公开反共的右派，在湖南如刘岳峙为首的“左社”，王凤喈等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头脑比较清醒，认识比较清楚，对之进行过公开的揭露和斗争，削弱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但是，我们对于当时表面上似处于中间状态而实质上已是右派，以及中间偏右，同右派有密切联系的唐生智集团的上层人物则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于他们同社会反动势力的联系和勾结，心中无数，特别是对第八军军官没有调查研究，这和我们缺乏改造旧军队的观点有关，因此，对之缺乏针锋相对的必要的批评和斗争，不能作到减少中间力量向右的摇摆。

此外，我们抓紧了工会工作和店员联合会工作，但对于工商业资本家缺乏调查研究。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只了解浮在上面的少数几个人。对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也缺乏调查分析。政策、策略上发生偏差，原因多在此。

## 6. 湖南党组织的优缺点

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党组织是一个能够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坚持民主集中制，遵守纪律，维护团结，有实干精神，领导群众同敌人英勇奋斗的党组织。

区委成员在几年中虽有若干变动，但始终是团结的，相互间有时也发生激烈争论，但一经作出决议，都能坚决执行。

区委尊重中央，遵守纪律，鄙视和反对派别活动。我记得一九二四年或一九二五年，全国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张国焘以党团名义在铁路党组织系统中进行垂直领导，发生地方路局摆脱地方

党委领导的倾向时，区委坚决予以抵制，粤汉路和株萍路工会的党团都未执行铁总党团的垂直领导。

区委对于党员的理论教育和训练也比较重视。一九二三、二四年，在长沙办过干部训练班，我去讲过课。自一九二五年，根据中央通知，党、团区委联合举办了多期暑假和寒假党校，向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学习的内容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一九二六年，区委编了一本《党员须知》，作为党内教材。县、市级领导干部靠自学，阅读《向导》、《新青年》和理论书籍。这种教育和训练十分必要，因为湖南党组织同全国一样，一建立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缺乏理论准备。这种学习有助于提高党员的革命自觉性。

湖南党组织的上述优点，很大程度决定于自区委以下各级党的干部。他们的绝大多数来自基层，有实际斗争的锻炼，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作风朴实，有一股拚命的革命热情。在大革命中，湖南区委能够做出一些成绩，主要是在群众工作方面能同群众在一起，受到群众实践的启发，在政策、策略上提出了某些可取的观点和措施，如土地问题，组织独立武装问题，建立县、乡自治政权的问题等，反映了群众的要求。

但是，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党组织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一，组织发展落后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党员发展少，在人民群众中所占比例小。一九二六年十月，全区党员共三千七百一十四人。一九二七年一月，农村党员有一千七百人，平均每千农民才有党员一人。一九二七年四月，湖南的党员发展到约一万三千人。应该说，从一九二一年湖南仅有几个党员，发展到一九二七年的一万三千个党员，这也算是猛烈的增长了，但是从湖南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客观形势的需要和可能来看，是远远不相适应



的。党员如此之少，就必然影响党的主张和政策的贯彻。工农运动高潮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我党党员少，无力掌握运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思想理论水平低。在革命实践中，我们积累了许多感性知识，但缺乏理论的指导，不善于分析综合，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从理论上说明问题和解释问题。我自己，作为班长，就是这么个低水平。马列主义太少，是湘区领导班子的基本弱点。例如，我在马日事变前通知各地农军准备就地自卫，同时决定省委领导人分四路指挥，是不错的。但在马日事变后没有改变为组织游击战争，表现出对全局注意不够，缺乏远见，结果只能等候中央的令行禁止。（关于各路农军攻长沙，我至今仍认为不论当时到了多少人，不论胜负如何，从政治上看都是英勇义举，应该大力歌颂。但是，从军事战略上看，我认为适合的策略是分区部署和发动游击战争，而不是集中攻打长沙，占领城市。）其他如对于争兵权问题、政权问题、左倾幼稚倾向问题等也都有停留在感性认识的缺点。这也是大革命后期湖南党受到陈独秀投降主义影响的主观原因。

第三，不懂得调查研究的方法。凭感性认识办事，固然是因为理论水平低，同时也由于不懂得调查研究这个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区委领导同志听取汇报，跑跑看看，是作了的，但没有意识到需要系统的调查研究。大家只称赞《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好，而没有认识到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方法好，没有去学习他已经作出的榜样。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它播下的火种却未曾熄灭。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湖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了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省份之一。湖南党组织在大革命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些是我

在前面提到过的，有许多我没有提到，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对于那些在大革命时期同我们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如朱剑凡、李荣植、邓寿荃、罗宗瀚等，我们同样永远怀念他们。

## 关于我在“马日事变” 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下简称《告党员书》)和《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著,下简称《机会主义史》)在“马日事变”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了批判,蔡和森在党的“六大”上的发言也有类似的批判。现在把《告党员书》和《机会主义史》的有关论断摘抄于下:

《告党员书》说:“长沙事件之后,因湖南共产党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民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的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民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退却。”原文在“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之后,紧接着有“李维翰”三字。

《机会主义史》说:“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导自溃的结果。从五月十八日以

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中央特派员及省委负责人，先日分析政治，谓将是唐生智整个的叛变，武汉一定已没有了，以为没有办法抵抗，只有逃赴江西边境去。明日知道河南郑州已下，武汉无恙，则又分析政治，以为许克祥不会暴动了；最后知道许克祥要暴动，省委乃自行解散，重要人物每人发二百元，次要一百元，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于五月三十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把戏。他的理论是：‘即使我们能够取得长沙，唐生智便要与我们武汉政府翻脸，是我们有了长沙而没有了武汉。现在武汉既然存在，便只有请求国民政府用法律手续来解决。’”

上述两个文件的这些论断和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批判所依据的一些重要情节基本上不符合事实，可是却成为几十年来论述党史和写文艺作品的根据。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承认在“马变”过程中犯有执行陈独秀路线的错误，并在各种情况下作过多次检讨，同时对一些基本上不符合事实的论断和批评，却心有不平。过去长期没有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告党员书》是我同意了的（后边要谈到这点），又因为手边没有可以证实自己的记忆和认识的资料。至于和森的《机会主义史》我以前未曾看过。去年以来，在参加座谈北伐时期湖南党史资料的过程中，我阅读了一些可资证明的文献和回忆录，为了进一步澄清史实和表明自己的观点，特写这个材料。

## 一、我在“马变”前后

党的“五大”闭幕后约十天，我依中央决定回长沙把省委书记职务交卸给夏曦，并帮助省委（按照国民政府土地法草案）起草一个土地法单行条例，约在五月中旬，任务完成，正准备去汉口，

因夏斗寅叛变，占领咸宁，武长铁路中断，未能成行，省委与中央的联系亦中断。下面简述我在“马变”过程中的经历：

（一）夏斗寅事变发生后，长沙风声紧张，我和省委估计湖南也有发生反革命事变的可能，省委因此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当时考虑，反革命进攻，要武装还击，但在未得到中央指示时，不主动进攻。

这个通知，现在尚未发现原件，但柳直荀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布尔塞维克》第二十期发表的《湖南马日事变的回忆》可资佐证。他说：“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但是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是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此外，最近发现的我在一九四〇年写的“自传”，那里面也说：“夏斗寅事变时，曾给了各县以训令，农民自卫军遇到攻击时，须予以抵抗，并指定了四路总指挥。”

（二）“马变”前一天（五月二十日）晚上，省委开会，书记夏曦提出，如事变发生，几个公开活动的负责人郭亮、戴晓云、李维汉和他本人等，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地方。我同意他的提议，但主张：（1）省委几个负责人分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但是还没有决定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同时就地派人到中央报告请示，我自己仍设法去中央；（2）在长沙成立秘密临时省委。大家同意这样办，并决定薛世纶，王则鸣，林蔚为临委成员（五月二十二日，薛世纶逃跑，王则鸣、林蔚在坚持工作），并给准备转移的几个人和我发了用费。

（三）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即“马变”当天，早餐后，接到报告说：夏曦未告知省委，出走了。他在国民党省党部留了一张条子，说是去武汉中央报告工作去了。当日国民党省党校开学仪

式，原定夏曦代表中共省委出席并讲话，至此只得由我出席。谢觉哉同志的回忆中也曾提及此事。我在讲话中仍宣传土改必要。下午长沙市委活动分子会，也由我出席，报告形势后，提出仍须准备应变，领导机关作转入地下准备等。

晚上省委开会，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分析形势时，估计反动事变仍有发生可能，确定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秘密省委的成立等准备应变的方针和措施继续有效，并要抓紧向中央请示。

散会不久，约在十时左右，枪声四起，事变发生。

(四)事变第二天(五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三十一日

二十二日凌晨，我转移至近郊离城约二十里左右黎瑾(党员)的家里。黎瑾的父亲是地主，同徐特立友好，徐亦来他家，与我同住一室。

我在黎家九天，同省委有过三次通信，彼此用的都是代号，当时不知省委谁在主持。我三封去信的内容记得有：(1)建议省委尽可能同中央取得联系，报告请示。(2)建议那个土地单行条例作废，仍准备秋后按农民插标分田。(3)省委来信计划组织长沙城(区)郊(区)暴动(并非所谓各路农军攻长沙计划)，我去信表示不赞成，认为工纠武装被缴械，省农协武装已转移或溃散，事属冒险，且此举应当请示中央。

郭亮二十二日离长沙去湘阴，二十四日到武汉的事，我是以后才知道的。

(五)五月三十一日上午，黎瑾报告浏阳农民自卫军来了，我感到突然(因为不知有外县农军进攻长沙的计划)，当即前去联系，在路上看到自卫军向小吴门前进，但队伍不整齐，女宣传队走在前头(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晨报》报道，也有“以妇女走头做先锋”的记载)，后面男自卫军背枪的，肩梭标的，还有挑炊事用具的，行列混杂，不象要攻城打仗的样子。离城不远处，找到

县委书记潘心源，我问他们怎么来的？他说，是三天前，柳直荀自株洲来电话，要他们五月三十一日来长沙会师。我问他农军开来多少，他说动员仓促，未能总集合，是通知各区如期开拔上路，数目不知多少。谈话间，忽闻小吴门方向有枪声，随即看见农军向后退却。心源问城内敌人多少，我告知有三千，他说那攻城没把握。问及政治形势，我告知报上登载以谭平山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要来湖南，可见两党中央合作关系没有发生问题，我已一再建议省委向中央报告请示。他问现在浏阳农军怎么办？我说可以退回原地自卫，听候中央指示。心源未继续谈下去，即赶赴队伍。

(六)如上所述，我在“马变”过程中主张的方针和措施，可以归总为三点：

- (1)工农武装就地自卫。
- (2)总的方针应等候中央指示。
- (3)党组织应准备转入地下。

## 二、中央的方针是和平解决

“马变”前后，我和中央失去联系，对中央的方针只是从报上看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的特别委员会要来。省委在“马变”后是否同中央取得联系，也不知道。

现在，根据得到的材料，中央对待“马变”的方针是和平解决。所据如下：

(一)从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议决的《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和同年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议决的《农民运动策略大纲》中，可以看到中央当时主张避免“纠纷”的态度。

(二)五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派谭平山等五人组

织特别委员会赴湘调查军队与农工冲突事，同行的有鲍罗廷。特别委员会提出处理湖南问题五点意见：“（1）改组湖南省政府；（2）改组湖南省党部及农协、工会；（3）制裁越轨军人，由周斓调查；（4）命令停止军队与农工之军事行动，不听者严厉执行；（5）其余善后问题，听中央办理。”

（三）毛泽东同志赞成和平解决。“汪精卫六月十三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报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

又，同一资料载吴玉章同志也赞成和平解决。

（四）中央决定毛泽东去任湖南临时省委书记。但他直到六月中旬才去长沙，现在看来是在两党中央协议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事件之后才去的。易礼容（中央决定他去的）于五月二十九日到达长沙代行省委领导职务。罗章龙说他因毛泽东同志的邀请，不久也去了长沙。我问过他们两人，都说毛泽东同志没有要他们组织武装暴动，又都说“八七”会议以前，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及过组织武装暴动或反攻的事。

以上四点可以证明中央对“马变”是采取和平解决方针。

### 三、关于《告党员书》和 《机会主义史》中的批判

#### （一）关于《告党员书》中的批判。



《告党员书》是新到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起草的，未经过当时中央实际负责人的集体讨论，临到八月六日晚上，瞿秋白才开始翻译，他翻一页，我读一页（我和他住在一处）。读到上述译文时，我提出：浏阳农军攻城经过，我到武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接见我时，向中央详细汇报过，现在这样写不合事实，应当修改。秋白说现在夜深了，要修改还要去找“毛子”，明天开会就要用，来不及了。我说明天我在会上作个声明。秋白说会议时间很短，你作声明，会引起议论，耽误时间，劝我算了。当时环境险恶，我也就算了，但心里存着一个疙瘩。上面所说我到武汉时向中央详细汇报过的内容，就是我在本文第一节（五）项所述的经过。

《告党员书》说：“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民军所包围”，“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这个批判的基本点，不符合事实。

（1）已有十万农军包围长沙城，只待进攻命令，事实不是这样。当时《晨报》报道，扑城的浏阳农军有三千余人，长沙河西第十区农协“啸聚党羽”“约期进省捣乱”的也只三千余人。参加“马变”的原三十五军一师三团团团长李仲任回忆，攻长沙的浏阳军有两千余人。柳直荀回忆在湘潭附近的姜畲地方聚集有工农义勇队万余，但已被敌人各个击破。据易礼容于六月初亲往该地了解的情况，是柳至姜畲时只带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这可能是义勇队已被击破后才到姜畲地方。只潘心源回忆说：“一夜之间，集合农民约数万人。”但我于五月三十一日上午在长沙近郊见到的浏阳农军，决无数万之众。我问潘来多少农军时，他也不知数目。当时担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并兼任代理省委书记的易礼容于五月二十九日回到长沙，到一九二八年春节前一日，他都在湖南。据他

说，十万农军攻长沙的事他不晓得，下令撤退的事也不晓得。

(2)当时，我同中央没有联系，省委也未曾告知我有各路农军攻长沙的计划，因此也就谈不上取消这个计划。省委也未告知我有中央要农军“等一等进攻”的信(有无此事，我至今不知)，因而也谈不上所谓我曾向各地农军下达过“停止进攻的命令”。柳直荀说，省方负责人认为不可盲动，中途改变方针，叫工农义勇队停止出发的论断，是否柳身历其事，还待商榷。因为据李淑一回忆，五月二十二日晨，柳即已化装离开长沙，经湘潭浏阳，又转回长沙，至长沙的当晚即去武汉。潘心源回忆中说，在长沙近郊遇到我时，是我告诉他“省委已通知各地不必进攻”，实际并无其事。因为，如上所述，当时我只知省委有一个城区的暴动计划，并不知有要各地进攻的计划。我见到潘时也并未阻止他们前进，我要他们退回原地自卫，已是在农军后退下来之后。

柳直荀和潘心源的回忆都提到有省委通知停止进攻的事。如确有其事，可能是中央通知省委这样作的，因为中央一开始就主张和平解决。但这也只是推想，尚无证明。即使确有其事，我也并不知情。

## (二)关于《机会主义史》中的批判。

《机会主义史》所揭发的事实中，只有一点，即给几个人发用费，虽有出入，却确有其事，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其他则都与事实不符。

(1)《机会主义史》说：“湖南马日事变，不是许克祥的功劳，乃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及中央特派员指导自溃的结果”，在“马变”前，省委即“自行解散”，“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原文在“‘藏个两月再说’”几个字上打了引号，似是和森引用的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或中央特派员的原话。《机会主义史》的这个论据与事实不符。

第一，如我在前面讲到的，“马变”前，五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我参加的两次省委会议，一次为夏曦主持，决定：如事变发生，几个公开负责人，分路转移，就地指挥工作；加强工农武装，就地自卫；成立秘密临时省委，指定临委委员。另一次是在“马变”当晚，因夏曦出走，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会议由郭亮主持，确定上次省委会议决定的应变措施仍然有效。据此事实，怎么能得出在“马变”前，省委即“自行解散”“各自逃亡”“藏两个月再说”的结论呢？至于夏曦在第一次省委会后，不辞而别，无疑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因夏曦的出走而得出省委“自溃”的结论，更不能说夏的出走，是省委或所谓的中央特派员让他这样作的。

第二，“马变”后，省委仍在长沙活动，因为我同省委仍有三次书信往还。郭亮、柳直荀以及临时省委的薛世纶虽然先后离开长沙（当时我不知道），但是作为省委组织仍尚有活动却是事实。据谢觉哉同志回忆，“马变”后，“省委出面的同志都仓促走了，由林蔚等同志组织临时省委。”刘英同志的回忆也说，临时省委成员之一的林蔚在“马变”后“一直在长沙，没离开”，“当时在省委工作的彭公达、何资深、夏明翰也在长沙。”我估计王则鸣也未离开省委，因为从未见过反证材料，所见到的是他后来牺牲于外县。

（2）《机会主义史》说：“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于五月三十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五人临时委员会”究竟是中央的机构还是省委的机构，至今我也不清楚；号召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之事，我更无所闻。因此，我不可能对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的事“大发雷霆”，并“斥为小孩子的把戏。”而和森说的这些所谓的事实，即“五人临时委员会”的组织和三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决定，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

议决的《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以及六月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策略大纲》中都没有提到。而且有关湖南的这样重大的决定，当时既不通知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也未告知即将赴湘的省军委书记和兼代省委书记的易礼容。因为据易礼容后来同我谈及“马变”问题时说，他从未听到毛泽东同志或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向他谈及这个事实。

(3)《机会主义史》中提到的中央特派员，并无其事。因为我并非中央特派员，当时中央也无其他所谓特派员在长沙。这个由当时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蔡和森虚构的所谓特派员，几十年来，在一些有关的文艺作品中，不仅充当了陈独秀主义分子，而且充当了叛徒、特务分子的角色。

《告党员书》和《机会主义史》对我在“马变”中一些情况所作的基本上不符合事实的批判，现在有必要加以澄清，它不仅涉及我个人，而且是党史上一段重要史实应予恢复本来面目的问题。

## 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

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纪念我们党建立六十周年之际，回忆起当时会议的一些情况，记录于后。

### 八七会议的历史背景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我们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曾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在一九二七年遭到了失败。

这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在客观方面，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包括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反对中国革命。它们的势力很强大，特别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主要集中地长江流域。在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占领武汉、南昌、南京、上海以后，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封建势力，就伸出千百只手来，先把蒋介石拉了过去，随后又把汪精卫等拉了过去。在主观方面，主要是由于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的领导。那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经验是很不足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还缺乏统一的了解，对领导权的问题、武装斗争的问题、统一战线的

问题，都认识不够。正因为党还处在幼年时期，陈独秀为首的投降主义才得以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自愿地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当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要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他没有在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思想准备。他反对共产党创建自己领导的军队，而把国民革命军全部让给国民党去领导，并帮助国民党去扩大和巩固它。当北伐军胜利占取长江中、下游，农民革命高涨时，他又不肯放手武装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却依靠上层谈判，而谈判则往往以退让、妥协告终。

陈独秀投降主义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开始，蒋介石等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策动、收买和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同时，汪精卫集团也加速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六月，汪精卫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纵容朱培德在江西强制“礼送”共产党人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出境，并派兵搜查革命群众团体；表面上决定对湖南马日事变采取所谓和平解决办法，实际上支持何键、许克祥等反动派继续实行白色恐怖，等等。这一切都是汪精卫等准备全面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

就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发生反革命政变之后和武汉发生反革命政变以前，我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下旬到武汉就任党中央组

织部长职(五届一中全会决定调我任中央组织部长)。我到达武汉时，陈独秀还在主持工作，党中央机关内部的情况很混乱。六月三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陈独秀提出一个所谓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是陈独秀投降主义在政治上的最突出的暴露，是一个彻头彻尾地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纲领。在讨论时，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代表团中央提出一个批评这个“议决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大发雷霆，也不传阅，就把它撕得粉碎，扔在地下，用脚踏上。任弼时同志要求发言解释，陈独秀横蛮拒绝，以致大家不便多发言，而集投降主义错误大成的十一条也就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接着，在七月四日以后到七月十二日以前，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鲍罗廷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估计这时鲍罗廷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斥责投降主义、调回鲍罗廷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训令，但鲍罗廷没说有这个训令。)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成员有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和我。在五人常委中为什么没有瞿秋白，我至今搞不清楚。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说：“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按指鲍罗廷)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他还说：“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李立三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作的《党史报告》中也说：“当时国

际对于中国的指导有不少电报来，可是党没有看到，都到了老鲍袋里去了，并且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同志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就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虽然还谈不上已经是对投降主义的纠正，但开始改变了右倾投降主义统治我党中央的状况，改变了向汪精卫反动集团一味退让的政策。七月十三日，我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公开揭露汪精卫等所把持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并命令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我党同志退出政府。这是我们党改变政策的开始。

与此同时，汪精卫于七月十四日晚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七月十五日又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接着，在武汉地区公开向革命力量进攻，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

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不久，新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了。在这前后，罗易和鲍罗廷走了。罗易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六月五日，他把在六月一日接到的共产国际给他和鲍罗廷的电报交给汪精卫看，让汪精卫找到了背叛革命的借口，所以共产国际很快就把他调回去了。鲍罗廷是国民政府的政治顾问，我党在七月十三日发表对政局的宣言后，他随即和瞿秋白一起到了庐山，七月下旬他从庐山回到武汉，随即回国。罗明纳兹是七月下旬到达武汉的。当时，五人常委开了一次会，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了国际的指示，作了批判陈独秀的报告。那时，五人常委代行中央职权。在五人常委掌权期间，主要决定了三件大事：



第一是同意举行南昌起义。汪精卫公开叛变后，五人常委派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一部分中央负责干部前往九江，准备组织党在北伐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继续革命，反对新老军阀。旋因军事形势变化，敌情紧急，李立三同志等一致向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征得当时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同志的同意。政治局常委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并派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委员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遂于八月一日胜利地举行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这里附带提一下张国焘的问题。过去只记得他有问题，但具体问题是什么记不得了。现在查阅一九二七年十月李立三写的《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和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得知原来政治局常委同意南昌起义的建议后，同时报告了共产国际。国际复电说，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把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常委派张国焘去前方传达国际电示，张借此反对起义。前委同志都不同意他的意见，经过两次激烈争论，张始同意举行。由于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到前线去了，到召开八七会议时，在武汉的常委只剩下张太雷和我两个人。瞿秋白同志在“八一”以前已回到中央，参加并主持八七会议的准备工作的。

第二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五人常委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至七月下旬这段时间里决定的。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在八月三日以前就草拟好了《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随后中央农民部还根据《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草案，为中央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八月三日，中央便作出决定，通知各有关省委。《大纲》明确要求在上述四省组织秋收暴动，并规定了秋收起义的战略。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时，我又向大家说明：中央农民部已根据《最近农民斗争

议决案》草案拟定了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这样，五人常委会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就得到了八七会议的追认。中央除通知有关各省坚决配合八一起义军的行动外，并于八月八日致电前委，指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因此这一暴动，应当与中央决定之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

第三是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中央紧急会议原来准备在七月二十八日举行，并由秋白、太雷和我与国际代表一起进行筹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交通困难，二十八日未能集会，而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到了八月三日，常委讨论了紧急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可是，仍然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非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八月七日，出席会议的人仍不能到齐，中央委员到了不过半数，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的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便只有召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人开会。因此，这次会议既不叫中央全会，也不叫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叫中央紧急会议。

五人中央常委除了决定这三件大事之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例如，在八七会议以前，各路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大部分到了武汉。那时我和陈乔年任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我们按照中央规定的三项办法进行安排：凡能秘密返回原地原籍工作的便派回原地原籍；不能返回原地原籍的，派到其他地方工作，其中大部分（包括一些党外进步人士）派到南昌参加起义。此外，还有一小部分送往莫斯科学习。

以上情况表明，八七会议是在我党中央领导机关犯了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之后，在非常困难和非常危险的时刻，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党内同志的要求召开的。当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完全必要的。

## 八七会议的经过

八七会议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数，我过去回忆是二十几个人。现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共计二十一个人。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就是我）等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同志。当时，他任党中央秘书长。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和其他两个俄国同志也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却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前后花了六天工夫。

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现在是鄱阳街一百三十九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当时我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对这个地方的环境和条件很注意，因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邓小平、陆定一同志也都认定这个地方是八七会议会场所在，因而现在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在这里陈列会议有关文物，开馆展览。

由于环境险恶，八七会议由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我担任主席。我代表常委首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

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这次会议的两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指出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紧急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尔后他就《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下简称《告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作了长篇发言。由于国际代表的报告很长，加上他讲一段还得由瞿秋白同志替他翻译一段，这样他的报告就花去了将近一个上午的时间。国际代表报告完毕，我随即向大家指出：国际代表的报告中包括几个重要问题：一、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二、工人问题；三、农民问题；四、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五、对国际的关系问题。并向大家说明：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着重讲了四个问题：第一是国民党问题，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第二是农民问题，指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第三是军事问题，批评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错误，指出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他强调说，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要求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是组织问题，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毛泽东同志的发言，是在党领导革命的根本性问题上，不但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而且提出了对尔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指针。

随后发言的中夏、和森、亦农、弼时等同志都指出，五次大会后党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中心在于强调联合小资产阶级，拒绝执行大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决议。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见上层，却不见群众（中夏并指出：甚至把谭延闿等等地主买办

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亦农还指出党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和森还指出：过去一切错误都无五次大会后的错误那样厉害，并自我批评说，他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弼时还指出机会主义者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秋白只对《告党员书》提了几点需要补充的意见。

发言者都表示拥护国际代表的报告，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都着重地揭发和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领导的错误。由于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便建议停止讨论，由国际代表作结论。接着，国际代表对鲍罗廷、罗易、魏金斯基的错误问题，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问题，目前形势的估计问题和民族革命中的几个矛盾问题，发表了结论性的意见，并提议对《告党员书》在原则上付诸表决。这个《告党员书》，是由国际代表罗明纳滋起草的，并由瞿秋白同志在八月六日晚上连夜翻译成中文。在会上，瞿秋白同志把它念了一遍，大家就在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并决定以瞿秋白、我和苏兆征三人组成委员会进行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秋白不是五人常委的成员，为什么却能代表常委向八七会议作报告？这是因为秋白在七月中旬由武汉赴庐山，下旬已从庐山回到武汉，参加了中央常委的领导工作，并主持了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秋白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随后，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策略付诸实现，他提出了三条具体方针：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第二，为了纠正过去的错误，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

府。最后，秋白提出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交会议讨论通过，同时要求会议对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予以追认。

接着，我依次将常委与国际代表起草的三个议决案；即《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一提请大家讨论。在讨论这三个议决案时，都是先由秋白宣读议决草案全文，经大家发表意见后，由秋白作结论或由国际代表答复问题。会议决定，三个议决案的文字修改权交临时政治局，政治局应将会议讨论通过的新政策发布各地。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先由国际代表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五人，并提出候选人名单付诸讨论。讨论中，我和蔡和森等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却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后来，国际代表认为可将名单付表决。表决前决定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增二名。表决结果，选出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九名正式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七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选举完毕，我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会议结束以后，八月九日，由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秋白、兆征、罗迈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兆征兼管工委，我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

为什么大家都推选瞿秋白同志负责？我认为从实际情况来看，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

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过抵制。他在党的“五大”时，发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篇文章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是驳斥彭述之的谬论的，彭述之与陈独秀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批判彭述之，实际上也是批判陈独秀。在当时，这是有系统地驳斥投降主义观点的一篇文章。党的“五大”时，他把这篇文章发给代表们看，也送给我看，问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后来，这篇文章还印成了单行本。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有的同志提出，当时应不应该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九二七年七月间陈独秀拒绝去共产国际，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但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在这里附带地叙述一下陈独秀问题的处理经过。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价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对他的态度是对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直到一九二九年他发展到有组织地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十一月十五日，才被中央开除出党。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一时的错误，而是如前所述，有他的“二次革命论”作为根源的。因此，他当时对待错误的态度很顽固，以致后来堕落到同托派相结合。陈独秀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下台，前后当了六年的总书记

(开始称书记,“二大”、“三大”称委员长,“四大”、“五大”称总书记)。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建党初期,他是为党做了工作的,我们对他要进行具体分析,要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功过。以前某些历史书把他的名字根本抹掉是不对的,现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他的照片是对的。目前对陈独秀有三种看法:一说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说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说对他要一分为二。我赞成他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是非功过要一分为二。

## 对八七会议的评价

八七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不开这个紧急会议,就不能纠正我们党中央领导机关所犯的投降主义错误,就不能确定新的方针和政策,就不能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八七会议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但是,八七会议也是有缺点、错误的。它的主要缺点是“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开始了惩办主义的过火斗争。

当时党在理论上和经验上还属幼年,还很不成熟。在八七会



议上和会议以后，还不能对陈独秀投降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清算，也不能对新的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思想上作系统正确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愤恨的情绪和拚命的精神。特别是在革命干部中占多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他们具有赴汤蹈火的革命决心，却还缺少无产阶级的坚韧精神，这种“左”倾情绪更容易滋生起来。在八七会议上，这种情绪是有反映的。会议的文件中就有“左”的东西。我自己就有一种“左”的情绪。那时“左”比右好的观点就已发生，不少人认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怕右不怕“左”。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

在八七会议的“左”倾错误中还有重要一点，就是看到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七年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以后，便笼统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以后在党内长期把蒋介石反动统治笼统称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这种把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同样对待的“左”倾政策，给党在白区和根据地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才改正了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此外，八七会议还有其他的缺点，这里不再具体叙述了。

八七会议以后，在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

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各省部分地区纷纷举行了武装暴动，同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恢复、重建和整顿党的组织，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关，组织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党内刊物，向阶级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从而把党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中挽救出来，胜利地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党的湖南省委，建立工农武装，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随后，他根据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把战略上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率领秋收起义剩下来的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了八七会议和后来的“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 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

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同志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三个常委之一。现就记忆所及，并重温有关文献，把瞿秋白同志和我们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问题作一些回忆和研究。

## 八七会议后的政治形势和 党中央所做的主要工作

八七会议以后，紧接着在八月九日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瞿秋白、我、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毛泽东、蔡和森、彭公达、任弼时、顾顺章及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人。会议由瞿秋白同志任主席。议程共有十一项，其中主要讨论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常委问题。会议对常委人选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多数通过国际代表提出的名单，以秋白、兆征和我三人组成常委会。至于分工，会议决定由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任党报总编辑；我兼管组织部、秘书厅；兆征兼管工委；恩来负责军事部，因他已率领南昌起义军去广东，由秘书王一飞代理部务；杨之华负责妇女部；顾顺章负责交通局；出版局暂由郑超麟负责。

二是关于北方、南方工作问题和湖南问题。关于北方工作问题，会议决定将蔡和森、王荷波二同志派往北方，组织北方局，蔡和森、王荷波、刘伯庄、彭述之和共青团的一名代表参加，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管理顺直（今河北省）、山西、满洲、内蒙和山东等省党的工作。对于这个问题，八月十一日《中央给山东省委山西满洲临委的信》中也写道：北方局“以和森、荷波、述之、昆弟、伯庄为委员，以荷波为书记，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各党部”。会议特别指出，北方局负有报告八七会议决议案并以会议精神整理所属各省党组织的任务。关于南方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张太雷同志去广东任省委书记。接着，八月十一日，《中央给广东广西省委及闽南临时委员会的信》中说：“临时政治局请派恩来、太雷、彭湃、陈权、代英、黄平、国焘为中央之南方局，以国焘为书记，并在南方局之下组织一军事委员会，以恩来为主任，管理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特支。恩来等未到以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的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上述区域内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此外并须报告此次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案，且根据之整顿该三省党部组织之责。至于前敌委员会与临时南方局相遇之后，前敌委员会即可取消。”关于湖南问题，会议决定改组湖南省委，吸收与群众接近的人加入，加强湖南党的领导；由毛泽东、彭公达与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新省委由九人组成，其中至少要有工农分子三人，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三人，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会议批评湖南省委不应在湖南组织一师与南昌起义部队共同取粤，而应使湖南形成一广大基础，将革命力量扩大到全省。在批评中，毛泽东同志指出，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正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毛泽东在这以前不久

曾起草并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即主张在湘南农民起义中形成一个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个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他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去。毛泽东同志自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当时只有他提出了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具体结合的远见卓识。

**三是关于政权问题。**会议决定在乡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中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暴动前是指挥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国民党左派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

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领导机关仍在武汉，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往上海。当时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当时，国内政治局势是非常紧张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已经建立了反共反人民的新军阀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为人民大革命所吓倒，也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我们党和其他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革命已经由高潮暂时转入了低潮。在这种形势下，我记得党中央由武汉迁往上海前后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迅速向全党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十二日和十九日先后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一号、第二号，阐明了党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各级党组织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全党。为了在

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等各项革命运动中也能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于八月份还陆续发表了《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今后学生运动方针议决案》等各种文件。与此同时，中央还通过党的组织系统下达会议精神，并派了一些同志到各地去进行指导。八七会议后，湖北省委很快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在湖南方面，改组了湖南省委，迅速传达和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湖南的秋收暴动是毛泽东、彭公达回去布置的。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后，曾多次将会议精神向他所到地区的党员干部作了传达。在广东，张太雷同志向本省的党员、干部和到达广东的“八一”起义部队领导人周恩来同志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在北方，王荷波、蔡和森同志也把八七会议精神迅速传达了下去。八七会议精神下达后，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斗志，使全党精神为之振奋。

第二，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和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的决定，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了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的武装暴动。在湖南，有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在湖北，有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等地的起义。中央在武汉时，瞿秋白、罗亦农和我在亦农家开过会，共同布置了湖北的秋收起义。在江西，有修水、德安、星子、鄱阳、弋阳、横峰、万安等地的起义。在广东，有海丰、陆丰、琼崖等地的起义。在江苏，有宜兴、无锡、江阴、崇明等地的起义。在河南，有光山、四方山等地的起义。在河北，有玉田等地的起义。在陕西，有清涧等地的起义。这些起义大半是我们党领导的，也有许多是零星的自发斗争。这是我们党在这段时间最重大的任务和最主要的工作。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或遭到了挫折，

但是它英勇地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和围攻，而且也有一部分起义取得了胜利。特别是井冈山斗争取得的胜利，对创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三，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党积极开展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下，工人阶级处于毫无政治权利、毫无经济保障的地位，原来曾经拥有三百多万会员的各地工会均被封闭，工人领袖和积极分子大部分遭到杀害和监禁。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工人运动，主要的工作是开展经济斗争，建立秘密工会，进行工农革命夺取政权之宣传。

在新军阀的统治下，学生的境遇日益痛苦，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不但毫无民主权利，而且大批失学、失业，致使许多人流落街头，徬徨无依。因此，就学生运动而言，当时主要是组织秘密学联；发展左派学生青年团体的组织，领导学生群众参加政治上、思想上和争取学生本身应得利益的各种斗争。

至于广大妇女，她们在旧社会的地位本来就比男子更为低下，这时又遭受国民党新军阀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更是痛苦不堪。为了积极开展妇女运动，当时主要是恢复各级妇女部组织，给妇女干部传授秘密工作知识，并要她们积极向女工、农妇做工作。

经过我党的工作或在我党影响下，当时有些地方爆发了一些零星的斗争。拿工人运动来说，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郑州市的纱厂和铁工厂的工人结队进行了游行请愿。同日，汉口邮务工人罢工。十月四日，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第一、二厂工人八千余人罢工。十月十四日，广州工人万余人举行大示威，反对反动政府委派工贼组织的“工会改组委员会”。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已经由进攻的性质转变为防御的性质，并且大

多数都是自发的、分散的经济斗争，但他们的斗争却是持续不断的，并有少数斗争取得了胜利。

第四，根据八七会议关于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见《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的决定，中央在全党散乱之际和遭受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进行了极其艰苦而又重要的组织工作，开始恢复、整顿或重建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的秘密交通网，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党中央除在八七会议后立即成立了北方局和南方局外，因中央迁往上海与长江各省相隔较远，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又设立了长江局。长江局所辖范围是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七省。“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指挥上列七省的革命运动与党务，上列七省的党务须纯全受长江局的指挥，但长江局须随时将所处理之工作与决定报告中央，受中央的指导”（引自《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十月二日，长江局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我、罗亦农、王一飞、任旭四人。会议决定罗亦农为长江局书记兼所辖各省军事特派员，易礼容为秘书长，蔡振德为秘书。会议还讨论了湘、鄂、皖、豫、赣各省的工作。各局建立以后，先后派人巡视各地，实际指导各地工作，在党的内部工作中注意培养党的干部和从党员群众中提拔负责人，领导党员和群众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极其艰苦而英勇的斗争。

第五，对湘、鄂、赣、粤四省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做了许多善后工作。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后，十月十二日《中央致广东省委函——关于叶贺军队失败后广东的工作及善后问题》中谈到：“关于从前线溃散之同志，南局应即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一招待处招待他们，……招待的详细办法由昌颐兄面商，大要是可以



留在广东的工作同志或可以就近归家之同志，须尽量留在广东或暂时回家，不能留者则令其回沪。现尚在前敌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无必要留在前敌时须一律设法回沪。”当时，我在中央常委中分管组织部和秘书厅。南昌起义军失败后，许多人辗转到上海是由组织部负责接待的。贺龙同志也转移到了上海。他名声很大，是个“危险人物”。我们在上海租了一幢两层楼的公馆，让他一个人住在楼上，下面安排一对夫妇带着小孩作二房东。当时我代表中央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在谈到湘西问题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俟农民起来。事后，我把与他谈话的情况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秋白同志听了汇报后说：是否要他去干一干呢？我说：我以为可以。去俄回湘由他自己决定。先叫他们到湘西去试一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会后，我又去找他谈了话。在谈话中，他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我说，你怎么能回湘西呢？武汉和长江你很难过去。他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上、陆路到湘西，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以前凡是打我的旗帜的，就不会遭到强盗抢劫。他还说，我很保险，你不要管，我只要出了武汉就行。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去。我就派人掩护他出了武汉，回到桑植。结果，他回去又干起来了。在南昌起义军南征失败后辗转到上海的，还有周恩来、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郭亮、夏曦以及党外的朱剑凡（周南女校校长）等许多人。对于这些人，党中央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有的分配工作，有的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回到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

在这一时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认为也应该提出来，这就是抛弃了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根据当时“几月的

经验(包括南昌军队中的暴动与两湖广东革命的农民暴动的爆发)指示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因为，一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并“由其腐烂的尸体中产生出赤裸裸的军阀专政”。另一方面，“以前国民党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因资产阶级军阀之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在群众眼里，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因此，中央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后来，十一月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则重申：“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

现在看来，当时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只是“苏维埃”一词是音译过来的，不易为中国老百姓了解)是正确的。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了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时也没有用左派国民党的名义，而是旗帜鲜明地以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他并致信党中央提议放弃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至于南昌起义部队，在开始时虽曾利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但到汕头失守以后也决定取消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在八七会议以后，我们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上就已露头。八七会议反对右倾错误时的“左”倾成分，主要见之于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应该肯定，《告党员书》的方向是正确的。它的目的是批判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并且基本上达到

了目的，但其中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确实存在“左”倾论调。首先，关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告党员书》说：国民政府“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这里所讲的“资产阶级”是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告党员书》明白地说：“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这里是把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同买办阶级“相象”。《告党员书》还说：“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并说：“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这里笼统地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只是工人阶级一己利益的斗争。这样，在《告党员书》中就混淆了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不知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主张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斗争，不讲争取和联合，这显然是错误的。其次，关于对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告党员书》说：“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这个分析，基本上是对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革命方法。《告党员书》的回答是：“工人阶级及其

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站到革命的战线上来”。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里讲的“工人阶级斗争”，如前所述，是指他们“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这种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势必不仅会对民族资产阶级过左，而且会过火到侵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民对地主的斗争，也存在这个问题，这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出现过。其次，这里没有区分农民对地主，工人对民族资本家两种斗争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没有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作必须极力争取和联合的对象、同盟者，没有认识到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一方面要照顾他们的利益，并进行适当的教育，另一方面要领导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取得胜利。与此相反，却把“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统统当作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又不是联合第一，不讲照顾他们的利益，而是用绝对的无条件的阶级斗争，即所谓“革命方法”来强使小资产阶级跟着自己走，这种做法就会把小资产阶级大部分驱到豪绅一边。如此等等。由于《告党员书》中存在着一些“左”的错误理论和偏激情绪，不够实事求是，它又“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事实表明，在八七会议以后，这种“左”倾情绪继续滋长，致使在中央领导机关和一些地方党的工作中，都包含有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河南省委在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写给中央的信说，冯玉祥反动以后，党的工作无形中停顿，党的组织非常薄弱，好多个县市缺书记，军事工作更是缺人。同时，“在农民中，没有我们的基础。”“工人对政治态度非常冷淡”（《河南省委报告》节录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但中共中央在九月二十四日却指示河南省委说：“河南现时客观的情形，一面反动统治不能稳定，一面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尤其是农民武装暴动，差不多继续不断普遍于全省。正是我们党从各方面领导工农穷苦民众实现这个总目标

的好机会。”在这前后，中央领导机关和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还提出“红色恐怖”（《江苏省委给宜兴的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大杀豪绅地主”（《中央给陕西省委信》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等口号。当时上海正在搞赤色恐怖，中央迁上海后，我同秋白去看上海新任书记邓中夏同志。他汇报这事，我们三个人都反对在城市搞赤色恐怖，市委随即制止（当时中央对城市恐怖政策还是反对的）。

党内“左”倾情绪的不断发展，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导致以秋白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 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召开和 我对几个决议案的看法

八七会议以后，经过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到一九二七年十月，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中这样说：“现在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均已告一段落”，全国局势“已有大的变化”。但是，“在这些运动中我们的党充分的暴露了他的弱点，同时也得了不少的教训，这些弱点和教训均须有一番正确的整理”，“本党今后的政策和组织须有一个新的决定”。因此，秋白同志和我们几个常委研究后，“特决定十一月十二日在沪召集紧急会议，凡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指定出席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均须列席；被指定之重要省委或中央分局亦须派代表出席。”接着，在《中央关于召开紧急会议的更正》中，则将召开会议的日期由十一月十二日改为十一月八日，并要求“到会的人务于七号以前赶到上海”。

随后，十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开会。出席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和我。会议除讨论了政治通告问题、两广问题和北

方问题外，主要讨论了中央紧急会议的准备问题。关于当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秋白同志说，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当时我也说，中国革命潮流高涨的形势，此时已比八七紧急会议时还要明显。农民的暴动简直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农民暴动已显然走到土地革命的阶段。目前中国革命，客观条件上可以综合各地的暴动发展成一个总的暴动。关于党的状况，我说，从前党有组织基础的是上海、湖南、广东三处，经过大压迫之后，湖南、广东党的组织几乎没有了。上海比较好些，还存在一点，但也不大好。其他地方更可以想见，甚至南昌等处党的群众都没有了。因此，我又说，当前党的力量实无力来适应客观条件的需要，不能负起如此重大的责任。会上我还提出这次紧急会议对于组织问题要下一决心，坚决地改造党，撤换一般知识分子的领导，提拔工农分子等。对于这个问题，秋白也说：党的组织是一非常严重的问题，一定要坚决地提拔工人分子，党不但灵魂要换，而且躯壳都要换过。凡旧的同志稍微不好的即请他自己去找职业。现在看来，秋白和我的这些意见，特别是我自己的意见，都是错误的，其中也都有国际代表的影响。这次会议，为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形成“左”倾盲动主义作了准备。

一切准备就绪，中共中央于十一月九日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两天。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正是九月两湖农民暴动遭受挫折以及叶贺军队失败之后。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按当时中央的说法，就是“不但要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指出我党今后斗争的策略，并且要指出根本上重造我们的党，强健我们的党，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的整顿政治纪律。”（见《中央通告第十六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与意义》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除中央常委外，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重要省委（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或中央分局的代表。在十月十九日《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中通知参加会议的人有：任弼时、彭湃、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王荷波、毛泽东、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邓中夏。当时，毛泽东同志正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可能这个通告他没有接到，就是接到了他也走不开，因此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张国焘随叶挺贺龙部队南征至汕头失败后，当时已从香港到达上海。张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王荷波同志在八七会议后被中央派去任北方局书记，十月十八日已在北京被捕，因此他没有参加会议。中央于十月二十三日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的信中说：“太雷已到此（按：指上海）”，“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见《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因此，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彭湃没有参加会议。蔡和森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致中央的信》中，曾谈到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到天津前“去沪月余”，在《关于顺直问题的口头报告》中又说他“动身来参加十一月扩大会之前一日接到中央纠正盲动主义的信”，由此看来，他是参加了会议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北省常委向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中说：当时“任旭已赴中央扩大会”，可见任旭参加了会议。这样，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苏兆征、我、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蔡和森、任旭等人。此外，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瞿秋白同志主持的。会议的议程我记不太清楚了。十月十九日《中央召集紧急会议的通告》称，会议的议事日程为：一、政治报告和讨论；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召集第六次

代表大会问题。会上通过了以下几项决议：

**(一)《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按十一月一日中央常委会上的决定，这个《决议案》是罗明纳兹起草的。

首先，关于革命性质问题，《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决议案》还认为：“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也说：“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他又说：“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他还说：“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



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最后，他指出：“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

所有这些，都是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否定与批判。陈独秀把中国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当成西方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后再来干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认为当时蒋介石的法西斯专政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决议案》和秋白的论文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并未完成，而是中断。夺取政权的革命只有一次，根本上无所谓陈独秀等人所说的“二次革命”。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而且“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因此，这个时候的革命“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它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继续完成国民革命——土地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从其“主要领导者来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而从“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象法国大革命似的”；这个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这些就是《决议案》和秋白论文中在中国革命性质问

题上的“无间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在当时，这实在是极为新鲜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光辉思想或光辉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已经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但是，在《决议案》和秋白的论文中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错误观点，即：“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错误观点，混同了中等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不认识中等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不认识蒋介石只是在他制造“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前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而在这个事件之后已转到大资产阶级的立场。过去很长时间内都认为，蒋介石一直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叛变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种认识从“五大”宣言起即见之于党的正式文件，几乎贯通于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不是某些个人的责任。这个观点是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观点。然而这个错误观点，却是“左”倾错误的一个主要的根源。

由于这个错误观点，至少主要是由于这个错误观点，便引出了模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一定界限的错误论调，即前面引述过的所谓“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基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国当时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速的进展”。这样，就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了政权之后，还需要经过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过渡时期。

但是，《决议案》和秋白的这种错误观点，同李立三、王明等“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提法上不相同。前者的提法是：革命既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革命的性质就超越民主主义的范围。这种混淆在历史上一直延续到瓦窑堡会议以前。后者除了这种混淆外，还加上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冒险性更为突出，再加上又主要靠红军打大城市，正是“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

其次，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决议案》从“左”的观点论述了“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危机”、“工商业的危机”、“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统治内部的冲突之不能稳定，然后说道：“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时间内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决议案》还认为：“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统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

广州暴动失败之后，秋白在《中国革命低落吗？》一文中还断言：“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其理由是：“第一，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更加分崩离析，军阀的混战更加要扩大。”“第二，广州暴动之后，不断的军阀战争，正在广东湖南河南山东福建等等省份大大的发展起来，这是许多杂色军队的小军阀的战争，亦就是桂系与蒋派间接的战争。”“农民暴动的事

实，差不多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看见”。“许多乡村之中农民群众自己开始寻找共产党。”“第三，广州暴动之后，开始兵士的参加革命。”因此，秋白说：“固然，白色恐怖摧残我们的力量，但是伟大的艰苦的斗争之中，共产党的力量和群众的基础是在生长起来。”

显而易见，《决议案》和秋白论文中的上述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提出革命必然要高涨，革命高潮必然要到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下，所有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没有解决，而且当时明显的事实是反动派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这里指出的“高涨”是“无间断的高涨”，“不断高涨”，这种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了当时总的说来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违反辩证法的。

大家知道，标志直接革命形势的三个根本条件是：统治阶级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下层群众不能继续生活下去，并具有对统治阶级进行生死斗争的决心；中间阶级日益动摇，脱离统治阶级，倾向下层革命群众。这些条件当时在全国根本不存在。实际上，秋白等人是把全国已处于革命低潮中的一些此起彼伏的农村暴动，夸大成为“直接革命形势”，这显然是错误的。

如果上面这个错误还是带理论性质的话，那么，《决议案》关于“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的论断，就明显地是直接影响政治实践的严重错误。至于秋白写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的论文，他所列举的第一、第二、第三条理由，即使全部是事实，也得不出“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更得不出这是“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结论。

我认为如实地估计当时的革命形势，情况可能是这样：

第一、虽经大革命失败(蒋、汪叛变)和严重白色恐怖,又经历八一起义军南征的失败,但革命斗争并没有熄灭,仍旧在继续,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

第二、农民暴动有失败,有胜利,失败多,胜利少,但斗争仍在继续,并未消失。各地农民起来暴动,特别是胜利的暴动,以及几处农民游击战争的坚持,证明八七会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实行土地革命总方针的正确。

第三、当时的农民暴动,并不都是“自发的”,其中大都是党组织领导的。这证明当时党的组织在一些地方仍有战斗力,响应了八七会议的号召。

第四、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全国来说还不是高潮,而是低潮;但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星星之火(农民暴动),它有一定的可能(这里必须有正确的指导这个主观条件)逐渐发展成为燎原之火,即逐渐发展成为高潮。因此,盲目乐观是错误的,悲观失望也是错误的。

再次,关于“现时的总策略”问题,《决议案》根据它对中国革命形势所作的“左”倾错误估计,提出了当时党的盲动主义策略总方针,即:“(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总策略”(一)使用了“自发的”这个形容词,实际上当时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多数场合是党组织在那里推动和领导的,其中有的还带有强迫命令的性质。)

《决议案》指出:如果农民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

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是提出了当时中国同志中间除了毛泽东等同志外，一般还没有认识清楚的关于游击战争的观念。这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紧接着又指出：“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对游击战争的发展前途来说，这也是对的，但在当时只能在小范围内进行。同时，就当时形势来说，这个“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和上面“总策略”(二)中的“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相结合，很难不产生盲动主义。

严重的盲动主义倾向是“总策略”的(三)。《决议案》指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秋白也说：“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制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见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大家知道，秋白在《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中，曾引用了列宁对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准备暴动的指示：“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须不依据于军事投机，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日益生长的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解决暴动问题的这三个条件，便是马克思主义与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秋白说：“列宁这几句，是革命发展到决定胜负的斗争时期，所应当特别注意的。”可

是，他在“城市工人暴动的问题”中，却没有严格遵守列宁的指示，而是依据他的“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的错误估计。

由此可见，“总策略”的核心便是武装暴动，是农村暴动和城市暴动的汇合，是以工人暴动为“中心”和“指导者”的城乡武装暴动。这种暴动的推行者并不认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而是强求城市工人暴动，搞的是城市中心论，而对农民暴动的估计，也是盲目乐观，以为很容易发展成为巨大的农民暴动，甚至农民总暴动。

此外，《决议案》还规定了一系列“左”的政策。例如关于阶级政策，《决议案》写道：“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消灭政策；……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农村暴动中，例如在湘南成为“杀尽土豪劣绅”以及烧毁他们房屋的所谓“烧杀政策”；甚至引进了城市。这种错误政策曾使革命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二）《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依十一月一日常务委员会决定，这个《议决案》是秋白起草的，共十个部分，即：“（1）组织任务之重要”，“（2）党的组织之大弱点”，“（3）党的改造之重任”，“（4）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5）工会的组织问题”，“（6）农民的组织问题”，“（7）党与青年团的关系”，“（8）党与反动团体”，“（9）党的组织与纪律”，“（10）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党的改造”问题，其政策的核心就是要“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

《议决案》指出：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议决案》分析这种情况的形成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在这一过去的时期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而工人贫农群众加入共产党，“这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孟塞维克主义的策源地”。

《议决案》的以上这些论述对不对呢？据我所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的负责干部大多数确实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中间的确有许多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还带着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党内产生右倾机会主义的阶级根源之一。有不少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消极了，逃跑了，甚至叛变了。只就这个范围来说，《议决案》的上述评论或多或少可以说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这些评论有很大的片面性，对当时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采取了近乎“一刀切”的否定态度。很显然，《议决案》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不可能直接从工人阶



级中产生，只能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作先导。这就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中央和地方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客观原因。事实上，在党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过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们同工农相结合，初步得到了实际锻炼，并在不同程度上学习过马列主义的初步知识，因而在第一次大革命中起了骨干作用。一般地说，他们的工作是积极的，斗争是英勇的。否认了他们的这个骨干作用，就很难理解我们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大革命所起的领导作用，也很难理解大革命的惊人的迅速发展。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些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有些还在继续奋斗。由于增长了丰富的经验和斗争成败两方面的考验，在当时更成为党的宝贵财产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经验证明（外国的革命经验也同样证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斗争中往往起着先锋作用，而其中真实信仰共产主义的部分，即本文称之为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部分，则能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同工人农民相结合，形成整个革命中的基础力量和领导力量。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就是革命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密切结合，没有这种结合不可能有胜利。可是，《议决案》的上述论述却忽视了这种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他们当时还只有几年党龄，在理论上、政治上都还很幼稚，还带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以至跟着陈独秀主义走过。但是，由于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已经牺牲的和正在继续斗争的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干部，是决不可以否定，决不可以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而相反是应该予以表扬和鼓励的。这是头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议决案》还把八七会议后的某些错误和失败也归罪于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议决案》写道：“最近许多正确的御

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这也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上实事求是地来对待他们，而是从盲动主义的观点来指责他们。我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上从八七会议开始就有“左”倾盲动倾向，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盲动主义错误。这是当时的主要倾向，在党内有它的思想基础。盲动主义政策到头来是行不通的，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在地方上直接领导暴动的干部，当然首先要受到这种惩罚，也就是知识分子干部首先要受到这种惩罚。但责任应当主要在中央，不能简单归罪于许多在地方上担任领导工作的知识分子干部，更不能指责他们为“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

第三个问题，《议决案》说：“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人）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功，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实行）这一改造工作。”这实际上就是要对大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干部实行大换班。

应当承认，培养和提拔工农干部（在城市斗争中是工人干部，在农村斗争中是农民干部），在当时，是党的建设上一项根本的带紧迫性的任务；同时也应当肯定，这项任务应该是也只能是有计

划有步骤地审慎地进行，并且决不能由此而得出用他们去取代一切革命知识分子干部的结论。但是，《议决案》却简单地采取大换班的办法，而且要求实行得愈快愈好，这又是“一刀切”。这个问题，周恩来同志曾经作过如下的评论。他说：“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181页）

在组织上，采取以工农分子新干部替换知识分子旧干部，这种大换班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即使是下面搞错了，也不能这么做。这是因为，八七会议的总方针之一是秋收起义，而起义就是武装暴动，就是要夺取武装，打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可是当时党内干部中几乎没有人有这种经验。不但没有经验，而且很少有真枪实弹（只有少数几处暴动先有部分正规武装为骨干），只有用梭镖、土枪、刀棍去夺取敌人（多半是民团、小部敌军、警察所）的武器。这首先要有很大的勇气，还要有几分冒险性。但是由于武器劣，经验缺，往往是失败多，胜利少。一切工农武装起义的成功和游击根据地的建立，都是经过反复多次的斗争和失败，才达到胜利的。天才（比别人聪明一些）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他本人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也是在秋收起义部队与优势敌人多次战斗受挫折以后，才说服干部，率部上井冈山，争取与袁文才、王佐合作的。如果一遇挫折和失败就进行大换班，那就不但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只能由于新提拔的干部的更加缺乏经验而

加速失败。无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或工农出身的干部，都得在战争中学习，而且主要是从败仗中学习，经常不断地总结斗争经验。大换班的性质是组织上的盲动主义，是对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争既缺乏知识，又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产物。

以上，就是我对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核心问题——干部政策的几点看法。

由此可见，十一月扩大会议在政治上是盲动主义的，在组织上是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服务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在十一月的《中央工作计划》中，就明显地把“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和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前者为后者服务。《中央工作计划》一开头就指出：“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使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深入于党员群众中；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洗刷一切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党的成份，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接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对各级党的机关在组织上和成份上的改造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这个通告在干部政策上完全是十一月扩大会议议决案的翻版。随后，十二月十日，中央发出第二十号通告，指示“改造党的具体办法”：一、重新改组各级党组织；二、选举前要热烈讨论党内问题；三、上级党委要派人到下级指导讨论和改造；四、扩大党内民主；五、上级不必派人到下级作书记或常务委员。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常委会（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决定改变中央组织机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八月九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选出的是瞿秋白、苏兆征和我三人，十一月扩大会议将常委扩大到五人，增补周恩来和罗亦农。组织局主任是罗亦农（兼组织部长）。组织局成立后，取消南方局、北方局和长江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是苏兆征，秘书是罗章龙，委员是苏兆征、向忠发、郑覆他、王藻文、陈郁、项英、胡×、万兴、黄五一、李立三、黄平、郭亮、许白昊、周文雍、张昆弟。党报委员会总编辑是瞿秋白，秘书是郑超麟，委员是瞿秋白、郑超麟、罗亦农、邓中夏、蔡和森、张太雷、黄平、周以栗、任旭、毛泽东、王一飞、任卓宣、周恩来、王若飞、李立三、恽代英、陆定一、刘昌群、罗章龙、刘伯庄、任弼时、尹宽、李富春、罗绮园、夏曦、夏之栩等。

### (三)《政治纪律决议案》

这个《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出来的。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前，我在党内已工作了好几年，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政治纪律”。因此，当罗明纳兹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而提出“政治纪律”这个名词时，我感到很新鲜。恩来同志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也说：十一月扩大会议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他当时也“觉得这一条很新鲜。”在这个历史文件中，受处分的有十案，其中属于“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错误”的有四案。这四案的性质都关系到是执行还是反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总方针有三项，即：清除陈独秀投降主义；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也就是在政治上清除陈独秀投降主义的主要标志。所以，凡是为实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而斗争，大方向就是正确的。

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在实行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斗争实践中，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起义都是实行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初尝试，都是新鲜课题。土地革命也是新鲜课题。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相结合更是史无前例。在实践中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在当时也是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保证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呢？

犯了错误怎么办？本来当时中央应该采取的态度是，首先要分

清是非轻重，即：要分清是不是错误；如果是错误，还要分别情节轻重，同时还要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其次，既然暴动区域党的指导机关都是在实行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斗争实践中所犯的 error，而且这些起义又都是实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次尝试，那么，对他们的处理方法，最重要的就应当是总结经验教训，适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是中央领导要有自我检查，决不可以把责任都推在地方上。但是，《决议案》并没有采取这些办法，也没有对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当时的中央领导更没有自己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相反，却简单地指责和处罚下面的有关负责同志。结果，有的不应该处分的处分了，有的斗争过火了。总之，当时是重组织处理，而不是重思想教育。从现在看过去，我认为这是惩办主义。这种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也是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服务的，同样是盲动主义的组成部分。

在属于“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错误”的四案中，这种组织上的惩办主义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负责同志的指责和处罚都是完全错误的。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发动和胜利，是由于以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决地击退和克服了张国焘主张联合张发奎、企图阻挠起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但《决议案》却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策略上、军事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是什么“软弱的军事投机”，给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同志）以“警告”处分。这就完全抹煞了周恩来等同志在八一起义中的作用和功绩。当然，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

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恩来在一九四四年说，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这个论断是对的，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不在前委。因为第一，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李立三等同志建议南昌起义，就是脱离张发奎，去占领广州。毛泽东、彭公达八七会议后回湖南的计划，就是要打长沙。第二，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不是游击战争思想占优势。后来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在全国都是逼出来的，甚至带着某种不自觉性（历代农民起义都有打游击的习惯，统治阶级称为“流寇”。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党员尤其是农民党员不能不受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上面这两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起义。这次起义不但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不是偶然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在马日事变以后和八七会议以前的七月间，毛泽东对农民游击战争就已有一定的认识。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代表中央改组了湖南省委，新省委提出了举行长沙暴动的计划，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当时，由省委书记彭公达直接组织长沙暴动。前委书记毛泽东去发动和领导安源、醴陵、浏阳、平江一带的起义，组织进攻长沙的敌军，加之吸收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一个约有五千人的师，准备与省委发动的长沙近郊和粤汉路的暴动里应外合，相机夺取长沙。后来见势不可能，便放弃了这个计划，而集中力量在平、浏一带创造割据局面，但没有成功，而且因反复激战，部队减员，只剩下千余人枪，被迫地却是机智地上了井

冈山。

至于省委直接部署的暴动，在此种形势下则只能有零星的发动。那时有个“马同志”（即国际代表马也尔）住在长沙，规定湖南省委要某天举行暴动，以配合前线。彭公达等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暴动。后来国际代表又一次叫暴动，彭公达他们又没有执行。由于彭公达和省委两次停止预计的长沙暴动，便受到了马也尔的严厉指责，并向罗明纳兹和党中央作了反映。彭公达受到指责后，对于第一次暴动没有搞起来，他没有承认错误；对第二次暴动没有搞成，他承认了错误。现在看来，当时的长沙暴动计划，无论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来说，都是冒险性质的，停止和放弃它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同时，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开端及其以后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率部把红旗插上井冈山，实在是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转变（还有一些同志或前或后在若干地区展开或大或小的游击战，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可是，《政治纪律决议案》却指责湖南省委“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并宣布给予如下的处分：“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附带说，这也可能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所说开除了他的党籍的说的由来。十一月扩大会议给毛泽东同志的处分，我过去记不得。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同志说，开头听说是开除党籍，后来又说不是，究竟怎样不清楚。周恩来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清楚，他便发问：罗迈，你记得吗？我答：不记得。现在我重新阅读了这个《决议案》的全文，对



于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谁受了处分，因何受处分，就一目了然了。）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决议案》严厉地指责八一起义军前委犯单纯军事行动的错误，毛泽东、彭公达等人犯军事投机的错误，都是由于他们不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这种指责不是实事求是的。第一，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革命处于低潮，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的地方，群众的革命情绪已经低落下去了。湖南原来是农民运动最有基础的地方，浏阳、平江更是处于前列地位，但当时从浏、平巡视回来的夏明翰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湖南秋收暴动专号）“所有前在农协工作的农民，除一部分外，已被土劣送解省城县署枪决囚禁外，余均逃了不能回籍，妻离子散，居住（处）被封者极多，情形非常凄惨。……这次暴动中，农民不敢起来，这个原因也有极大关系，惟恐失败后又遭土劣残杀。”（同上）在湖南如此，在江西更不会好些。刘伯承写的《南昌暴动始末记》中说：“广昌以北曾见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现，至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介石命令实行清党，在民众（中）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我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第二，暴动就是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发动群众，二是发动分田。其一，要使暴动成为群众性的暴动，必须有事前的准备，或者临事有发动的时间。在安源，因为有准备，加上当时主客观条件都具备，才成为群众性的暴动。在搞长沙暴动时，虽有准备暴动的时

间，但因为群众情绪低落和党的组织力量薄弱，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结果只有几个零星的“暴动”。另外，起义部队边打边走时，只能做些口头或文字宣传，要待部队战胜敌人，取得短时间就地休整的机会，才能放手发动群众。这一层，八一起义部队和湖南秋收起义部队都是做了的，例如八一起义部队之在瑞金和在汀州，秋收起义部队之在醴陵和在浏阳。其二、至于发动农民起来分田，就需要有更高的条件。如果起义部队已经占据了一块地方，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站住了脚，就可以而且必须努力鼓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造成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的起点。在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和八一起义部队南进时，都没有取得这种条件，因为在当时他们都是边打边走，其间在一个地方只有停驻几天的机会。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经过反复苦战之后，才上了井冈山的，上山同袁文才、王佐部队会合后，才开始了分田斗争。因此，《决议案》批判南昌起义部队前委和秋收起义部队负责同志犯了“单纯军事行动”的机会主义错误，是主观主义的，是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这个《决议案》的总的精神，是为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在这个错误精神指导下，当时错误地处罚了一批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同志，这是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之一。

除了上述突出表现“左”倾盲动主义的三个主要决议案外，扩大会议还通过以下几个决议案：

一是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前，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征求各级党组织及一般党员对这一草案的意见，尔后提交党的“六大”讨论并作出决定。这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和会后的讨论，为“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

想，也是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以后第一个土地法草案。

二是通过了《关于召集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这个决议对召开“六大”的时间、代表选举法、议事程序、各省党的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等等，都作了明确的决定。

三是会议还特别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讨论和通过了新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认为，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大致都有忽视职工运动的倾向，同时指出了反对反动工会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并要各级党组织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引导工人群众认识苏维埃暴动的意义，以及工会的武装准备等工作之重要。这个决议案里的问题，主要是夸张地估计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形势，并对职工运动的任务提出了过“左”的要求。

此外，会议还有两项特别的新的决定，即：（一）“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口号，成为暴动的主要口号，而且大城市中斗争剧烈时，即应组织工农兵等群众斗争的代表机关，就是组织苏维埃，以为暴动的指导机关；（二）“没收一切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在乡村中也实行苏维埃的口号，取消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

总之，十一月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和其他决议案及中央所发出的一些《通告》，以及瞿秋白同志在这期间所发表的文章，一方面，包含着一些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如严厉批判了党内的悲观思想，强调要深入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重申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号召真正革命分子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见《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当时中国的革命仍然是“民权主义的性质”，是“彻底的土地革命”（见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而不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陈独秀的所谓“二次革命论”，明

确提出了推翻新军阀国民党政权，和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目标；提出中国革命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同上），组织“工农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见《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并指出在发动农民暴动，进行游击战争时，一定要“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见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等等。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这些文件的主要倾向来看，却是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加强起来的“左”倾情绪。因而提出了中国革命是“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见瞿秋白《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国革命“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同上），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由此得出的全国总暴动的策略，以及在组织上采取惩办主义政策，等等，则是互相联系和一贯性的严重“左”倾错误。这样，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上就形成为以瞿秋白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 盲动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和 我去两湖巡视的情况

十一月扩大会议所规定的“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实质上是幻想全国总暴动的策略。这个“总策略”的执行情况，从十一月扩大会议后至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二月来信传到中国，中央的政治态度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月扩大会议后到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以前，具体来说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中旬。这个时期贯彻执行“总策略”的情况，我记得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我们几个中央领导同志于当月制定了一个《中央工作计划》。**这个计划明确规定：“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主要任务为严格的执行最近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使扩大会议决议的精神深入于党员群众中；坚决的改造各级党部，洗刷一切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党的成份，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如此才能使党成为一个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党。同时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各重要省份的工人运动，以及组织并发动各重要省份的农民暴动，创造新的军事工作的基础。而组织中央本身之强固的建立以及引导各地党部走入组织之正轨，亦为中央目前之重要的工作。”根据这一总的要求，《计划》规定了三个月内应做到的十七项工作和分三期订出具体工作计划。在第一期（从十一月二十日到十二月二十日），中央决定派人巡视两湖、江浙的工作，布置这几个省的工农暴动的局面。这样，随着十一月扩大会议精神的下达和《中央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就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实际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广州暴动问题。**南昌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时，中央曾指示广东省委，如起义部队在东江地区取得胜利向广州进军时，广州即应举行起义，夺取广州。后来，由于南昌起义部队攻取东江地区的军事计划失败，中央又通知广东省委说，广州起义的条件暂时丧失，但仍应积极准备，以待时机。十一月扩大会议之后几天，中央又与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同志讨论了广州暴动问题，根据粤、桂军阀战争即将爆发，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决定了广东总暴动的计划。接着，十二月十一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等同志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次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的又一次英勇尝试。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广州起义是可能取得胜利的。后来的事实证明，起

义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对革命群众则给以很大的鼓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513页）但当时党中央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想保住这个胜利，而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德国人），又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所以，在起义的当夜，当叶挺看到要坚守住广州并不容易，正确地主张把队伍撤退到农村时，纽曼便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本来可以是英勇的胜利的一战，却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次起义还是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第三，关于两湖暴动问题。**十一月扩大会议后，中央曾对两湖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十一月十五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指出：“唐生智系军阀已日趋败溃，据沪报载唐已出亡，武汉交何键，湖南交刘兴，八军亦退湖南。这虽不足证明唐系军阀纯全溃败，亦不足证明南京系军阀程潜、李宗仁等之大胜利。但两湖大小新军阀从此混战的局面将益趋激烈而不可收拾。”

在对这种现状的估计之下，中央认为“在极短的时期内有造成两湖工农大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因此特命令“两湖省委注意两湖革命最近发展之前途，同时命令两湖省委利用唐生智系军阀崩溃与大小军阀混战，工商业财政破产的局面，更积极的发动两湖的革命，创造部分的暴动，汇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的暴动”。

在城乡主张采取“左”的政策，信里写道：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当“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尽量发动工人的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政治罢工”；“领导失业工人捣毁失业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在汉口和长沙可领导工人“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则要“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如此等等。

至于两湖农民暴动的部署，信中说：“鄂省委应当在极短的时间内领导农民割据公安、石首、当阳向极西发展。并与湘西联合，割据天门、沔阳向四周发展，割据麻城、黄安向鄂东与京汉路发展，恢复鄂南的工作成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与湘北联合，恢复鄂东的工作；湘省委，应当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割据湘西，湘南，湘北各数县与鄂西、鄂南联合。应当恢复长沙附近数县的农民运动，以至与长沙工人联合扑城。”

现在看来，中央这个指示是推行盲动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文件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条件，不问群众情况。一味强求暴动，提倡烧杀，不计影响和后果。这种烧杀政策，后来在湘南造成极坏的后果。

至于两湖暴动的执行情况，其中盲动主义表现得比较突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武汉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爆发了宁汉战争，南京下令讨伐唐生智。十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七日，党的湖北省委和党的长江局第九次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唐生智败退时党的政策，主张利用宁汉之战趁机在武汉三镇举行暴动。二十八日，中共长江局书记罗亦农自长沙回到武汉，召集长江局（罗亦农、陈乔年、任旭、刘昌群）会议，讨论长江局工作，次日通过了罗亦农起草的《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认为“目前绝非继续总的暴动时期”。我认为长江局和罗亦农的这一决定，从主要的方面来

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唐生智败退时虽然给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以可乘之机。但就武汉当时的情况而言，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并未改变。当时，我们在武汉只有六百名党员和三千名工人群众，要想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但是，共青团湖北省委的一部分人却认为，唐生智溃败是两湖暴动的唯一时机，无论如何不能放弃。针对这种情况，中共长江局于十一月一日召集长江局及省委常委联席会议，特请罗亦农报告长江局十月二十九日的政治决议案，和答复共青团湖北省委一些人的怀疑。会议决定取消党、团湖北省委关于立即准备暴动的计划，改为从十一月八日至十四日举行武汉三镇反新军阀战争政治宣传周，但团省委的同志不同意。十一月九日，团湖北省委常委认为，唐倒已迫在眉睫，党应下令举行罢工和实行红色恐怖等等。在他们的压力下，党的湖北省委常委为“避机会主义之嫌”，决定十三日上午八时武汉三镇总同盟罢工，同时下午集合群众攻友益街。但群众的情形实际上还是不能暴动，因此直到十五日，武汉三镇罢工的很少。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湖北省委开扩大会议，讨论罢工事件，认为省委未看清形势，党的组织太差。但共青团湖北省委一部分人却指责这是长江局政治决议案的错误和省委领导的错误，并认为：如果利用这次时机，“在武汉我们不仅可以推翻敌人的政权，而且可以把革命的政权建立三天至五天之久”（《湖北C. Y. 代表刘昌群、韩光汉对于湖北问题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显然，当时共青团湖北省委一部分人的意见是错误的。后来，团长江局、团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曾向中央控告罗亦农和党的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逃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之错误”，要求中央“彻底查究”（见《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据此，中央派出了一个由苏兆征、贺昌、郭亮组成的三人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查处。特委赴湖北后，采取



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方针，对武汉暴动问题作出了错误的结论。由于中央和特委对湖北问题的处理引起了湖北党内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同时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在实践中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在听取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后，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唐生智崩溃时，武汉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罗亦农对湖北的政治指导并没有犯所谓机会主义的错误（《罗亦农给中央常委并转政治局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另一个是长沙暴动问题。根据党中央对两湖工作的多次指示精神，中共湖南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出了为夺取全省政权总暴动的总动员通知，“决定于最近期间，开始夺取全省政权之总的暴动。”接着在十二月一日发出省委第二十一号通知，号召长沙暴动。到了十二月七日，省委又决定七日至十日为暴动日期，命令各县按时尽量暴动起来。但三天过后，长沙并未罢工。时至十日中午，在省委委员伍桐亲自指挥下，铁路工人才开始罢工，而人力车和码头工人仅在街上停着。晚七时，省委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进攻电灯公司、军事厅和卫戍司令部，并由省委书记王一飞、省委委员伍桐亲自指挥，各打一路，结果只破坏了电灯公司。当晚，敌人调来一个师，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第四，关于上海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暴动起来，斗争是英勇的。这就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即以上海响应宜兴、无锡暴动的倾向在江苏省委中发展起来。十一月九日，江苏省委发出第八号通告说：“上海暴动时期……，现在确确实实的到来了。”通告还说：“今日上海举行暴动，可说比从前三次大暴动的时机尤为成熟”。因此，通告提出“应以最迅速的手段加强主观的力量（如党的组织，工会组织，军事组织），同时变小的经济斗争为大规模的经济斗争，纱厂丝厂便须做成整个的总罢工，由这种斗争很（迅）速的达到暴动。夺取

武装，夺取政权。”通告最后要求各区委接到省委十一月九日通过的紧急决议案后，“应即召集活动分子大会讨论执行。绝对不准丝毫犹豫，凡犹豫不积极执行者，省委必决不容情的予以最严厉之处罚。”他们的天真想法和妄图发动上海群众举行暴动的特别方法是：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地威吓工人罢工，如此弄成总罢工，这样，暴动就可以起来而获得成功！江苏省委发出这一“刺激性”的八号通告，使党员同志在领导罢工时，只以强力打厂手段扩大罢工。结果，他们这样做反而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后来，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共同开会纠正了这种做法。

**第五，关于北方顺直“大暴动”问题。**一九二七年十月上旬，在北方发生了奉晋战争。中共北方局便利用这一时机，立刻在十月六日通过暴动计划，决定顺直区域（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京东）的“大暴动”。当时，他们听到张作霖失败消息的传闻，便立刻下令叫天津、唐山暴动起来，并准备在天津站不住就退往热河去与外蒙联络。对于农民运动，他们特别注意于玉田、遵化，因此，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同志曾带着新方针前去改组那里的党组织和指导农运。结果，只有玉田在十月下旬举行了起义，而且很快就失败了。这次暴动虽然发生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但搞的也是盲动主义的一套。

从以上这些情况来看，这个阶段是完全执行十一月扩大会议总暴动策略的。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央决定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到共产国际二月来信传到中国，也就是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在这个阶段，我想谈以下两点：

第一，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曾搞了《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这个文件的原文无时间。我一

九二八年一月上旬在上海时，这个文件尚未搞出来，但是一月二十日中央致我的信中已经谈到了这个文件，并把文件寄给了我。所以，可以设想这个文件是在一月中旬制定通过的。

这个《议决案》错误地认为，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表面上看来革命又受到一次挫折，但从广东的海陆丰、江西的万安、湖南的茶陵、湖北的黄(安)麻(城)等处农民斗争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潮流一般的普遍和高涨”的形势是很明显的，“中国仍然在直接革命形势之中。”

接着，《议决案》按照对客观形势所作的错误分析，阐明了当时全党的工作方针，即：“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暴动而夺取某一省或几省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扩大革命胜利于全国”，并认为这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政策”。

那么，当时哪几个省份最具备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呢？《议决案》认为是“两湖和广东，其次是河南等省。”同时，由于广州暴动的失败，湖南便成为“最有胜利机会的省份”。加上考虑到湖南与湖北、江西地域上的关系，以及历来革命运动发展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武汉民众革命的胜利和湘赣边境农民暴动的胜利在维持湖南全省范围胜利中的作用，《议决案》认为“湖南与湖北江西应成一革命的中心区域”。

至于我党对于这些省份的主要工作，《议决案》认为当时应当利用军阀战争，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进行斗争，造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同时要发展“军阀军队中的革命兵士运动，发展城市中尤其是长沙的工人斗争，引导一般贫民群众到总的争政权的斗争，以至于总暴动而夺取湖南的省政权。”《议决案》还认为，武汉工人群众的团结与斗争格外重要，在那里“必须切实的建立工人的斗争组织，使他们与湖南湖北各地的暴动农民相联络，使武汉的群众运动能够切实准备以至于暴动”。总之，《议决案》认为应

当肯定以夺取省政权为目标，但这个目标在当时是无法达到的。

随后，《议决案》指出了在广州暴动之后党的严重使命：要“认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指导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动领导汇合群众的斗争及其革命意识，以创造总的革命高潮，造成群众力争政权之决心，而勇敢的领导他们到决定胜负的暴动的发动。”《议决案》说，如果不要群众，而是只凭“少数共产主义者的勇敢，施行个人的暗杀，或在乡村中实行与群众脱离的游击以杀人放火，或者不问直接暴动的形势与条件具备与否，轻易号召立刻在大城市暴动起来，轻易的脱离群众，实行少数党员的暴动”，那便是“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这些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想要防止盲动主义。可是，由于党中央的“总策略”本身就是盲动主义的，这段话在执行过程中就不可能起到防止盲动主义的实际作用了。

最后，《议决案》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有一个应当特别需要注意纠正的缺点，这就是“客观上好象农民运动超过于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有不能领导农民争斗，城市不能成为农民暴动中心的危险”。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忘记了农民革命是在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之下进行的。毛泽东同志后来批评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9页）

总之，这个《议决案》是在推行十一月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

义“总策略”已经受到挫折的情况下制定的，这时中央的方针已经有后退，因而其中有些论述是正确的，但从文件的基本倾向来看，仍然是一个继续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文件。

第二，关于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问题。在党中央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使革命不断遭受损失的时候，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中央决定派我到两湖去，停止两湖同时搞阴历年关总暴动（不是停止和取消两湖搞暴动或两湖各自准备的暴动），根据中央的决定，我于一月中旬到达了武汉。

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致我及两湖省委信说，中央在《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并未肯定全国的暴动中心（即全国苏维埃政权的中心），而只说从工农革命群众主观的力量与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政权的动摇，这许多主要条件之下，以广东与湘、鄂、赣易于举行与得到全省总暴动夺取政权的胜利。因此广东与湘、鄂、赣应为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区域。在湘、鄂、赣因为地理的关系，工农兵士群众以及工农兵士群众的领导者——C. P. 力量的关系与暴动发动取得一省政权与维持这一胜利的关系，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应以湖南为中心。”可见当时中央的方针，第一是把广东和湘、鄂、赣当作全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第二，湘、鄂、赣三省暴动则以湖南为中心。

为什么党中央在十一月扩大会议后要急切地抓紧两湖暴动呢？因为当时那里的军阀混战正在激烈地进行，中央抓紧两湖暴动有配合广州起义的意图。可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前后的两个月以来，武汉、长沙总暴动发动未成的经验，广州起义后失败的经验，使中央看出两湖年关暴动也搞不起来，便不得不决定停止两湖的年关暴动，并对两湖暴动从新加以部署。当时中央给我和两湖省委的信中说：“不但暴动的中心问题湖南应是湘鄂赣三省的中心，并且这三省的暴动形式，也不能象广东一样先以长沙武汉三镇

做发动暴动的开始。这一要义，迈兄在中央时已讨论过几次，望详细地为省委同志加以解释。总之无论湖南湖北那一省举行全省总暴动，在主观条件上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中心城市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起来，对于暴动均有相当的认识。各外县的农民必须要有许多县份造成割据的局面，全省都在暴动的恐怖与骚扰中，有确实把握的比较大的兵士兵变才能举行。”

显而易见，当时党中央的这些总结性的意见是好的，在暴动问题的认识上比原来提高了一步。这些意见说明，当时秋白等人在暴动问题上犯盲动主义错误，是由于缺少经验，因而是认识问题。同时，这些意见在事实上阻止了两湖总暴动的再提出。并且，这些意见还很可能是随后中央容易接受共产国际批评的主观因素之一，但是，当时中央并没有从议程上取消两湖暴动的问题，我去两湖仍然按照中央的方针和指示执行了巡视任务。

我从上海到汉口时，湖北省委书记是郭亮同志。其他负责人我只记得有夏明翰、苏先骏。我一到武汉，先与郭亮接上了头。那时武汉的形势很严重，连住的房子也找不到。湖北省委只有郭亮租了一栋房子，其余的人都没有地方住。夏明翰当时是湖北省委委员，他住在龚饮冰介绍的湖南商号中。由于省委租不到房子，没有地方招待，我在武汉期间一直住在法租界一个旅馆中。当时我化了装，头戴瓜皮帽，蓄着胡子，身穿驼绒长袍和直贡呢马褂，带有水烟筒和珠算盘，装作是上海坐号商人，准备回长沙结帐，因两湖战争，行旅不便，在此地滞留若干日。平日来我处找我的为郭亮、夏明翰及共青团长江局书记刘昌群等人。为了作掩护，有时我们还一起搓搓麻将。阴历除夕，郭亮和夏明翰到旅馆看我。郭邀了熊季光来搓麻将。郭、熊走后，我同夏明翰买了一瓶白兰地，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谈到天亮，白兰地也喝完了。阴历大年初一，郭亮还要我到他家去吃过一餐饭。

在工作方面，我与省委接头后，随即向省委传达了中央停止年关总暴动的指示，并共同商定了新的工作部署。当时外县的农民暴动，鄂北和鄂东南较有起色。我在一饭店楼上会见过黄安来的同志。他们有的是到省委来接头的，有的是到武汉买盒子枪的，一个个都精神抖擞。但都不注意保密，甚至还把买到的枪支放在饭店的楼上。我曾告诉郭亮，这样是危险的，万一被敌人破获，就全完了。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中谈到：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议选举的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监察委员会名单中“郭亮贺昌两同志中央另调工作，加派刘伯庄袁达时加入省委为委员”。此后，中央决定成立湘鄂赣边特委，以郭亮为特委书记。根据中央的方针，我在武汉期间，同郭亮等同志商定了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决定该特委辖湖南之浏阳、平江、岳阳、临湘；湖北之咸宁、蒲圻、通山、通城、崇阳、嘉鱼；江西之修水、铜鼓，共十二个县，特委机关驻岳阳，受湖北省委领导。郭亮离武汉后，省委书记由刘伯庄继任。郭亮很快即去岳阳就职，不久因军事部长苏先骏在长沙被捕叛变，带领敌人至岳阳将郭捕到长沙杀害，时湖南省长为程潜。郭亮在岳阳被捕的事，现在还有刘英可证实。

我到武汉不久，就收到了中央一月二十日给我的信。信中说，共青团湖北省委曾于一月十一日写信给中央，认为“湖北已经到了工农兵暴动夺取政权时候……工农群众已经普遍的起来。省委已于十一日决定湖北全省总暴动的日期及一切具体的计划”，对此，中央表示“反对即刻举行总暴动”。并希望我斟酌情形，按照中央寄来的《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关于湘鄂赣工作的指示，督促湖北省委布置湖北的工作。信中又谈到，中央还收到湖南省委寄去的湘南特委报告，中央看了之后认为，

湘南特委主持工作的同志有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如他们的口号有：“暴动起来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协会专政”，“暴动起来工人占据工厂自己管理”，等等。他们还认为当时的革命环境“已较好于十月革命前之俄国”。中央信中，希望我到湖南时加以纠正。

在中央来信之后，我于一月二十五日晚上给中央写了封信。信的主要意思是说，湖北农村的斗争比湖南深入，湖南乡村豪绅的统治相当的稳定，同时湖北还有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的意义和工人区域等等，因此两湖暴动应以湖北为中心。中央收到我的信并听了其他同志的口头汇报后，在二月三日给我和两湖省委写了封信，答复湘、鄂、赣三省举行暴动，仍应以湖南为中心。

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本来我是打算去长沙的。我已派出准备陪我去长沙的郑伯祥去长沙同省委联系，以便作些准备。可是他去后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约在一九三〇年知道，他已被捕自首，但没有供出我来）。当时，军阀战争已发展成为蒋派（在湘）与桂系（在鄂）之间的战争，形势很紧张，武汉和长沙白色恐怖很厉害。湖南省委连续遭到破坏，先是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牺牲，接着继任书记任卓宣又被捕后叛变。因此，中央通知我说，目前长沙危险，不要去长沙。于是，我在二月四日晚上给湖南省委写了封信。在信中，我首先针对湖南省委在遭受损失后所产生的悲观情绪，分析了湖南的有利条件，说明他们应“一方面急图指导机关的建设，一方面则应根据中央的指示具体指导全省工作。”接着，我讲了中央的指示中有两点应加以修正：第一，关于两湖暴动以湖南为中心的问题，根据当时两湖的实际情况应以湖北为中心；第二，关于湘西北割据的问题，我们不能太重视这一区域在两湖暴动中的地位。第一点意见，经中央来信改正，仍以湖南为中心。第二点意见，现在看来也是不对的。接着，我谈了工作安



排问题，指出：“湖南亦是外县很好，长沙太坏，与湖北一样。由此可见中央对湖南指示中，关于长沙市工作的一方面是异常正确的，兄处应当把这一指示具体的实现起来”。其次对外县工作区域，提出了包括新规定的“湘鄂赣边特委”的区划在内的几点建议。最后，我在信中说：“我因工作上之需和环境关系，不能来长，我预备十五天以外回中央，十天以内召集京汉粤汉二路负责同志规定二路工作计划，十天到十五天之间召集湘鄂赣豫四省委代表在汉开一次会（定本月十四日）讨论四省共同关系，对于湘省工作请省委根据中央之指示及这封信，定出：（1）湘省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2）职工运动具体计划，（3）农村斗争计划（包括客观分析及批评割据，长沙为中心之区域及一般工作），（4）长沙市工作计划，（5）党的组织上的改造和发展及人力的分配，（6）军事工作计划等六个草案，派伍桐兄及另一多熟悉点情形的工人同志来汉决定。”我去信的方针，仍然是准备两湖暴动。湖南省委收到信后，派何资深（即伍桐）来到武汉，我与他共同商定了一个湖南的工作计划由他带回。

我在武汉期间，中共河南省委还派一位负责人带着该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到我处来过，我从他的口头报告中知道了河南各方面的近况。二月十九日，我给河南省委写了封信。在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我写道：“河南目前客观的革命环境异常之好，冯玉祥之统治比较以前更加不稳定，工农群众固然对冯极端怨恨，就是一般穷苦小资产阶级也成了反冯的群众，只有豪绅资产阶级站在冯的方面。……依现在大局形势，北伐已经成了蒋冯阎互相牵制推诿的局面，蒋介石缓北急南和奉除桂的趋势已日益显明，这次蒋冯会面据我个人的推测，蒋的目的恐怕不是真正去促进北伐战争吧！无论冯玉祥在最近的将来继续北伐或者反戈而南，河南的统治必定是愈向崩溃的路上发展，河南的党应抓住这

一时机发动一个革命的富于群众的斗争高潮。”

根据对河南形势的分析，我在信中明确表示：“大体同意”河南省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向他们指出了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特别谈到：“在党的力量上看，全省工作的布置，不要取普遍的主义，而应当抓住几个中心去集中力量发展，依我的意思，平汉陇海道清三铁路及其他工人区，郑州为中心一区，开封为中心一区，洛阳为中心一区，卫辉为中心一区，许昌郾城为中心一区，信阳为中心一区，光山为中心一区，南阳为中心一区，每区的范围包括三县至五县，豫南的光山南阳二区虽然过去深有基础，但必须加紧力量去发展起来，造成割据局面。因为这几区在声援湖北总暴动上关系极为重要。其余各区原来都有点基础的，如果能根据新的策略在这几区做了相当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河南革命前途上建立了相当的根据。”

我在武汉把一切工作料理完毕，即回上海。

我一回到上海，便将我赴两湖巡视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对我在武汉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说：

“中央认为中央巡视员罗迈同志对于两湖工作的布置和决议及湖北省委自己的决议大体都是对的，惟尚须指明的：

（一）湖北——在政治任务决议案中大体是对的，惟目前因情势已有变更，故在中央特派指导湘鄂赣豫四省工作的临委到后须另成一新的决议，在此新的决议中要注意将各项工作说得具体些。鄂中是湖北的一个重要区域，原有决议中对此稍嫌忽略，这是不足的，在新决议中应注意及此。职工运动决议案亦可适用，惟对于各厂各业的斗争策略尚嫌不足，此须在实际工作时详加讨论规定。此外在各县的决议案中要注意各县应向武汉这个中心发展。

(二)湖南——罗迈与资深同志商草之湖南工作决议案湘省委应当依此决议执行，惟中央尚有下列几点意见：首先，在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几个重要的区域：A、湘鄂赣边界一区；B、以醴陵为中心的一区；C、以常德为中心的一区；D、以衡阳为中心的一区；E、郴宜的一区；F、茶攸一区。湘潭为中心的一区取消，因为该区的工作可由省委直接指挥。至于发展的趋势应该注意从广东到湖北的湘赣边界，各区发展的趋势应趋向于长沙。在朱培德部队占据的郴宜等县应注意土地革命之深入，群众向外发展的路线应是西向宝庆，北向衡潭，至其在军事上则应向衡潭发展。其次，湘东之醴萍茶攸酃与赣西南之遂川宁冈莲花诸县在工作上应有一密切的联系，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必须经常发生密切关系，如将来在这些地方的割据将会合时，临委可以决定此两特委合并归湖南指挥。至毛泽东的军队之分配应看两特委之需要，由两特委共商调遣，不必专于死板的决定其驻在某地。

(三)江西的工作，中央最近已有详细的指示，江西省委应努力实行中央这些指示，并须注意加紧各处割据局面之创造、扩大与深入，对于南浔路的工作要特别的加紧，不要只专注意于赣西南的局面。”

上述情况表明，在这第二个阶段，中央的部署还没有摆脱全国性质的暴动，还是在推行盲动主义。但是，由于广州暴动的失败，使中央已有所觉悟，因此即去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可是，中央仍然没有取消湘、鄂、赣三省的暴动（八七会议前是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并且又加上了河南暴动。但暴动计划和部署，与以前大不相同，即是采取分区创造割据，包围中心城市，同时加强城市工作，而不是象以前一样，首先就是要夺取长沙、武汉。对盲动主义的实行来说，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认识上却是不小的进步。这是后来容易接受国际指示的历

史前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总策略”的过程中，还出现了几种重要的错误倾向：一、认为没收一切土地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从前是说忽视土地，这时已经说到没收一切土地了，甚至分配土地给贫民了，这就使一些同志错误地认为，从前搞的是民权革命，这时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了。他们这样自己问自己：平均地权的平等主义，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运动么？他们不明白农民的土地革命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而忽视了自耕农抗捐抗税的民主斗争，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二、主张没收一切资本家的财产。在十一月扩大会议时就有人提议：农民可以分到土地了，工人只得八小时工作制是不够的，不能引起他们暴动的热心的，最好说，汽车夫没收汽车，工人店员没收工厂商店，各人有所得才好。广东省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时，也有许多人提议：没收一切资本家的钱财。这种想法，其实不是社会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农民得田地可以成小资产阶级，工人也应当分得些钱财，成为小生产者。很明显，当时他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三、实行烧杀政策。当时，有些地方的农民运动除杀戮豪绅之外，还“必须”加上烧屋的工作。如湖北汉川农民暴动的指导者，要烧去整个儿的城市，湖北许多村庄整个儿的都烧尽。湖南某些指导者，主张烧光县城，只取出暴动农军所需要的东西（如油印机等）。江苏省委的暴动须知也说：“必须挨家挨户告以暴动口号，号召……起来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制裁。”对于这种强迫群众的错误作法，中央曾经纠正过。这种烧杀主义，对革命是十分有害的。四、把民众政权变成了党的政权。以前各地的工农运动，往往只有党员个人领袖的英雄主义，没有党团的作用。到了这时，“党权运动”高涨，变成了党的政权，而不是工农民主政权。海陆丰的情况也是这样。暴动胜利

后，仍旧不是群众政权。党组织完全代替苏维埃，没有广大的群众参加政权。如此等等。这几种错误倾向后来才逐渐得到纠正。

以上，就是以“广东与湘、鄂、赣为全国发动中心”的各重要省份准备和发动总暴动的经过简况。它证明了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确实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和 “左”倾盲动主义的基本结束

我去武汉停止两湖年关暴动后，大约在二月下旬回到上海。在这期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共产国际曾指令我们党的向忠发和李震瀛出席了会议。向忠发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写过一份《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其中专门有一节讲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中的中国问题”。这个报告我最近已经找到了。

报告说，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共五个，即：反对派问题，职工问题，中国问题，法国问题，英国问题。其中对职工、中国、法国和英国问题并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中国问题，在这次大会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问题预备会议上，在特别委员会上，经过很长久和热烈的争论，所得出的决议，把过去丰富的斗争经验作一结论，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的性质，并指出目前革命形势和党在组织上及策略上的任务。

报告说，在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有极右的意见，亦有极左的意见。极右的意见说：“中国革命

遭了极大的失败，一切群众组织和党的组织归于破坏，党与群众发生裂口，……广州暴动是军事冒险，是中国革命到了背城借一的形势，……我们现在只有把过去犯错误的党的组织一概都不要，重新再来过，革命工会应取得公开，用群众请愿示威方法，取得合法组织，当利用现有合法工会（黄色工会和政府工会）做我们活动，……”这样说法，其结果必致走到合法的改良的路上去，其结果必然要反对党的暴动政策，反对组织苏维埃。对这种极右的意见，在中国党内机会主义流行时期，或可以找到一些应声者，但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绝没有一个附和者了。至于极左派的意见，倒反有许多人附和，他们说，中国革命无论从它的客观内容、任务、动力来看，都已非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已到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断性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只有资产者没有形成整个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叛变革命走向反革命中去，反使反革命营垒的力量减少，更增加他们内部的矛盾冲突，反动统治一点绝无稳定可能，革命力量向上涨，反革命力量向下降，现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的高涨……中国革命发展的前途只有不妥协的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绝无一点可能……。这种极左的意见，恰与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议内容相合……。在这次国际大会上，指出他们（极左的意见）理论的误解，观察的不清，分析的矛盾，和估量的错误等，而定出正确的列宁主义的意见，已如中国问题决议中所言。

报告紧接着说，这个决议案简单明显，而所指示的，各方面都顾到，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帮助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必要，更具体的确定的指出来，这个指示绝不是一纸具文，官样文章，而要切实的积极的去执行，这是决议精神中重要的一点。这个决议，本来为在国际六次世界大会前短时期内适用的，这次国际六次世界大会对中国革命问题当有更详细更具体更正确的决议

和指示，不久前中国党第六次全国大会中对政治问题的估量、分析和决定，完全与国际九次扩大会对中国问题决议一致，从国际扩大会议到现在，国内所经过的实际政治变化，所经过的革命形势和党应有的路线及策略，都证明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完全是正确的。

《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是出席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向忠发在担任我党总书记期间所作的报告。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了当时我们党的工作中心和党本身的任务，它的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

第一，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议决案》正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批判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中国革命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主张。

第二，在革命形势问题上，《议决案》正确地指出：“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当时“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这就很自然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但“两个高潮之间”的说法是到党的“六大”时才明确起来的。《议决案》还说：“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分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议决案》正确地

指出：“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实行农村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但认识了  
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并不等于就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共产国际、斯大林都没有这个认识。

第四，《议决案》正确指出：当时党的主要的政策路线，是“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当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议决案》还正确地、中肯地、有力地指出：“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它不能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这是深切的告诫。

第五，在具体的政策上，《议决案》指出要“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指出：“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这可能是第一次提出可以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同时还提出：必须“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这些提法都很好。

第六，《议决案》指出：党“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由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它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形势的



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恐怖方法，……）以及组织上的动摇。”在这里，《议决案》在实际上指出了策略上的动摇的主要方面是“左”倾，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同时，《议决案》还指出党本身的当前任务是“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这些都是很正确的。

此外，《议决案》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如反对各式各样的分裂党的活动，号召各国党要赞助中国革命，等等。

由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它对纠正临时中央政治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当然，这个《议决案》也有它的错误和缺点。虽然《议决案》中承认广州暴动中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有责任，但《议决案》并没有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的指导思想进行自我批评，所以一些错误的认识仍然存在，仍然在起着指导作用。例如，《议决案》说：“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成）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这种说法，对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而言，是完全正确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中极少数转到反动的右翼分子而言，也是正确的，但若对民族资产阶级也这样说，那就象八七会议所开始的那样，继续混淆了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又如，《议决案》说：当时“许多朕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这种估计，也是不恰当的。就当时工农革命的实际情况而言，还不能说“正走向”新的高潮。再如，《议决案》认为，中国各省区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

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并认为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这些论点仍然包含着各个地区的游击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并且批评了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某些地区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这种城市中心的思想显然是错误的。

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约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到达中国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会，在会上，大家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且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发了一个通告，即《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

通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在实践中，中央对那些包含大中城市在内的暴动，确实是停止了，不再搞了。

通告接着说：“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的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余毒。”应该承认，当时的中央有“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一面，如上面所提到的，特别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停止了两湖阴历年关总暴动。同时，虽然

中央当时并没有终止继续准备以湖南为中心的两湖暴动计划，但却指出了“无论湖南湖北那一省举行全省总暴动，在主观条件上必须要中心城市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中心城市附近各县的农民群众普遍的起来，对于暴动均有相当的认识。”（《中央致罗迈同志及两湖省委信》一九二八年二月三日）这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中央所作的一个好的总结。这种思想认识使中央较为容易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也应当承认，当时的中央还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一面，而在这段话里，中央本身却缺乏自我批评。

通告在部署各项工作时还说：“中央政治局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用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中央关于当前各项工作的部署基本上是对的。

最后，通告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革命”的提法进行了解释：“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无间说’，认为‘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确是要跳过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民权独裁制）。而直接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观点如果移到中国革命上来，是显然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论述过，十一月扩大会议和秋白的论文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看来，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只注意其中不正确的方面，

而当时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则只注意其中正确的方面。

总之，我认为这个通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及其实践中的盲动主义没有自我批评。有的同志说，这个通告是“羞羞答答的接受”共产国际的二月决议，事实确实是这样。一方面，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基本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另一方面，又不认真地作自我批评，并且对错误有点遮遮掩掩，甚至对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在政治上组织上形成那么严重的盲动主义没有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后来秋白他们在六大会议上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至于推行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主要责任，都在以罗明纳兹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只是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了国际代表关于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错误主张。而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二月决议的通告，则一概未提及国际代表的事，这可能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

以上，就是我对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的一些看法。其中，材料和观点都可能有点缺点、错误。当时，这个通告是中央常委一致通过的。在发这个通告时，我记得还把共产国际的决议附在上面，发了下去。这样，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就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 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

治局，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在这个过程中，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坚持八七会议关于清除陈独秀投降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率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斗，开辟了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它号召和指导有些地方由于大革命失败和陈独秀主义影响而趋于或接近于涣散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重新振作精神，保持了革命传统。在整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时期，许多地方的农民暴动，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到创造和扩大工农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苏维埃政权，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起点。凡此种种，都是应该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实行了由八七会议开始的一些“左”的错误，并逐渐发展到十一月扩大会议，而形成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的严重错误。其中，主要表现在“主要省份”特别是两湖的总暴动，其次还有不问主客观条件的地方暴动。这些严重错误，曾给予党和革命事业以重大的损害。对此，我在前面已经夹叙夹议地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同时也指出决议案和秋白论文中某些正确的东西，没有给以抹煞）。还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既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的。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之一。下

面，我将对盲动主义发生的思想根源和历史背景试作分析，这同时也是我的自我反省。

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以会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错误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我观察，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太少。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自党成立的时候就确定下来的。但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甚至需要一个多次反复并付出相当代价的过程。既要不断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又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及其特点做深入细致、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中国革命事业才能得以逐步发展并走向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面临着许多极关重要的新问题。例如：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高潮还是低潮？中国革命的性质，我们已经抛弃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那么继续要进行的是胜利后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彻底的新式民主革命，还是允许所谓“超越民主主义范围”的“不间断革命”？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应不应加以区别？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否应当继续以“城市为中心”，还是应当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道路？再如，怎样反对陈独秀主义，怎样贯彻八七会议的正确方针，怎样举行秋收起义，怎样搞土地革命，怎样建立军队，怎样打仗，以及在斗争中联合谁、打击谁，等等。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特别是在革命情势的转变关头，遇到的这许多特殊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一般原理，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照搬苏联经验，是不可能解决的。

那时，秋白等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革命问题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但是，总的说来理论水平不高，还缺乏经验，也有些教条主义。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没有很好地研究，对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很好地领会，未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当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观察和处理问题，但是未被公认。八七会议他只当选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十一月扩大会议更被撤销了。虽然两次都是国际代表的提议，但又都是与会的中国同志举手通过的。

第二是“左”倾急躁情绪的发展。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已经懂得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于陈独秀等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期间，同陈独秀主义彻底决裂了，并进行了坚决的反陈独秀主义的斗争。但是，并不懂得清除陈独秀主义要从思想上清除，才能肃清其在党内的影响，而是简单地采取组织处理的方法。结果，一声吼，陈独秀被打倒了，但陈独秀的思想和影响还在，而且在反右的同时，“左”的情绪又滋长起来。

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要革命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甚至连自己的头都保不住，然而他们凭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凭着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希望迅速冲破失败的局面而复兴革命。并由于对白色恐怖

的极端仇恨，不能冷静地总结教训，尤其是在农村的武装暴动中不能不带有冒险性。这样就产生了狂热、拼命和冒险情绪——革命者的急躁幼稚病。当时，这种“左倾情绪”，在革命者内部乃是普遍现象。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的动力。这个动力有两重性，站着斗争，这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斗争受“左”倾情绪支配，便带有盲动性。由于这种急躁幼稚病，又由于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左”的理论和政策思想，例如，在八七会议《告党员书》里面，就存在着一些“左”的形而上学的偏激论断，而这个《告党员书》和罗明纳兹的政治报告，在八七会议上是受到一致拥护的。拿我自己来说，在八七会议前夕，秋白彻夜翻译《告党员书》，他译一页，我看一页，最后翻译完毕时，秋白问我：“怎样？”我答：“一剂清热散（意指清醒脑筋），好极了！”这样，就没有能够在党内正确地树立起反投降主义的旗帜，开展既反右又防“左”的两条战线的斗争，而只是树起一个“右是跪着降”的对立面——过左的“站着斗”的旗帜，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第三是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作了错误的估计。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秋白等人并不认识当时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时期。相反，他们却认为当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们也不认识广州暴动是退兵一战，而仍然宣称当时的革命形势是“继续高涨”。由于他们从主观主义出发，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盲目乐观，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在伴随而来的行动问题上，就制定了举行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其结果，就必然走上了盲动主义的道路。



后来，到召开党的“六大”时，对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当时，“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实际上，在低潮时的几个浪花，就是在革命失败后重新点燃起来的星星之火。而秋白等人的错误，就是把低潮时期的几个浪花当作革命的高潮。

经过以上这一番争论，最后，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才指出：“广州武装起义，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底指导机关却没有估计到。”当时的指导机关“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底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底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这一段论述，虽然还有点自我宽恕，但终究说明了问题。

第四是不懂得中国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旧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可是，秋白等人在当时并不了解这一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红色政权的发生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

种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加上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而农村特别是几省交界的偏僻山区则是反动统治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就造成了反动统治的缝隙，使革命力量有可乘之机。后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九二七年秋毛泽东把红旗插上井冈山，经过短短的三年时间，我们党就在全国创造了几个大块苏区和几支强大的红军，以至能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这是我们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秋白等人的认识没有变化。在广州暴动后，中央的认识有点进步，停止了两湖年关总暴动，明确对湘、鄂、赣三省的暴动不是从占领中心城市开始，而是先从分区割据做起，同时加强城市工作。不过，当时还不懂得利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统一的特点，从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做起。实际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落后，正是革命发家的条件，只看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和能否正确利用。

关于政治发展不平衡，包括两个方面：敌人统治力量的不平衡，革命群众基础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在政治上造成了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南方九省经历了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北方农村却只是一般发动起来。可是，后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者们却否认这一点，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北方特殊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结果给革命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情况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紧紧抓住这一点，因势利导，结果排除了所谓的“北方落后

论”，使北方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是机械地搬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北伐战争关于城市中心和正规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说过：“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战争和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06页）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实行的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然后把革命从城市推向农村。中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同上书第507页）

但是，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领导期间，并没有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便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在中国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相反地，却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盲目追求以中心城市暴动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或者幻想北伐时期正规战争的再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当时特别强调要发动城市工人暴动，并极力主张“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当时所谓重要省份的暴动，都是这样要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结合总暴动。

同时，当时所有有关文件和文章都贬低农民暴动，如把农民暴动称之为“自发的”农民暴动，或称之为“农民之自发的游击暴动”，意思都是指这些农民暴动还没有得到工人阶级的直接领导（当然不是没有得到共产党的领导，因为不是经过共产党组织和发动的纯粹自发的农民暴动，事实上虽然也有，但那是极个别的）。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的二月决议还以“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

溺爱”来反对小块割据，反对由点到面的路子（即由点发展到面，或由点的结合而成面）。

总之，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武装起义固无经验，也缺少研究。他们不懂得我们党领导的秋收起义是农民武装起义，是打游击战争，而只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北伐战争的经验：占领中心城市，打正规战争。

不过，秋白等人的主张，在当时是并不奇怪的。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秋收起义过程中，开始也是主张攻打长沙的。后来他感到在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攻打长沙不行，便很快放弃了搬来的公式，把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经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公式——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而当时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则虽经一再挫折，仍固执地坚持搬来的公式。因此，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所犯的盲动主义错误，带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

第六是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其重要的“左”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明纳兹，在帮助我们召开八七会议，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等方面，是有功绩的，这要加以肯定。

但是，他们对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负有重要责任。据我所知，八七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是罗明纳兹根据国际的指示作的，八七会议《告党员书》也是罗明纳兹根据国际的指示起草的；十一月扩大会议上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和《政治纪律决议案》，都是罗明纳兹等人搞的。他们不仅是盲动主义和惩办主义的创造者，而且是强迫推行者。因为，我们相信和尊重共产国际，同时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据我的记忆，我们当时对国际

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必须根据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必须看到农民是主要的群众，要反对的不是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要根据这种情况来运用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措施。”列宁的这个指示是非常正确和非常重要的，但上述情况表明，当时共产国际特别是它的代表，违背了列宁的指示。

第七是“左”倾盲动主义能在全党贯彻执行，主要是中央自上而下强迫推行的结果。

盲动主义在全党的贯彻执行，固然是反映了基层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拚命、冒险情绪，但主要的是来自中央和自上而下强迫推行的，因此在组织上相应地产生为政治上盲动主义服务的惩办主义，错误地处分了一部分负责干部。

在推行“左”倾盲动主义时，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情况因职务不同而各异。但是，那时秋白同中央领导班子里的几个人经常在一起，中央在作出什么决定时，他是能够听取别人意见的，在作出决定后几个人就分头去执行。因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批评，当时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班子里的几个人都是有份的。

第八，关于瞿秋白。

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宣传家和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也是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是一个有声望的共产主义战士。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反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戴季陶主义”和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新的方针，这个作用在当时来说是很关紧要的。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对停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三年里，王明等人对秋白进行了无情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下去，相反，他根据自己的特长，主动地为党在文化战线上做了许多工作。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象一切杰出历史人物都有他的缺点一样，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如同我在前面论述过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况且，当时党还不成熟，秋白还年轻，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只有二十八岁，犯错误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我认为秋白是一个正派人，他没有野心，能平等待人，愿听取不同意见，能团结同志，不搞宗派主义，事实上，临时中央政治局是一个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点是在接触实际上有点教条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服从国际代表，他有一定责任。他遵守纪律，四中全会上撤销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后，我问他准备怎样，他说听从党的分配，以后几年果然行如其言。一九三五年被捕以后，他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因此，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他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见《论民族自决权》）。这个夹叙夹议的回忆录，特别是以上八条，究竟对不对，符不符合列宁指示的原则，有待指正。

## 回顾党的六大前后

我现在对党的六大前后若干情况和主要工作，根据个人回忆并参考文献记载，作一简要论述。

### 六大的历史背景和准备工作

我们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基本结束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后，面临着三种情况：

一是国民党新军阀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加强了反动统治，使我们党的组织受到严重摧残。据粗略统计，从一九二七年三月至一九二八年六月，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竟达三十一、二万人。（周恩来《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工会、农会、学生团体等，都被打散或被打入地下。

二是革命力量逐渐恢复。我看过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的《组织问题报告大纲》，这个材料说，自宁汉反动后至党的六大，我们党领导过的重要罢工约四十七次，参加罢工的群众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多人。同时，我们党在农村中领导的暴动约有九十四次，参加斗争的群众有三十四万多人（两广的数字未计入）。其中，有二十六处成立了县苏维埃，三十一处成立了乡苏维埃。此外，还有许多自发斗争（这个材料可能有超过实际之处，现在没有找到核证的材料，但革命斗争正在复兴，则是可以肯定的）。在

这些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建立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这期间，党的组织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据统计，到召开六大时，全国共有省委十六个，南洋临委一个，特委三十七个，县委四百个，市委三十六个，区委四十一个，特支一百三十八个。（见《组织问题报告大纲》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十日）党员人数已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万多人上升到四万多人。这个数字是目前许多同志的一种估计。恩来在党的六大大会所作的《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中说，全国党员人数为十三万零一百九十四人，但他同时指出十三万多人这是“夸大数字，无法保证是正确的”。据历史文献记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全国党员由近六万人减少到一万余人。一九二九年六月六届二中全会时，党员发展到七万三千多人。因此，在召开六大时，党员人数已在上升，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是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还没有统一认识，有待于正确地澄清和解答，否则便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例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它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却要无产阶级来领导，怎样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些问题，当时许多人还搞不清楚。加上陈独秀散布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彭述之鼓吹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天然的领导权，当时虽然对这些错误论调进行过批评，但没有从理论上完全弄清楚。六大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更搞乱了我们党内的思想。这样，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当时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又如革命形势问题。当时到底是高潮还是低潮，许多同志的认识也是很模糊的。有些同志对革命高潮到来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关系分



不清楚，往往只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不重视主观力量强弱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对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也分不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的到来，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一个大城市直接革命形势的形成，也不能说全国可以马上起义。总之，在这些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再如在斗争策略上，当时是应该退却还是应该继续进攻？如果是退却，那么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不可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在当时也是搞不清楚的。

针对这些情况，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弄清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性质，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迎击敌人的残酷进攻，领导革命胜利前进，在八七会议时，中央临时政治局已规定在六个月内准备召开六大。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定六大“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大会代表的选举办法是：一、“各省党部得选举有表决权的代表。代表应由各省党部代表大会选出，如因秘密组织的环境关系，不能开代表大会，则由各省委全体会议派出代表，然而应当尽可能由扩大的省委全体会议选派”；二、“各省党部选派代表以五百党员选出一代表为标准，五百人以下的党部，亦得选一有表决权的代表；无表决权的代表各省党部亦得选派，但必得中央的同意”；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如果没有被某一省党部选为代表，因而无表决权，则可以无表决权的参加大会”；四、“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派五人出席大会”；五、“出席大会代表必须入党一年以上的方能当选”。至于六大的议程，决议规定为：国际代表报告国际状况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和策略；中央的政治与党务报告；中国革命过去的分析及将来之前途与党的任务和策略；土地问题党纲；革命工会的任

务；党的组织任务；共青团工作；选举中央委员会及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后来，由于情况的发展变化，代表产生办法和大会议程都有所改变。

到了一九二八年初，关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召开六大的问题，因环境关系，中央还未能作出决定。至三月底，共产国际来电，让六大代表去莫斯科开会，这样，开会地点就最后确定下来了。

关于六大代表的产生，本来是准备按照上述选举办法进行选举的，但由于当时环境十分险恶，加上时间仓促，四月份代表就得启程，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因此来不及按照选举办法进行选举。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出席大会的代表究竟有多少，我记不准了。我记得的代表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刘伯承、向忠发、张国焘、蔡和森、关向应（共青团代表）、阮啸仙、周秀珠、霍锷鏞（湖北代表）、刘义（湖南代表）、李子芬（共青团代表）、余茂怀、夏曦、李立三、邓颖超、张昆弟、罗明、杨之华、蔡畅、邓中夏、项英、罗章龙、王仲一、任旭、王凤飞、黄平、王灼、杨殷、胡锡奎、毛简青、王藻文、华少峰、徐锡根、何资深、王若飞、唐宏经等人。上述名单中有些名字有待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证实，未能回忆出来的名字，也有待查证。

确定六大代表人选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过分强调工人成份；二是没有让一些从事实际工作、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并在党内享有声望的同志参加六大。关于这两条，我完全同意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所作的评论。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六大的组织准备工作。下面再说关于六大的政治准备。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前，中央就指定专人草拟了

《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十一月扩大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般同志参加讨论这一草案，提出书面的修改意见，同时要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把这些意见和材料随时上报中央，在党报上讨论，以待六大作最后的决定。后来，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可能参考过这个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接着，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并经过斯大林等修改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六大所讨论的主要问题，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形势、党的工作中心、党内所要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等等，在这个决议案上都有阐述。

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秋白写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作为向六大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写成的。它叙述了一九二五年至六大前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阶段，总结了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肯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主义，原则地提出党的五项任务，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这段历史时值得一读。但是这个报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估量，继续坚持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坚持城市中心和加紧准备总暴动等“左”的错误。

对召开六大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南方各省的代表便在上海集中，陆续前往莫斯科。由上海去莫斯科的代表，一般都是经大连、哈尔滨，在满洲里下火车，于夜间渡过国境线，进入苏联境内，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九二八年五月一起离开上海去莫斯科的。瞿秋白离开上海的具体时间我已记不太清楚，据秋白本人在《多余的话》里说，他是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离沪出国”的。

秋白、恩来到达莫斯科后，继续为大会的召开进行准备工作。开会前，斯大林又找部分代表谈了话。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大会于六月十八日下午正式开幕，七月十一日闭幕，历时二十四天。

## 六大期间留守中央的工作

六大开会期间，我和任弼时受命负责留守中央，中央秘书长是邓小平。从一九二八年四月开始到同年九月新中央负责人回来的期间，开会的地点仍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子里。这个秘密机关是一九二七年冬或一九二八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夫妇住守（熊瑾玎任中央会计）。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后来，大概由于一九三一年四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了这个机关。（一九五二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宪法时，通知小平和我到他那里去。路过上海时，小平和我去看过那个老地方，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站。一九八〇年四月我到上海又去看过，其结构完全变了，成了一排市民住宅中的一间。从云南路上楼的途径也没有了。）当时，每天上午九时，我、弼时和小平碰头处理日常事务，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离此不远，隔一条街的一个商店楼上，到场的还有熊瑾玎、内部交通主任和其他个别负责干部，例如江苏省委留守负责人李富春有时也来参加。

中央（留守）在六大开会期间，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开展反日运动，同时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勾结英美出卖山东、满洲权益给日本帝国主义。**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向济南大举进攻，几天之内屠杀中国军民三千余人，并杀害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其交涉署职员十六人。在胶济铁路和青岛，日军也有同样的暴行。面对这一情况，蒋介石不但不敢抵抗，还扬言要继续北伐，自动将军队调离济南，进行新军阀对旧军阀的战争。同时又严令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以示“镇静”。但日本帝国主义则步步进逼，继续从青岛、满洲和国内派遣飞机、军舰到山东、上海、南京、武汉等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蒋介石的奴颜婢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留守）于五月九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五三”惨案后反帝斗争工作》，指出：“我党目前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应当领导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要求“各地特别是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济南、青岛、天津、北京、开封、郑州、武汉、九江、南昌、长沙、芜湖、安庆，接到此通告后，须立即制定当地行动大纲执行之，并将执行情况报告中央”。随后，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中央（留守）先后发出四次通告，有些地方还派了人，有些地方另有书面指示。在这些通告中，中央（留守）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和满洲的事实，不断揭露英美帝国主义纵容日本侵略而自己也乘机侵略中国的事实，强调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并提出斗争的口号和策略方针，要求各地加紧这一工作，努力“使反帝运动与一般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见《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在群众反帝运动开展起来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也高唱废约修约等论调，企图骗取反帝领导权，以控制广大群众的反帝斗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留守）在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强调指出：“反帝工作此时特别重要，各地应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反帝的通告，去发动群众反帝高潮，揭破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反帝的黑幕，而取得这一运动的领导地位。”

在我们党抓住济南惨案发动全国反帝运动，并向民众揭破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政策之后，情况逐步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在党组织的领导或直接、间接影响之下，许多重要城市掀起了反帝运动，同时还通过反帝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出卖满洲、山东和压制群众爱国运动的丑恶面目；第二，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已能运用中央（留守）所指示的策略和方法去领导反帝运动，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开展，扩大了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的兴起，也表明了我们党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仍然对运动起了一定的领导作用。

## 二是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加紧城市工人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在许多大中城市中，工人运动受到重大挫折。但是，经过党的努力工作，在济南“五三”惨案之后，工人群众的罢工斗争即开始复兴。反帝运动也在发展，不仅工人群众参加，并且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留守）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要求各级党组织打破一切困难，去创造城市工作的基础，特别是广州、上海、武汉、长沙、郑州、天津、九江、南昌、青岛、济南等城市的党组织更应加倍努力。各地县委也应当打破过去忽视城市工人运动的错误倾向。对于城市工作，还提出了两个应当注意的问题。

首先，建立工人群众统一路线。当时除我们党领导的工会

外，全国尚有下列各种不同性质的工会组织：一是工人为保障自身经济利益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这类工会能够站在工人方面要求改善工人生活，并防止资本家的进攻，但不反对国民党，甚至在形式上还和国民党发生关系，如上海邮务、商务印刷所、商务印书馆、报业、南洋烟草及英美烟草公司、电汽等七大工会。这类工会都有两面性，都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二是工会组织的头头多半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当时叫它“御用工会”。这类工会在政治上完全受国民党的指挥，但大都有一部分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尚能站在工人利益方面来调停劳资纠纷，仍有两重性，还不完全是“御用”的，如厦门、福州等地的工会组织。三是完全由国民党指定的“忠实同志”所组织的御用工会。这类工会只有上层机关而无下层组织。他们违背工人利益，利用国民党的势力压迫工人斗争，时常引起工人群众的反对，如上海的工整会（即由上海“工人总会”与反动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而成的“工会整理委员会”）等类组织。四是在工人贵族领导下的工会。这种工会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有极深的关系，历来与我们发生冲突，如广东的机器工会，它是由各个企业的机器工人抽出来成立的。这种工会是分裂工人，不是联合工人。由于机器工人在企业中具有重要地位，它能破坏工人罢工和统一的斗争，是特种形式的反动工会，我们的工作是要争取其群众。

对于这些工会组织，“我们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根本意义，是统一各派工人群众斗争的行动，在斗争中去获得群众工会的群众。”（见《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这一原则之下，对于如工整会一类完全没有群众的反动组织，我们就在工人群众中揭破其黑幕，防止它在工人中发生影响。对于其他各类工会，则按其性质的差别，切实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具体方式是：一、对于一、二、四类工会的群众，经常用我们领导下

的工会(或其他工人结社)的名义,提出当地工人最迫切而实际的要求,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尤其要使这些宣传深入到右派工会组织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中去,鼓动他们在这些要求之下一致行动;二、在有这类工会的工厂中,设法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并派一部分身分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加入他们的工会活动,用结拜兄弟姊妹<sup>①</sup>等方法组织左派力量,监督其领袖分子的行动,推动其群众左倾,直至适当改造其指导机关;三、在他们为工人利益领导斗争时,我们的工会就站在工人阶级利益上号召工人起来援助(发宣言、传单,派代表慰劳群众,以至举行同情的怠工或罢工),以便影响其群众,同时注意及时揭破其领袖妥协、畏缩或出卖工人利益的活动;四、在斗争爆发之前或斗争紧张时,我们的工会可用书面形式要求第一、二种工会作一致行动,如他们同意便可与之作一致的斗争;如在一致行动中他们的领袖表现畏惧退后时,则向群众宣布其欺骗黑幕以争取其群众。

现在看来,提出建立工人群众的统一战线,把它作为联合和团结各派工人的策略方针,是正确的,特别是在摆脱“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时,提出这个策略,是更必要的,但在策略的灵活运用上还有不足和缺点。例如:对第一类工会的上层,有可以争取、可以中立、需要孤立的三种人,应该加以分析和区别对待;第三类、第四类的上层,在群众压力之下,也可能发生分化,就

---

<sup>①</sup> 关于结拜兄弟姊妹的问题,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中说:“中国原有的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青帮等所谓‘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姊妹团’等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是说对某些可以争取或中立的上层也要做统一战线工作，这些在以后的经验中都是有过的，而当时我们却没有这个认识。

其次，是纠正过去错误的斗争方式。在这以前，我们党发动斗争的方式有过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用恐怖手段威胁群众，派人以武力制止工人进厂工作，以造成罢工形势；第二、把罢工、暴动看成是工人斗争的目标，忽视了发动小的能够争取和教育群众的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两种错误倾向妨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我们当时决定立即予以纠正，并提出了发动工人斗争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一、抛开武力胁迫的方式，着重说服教育，同群众商量，定出合乎实际情况的斗争要求；二、切实领导工人日常的斗争，在小的斗争中聚集群众的力量去准备大的斗争；三、建立赤色工会，发展工人结社（兄弟姊妹团等）；四、有计划地组织赤卫队或自卫队等工人武装，并用体育队、习武队等名义公开组织卫护工人的团体；五、注意开展手工业工人运动。

我们做了一系列工作以后，工人运动获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反帝运动中活跃了工人斗争，这在上海特别明显。上海的反帝斗争开始时也是很难领导起来的，但因江苏省委比较能执行中央（留守）指示的策略和方法，工作渐有起色。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三日（是“五卅”三周年、济南惨案周月纪念）两次示威行动，有数千工人学生参加。他们在上海南京路和西门一带，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卖国的国民党等口号。虽然有许多人被捕，但很快就被释放出来。这两次示威行动，在党内党外都有很好的影响，鼓舞了群众。有些比较涣散的支部也精神为之一振。因此，到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上海就爆发了大小近四十次的工人经济斗争。其中少数完全胜利，大多数得到部分胜利，失败的只有三数起。除上海外，广州、安源（矿工）、天津（纱厂）、济南（失业工人）、淄博（矿工）、豫南、汕头、佛山、海口市、镇江、苏

州等城市的工人经济斗争(约三分之二是罢工)都陆续起来了,而且差不多都是由党直接领导的。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几个月来沉寂的城市工人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这说明我们当时注意争取其他工会的工人群众和注意纠正过去两种“左”倾错误的斗争方式是对的。

### 三是整顿和发展农村工作,注意组织农民暴动。

八七会议以后,我们党在组织农民暴动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盲动主义的影响,不少地方党组织不顾主客观条件,一定要把斗争引导到武装暴动和武装割据,这样便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即:一、不注意群众的日常组织工作(如江苏的江北);二、普遍忽视对群众的政治宣传与教育;三、只注重如何利用“土匪”枪会组织(如安徽);四、不去努力发展和领导群众进行小的经济斗争;五、未能造成巩固的农村党组织,在盲动失败之后,党组织就瓦解消失。这些错误倾向,使一些割据区域形成了单纯军事割据,未能坚决组织和发动群众以执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因而不能推动广大群众起来为切身利益而拥护革命和苏维埃政权。

中央(留守)分析了这些错误倾向之后,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明确指出: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方针就是发动农民抗税抗债抗捐分粮一直到秋收时抗租没收土地,在群众与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须实行割据与暴动。我党应即抓住这一秋收时机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尤其是在湘鄂赣粤四省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六大以前,中央曾指示湘、鄂、赣三省要努力创造区域割据的局面。中央(留守)指示:“必须特别注意在此时期中推进全省总暴动的布置。”这仍然是未彻底脱离盲动主义的思想。)与此同时,中央(留守)还要求农村工作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一、要防止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倾向。为了

防止这种错误倾向，中央(留守)还就具备什么条件方可攻取县城作了明确的规定；二、要注意城市与乡村及各区的配合发展，在湘、鄂、赣、粤四省之内尤其应当特别注意这一点（这也反映了当时还没有脱离盲动主义倾向）；三、要加紧农民群众的组织工作，如注意建立和发展农民协会（或用其他名义）的组织，注意“乡村无产阶级”群众的特殊组织工作（在割据区域建立雇农工会，在未割据区域建立手工业工人工会，在农协已有相当群众基础时设立雇农部），建立农民武装与开展游击战争，等等。

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农民暴动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广东，群众组织因零乱而失败的现象已经减少，海陆丰和海南岛乡村的革命势力仍然在党领导之下，东江的革命力量也在向四周发展。在湖南，以湘东为中心，沿湘东北以至湘粤大道，农民暴动的声势在继续发展，并且比以前深入。湘西的群众斗争也开始发展，那里还时常发生兵变加入农民暴动的事情。在江西，赣西、赣南、赣东、赣东北的农民暴动继续不断，特别是赣西以井冈山为基地的宁冈、永新一带，已经分配了土地。赣东北的弋阳，数十万群众坚持了五、六个月的割据局面。从湘赣两省来看，当时有组织的红军约有一万人以上，尤其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好的基础。在湖北，虽然武汉三镇的工作尚未完全恢复，但外县的党组织都还存在，鄂东、鄂北、鄂中、鄂西各区域的农民斗争仍在此起彼伏地发展。总之，在湘鄂赣粤四省中，湘鄂赣三省的农民暴动都在继续发展，土地革命的内容一般都比以前充实，群众的基础比以前更扩大了。此外，闽南（以平和、永定为中心）、豫南（信阳等地）、浙江的临海温（临海、温州一带）、山东的胶东一带、苏淮（以南通、如皋为中心）以及陕北地区，都有农民游击战争。

为了加强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中央认为有必要重新组织

前敌委员会。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央发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转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信。这封信是中央(留守)发的，也可能在秋白、恩来出国前曾讨论过。这封信肯定了“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直接的来完成此一革命的使命”；批判了“以为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了民权革命的阶段，而是社会革命”的错误理论、不顾主客观条件“玩弄暴动”的盲动主义、专以攻城夺地为目的的“单纯的军事行动”和过“左”的烧杀政策；同意在湘赣边界以“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关于前敌指挥机关，“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定前委由“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成，而以毛泽东为书记”。中央在信中还指示：要在“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运动委员会，以前委之一工人同志为书记。军委及工委的名单由前委决定”。前委所管辖的范围“要由环境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现在看来，中央信中的这些指示是适当的，是合乎斗争需要的。中央这封信的错误方面，就是只把中心区域的割据作为“全省总暴动”的条件，并要求红四军向四周发展，“而推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同时，还错误地要在红四军中“取消党代表”制度。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说，湘赣边界党的领导机关接到中央来信后，认为“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当即印发给军队和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十一月六日，由湘赣边界特委召集特委委员、军队及地方党的活动分子三十余人开会，讨论中央来信。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

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同日,“依中央的指定”重新组织了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同志)、毛科文(农民同志)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统辖于前委。由于重新组织了井冈山前委,就使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和扩大,有了更加坚强可靠的组织保证。

#### **四是派得力同志到敌军中工作,加紧士兵运动。**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中的士兵曾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北伐战争,但大革命失败后,在新军阀蒋介石之流的反动统治下,他们没有得到丝毫的利益。当时,新旧军阀手下的士兵生活条件十分低劣。有的军队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到了夏天就将棉衣的棉花抽去作为单衣。有的军队士兵不但领不到欠饷,而且还有被裁减的危险。这正是我们发展士兵运动的机会。同时,由于朱培德已派军队妄图“围剿”井冈山根据地,湖南的敌人在高唱“清乡”,北方的军阀也在进行“平匪”的军事行动。如果我们不加紧士兵运动,进行争取和瓦解敌军的工作,那就会给革命增加许多困难。

但是,在我们开始搞留守工作的一段时间,除在广东的一部分敌军中建立了相当的工作基础外,其他各省的士兵运动只有一些零散的活动,有些地方的党、团组织还没有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就是稍有士兵运动的地方,在工作观点和方法上也有某些错误,如有的省委对于士兵工作主张“有一个变一个”,有些地方忽视“秘密艺术”,以至遭受极大的损失。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留守)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提醒各级党、团组织严重注意这项工作,指出:“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

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通告还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应即于一周以内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讨论这一工作具体进行的计划”。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留守)在《中央关于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又强调指出：“士兵运动关系我们争斗的工作十分重要，今后不独努力使城市与乡村的工农适应的发展，各地应即切实计划进行这一工作”。至于在军队中开展工作的方法，主要就是派出得力的同志到敌军中去，如各个军阀经常需要补充兵额，有的军队实行征兵制度，我们就利用这种机会派同志进去。此外如军阀创办下级军校，我们随时注意派同志去报考。如没有入伍的机会，则派同志接近士兵，注意争取军队中的中心力量，发展我们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利用大军阀假借裁兵名义裁撤异己军队，不发清士兵欠饷，不抚恤救济死伤残废，不给退伍士兵工作等等，鼓动士兵群众兵变，以动摇军阀统治，增加工农斗争的声势。这项工作，在当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 **五是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

在我们开始留守中央时，党内存在着几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在几个月内遭到了几次重大的破坏。尤其是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被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出卖，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上海被捕牺牲。这对我们震动很大。当时秋白、恩来还在上海。我们考虑，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猛烈进攻，但我们党的组织不适应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叛徒的告密，乃是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关键。同时，我们又考虑到有些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往往失去了领导斗争的力量，甚至不能与广大的群众联系，因此对白色恐怖下

党的组织问题必须严重注意，必须坚决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护党的组织和干部。巩固下层组织的基础——党的支部，以便使各地党的组织既不致遭到破坏，又能积极领导当时的斗争。

为此，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在发出这个通告时，秋白已经离沪出国，恩来也可能刚离沪出国。他们二位对发这个通告有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建议，我已记不得了。在这个通告中，提出了关于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九项办法，要求各级党组织特别予以注意。这九项办法可以说是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用鲜血换来的经验，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例如第二条办法说，在秘密环境之下务使党的组织适合于这一环境，使敌人不易破坏党的机关与组织，或者破坏一部分而不致连带到其他的部分。因此，以后凡超过五人以上的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分部，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体大会。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如支分部超过六人时，亦须分组开会，开会时务须特别注意秘密技术。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一旦发生破坏能有人继续工作。

又如第四条办法说，为健全指导并卫护指导机关起见，以后区市县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和一二内部工作人员，他们平时应少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不出席执委以下的各种会议而偏重于内部工作。在书记被捕或平时向外活动委员发生问题不能继续工作时，他们能够代替前者的工作。再则，县执委委员必须轮流到所属县区党部巡视工作（广东、湖南等省须有五六个巡视员，其他省份须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巡视员），常会所在之地至多留三人。

只有这样，才可以加强对各地的实际指导，同时又可避免原组织全部被破坏的危险。以后，当地上级对下级的指导非十分必要时不应用书面形式，执委委员的姓名不必向普通同志公开，出席各种会议时只讲代表机关不必宣布个人的姓名。

再如第七条办法说，过去许多割据区域的党组织与负责同志常常忽视秘密工作，以为“既然被我们割据了便永远（是）C.P.（共产党）的天下”，因此把党的一切机关都公开起来，负责同志也常常把自己的“官职”公开，以致反动局面临头，公开机关便全部被敌人破坏，负责同志和干部也全不能立足或遭敌捕杀，以后应特别注意纠正这种现象。在割据区域的党组织固然应当公开一切党的活动，但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同志，以便在敌人进占后我们可以继续活动。

这些办法下达以后，对于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四个多月的留守工作中，中央除了与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事实上断绝了关系以外，曾通过各种方式如和一些省委的代表接谈、给一些省委写指示信和派人到省里去巡视等，对各省都进行了个别指导，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发了一些通告、决议，给各省的工作提出了总的指导方针。在中央（留守）、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当时的工运、农运、兵运、反日运动、党的整顿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说：“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主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



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行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这是这个时期全国革命形势和党的工作的一个简要概括。

#### **六是传达和贯彻六大的指示电。**

在我们留守中央期间，出席六大的同志对国内工作是很关心的。曾发来一份《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电稿首先表示：“第六次大会无疑义的同意第九次国际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的决议案。”（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235页）电稿接着说：“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以屡次失败而完结，而新的浪潮没有来，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加紧日常工作，尤其是城市产业工人之中的工作。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一切暴力的机会，要激动一切阶级冲突并使之深入。”（同上）电稿又说：“必须与主要口号同时提出工农运动的部分口号。党与群众脱离是主要的危险。全国范围之内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决不能削弱农民的游击战争之指导。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同上）电稿最后还说：“最大限度的引起群众于反帝国主义运动，使这种运动与反国民党反军阀的斗争相联结起来，然主要的任务仍旧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工农民权独裁制的苏维埃的政权，继续坚决的改造党。”（同上）我们收到这个电稿后，曾进行反复讨论，并按照来电的要求，发到各地进行了讨论。这样，就及时地传达了六大精神，指导了全党工作。看来这个指示电反映了六大总的精神和方向，是在大会有了结论时发出的。

#### **七是关于《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留守）从实际情况出发，起草了《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国民党军阀打下平津后的形势和深

入反帝运动复兴城市工作问题》。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打下了平津，蒋介石政府已发表了对内对外宣言，豪绅买办阶级军阀内部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态度、一般民众对国民党的感觉，都较前明朗起来。中央(留守)第五十四号通告在分析了这一形势之后指出：

“现在是我们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的时机，我们要全体动员参加反帝运动推进反帝运动，……主要的路线是深入群众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在这个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很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的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

通告接着说：“当此我们在城市没有基础的时候，我们要有独立的政治宣传和批评，不断的指出群众的出路，但我们却还没有力量以C.P.的名义公开的领导群众运动，因此我们的行动只有潜伏在群众里面，愈能深入群众，则愈能取得群众而愈能建立党在群众的基础。中央曾坚决的严厉的批评有些党部想以激烈的行动(打杀)发动群众运动，因为这是脱离群众，不要群众的拼命主义。”

通告接着又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山东的侵略和屠杀正在一天紧似一天，国民政府的外交更是一天软弱一点，以收回满洲和山东主权为骨干的反帝运动，更可以大大做起来。同时民权运动已经是一切城市民众的迫切要求。”因此，关于我们党在当时的的工作，中央(留守)除提醒各地党组织仔细地执行中央已经发出的四次通告外，又进一步作了八条指示。

第一条是：“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斗争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特别是复兴城市运动。”在这条指示中，提出了十七项总要求作为当时群众运动的总目标。其中，除了提出“要求外交公开”、“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收回山东满洲的主权”、“驱逐在华帝国主义的海陆军”、“反对军阀战争”、“释放一切争自由争国权的政治犯”、“工人有自己组织工会宣布罢工之自由”、“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士兵耕种”、“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处以极刑”等等以外，还提出了“要求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权”以及“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国民会议由工农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等民众自己选举的团体派出代表及军队以连为单位由士兵选举之代表组织之。反对御用的包办的国民会议”等条文。通告说：“这些要求自然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这只是我们用以发动群众的口号，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从斗争中扩大群众组织的基础和斗争的力量，更加明确其反国民党的意识而有反国民党的决心和勇气。总之这些要求特别是复兴城市运动的策略。”

第二条是：“中央另外以党的名义发一宣言指示民众目前的出路和应有的要求，口号比上面更直接，因为这是党的立场说话与上面要民众采用由他们此时自己提出者不同，各省委各市委各县委特委应根据那个宣言用党的名义发出宣言，总的原则和态度不能逸出中央宣言之范围，但必须把中央宣言所指出的要求，依据当地的事实化成更具体而切实的口号。这样的宣言要设法多多的散到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小商店中去，同时要注意使党的要求变为各种民众自身的要求自己发表出来，由口号而变成行动。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某种群众尚不能完全接受我们的党的宣言所指出的要求，那么至少限度须使他们采用本通告所指出之要求，从他们自己队伍中叫出来方有意义。”

随后，通告就宣传鼓动工作、城市工作、党内组织动员工作、农村工作、国民党内反对派问题等一一作了指示。在这些指示中，对中华革命党（当时我党称它为第三党，其领导人物是宋

庆龄、邓演达、谭平山、陈友仁等左派人士)的分析和策略是有明显的错误的。一九二七年底，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一篇宣言。宣言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罪行，决心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而斗争。但是，通告却认为第三党的宣传是“虚伪”的，最后他们“当然成为蒋介石的走狗”，因此“我们党从中央以至地方须尽可能从理论上给他们以打击，同时对党内外群众指明他们的虚伪的狐狸面具”。除此之外，其余各项指示大体上是正确的。例如第四条指示说：“在城市工作主要的是如何扩大工人组织（不一定叫做工会）发动工人斗争，取得广大的工人群众。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再则如何进行或开始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求其发展。C. Y. 更要加紧学生和青年工人的运动。再则对小商人须时时提出代表他们利益的要求引他们参加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使他们日益脱离国民党的影响而倾向我们。”

当时，中央(留守)的文件都经过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转报国际和六大主席团。共产国际曾来电对五十四号通告进行严厉的批评。国际来电原文现未找到，但查到中共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记录。这次会议结论认为五十四号通告“工作方法是正确的，工作策略路线或政治路线是非常右倾错误的”，并建议国际代表即以紧急电报指示国内中央。

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后，我们经过研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通过了《答复国际来电的决议——对国际批评五十四号通告的回答》。在这个决议中，我们对国际来电作了八条答复。即：

(一)“与54号同时发出的有中央宣言(已寄来)，宣言中提出二十余口号‘打倒国民党’‘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都有。在54号通告中指明各级党部须尽可能使中央宣

言的口号变成群众自身的口号，在落后群众中，至少亦须采用通告中的口号。”

(二)“中央在宣言布报(布告)及行动大纲等其他文件都主张‘自动的恢复民众运动’，实际各地发动群众亦不是经过要求国民党的形式。”<sup>①</sup>

(三)“中央在最近几个月中指示各地党部发动群众斗争，在斗争时抓住公开活动的机会，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反对旧时离开群众的秘密方式，同时又反对幻想在国民党谅解下的合法运动。”

(四)“在反帝运动中和工农斗争中，党都随时揭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并取得了群众的欢迎。”

(五)“第三党在一部分学生中有点信仰，党久已公开的与第三党奋斗。”

(六)“54号通告提出‘工农兵及城市穷苦小资产群众代表会议的民众政权’其内容本即是‘工农兵城市贫民代表会议’的意思，‘民众政权’四个字不妥当加改正，但党的公开口号始终是‘苏维埃政权’。”

(七)“国民会议的口号在五十四号通告中原是一种策略，但在宣言中素来即是‘反对国民会议’的口号，以后当继续在群众中宣传，反对御用的国民会议以揭穿国民党的欺骗。”

---

<sup>①</sup> 六大后的新中央对“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在谈到当时“几个战略上的错误的偏向”时说：“认为现在部分群众的政治意识非常落后，现在党的战略上的口号太高，群众暂时不能接受，所以党应该把政治的口号降低（如主张党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或主张‘要求恢复民众运动’的口号，对国民会议根本不反对，只反‘善后会议’式的国民会议，而要求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又如对反国民党的动摇等），所以党的政治口号应该看群众接受的程度来决定这一偏向，实在含有莫大的危险，很可恢复到过去的机会主义。”

(八)“现在全国城市运动已有活跃的现象，党的独立的宣传异常重要，中央虽历次督促，但各地对此工作仍缺乏，今后当更加紧此方面工作。”

中央(留守)对国际来电作了上述八条答复以后，并于八月十一日，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二号——目前党的根本策略与政治宣传鼓动》，其中规定“目前政治上的中心口号”共十八条。这些口号包括：“一切土地国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打倒替资产阶级作走狗欺骗群众的第三党(中华革命党)”、“武装暴动是工农兵的出路”、“反对御用的国民会议”、“‘苏维埃’是工农兵自己的政权”，等等。关于对这些口号的运用，通告作了三条规定：“第一，利用每次群众运动和一切可能接近群众的机会，向群众宣传。第二，用党和团或秘密工会的名义口头的或文字的不断的向群众宣传，并加以解释。第三，这些口号当然不要与日常的经济口号及临时事件的口号隔离，而要使之联贯一气。又五十四号通告中‘民众政权’及‘召集国民会议’二口号须停止宣传，因为足以混淆工农对苏维埃政权的意识。”

从第六十二号通告的内容来看，当时中央(留守)已经接受了国际来电的批评，并在实际行动中有了表现。

现在回过头来看，对共产国际来电和六届中央政治局批评五十四号通告策略路线和政治路线右倾，我申述下列的见解：

(1)口号问题。党的口号历来分宣传、鼓动两种。宣传口号带战略性、纲领性，表达一个阶段的革命目标和革命任务，以教育和提高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水平；鼓动口号带策略性和临时性，是直接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迫切要求，能够即时发动他们起来斗争的口号，引导群众从切身利益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党的宣传口号的正确加以接受而为之奋斗。中央(留守)一方面用党的名义公开发表宣言，提出“打倒国民党”、“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工

“农兵苏维埃政权”等口号；又一方面发出五十四号通告，提出一些带策略性的口号，是有意区别这两种口号的。

群众的觉悟程度往往有进步、中间、落后的区别，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我们必须从多数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提出恰当的斗争口号。对于落后群众，也应当争取他们。但当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时，比如多数群众还对国民党存有幻想，坚持要向它提出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以至政治上不适当的要求（如“召集国民会议”等等），我们应当怎样办呢？是退出运动，撒手不管，甚至与群众对立起来呢？还是始终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一方面，深入细致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从实际的经验教训中帮助他们提高对国民党的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当然应当采取后一种态度。因为群众的觉悟主要是靠自己亲身的经历中提高起来的。但在“左”倾领导时期，我们还不懂得这条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

五十四号通告指示，提出斗争口号时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在反帝运动中要时时增进反国民党的意识和行动，但我们的方法是曲线的，不是一开始便简单的叫打倒国民党吓跑了群众，因为群众反帝运动和自身斗争能够起来，必然的走到反国民党。”这个策略指导思想，在当时情况下，我看是正确的。问题在方法上，不是指导下级组织从当时当地多数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出发，而是由中央一般地、主观地规定一些意在照顾觉悟程度较低的群众的口号，而且大都是采取向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要求的形式，这是不适当的，有错误的。

（2）“工人统一战线”问题。五十四号通告提出了“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有黄色工会或反动工会的地方，并且要注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打入他们的群众中去。”这是正确的，在当时尤为必要（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作过一些论述）。中央

(留守)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给江西省委信中说得更加透彻。该信写道：“至于你们对于黄色工会的意见中央仍然不能同意。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面去活动，以公开的地位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的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至于在宣传方面，我们当然要公开的批评黄色工会的欺骗，但是不能够简单的站在群众以外笼统的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至于对于空招牌的反动工会天天去压迫欺骗工人，我们当然要无条件的号召群众起来推翻它。过去各地对于黄色工会的态度，一方面自己未去做职工运动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一方面又不管是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或无群众的黄色工会，一概笼统地机械地提出打倒的口号，结果黄色工会并不因为我们的反对打倒而受任何影响。事实上，工人群众因为得不到出路反而一天一天接受黄色工会偶然的欺骗而受其影响。这从上海的教训告诉我们这种政策是错误的，希望你们仔细考虑此问题。”

我认为中央(留守)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与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的内容也基本一致。中央(留守)提出的“工人统一战线”策略，很明确不是要同反动上层搞统一战线，而是要在工人之间结成统一战线。可惜六大职工运动决议说“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sup>①</sup>，而六大后新中央对“工人统一战线”这个口号则正

<sup>①</sup> 六大《职工运动决议案》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务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导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对这一部分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出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彻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25页)。



式予以批判和否定<sup>①</sup>，自此以后，我们的职工运动长期遵循着赤色职工国际“左”倾路线，跳不出来。

(8)对待第三党的问题。否定统一战线的“左”倾策略，还表现在对待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的态度上。第三党的发起人亦即他们当时的领袖人物，如前所述都是真正的左派人士。他们的政治主张有妥协性的一面，如不满意共产党所谓“超过时代”的政策，主张“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治同盟”，对土地革命主张和平地合法地没收地主土地，对国民党主张恢复民二时代的中华革命党。但他们反对国民党“在朝派”，不反对共产党，而“标榜以孙总理及其主义为圭臬”，并想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对于他们，为什么不应该采取积极争取和联合的政策，反而只采取斗争，而且是公开的斗争的手段呢？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留守）的策略也是错误的。但中央（留守）的错误仍然来源于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早已预断他们是“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

综上所述，第五十四号通告虽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比较正确的，决不是政治路线上的右倾。而国际来电和六届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则是过分的。他们进行政治批评的出发点基本上是“左”倾教条主义，是反对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这一点，下文我将谈到。

## 我对六大的几点看法

我没有参加六大，对六大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不可能作什

---

<sup>①</sup> 六大后的新中央于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三号——目前革命形势与党的战术和策略》中说：“我们不应采取‘统一战线’的口号，因为这些口号可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工会的幻想，应普遍的发展工厂委员会（另有通告说明

么回忆。下面根据学习有关文献，提出几点看法。

关于对六大的评价，过去是有不同看法的。直到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时，在一部分同志间仍有分歧，有争论。后来，统一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完全同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学习和时局》以及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一致肯定的，六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结论。这是经过长期历史证明了的。

同时，上述文献，在一致肯定六大路线基本正确后，又都指出六大有缺点和错误。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些评价是正确的。

那么，这些文献是怎样评论六大的缺点和错误的呢？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

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六大“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

---

其作用），把在国民党及改良主义影响之下的工人群众完全夺取到我们方面来。”（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399—400页）

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

恩来是“六大”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揭示了六大本身的一些重要事实和他评论六大的一些重要论点。但是，他和其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周恩来、李立三、龚饮冰等），回国后在传达六大或关于六大的谈话中，很少提到这些。我想这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一是认识的局限，二是为了团结全党为六大路线奋斗，当时有许多实际情况要保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现在重新学习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六大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左”倾，又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战略性问题上：即城市中心论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现就这两个问题作些回顾和论述。

### 一、主张举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六大《政治决议案》提出了“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3页）的总方针，并说：“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见同上书第222页），“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同上）（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这些当然是正确的。

但《决议案》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见同上书第221页）。同时又说：“这里，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见同上书第221—222页）。这些论点都表明《决议案》提

出的武装起义，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时，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理论，还处在探索和孕育的过程中，关于武装起义还只知道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广州起义就是这种经验的再现。总之是搬用了外国的经验。

其实，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这个观点，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以及在六大的《政治决议案》中，基本上是连续一贯的。六大决议批评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具体特征，却没有批评临时中央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案》的以下一段论述，即：“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展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扩大群众的革命高潮，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更没有批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所说的这么一段论述：“党指导着各省区之农民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这是因为六大决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以及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二月决议，所主张的都是搞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

历史证明，这种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是很大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正是坚决执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论的错误，结果使党和革命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更“左”更冒险的城市中心论者王明等人，在把城市工作的资本几乎输尽以后，又要求红军进行最后决战，结果

在一九三四年使党和革命遭受了类似一九二七年的大失败。

“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它不认识或不承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根本特点，不了解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文化上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不了解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因此就不了解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军阀的武力统治之下，中国革命不能如俄国的十月革命一样走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进军农村的道路（这已有广州暴动的经验可以佐证）；而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农民利用经济、政治、军事等极不平衡的特点，实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创立根据地和革命军队，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虽然毛泽东已经创造性地探索到这条道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但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仍然不予承认，以致把革命引到失败。毛泽东当时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即已发挥和发展了党的四大关于无产阶级必须争取同农民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的思想，肯定农民革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是摧毁“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的革命。他总结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他同时强调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大革命失败后，他主张发展农民武装斗争。一九二七年七月，他说农民武装斗争有困难时可以上山。当有人主张集中农民武装在湘南建立一个师去援助八一起义军时，他主张把它留在湘南创立割据区。八七会议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八七会议后他亲自下乡领导秋收起义。而以后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成功地开创了一条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这个重要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思想的发生和发展表现了它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一贯性和正确性。

## 二、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小资产阶级。

早在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以后，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一些文件中就开始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认为：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事变是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联盟的开始，“革命运动已到了第三阶段之门”，即“无产阶级、农人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之门。又如，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认为：蒋介石的“四一二”事变，标志“民族资产阶级离开了民族战线，跑到反革命的营垒去。”再如，同年同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认为：“蒋介石及其部下的行动，自三月以后都是反对国民革命的，他们的行动决非个人的行动，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还说：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在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叛变以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又进一步认为：“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15页）

党的“六大”并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少分子虽然一度附和了反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取得政权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因而他们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仍有矛盾。“六大”把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断定为“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见同上书第211页），认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

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见同上书第 212 页）同时，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六大”虽然认为“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参加”（见同上书第 225 页），但又说中国革命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见同上书第 212 页），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排除在动力之外了。

党的“五大”和“五大”以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党的“六大”和“六大”以后进一步排除小资产阶级。特别在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期间，这种政策发展到极点，使党和革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左”倾的阶级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及其以后才得到彻底纠正。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中，对阶级政策问题作了完整的分析和结论。他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分。大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历来是革命的对象。“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

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也是教条主义，也是由于不认识或不承认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就不了解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即既有革命性一面，又有妥协性一面。这种两面性，是他们“从娘肚

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是同时存在不可分离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这一面或那一面占主导地位。历史实践正是这样证明了的。其实四届三中全会上的中央政治报告和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都早已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特点。毛泽东由此在实践中创立和发展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理论和政策。但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革命性的一面，因而对他们节节退让，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拒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坚持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错误到底。

上述两个战略性的“左”倾错误观点——城市中心论和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买办资产阶级——及其实际影响，直到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才获得纠正。

必须指出，六大的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因此，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即到六届四中全会以前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六大已作为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而载入我党的光荣史册。



# 回忆江苏省委

(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新的中央负责同志陆续回国。十月，中央任命我为中央巡视员，巡视上海市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一月，江苏省委改组，我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九月或十月间任代理省委书记，十一月底任省委书记(省委兼上海市委)。现就这两年多的历史作一简略回顾。

## 一、巡视上海工作期间

(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二九年一月)

上海市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当时拥有产业工人八十万。上海工人阶级经受了一九一九年的“六三”大罢工、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反帝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反对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考验和锻炼，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党在上海的力量比较强，群众工作的基础也比较雄厚。上海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首府南京，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中心。因此，无论是对于革命或对于反革命来说，这两个地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大”后的中央政治局由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徐锡根、卢福坦等组成。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委会主席向忠

发，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蔡和森（后为李立三），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后为彭湃），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保，军事部长杨殷，团中央书记关向应。党中央根据“六大”关于用一切力量去争取团结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决定将巩固和发展党在天津、武汉、上海、广州、香港等重要城市产业工人中的基础，建立产业工人中心支部作为首要任务。中央十分重视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将上海市看作是领导全党工作的基地，党中央机关就设在上海。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是接受中央指示最快的地方，许多工作都是在党中央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为了加强、改进江苏省委和上海的工作，组织了两个巡视委员会，一个由周恩来、康生（省委组织部长）、李子芬（团省委组织部长）和我组成，恩来任主席，任务是巡视上海党的工作；另一个以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苏兆征为主席，任务是巡视上海工会的工作。我参加的巡委会于十一月十六日正式成立，制定了巡视计划，主要是巡视上海各区的重要产业工人支部。由于恩来要处理全党的工作，没有时间到基层参加支部会和区委会，因而他一般只参加巡委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到各区、各支部开会的主要是我和康生。后来省委又派了何孟雄、马玉夫参加巡视工作（实际参加的是孟雄）。巡视的时间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九年二月间。

当时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两个月中我对上海七个区的区委及下属的重点支部进行了巡视，参加的各种会议有八十多次，往往一天要参加两、三次会。我参加各区的主要会议有：区委常委会、区委会，区的宣传、组织、工会工作的专题讨论会，重点产业支部会（亦称中心支部），支书联席会等，同时还进行个别谈话。我巡视过的部分党支部和党小组有：沪西区的祥昌、同兴、

申新、内外棉四厂和五厂等纱厂和绢丝厂；沪东区的老怡和、恒丰、永安等纱厂，茂昌蛋厂、英商电车公司和码头；沪中区的药材、估衣等行业，裕昌火柴厂、劳动大学、《民众日报》；闸北区的邮务、商务印书馆、苏州河码头、海员、电汽车公司；法南区的法商水电公司、华商电车公司、金银业和振华纱厂；浦东区的英美烟草公司等。参加会议一般只有三至五人，均为区委和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开会地点一般在区委机关或支部接头处，有时也在工人宿舍或工人家里。如沪东区恒丰纱厂的老板聂云台是湖南人，厂里的工人很多是湖南籍，我们以同乡的关系为掩护，时常在这个厂或这个厂的工人家里开会。我每次外出开会都要化装，由区里或支部同志带到约定的地点去接头。有一次我去工厂开会，途中突然被人紧紧抱住，一看是巡捕，他要抄把子（搜身），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便放了我。我每巡视完一个区后，即写一份综合报告呈送中央，并向巡委会作汇报，省委同志也参加。

前两年在档案馆找到了当时经过抄正的我的一部分巡视日记，它记载了我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六日两个月的巡视工作情况，有十余万字，内容包括上海的政治形势；各区党、团组织状况；工会组织、工人斗争情况，以及我对工作方法、斗争策略、存在问题的分析。经过这段时间的巡视，使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江苏省委和上海各区党的组织和工作的基本情况，为我起草提交一九二九年三月省委扩大会议讨论的《上海工作方针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和说明书，以及《上海组织现状和工作计划》等文件准备了素材。当时我了解的基本情况综合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江苏省的党、团组织和群众组织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到一九二八年底已有初步恢复。当时，省委由李富春（代理书记。原书记项英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未归）、

何孟雄(负责宣传和农村工作)、康生(负责组织工作)、徐炳根(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马玉夫(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王克全(负责职工运动)、吴振鹏(负责团的工作)组成。省委兼上海市委,市委下辖沪东、沪西、沪中、法南、闸北、浦东、吴淞等七个区委,一百四十多个基层党支部,一千二百多党员。上海各区的基本情况是:

工人分布情况:沪东、沪西区的产业工人较多,大都分布在中国和日本资本家开办的纱厂、丝厂和英、美资本家开的水电、电汽车公司中。沪西区轻纺工业的工厂较多,因此女工、童工就多,受压迫剥削也最深。沪中区为商业中心,店员、手工业者占了绝大多数。闸北区手工业工人、自由职业者和码头工人较多。浦东和吴淞区为工农混居的郊区,有部分产业工人,因濒临黄浦江,船工、车夫、水木工较多;还有上海市以外八个县的农民和反动军队的士兵,也是一部分不可忽视的革命群众。

党的组织情况:七个区委中,沪东、法南、沪中、闸北区的力量较强,浦东区最弱。工人党员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知识分子党员为百分之十六,其中以法南区、吴淞区、闸北区为最多,他们大部为学校的老师、学生和文化工作者。还有少量的女党员和士兵党员,农民党员最少。市区的几个区委都有会议制度,区常委会大都每周开会一、二次。上海的一百多个支部中能经常开会的有一半多。还有一部分组织不健全,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有些大工厂还只有党员,而无支部组织。

各区委都出了小报或刊物,向工人散发,也有销售的。如沪西区出的《无产阶级》,每期可以销售二百多份;工会系统出的《工人之路》每三天出一期,每期印四百五十份,材料丰富,消息及时,受到工人的称赞。沪东区有《沪东工人》。闸北区出有《沪北工人》。沪中区出版的刊物较多,小报有《党的生活》、《伙伴》,

还印发了一些小册子，如《六千信条》、《什么叫共产主义》、《秘密工作须知》等。有些工厂支部还出了壁报，揭露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罪恶，介绍其他厂工人斗争的情况。当时，省委分配下来的中央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因工人文化低，看不懂，销路不好。各区出版的读物，尽管有的质量不高，但对于扩大党的影响，启发工人觉悟还是起了作用的。在白色恐怖下，党的基层组织能坚持出版这些刊物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工作。

上海以外的县、市党组织有沪宁(十二月改为特别区)、徐蚌、盐淮、南通、扬州、淞浦等六个特委和南京市委，领导着五十多个区委、县委和特支。

根据康生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代表省委向中央巡视委员会介绍全省情况时提供的材料，当时全省有一万一千多党员，其中工人党员二千多，还有一千多团员。从这个数字看，同全国其他省区比，江苏和上海党组织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

(二)上海的工人运动，在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以后，开始复兴。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的暴行，在上海总工会领导或影响下，百余工会团体和学生，联合组成“反日会”、“济案后援会”等反日组织，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组织演讲队到各区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屈辱妥协行为。“五卅”这天，全市实行总罢工、罢课。以学生为主的数千群众在南京路和西门一带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六月三日为纪念“五三”周年，群众反日情绪高昂，举行纪念大会。上海人民的这些反日革命斗争，成为“四一二”后上海人民反帝斗争复兴的起点。在经济斗争方面，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邮务工会因资方迟迟不答复四月提出的改善生活的要求，举行罢工；一九二九年一月和二月，上海新新公司职工八千余人，为反对资方开除工友，克减膳费，并强迫

全体工友更新保单，连续两次举行罢工。此外，上海内外棉九厂和老怡和纱厂的工人和金银业、熟货业的店员都举行了罢工、怠工或其他形式的斗争。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统计，一九二八年8月至12月，上海工人罢工就达七十一次。这些斗争虽然只有少数取得胜利，大部分或因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和破坏，或因领导工作的缺点失败了，但它毕竟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受到严重摧残的上海工人运动开始复兴的形势。

(三)当时江苏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斗争策略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一部分党员和工人的消极和恐惧情绪仍然严重存在；不少党支部还没有恢复和建立起来，即使恢复和建立起来的，也还比较涣散，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有的区委组织不健全，缺乏集体领导，工作作风也不够深入。不注意领导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日常经济斗争，不善于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严重；二是“左”倾盲动主义虽然受到批判，但并未完全克服。我已觉察到这些问题，感到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正确贯彻“六大”制定的总路线，大力争取群众，注意发动日常小的经济斗争，逐步提高工人的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党团员的工作主动性。基层支部工作应当灵活地运用“宁小勿大，宁少勿多”（按：这是李维汉同志以镜松化名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关于巡视沪西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的原则，脚踏实地地作艰苦的工作。在组织上，要加强中心支部的工作，改进支部生活，改进区委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我还主张省委应改变由上海总工会直接向各区、各支部派特派员和组织员的领导方式，而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工会的领导。我的这些意见虽然不够全面，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当时上海党内的基本状况的。

在我巡视上海工作期间，江苏省委与中央之间发生了一次纠

纷，后来称为“江苏问题”。

新中央为了加强江苏省委的领导，贯彻“六大”将工人干部提拔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的组织路线，十月间决定派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任江苏省委书记。省委则主张选本省的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任书记，不同意罗任书记。后来，中央同意省委意见，但要罗登贤兼省委常委。省委也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商水电公司或法电）工人，因要求资本家承认工会、改善待遇、缩短工时，连续举行两次罢工。中央非常重视这次斗争，想通过这次罢工推动江苏的工作，因此，决定由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和江苏省委联合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不久，中央又将省委与行委合并，统一由行委领导和指挥法电罢工。中央的这些做法引起省委不满，认为“简直中央可以代替省委”（见《江苏省委常委会议文件》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次罢工由于遭到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镇压和工贼的破坏，由于党的力量薄弱，没有取得胜利。这次罢工的失败使中央更加感到省委特别是上海各区委的领导有加强必要的必要。因而中央又进一步讨论加强江苏省委的问题。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撤销省委，由中央兼；一是中央不兼，抽一部分人员去加强省委，省委部分人员到区委加强区的工作。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于是中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也参加了特委会。特委会在向忠发、李立三主持下，作出了中央兼省委的决定。正当中央政治局准备将这个决定通知省委时，一九二九年一月上旬，恩来去北方解决“顺直问题”后回沪。他反对中央兼省委的做法，强调中央深入群众的办法不是简单地兼省委、市委，而是要深入基层，转变作风。于是政治局又连续开会讨论，意见仍不能统一，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重新组织

“特别委员会”再一次研究。一月中旬，恩来带我去参加特委会，经恩来的说理，会议决定中央不兼省委，由政治局派出部分同志参加省委，同时加强上海各区委的领导。

但是，在特委会作出中央兼省委的决定尚未传达付诸实施时，团中央的个别同志错误地将决定告诉了团省委个别人。党的省委的同志也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不满，即错误地召集各区委负责人会议，传达省委与中央纠纷的经过，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并在部分省来沪联系工作的同志中进行违反纪律的活动。这样，中央与省委间的纠纷发展得更为严重，中央严厉批评省委的做法是“非组织行动，离开了政治路线。”（见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中的报告》，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五日）“是别有用意，是派别问题。”（见《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省委向中央申诉了党和团的中央不应兼省委的意见，批评了“C. Y. 中央先将兼省委事通知C. Y. 省委，而不与党在政治上作一致行动”（见《江苏省委对中央工作的意见》，一九二九年二月），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后经中央多次开会，省委勉强接受中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鉴于以上情况，党中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决定将江苏省委解散，分别给省委成员以警告处分，并指定六个同志组成新的省委常委，派罗登贤任书记，任弼时为宣传部长，我为组织部长，彭湃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军委书记，原省委常委康生为秘书长，徐锡根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原省委的一些成员，如李富春分配到法南区委，何孟雄分配到沪东区委工作。

“江苏问题”的解决，前后历时约三个月。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水平不高，江苏省委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有严重错误，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一是中央过分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份，认为调工人干部加强省委领导，才有助于贯彻“六大”决议。



当时，省委和各区委的领导工作虽有缺点和错误，但还没有到不能继续工作的程度。二是处理问题简单。调整省委领导班子，不同省委同志商量，召开各省来沪代表会议时，不通知江苏省委派人参加，就简单地决定停止江苏省委的职权和工作。周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党中央虽由向忠发负责，但实际上是李立三说了算。这些做法虽然主要出自立三的意见，但中央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内，都是有责任的。立三听不进省委同志的不同意见，以救世主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当时是有感觉的。三是中央对省委问题的分析，言过其实。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采取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促使了矛盾的激化。

江苏省委在未正式接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兼省委的通知时，凭小道消息，不顾党的纪律，进行一系列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甚至将在“六大”召开期间争论的一些问题不加区别地进行传达，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在这方面，也是极其错误的。

## 二、省委领导的加强和工作的开展

（一九二九年一月至一九三〇年六月）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新省委成立后至一九三〇年六月间，省委和上海市委总的工作路线和斗争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江苏省党的“二大”以后，省委中“左”的思想逐渐发展，为后来贯彻立三路线准备了条件。

### （一）我参加省委时省委的基本情况

新省委成立后，省委常委办公机关设在北四川路南头路西的一个弄堂里，对外以写字间为掩护。这个机关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我离开江苏省委止从未遭过破坏。当时省常委每天碰头一次，处

理日常工作，决定重大问题。省委每周召开一次上海各区委书记和群众团体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先由各区书记汇报情况，然后讨论工作。常委还分工联系上海各区并参加区委会议。对外县除派巡视员外，还召集特委或县委书记到上海来讨论工作。

省委各部的组织比较精干。以组织部为例，我开始任部长时，共六个人，任作民（任弼时的弟弟）任副部长，另外有秘书、干事、发行和做技术工作的各一人。组织部主要管地方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巡视工作。全省的发行分配工作也归组织部管。

一九二九年二、三月间，组织部为了全面了解全省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就省委、区委、市委、特委、县委、特支的领导成员，全省党员的社会成份，各党支部的组织生活状况，各级党组织掌握的积极分子数量，妇女党员数和被捕同志数等问题，分类进行了一次调查。根据这次调查统计，上海共有支部一百四十三一个，党员一千三百人。南京市有支部十三个，党员一百一十四人。从1929年上半年开始，上海党员的成份已由主要是店员和手工业工人向产业工人发展，铁路、海员、矿山、金属业、纺织、电汽车等轻重工业中已有党员和党的组织。党在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有一定扩大，党群关系有所改善，能起作用的支部较前多了。至于全省的组织统计，因部分县委将党员数和受过党的影响的群众数混合计算，就不准确了。

省委宣传部工作由任弼时负责。宣传部根据中央和省委提出的任务，拟定宣传工作计划和宣传大纲，编写各种宣传品，编辑出版党刊党报，督促和指导各区出版供工人阅读的通俗刊物和工厂小报。宣传部编印的《每日新闻》，把每天报纸上的重要新闻汇集起来，供省委机关同志阅读。一九二九年六月出版省委党刊——《教育周刊》，因环境恶劣，实际每月才出一期。在中央宣

传部的具体指导下，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省委宣传部出版了供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阅读的半公开的报纸《上海报》，到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四日停刊，共出了三百八十五期。《上海报》内容通俗，文章短小精悍，形式多样，有图片，有漫画，有文艺专栏“海上俱乐部”，每天都刊有上海工人和江苏省其他县市以及外省工人、农民斗争的消息。还经常报道红军战斗的消息。该报深受欢迎，每天销量达五千余份。在一九二九年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的示威运动中，八千余份《上海报》五个小时就一销而空。此外，省委还指导各区委和工厂支部办好以工人日常生活和斗争为素材的能够启发工人觉悟、联系群众的工厂小报。省委编印的各种宣传品，在斗争中也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是，那时的宣传工作也存在较大的缺点，在罢工、示威游行中只满足于印发了多少万份传单、标语、宣言，不善于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启发工作。有些宣传品，特别是宣传大纲、宣言等，文字冗长，内容空洞，口号成串。这些都影响了宣传的效果。

## (二)省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大”决议，制定全省工作计划，并为江苏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准备，省委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各区委，外县各特委、市委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委代表共十九人，他们是：沪东区委组织委员毛春芳、沪中区委书记俞伯揆、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沪西区委书记林育英、闸北区委组织委员陈德辉、浦东区委书记王克全、吴淞区委书记霍锟镛、南京市委书记游无魂、盐淮特委组织委员吕冰心，徐州特委书记蒋云、扬州特委书记夏采晞、南通特委书记叶守信、无锡县委书记黄亦武、淞浦特委书记孙予真、共青团省委书记吴均鹤、团省委组织委员李子芬、上海总工

会党团书记徐锡根、江苏省委书记罗登贤、省委常委彭湃；此外，与会的省委常委和省委部委负责人还有李维汉、康生、蔡畅。中央的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也到会指导。扩大会议的主席团由罗登贤、吴均鹤、游无魂、徐锡根、毛春芳等五人组成。会议成立了政治任务和策略路线、组织工作、宣传工作、职工运动、妇女运动、上海工作方针、共青团工作、农民运动、全省代表大会计划等决议草案的修改委员会。《组织计划决议草案》和《上海工作方针计划决议草案》由我起草，这两个修改委员会的书记也 由我担任。会议于十九日正式开始，二十三日结束。在会议召开前的十七日晚，主席团开会，由于环境恶劣，决定会议分三个小组讨论并通过各项决议草案。我参加了第二组的讨论。十八日晚，主席团召开外县代表开会，特别解释了这次会议的意义。会议的第一天，由中央代表李立三作《党的第六次大会经过及目前政治报告》，罗登贤代表省委作副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上述各项决议。这些决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分析了全国和江苏的政治形势，指出在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和中国统治阶级的内部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是促进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江苏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中心，是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江苏人民处在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直接压迫剥削之下。“帝国主义的侵略，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城市造成了广大无产阶级”（见《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报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并促进了它们的革命化。在农村，“造成农村经济破产，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条件。”（同上）

（二）指出江苏群众斗争已开始复兴，但“工人斗争是部分的时起时伏的，还没有汇合成广大发展的局面，农民斗争虽是继续发生，但亦没有成为广大群众参加的斗争，因此，我们不可有过

分的估量。”（见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提纲》一九二九年三月）根据这种估计，会议确定江苏党仍然要遵循“六大”制定的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加紧发展工农的日常斗争，使日常的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同时要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三）确定了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的工作方针。职工运动的主要方针是加紧“发展日常斗争，鼓动革命情绪”，并“联系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见《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报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把重点放在大产业，特别是重工业中。要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发展赤色工会的组织，“利用各种名义的组织，加紧赤色工会的斗争作用”（见李维汉在闸北区组织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并注意女工、童工工作。关于农民运动，提出要注意领导自发斗争、恢复暴动失败区域的工作，既要反对畏惧斗争的右倾情绪，又要注意纠正盲动主义的残余。农村斗争要以贫雇农为主体，并建立包括富农在内的农村中极大多数的统一战线，并加紧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宣传。关于士兵运动，会议指出江苏是反动统治的中心，驻扎着强大的反动军队，党应注意发展反动军队中的士兵组织，加紧士兵中的工作。

（四）确定党的组织路线是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建立产业支部，建立和健全地方党部，使党的生活布尔塞维克化。会议认为，江苏党要努力发展工农组织，建立士兵组织，培养训练干部，深入工农群众，以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为此，党内必须克服“盲动主义残余”、“小资产阶级意识的纠纷”、“极端民主化”、“非集体的手工业式的个人指导方式”、“命令主义、委派制度”（见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一九二九年三月）等错误思想，以实现“六大”提出的政治任务。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是符合“六大”路线要求的，是基本上正确的，对江苏省委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会议过分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在全国在江苏，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比重都在日益增大，而民族改良主义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策略，“改良主义的欺骗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已有很大的发展”，“在争取群众工作中事实上已成了我们最毒辣的敌人”（见江苏省委扩大会议《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一九二九年三月）。因此，“一切群众工作都须注意反对改良主义斗争”，如果“忽视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必然要变成党之路线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见《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报告》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九日）。在扩大会议上，淮盐特委同志认为对改良主义的影响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近来发生的一些群众斗争是群众受压迫太甚而进行的退兵一战，还不是复兴的形势。会议反对淮盐特委代表的意见，认为他们的意见是革命失败情绪的一种反映。现在看来，淮盐特委同志对改良主义影响的估计是正确的，扩大会议的分析则是错误的。第一，它延续了“六大”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危险敌人的错误分析；第二，它把改良主义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策略，没有区分哪些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反映，哪些确实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第三，尤其错误的是把一切改良主义都当作敌人的反革命欺骗而加以反对，不去联合那些哪怕是暂时可以联合的各种社会势力，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

### （三）深入基层共商区委和支部工作

为了贯彻“六大”和省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我于四月初开始，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到沪西区委（与林育英等）、闸北区委（与陈德辉等）、法南区委（与李富春等）连续开会，研究区委本身和下属支部的工作和建设问题。这些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一)加强产业支部(中心支部)的工作。当时各区委都确定了一批数量不等的中心支部。中心支部的条件是：党的力量比较强，支部工作较好，工人斗争热情较高。闸北区确定的中心支部有邮务、商务印书馆、苏州河码头、电汽车、电话、海员等；沪西区确定的中心支部有电汽车四厂和五厂，同兴、振泰、中新纱厂和绢丝厂等。区委要求中心支部无论在党的生活和群众斗争中都要起核心的作用。

(二)慎重对待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党的老党员，积极发展新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党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或因消极或因被工厂开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他们并没有变节行为，其中部分人有恢复组织关系的要求。当时区委的一些同志对这部分人不大信任，不愿进行积极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在残酷的斗争面前消极畏难，当然是错误的，但他们原来受过党的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只要他们还要求继续革命，我们就应热情帮助他们，多做工作，坚定他们的信念，鼓励他们积极工作，经过严格考核后还可以重新入党。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也十分重要，在上海八十万产业工人中，当时只有八百多个党员，极不适应工作的需要。支部和党员要深入群众，主动、耐心、细致地工作，宣传党的政纲和路线，在日常斗争和生活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

(三)妥善处理失业工人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工人中的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失了业，少数失业工人为了生活，被资本家收买利用，一部分消极。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在当时也很重要，处理不好，将影响党同群众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启发工人觉悟，使他们认识到阶级压迫和失业的根子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要消灭剥削和失业，必须起来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要组织和领导失业工人起来和资本家进行必要的斗争，

争取就业，并帮助他们找工作，必要时捐款接济。

(四)确定争取黄色工会中的群众，破坏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从中央来的。它对黄色工会一概否定，总想建立与它对立的赤色工会，这是并不正确的。黄色工会一般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为国民党当局所承认，只是领导权不在我党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利用它和它的附属组织，进行各种公开活动，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人群众。对其领袖，也应根据其不同的政治态度或团结争取或给予打击，而不应一概打击。对黄色工会的总策略不应一概破坏，不应把工会招牌涂得很红，重要的是争取对黄色工会的实际领导权。实际上，在许多大工厂中党的组织薄弱，工人群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畏惧斗争的情绪相当普遍，打出赤色工会的招牌，很难争取群众。它的活动也很难公开。

会议还根据中央关于开展“五一”到“五七”纪念周活动的指示作了布置。我同区委同志就上述主要问题的讨论，对于贯彻省委扩大会议决议，起了推动作用。

#### (四)参加党的六届二中全会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央为贯彻共产国际训令，制定今后的工作方针，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我作为江苏省委的代表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今后党应该继续执行“六大”规定的“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规定争取广大群众的十项任务。其中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军阀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领导游击战争，加强兵士运动，注意青年妇女工作，扩大党的路线方针的宣传等。会议强调指出：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坚决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与建立工农红



军，“是推进革命高潮，决定全国工农最后暴动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见《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政治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会议认为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仍然是目前争取群众的主要方法，“党只有提出一切的群众的日常的痛苦来发动群众的斗争，正确的运用斗争的策略取得不断的胜利，然后才能渐次提高群众斗争的勇气，而调动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政治口号之周围”。（同上）会议所规定的上述基本任务大体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所规定的策略口号都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许多是延续了“六大”的缺点，例如：在反帝斗争中强调拥护苏联；在反对军阀战争的问题上，不知道利用矛盾，而主张“对于任何一方面都加以坚决的攻击”；在土地革命中，主张“必须坚决的反对富农”；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否认其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仍是目前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在职工运动中继续强调赤色工会与黄色工会对立等等。这些“左”的规定，对江苏省委工作中“左”的倾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 （五）省委成员的调整和群众工作的加强

六届二中全会后不久，省委成员进行了调整。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军委的彭湃、颜昌颐及中央军委的杨殷等五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罗登贤奉调离开省委，省委书记先由任弼时后由我代理；法南区委书记李富春和外县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云调省委工作。九月十二日，省常委会议上决定，由任弼时、康生、陈云、李富春和我等六人任常委。后来，中央又决定，省委会由六个常委加团省委书记和基层的电车、汽车、纱厂、金银业支部的同志，以及做妇女工作的女同志共十二人组成。当时认为这样做可以使省委同基层有较密切的联系，也有利于培养锻炼干部。为了处理工作敏捷，又将原来的六个常委改为

正式三人，候补三人，常委每天碰头研究日常工作，常委和候补常委每周开会一次，决定重大问题。我任代理书记后，组织部长由康生担任。

军委和农委的工作原由彭湃兼管。彭湃牺牲后，九月九日常委会决定军委由富春负责，成员有张天民、陈云、顾作霖和工联合会一人；农委由陈云负责，成员有周孟平、英举、赵和尚。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开展较迟，到一九二九年底蔡畅同志任妇委书记后才积极地开展工作。外县工作委员会仍由陈云兼管，下设若干巡视员，负责与六个特委和省委直属县委的联系。

新省委调整前后，为贯彻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和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加强了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的领导，使各方面的斗争都有些发展。

一九二九年六月，省委将上海的纱厂工人总工会、码头工人总工会、手工业工人总工会、店员工人总工会等同一产业系统的工会和各区的工会联合成立上海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合会”，党内称赤色工会），并领导一些行业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如五月到九月间，上海市二百五十家估衣店员一千六百余人，为支援沪西衣庄工人的斗争和改善自身待遇，举行了近一百天的罢工；七月，虹口区二十家丝厂女工一万一千余人，为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举行同盟罢工，坚持了三个月；十月，南洋烟厂七百余工人，为反对国民党通缉工人中所谓“反动嫌疑”分子举行罢工。这些罢工斗争规模较上半年大，有的带有明显的政治性。

江苏省委领导的农村斗争的范围，是外县各特委和上海的吴淞区、浦东区所属各县。省委依据“六大”规定的农村工作路线和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在南通区、徐海区、淮盐区和常州、扬州、丹阳、靖江等地建立了农会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反苛捐杂税、抗债、抗租的斗争。淞浦区领导崇明和常州、南通的农民进行抗租

斗争。农民自发的斗争也不断发生。部分地区的农民提出了土地要求。在南通、海门、泰兴和启东地区还组织了红军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战争。这是江苏省最早的一支红色武装。南通的红军游击队在春荒斗争中支持农民打土豪，分粮食，配合农民协会武装打击保甲武装，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游击区。南通东乡还进行了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一九二九年六月，如皋、泰兴两个中心县委决定将该地区的游击队统一编为“如泰工农红军”，使这个地区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省军委曾派薛衡竟去该地区加强领导。海门、启东地区的党组织，也领导农民开展了抗租、抗粮斗争，成立了地方武装赤卫队。根据这个地区斗争形势的发展，一九二九年秋，省委决定成立通海特委，指定李超时为书记，王玉文、张辛、陆克、刘瑞龙、顾臣贤等为委员，统一领导通海、如泰地区的斗争。这些，说明江苏农村的斗争形势是在向前发展。

在这期间，青年运动也有所恢复。华南大学、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浦江中学、泉漳中学等十几所大中学校都有党员或党支部。一九二八年冬，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共青团支部和共产党支部先后成立。刘焕宗(刘季平)为党支部书记，徐一冰为团支部书记。该校党支部领导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动附近农民组织“联村自卫团”。青年团的组织也有所发展。据一九二九年六月统计，上海青年团已有一百余个支部，一千余团员。南京、南通、无锡等地团员也有一定的发展。省委还领导各校成立学生会，反对国民党对学生的政治压迫。在上海，成立了青年工人联合会、青年反帝大同盟、青年革命互济会等群众团体。这些青年组织在斗争中一般都能起作用。

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一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

和青年士兵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反国民党的示威游行，而学生又是这些活动中最活跃的力量。一九二九年九月，党、团组织发动学生参加上海各界人民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追悼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桢四烈士的活动。十月，日本东京发生逮捕无辜中国学生的事件，引起国内学生的愤怒。十月二十七日，上海举行援助旅日中国学生的示威和罢课运动。在外地，如东海、南通、松江、苏州等地的中学学生也举行了罢课。此外，一些学校，还进行了维护学生切身利益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的“五一”“五三”“五四”“五九”<sup>①</sup>“五卅”“八一”<sup>②</sup>等纪念日和苏联十月革命节，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都曾组织过大小不等的公开的示威活动。“五卅”纪念活动，党内成立了由党中央、团中央、省委、团省委、上海总工会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行动。党外的群众团体成立了上海各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筹委会。印发了大量的宣传大纲和传单。三十日清晨，示威群众从各方面陆续汇集南京路两旁。十时正，一声哨响，积极分子拥上街头，一面散发传单，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等口号。少数积极分子撤退时砸了电车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馆。这天，有的区也分片组织了示威、群众大会或飞行集会。有的工厂举行了罢工或关车数小时以示纪念。这次示威的总指挥部设在南京路北侧一家大商店的后院楼上，我和恩来都在指挥部观察，恩来说要下去看看，我没有让他去，我去看了。这次活动有近百人被捕。

---

① 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袁世凯于五月九日予以承认，并签订了卖国条约。中国人民将“五九”定为“国耻日”。

② 一九一四年八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间。一九二八年六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为反对世界大战，保卫苏联，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群众在八月一日向帝国主义作总示威，并将“八一”定为“国际赤色日”。

“五卅”示威后，省委又着手筹备“八一”总示威。这次示威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党中央于六月就制定了工作计划。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同时举行示威、罢工、飞行集会，也同样成立了由党中央、团中央及省里的一些团体的负责人组成的“总行动委员会”，指挥这次示威。由于群众对“八一”国际赤色日一无所知，省委要求进行广泛的宣传。七月十四日和二十六日还进行了两次预演式的示威。“八一”当天有数千工人、学生和少数农民、士兵、冲破中外反动派的警戒封锁，在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示威游行，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上海各区也举行了罢工、飞行集会或群众大会。南京、常州也在这一天举行了示威活动。以后的一些纪念日省委也组织了示威游行。

上述的示威活动，一方面说明，江苏和上海的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激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愤，仍然保持着革命热情，经过省委的发动，敢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展斗争。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省委在工作指导上存在着“左”的错误，把“六大”提出的在客观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公开的路线简单地理解为以公开的政治口号，通过公开的群众组织，发动群众罢工、示威、游行。这样公开的结果，公开工作不是掩护了秘密工作，而是暴露了秘密工作。有一些做法更近于愚蠢，如将示威的时间、地点、公开在《上海报》上刊出，这无疑是给敌人报信，所以每次行动，几乎都有人被捕。

## (六)文化工作的开展

党的“六大”以后，一批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运动的党员，如潘汉年、成仿吾、李初梨、冯雪峰、冯乃超、朱镜我、彭康、阳翰笙、钱杏邨、夏衍、孟超、田汉、杜国庠、柯柏年、许涤新等

的党组织关系都在上海市委，归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他们大部分编在闸北区委、法南区委所属支部。一九二九年六月，党中央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潘汉年任书记，直接领导“我们社”、“太阳社”、“创造社”、“艺术剧社”、“南国社”等文艺社团的工作，并通过“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建立了联系。

这些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经营书店，编辑出版革命文艺书刊，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苏联文学作品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书籍，创办《太阳月刊》、《创造月刊》、《新思潮》等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主张。有的同志还在学校、工人夜校和工人补习班授课，通过各种途径在学生和工人中开展革命文化的普及工作。为支持工人斗争，他们在书写和印刷宣传品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九二九年春，“创造社”被查封。“太阳社”鉴于客观条件的艰难，在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后于五、六月间主动解散。在此之前，中央就曾打算联合鲁迅等人成立一个左翼文艺界的组织。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由潘汉年和省常委李富春先后向原“太阳社”和“创造社”的负责人冯雪峰、钱杏邨等传达了中央的这个意见，并研究了具体办法。经过多次磋商和积极筹备，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任党团书记是冯雪峰。接着又陆续成立了“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等左翼文化组织。一九三〇年六月组成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为上述左翼文艺组织的总机关。几个左翼文艺团体成立后，他们的工作完全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省委就不再兼管这方面的工作了。

### （七）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在党内开展

了反托派(亦称取消派)的斗争。中国党内开展反托派斗争,同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反对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前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部分中国留学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政治观点,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组织,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被开除出联共(布)党后,在联共党内开展了肃清托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二八年秋和一九二九年,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先后被遣送回国,他们开始在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建立中国托派组织。当时国内的托派组织有:梁干乔、张特、区芳等组织的“我们的话社”;刘仁静、王文元、宋蓬春等组织的“十月社”;刘胤、王平一等组织的“战斗社”。他们出版刊物,宣传托派理论。一九二九年五月,陈独秀和在上海工作的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接受托派的理论和主张,反对党中央和“六大”制定的路线,否定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公开打出托派反对派的旗号。九月,陈独秀同彭述之等组织了人数最多、影响较大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后来的“无产者社”),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封建势力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还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主张以“召开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等等,其实质是取消革命,故被称为托陈取消派,或称反对派。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三日,党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托派问题》的第四十四号通告后,在党内全面开展了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针对陈独秀等人分裂党的非组织活动,中央在同年十月十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揭露和批

判陈独秀等反对中央路线，进行小组织活动的错误。陈独秀拒绝接受党的批评，坚持错误，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将他开除出党。

当时，在上海党内活动频繁的托派分子有闸北区委第二街道支部的彭述之、汪泽楷，沪东区委的马玉夫，沪中区委的蔡振德等，他们与陈独秀的观点完全一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一日，省委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并报党中央批准。十二月，省委又将郑超麟、李季、尹宽、刘伯庄等开除出党。

### (八)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当江苏省和上海市的各项群众运动和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日益发展和取得不断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六日，江苏省委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二次全省党代表大会，贯彻共产国际和六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三十七人，都是上海各区、特委和市、县委以及省委的主要负责人。我记得有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徐锡根、上海工联会委员长徐炳根、上海市沪中区书记何孟雄、沪中区委员吴国治、沪西区书记游无魂、闸北区书记王克全、法南区书记陈德辉、沪东区常委顾作霖、徐海特委书记陈资平、通海特委常委刘瑞龙、南京市委书记夏采晞、上海革命互济会主任王弼、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孟济平、沪宁线党的负责人管文蔚、中学生代表惠浴宇，还有做妇女工作的蔡畅、徐大妹、苏雪华等。省委代表三人：我、富春、康生。恩来和立三代表中央参加会议指导，他们分别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和中央组织问题报告。大会主席团由周恩来、徐锡根、康生、王克全、吴国治、孟济平、徐炳根、陈资平、顾作霖和我组成，由我担任主席团主席，王克全担任主席团秘书长。



会议由我主持。会前，我同陈云商讨后，由我执笔起草了《江苏政治状况与党的任务和策略》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我抽出几个主要问题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副报告。康生、陈云、徐锡根也分别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关于江苏省组织问题、农民运动和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青年团运动及对青年团工作、武装保护苏联、反对党内取消主义与取消派等决议案，还发表了宣言和致中国工农红军书。

大会选出新省委委员十七人，候补委员九人；审查委员三人，候补委员二人。李富春、康生、徐锡根和我为省委常委，陈云和王克全为候补常委。新省委的分工是：我为省委书记，富春为宣传部长兼军委书记，康生为组织部长，陈云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徐锡根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王克全参加组织部工作。十一月二十七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组建职工运动委员会，徐炳根为委员长，徐锡根为党团书记，胡光明任组织部长，金鳌任宣传部长。

会议肯定了十个月以来省委工作的成绩：(1)群众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表现在：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十月，上海共罢工一百零九次，参加者有六万多人；五月至十月，无锡、南通、常州共罢工二十次。农民斗争日益扩大，抗租、抗税斗争不断发生，有的开始走上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道路。学生、妇女、士兵等工作也有一定的成绩。(2)党的组织有一定的发展，全省党员六千八百人，其中工人党员一千二百人；党员质量有所提高，产业支部有所加强。(3)开展了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

这次会议在政治形势的分析和今后工作方针上，存有不少问题。例如：(一)过高估计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认为国内政治形势是“革命危机日益加紧，统治阶级正在日益崩溃”。

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是马上就要爆发之震撼世界之巨变”，要求江苏省全体党员“用尽一切力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实行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力争中国革命的胜利，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对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仍根据中央的观点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是豪绅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农都已变成了反革命，应予坚决的打击或排斥。（三）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把农民运动的重点放在中心城市周围和铁路沿线附近，把游击战争看作是城市武装暴动的一种准备。（四）否定城市工作在战略上应取防御的方针，反对一切改良，不顾条件的追求政治罢工和示威运动。

会议期间，何孟雄等少数代表对中央和省委的报告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中央和省委对革命形势作了夸大的分析，革命刚刚开始复兴，但极不平衡，还不是“成熟的复兴”。党的策略应该是“准备进攻的路线”，而不是“直接进攻的路线”。对于李立三在报告中否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的观点，一些代表也提出批评。徐海特委代表陈资平提出“西北群众痛苦万分，每天饿死几万人”，这样易于爆发革命的客观条件，“如何没有革命高潮”发生？就是因为“没有群众的自觉力”。有的代表虽然同意大会制定的“进攻路线”，但又提出不能一味的不停顿的进攻，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有的代表还反对不顾客观和主观条件是否具备，遇有纪念节日，一概组织政治示威的做法，认为“过去为示威而工作，忽略日常工作”，“放弃日常斗争”，结果脱离了群众。现在看来，当时许多代表指出中央和省委在政治路线上存在这些问题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中央和省委却并未认识。会上，立三和我同孟雄等同志发生了争执，我们认为孟雄等“右倾”，执行

党的路线不坚决，公开指名批评孟雄是“调和主义”“调和路线”。立三更把孟雄的正确观点同取消派的错误观点对比地加以批判，简单粗暴地迫使孟雄在组织上“服从结论”。

大会的缺点，主要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近一年来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中央的观点。一九二八年八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从一九二八年起已进入“第三时期”的理论，“资本主义稳定进一步瓦解”“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必然会引起一个新的冲突的时期”，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苏联的战争”时期，“也就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提纲）一九二九年五月，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国民党政府用武力强行接管由中苏双方共同管理的中东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开赴绥芬河，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发动群众，支持苏联。国际认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在中国已经成熟。事实上，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是不正确的，而中国党却完全接受国际的观点，不断作出决议要各级党组织努力贯彻。江苏省委也不例外地贯彻执行了。

省“二大”闭幕后，我于十二月四日向上海各区委书记、委员和各群众团体主要负责人传达了会议精神。十二月二十三日，省委发出关于组织同盟罢工的通告和计划大纲。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省委作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决议及中央通告六十二号——接受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加强组织同盟罢工和政治罢工；加紧发展赤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等。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每逢纪念日或遇有工厂罢工和其他活动时，差不多都要按照上述决议的精神组织示威活动。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三日沪西区美国资本家经营的安迪生灯泡厂一千多工人，为反对国民党军警枪杀工人举行罢工。十五日，中央发出通告，要求“以灯泡厂惨案为中心”，“结合目前迫切任务——反军阀战争，武装保护苏联与准备武装暴动”举行示威。同日，我召开上海各区委书记、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决定十九日举行总示威。这次行动，只有同兴纱厂实现了罢工，参加示威的群众一千多人，示威的结果是数十人被捕。但省委并未从这次行动中接受教训，又要求各区委书记“抓住阴历年关的斗争”和“二七”纪念周，继续组织罢工，并接着布置纪念“三八”的示威活动。“三八”这一天，全上海只发动了一千四百余人参加示威游行，有二十人被捕。

一九三〇年二月间，在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上海左翼文化界人士，为争自由，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本来，争自由运动是符合争取公开和利用合法斗争的策略的，但当时从中央到省委，总想把本来是或应该是有广泛群众性的团体，涂上很红的色彩，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革命。当时省委号召党员、赤色工会会员和进步学生加入自由大同盟，“使小资产阶级自由运动，变成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争自由运动”，以汇合成准备全国总暴动的政治斗争。结果使可以合法存在、公开活动的群众组织也很难存在和活动。自由大同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下，不久即停止活动。

在这期间，江苏省的一些县、市的工人所进行的小的经济斗争，只要不是以同盟罢工为着眼点的，大部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胜利。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初，南京市浦镇大厂工人包围机务处处长，要求发还被扣的十一月份工资，取得了胜利。一九三〇年初，南京市龙潭水泥厂工人罢工，要求厂方抚恤被机器轧死的工人，发年关双薪和工人请假不得克扣工资，取得部分胜利。无锡

市成衣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经调解签订协定，也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从省“二大”后，我们天天喊组织同盟罢工，政治罢工，却总不能形成同盟罢工的形势，更达不到政治罢工的目的，斗争屡遭失败，党员数量下降，法南区由二百二十人减少到一百五十人，沪中区由一百多人减少到九十人，吴松区则只有三十人。当时，全上海的党员最多不过一千人，其中还有些不坚定分子。赤色工会会员人数也下降了，沪西区原有三百人，减少到一百人。群众斗争情绪也日益消沉。但上述两个方面的事实，并没有使省委从政治路线上去总结经验教训。

在这期间，上海区委以及一些基层干部和党员，由于在实际斗争中遭到种种失败和挫折，对中央和省委的路线及政策产生不满或怀疑，对斗争策略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由于群众力量薄弱，不少群众因害怕被开除、被捕而不敢起来斗争，因此应进行日常小的斗争，不能盲目、持续地坚持罢工；罢工时提出的条件不宜过多过高；示威运动也不宜搞得太多，以致损失太大。对于这些合理意见，省委、区委都不加区别地扣上“取消同盟罢工路线”，“怯懦的机会主义观点，害怕斗争”等等帽子，给予批判或处分。这样，就更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央对黄色工会和赤色工会的策略更加“左”倾。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省委向上海各区委书记、党团书记传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职工运动的决议和中央接受国际决议的六十二号通告。主要精神是要以赤色工会代替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批评“过去只提出打倒黄色领袖，不反对黄色工会”的策略是“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事实上，工会应该是广泛群众性的组织，应该尽量吸收工人参加，利用合法的条件，公开进行活动，人为地制造赤、黄对立是错误的。当时，省委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入黄色工会，其目的不是为了利用这一合法组织来进行公开

的斗争，而是要打倒它、消灭它，以赤色工会取而代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赤色工会把自己的面貌涂得如此之红，就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存在的条件。其结果是赤色工会愈来愈脱离群众，会员愈来愈少。

省“二大”以后，通（南通）海（海门）如（如皋）泰（泰兴）地区的游击战争有了新的发展，开辟了通海、如泰两个游击区，并开始进行了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约在一九二九年冬，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省军委将如泰地区和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省委先后派何昆、徐德、黄火青等熟悉军事的干部到苏北，加强部队工作。不久组建成红十四军军部，何昆为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政委，薛衡竟为参谋长，余乃诚为政治部主任。徐德、黄火青分别为如泰和通海区的军事特派员。军部成立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整顿了部队。一九三〇年二月，通海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编为工农红军江苏第一支队，刘廷杰为队长，后改为二师，秦超为师长，陈雪生为政治部主任；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工农红军江苏第二支队，后改为一师，何昆兼师长，黎时中为政委。四月底，红十四军启东大队成立。经过整编后的红十四军约有二千余人，几百条枪，这对南京、上海的反动势力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是革命的宝贵力量。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和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红十四军连续冒险攻打敌人地方武装，因敌众我寡而失败。四月中旬，红十四军一师，以及赤卫队和革命群众万余人，分三路围攻如皋西南的老虎庄，军长何昆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四月下旬，红十四军又围攻泰兴东北的顾高庄，参谋长薛衡竟负重伤后牺牲。五月，红十四军二师及群众万余人，进攻通海边境的反动道会门——白龙党的老巢汤家沟，打死地主和反动武装六、七十人，打击了白龙党的反动气焰，但师长秦超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此后，通海特

委和红十四军军部，继续实行“左”的冒险行动，使幼小的红十四军不断受到损失。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爆发了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阀混战，全国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红军发展到近十万人，建立了十几块大小不等的革命根据地。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在这一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党内的“左”倾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第七十号通告《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认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前途，特别是武汉及其邻近的省区表现着更多的可能”；党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的到来”，“要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求各级党组织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组织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组织兵变。三月，李立三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他在文章中除阐述通告的思想外，还形象地表述了“城市中心论”的思想。他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制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三月下旬，中央又连续发出通告，要各地党组织开展“红五月”运动。

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三月下旬，成立了纪念“五一”的总行动委员会，各区成立了区行委会，支部成立了干事会，群众团体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省委还成立了由我、石心、朱瑞、潘汉年、王弼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示威时如何组织群众占领马路等技术问题。上海的“红五月”运动是在李立三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三月底到四月底，李立三多次在上海各区书记和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反复宣传他

的“左”倾观点，动员准备“五一”总示威。四月八日，省委在北京大戏院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一次筹备代表大会，散会时被武装巡捕包围，百余人被捕。二十日，上海各区工人纠察队近四百人，在杨树浦临青路一带公开举行检阅大会，遭到敌人冲击，许多人被捕。二十七日，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第二次筹备代表大会，二百多人被捕。“五一”那天，上海有一万多群众拥到南京路，占领马路，阻拦电车、示威游行，遭到早有准备的中外军警巡捕的冲击，被捕多人。南通、如皋、邳县党组织也发动群众集会示威。南京、无锡因党组织遭到破坏未能发动。“五卅”这天，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再度组织上海群众示威游行，群众队伍冲到外滩，包围了英国领事馆，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一位纠察队长牺牲。此外，还有四月份的上海公共汽车公司与英商电车公司的罢工，虽坚持二十余天，但最后失败。南京和记蛋厂的工人罢工，也遭到反动军警、英国水兵的殴打，结果千余人受伤。多次的挫折，使我的思想也开始动摇，觉得这些做法值得研究。“五卅”当天下午我去见立三，我还未作申述，他就批评我说：情况都知道了，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立三还嫌我们右，干得不好。

半年来，江苏省委，特别是上海党领导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很少取得胜利。这种冒险主义的行动暴露了自己，损失了力量，干部情绪消沉，群众产生严重的恐惧心理。由于工作难以推动，各级领导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一言堂等坏作风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的除李立三外，还有周恩来、向忠发、项英等。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工人出身，理论水平不高，缺乏独立见解，项英负责职工运动和长江局的工作，政治局的决策人实际上是恩来和立三。而恩来出国前和立三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如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和组织各地暴动等



问题就有争论。三月，恩来赴莫斯科参加联共(布)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

###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江苏的贯彻

#### (一)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

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向忠发、李立三、关向应、项英等。温裕成和我列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个决议是立三“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志。它夸大中国革命客观的有利形势和主观力量，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主张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它还夸大世界革命的有利形势，认为中国革命的爆发，将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的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这次政治局会议后，中央即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这个决议之前，政治局在六月九日曾开会讨论决议草案。立三在这次会议上对决议草案作了长篇的解释发言。他在会上点名批评毛泽东，说毛泽东“有整个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

战争的观念”。认为“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时的需要的”，“游击战争的秘诀”就是“逃、跑、走”，是“乘虚进攻敌人”。他强调现在的红军“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见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六月九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在六月十一日政治局的会上，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中心，只要上海胜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见李维汉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六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呈报了上述决议，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并动员各国共产党支援中国革命。当时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对这个决议的几个具体问题有不同看法，因而反对下发这个决议。

李立三对罗伯特非常不满，说他右倾，妨害中国党的领导工作。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求将罗伯特撤走。李立三在未接到国际指示的情况下，于七月十三日又召开政治局会议，布置南京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要求全国配合。七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又电共产国际，要求批准上述武装暴动和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计划，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信中特别要求联共“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中央为贯彻上述计划，成立了北方局（贺昌任书记）、长江局（任弼时任书记）、南方局（李富春任书记）和江苏总行委（李立三任书记）。我任江苏总行委的组织部长，总行委成员还有顾颉章、吴振鹏、徐锡根。立三之所以要亲自兼任书记，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江苏省委还“左”得不够，对我能否坚决执行他的政策不大放心。七月二十七日，红三军团乘虚攻占长沙，李立三被这一突如其来的胜利

冲昏了头脑，错误地认为目前形势已到了“历史上伟大事变的前夜”，要求全国各大城市“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七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收到共产国际的复电，要中共中央停止下达六月十一日的决议。立三等人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认为国际不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是受周恩来的“右倾”观点所左右。他于八月一日和三日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部署全国暴动的工作。八月一日的会议决定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委，为各地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中央总行委的委员有十四人，即李立三、邓中夏、吴振鹏、陆定一、刘伯坚、徐锡根、向忠发、李维汉、王克全、余飞、陈郁、袁炳辉、罗章龙、潘问友。总行委的主席团为向忠发、李立三、徐锡根和袁炳辉。八月十九日总行委又扩大为二十二二人，加入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关向应、罗登贤、贺昌、温裕成。主席团扩大为七人，加入周恩来、瞿秋白（当时，恩来、秋白均尚在莫斯科）、顾顺章。政治局八月三日的会议又进一步具体研究了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计划。立三的设想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的爆发，将引起全国总暴动的发生，届时苏联和蒙古可以出兵，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支持中国革命。这样一来，“日帝国主义必很迅速地向苏联进攻”，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会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这是一个十足的主观臆想。会上，李立三、向忠发等人还错误地批评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的恩来右倾，指责他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没有将中国革命速度和群众运动高潮的经济基础说明”。随后，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并组织其他各路红军向武汉推进，以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

## (二)省委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 各项工作部署

七月九日，省委召集上海各区常委联席会议，贯彻六月十一日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会议决定积极准备上海、南京武装暴动，并加紧无锡、苏州、常州等城市和沪宁线、淞浦附近各县农村的工作，以配合南京、上海的暴动。同时要求扩大通海的红十四军，并在沪宁、徐海两区加紧建立新的红军，以南京、上海为总目标，进攻中心城市。为了实现以上要求，省委在纱厂、市政、铁路组织了行动委员会，并“将（沪）东、（法）南、（沪）西、（闸）北四个区委分成八个区委”，将“手工业、店员、学校、自由职业者，编成马路支部”。

此后，省委即连续召开区委书记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具体讨论暴动计划和措施。

在上海，省委于七月领导了英商老怡和纱厂工人为要求取消三日调班制（一星期只给三天工钱），工人举行罢工不得无故开除。老怡和厂的罢工委员会曾同申新、三新等纱厂联络试图发动同盟罢工，并领导工人打电车、打汽车，到马路上示威。当时日华、恒丰、内外棉八厂、九厂曾经响应，上海纱厂总工会也发出总同盟罢工的号召，并准备于八一举行示威。但是这些罢工，由于缺乏群众基础，遭到国民党的镇压，都失败了。同盟罢工没有实现，一些积极分子遭到逮捕。七月十六日，根据中央指示，省委组织了上海工人、学生为反对军阀混战与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游行示威；七月二十七日，红军占领长沙后，省委组织了“八一”示威。九月七日，又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白色恐怖大示威。这些示威，每次都差不多有积极分子被捕。

当时也有取得胜利的罢工，如一九三〇年六月十八日到八月

十三日，上海法商水电公司工人为要求八小时工作和增加工资所举行的罢工，就是一个例子。这次罢工之所以取得胜利，恰恰是罢工的领导人没有执行省委“左”的方针，而是实行了比较符合实际的策略的结果。法电工会的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徐阿梅，他在一九三〇年红五月运动中，认为时机不成熟，没有执行省委、区委的罢工命令而被开除党籍。六月，公司机务部工人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资方态度强硬，国民党社会局插手调解，资方仍不予理睬。徐阿梅等利用国民党同法商的矛盾，发动机务部工人罢工，使法租界内一度断电，自来水供应也很紧张。七月下旬又发生了“马浪路血案”，巡捕开枪打伤罢工工人三十余人，捕去二十余人，激起工人和社会的公愤。徐阿梅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群众的情绪，团结公司其他各部工人和职员共一千六百余人一致罢工，争取了社会的广泛同情，最后资方被迫答应条件，罢工取得胜利。对于这次罢工，上海工会联合会虽然也组织了“后援会”声援，但只是高喊举行总同盟罢工，实现“八一”示威等空洞的口号，而法电工人罢工的胜利却恰恰不是在这些空洞口号的号召下取得的。当时省委领导并未从这件事中取得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徐阿梅是“黄色工贼”，还说不能过分估计黄色工会领袖的作用，甚至提出驱逐黄色领袖，推翻黄色工会等口号。但省委的同志却不得不承认法电的“整个路线是随着徐阿梅跑”，“工联会的同志都去找徐阿梅，希望经过他来组织群众”，可见人心所向了。

在农村，江苏省委曾抽调干部加强沪宁线和淞浦附近各县的工作，同时部署了徐海、南通两地区的地方暴动。但只有少数地方如宿县、淮涟、南汇的泥城有过少数人军事冒险的暴动，大部分地方并没有搞起来。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日南汇县的泥城暴动，仅有两枝枪，七、八个人，还成立了红十八军；淮涟只有十几个人也去攻城，结果都失败了。

对红十四军，省委和通海特委提出，为了配合南京暴动，“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地。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共南通特委召集如泰地区红军联席会议，决定在黄桥实行“总暴动”。会议认为，这是“江北革命政权与反革命政权的最后决战”，并成立了暴动委员会作为统一指挥的机构。八月三日，红军主力部队由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和省委特派员徐德两人指挥，在当地农民的配合下，进攻黄桥，同时分兵佯攻古溪、蒋垛、季家市、卢庄等据点。但因内奸通敌，部队受到意外的袭击，不得不撤出战斗。结果，红十四军在敌“协剿”下被打散。

关于南京兵暴问题。李立三竭力夸大敌军的弱点和我党在敌军中的力量，认为“现在军阀军队极端动摇，到处哗变”，“党在军阀军队中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飞速扩大，现在镇江驻军主要部队完全在我们的领导之下，特别是十余万伤兵热烈要求党的领导”。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省委认为仅仅组织士兵哗变，已经不够了，要组织士兵暴动，夺取政权，甚至把本来可能组织成功的一部分兵变也停止了。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抓紧发动南京兵暴。李立三命令曾中生领导的学兵营举行起义，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曾中生曾反映，仅以学兵营的兵力占领南京，根本是不可能的。我在省委也提出士兵暴动后把队伍拉走，改编为红军，到农村去发展土地革命的意见。李立三批评这些都是右倾。所以兵暴工作一开始就采取公开发动群众的办法，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致使地下党暴露，结果从六月到十月，宪兵连、军官团、学兵营等国民党士兵支部的党员，因组织兵暴而暴露，遭到秘密杀害的至少有四十人。南京市委机关也因而两次遭到搜查，全市被敌人逮捕的党员有一百多人，使南京党组织受到大破坏。南京兵暴的计划终成泡影。

此外，党在学生中也进行了一定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反帝反军阀，以及争取读书、思想、言论自由的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总的路线和政策错误，也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

几个月来，江苏省委积极贯彻执行立三路线，使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上海、南京等城市的一些党组织和赤色工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一些优秀党员和积极分子遭敌人杀害。仅据全国互济会调查，在四月至九月的半年中，江苏被国民党杀害的党员和群众三千一百三十人，一千四百八十人被捕。

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连觉也顾不得睡地昼夜工作。后来，因为工作推不动，罢工刚一起来就失败，同盟罢工、总同盟罢工又实现不了，武装暴动更是渺茫，使我开始怀疑立三的一些做法。八月初，我向李立三汇报江苏和上海的情况后说：看来，上海暴动搞不起来了。要举行全国暴动，这样大的事，是否应向共产国际请示？恩来在莫斯科，是否让恩来去请示一下？立三听了我的话很生气，他说，红军已打下了长沙，攻下武汉没有问题。并说，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高潮已经形成，打下九江、南京后可以会师武汉。现在就看你们江苏的了，看你们能不能砍下蒋介石统治的“头”了。他还讲，等打下武汉，中国革命胜利了，再同共产国际讲话。当时政治局开会的记录都要送共产国际和远东局驻中国的代表，所以李立三的话，国际都是知道的。由于在实践中碰了钉子，李立三又不听我的意见，我开始消极了。

### （三）党内同志对立三路线的抵制

当时，党内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也都对立三提出过不

同意见，但立三一意孤行。如当时党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之一的恽代英，由于反对立三的冒险主义做法，被立三扣上“调和主义”帽子，排斥出中央机关，调到上海沪西当区委书记，随即被捕，后来英勇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在江苏省委、苏准会办事处、互济总会党团中，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干部都是较早起来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他们都遭到李立三的压制和打击，被扣上“调和派”、“取消派”、“右倾势力”等帽子，以至受到组织处理。何孟雄当时是江苏省委候补委员、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他几次批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特别是在九月一日召开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中央政治局的“左”倾错误。李立三当即制止他发言，并组织对他的批判，何孟雄坚持原则，没有屈服。九月八日，孟雄向总行委和中央政治局写了《政治意见书》，系统阐述了他的意见，明确提出反对“立三同志领导路线”。结果，孟雄被立三指斥为“取消派暗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和沪中区委书记职务，降为江苏省委干事。其他支持何孟雄的同志也都遭到打击。

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到处碰壁，引起党内越来越多的同志的不满，同时共产国际也不赞成李立三的做法，从而促进了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四）关于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问题

立三路线的产生，是受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一些“左”的的理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来信的影响，但是共产国际在武装暴动的时机、条件等问题上同立三路线又有分歧，觉得立三走得太远，对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的具体计划提出过批评。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



治秘书处任瞿秋白、周恩来参加下，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批评了立三对革命形势所作的不正确估量，指出立三在若干问题上所犯的一些策略上的错误。国际的这个决议对于停止立三“左”倾错误的执行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际在正确指出立三错误的同时，又认为“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因为从顺利执行摆在党面前的任务方面看来，右倾仍是主要的危险”。（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见一九三〇年十月三日《实话》）国际对中国党内斗争的这种分析，为后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根苗。

八月下旬，周恩来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先后回到上海。恩来带回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的决议。他们负有回国贯彻国际七月决议的任务。秋白和恩来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两次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对于形势的看法。随后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开始纠正立三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一九三〇年九月四日，中央发出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九月八日，中央发出接受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七月决议的指示，决定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些主要错误，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已经开始纠正。

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于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共三十六人，其中中央委员有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等十四人，中央审查委员二人，还有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青年团、全总党团的代表二十人，我和李富春、陈云、王克全作为江南省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

国际七月二十三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向忠发向会议作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李立三作了检查发言；瞿秋白作了《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周恩来和项英还分别作了组织问题和职工运动的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国际东方部一九三〇年八月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

周恩来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新高潮已无可怀疑，但在今天，中国工农的力量尚未能聚集起来袭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恩来认为这时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不平衡的原因“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裂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的发展还保有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动有先后，革命经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恩来指出，立三是“将前途的某一可能”“作为今日要做的根据”，从而在革命发展的速度与程度上发生了过分的不正确的估量，导致了冒险主义错误的发生。

全会根据国际决议和恩来的报告，作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决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立三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冒险错误，但仍然认为它仅是策略性质的错误，而不是路线错误。全会肯定前一段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并且仍然把右倾看作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加以反对。这说明，三中全会对于立三错误的实质认识并不清楚，没有超出国际决议的认识水平。

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并承担了责任，对自己和中央政治局几个月中所犯的错误作了检查。立三的自我批评，

虽然对其错误所造成的实际危害揭露得很少，在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上仍然坚持城市中心和城市暴动的观点，但他检查错误的态度是严肃诚恳的，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责任，并有改正的决心。全会以后，立三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一九三〇年十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指示信，对立三的批评调子突然变了：1. 批评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认为“他所犯的错误，并不只是个别的错误，而是造成了整个错误观点的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2. 认为立三路线“是与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所共同制定的路线对立的”，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随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进一步批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在中国党内又发起了一场反对所谓调和主义的斗争。

三中全会虽然结束了立三以冒险主义为其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没有能从思想实质上真正分清是非，清除其“左”的路线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当时，我们党的状况虽然较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了重大进步，但是，政治上还不成熟。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对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仍然缺乏深刻认识。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并没有指出它的真正不足，还完全否定了三中全会在纠正立三错误上的积极作用。这个批评并不公正，因为三中全会完全是根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的精神召开的，没有一点违背这个决议精神的地方。此时共产国际为什么改变了对立三错误性质的批判调子，提出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呢？这是因为：第一，六月十一日决议通过后，立三多次对抗共产国际关于停发六月十一日决议和制止武装暴动的计划的指示；第二，立三在八月一日、三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讲了一些不尊重共产国际的话，如说“等占领武汉

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还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等等，这对有权指挥各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不容许的，因此认为立三是反共产国际；第三，对三中全会的主持者瞿秋白不满。瞿秋白于党的“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驻在莫斯科。他在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中的派别斗争问题时，因不同意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的王明等少数人的宗派活动，引起米夫等的不满。一九三〇年春瞿被撤销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由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又违背共产国际的原意，把他选进了中央政治局，这也是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特别是它的主持者瞿秋白的一个因素。这年冬，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工作，他直接插手中国党内的斗争，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共产国际的十月指示信，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才收到。中央在共产国际和党内一部分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同志的压力下，承认了“调和主义”错误。中央政治局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开扩大会议，二十五日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完全接受了国际来信的批评。

十二月一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立三路线问题的报告。他回顾了八月份以来执行国际路线的经过；估价了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中央工作的功过；着重分析了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左”倾机会主义实质，以及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的严重影响；还论述了立三错误能够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统治的社会根源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准备召集紧急会议，同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同志书——为反对、肃清立三同志路线的问题》。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这三个文件都强调要通过新的决议，以代替三中全会的决议。这实际上为后来召开新的

中央全会作了舆论准备。

### (五)改组省委，贯彻三中全会决议

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改组为江南省委（管辖浙江、安徽、江苏），十月五日，省常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的有我、陈云、王克全、夏曦、顾作霖、沈先定、李求实、吴振鹏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和贯彻三中全会决议，通过了《江南党的任务和策略决议案——接受国际指示与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之决议和精神》。同三中全会一样，这个决议的总精神也仍然是强调集中力量反对右倾思想，这就一面检查又一面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南省委又进行部分改组，我即离开了江南省委，准备去莫斯科学习。改组后的省委常委成员是：王克全（代理书记）、何孟雄、夏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

江南省委的改组，因没有实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要安排王明等的意图，受到米夫的干涉而很快流产，省委工作陷于瘫痪。后来在米夫的操纵下，中央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决定委派王明担任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任团中央宣传部长，这就为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 四、经验教训

上面我简要回顾了巡视江苏省委和担任省委领导工作期间的情况。下面，就这两年多江苏省委的工作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这两年多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即前期，从党的“六大”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第二段，即后期，从一九三〇年六月立三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以后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前。前期，省委贯彻了“六大”制定的争取广大群众准备

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工作取得相当成绩，表现在：江苏党和群众的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工、农、青年运动逐步复兴；省委做了许多争取文化界的工作，开展了革命文化运动。虽然在前期的后一段时间，即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中“左”的倾向有所发展，如开始过高估计革命形势发展的有利条件，频繁组织纪念节日的示威运动，但总的还是贯彻了“六大”的路线的。后期，中央和省委实际上否定了“六大”争取群众的路线，把发动城市武装暴动作为行动口号，使江苏成为贯彻冒险主义的一个很积极的省区。

省委领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曲折呢？我考虑主要是因为“六大”决议具有两重性，它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正确的一面。省委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是执行“六大”正确方面的结果；省委所犯的“左”倾错误，则是执行和发展“六大”错误方面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1. 自党建立以来，就存在着照搬苏联十月革命经验，走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的传统观念。大革命时期，北伐军主要攻击和占领的是城市，走的是这条道路。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是中央没有认识这个变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六大”对于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认识不清。“六大”决议，只是说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任务是争取广大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准备暴动。它所讲的“准备暴动”，实际上是准备城市武装暴动。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中国时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如果我们党能够正确估计和利用这一形势，本来可以大大发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者的党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夸大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反动统治的危机，认为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已进入直接革命的形势，照搬苏联十月

革命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进攻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冒险计划。他的计划，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没有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如毛泽东、方志敏等同志那样，向农村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继续放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强大的城市，以弱我进攻强敌。“六大”以后，省委整个工作布置，重点都放在城市，甚至把农村工作的中心地区也选择在沪宁线和上海邻县，这是很不符合实际的愚蠢做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城市的反革命统治比较强，而江苏又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区域，其统治力量就更为强大，革命要在上海、南京这样的城市首先发动并取得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同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虽然都是城市中心论，但二者也有区别。秋白主要是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绪，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立三则更加突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他虽然也主张发展农村革命，发展红军，但其着眼点是配合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所以，城市中心论是产生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对此不应苛求，应当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认识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需要实践，需要有一个过程。要求“六大”对于中国革命的道路认识得那么清楚，是不实际的。

2. 党的“五大”，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对象，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六大”继续“五大”的观点，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甚至将第三党这样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民主力量，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加以反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敌人，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是革命团结、争取对象。尽管它

当时已附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但它们之间仍有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在分化，是可以和应该争取的。“六大”提出反对中间阶级是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是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对于富农，“六大”制定了中立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斗争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党的“六大”决议犯了“联合富农”的错误，因而指示中国党必须执行反富农的政策。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省“二大”接受了这一方针。这样，就在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对待富农这样涉及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上，犯了根本性的“左”的错误。

3. 党的“六大”，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六大”对“左”倾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未能从思想上肃清其影响，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在“六大”以后又滋长起来。托陈取消派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否认武装斗争的道路，批判他们取消主义的反动观点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应该把托陈取消派同一般党员因白色恐怖严重而产生的消极畏难的右倾情绪加以区别；应该把托陈取消派同党内部分同志对中央和省委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加以区别。然而中央和省委却混淆了以上的两个区别，扩大了打击面，不仅使部分同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分，而且使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掩盖了中央和省委的“左”倾思想，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

此外，李立三几个人也有问题。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又不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



一般的、局部的经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对组织示威游行，“红五月”运动等，他是非常欣赏的。经验主义是他的一个致命伤。立三的另一问题，是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他是建党初期的党员，领导工人运动有经验、有贡献，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盲目地骄傲起来。他的独断专横的作风是很严重的，不肯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就是共产国际也不在他的眼里。

我在江苏工作的这两年多时间，既执行了国际和中央指示的正确方面，也执行了国际和中央指示的错误方面，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存在着盲目性，无论是正确或错误，只要是中央决定的，我都坚决执行，特别是在组织上，是绝对服从。我之所以犯“左”的错误，更重要的还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足。我从法国回国之后，就投入了繁忙的革命工作，没有时间读书。由于缺乏理论，也就谈不上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了。

尽管江苏省委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后期犯了“左”倾错误，使革命力量受到损失，但江苏党、团组织并没有垮，这同后来的王明路线使整个白区党的组织遭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的情况是不同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江苏的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及省委领导班子，在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和英勇牺牲精神，却是可歌可泣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为首的少数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扶持下，取得党中央领导权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什么积极意义，而且把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到更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去。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又看了一些材料，深感这次会议前后党内斗争错综复杂，经验教训也很深刻，很有研究的必要。

### 四中全会的召开和王明的上台

一九三〇年九月由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进行的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调子对李立三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批判的。三中全会对于停止立三的“左”倾错误起了积极作用，是有贡献的。当然，批评的还很不够，不彻底。后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说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批评三中全会对立三的错误采取了所谓调和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后来被王明的小宗派利用了。

王明等少数人，是米夫培植起来的宗派。王明这个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就认识他。一九二五年秋天，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党派了一些青年到那里去读书，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党青年，王明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到中山大学去学习的。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在学习期间得到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一九二七

年初，共产国际代表团（米夫在内）到中国工作时，由他当翻译。那时，我在武汉同俄国顾问谈话时，也由他当翻译。大革命失败后，米夫返回苏联，他也跟着回去了。后来，成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

一九二九年四月，王明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委做过一段宣传工作，后来又中央宣传部担任《红旗》报的编辑。我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经常到上海各区委出席会议，见到他参加过沪东区委。一次区委在讨论支部工作，谈到有些党员不缴纳党费时，我说：党员应该缴纳党费，要进行教育。他写了个条子给我，说党员不但要缴党费，还要做工作。我没有理他，因为我谈的只是交党费问题，没有谈别的。王明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态度，在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到达中国以前，总的是拥护的，有些“左”倾观点也是同李立三一致的。王明回国不久，一些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也陆续回国。王明得知共产国际批评三中全会的消息后，便在中山大学回国学生中互相串连，积极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十一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收到了十月来信。十一月中旬，他和博古连续写信给党中央，批判三中全会继续立三路线，公然要求中央撤销对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和对博古等人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公开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抛出《两条路线》（即后来改名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煽动党员反对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要求彻底改造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补充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国际十月来信，并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十二月一日，恩来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同时也指出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当时中央一再对他们让步，还是不行，分配工作他

们也不干，硬要召开紧急会议。有一次政治局开会，我主张跟他们进行斗争。我说，他们不象话，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还闹，分配工作还不干，党中央开的会还不行，还要开紧急会议。这个时候中央很软，他们很硬。他们为什么很硬？后来才知道他们有米夫作后台。

十二月中旬，米夫突然来到中国，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取消了对王明、博古等四人的处分，并委派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习惯仍称江苏省委）书记，博古任团中央宣传部长，这为他们取得中央领导权作了准备。后来，中央又发了第九十六号通告，全面接受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的批评，决定改造各级领导机关，引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干部，尤其是工人干部到领导机关。但王明等人还是指责九十六号通告右倾。

本来我是主张同王明等人斗争的，后来共产国际代表来了，说他们是正确的，我的态度就转变了，政治局同志的态度都转变了，因为那个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是很高的。中国党自己还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既然共产国际来人了，那还有什么说的。我虽然改变了态度，但仍有一个看法，认为他们是吃面包的，没有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

六届四中全会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贺昌、罗登贤、关向应、王明（即陈绍禹，当时名陈韶玉）、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罗章龙、陈郁、徐锡根、王克全、余飞、史文彬、张金宝、王凤飞、韩连会、秦邦宪、温裕成、顾顺章、徐兰芝、邱泮林、肖道德、顾作霖、柯庆施、陈云、周秀珠、袁炳辉、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和我，共计三十七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参加了会议。还有记录二人。会议从早晨到晚上十点

多钟，共开了十几个小时。会议由推举出来的主席团主持，主要主持人是向忠发。米夫是全会的实际操纵者。会议有八项议程，四项是主要的，即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讨论报告；米夫代表远东局作结论；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

由于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和米夫扶持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一次会议，这与罗章龙一派企图通过召集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以取得领导权是完全不一致的。与何孟雄等人的主张也有矛盾。所以会议自始至终都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当向忠发刚宣布开会，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首先提出会前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仍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接着王凤飞支持韩的发言。米夫急忙制止，要求停止讨论，立即进行四中全会的工作。说四中全会已经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它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王凤飞对此表示不满。接着罗章龙作了较长的发言，同意韩连会、王凤飞的意见，力主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三中全会的决议，改变中央领导。米夫又急忙制止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的，现在要马上举行。米夫的发言得到夏曦、博古、沈泽民等人的支持。会议在米夫的坚持下，通过表决，否定了罗章龙等人的提议。但是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仍然不服，罗章龙却对这些人表示支持，并保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接着向忠发提出主席团名单：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等五人，获得多数通过。

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主要讲的是：国际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批判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对立，立三敌视共产国际；指责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没有实行真正的转变，秋白要负最主要的责任；提出党最迫切的八项任务。但中心是两条，一是改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部，尤其要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赞助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引进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所谓“斗争干部”，

尤其是工人同志到中央委员会。二是在实际工作中实行坚决的转变，在反对“左”倾的同时，更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报告是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王明等人一系列“左”倾言论的翻版。

向忠发报告后进行讨论，许多人发了言。王明在张金宝、韩连会简短发言之后，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姿态作了长篇发言，一开场就说他的《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没有带来，要大家去详细地看，气焰十分嚣张。他一共讲了四个问题：首先说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虽然他也指出立三路线中若干“左”的政策，但主要是批判立三的右倾机会主义。如否认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对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富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右倾政策等。其次，他完全抹煞三中全会的成绩，指责三中全会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继续立三路线。他点名批判瞿秋白与李立三的错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对立三路线采取公开的调和态度。第三，他强调只撤换某几个中央负责人是不够的，必须发展全党的政治斗争，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要以所谓反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新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第四，他尤其强调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很显然，王明的这个发言是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总纲领的体现，也是为他们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王明发言之后，有几个人继续发言，有的完全同意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接着何孟雄提议政治局的同志先发言，要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何的提议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接着周恩来、关向应、瞿秋白、向忠发、我和顾作霖等发了言。瞿秋白的发言在这种形势下主要是进行自我批评。他主动地、诚恳地承担了三中全会及政治局所犯错误的最主要责任。说他参加了国际七月决议案的讨论，对情况是了解的，他认为立三的意见和政治局的路

线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因此十月来信后没有认识到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而是经十月来信所领导起来的党员群众的斗争和国际代表的指导，才了解到这一点。秋白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以及和自己若干大致相同的观点，并提出党应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斗争的若干建议。

我在会上也作了简短发言。首先作自我批评。我说立三路线的形成，实际上也有我的意见，我不是简单的执行者。对于说立三的错误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我也是赞成的，因此也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同时，我对立三的“左”倾路线错误也进行了批评，指出他过分估量了有利的革命形势，不去认真准备力量、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相反却积极执行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冒险政策，命令其他地方到处组织暴动，取消党、团、工会和一切群众组织。指出他在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下，实行家长制、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破坏民主集中制，抑制党内自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严厉打击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同志。此外，我还具体批评了布置上海暴动、南京暴动、武汉暴动。批评了决定徐海蚌无条件地首先暴动、通海地区的先占南通再攻南京的盲动主义错误。现在看来，这些批评还是正确的。但其他一些批评就不完全正确，甚至还有许多过左的地方。对三中全会的批评也有许多过头的地方。

政治局的同志发言之后，何孟雄、王稼祥、罗章龙等十儿人又发了言，大都是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强调要彻底改造党的领导。至此，国际代表米夫说已有十八人发言，相信不会有新的意见发表，会议必须在十点半结束，不能再延长下去，讨论要在七点半结束。米夫的插话刚完，一些人又表示对四中全会不满，有的人要求秋白等马上离开中央。这时，米夫提出停止讨论，由他作结论。米夫的结论，强调立三“左”倾路线的实质是

“右倾”，用“左倾”词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批评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继续推行立三路线，尤其瞿秋白要负责；指责三中全会不是反李立三，而是反对那些反李立三的王明、沈泽民等，说这些人是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他对罗章龙等人坚持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也进行了批评。随后，会议就基本上通过了由米夫等事先准备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选出王明等五人委员会同远东局共同修改。

尔后，即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拟定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让我和贺昌从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中退出来，让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从三中全会的政治局中退出来，并提出向忠发、王明等十六人为新的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这个名单一宣布，即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罗章龙不仅要求把李立三、我和贺昌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而且要求彻底改造政治局，说政治局的大半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国际代表急忙提议先表决我和贺昌退出中央委员。许多人提出质疑。罗章龙一派的韩连会则提出另一个名单，他们是徐锡根、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可能还有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蒋云等。国际代表米夫立即制止这样的讨论，要求照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名单先行表决，然后再提议其他人。会议通过了我和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但有人仍提出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统统退出，另选中委。罗章龙表示不同意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提的名单。由于争执不下，付诸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统统退出的只占少数。在这种情况下，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仍坚持己见，罗章龙并威胁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他说，请国际代表指定，我不表决。米夫说：应当安静的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现在要表决远



东局和政治局的名单和韩连会的名单。有人提问：什么人有权表决？米夫说：现在都有表决权。在米夫的操纵下，又由于罗章龙等人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远东局和政治局提出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结果，退出的中委是我和贺昌，补选的中委是韩连会、王荩仁、王明、许畏三、沈先定、沈泽民、黄苏、曾炳春、夏曦等九人；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李立三和我三人，新选入政治局的是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五人。这样，在米夫支持下便实现了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的计划，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进入党中央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局。向忠发名义上虽然继续担任政治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由王明等人独揽中央领导大权。

王明等人之所以能够上台，我认为：一是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和支持，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二是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三是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着的“左”倾情绪和政策还浓厚地存在着，容易为王明的一套更“左”的理论和政策所迷惑。

总之，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它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灾难。

## 关于罗章龙的分裂主义问题

罗章龙在立三路线时期，他在全国总工会工作，当时刘少奇同志到共产国际开会去了，不在国内，罗在那里掌权。四中全会上，他竭力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力争召开紧急会议，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中央领导人，连同党中央，统统换掉和彻底改造，以选举他们这样的所谓反立三路线反三中全会的“斗争干部”或工人。由

于他们提出的名单被否决，没有达到目的，四中全会后就更有组织地反对四中全会，搞分裂党的活动。

党内斗争，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组织第二党是非常错误的，这是背叛党的行为。但罗章龙等一些人却搞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他们还派人到其他地方搞分裂。因此，中央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

罗章龙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我是很不满意的。一九七七年他来北京后，我同他谈过一次。他说在四中全会上，他们是反对王明宗派主义的，是反对米夫的。我说：你们搞第二党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如果你们只是反对王明的宗派主义，那是对的。但我们党在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四中全会的召开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其结果又为共产国际所承认，因此从组织原则上来说，召开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你们对四中全会不满，另外建议召开紧急会议也是可以的，但你们单独搞会场开会，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则是不对的。可是他却认为这样做不是分裂党。我说：你们搞“第二中央”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你们搞“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在江苏省委我是当事人。当时我的省委书记职务虽然已被撤销，但还没有离开省委。那时王克全、徐锡根等人参加了你们的组织，他们到江苏省委来闹事，要我们让出省委机关给你们的省委，我们没有让，并与你们进行了斗争。这是实实在在的。我是当事人，可以做证明。我说：你们是在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党纪所不允许的。罗章龙说，他们搞第二组织，是要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这种辩解也是说服不了人的。即使他们当时想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也不能说明另立中央

就是对的。这个问题是他的要害。

当时也有人跟着罗章龙一起闹，但后来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受处分。有的同志还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陈郁同志就是这样。罗章龙没有承认错误，而且坚持错误，才被开除党籍的。当时跟着罗章龙受害的人不少，王克全等人也被开除了，这些人都是坚持分裂的。

## 去 苏 联 学 习

六届四中全会开完后，一天，我与秋白去吃夜餐，他问我：今后你打算怎么办？我说：我要到莫斯科去学习。他听了很赞成。

我为什么想到莫斯科去学习？因为四中全会使我产生了一个看法。以前，我看不起王明等人，认为他们是吃面包的，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当然，还有他们反对中央的路线问题。可是，他们大闹了一阵，却说他们是正确的，是有理论的；我们有实际工作经验，但没有理论，所以我们是错误的。我还举了夏曦的例子，夏在湖南时跟我一起，在我领导之下工作，但这次从莫斯科回来，中央把他派到江苏省委任宣传部长，就是为了让我和他斗争。因为立三同志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去莫斯科后，执行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人中我是头一个。但我不肯承认王明他们那一套，所以他们就派夏曦来江苏省委和我作斗争。夏曦到江苏省委后，开了好几次会斗争我，想把我从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搞下去。把我搞下去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执行过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夏曦这个人我了解，但他现在能讲很多大道理，就是因为他有理论。当时我拿这个例子为自己作辩解，这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没有认识什么叫真正的理

论，它和教条主义有什么不同。

四中全会后不久，周恩来同志找我谈话，要分配我的工作，谈话地点是在上海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一幢房子的楼上。我估计中央决定分配我的工作是因为周恩来同志为我说了话。因为我在路线上已承认了错误，同时王明他们在江苏省委查我的帐目也没有查出问题来。周恩来同我谈话时，首先要我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去任负责人。我表示不想去。又提出要我到赣东北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那里任特委书记。我表示也不想去。周恩来见我两个地方都不想去，便说：你想做什么？我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犯错误。后来，米夫也找我谈话，我还是坚决要求去莫斯科学习。结果，他们批准了我的要求。

中央同意我去莫斯科学习后，我在上海等了半年。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国际海员工会搞到苏联租用的一艘资本主义国家的轮船，党用“买黄鱼”的办法，买通船上的大副，让我们穿上水手的衣服上船。在船上，水手们站队我们也站队，水手们吃饭我们也吃饭，一切都听人家的。上船后，我才知道和我一起去莫斯科的还有陈郁同志，他是因为反对四中全会、参加非常委员会，后来承认了错误，而被送到苏联去学习的。这样，我们两人一路上还可以谈谈。

当船快到海参崴时，大副怕苏联的“格伯乌”上船检查，头一天晚上就把我们二人锁在货仓里。货仓堆满茶叶箱，空气很坏，很闷热。其实，我们并不怕苏联的“格伯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后，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去莫斯科的问题。当时，我的身体很差，陈郁同志身体好一些。我说：我要死在这里了。后来，我摸着仓门的铁盖子，使劲地敲，敲了一阵子，他们打开仓盖说：“格伯乌”已经检查过去了，你们出来吧！这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在海参崴上岸后，到了海员俱乐部，找到了联络人，他

们与共产国际接上关系后，便把我们接走了。随后，乘火车去莫斯科，一共走了十二天，七月十二日到达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我们先到共产国际东方部报到。在那里，米夫找我们谈了话，把我们送到共产国际的“国际列宁学校”学习，该校专门设有中国部。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利用这个时间，一位俄文教员教我们学俄文，从字母教起，每天上课。也参观一些工厂和地方。后来我被安排到该校的国际班学习，陈郁同志到该校中国部学习。

这时，李立三同志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里，我问他：你来莫斯科后怎么样？他说：我承认了错误，是犯了路线错误。接着，我跟他谈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并向他提出忠告：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我们不能反对四中全会。并说：你要注意，过去你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四中全会后不能这样了。我与陈郁也是这样谈的。

九一八事变后，听说国内有人要来。谁来呢？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王明。但我估计恩来要坚持国内工作不会来，来的一定是王明。果然，有一天立三告诉我，王明来了。这是十月的事。王明到莫斯科后，先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后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王明到莫斯科后，就要改组列宁学校的中国部，很快就把该部负责人周达文和教员俞秀松、董亦湘等人赶走，控制了中国部。他还组织在中国部学习的人批判陈郁反对四中全会的问题。

我在国际部短期训练班学习，为期八个月毕业。学习期间我是很用功的。学校组织到雅尔塔海滨休养时，每天晚上有电影，我就是不看，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拼命读俄文。到后来，俄文版的政治理论书如《国家与革命》等，我都可以看了，俄文报纸也能看懂了，政治报告也能听懂三分之二。我想短训班毕业后，

争取到三年制的专修班去学习，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这是王明答应我的。我在莫斯科死读书读死书的结果，现在看，可以一分为二，有好的地方，就是看了点书，学了点马列主义著作，有好处；也有坏的方面，就是从本本到本本，学了些教条主义的方法。但我这个人教条不多，局部的经验却是我思想方法的基础。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当短训班快结束时，王明找我谈话，要我回国。他说，国内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要人回去工作，决定让你回去做特科工作。我答应了，准备立即回国。回国的路线是经西伯利亚到满洲里。与我同行的有伍云甫的爱人熊天荆。路过赤塔时在那儿呆了四十天。一位工人前来接我，准备在满洲里过境。这时，满洲里已被日军侵占。在火车刚过境还没有到车站时，那位工人就带我跳下火车，到他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给我换了一件很不合身的长袍，还给我一只绿色小帆布箱，里面装些牙具。此时，我又准备了必要的“口供”，以便应付意外事件。这是搞地下工作的人每搬一次家或到一个新地方所必须准备的。那位工人把我送上了火车。

上车后，一下子就有六个人（朝鲜、日本、中国各二人）把我团团围住。问我：你是干什么的，从哪儿来，上哪儿去？我说：从上海来，我哥哥在满洲里做生意，被大水冲倒房子压死了，他的伙伴要我来收尸，但我到了满洲里他们都不在了，现在我要回上海。他们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就放我过去了。到了哈尔滨，在旅馆里住下。次日上午到公园去找国际交通员，走到接头的那幢房子前便上楼去，见到一个白俄，我便问：某某在吗？他说不在，出去了。他问我：你是鞑靼人吗？我说：不是。下午又去找，找到了，是一个女同志。我在她家剃了头，打扮成商人的样子，住了一夜就走了。临走前，她告诉我：在路上有人碰你一下，你就跟他走。果然有一个人在路上碰了我一下，对我说：你

还是那样！这个人姓傅，是湖南醴陵人，可能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我们在一起过。以后他到过延安。那时，他在龚饮冰开的哈尔滨绣花铺里工作，我在他家过的阴历年，他还带我到左邻右舍拜了年。

过年后，我离开哈尔滨到大连，然后乘船到上海。船上的日本人很凶，我刚坐下，一个日本人就来问我：你去哪儿？我说：去上海。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哈尔滨绣花铺的介绍信给他看，并对他说：我是去上海结帐的。他看我带有美金和哈尔滨票子，就拿出来数。在数的时候把一张美金塞进了自己的袖子，我也只当没看见。在船上又碰见了熊天荆等，我用眼睛瞪她们，意思是不要她们与我打招呼。后来，她们告诉我到上海后，到什么旅馆去找她们。

在哈尔滨时，交通员教我接头的地点和方法。他说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一条弄堂里有一家理发店，有个俄国理发员，你进去后就坐着理发，给他一张哈尔滨票子，他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然后他就给楼上打电话，与中央接通关系。可是，我到上海后找到的这家理发店却有两个俄国理发员，就没有敢进去。这时我记得戴晓云一家，戴因反四中全会已被开除党籍，但他的爱人周若明没有被开除，女儿也是共产党员。我知道他们的住处，就写了封信。他们收到信后，即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他们夫妇俩住一间小小的亭子间，没有床铺我就睡在地板上。这个地方是党经营的酒店，实际上是一个地下联络站，谢觉哉同志经常来。周若明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谢觉哉，这样我才找到了党中央。然后我通知熊天荆，因为哈尔滨的交通被破坏，她们在那里没有接上关系。她们到上海后，是我帮助她们与中央取得联系的。

我同党中央接上关系后，李竹声（后叛变）和康生接待了我，决定分配我到中央苏区工作。这样，一九三三年四月我就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 在中央苏区

一九三二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国。翌年初，我到上海找党中央。李竹声、康生接见了，他们要我留在白区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又要我到中央苏区去。为什么白区被破坏得很厉害，特科工作又缺人，却要我到苏区去？后来才知道，是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靠不住的。四月，我奉命到达中央苏区。

当时，临时中央已于同年一月迁到瑞金。党中央书记是博古，中央组织部长任弼时，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参谋长刘伯承，李德是军事顾问，何凯丰后来是少共中央书记。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那时，我对毛泽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上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被撤销红军领导人的职务这些事，都不知道。也没有听到人说毛泽东是搞“右倾机会主义”。任弼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我在莫斯科学习时，也没有听王明等说过。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



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当时罗明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邓小平任江西省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经担任过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五师师长；古柏曾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从实际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正确的意见，抵制“左”的做法。如主张在红军弱小的情况下应向农村发展，不赞成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诱敌深入”，然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不赞成硬拼；主张中央红军、地方部队、群众武装都应发展，互相配合，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界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同样的办法；主张健全根据地的革命群众团体；坚持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主张根据地的行政、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都由政府负责，不应由党代替政府工作。结果，这些正确主张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被称为“罗明路线”。这时，张闻天已从福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后回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还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会、寻、安地区是苏区的边远地区，是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的游击区。但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却认为失掉了寻邬，是中心县委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执行退却逃跑的防御路线的结果。毛泽东、朱德总结出来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红军最早的战略战术。后来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原则，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把它发展为十大军事原则。而反“罗明路线”，实

际上是批判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那时苏区的边远地区，完全是赤白交错对立。毛泽东曾经说过，困难的是有中间派反水的问题。因为赤白交错对立厉害，中间派中不少人反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游击地区还有革命的“两面”政权，敌人来时可以应付一下。但当时在边区只有实行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才行。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谈，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承认“错误”。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开后，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我写这篇文章是完全错误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反所谓“江西罗明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后几十年，我就再没有反对过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被撤销了党的和军队的领导职务后，只有一个实际上被架空了的政府主席的职务。一九三四年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他也没有参加。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犯了所谓“富农路线”的错误，但他服从党的决议。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时，仍争取在党领导下做一些工作。如查田运动，他主持召开了瑞金、会昌等八县的区以上政府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等，这些都是根据中央局作的决定去做的。他到兴国作调查，写了长冈乡调查报告。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模范乡、模范村建设，是在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为中央苏区的巩固打下了基础。他自己曾说过，在这段时期，他看马列主义的书，搞农村建设工作，对党的决议是服从的。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最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失败了，还是请毛泽东出来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和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十二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他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他读了许多书，总结了全党的经验。他写的文章，都是气势磅礴的。那时，在正确路线指导下，各方面工作都是生气勃勃、蒸蒸日上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王明他们要反对毛泽东呢？为此我还写了一篇笔记。我认为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

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们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周恩来说，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职务时，毛泽东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后来博古等没有让毛泽东出来再担负红军领导工作。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当然，是集体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是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进行的，红军指战员和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战略和战术原则，所以取得了胜利。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里和红军里的威信扫地。他们还准备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换班。其实，当时已经换班了，由张闻天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毛泽东已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后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转变了态度，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

我到中央苏区时，开始是中央组织部的干事，后来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便任命我为中央组织部长，但我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和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我只联系三个省委的工作，一是江西省委，省委书记李富春，妇委书记蔡畅，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副主席陈正人，军区动员部部长陈奇涵，省委机关设在宁都。二是粤赣省委，它是从江西省委分出去的，省委书记刘晓，妇女部长李坚真。我去过粤赣省委几次，没有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是由胜利、兴国等县建立的一个省委，叫什么省委，记不清了。省委书记是朱开铨。福建省委由张闻天联系。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组织局，主任是我，成员有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同志，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当时，张闻

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是副部长，他不是组织局成员，但组织局开会，他也参加。妇女工作由我兼管。白区工作部是陈云兼管的，贾拓夫是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组织局每一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张闻天提出，会议结论也由他作。重要问题博古也出席。讨论查田问题，毛泽东也来参加过。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主席是我，参加的人是常委，做结论的是张闻天，名义上是我负责，而实际上我只联系三个省委。

我在中央苏区所做的第二件事，是扩大红军。一九三三年冬开始的扩红工作，整个由我负责。十二月，博古通知我说，现在正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我们要扩大红军三万人，明年红五月时完成任务，这个事归你负责。他还说，这是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杀头。这是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好象完不成扩大三万红军的任务，第五次“围剿”就不能粉碎。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整个苏区全部动员了。这时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开过，群众革命情绪很高，这项任务完成得很好，扩大了五万红军。任务完成得这样好，还是以前的正确路线在那里起作用。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当时工会组织了工人师，少共组织了少共师。我对扩大红军工作很努力，经常跑到瑞金等地去检查工作。当时后勤工作由陈云负责，他管军工生产。毛泽东负责经济工作。至于前线打仗的情况，我不知道，白区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因为有关前方打仗情况的电报是不给我看的，白区情况的电报也不给我看。有一次，张闻天到中央政府去了，博古要上前线去，他临走时对我说，有电报收一收。我就把电报收下。当时，我拆了一份电报，博古回来后，对我大发雷霆。

我在中央苏区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兼管中央党校的工作，任中央党校校长。罗明被批判后，是我要他到党校工作的，他来党校教“党的建设”课程，编写“党的建设”讲义。我曾经和他一起研

究如何讲课，关系还融洽。

我不是王明小宗派里面的人，很多情况我是不了解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快要失败的时候，连红军要战略转移的消息，都是到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才知道的。这是因为他们要我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中央的意图，所以才对我透露要向湘西转移的消息。我的情况虽是如此，但我却犯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我经常想，为什么会犯这次错误呢？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我在莫斯科学习时，读了点马列主义著作，还是有点好处的，但也学了些教条主义的方法。我这个人的思想方法，局部经验是基础。到莫斯科后，又学了些教条主义的方法。因此，对问题的是非看不准，分不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从书本出发，否认实际，把苏联的一套搬到中国来，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否认矛盾的特殊性，脱离实际，危害当然很大。经验主义把狭隘经验当普遍真理。拿局部的经验到处推广，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危害也是很大的。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青人不太清楚。当时中央苏区提出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也不好，只比后方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不饱。吃饭前，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蒸，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从其他地方来瑞金开会的同志，吃饭用饭票。从瑞金

到外地出差，沿途有兵站，在兵站吃饭、睡觉，地上铺些草就睡了。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不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背上还背着布单子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亲密，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我们党和红军的光荣传统。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对于培养青年一代，振奋革命精神，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前进，是很有意义的。

# 回 忆 长 征

## 一、转 移 准 备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博古等人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民虽经一年的艰苦斗争，但终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失败而被迫长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在军事路线上，反对积极防御，实行消极防御。反“围剿”开始时，搞冒险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遇到挫折后，搞保守主义，分兵把守，打阵地战；被迫作战略转移时，又搞逃跑主义的大搬家。这是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根据地的最大恶果。

当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失利后，各路敌军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全面进攻，形势已对我十分不利。红军在内线破敌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的时候，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你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这个精神，让省委作好转移的准备，提出带走和留下的干部名单，报中央组织局。他还说：因为要去建立新苏区，需要选择一批优秀的地方干部带走，也让省委提出名单。听了博古的话，我才知道中央红军要转移了。根据博古的嘱咐，我分别到江西省委、粤赣省委去传达。



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传达后我又回到瑞金。

长征的所有准备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领导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个别环节，群众一般是不知道的。当时我虽然是中央组织局主任，但对红军转移的具体计划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情况，他们也没有告诉过我。据我所知，长征前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战略问题没有提出讨论。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是什么？要到何处去？始终没有在干部和广大指战员中进行解释。这些问题虽属军事秘密，应当保密，但必要的宣传动员是应该的。

我回到瑞金后，开始进行长征的编队工作。

按照中央指示，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又名“红星纵队”，是首脑机关，也是总指挥部。博古、洛甫、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还有其他负责同志，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干部团的前身是红军大学，学员都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他们都经历过多次的战斗。干部团人数虽不多，但战斗力强，实际上是首脑机关的警卫部队，在长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体不好，一直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苏区负伤，不能行走，也只好坐担架。在长征路上，他们两人经常在一块讨论问题，交换意见。那时毛泽东不管事，管事的是博古、洛甫、恩来。第二纵队，又名“红章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约有一万多人。中央任命我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纵队的编组工作，邓发花的力量大，我花的力量小。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的一位团长牺牲了，

张宗逊被调往红三军团任团长，第二纵队参谋长由邵式平接任。李富春是总政治部代主任，也在第二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部有四个女同志随军行动，他们是蔡畅、陈惠清（邓发夫人）、刘群先（博古夫人）、阿金（金维映）。司令部下面还有几个单位：一、干部团或干部连（也叫工作队），约有一百多人，李坚真是指导员。这个干部团不是打仗的，是做地方工作和安排伤病员的。二、干部休养队，也有一百多人，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等都在休养队。他们不担任工作，只要身体好，能随军走就行。三、警卫营（营长姚喆）。四、教导师（师长张建武），担任后卫，约五千人，是1934年红五月扩红时参加红军的新兵，才成立十五天就出发了。它虽是后卫，但没有打过仗，因为第二纵队是由别人保卫的。配属第二纵队领导的还有一百多名地方干部，他们对政权建设有经验，准备去新区建立政权。中央党校的一部分学员，也编在第二纵队。此外，还有运输队，挑夫很多，任务很重。党中央机关的文件、资料之类的东西不多，但中央政府机关的东西很多。如中央银行携带很多银元，财政部有大量苏维埃钞票，还有银元，都要挑着走。一边走，一边抄土豪的家，得了现洋，也挑着走。因为部队发的是苏维埃钞票，不能拿苏维埃钞票买老百姓的东西。印票子的石印机也抬着走。军委后勤部把制造军火的机器也带上了，要七、八个人才抬得动。每个部几乎都要抬着机器走。卫生部带的坛坛罐罐也很多。真是大搬家。这个运输队成员多数是从劳改队放出来的，体力差，又是走夜路，有的挑到半路就不行了，只好另换人。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总工会

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总政治部决定的。我负责管的是苏区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组织局、秘书处、宣传部。组织局还管妇女工作。中央局的秘书长是王首道，当时机要工作是邓颖超管的，李坚真也搞机要工作，他们三人都是随军长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但我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四个人，他们是毛泽覃、周以栗、陈正人、贺昌。

毛泽覃在组织局工作，我问过博古，是否让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没有带他走。以后毛泽覃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对毛泽覃同志的不幸牺牲，我长期感到内疚。谢唯俊也在组织局工作，我把他带走了。

周以栗曾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领导中央工作时派去的。他是主张打长沙，攻大城市的，后来毛泽东把他说服了，放弃了攻打长沙和大城市的计划。我在湖南时就认识他，而且很熟悉。一九三三年我到中央苏区时，他已在养病，没有工作。长征时，博古决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陈正人，原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原来我不认识他，与他没有什么工作关系。我到苏区时他在养病，长征时，也被博古留下了。

贺昌，我对他很熟悉。立三路线时，他是北方局书记，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职。长征前他负了伤，曾到我那里要求随军走。我问过博古，博古不同意。后来他牺牲了。

上述四个同志当时都在养病，没有工作，归组织局管。他们

可以留下，也可以带走，病人可以坐担架长征嘛。他们如果不应该留而被留，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虽然博古不同意他们走，但我是组织局长，还有一定发言权，我可以争一下，但我没有争。

古柏，当时是江西省委决定把他留下的。我与古柏没有打过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对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责任的。古柏留在苏区，后来也牺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们决定的，我没有参与其事。

除了苏区中央局机关归我管以外，我还分管中央党校，从这儿调来的干部归我负责，我把他们都带走了。长征时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潘汉年，我把这个部的正、副部长都带走了。

## 二、长 征 初 期

长征初期，整个中央红军的部署是错误的，可以说是个笑话。

中央的两个纵队在中间，一纵队在前，二纵队跟后。中央纵队的两边是一、三军团，他们是战斗队，作战的主力。五军团搞后卫，任务是保卫这两个纵队的。此外，还有二十二师、九军团，都是新兵组成，把他们放在离两个纵队更远一些的地方，也是做后卫的，任务是箝制敌人。几个主力军团主要起保卫中央纵队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保卫大搬家，还谈得上什么运动战？怎么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样的部署把自己的手脚完全束缚起来了，因而处处被动挨打。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的办法一是夜行军，二是爬大山。实在避不开，就硬挤。我这个二纵队司令员不了解军事情况，只是按命令走。军委把命令传给二纵队参谋长，参谋长再把命令传给我。我根据命令内容，分析行军的方向。有时，我想今天可能要爬山

了，因为大路会遇到敌人不能走，后来果然是爬山。

由于长征前没有进行动员解释工作，行军情况很不好，队伍稀稀拉拉，有时先头部队出发了，后卫才到达宿营地。几乎天天都被敌人尾追，掉队的很多，收容队里的人员大量增加，部队人员大量减少。我所在的“红章纵队”，也是稀稀拉拉的，实在走不动了，才慢慢地把东西扔掉，把一捆捆苏维埃银行的纸币烧掉，把机器也打烂了。我看到年轻的战士牺牲在路旁，心中很难过。后来“红章纵队”因大量减员而缩编成三个梯队，教导师补充到前线作战去了，我也由纵队司令兼政委改任梯队的队长。

由于天天夜行军很疲倦，经常边走边打瞌睡。有的时候我晚上查哨，看到哨兵坐在地上打瞌睡，我去拿他的枪却拿不动，原来哨兵把枪拴在裤腰带上。那时对哨兵打瞌睡也没有办法，战士太累了。我们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湖南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只走了一千多里路，平均每天才走四十多里。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文明司接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签署的命令：

罗迈：

(一)一、九军团后方部及二十二师于十一日晚或十二日晨到达文明司地域。

(二)他们配置于现地第一纵队的宿营位置。

(三)罗迈同志为文明司的卫戍司令并负责分配宿营地域及一般秩序。

为了箝制敌人，九军团、二十二师处于比五军团更后的位置，所以经常掉队，在文明司宿营，就是为了等他们。我接到命令后，就按命令分配部队的宿营地，维持军队的秩序，进行军容风纪的教育。11月初，我们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继续前进。11月中旬，解放了湖南的宜章县，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

线。在宜章我们住了几天。我是分管长征沿途的白区工作和地方工作的安排的，所以到宜章后，就派了一部分人进去工作。宜章县原有我党县委组织，我送给他们一些人枪，组织他们打游击。我们离开宜章后，他们在县委领导下，也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后来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游击队也不存在了。

过湘江是在夜里，部队走得很慢，等他们过去了，我们才开始过。我对前面的消息很少知道。后来才知道“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要到湘鄂川黔根据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敌人估计到这一点，就调兵四十万分三路围追堵截，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把我军全歼于湘江边。因此湘江一仗打得很艰苦，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和其他人员共有八万多，到这一仗打下来，只剩下三万多人。这就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经湖南、广西边境的苗族、壮族居住的越城岭山区，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前进。

越城岭又名老山界，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难走的大山。过老山界时，军委命令我们随左边的三军团行动。这时彭德怀给我纵队来电话，明天他们要打仗，我们如果跟他们军团行动，整个纵队要出问题，会有危险的。他已向军委发电报，建议二纵队跟一纵队走，由五军团殿后担任警卫。要我派人到军委领新的命令。我接到彭德怀来电后，立即派人到军委去。军委批准彭德怀的建议，叫我们跟一纵队后面走。多亏彭德怀的建议，不然我们跟着三军团后面走，三军团与敌战斗，会招致很大的损失。我们纵队过老山界，是夜间行动。在漆黑的夜晚，翻越高山峻岭，一级石阶一级石阶地往上攀登，山高路陡，马不能上山，只好把马扔掉。一纵队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走几步，停几

步，行动缓慢。敌人追得很紧，五军团在后面打仗，挡住敌人，保卫我们。他们也催我们快走，以便甩掉敌人，减少兵力的损失。我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才知道一纵队的电台队的工作人员实在太疲倦了，他们边走边睡觉，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影响我纵前进。一纵队首脑部门早已走远，丢下电台队在后面，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催他们快走，他们才紧追上去。过了老山界，下山就快了，我们追上了第一纵队，到了宿营地休息。五军团在过老山界时，吃了很大的苦。老山界一仗，进一步暴露了长征初期我军的被动情况。

### 三、遵义会议前后

过了老山界，因为没有敌机骚扰，我们多半是白天行军。广西一带的房子都是木结构，很容易燃烧。阶级敌人为了制造所谓“共匪”杀人放火的舆论以破坏红军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扰乱红军的宿营，使红军得不到休息，就偷偷放火，妄图诬陷红军。我们在广西扑灭了好几处火，并捉到放火者加以处置。

这时红二、六军团为配合红一方面军的行动，也对敌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蒋介石反动派害怕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急忙调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在武冈、城步、绥宁、靖县一线阻截，同时命令广西军阀配合堵击。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红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

进。十二月十五日，红军攻占黎平。大约一两天后，我们也到达黎平。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会后，中央政治局将这一决定电告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等，然后通过他们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我也听了传达。黎平会议放弃了在湘西创立新的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这个改变是因为：第一，按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已经不可能，也不适宜；第二，为尔后考虑计，能使红一方面军更有利于与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一致行动，协同作战；第三，川黔边境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条件上，有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第四，该地区有利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

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它既使红军避敌重兵，免遭灭顶之灾，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打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特别是使红一、三军团获得“解放”，可以灵活机动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五军团也不致因担负后卫，老吃苦头。

黎平会议后，部队实行整编。一纵队二、三千人，二纵队一万多人，合编为三个梯队。三个梯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属军委。我是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卫生部是贺诚当队长，后勤部是叶季壮当队长。过湘江时，已把笨重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装多了，主动多了。

离开黎平，我们向黄平前进。从黄平到遵义已经不远了。黄平前面有一道河，梯队的担子全在河边等着，只有一两只小船，来回运输，很慢。当时是白天，目标很大，很容易遭受敌机空袭。我就乘一只小船划到河中心去，测量水深，看能否涉水过



河。我到河里一站，水深只到膝盖，便带领梯队涉水过河。其他梯队也跟着涉水，加快了过河速度。

一九三五年初，红军打败了沿途的贵州敌军，强渡乌江天险，一月七日占领了遵义。自此以后，行军作战虽仍异常艰苦，但摆脱了被动局面，部队情绪一天天振奋起来。

按照黎平会议的决议，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者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党中央进入遵义城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进遵义城，也没有参加会议。当时我是地方工作部部长，凯丰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地方工作部副部长，他参加了会议。开会回来后，我问他会议情况，他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吧！”对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不清楚，直到以后听了传达才知道。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准备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致电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但张国焘竟违抗中央命令，不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却北攻陕南，使敌人得以调动兵力封锁长江。

本来我军计划从土城、元厚西渡赤水，然后北渡长江。土城虽占但后来打得很艰苦，打了一天未歼援敌，我伤员很多。地方工作部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部队，动员一些地方干部，把伤员安置好，一般都是安置在老百姓的家中。长征路上，常常如此。撤出土城时，我又留下一些人，组织游击队，坚持斗争。后来游击队失败了，没有坚持下来。土城战役后，一月二十九日，红军从土城、元厚一渡赤水河，西去四川的古蔺，准备到泸州，我又派了一些人到泸州组织游击队，并派余泽鸿到泸州工作。以后泸州游击队也失败了，有些干部回到了部队。后来，由于敌人重兵云

集，渡江已不可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率领红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今威信）集中，待机破敌。

二月十日，在扎西召开干部会议（也叫作军事扩大会），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下着蒙蒙细雨，大家集合在露天广场的一棵大树下，聚精会神地听他传达。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我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有一个认识过程。遵义会议前，我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正确性”已逐渐发生怀疑。

记得在中央苏区时，我和博古、张闻天等住在一个地主的大院里。有一次，我在一间房子打乒乓球，听博古对洛甫说：“老毛（指毛泽东）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加里宁是苏联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只留下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职务，而且是个虚职，所以博古把毛泽东比作苏联的加里宁。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毛泽东的评价和看法。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有一次，我路过博古、洛甫的房间，无意中听到博古对洛甫说：“上海完了。”（指上海党组织被破坏完了）我猛听到这句话非常吃惊。我当时对白区工作情况、前线作战情况并不了解，他们也不让我知道。后来才知道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想：在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织没有完；在李立三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时，上海的党组织也没有完；为什么在自称百分之百正确的王明、博古的领导下，具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上海

党组织却完了呢？这是我对王明路线的“正确性”产生的第一个怀疑。

第二个怀疑是，红军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时，也是敌强我弱，但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时，博古给我下军令状，说要扩大红军三万人才能粉碎“围剿”，完不成任务要杀头。由于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和翻身农民踊跃参军，结果扩大红军五万多人，成立了工人师、独立师、教导师、兴国师、模范师、少共国际师等，广大群众斗争情绪很高，但不久，第五次反“围剿”却宣告失败，红军被迫转移。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我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正确性”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第三个怀疑是，在红军转移的路上，不是象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那样，主动地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是拚命逃跑、避战，处处被动挨打，损兵折将。

总之，这时我对王明路线已发生动摇，不象过去那么坚信，那么积极贯彻执行了。但对王明“左”倾错误错在哪里？如何克服？还认识不清楚。

听了张闻天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解开了我思想上的许多疑团，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因此，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这句话是他说的，表明了他的坦率态度，说明了他还是位好同志。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从此，我们党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遵义会

议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今天再来认识遵义会议，我还有以下两点看法：

一、为什么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指出“左”倾领导者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而且还认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呢？我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党内思想还不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多数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其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再就是鉴于紧迫的战争环境，因此，毛泽东等同志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时是处在没有根据地，敌人前堵后追的战争环境中，战争的胜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主要问题。这时，如果提出王明等人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使党内受到过分的震动，引起大的争论，对打仗非常不利。政治路线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讨论，这样做对于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争取长征的胜利，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者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当时党内的许多干部，特别是中央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也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认识的。通过几年来对王明等人所实行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和处理，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对肃反政策的观察和体会，通过对“左”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观察和体会，特别是通过对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比较，有的同志对王明为首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是有清楚的认识的；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其政治上的某些政策是不满的，怀疑的，甚至是否定的；有的同志则从积极维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开始觉悟到王明等人在政治上也有若干“左”的错误（但是从全党来说，还没有深刻认识到王明等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因此，到瓦窑堡会议就能逐渐从政治上批评王明路线的错误，而到后来，在

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党中央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作了全面的批判。

二、遵义会议开始了我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历程。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二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因此很多问题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分不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过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它又因为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依靠本国人民，依靠本国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国际间的支援是需要的，但革命只能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决不能依赖外国，外国也不能越俎代庖。李德本来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一个军事顾问，但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什么事都听他的。李德搞瞎指挥，在军事上更是他说了算，甚至一个战役中一挺机关枪放在哪里，都要听他的安排。李德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当然，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是中国党当时的错误领导，但一切都听从国际及其代表的，则是一个重要原因。遵义会议是我党破天荒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仍让李德瞎指挥下去，全党全军都有陷于覆灭的危险。遵义会议的确是把我们党、我军从危亡边缘挽救出来的一次重要会议。前几年，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对我说：遵义会议开会时，李德坐在门口，让他靠边站了。中国的问题由中国党自己独立自主地解决，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二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中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正是当时的历史写照。没有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党的问题，红军可能被敌人消灭

在长征路上。而没有武装斗争，我党就不可能存在，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这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 四、从二渡赤水到天全、芦山

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后，敌人沿长江两岸布防，滇、黔军也陆续追来，对红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因此红军不宜继续北渡长江或就地建立新苏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见贵州境内是敌人薄弱之点，便率领红军东进，于二月中旬在太平渡和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攻占娄山关，再次夺取遵义城，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

这次我也随军进了遵义城。这时贵州党组织已被破坏，但贵州党组织的负责人林青没有被捕。我们在遵义城外一个农民家中开会，经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贵州工作委员会，成员有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等，仍由林青负责。我离开遵义时，留下了一些人组织游击队，他们一直坚持到贵州解放。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军，红军在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再次进入川南的古蔺地区。我们三渡赤水时，蒋介石以为红军主力又要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急忙调兵遣将，企图再次包围并在长江南岸消灭红军。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立即指挥红军东进，于三月下旬又经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接着掉头南向，直指乌江。三月底红军渡过乌江，便把蒋介石集结的军队全部甩在乌江以北了。

红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天才表现。当时谁能想得到四渡赤水后，过了金沙江，就把尾追的敌人甩掉了呢？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发展到如此高峰的，毛泽东是第一人。

四渡赤水，我们都是跟着军委纵队走的，都是在夜里渡过赤水河，没有发生什么事。我们地方工作部每到一地，都要做地方工作，要派人打前站，头天就要去，把路标搞好，把宿营地找好。谢唯俊当时在地方工作部工作，他就是打前站的。一路上他工作很积极负责。每到一地方，他先去了解群众情况，我们到后就可以及时开展工作了。

四渡赤水后，我们就巧渡金沙江。过金沙江也是晚上。我们在沙滩上等着过江。船很小，把马、骡放在船上是没有办法过江的，后来想了个办法，把马赶到江里，人坐在船上牵着马、骡过江。

五月五日，军委纵队渡过金沙江。五日、六日朱德连续给各军团布置作战任务。为了防止一军团被敌人隔断，军委命令他们务必不顾疲劳于七日兼程赶到绞平渡，八日黄昏前渡江完毕；命令三军团迅速渡江北进会理，消灭敌刘文辉部；命令干部团和三军团一起行动；命令五军团在绞西以南掩护红军渡江；命令九军团彻底焚毁沿金沙江各渡口的所有船只，阻止追敌于金沙江右岸，以掩护我军主力集中于会理一带。我是随三军团到会理城外的。晚上我还到了彭德怀指挥部，他正在指挥作战。会理城打不开，就采取炸城的办法，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城炸开了一个缺口。后来因为要抢渡大渡河，就没有继续攻打会理城，而是迅速北进，攻占德昌。占领德昌后，本拟向西昌进攻，但因西昌守敌有四个团，共二、三千人，城墙又高，筑有坚固工事，加以上有敌机，下有炮火，一军团无法靠拢城门，而且刘文辉准备从雅安亲率数团兵力增援西昌。为了避免硬攻消耗兵力，争取时间迅速北上抢渡大渡河，军委决定一军团向泸沽方向前进。由一军团的一师、二师的两个团为抢渡大渡河的先遣团。军委还派参谋长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五月二十五日，在安顺场渡口，一困

的十七勇士乘着唯一的一条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冲破敌人的防御，到达了大渡河东岸。随后，一师的其他部队也从安顺场过河。过河后，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河的东岸迅速北向泸定桥，以策应西岸部队，准备攻占泸定桥。我记得我们随一纵队到了安顺场，在安顺场住了一夜，还闲谈了石达开在安顺场失败的历史故事。我们没有从安顺场过河。五月二十九日，西岸部队组织了二十二人的英雄突击队，在红军火力掩护下，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前进，十分惊险地夺取了泸定桥，攻占了泸定城。

当我军经冕宁向安顺场北进时，前线政治部通知我冕宁有我党的县委，书记是廖志高，叫我与廖志高接头。我在城外和廖志高接了头。廖向我介绍了那里的情况。然后我根据军委指示，要廖随军北上。廖就带了几个彝族干部同我们一起北上了。我们离开冕宁时留下了一些人坚持斗争。

部队飞夺泸定桥后，就向天全、芦山前进。休息时，洛甫要我到他的房间去。我到时陈云已经在那里了。洛甫对我俩说，白区工作很重要，中央想派你们两位去白区工作。长征途中这是第一次提出要派干部到白区开展工作。后来我因为有事，没有去白区工作。陈云就从天全、芦山一带出发，到白区去了。陈云先到上海，后来到莫斯科，他带有电报的密码本。潘汉年也到上海，也带有密码本。可能就从这时起，中央与上海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重新部署了白区工作。这说明党中央贯彻遵义会议决议，开始重视并有可能进行白区和统一战线工作了。陈云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是秘书。陈云随军长征后，中央同白区的联系就中断，也无人负责白区工作了。长征前，我不负责白区工作，但有一件事是我处理的。一九三四年一月，满洲省委派何成湘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中央要我找他



谈话。二月，我还起草了《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在长征途中，我也做过一些白区工作。遵义会议后，凡到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来找我。有些问题也是我处理的，如组建中共贵州工作委员会，坚持泸州的地下斗争等，都是我安排的。中央打算让我和陈云到白区工作，也就是考虑我们过去搞过白区工作。

## 五、在杂谷脑

长征路上遇到的第一座大雪山，叫夹金山。山很高，雪很深，行走艰难，不能骑马，我们就拉着马尾巴，让马把我们拖过雪坡。到了山顶，空气稀薄，不能坐下休息，因为一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过了雪山就是懋功。懋功前面有个村庄，是回民居住地区。我们到回民村做了些工作。在懋功住了几天，此时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了。从懋功到两河口后，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我在干部会上听了洛甫的传达，说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我知道遵义会议是决定在云贵川广大地区中建立新苏区，这时改为建立川陕甘苏区。两河口会议大概有争论，但洛甫传达时没有谈内部的争论。

开完干部会，洛甫(或是博古)找我谈话，说现在要派一个慰问团到杂谷脑去慰问。杂谷脑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方，也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洛甫叫我慰问后就留在那里担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如果做不成，就到白区当四川省委书记。

慰问团有林伯渠、叶剑英和我，可能还有李富春。我们在杂谷脑住了几天，林伯渠告诉我，苏区省委书记当不成了，这里不欢迎。又过了几天，慰问团成员都走了，只我一人留下来，准备到白区去当四川省委书记。我住在省苏维埃的一栋大房子里，住房靠着大厅，出入他们都看得见。表面上，他们对我很好，很客

气。原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某，老是陪着我，吃饭也陪着，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我接近四方面军的同志。我在杂谷脑只出去过一次，碰到过宋佩夫、张琴秋两个熟人。宋佩夫，他是中央从上海派到四方面军搞电台工作的，在上海时我就认识他。张琴秋是四川省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他们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把我不让接近四方面军的同志。周某与我谈话中，流露出瞧不起红一方面军的口气，认为红一方面军衣破、人少、枪少。我对他作了解释。他的意图我也看得出来，不愿意让我当苏区的四川省委书记。我叫他们派两个与四川有关系的人给我，陪我一起到白区去接关系。他们就派了张德生、白载昆陪我。张德生当时是从陕南翻过大山到四川去接关系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解放后，曾任八届候补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白载昆是党中央从上海派到四川的交通员，他把中央的信送到川陕苏区后就留下来，我原就与他很熟。我不能经常出门，他们可以经常出门。有一次他俩对我说，张国焘、陈昌浩开过秘密会，策划反对党中央。他们还指着我们住房对面的一排平房说，外面进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就住在那里，他们俩也在那里住过。住在那排平房的人，不能随便出去。何柳华（廖承志）等人就在那里住过，实际上被软禁了。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张国焘的一些底细，才知道张国焘是反对党中央的。由于我被严密封锁，无法出去与人接触，连红一方面军开走了我也不知道。

不久，中央打电报给我，要我在四方面军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我已了解张国焘反对中央的一些底细，这个纵队政治部主任是没有办法当的，也不能当。于是我婉转地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让中央知道我不能在红四方面军呆下去的处境，陈述我不懂军事，无法胜任纵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等等，以此为理由，要求返回中央机关。这位省委书记同意我发电报，因为他们也是不想让我

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接到我的电报后，明白我的处境不妙，立即回电叫我返回中央机关工作。我离开杂谷脑时，也把张德生、白载昆带了出来。我们爬了几座山，到了毛儿盖，中央机关、政府机关都在那里。我见到洛甫等中央领导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张国焘反对中央的情况。他们也把同张国焘的分歧和斗争的情况告诉了我。

## 六、过大草地

回到毛儿盖，中央叫我归队，仍负责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共青团等部门的工作。我在毛儿盖休息了两天，就到另一条山沟去看望林伯渠。我下午出发，晚上回来。回来时，我负责的几个机关都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接到紧急通知，赶往大草地集中。当时剩下我和警卫员、饲养员共三个人，一匹马，处境相当危险。两旁都是森林，由于国民党制造民族隔阂，藏民经常躲在森林里打冷枪。晚上又看不见路，赶了半夜，才到达大草地，但前面的部队又走了。第二天我们又赶路，进入大草地才赶上了队伍。

过草地整整走了七天七夜。大草地的草兜很大，水是黑色的，有时也有块干地和小坡坡，或者有棵树。草地上没有居民，也没有敌人，但要同大自然作斗争。我是在中央纵队的后面做后卫工作。行军路上战士牺牲很多，牺牲了就扒些泥盖起来，做个坟堆以资纪念。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我还看见前面有一位战士，身子左右摇晃倒在水里，我赶快过去扶他，可是已经死了。我们的红军战士为了革命事业就是这样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的！

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也吃过草根。

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细雨霏霏，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阴霾满天，真是瞬息万变。到了宿营地，我们在地上挖个坑，垫点草，人就睡在里头，上面盖块油布或用雨伞支撑，以避风雨。在有小树的地方，就找些干枝烧起篝火，几个人围坐度夜。

## 七、脱 离 险 境

过了草地我们就到了班佑。班佑有一座大寺庙，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等已经先住在庙里。我也住进去了。毛泽东带着干部团、三军团住在离班佑大概不到十里路的巴西。

这时中央机关由凯丰负责，政府机关由林伯渠、曹菊如负责，总政治部由杨尚昆负责。上述单位都归我管。没有粮食吃，我们就到老百姓地里割青稞麦。芦花、黑水地方有一个寨子，那里有粮食，每个部队都先到黑水、芦花打粮，然后才到班佑。在藏族地区打粮，经常找不到人，割了青稞就在地里插个牌子，写明割的数量、单位，这是总政治部规定的。我们到老百姓地里割青稞，那是不得已的事。为了红军不致饿死，为了革命事业，只有这样。我们后勤部队是由白载昆带着收割，割后都插上木牌。据说老百姓回来，见到木牌很感动，有的把它保存起来，一直存放到解放后，作为珍贵的纪念。

在班佑时，有一次博古、洛甫对我说，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是不同意的。后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张国焘在

会上同意了，但会后他又不执行北上的方针。到了阿坝后，他借口噶曲河涨水和粮食困难，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右路军是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右路军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三十军、四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力。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仍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咛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守秘密。我接受指示后，就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杨尚昆，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负责人准备好。这天晚上，我到街上走了两趟，看看有没有人发现我们要北上的动静。我见四方面军的人没有发现我们北上的意图，就放心了。第二天凌晨我站在路口上等候他们，中央机关、总政治部都走了，唯有中央政府机关还没走出来，他们有银行、辎重，事情多。我见前面部队都走了，心中很焦急，就亲自跑到政府机关办公的院子里去看，他们还在打包。我说，你们不用打包了，把东西丢掉些，要带的东西驮在牲口上，马上出发。他们就按这个办法，很快出发了，我随后也走了，安全地到达了巴西。一到巴西，部队立即出发。后来四方面军的特务队长李特带部队来追党中央。但三军团在山上警戒，担任后卫，如果李特攻击我们，我们就自卫还击。后来李特走了，没有打成。我们终于脱险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有一条注释说中央“脱离危险区域”，就是指的这件事。前两年杨尚昆与我说起这件事时还问我：你当时站在路口做什么？我们都走过了，你还站在路口等。我说：等你们，不等你们走完，我怎么能走呢？我也问他，你怎么那时还在巴西呢？

他说他下午还在巴西，想向有关的人了解些情况。有人对我说，你回去问罗迈就知道了。当年的紧急情况，我们都还记得起来。

## 八、俄界会议

从巴西到了俄界，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以后的行动方针，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会议是当天上午11时开始的。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何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和我，也有李德。一军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却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七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这时，中央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在周恩来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北上。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的方针，这是不对的。毛泽东说，张国焘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南面地形不好，又是少数民族地区，给养无法解决，红军作战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来源，战略退路也没有，如果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带去走这条绝路。

第二，关于在何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毛泽东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所以一、三军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毛泽东分析了陕甘一带的地势、居民和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又有正确的领导，依靠游击战争，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目的的。

第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毛泽东指出，张国焘在通(江)南(江)巴(中)苏区时已经犯了部分的严重错误；在粉碎四川敌人的六路进攻，退出通南巴苏区后，便形成了一条错误路线。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曾想了许多办法来纠正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

会议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彭德怀、邓发、李富春、王稼祥、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严厉批判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路线斗争。有的同志甚至说如果张国焘坚持错误，他的前途将是另立中央与党对立。我在会上也作了发言，完全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和对张国焘的批判。我说我们党同张国焘的斗争是路线斗争，张国焘惧怕敌人，对在中国本部创造苏区无信心，这与他过去轻易退出鄂豫皖和通南巴是有联系的，这完全是他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党内搞小组织活动，公开在下层反对党、侮辱党。自六届四中全会以来，除罗章龙外，

还没有第二个象张国焘这样分裂党的人。我同意在陕甘广大地区建立根据地并打通国际路线。对白区工作应有布置。

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对张国焘要有步骤地处理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只在中央委员中公布，不再往下传达。

会议还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会议决定：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和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向干部说明当时的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俄界会议是同张国焘作斗争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中央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和处理意见都是正确的。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张国焘无视中央多次令其北上的电示和左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要求，率军南下，打出了反党旗帜，成立了伪中央。后来，由于中央的不断斗争和挽救，由于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斗争，特别是由于南下后到处碰壁，广大指战员更加不满，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同意北上。当在甘孜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又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继续北上，但他一直心怀鬼胎，不可救药，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只身投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叛党而去。

## 九、胜利会师

俄界会议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突



破天险腊子口，接着就过岷江。岷江水深流急，江面狭窄，那里住的是藏族同胞。过了岷江后，沿着洮河的右岸向甘肃的哈达铺前进。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等同志在一起休息。毛泽东向我打招呼：罗迈，你也来休息一下！我就下马休息，看到他们正在翻阅一张国民党的地方报纸，上面登了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我们才具体得知有这样大的红军在陕北苏区积极活动。党中央随即决定到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才正式宣布成立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共有六、七千人。中央派我随陕甘支队北上时，沿途检查军容风纪。因为这些地区的群众多是回族，搞好民族关系很重要。我跟彭老总一道走，一起到达吴起镇。吴起镇是陕北苏区的大门。我们到吴起镇时，后面还有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建国后先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常委）部的骑兵跟踪而来。另外，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毛炳文的骑兵也跟了上来。毛泽东在吴起镇召开会议说，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赶快打退他们。他集合支队干部讲话，动员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他指挥部队和敌人打了一仗，击溃了敌人，并俘敌一部充实了红军。随后，即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从此，党中央便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师，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毛泽东在论述长征的伟大意义时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终。长征一结束，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 初到陕北

## (一) 陕北苏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苏区，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以后，陕北就发展成为我党的革命大本营，延安成为我党指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

1. 陕北苏区的概况。陕北苏区和红军是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前，在陕北存在着地域隔绝的两个苏区、两个党组织和两支红军：一是陕甘边苏区，设有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归陕西省委领导，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六军；一是陕北苏区，设有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领导，也拥有一支红军队伍，即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五年二月初，双方经过协商，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和西北军事委员会（一说这个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四年底。委员会主席，我记得是谢子长，一说是刘志丹），实现了两个苏区党组织和两支红军的统一领导。谢子长负伤去世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安定六座县城。长期被分割的两个苏区联成一片，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人口九十万，建立了二十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

扩大到五千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人，革命形势是很好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朱理治以中央代表名义到达陕北，同郭洪涛、聂洪钧等一起，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九月中旬，徐海东、程子华率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川永坪镇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随后召开了永坪会议，撤销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朱理治等组成“中央代表团”（一说为“中央北方局代表团”）；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任正、副书记；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统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任政委；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由聂洪钧任主席。

当时，陕北苏区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粉碎敌人从七月开始的第三次“围剿”。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歼敌东北军一一〇师近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全部约三千七百人，击毙师长何中立，参谋长裴焕采。十月二十五日，在榆林桥又歼敌东北军一〇七师一个加强团，活捉团长高福元。但是，“围剿”还未能粉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后方的瓦窑堡发生了错误的肃反事件，逮捕了刘志丹等同志，随后又发展到前方，在红二十六军中也进行了“肃反”，并且错杀了一些人，使陕北这个硕果仅存的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

2. 党中央到达后的紧急措施。党中央到了吴起镇以后，即派贾拓夫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去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我与他同行（贾拓夫于一九三四年代表陕西省委到中央苏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会后，留中央白区工作部工作，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并任总政破坏部部长）。我们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曾有同志向党中央反映陕北肃反和刘志丹被捕的事，现在得到了证实。我们当即电告党中央

毛泽东等同志。党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随后，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来到下寺湾，听取了郭洪涛的汇报。党中央在下寺湾召开会议，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决定分两路行动：一路由洛甫、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和我率中央机关从下寺湾直接去瓦窑堡（陕甘晋省委驻地，苏区的中心），于十一月七日到达瓦窑堡。当时还指定王首道等先期到达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战第三次“围剿”陕北苏区的敌人。

3.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在西北建立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劳山、榆林桥两个战役击败了敌人，但未能粉碎“围剿”，敌人又以五个师的兵力再次来犯。东边一个师沿洛川、郃县大道北上，西边四个师由甘肃的合水、庆阳，沿葫芦河向郃县方向进犯。不粉碎敌人的进攻，就不能彻底击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甘泉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共同商量决定了直罗镇战役计划。十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十五军团会同作战，歼敌一〇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又在追击中歼敌一〇六师一个团，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终于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方面军营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央领导我们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 （二）参加纠正错误肃反

上述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九、十月间的陕北错误肃反事件，是

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但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最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中央指定的五人小组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老干部反复研究、商讨，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结束这场争论，这就为西北光荣历史的编撰扫除了路障（详见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二十八号文件）。

下面简述我参加处理这件公案的史实：

1.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

2.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底，开了一次平反会，洛甫、博古、刘少奇等出席，五人委员会也都参加了。记得这次会是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sup>①</sup>。王首道代表五人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讲了话，他说：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中央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会上，宣布了党中央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sup>②</sup>。他们以后也作了检讨。

---

<sup>①</sup> 《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见《六大以来》（下）第372—373页），指出：“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编者注。

<sup>②</sup> 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关于戴季（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指出陕北肃反

3. 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的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西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我对陕甘边干部一个也不认识，但我出席了省委会议，所以对地方干部不太合理的分配，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4. 一九三七年去陕甘省委工作期间，在省委和关中特委，我先后听到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刘景范等的叙述，才认识到错误肃反的根源和一九三五年《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也有缺点错误。回延安后，我向毛泽东、洛甫作了反映。

5. 我肯定过三点史实。一九八一年，我为了搜集在延安工作时期的资料，到了西安。一些从事党史研究和党史讲授的同志对我说，高岗问题发生后，边区党史不好讲了，要求我讲讲这个问题。我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肯定了三件史实：第一，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位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讲话记录送原陕北、陕甘边几位负责同志看过，都表示同意。

### (三) 参加瓦窑堡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以后，于十二月中

---

错误的“主要责任，应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继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鸿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继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的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鸿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编者注

旬到瓦窑堡。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在洛甫住的窑洞里召开，由洛甫主持。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和我（名单可能有缺漏）。

会议主要讨论抗日问题。会议前夕，张浩（林育英）于十一月下旬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奉共产国际之命，装扮成商人经外蒙古、内蒙古到达瓦窑堡，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消息和季米特洛夫在“七大”上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这个报告的中心是论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会上，毛泽东作了发言，并进行了充分的认真的讨论。在会议开始时，博古仍有“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很快取得了一致。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

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十二月二十七日，党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了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比较多。会上，由毛泽东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强调了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是继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之后，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纠正；是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重要文献。

它纠正了党内在一个很长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混同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错误，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农大众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中央便利用一切可能向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士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工作，并派刘少奇去领导华北的工作；稍后又派冯雪峰去上海接通党的关系。从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陕北，更是上上下下一起开展争取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的活动。吴亮平主编的《打回老家去》小报，与各地的口头喊话相结合，在东北军的下层中有很大的影响，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 （四）中央机构和地区组织的变动

党中央初到陕北时，中央机构作了相应的变动。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工作。西北中央局内部分设：宣传部，部长洛甫兼，副部长吴亮平；白区工作部，部长张浩；组织部，部长是我。

军委和政府机构也有变动：

遵义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朱德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没有变动。会后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当红军离开遵义继续长征不久，党中央又先后决定博古的职务由洛甫代替，负总的责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行动。到陕北以后，改设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办事处主席博古，财政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长邓



发，土地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长邓振询。后又设立外交部，部长由博古兼任。

同时，陕北苏区的行政区划分及领导机构也作了变动。撤销了陕甘晋省委，把苏区划分为陕西省、陕甘省（以下寺湾为界，下寺湾以北为陕西省，下寺湾以南为陕甘省），并设立了三个特区。这样，党的领导组织就有陕西省委、陕甘省委和三边、神府、关中三个特委。

陕西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长王达成，妇女部长白茜（后为史秀云），工会主席高长久（兼工会党团书记），军事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省委机关在瓦窑堡。

陕甘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组织部长欧阳钦，白区工作部长张策，军事部长肖劲光。省委机关在甘泉下寺湾。陕甘省所属的地区面临东北军、西北军的驻地，在主力红军东征期间，许多地区如甘泉、邠县等被他们占领了，所以工作困难很大。省委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苏区、地方武装，以及党的组织，同时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三个特委为：

1. 三边特委，书记谢维俊。他在江西“反罗明路线”斗争中受批判后，调中央组织部工作。后来参加长征，一路工作积极负责，到达吴起镇以后，党中央派他在吴起镇一带消灭土匪部队。特委成立后，由他任书记，慕生忠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刘景范。独立营营长杨琪。一九三六年发生三边事变，谢维俊被叛匪杀害。

2. 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宣传部长张江全，组织部长张秀山，少共书记张汉武。红三团团团长王兆相。对于神府特区的工作，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作了研究。毛泽东、洛甫、邓发、张

浩以及贾拓夫、王达成、杨和亭、张江全等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方很重要，是个抗日前哨！”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讲到对地主、富农的政策。他说：对地主，在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以后，要和农民分同等的土地；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不分浮财。

3. 关中特委，原为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时，派贾拓夫为书记（后由习仲勋接任），张德生为组织部长，黄春圃（江华）为司令员，秦善秀为苏维埃主席，张邦英为副主席，陈国栋为游击队指挥。

以上是初到陕北的情况，以后有改变。

### （五）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当时的中央组织部机构精简，只有一个部长和两个科：干部科和组织科。干部科长郭滴人，组织科长金维映，总共只有几个人。由于瓦窑堡会议以后全党的工作都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目的进行，中央组织部也不例外，组织科主要是参与和帮助当地的工、农、商、学、妇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党校的招生和毕业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调配工作。

我同时照管陕西省委的一部分工作，出席陕西省委的会议，并且在中央党校教“党的建设”课程，也参与中央党校的建设事宜（中央党校的情况将另篇叙述）。

党中央迁到保安以后，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打通对外联系的工作。如陕西省委的汪锋、孙作宾，上海的董健吾牧师等，都是我接待以后报中央安排工作的。冯雪峰就是在接待董健吾牧师以后，经组织部派到上海接通关系的。

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离开中央组织部。

## （六）联系陕北省委的工作

陕北省委在瓦窑堡被高双成侵占以前，与党中央驻在一起。我刚到瓦窑堡时，洛甫就要我联系陕北省委，参加省委的会议和某些工作。在此期间，我主要参加了省委的下列工作：

1. 帮助扩大红军。一九三五年末到一九三六年初，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七千人。这是陕北省委一项没有经验的工作；陕北地广人稀，要扩大这么多的红军，难度很大。我帮助省委召集各县领导干部会议，介绍中央苏区扩红经验。一九三六年一月，基本完成这次扩红任务。之后，省委又召集包括各县领导干部在内的扩红活动分子会议，确定三月底以前继续扩红二千六百人。在这次会议上，我又介绍了中央苏区的经验，并帮助总结了上次扩红的经验。最后完成了扩红计划。

2. 参与修订各项政策。党中央逐步将各项苏维埃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或改变，使之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富农策略的改变。刚到瓦窑堡时，洛甫就要我研究和起草关于中立富农政策的文件。我和王观澜、郭洪涛等共同研究，并主持起草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发出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下，“富农也开始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革命，或采取同情与善意的中立态度，不论是富农自己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甚至中立态度，对于我们现在不是可怕的，而是有利的。”决定指出：“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

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佣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这样的改变,可以使富农对苏维埃政府采取善意中立的态度”。这是一个很大的带有根本性的转变。

根据中央关于中立富农政策的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颁发了一个命令,规定“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高额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以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同时,土地政策也作了调整,如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布《土地政策新的改变》,规定地主在没收其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对于小业主的土地不没收;对于大农业企业主按已公布的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等。

商业政策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颁布布告,规定完全取消对苏区工商业的一切税收,包括营业税和关税,不仅苏区内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而且“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到苏区来营业”;“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

除了改变若干经济政策外,政治上的政策也有明显的变化。西北办事处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公布的《西北苏维埃选举法》,和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颁布的选举法比较,有如下重大的改变:第一,一切脑力劳动者(如医生、著作家、教员等)都有选举权。第二,雇佣工人在十人以下、资本在五千元以下之工商业主也有选举权。第三,在苏维埃政府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不论其出身如何,均可获得选举权。此外还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

区域内党的工作基本原则草案》，发表了《中央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宣言》等。

上述各项政策的修订，我都或多或少地参加了一些工作。

3. 参加讨论和组织地区工作。我与陕北省委的同志一起，讨论过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和办法，讨论过神府特区的工作，特别讨论了内蒙地区的工作，主要是伊克昭盟的工作，帮助组织了以高岗为首，贾拓夫、曹动之参加的内蒙工作委员会。内蒙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党中央到陕北后，是始终重视内蒙工作的。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内蒙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将回族工作也包括进去。

4. 做东北军的工作。我们还讨论和发动群众利用《打回老家去》小报的内容进行喊话，做东北军士兵的工作。为此设立了许多工作站，我们在工作站活动，东北军士兵见了也不开枪，说明我们的争取工作是有成效的。

这个时期，我和陕北省委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

党中央迁到保安后，我随中央到了保安，陕北省委迁至安定县（今子长县）谭家营，我和陕北省委的联系就断了。

## （七）在定边三个月

1. 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九月，毛泽东叫我去他那里。我到达时，宋任穷已在座。毛泽东对我说：准备打宁夏，夺取银川，因此要组织定边工作委员会，进行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要我任工委书记，宋任穷（驻防军政治委员）、宋时轮（驻防军司令）、高岗、贾拓夫为委员，与定边、盐池县委密切合作。九月二十二日，我同宋任穷一道去定边。临行前，洛甫对我说，组

组织部的工作由他照管。到定边十多天后，接到他的来信说，中央认为中央组织部长改由陕北同志担任为好，决定由郭洪涛接替我的职务。我立即去信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后来知道，是博古任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我的免职是出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等的要求。

定边工作委员会做了下列工作：同定边、盐池两个县委商定了白区工作计划；查明了吴忠渡河点和攻城有关的一些情况；组织了回民游击队；为团结哥老会开了香堂。工委的第二项任务是加强内蒙的工作，做了一些伊克昭盟的工作，但不多。

定边工作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到两个月。因为情况变化，原计划取消，工委宣告结束。

2. 组织筹粮委员会。红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在静宁会师，经过山城堡对敌战斗后，全部后撤休整。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驻在定边附近。党中央又电示我和董必武（中央党校校长。当时中央党校也迁到了定边）负责组织筹粮委员会，高岗、贾拓夫均为委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去总指挥部。彭德怀问我筹粮情况，我说，只能保证三个月。他说，可打安边。我说，也筹不了多少。他说，中央在考虑来个“小长征”，打到汉中去。

从彭德怀处回定边不过两三天，又接到他的电报，说发生了西安事变，捉了蒋介石，红军主力即日南下，不用再筹粮了。筹粮委员会也就结束了。

## （八）任陕甘省委书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中央来电要我回保安。我想绕道庆阳同李富春谈谈江西“反罗明路线”的教训，去信约他在庆阳会

晤。到庆阳时，蔡畅在等我，李富春未到，未能多交换意见。

回到保安，洛甫告诉我，中央决定成立陕甘省委，以加强关中特委的领导，去发动西安四周农村的群众，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如内战再起，即利用机会把苏区向南推进。并决定我为省委书记。现在记得的省级干部有：张邦英、李华生、杨一木分任组织、宣传、统战（白区工作）部长，申力生任秘书长；刘景范、霍维德为省苏维埃正、副主席，艾禁南为财政部长；白向银为团省委书记，黄静波为团省委宣传部长。省委驻地在黄陵县店头镇。当时，省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已经前去省委驻地。洛甫要我立即去延安同郭洪涛接头。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我从保安出发。到延安后，郭洪涛要我缓去省委，先和张邦英率两支游击队问道去关中特委，在那里同特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商量向南发展计划。张邦英是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对桥山山脉的山路很熟悉。沿途保安团受西安事变影响，张邦英打个招呼，互相戒备，互不侵犯，就过去了。一路很顺利，很快到达关中特委驻地淳化桃曲河，见到了特委书记习仲勋。

我们从特委了解了特区的情况，并初步商订了向南发展的计划，等候前敌总政治部约我们去商谈。

住在特委期间，上午我自己看书学习，下午同习仲勋、张邦英、张策及特委其他同志一起研究工作，交谈情况，主要谈了特委所属各县的情况和陕甘苏区的历史变迁，也谈了陕北错误肃反和纠正肃反以后的问题。主要是他们谈，我只提问题，从无知到有知。有时我也谈些他们关心的红军长征的情况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我们还去过正宁、宁县两个县委，同县委的同志谈过话。

在关中特委住了约半个多月，得到任弼时（前敌总政治部主任）的通知约我去前方接洽。我和张策在淳化县城见了。他告诉

我们，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国内和平的局面还不很稳定。我们一起商定了向南发展的计划。我当天即回特委，又同特委进一步商量了一些具体问题，耽搁了一些日子，我才动身去省委。出门走不到一里路，通讯员赶着送来中央给我的电报，说两党谈判有进展，总的和平局面已定。省委结束，人员回延安。我回去同习仲勋谈了请他按新的形势部署工作之后，仍向省委驻地店头镇前进。

到店头镇后，开了两天会，彼此汇报了工作情况。又召集了几个新解放县区的领导同志，讨论和部署了新区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省委结束。工作人员回延安时，经过甘泉、鄜县。数月前，这两县县城由国民党的县政府保安团队控制着，我们曾想打下甘泉，但未成功。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影响和我们的统战工作，这两个县城已成了统一战线区。在这里成立了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后援会”。我们进了这两个县城，曾在鄜县县城住了一夜。

### （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党中央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计划基本实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深入中国本土的危急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等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接受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发动了震动全国的爱国义举，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们在定边获悉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会后，我们致电党中央反映了群众的愿望。这是革命人民对蒋介石多年来坚持独裁卖国反动统



治的深刻仇恨的自然反映。但党中央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一件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的事情。当时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并企图取代蒋介石。在西安，我们一方面要对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宣传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根本条件。在这方面，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做了很多很艰巨的工作；同时，在国民党区域，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爱国民主人士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事变得得到合理的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同意实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准备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至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相对稳固，党中央建立新的革命大本营的计划基本实现。

# 回忆中央党校

一九三七年三月陕甘省委结束以后，我从黄陵店头镇回到延安。五月，因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调任抗大四大队政治委员，中央要我接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我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时，曾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到陕北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也一直代表中央管理中央党校，与中央党校有较长时期的密切关系，因此我想对中央党校的这段历史概况作一简要的叙述。

中央党校从一九三三年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瑞金时期；初到陕北时期和延安初期。

## (一) 瑞 金 时 期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三月十四日)五十周年，宣布成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央党校。校址设在江西瑞金。首任校长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不久任、杨离职，改由张闻天兼任校长，董必武兼任副校长，罗明(即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打击乃至撤职的原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任教务主任。专职教员仅有成仿吾、冯雪峰。他们是一九三四年为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到苏区的，讲政治常识。其他都是兼职教员，如董必武讲苏维埃建设，刘少奇、陈云讲工人运动，我讲党的建设等。这一时期的教学，基本上是训练班性质的。

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董必武、成仿吾、冯雪峰等党校的干部参加了长征。党校的一部分学员和由地方调来准备创立新苏区临时放在党校学习的干部，也参加了长征。这部分人员处理工作是我负责进行的。处理原则主要是两条：一是个人能力能否胜任新苏区工作的需要，二是身体情况能否适应长期行军的艰苦生活。参加长征的教职员和学员都编入中央军委第二纵队的干部队。

## (二) 初到陕北时期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十一月到达瓦窑堡，立即恢复中央党校。援瑞金旧例，仍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校长、教务主任由董必武、成仿吾分别担任，龙标贵负责总支工作。十二月即开始招生，校址设在安定第二完小。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相应的一整套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设三个班，由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分任班主任，马树良、黄元庆任军事教员，同时还办了一个教员班，学员有白栋材、李景膺、吴文遴、马定邦、吉汉杰、姜旭等。一九三六年二月，主力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党校的部分学员和教员由成仿吾带队参加东征，学校暂停招生。此时，榆林地区的地方军阀高双成部队乘机袭击瓦窑堡，党中央撤至保安，中央党校也同时撤离。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央党校到达保安，分散住在以任家坪为中

心、上下二十里的一条大山沟的四个村子里。此时，主力红军东征回来，从山西带回许多青年学生，大部分进了党校，设立了高级班、普通班。原来的教员班改称高级班，由成仿吾任主任，白栋材任班长，另设八个普通班。高级班的学员大都同时兼任普通班的主任或教员。这种形式一直持续到定边，迁到延安后才改变。在保安，新增白区（即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班和白军（即国民党军队）工作班，专门训练去白区和白军中做秘密工作和统战工作的干部。此时，董必武仍讲苏维埃建设，周恩来、邓颖超也到白区和白军工作班讲课，我给同校部驻在一处的高级班讲党的建设。学校物质条件较差，住的、吃的、烧的都困难，书籍很少，更缺乏马列著作，但大家情绪饱满，求知欲十分旺盛。

一九三六年九月，天气冷了，为了解决学校的吃、住、烧等问题，中央党校又迁到定边。不久，四方面军也带来一个党校，与中央党校合并，人员就更多了。好在定边的物质条件比较好些，吃的问题基本解决，大家可以比较安心地学习了。

### （三）延安初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东北军撤离延安。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一月进入延安，中央党校也奉命于二月迁到延安，校址设在延安东郊桥儿沟天主堂旧址内。

我从一九三七年五月接任中央党校校长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这个岗位，在中央党校工作了一年。过去我从上面参加对中央党校的领导，现在又直接领导中央党校，不仅参加了教育人的工作，同时也使自己受到了教育。

在这一年里，学校的主要干部有：教务处主任成仿吾，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成仿吾调任陕北公学校长后由王学文继任；副主任

刘芝明，总支书记先后有廖志高、李景膺、方仲如、张德生、张启龙，宣传委员先后有罗青长、夏耘、温建平、张拓，组织委员先后有章夷白、秦化龙、余代生，秘书王安邦；总务处长先后有白栋材、吴文遴、张志良、马定邦，副处长赵成群，管理科长王大甫，会计出纳牟泽銜，后为杜天长；自卫军大队长陈庆先，副队长李振运、赖传珠。学员不再按原工作性质编班，也不再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按他们的来源和文化程度高低编班，共编了十五个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先学汉语，再学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期限最长；八班是抗大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掉党的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工农、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十五班我已记不清了。

课程比瑞金和初到陕北时期完整了，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并设有各个相应的研究室。党中央也在这里设了一个“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取消了苏维埃建设课。

王学文接任教务主任后，在教学上建立了一些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业鉴定制度，就是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考核或评定的制度。这样，党校就有了两种鉴定制度，一是组织鉴定或政治鉴定制度，衡量学员的党性修养；二是学业鉴定制度，衡量学员的学习好坏，学业鉴定做得很仔细，对学员的学习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时，教员比过去多了，毛泽东讲过哲学，洛甫、博古、刘少奇也讲过课，我和董必武、廖志高等讲党的建设。部分干部如

成仿吾、王学文、白栋材、吴文遴、罗炳辉、姜旭等都有兼课，胡乔木、柯庆施、艾思奇、吴亮平、杨松、何干之、王思华、李景春、刘芝明、钱维仁、贾若瑜等都在党校任过教。那时陈伯达任“中国革命问题”研究室主任，也讲过课。

中央党校在我任职的这一年来，先后毕业学员约五、六百人，连同瑞金、陕北两个时期毕业的学员，总数达千人以上。以后为数更多。这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财富。当时在党校学习的同志现在遍及全国各条战线，有的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正在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也有的已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林瑾（后改名林平），四川人，一九三八年五月在中央党校毕业，派往湖北省大冶县从事工运工作，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二十一岁。这样的同志还有一些。回忆党校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她）们的名字，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吧。

#### （四）离 职

一九三八年四月，洛甫来中央党校传达三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完毕，我陪他从礼堂出来，对他说：“你在这里吃饭吧！”他说：“不吃了，给你谈一件事吧！”我问什么事？他说：“中央决定你到陕北公学去任副校长。”我说：“可以。”又问到那边应该注意什么？他说：“一是帮助学校领导搞好团结；二是要放手吸收新党员，可在青年学生中发展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我问：“何时去？”他说：“一个礼拜之内就去。”

我离开中央党校后，即由康生接任校长。一天夜里，他把我找去，说：“你应该办移交！”我说：我不知道是你来作校长，因期限已到先走了。要交现在就可以交，印章和文件在校长秘书罗青

长手里，教务处是王学文管的，管财务的有五人小组，每月开支由小组审查签字<sup>①</sup>，有问题再找我。康生没有纠缠，说：“不必另办移交了，你可以回去了！”我就回来了。这就是我在中央党校最后的工作。以后听说，康生一进学校就宣布罗迈是“半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 （五）经 验

1.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当时尚无这种说法，但已有这种实践，即按实际需要安排教学。第一个需要是向群众学习。延安时期，新来的学员都要到农村去生活一段时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作为入校第一堂必修课。这对提高学员的思想素质，培养学员的群众观点、实践观点和劳动观点，有很大帮助。二是学习军事。内战刚刚结束，又响起芦沟桥抗日的枪声，全党都要学习军事，准备打仗，党校也不例外，因此开设了军事课。赖传珠、罗炳辉、陈伯钧、郭化若、黄治等军事干部除作学员外，还兼任军事教员，对学员进行制式教练和作战训练。还组织过半个月的野营学习，在从延安到延长二百多里的路程上，每日进行数十里的急行军，还要学习进攻、防御、侦察等科目，虽然十分艰苦，但情绪很高涨，受到了一次严格的军事和纪律教育。罗炳辉

<sup>①</sup> 关于财务，一九二三年我开始担任湘区党委工作时，就决定由组织委员何叔衡兼负监督审查财务之责，那时每月有几百元收支，按月结帐都由他审查。一九二九年我担任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书记，常委规定十元以上的开支由常委核定，并由常委指定以陈云为首的一个五人小组负责审查帐目，按月结算，签字为据。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为首的中央开除赤色互济总会主要负责人戴晓云党籍，一条主要理由就是他从救济款中给李立三提供了暴动经费。开除戴晓云以后的若干日，王明也向我提出要审查省委的帐。我告诉他，五人小组健在，可请他们现场作证。审查结果，只发现我有一次批的十元钱开支下落不明。我就提出从生活费中扣除。王明说：“不用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就把它运用到了中央党校以及陕北公学。

曾经亲自领导了各种野营练习。他对学员们风趣地说：你们不要看我比你们胖。爬山肯定胜过你们。事实确是如此，在几次爬山中，他总是走在前面，第一个登上山顶，真正发挥了军事指挥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学习马列主义，对一般学员来说是新鲜事，有的虽然入了党，但还没有正式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有的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学习，对他们说来确实是一种启蒙教育，时间不长，收获很大。现在白如冰、罗青长、林肖碛、黄华等都有反映。白如冰说：“我过去心中只有一个字，就是‘干’。从进中央党校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为以后更好的工作和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罗青长说：“我们在党校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双胞胎’，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觉得很新鲜。我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从党校开始的。”林肖碛说：“在中央党校短短几个月的理论学习，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它不仅使学员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而且为以后的自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些回忆都是很实在的，说明他们在党校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基础教育，找到了一个自学的门径，帮助他们在往后的工作中继续深造。在理论学习中，特别强调和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如学习政治经济学，大家联系自己所了解的社会经济情况，作了分析，写了心得，体会就较深，收获就比较大。又如，当时抗大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红军干部因恋爱问题枪杀了一个女青年。中央决定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定罪。党校五班学员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是否应该判处死刑问题，争论激烈。多数支持中央建议判处死刑，但又表示惋惜，心情十分矛盾。在这一事件中，每个学员都经受了一次政策水平的检验。

2. 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党内生活。党的多数组织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党内生活充满民主气氛，上下左右互称同志，大家平



等相待，友爱相处，亲密无间。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开展得很好。许多同志至今还怀念党校生活，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全党服从中央是普遍自觉的习惯。举个例：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全党开展了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斗争。党校也开展了这一斗争，董必武未走前已经开始，我到来后继续进行。鉴于党校有许多四方面军的干部，我们在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中，按中央方针，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张国焘个人的错误加以严格区别，四方面军干部要保护，张国焘错误要批判，并发动四方面军干部一起批判。陈昌浩和张琴秋在党校就参加了批判并作过自我批评。这样一来，我们就达到了既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又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的目的，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此事黄华回忆说：“批判张国焘分裂中央，是我在党校学习期间的一件大事，大大提高了我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认识，对坚持党的组织原则和维护党的统一、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的认识。”

3. 坚决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党校的领导和教员对学员都十分注意革命气节教育，帮助大家了解建党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牺牲献身的无数先烈如李大钊、王荷波、彭湃、蔡和森、方志敏、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向警予等的英雄业绩，激励他们要象革命先烈那样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终身。实践证明，我们的同志对抗日是坚定的，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忠诚的，同志间是团结的。苏区同志和白区同志，年青同志和年老同志，新干部和老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等等，相互之间都很团结。白如冰回忆说：“当时的中央党校有一个很好的校风。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有新同志也有老同志，有老师也有学生，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的气氛很

浓，感情很深。”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大家对军事训练、政治学习都很积极，文化娱乐活动也开展得生动活泼。文化娱乐活动是由学校俱乐部组织的，主任是李剑白。未开会，先唱歌。有独唱，也有小组唱。王任重、许明都很会唱歌。有一次开大会，我叫“王任重唱一个”！王任重就唱了一支《大刀进行曲》，许明也唱了《松花江上》。许明是十二班的女同学，几乎每次集会都要请她唱《松花江上》。她唱得很感动人，有时她自己也唱得掉下泪来。大家亲昵的给她一个外号“松花江上”。象这样曾经受大家爱戴的歌手，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了。

中央党校确实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革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董必武是艰苦奋斗的模范。那时，他虽已五十多岁，是革命队伍中的几个老同志之一，但在生活上却从来不特殊，行军不骑马，把马让给病号或用来驮公物，自己同学员们一起徒步行军。成仿吾的行李最简朴，长期放在一个马袋里。学习的物质条件很差。我在保安给高级班讲课，课堂就设在一棵大榆树下，大家席地而坐，情绪都很高。写字只张启龙有一支钢笔，其他同学全用铅笔。斯诺到保安要参观中央党校，他是当时第一个到苏区来的外宾，理应从优招待一番。成仿吾派人跑了几个村子买食物，只买到几个鸡蛋，用白水煮熟了请他吃。当时物质条件的艰苦不是身历其境是很难想象的。抚今追昔，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党校迁到延安后，生活有所改善，每人每月还能发一元二角的津贴费，饭也可以吃饱了。但缺菜、少油，粮食主要是小米，很少吃大米白面。过年过节改善一次生活，吃点肉，大家就很满足了。即使如此，学习是很刻苦的，有时晚上没有灯，就借助月光学习，甚至摸黑讨论问题，气氛同样热烈。

# 回忆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关中栒邑设立分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延安陕公总校迁到栒邑与分校合并。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工人学校、安吴堡青训班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晋察冀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陕北公学，在延安重新招生，称为后期陕公。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党中央又决定将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结束了陕公的历史。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陕公工作，先后担任过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分校校长、后期总校校长等职。我和许多同志在陕公的那些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共同切磋的日日夜夜，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 一、陕公的创立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十二月，党中央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长期统治党中央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从此，革命进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节节逼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事变以最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结局得到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威望。它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蒋介石残杀千百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血海深仇，协同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他；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组织者，抗战离不开共产党；因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青年们是为追求真理、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而来。从我们党来说，为了开展全民族抗战，也急需增添新的力量，理所当然地把青年视为极可贵的财富。但当时延安只有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它们的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党政干部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无法容纳来延安的广大知识青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增设了第四大队，这是我党在延安培训全面抗日青年的第一所熔炉。

“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广大国土相继沦陷，因而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的青年，与日俱增。为了开展全民抗战，以最快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战的人才，党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

本来我们想把陕公取名为“陕北大学”。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边区要办一所大学，不能不事先通报国民党当局。国

国民党以边区地域小、已有了抗大等为由，不同意再办“陕大”。这样，我们便改称陕北公学。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办过上海中国公学，陕公的名称，一方面是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學生进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學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党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成仿吾（当时是中央党校教务长）为陕公校长，他带来十几个干部负责筹建工作，他们是陕公的开拓者。

九月九日，《新中华报》刊载了筹办陕公的消息。《新中华报》载明，陕公的发起人为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国外）、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创办陕公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校址在延安东门外；设有政治经济、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个系；准备招收学员一千人，每系二百名。随即，我们在三原、西安、延安等地设立了报名处。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介绍、接收陕公学员的重要阵地。

九月十四日，《新中华报》又刊载了陕公的招生简章。简章对陕公的办学宗旨，各系的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考试日期、地点、学员生活待遇、毕业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简要介绍。关于报考资格，我们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十八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

党中央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为抗战培训人才，输送干部。因此，陕公的学员，随到随编班，一面招生，一面办学。最初的学员，大约有从抗大转来的二百名，延安的一些部门、白区党的

一些单位、爱国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等)也送来一批学员。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到校学员有三百多名。九月一日,正式编班上课。

初创时的陕公,领导机构很简单,干部也极精干。在校长领导下,设有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部)、校务处等三个部门。教务处长邵式平,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周纯全,校务处主任袁福清,秘书长饶志雄。中共陕公总支委,是学校专做党务工作的组织,第一任总支书记宋琏(女),以后是季凯、申力生等。陕公最高党的领导机构是党组,设有党组书记。

陕公最初开设三门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授课教员,除学校的行政领导如邵式平、周纯全等兼课外,专职教员有周起应(周扬)、李初梨,聘请的有吴亮平、凯丰,约请的有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中央的大力协助和学校的努力下,教师的阵营很快得到加强、充实。党中央将一些名学者、名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吕骥、李凡夫等从白区调到陕北,在陕公任教;另外聘请、约请的教员也大大增加,如张如心、李培之、宋侃夫、林俚夫、邓止戈、何定华、李唯一、贾克、陈昌浩、陈伯达、徐冰、陈唯实、王观澜、毛齐华、杨松、任白戈、王思华、贾侃、李舜初等,都先后在陕公讲过课。

一九三七年十月,陕公学员已编了五个队,第一到第四队是男生队,第五队是女生队,共约六百人。十一月一日,陕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宣告陕北公学的诞生。

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由中央党校校长调任陕公副校长和党组书记。

## 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公的亲切关怀

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陕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讲话。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讲陕公的任务，他说“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炼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一生，号召陕公学员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要象鲁迅一样，“用显微境和望远镜观察社会”，“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要象鲁迅一样，决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利诱、残害，“一点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还表扬了陕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勤恳学习革命理论的精神。他说，陕公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创造革命先锋的场所。”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为陕公写下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陕公一创办，在财政、物资方面就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九三八年三月，当陕公发起向国内外要求支援时，毛泽东在我们出版的《援助陕公》的小册子上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容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在办学过程中，毛泽东对陕公的关怀是经常的、多方面的。以一九三八年为例：三月三日，他参加了六至十队的毕业典礼，会上他作了“临别赠言”，说陕公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陕公讲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四月一日，他参加陕公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首次讲述我党我军的“三八作风”问题，对其中的第一、第二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了详细阐述。四月五日，毛泽东在陕公讲国共合作问题。五月七日，他在陕公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勉励学员要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六月二十七日，他在陕公讲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党的基本战略持久战问题，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员作了介绍。毛泽东还给陕公师生讲过哲学课，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党中央的其他许多同志也非常关心陕公的成长。周恩来在陕公作过关于大后方的抗战形势和平江惨案的报告，朱德作过关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和青年修养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此外，任弼时、王若飞等都到陕公作过重要讲演。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陕公能迅速发展和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



### 三、陕公的教育方针

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斗争环境密切联系着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所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六届六中全会又规定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尽快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等。

我们根据党中央关于战时教育的基本方针，根据陕公的性质、学员的特点等等，规定了陕公的教育方针：

第一、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

第四、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第五、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培养革命的实际主义与民主作风。

陕公最初的招生简章曾规定设置五个系，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设想脱离实际。因为，当时有的系如医学、国防工程，延安无条件设立。以后陕公不分系，只分普通队和高级队。普通队培

养前线与后方急需的抗战民运干部，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到四个月。高级队培养学校的师资，学习期限为一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普通队。

普通队开设四门课程：

1. 社会科学概论，又称“政治常识”。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使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初步懂得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识中国革命不仅有当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问题，而且还要谋求社会解放、阶级解放。讲这门课的有李凡夫、吴亮平、张如心等。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的产生、形成和意义，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又斗争又团结，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这门课有史有论，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学员们非常爱听。讲授这门课的有邵式平、何干之等。毛泽东每次到校讲演，也总要讲这方面的问题。

3. 游击战争。主要讲游击战的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最初讲这门课的是周纯全，他是从四方面军来的，是位经过长征、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讲课具体生动，绘声绘色。邵式平、张然和也讲过这门课。

4. 民众运动。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主要讲群众运动知识，如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以及各种政策、法令，如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合理负担、妇女解放、扫盲、儿童站岗放哨等等。讲这门课的有邵式平等。这门课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〇年底，是我们军队和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那时我们派些干部深入敌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里就有我们陕公的功

劳，有我们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

除了上述四门课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主要是讲国内外和边区的形势，这对学员开阔眼界，保持清醒头脑和增强胜利信心，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常请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来作这方面的讲演。

上述课程的内容、讲授的份量、时间的安排都不是死板的。有时，前线特别需要民运干部，我们就加强民众运动课程的份量。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发表后，我们就重点讲授。国民党搞反共磨擦，统一战线课程内容也作相应的变化。

陕公课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启蒙性。由于前线急需干部，学习时间又短，我们只能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让学员短期学习后就立即投身于实际斗争，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和积累经验。实践证明，这种启蒙性教育是成功的。第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课程的开设，不仅是为了满足斗争的需要，在讲授中有史有论、联系抗战实际和同学的思想，而且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也是密切联系的。在校内，结合游击战课程，经常举行各种军事演习。但是，这些活动只起辅助作用，主要还是搞好课堂学习。

陕公的高级队，专门培养师资。陕公本身的师资需要补充，延安其他许多干部学校也向我们要教员。高级队学习期限一年，开设的课程也较多，计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中国问题讲座（如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边区经济、工农政权问题等）、三民主义研究、战区政治工作等。

高级队各课的内容，比普通队也深得多。比如马列主义课程，要讲不少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都是必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课程，还要学《资本论》。

不论是普通队或高级队，我们在教学中，都注意贯彻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历史到理论等项原则，也注意了各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一个时期，在课程的设置和讲授上，我们比较强调少而精。陕公是一个短期干训班性质的学校，搞多而杂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从学习规律来说，人们的知识总是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对学员来说，他们应该尽量的多学一点，学好一点。所以，我们不把少而精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我们强调的是刻苦。

#### 四、陕公的教学组织、教学过程

陕公的主要教学组织是教务处、队、班。在陕公，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因此教务处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它是全校最高学习领导机关。课程的设置、教员的配备、教材的编定、教法的研究、学员的学习考查等等，均统一由教务处负责。

教务处下面，设有教育科、学习指导科、军事教育科、各科研究室（即各科教研室）、图书室、陈列室。学习指导科，是教务处直接领导教学的行政机构。以学习指导科科长为首、吸收各科教员代表、学科指导员、各队队长参加，组成学习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教学计划的制定，并实地指导学员学习，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学员编为队、分队、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有学员一百到一百二十人，由队长、指导员（最初叫队主任）、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他们的分工是：队长管学习，副队

长管生活和军事，队指导员是队的支部书记，负责党的支部和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助理员管党的组织宣传，队学生分会主任管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

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八到十二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每班都编进一两个政治文化较高的学生，以便发挥骨干作用。班长、副班长均由学员选举产生，是学习较好，能力较强，工作负责，能团结全班的优秀学员。

由于客观条件困难，上课采取大课堂制，常常是几个队、数百人在一起听课。教学的基本环节为：引言、预习、质疑、讲授、复习。各门课一般都没有讲义、教科书，但各课都编印了教学大纲，对课程内容、范围、研究方向等作扼要说明。陕公教学程序的主要优点，是废止了注入式，能启发学生思考，讲授有的放矢，它把教员的指导、学员的自习、个人的研究、集体的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连续反复、由浅入深的过程，既发挥了教员的指导作用，又调动了学员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学校对教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教员多是革命的前辈，或由国统区来延安的有威望的革命的教授，这些教员既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与方法，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处处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诲人不倦，既教书又教人。所以他们在学生中威信是很高的。

学员的学习强调三个原则：

一是自学为主。在时间的分配方面，学校规定自学的多于上课的时间；在自学时间内，个人自学时间又多于集体自学时间。但同时并不否认集体作用，不否认同学间的互助。相反，当时陕公的课堂讨论、先进帮后进等活动，都是组织得很有成效的。

二是循序渐进。学习要靠思考，思考只能从容前进，“欲速

则不达”。

三是发扬民主。陕公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学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海外，其中有少数国民党员，他们各自的经历是不同的。在学习中，我们提倡独立思考，敢于辩论，反对强制服从，反对随便给人戴大帽子。课堂讨论是体现学习民主的重要环节。除此而外，当时每个队每周还出版一次《学习导报》，内容有学习评论、学习收获、学习方法介绍、讨论会总结、参考书指导、各班学习反映、问题质疑与解答等。《导报》充分贯彻了民主精神，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

陕公也有考试、考查制度，主要是给学员对已学知识有一个温习、整理、综合与提高认识的机会，同时也检查教学计划是否适合学员的情况，检查教员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等。考试、考查方法，除笔试外，课堂讨论、辩论会、问答晚会、学习笔记、学科展览会、学科集体创作、实习通讯，都是考查学生成绩的途径和方式。

## 五、陕公的校风

陕公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这是陕公全体师生员工共同生活准则、共同作风。

第一、陕公所提倡的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马列主义原则。这个精神，具体贯彻在陕公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中，使他们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陕公这个革命大熔炉，曾经培养锻炼了成千上万的优秀革命战士，他们无限忠诚于民族革命战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有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成了逃兵，有的甚至成为叛徒和民族败类。出现几个坏人，当然无损于陕公的光辉。我们对这些人，在校内和《新中华报》上，进行过公开的揭露和斗争。

第二、陕公所提倡的团结，就是团结于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于革命，把陕公办成革命的大家庭。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汉、藏、蒙、回、彝等许多民族，有的来自祖国边远的东北、西康、云南，有的是从朝鲜、暹罗(泰国)回国的华侨。年龄上的差别也较大，有十五、六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大哥、老大姐。从经历来说，有红军战士，有白区地下党员，有陕北贫下中农的儿女，也有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子女(如邓宝珊的女儿)。陕公的干部也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抗日，这是陕公团结的政治基础。虽然，陕公是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但我们在信仰上不强迫他们，我们以马列主义真理、革命理论来培养教育青年，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为了搞好团结，陕公执行四个原则，这就是平等、民主、五湖四海、用人唯贤。

平等。陕公内部生活，严格执行红军年代行之有效的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学校对所有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以亲切关怀。一个同学病倒了，他会受到大家的热情照料。为了帮助一个落后同学，校长也常常亲自出马。陕公的校长、教员、公务员、学员，生活平等，功过赏罚一视同仁。象成仿吾，每天比学员起得还早，学生出操时，他早已在各处巡视了。他对学员十分爱护，学员送给他“妈妈校长”的爱称。

民主。陕公提倡学校全体成员参加管理学校。学校的一切大政方针，师生员工都参加讨论，任何人都有权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学校也不隐瞒自己的问题，谁有缺点、错误，都要作

自我批评。

五湖四海。是不许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先进不许歧视落后，党员不许歧视非党同志，某个地区、部门来的，不许歧视另一地区、另一部门来的。这一点，在当时陕公干部之间，尤为重要。陕公有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也有一方面军来的干部，还有少数陕北地方干部，他们中又有知识分子出身和工农出身的区别。但我们在指导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搞五湖四海”的方针，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

用人唯贤。这也是我们搞好团结的重要原则。陕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发现、识别、培养人才的经验。比如在认识人才方面，我们注意把干部的学习和生活、思想和行动、过去和现在、长处和短处、一时表现和一贯表现统一起来观察，防止片面性。对于干部犯错误，我们主要着重教育，启发他作自我批评。必要的组织结论，让他亲自参加，允许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上诉的权利。对于干部的鉴定，让本人过目，也允许保留意见。我们注意在实践中发现、培养、提拔和使用人才。陕公不少教员和学校干部就是从学员中提拔的，如柴树藩，他原是十七队的学员兼副队长，以后提拔为分校校务主任。

由于我们在团结方面，注意了上述原则，陕公的确成了一个温暖、团结、抗日的革命大家庭。学员、师生、干部之间互相友爱，充满革命情谊。陕公初创时，无力发统一服装，膳费也要自理，一些家在沦陷区或家境贫寒的学员，生活困难。但由于互助，问题都得到顺利解决。师生之间，关系很亲热。教员到学员那里，学员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对教员很有礼貌。有的学员还用自己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费买香烟慰问老师。教员也虚心向学员学习，教学相长。如有的教员，向一些在白区做群运工作、妇女工作的学员调查，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学习的



青年，深切感到陕公与国统区学校有天壤之别。

第三、陕公所提倡的紧张，就是培养严守纪律、迅速果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陕公生活的军事化、战斗化，就是这种作风的具体体现。

清晨六点，军号把学员从梦中唤醒，二十分钟内，要完成内务整理、洗漱，然后是全校集合，点名早操，整队露天进餐。早餐后，稍稍休息，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晚饭后的文娱活动，唱歌、看节目，也是集体的、有组织的。

结合游击战课程，经常有军事战斗演习，如夜间紧急集合、行军、防空演习、作战等等。夜间的紧急集合，并不事先通知，且多在深夜或黎明前进行。同学们听到紧急集合号声后，不准点灯，要求在十分钟之内，将每人的衣、物、书籍、被褥等，打成行军背包背上，然后奔赴指定地点集合。有的学员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但以后就都符合要求了。集合后，有时是夜间行军，月色朦朦，戎步匆匆，走过田间小路，又爬上到处是荆棘的山坡。途中，又往往穿插着“敌机来了”、“发现敌人”、“捉俘虏”等演习。虽然紧张劳累，但同志们精神上无比欢快。因为他们懂得，这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

学员的学习期限，一般只有三个月，但严格的军事化、战斗化生活，使他们的思想、作风都很快发生深刻变化。初到陕公时，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窄袄，“少爷”、“小姐”的气息，不能一下去掉。但到毕业时，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吃苦耐劳，养成了集体生活习惯，工作说干就干。陕公就是这样熏陶、锤炼了祖国千万个优秀儿女。

第四、陕公所提倡的活泼，一是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一是指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校团结进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生活有紧张的一面，也有生动活泼的一面，有张有弛。特别是青年，爱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千篇一律的死板生活是不行的。为此，学校在困难条件下，也非常注意开展文娱活动。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还有拔河、掷手榴弹、爬山。晚饭后，经常组织歌咏会，有时也有晚会。学校集会前，总要热烈地拉歌，歌声此起彼伏，高亢雄壮，激发着人们革命的热情。当时陕公最流行、最受欢迎的歌曲有《陕公校歌》、《大刀进行曲》、《毕业上前线》、《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河颂》、《游击队员之歌》、《松花江上》等等。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常来陕公辅导，吕骥是陕公的教员，郑律成是陕公学员，因此陕公歌咏的开展，在延安要算首屈一指了。

陕公的集体盛会不少，每期新生开学，要举行开学典礼，毕业又有毕业典礼，每逢陕公的周年纪念，盛况更为热烈。在这些会上，总要举行展览会（学校行政、教学、学员的学习与生活等）、体育比赛、墙报比赛，还有演出晚会及会餐。记得第二期新生开学典礼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参加，她在会上作了山西之行的报告，还与几位女同志合唱了几只民歌。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及进行社会宣传，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在延安成立的是陕公剧团，在柘邑成立的是陕公流动剧团，后期陕公成立的是陕公文工团，团长是苏一平。这些文艺社团，先后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牢狱中》、《补缸》等短小精彩的节目，也演出过《蜕变》、《母亲》等大型话剧。陕公自己编的《生死关头》、《送郎上前线》，曾受到社会的好评，胡乔木还请我校剧团到安吴堡演出过。黄天是陕公剧团的很有才能的领导者，他后来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陕公是统一战线的学校，因此它所提倡的活泼，最重要的还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所有成员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

心情舒畅。要形成这种局面，关键是民主，是民主集中制。这是陕公治校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也是陕公区别于国统区学校的根本标志之一。为此，在实践中我们遵循下列原则：学校成员，不论有无党派关系，一律平等；凡属于政治与理论方面的原则问题，遇有意见分歧，采取辩论、讲道理的办法解决；凡教学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采用大家商量、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决定；学校教育计划与工作计划的讨论、决定、检查，由学员派代表参加，并在实施过程中监督；凡学校成员，对学校全部工作有权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副队长以下各级干部，由学员选举；各队设立意见箱和救亡室，任何人都有权越级上告，每星期三为救亡日，救亡室的壁报是各队的喉舌。

在实践民主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对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如不关心政治、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都采取疏导的方针，利用他们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之对民主有正确的认识。

陕公的民主、自治，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会的工作和活动中。学生会是全体学生的自治机关，全校有学生总会，各队有分会，它的职责是：

- (一)领导全体同学恪守学校的制度、规则、纪律；
- (二)协助组织学习和开展课外研究（学生会设有各种研究会）；
- (三)领导和组织学员的课外活动，如文娱体育、参观访问、参加社会实习等；
- (四)组织和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如募捐支前、同学间的互助等；
- (五)积极领导学生参加改良行政设施、改善生活和物质条件的活动，如筹募学校基金等。

学生会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学校给予必要的指导；在组织

上，学校尊重学生会的独立性。学校经常倾听学生会的意见和呼声，吸收学生会干部参加学校行政的各种会议，对学生会的活动时间予以充分保证。

学生会的干部，由学员民主选举，迅雷、刘春、齐语、王敬、李琦、顾明等都曾是陕公学生会的骨干。

## 六、艰苦奋斗是陕公的光荣传统

陕公的创建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下的机场旁边，校舍是一个汽车训练班的几间旧营房，开办费很少。工作人员只有成仿吾从中央党校带来的十多名干部，这就是陕公创建时人、财、物全部家当。但延安是全国抗日模范根据地，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把陕公办成全国闻名的革命大学。怎么办？我们的方针是因陋就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解决栖身之所挖窑洞。窑洞并不宽敞，一般七八个人共一个土炕，下面铺的是茅草，晚上翻身都感困难。至于上课、吃饭、开会等等，就都在室外。同学们说陕公的室内活动就是睡觉，确是如此。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教员头顶雪花上课；雨天，泥泞满地，教员赤脚上课。数九寒天吃饭，饭凉菜冻，若遇上狂风，饭菜里还要掺杂点沙尘、草芥。课桌课椅是没有的。学员的被子一物两用，白天捆起来当坐凳，晚上打开睡觉。以后在露天广场用石头、泥块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一九三八年夏秋，大部分师生到了栒邑分校，留在延安的总校迁到北门外，师生自己动手盖了一个能容七八百人的礼堂，当时在延安算是一个宏伟建筑了。这个礼堂以后交给了党中央使用，人们称为“中央大礼堂”。

教材教具，都极缺乏。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资料也很

少。因此，记好课堂笔记，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延安当时文具纸张很少，加上我们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蓝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订笔记本。夜晚照明用小油灯，也是几个人共一盏，因此夜晚多用来举行讨论会。煤气灯也有，只在盛会或演出时才使用。

陕公初创时我们在招生简章上写明：免收学费，衣服用具自理，膳费每月收六元。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学生一律免交膳费，还发统一的土布灰军装。生活津贴：校长五元，科长二元，科员一元五角，勤务、炊事员、学员均为一元。

主食是小米饭，土豆是主要蔬菜。以后我们到关中栒邑办分校，那里较富裕，经常能吃上白面馒头，同志们就很满意了。

为了克服困难，学校采取的办法是：第一、自己动手。就是自己挖窑洞、修操场、筑路、挖厕所、开荒种菜、打柴等等。第二、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学校不用或少用勤务员，值班、清洁卫生以至印刷、搬运等工作，大部由学员自己干。延安医生少，学员懂一点医学的，既当学生又当医生。第三、开展互助活动。这个工作由学生会负责进行，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一些家庭经济较好的学员，根据自愿原则，将自己多余的钱、衣物，交到学生会，由学生会统一分配给困难的学员。第四、开展社会募捐。《新中华报》、《新华日报》都刊登陕公向社会募捐基金的启事，学校还专门编了一本《援助陕公》的书，出版发行。学校还给每个学生一个募捐册，由他们向熟悉的亲戚朋友开展募捐。陕公的募捐活动，扩大了陕公的社会影响，国内外都知道陕公这样一所坚持抗日教育的革命大学，因此以各种方式积极援助陕公。我们也每隔一个时期，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上载明募捐人的姓名、款数，刊登“鸣谢”启事。

陕公接受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同时也在物质上对全国抗战

尽力所能及的援助。一九三八年冬，朱总司令发出了慰劳八路军的号召，陕公立刻响应。师生员工把自己身边最珍贵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很快汇集了约五千元的物款，慰问前线八路军将士。

## 七、陕公分校的创办与后期陕公

陕公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创办，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办了两期，共建立二十七队，先后接收和培训了约三千名学员。这个成绩当然是很大的，但仍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全国要求来延安进陕公学习的青年，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边区各部门、各个抗日根据地、各部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要求增添更多的干部。这时又有两个新的情况，一是由于延安的人口膨胀，粮食及各种日用品日趋紧张；其次是国民党加紧反共磨擦，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立许多关卡、检查站，沿途堵截、逮捕去延安的青年。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底相继开会，作出了在柜邑创办陕公分校的决定。柜邑地处关中，土地肥沃，粮食供给等较延安容易筹办；这里离西安近，青年较容易进入边区。中央决定成仿吾留在延安主持总校工作，着重办好研究班，为分校培养师资；由我任分校校长，率领一部分骨干去柜邑看花宫创立分校。我从学员中挑选了一批干部同往，其中有柴树藩、何定华、孙力余、吕光、席柳溪、赵志萱、华子扬、陈琅环等。从此陕公的主力即移到分校。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我们是分两批走的。第一批约一百多人，出发的那天正好有一队汽车从延安到西安去，他们首先坐汽车到耀县，然后步行去柜邑。我去分校是第二批，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季凯、何定华、邱春甫、华子扬、吴景直、朱改、

张煜、倪淑英、缪文等。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经过甘泉、鄜县、直罗镇、店头、关门子、羊坡头、织田镇，最后到达看花宫，全由解放区通过。每日行军近百里，一个叫陈彤的女学员打着一面旗子走在前面，使队伍显得更为生气勃勃。七月初，去分校的人员均安全抵达看花宫。

看花宫据说是唐代杨贵妃看花的地方。这里过去牡丹花很多，也有些古迹。我们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除校部和女生区队设在看花宫外，其余各区队分布在看花宫附近的平坊、门家、赵庄等村庄。教学用的桌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借给我们的。七月七日，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陕公分校正式开学。

分校的领导班子、工作人员有以下这些同志：

校	长：	李维汉							
教	务	部	长：	邵式平					
政	治	部	主	任：	周纯全				
	副	主	任：	张然和					
校	务	部	长：	袁福清					
	副	部	长：	柴树藩					
党	委	书	记：	申力生					
党	委	组	织	委	员：	陈伯村			
党	委	宣	传	委	员：	申力生(兼)			
政	治	部	宣	传	科	科	长：	吕光	
俱	乐	部	主	任：	刘春				
合	作	社	主	任、	总	务	科	长：	席柳溪

分校党组由李维汉、邵式平、周纯全、张然和、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等七人组成。

有了总校的办学经验，分校各方面的工作都进展很快。我们

接总校编队，从第二十八队开始，编到五十四队。分校在组织上新建了区队一级机构，每四至五个队组成一个区队，相当于部队的营。区队有区队长、军事副区队长、协理员（相当于总支书记）。分校共有四个区队：

一区队，地点在坪房，区队长何定华，副区队长季凯，协理员廖作华。

二区队，地点在门家，区队长朱改，协理员李言。

三区队，地点在看花宫，区队长申力生（兼），副区队长赵志萱，协理员吴景直。这个区队全部是女学员。

四区队，地点在赵庄，区队长孙力余，协理员万波。

分校的教学方针、教学制度、教学组织、课程设置等等，都与原来的总校差不多。总校不少有名的教员如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等也来分校任教。但由于学生增加快，教员总是不够，因此，除一些区队长同时兼任教员外，学校还成立高级队和几个研究室培训师资，充实教员队伍。高级队的学员是从普通班选拔的优秀生，学习期限一年，所学的课程较多较深。我们前后共办了五个高级队，廖盖隆、田家英、霍遇吾、张腾霄、胡华等就是分校高级队的学员。校部所设立的研究室，有中国问题研究室，由何干之领导，成员有季凯、刘春、陈琅环等；政治经济教研室，由李凡夫领导，成员有尹达、温济泽、李唯一；哲学研究室由陈唯实领导。研究室也有教员上课，以老带新，一边研究，一边教学。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大会的结论，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放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我在开完六中全会后回到分校，从十二月三日起，用了一个星期传达和讨论会议的精神。全校师生员工对会议表示极大的关注，一致拥护会议的决议。根据会议的精神，我们的课程作了调整，集中讲授六中全会的文件，清除了过去讲授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分校的劳动任务比延安时增加了，这是因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学员除白天上课、晚上站岗放哨外，还要开荒生产，保证生活的需要。陕甘分界处有个何家山，离我们分校约七十里地，我们在那里开荒两千一百多亩，种了洋芋、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学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陕公新村”，师生轮流到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作群众工作。另外学校的合作社还试验自造肥皂，生产草鞋。

一九三九年初，党中央为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任命洛甫为干部教育部部长，我为副部长。我即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离开陕公分校，到干部教育部工作。我走前，曾召集校部、各区队、总支的干部汇报和总结陕公办学的经验，开了几天会。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战时干部学校教育》，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这时，我党已在敌后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边、山东等广大根据地，亟需大批干部。中央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干部教育，决定在晋察冀和晋东南两地建立抗大分校，并指令从陕公总校、陕公分校抽调干部前往办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周纯全、邵式平各率一千多名师生，相继离校。周纯全等在晋东南的长治一带建立了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邵式平

等在晋察冀的灵寿一带建立了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以后抗大在敌后共建立了十二个分校，陕公因此仅剩下四、五百高级班学员。

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和有利于教育行政的集中，中央决定延安的陕公总校也迁到看花宫，与分校合并，由成仿吾任校长。一九三九年一月，总校到达栒邑。新的领导班子是这样组成：

校 长： 成仿吾  
教务部部长： 江隆基  
政治部主任： 张然和  
总务处处长： 鲍建章  
党委书记： 申力生

合并后的陕公，其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学习期一年，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为了进一步培养专门学者，还计划在大学部上面筹办研究部，学生为大学部的毕业生和有相当程度的外来学生、研究人员，学习期亦为一年。这个计划后来未曾实现。除此而外，学校附设了训练班，专门培训不能进大学部的学员，学习期限为四个月。课程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与政治工作、民众运动。这个训练班相当于最初陕公的普通班。

一九三九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延安鲁艺（院长周扬）、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冯文彬、胡乔木主持）、延安工人学校（校长张浩）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六月下旬，陕公由栒邑先迁回延安。七月初，四校完成整编任务。在离开延安前，我送他们到桥儿沟，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同志：毛泽

东、周恩来、博古等，在桥儿沟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报告。去前线的学员送给毛泽东一面锦旗，毛泽东在报告中回赠他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的团结。指出，只要好好掌握和运用这“三个法宝”，就什么敌人也不怕，什么困难也能战胜。七月十一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七月十二日，他们踏上新的征途，向晋东南进军了。

一九三九年冬，党中央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战干部，又决定复办陕公，在延安重新招生，校址在北门外，人们称为“后期陕公”。由我兼任校长和党组书记。教务处长胡松，干部处长武光，总务处长刘汉兴，秘书长杨石人，总支委书记石砚之，副书记吴景直。学员编队与以前的总校、分校相衔接，从五十九队起编队，共有学员数百人。十二月初即开始上课。

一九四〇年九月，陕公改变学制，成立师范部和社会科学部。师范部主任孙力余，培养教育师资及教育行政干部，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期两年，预科修业期一年。社会科学部主任张仲实，培训抗战民运干部，也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期为一年半，预科修业期为半年。两个部的课程，除一般的政治课外，都还有各自的专修课程。一九四〇年，后期陕公还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边区的民主建政工作（如参议会选举）、办冬学扫盲、演出宣传、下乡搞社会调查，参加镇压汉奸、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宣判大会等等。

后期陕公，在领导体制上成立了校董会，成员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高岗、张仲实和我。校董会通过了新的陕公简章、教育方针及施教计划。

后期陕公加强了民族干部的培训。一九四〇年八月，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少数民族学员三十多人。他们自己选举队长、副队长，每十人编一个班，队指导员

由学校委派，天宝即是这个民族工作队的学员。他们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还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学习期限一年。一九四一年夏，进一步成立民族部，六月三十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民族部开学典礼。民族部有学员一百八十五人，包括蒙、回、藏、彝、苗、满、汉七个民族。民族部主任贾拓夫，杨静仁、汪锋分别任回、蒙班主任。以后又在民族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学院，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陕公为党的民族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党中央为了精简机构，以及在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使高等教育正规化，积累高等教育的经验，决定将陕公、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中央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校址即原女大校址。延安大学设有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法学院三个院及俄文系、体育系两个专修科。另外还附设了中学部，分高中、初中两个分部。九月中旬即筹备就绪上课，九月二十二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有学生五百余名。延大的成立，结束了陕公前后约四年的光荣历史。

## 八、陕公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

陕公的每个队都设有党支部，支部由指导员、队长和政治助理员组成，支部以上是总支（在分校期间，总支设在区队），这是学校专做党务工作的机构。总支上面是学校的党组，总支书记也参加党组的工作。在分校总支上面设党委，党委书记参加党组。

陕公的共产党员和党的活动，有下列特点：

（一）党员的大多数是正在过着学习生活的新党员，即学生党员；学校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只占党员比例的少数。

(二) 党支部的周围，是一大批非党青年，他们有极高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热情，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把参加共产党当着自己崇高的愿望。

(三) 由于当时共产党在全国还没有公开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陕公党的组织生活，也未完全公开。

(四) 学员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发展工作，必须特别抓紧。

根据这些特点，陕公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团结全体党员和非党员，保证学校全部教学计划和工作计划的完成，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学习第一”，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学校工作、对党的支部工作的要求，党支部要对组织好学生的学习，起保证作用。

陕公共产党支部的第二个任务，是接收新党员及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这个工作，是陕公支部最重要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为大量发展党员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是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另一方面是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克服关门主义，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强调要勇敢地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下级官兵中吸收党员。

在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直接抓陕公的组织发展工作。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经常亲自找陕公的总支书记汇报，指导工作，还亲自给学员上党课及参加新党员的宣誓仪式。陕公第一期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中央组织部举行的。

陕公发展新党员的方针是既慎重、又大胆放手。我们根据中央精神，强调不要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不要怕社会关系复杂，只要表现好、思想进步、历史清楚，就可以发展。当时从国统区来

的大批青年学生，从他们本人的情况看，多数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不少是“民先”队员，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虽比较复杂，但他们到延安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对他们搞“唯成分论”，是完全错误的。

陕公学员在校学习期限很短，一般只有三、四个月，因此发展工作必须抓得很紧。学员一入校，支书、助理员就同他们谈心，积极了解他们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在学员心目中的威信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一到陕公，立即找党组织谈思想，写自传。支部经过仔细研究，确定重点考察培养对象，一二十天之后，就找他们谈话，进行党的教育，端正入党态度。由于要求入党的学员很多，一些候补党员也要参加谈话的工作。

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比例，中央组织部开始要求我们发展三分之一，以后提出发展二分之一多。一九三八年洛甫对我说，陕公学员中要求发展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党员。可见当时发展组织任务之迫切、繁重。

新党员要填写入党志愿书，并有两个正式党员介绍。介绍人要对被介绍人的优缺点写出报告，说明介绍的理由。党支部审查通过后，还要写出支部讨论的意见和评语。经总支批准后，新党员履行宣誓仪式，最后编入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当时我们所发展的新党员，有的是很年轻的，一个叫徐光的，入党时才十五岁，田家英入党时才十六岁。

为了使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斗争传统，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抓紧思想教育，强调党员在学习中必须比非党同志学得更刻苦努力，在职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同志承担更多的工作，并积极完成在职干部的学习任务。

陕公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決心，必须模范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坚持民主、团

结等原则，必须在任何环境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作一个先锋战士。

陕公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陕公创办不到两年，我们培养训练的六千多名抗战干部中，发展的新党员就有三千多人，他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九、成绩、经验和教训

陕公创办的近四年中，共培训了约一万一千多名学员。他们在校学习的时间虽有长有短，但都有共同的收获：第一、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获得了抗战的理论与知识；第二、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第三、培养了民主精神与习惯，树立了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第四、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懂得了改造旧社会旧中国的必要；第五、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

学员毕业后，响应学校提出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愉快地奔赴战斗岗位。他们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少数转到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或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等继续学习。陕公学员分配的面是很广的。以第一队到第十队毕业的学员共一千一百八十六名为例，他们分配的地区是这样：江苏三十七名，湖北七十九名，安徽七名，湖南十八名，江西十五名，四川十四名，福建二名，上海十六名，广东十四名，浙江三十名，广西一名，宁夏十二名，贵州四名，山东十七名，山西一百二十九名，河南三十一名，华北五十四名，绥远九名，甘肃

六名，边区六百一十三名，陕西七十八名。从这个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东北、新疆、西藏外，差不多每个省都有陕公的毕业生去工作。这十个队的一千一百多学员中，留在边区的占一半多，这是较特殊的情况，因当时边区太缺知识分子干部，我们不得不首先满足延安、边区的需要。但以后陕公的毕业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分到前线去了。一九三八年冬，分校第一批毕业生，分到晋东南前线去的就有一千多人，“毕业上前线！”这是当时的光荣口号。

每期学员毕业，我们都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来参加。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第二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毛泽东还给毕业生送来了“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的题词。

毕业生离校，有的行程是很远、很辛苦的。分到太行山辽县前线的学生，从延安到临汾、再到辽县，行程一千四百多里，沿途要经过国民党顽军的不少关卡，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还会遇到敌机的轰炸，而太行山又是“四月仍结冰，八月即飞雪”的气候。但我们的学员依靠自己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战胜一个个困难，胜利到达。许多学员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联系，经常向学校汇报自己工作中的收获、体会、问题，并提出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在经济上还为母校的建设开展社会募捐。

从学校来说，也密切保持与毕业同学的联系。学校设有同学会的组织，编有同学录，设有通讯联络部，出版通讯集和纪念册。通讯集交流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介绍母校各方面的状况，还刊载学校给毕业生的工作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每逢陕公创办的周年纪念，学校都要举行展览会、报告会、编辑纪念特刊，全面介绍学校各方面的情况、经验、成绩，并欢迎校友们返校参加盛



会。

陕公学员奔赴各地，他们中许多人一走上工作岗位，就担任游击队长、县长、科长等职，工作中勤勤恳恳、英勇战斗、历尽艰辛，为党为人民创建了光辉业绩。其中不少同志在战争年代就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以后，当年的陕公学员、干部中不少人已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重要骨干。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他们再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今天，他们虽大都已过花甲或古稀之年，仍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辛勤工作。陕公桃李遍神州，陕公的光荣传统将永远哺育我们的后代。

回顾陕公的全部工作，最重要的一点经验，是我们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九三九年底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在长期的和严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团结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要性。决议批评当时一些干部恐惧、怀疑、排斥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思想，号召大胆地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条件成熟的要坚决吸收他们入党。陕公在办学过程中，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一政策。我们为一切要求抗日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广泛招收他们前来学习。我们在思想上、生活上亲切关怀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他们，使他们深感党的温暖。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常常因失学、失业、政治上没有出路而苦闷，但他们一进陕公就朝气蓬勃，不仅是有用之材，而且有用武之地，刻苦地为祖国学习、为革命献身。

陕公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是启蒙性的，课程不多，教学时间也不长，但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而他们学得快，兴趣高，生动活泼，效果也好。

陕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有的同志把陕公的

成就集中概括为“识别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是有一定道理的。抗战开始后，我们边区和前线可说是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干部、人才。当时各地方请求党中央支援的主要不是钱和物，而是干部。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剩下的红军和干部总共才三万多人，这同抗战初期的大发展形势极不相适应。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干部，的确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公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都是以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使用为出发点，任人唯贤，量才使用，大胆提拔。学员一进陕公，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党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让他们肩负重任，在炮火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延安培养了中国一个时代的革命骨干，陕公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陕公的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两件事，我至今深感不安。

陕公创办之初，几个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卡尔学会”（即卡尔·马克思学会之意），其目的和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但陕公有些干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当时的青年团、“民先”等组织都已解散，为什么在延安还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叫马克思主义学会，而要叫“卡尔学会”？这个组织的青年学生作了辩解，我们一些干部仍然不理解。加上这些青年在一起，有时也难免发表一些批评性的言论，于是断言“卡尔学会”是一个近似托派性质的反动组织。那时王明、康生刚回国，他们把苏联的反托派斗争搬到延安，也影响了陕公。结果学校找“卡尔学会”成员一个个谈话，最后将为首的七八个学员开除出校，受牵连的其他几十个学员毕业时，也不给分配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卡尔学会”并非反动组织，那些被打击的学员并无不良企图，他们是好学的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虽遭受

错误打击，但仍不忘革命，有的还返回延安找党。此案发生时，我尚未到校，但最后处理时我在，我当时是学校党组书记。我听了汇报，未深入调查研究就处理此事，损害了同志，也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以为疚。

还有一件事是在后期陕公发生的。学校结束时，总务处还保存一些布匹，校务主任兼秘书长杨石人反映有些干部缺衣服，提议给他们每人做一件，我同意了，并由总务处长刘汉兴执行。后来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同志追查此事，认为这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找我们谈话，我表示事情是我同意的，应由我负责。但后来给了刘汉兴同志警告处分，调往前方工作。临走时，我深感不安，送他到中央党校前面的河边，一边走一边谈心，安慰他，鼓励他努力工作。他走后，我经常打听他的情况，得不到消息。“文化大革命”后有同志告诉我，曾经听说刘汉兴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英勇牺牲了。刘汉兴是一个为人忠实、工作勤恳的好同志，追忆至此，深志怀念。

# 中央干部教育部和 延安干部教育

## (一)中央干部教育部的成立

1. 成立时间。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同年十二月底通知我去延安任干部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我在陕北公学分校任校长。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我从关中栒邑看花宫出发，同行的还有孙力余、何定华等。他们到延安以后，也在干部教育部任职。

从栒邑到延安六、七百里地，我们走了一个多星期。到延安以后，同党中央，主要是同洛甫（他是干部教育部部长，同时又是中宣部部长）联系。研究干部教育部的成立工作，并决定在中央宣传部右侧（南边）山沟口设立干部教育部机构。

2. 成立原因。首先是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革命形势带来的迅速变化，需要我们共产党人重新学习。尤其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给了我们很大启示，使我们懂得了王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和抗战时期的右倾，从思想根源上说，都是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原则，都是教条主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

运动的号召。毛泽东强调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又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六届六中全会就全党的学习问题作了相应的决议。中央干部教育部就是在这种全党开展学习运动的形势下产生的。

其次，延安干部学校的迅速发展，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加强统一领导。在延安，除了陕甘宁边区系统的干部学校以外，直属党中央各部门的干部学校就不少。党中央到陕北以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瓦窑堡恢复了中央党校，接着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创办了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在抗战即将开始，国共两党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前夕，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把红军学校改编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林彪），为抗战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成立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招收来延安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培养抗战的干部。同年十月，创立了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冯文彬、胡乔木负责）。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培养从事抗日文艺运动的干部。同年五月

五日，创立了马列学院（院长洛甫，副院长王学文），专门培养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的干部。以后又成立了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王明）和工人运动学校（张浩负责）。这些干部学校分属于党中央的各个部门。为了加强统一的领导，需要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

第三，干部队伍不断扩大，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抗战以前的老干部不多，绝大部分是抗战以来的新干部；老干部一般说文化水平不高，甚至还有文盲，都需要进行教育、学习。

3. 工作任务。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央为着（一）统一领导中央直属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育与教学方法；（二）适当地调剂各学校的教员、教材、课程；（三）有计划地进行招收新生工作；（四）领导党政军民各机关的干部教育；（五）总结各学校、机关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等，特决定组织干部教育部，以洛甫同志兼任部长，罗迈同志为副部长。现已在中央驻地附近设立机关，并开始工作。今后各学校各机关凡有关于干部教育的计划、教材与工作报告、检查工作总结等，请随时送交中央干部教育部。”这个通知明确了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我们以后在干部教育部所做的工作，就是通知所规定的内容，即统管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中央以后又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中的比重，又应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在短时期内实际所做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

4. 机构演变。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时的机构很简单，下设两个科：党内干部教育科，科长曹轶欧、副科长章夷白；国民教育科，科长何定华。部秘书陶希晋，兼管行政工作。洛甫不住在部

里，我同大家住在一起，一共十几个人。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央干部教育部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同年十月，又改称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还是我们两个人。原干部教育部的党内干部教育科和国民教育科统归宣传部建制，人员略有变动，许之桢任国民教育科科长。

## (二)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发展的三个阶段 和中央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延安的干部教育是在党中央、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开展起来的。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以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又在由组织部召集的关于党政军民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提出“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这里所说的学习，不仅是指干部学校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指在职干部的学习，也就是从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到各机关事务人员的文化学习。

中央干部教育部实际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正是在在职干部教育。因此，我着重回顾在职干部教育，同时兼及干部学校教育。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大致经历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九年二、三月制订并公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五月二十日召开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到一九四〇年六月进行年度总结，历时约一年余。主要进行如下工作：

第一，制订并公布教育计划。我们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延安就开始制订《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第一期计划)，二月初即完成，三月正式公布。但是由于进行生产突击，绝大多数单

位实际未执行。

第二，召开动员大会。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党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会上，毛泽东讲话，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学习的方法，要求大家克服可能发生的困难，并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洛甫也讲了话，强调在职干部学习须有持久性和恒心。我在会上作了在职干部学习的动员报告，主要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强调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当我引用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话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欣慰地笑了。关于教育方针，我说：“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的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根本原则的具体的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要做到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首先要深刻地研究马列主义；在研究的时候，注意学习它的内容和意思，学习它的立场和方法，而不是把它当作教条。”“要做到马列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它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来；在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查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从这个具体的环境出发。”

在动员报告中，我还提出了对在职干部学习的希望。我说：“学习，要有恒心，有经常性。就是要经常地学，不间断地学。只要有恒心，每天学一点，日积月累，就会有可观的成绩。譬如每天读五页书，一个月就可读一百五十页，一年就可读一、二千页。有些同志看轻每天五页的成绩，认为要读书，就只有进学校去，读它一年半载。且不讲我们有没有可能使所有在职干部都进学校，就是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年半载的时光也只能获得入门的



知识。古人有言‘做到老，学不了’，要真正学些东西，仍不能不靠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最靠得住的学校，仍是‘在职干部学校’。当然在职干部是以工作为主，学习只能占小部分时间。但是，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长期的学校，而且是最能把学习与实际密切联系起来的学校。所以，只要有经常性，有恒心，真正的学问一定可以从这里磨炼出来。”

这次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就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约有二千多人。可以说，在职干部学校是一个学员最多，师资最省，设备最简单，但可以取得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成效的大学校。

第三，建立学习制度。一是建立了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肯定了干部教育的教学程序及其课程，指出“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因为如果把在职干部的学习完全放到业余来进行，则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是难以做到的。二是进行了教育和课程的安排以及人员的编组。在进行具体的教育和课程安排时，实行以“少而精”为原则，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由近到远，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定出学习和研究的程序，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类课程。初级课程为：党的建设、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游击战争（包括军事常识）和社会科学常识（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级课程为：近代世界革命史、联共党史与马列主义，以及军队政治工作。高级课程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国际纲领

和军事理论。对于初、中、高级课程，如是干部学校，可依次分期进行；如是在职干部，则依干部的具体情况，参照初、中、高级的课程，学习和研究其中一种，最多两种课程。把参加在职干部学习的人员分为三类：甲类，主要是担负领导工作且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老干部，学习联共党史。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但党龄较短的新干部（当时新老干部的区分以抗战爆发前后参加革命为标准），学习党的建设（以《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为教本）。丙类，主要是政治、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多数是从从事务工作的同志，学习文化为主，兼学党的建设。因为这是第一年的学习，对在职干部来说，是一个打基础的学习，所以，这一年对所有的干部都没有安排学习高级课程的内容。

三月二十四日，党中央又专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对《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在这个指示里，进一步把在职干部按文化、理论程度分为四类：一、二类是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高级干部和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三、四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农出身的两类新干部，并按类规定了不同的课程和共同的课目。指示还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一次。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用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习是基本的方法”。为了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指示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奖励以集体为主）。

从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到党中央连发的两个指示，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第四，编审干部学习教材。在干部学习中，教师和教材的需求特别迫切。一九四〇年六月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

上讲话，讲得十分具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前方学习中的困难，首先是缺乏教师。去年（指一九三九年）邓小平同志带了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别人从后面把那两个同志留下了；于是乎打官司，打了整整半年，结果还是从总司令部抽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去替他们‘顶赎’回来。”“我们的第二个困难便是书本子。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但是他们只收到了七本。为什么呢？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地被抢光了。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我们办了规模不下于延安的印刷局，延安出了一本新书，我们马上就翻印，但还是‘供不应求’。”延安的情况，比起前方来当然好得多，但是，当时延安的印刷出版条件也很差，只有一个解放社，一个中央印刷厂，纸张缺乏，任务很紧，要出版几千名干部的教材，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也要克服很大的困难，才能办到。

延安干部学习教材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和苏联的教科书。例如，作为高级课程的《哲学选辑》，就是马列原著的辑录，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著）等都是翻译的。二是我们自己编写，例如，党的建设教材，中国问题教材，中国历史教材等等。最早编了一本《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后来又编了一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毛泽东选集》中的那一篇。该文题释对起草经过作了说明。关于第三章《党的建设》，我曾写过两节，都送毛泽东看过，记得在第一节里曾说到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毛泽东作了顶批：水可以没有鱼，鱼不能没有水。我在讲课时还宣读了这个批语。第二节是写的民主集中制。后来，因情况变化中止了，第三章未完全写完，所以《毛选》中只有两章。）当时，中央干部教育部约请一些同志或组织专人编写教材，初级课程中的《政治读本》、《国文读本》等都是干部教育部的同志与专家共同编

写的。经过大家的艰苦努力还是搞了不少东西，基本上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第五，加强干部学习指导。干部学习虽然主要靠自学，但给予适当的辅导是完全必要的。我们采用的办法，一是为各单位配备一定的指导员或教员帮助干部进行学习。为了培养和提高指导员或教员的水平，又特别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会，各学校各机关担任或准备上课的教员一律参加。这些研究会的任务是指导延安的干部学习，包括编写教材或参考材料，组织专题报告会等。这些研究会在在职干部的学习中起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所以，后来又成立了哲学研究会、时事问题研究会等。二是聘请老同志和专家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如学习党的建设，我们就聘请陈云为总指导。三是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和各根据地来的负责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大家欢迎。请党中央领导同志和从敌后抗日根据地来延安的负责同志为在职干部作报告的倡议，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以身作则，多次为延安的干部作报告，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四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演讲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也是中央干部教育部组织的，演讲在七月八日和十二日接连讲了两个下午。王震（从前线回延安以后）、张鼎丞也应邀给干部作过报告。这类报告从动员大会以后到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年时间里一共作了八次。至于时事政治性的报告，则平均每月有两次。

第六，检查和总结。我们从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一九四〇年五月一年时间中，对延安的在职干部学习情况进行过三次大的检查。每次检查以后，我们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全延安的学习。第一次检查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进行的。检查以后，我

写了一个《怎样展开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总结，刊登在《解放》第八十六期上。第三次检查是在一九四〇年四月进行的。同年六月六日，在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大会由王首道主持，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载《解放》杂志第一一〇期，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出版——编者注）的报告。在会上，还奖励了三十九个由各类干部组成的模范学习小组。

经过第一阶段一年的努力，在职干部学习基本上普及了，在延安及延安附近（远至八十里）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学习，中央负责同志也参加了学习，总数达四千零六十人，其中甲类八百三十七人，乙类二千二百五十五人，丙类九百六十八人。各类干部基本上学了一门课，甲类学完了联共党史，乙类学完了党建，丙类差一些，有的学了党建的大部分，有的学了一半。在学习文化上，识字多的达一千二百字，最少的也有二百字。健全了学习制度，许多同志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收获是不小的。

2. 第二阶段。从一九四〇年六月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以后，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前，历时约一年，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学习质量。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

第一，加强策略教育。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党应当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随后，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发出

了《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规定“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察的重要标准。”此外，还对延安干部的策略教育作了具体布置，主要是有计划地组织各种关于策略教育的报告会或演讲。后来延安还专门组织了“策略教育干部会”，吸收全延安党与宣传教育的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研究和讲授党的策略及其具体运用的有关问题。仅几个月就作了十几次报告，提高了在职干部学习的热情。

第二，培养和提高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一个《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以外，强调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决定指出，为了提高学习的质量，以求学习的深入，“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嚼得烂，懂得透。”决定还规定了为提高干部学习质量所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例如，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地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对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这种检查应着重于教学质量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等。这个决定对于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一阶段，因为采取了这些措施，干部学习的质量是有很大的提高的。

3. 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起，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号召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止。历时不足一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改革延安的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在中宣部

组织的干部学习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肯定了党的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的成绩。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第二，指出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中的缺点，这就是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毛泽东列举了一些坏典型后说：“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多，为害相当大，不可等闲视之的。”第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主观主义两种态度的对立和区别。第四，提出了改造学习的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在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以后，党中央发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指示，其中包括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布的《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则不得其法，或则轻重不分，或则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

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则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则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并分别指出了四种范围的内容和教学措施。关于理论教育，决定指出：“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这些指示都是十分正确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就是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建议和这一决定的精神，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开始了崭新的阶段。

### （三）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初，这一阶段的干部学校全属训练班性质。为了满足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迫切需要，学习时间短，大多只有三个月、半年、最多一年，就结业分配工作。因此，这个阶段的课程内容一般都是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也教授一些理论课如中国问题、马列主义等，但只是启蒙性质的。当时的学员现在回忆起来还认为这种启蒙教育对他们很有好处。



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我作了一个题为《鲁艺的教育方针与怎样实施教育方针》的报告。在那个报告中，我着重阐述了党中央为鲁艺规定的教育方针，提出了怎样实施党的这个方针的意见。当时，党中央为鲁艺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和核心。”这个教育方针虽然是为鲁艺规定的，但它反映了党在那个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首先是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其次，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实际技能；第三，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特征，无论是鲁艺，还是其他的干部学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培养人才和进行学科的研究。

由于当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短期训练班内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但由于上述情况，这种毛病的影响一般说是轻微的。

2. 第二阶段。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后，转到干部学校正规化阶段。延长学制，确立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学习时间一般改为一年、二年甚至三年。要求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伴随着正规化而来的，是教条主义习气的复活和滋长。这在马列学院的部分课程的教学表现得尤为突出，陕公高级班也有这种情况。教学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决不可少的，但教条主义的方法却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根本相违背的，是十分有害的。

3. 第三阶段。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严肃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

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弃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了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决定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革的措施。这些指示也是十分正确的。延安干部学校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建议和这一决定的精神，进行了若干改革。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两个决定和检查自己的工作，我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写了一篇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载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第三版——编者注），检查了毛泽东在党的六中全会上提出“教条主义必须休息”的号召以后，干部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的各种表现，并且指出：“教条主义在党内有长期的传统，而在教育工作中尤有深固的根基。要执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要实行干部教育上的革命，主要地就是要肃清教条主义；而要肃清它，就首先要揭露它

和批评它，一次不会揭露得干净和批评得透彻的，要坚持地去揭露和批评。否则，无论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真正的彻底转变是困难的。”这是文章的基本精神。鉴于教条主义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又在干部学校复活和滋长，当时延安整风正在开始，想借此给以推动。但文中没有抓住“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是最大的缺点。同时，对于延安干部学校前期的成绩和后期教条主义复活的错误也未作必要的分析，存在着否定过多和笼统化的缺点。

#### (四)党内教条主义思想体系的 发生、滋长和被改造

八七会议后的瞿秋白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都包含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因素，但还未成系统。直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出现后，教条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才成为完整的登峰造极的东西。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是百分之百的教条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宗派集团。他们在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之后，钦差大臣满天飞，所到之处，总是攫取首要职务，使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得以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以后，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逐步地在全党基本上清算和纠正了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贯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但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思想路线，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范围，是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左”右倾路线的思想根源。根源不清除，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错误路线，不论是“左”的或右的，得到纠正以后，一有机会还会反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

延安，在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三月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反对党和毛泽东的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一度又模糊了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以致此后约半年时间内，毛泽东又处在少数甚至孤立的地位。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便是例证。毛泽东是革命天才。所谓天才，就是比别人更聪明，更有远见。早在一九三〇年，他就通过中国革命实践，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又大量研究哲学著作，一九三六、三七年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党内进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号召全党，要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以后一有机会他就在文章里和指示中联系实际进行教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整个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行，应该归功于这个教育的效益。但是要系统地、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的全党整风学习，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王明宗派集团的分化和克服，除王明等一二人至死不改外，大抵也是经过这样一个曲折的路程的。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学习，就成了我们党空前团结和走向胜利的标志，成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的标志，成了我们党自成立以来最好的一次代表大会——“七大”的前提条件。

由此可见，上述第二阶段（即一九四〇年下半年以后转到干部学校正规化的阶段）干部学校教条主义学风的滋长，是有历史根源的，不是偶然的。洛甫长期担任和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他有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他在遵义会议上功劳，以后又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方面是有显著成绩

的。但他的教条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在这方面，毛泽东对他有过许多帮助。延安整风的前一阶段，他作农村调查去了，没有参加。回到延安后，写了《出发归来记》，自我批评是深刻的。最近看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期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两篇文章，深感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理论力量。他要没有去世，是会在思想战线上做出有益贡献的。

### (五) 编辑《共产党人》

最后，我要提一下编辑《共产党人》的事。《共产党人》杂志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创刊的。《共产党人》的出版，不但同延安的干部教育以至整个党的干部教育密切相关，而且是我党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1. 创办经过。《共产党人》创刊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它的任务就是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所说的，“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我是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工作人员有陶希晋，后来又有马洪。洛甫是主编，每期稿件编好后，都送他审定。

《共产党人》是党内刊物，不仅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行，也发行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包括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行总数在一千份以上。这在当时也算是发行量很大的了。

《共产党人》从一九三九年十月创刊，到一九四一年八月停刊，历时一年零十个月，一共出版了十九期。因为陕甘宁边区发生严重经济困难，纸张供应紧张，党中央决定收缩出版工作，停

止了包括《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等一批期刊的出版，《共产党人》也同时停止出版。

2. 主要作用。《共产党人》出版时间不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主要有四点：

第一，传达中央有关党的建设的指示。我们的党当时已是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十分需要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使它迅速地与广大群众见面，这对党的事业关系极大。我们在《共产党人》的编辑工作中，自觉地承担了这一政治任务。在《创刊号》上，我们就刊载了党中央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同时还刊载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其中只有少数几期没有登载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刊登指示最多的是第十九期，也就是最后一期，共刊登了九个有关的决议和指示，如《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地方及军队中各级党部取消、改正与停止党员处分手续的决定》，以及中宣部的《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报纸杂志的指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等。总计，先后共发表党中央及各部门的有关的决议、指示三十九篇。事实上成了党中央的机关刊物。

第二，传播经验。我们经常选登研究党的建设，总结党的组织工作经验的重要文章，其中，毛泽东写的《发刊词》是最重要的文章，为我们党确定了一个布尔什维克化建设的纲领，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第十八期又刊载了毛泽东为他自己的《农村调查》写的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是我党思想建设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创刊号》刊载的刘少奇写的《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我党在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结。还有洛

甫的《党的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了解具体情况》（载第四期）、《提倡朴素和切实的工作作风》（载第七期）、杨尚昆的《华北党建设中的几个问题》（载第五期）等，都是有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文章。我在延安，从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直至中央干部教育部，一直在干部学校讲党的建设。部分讲稿经过整理，也发表在《共产党人》上。

第三，宣传政策。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及其实施，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写过许多关于政策及策略的文章。仅在一九四〇年就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两篇文章，总结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政策和策略原则，强调党的政策对于争取抗战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宣传。

《共产党人》在刊载党的决议和指示的同时，经常约请一些负责同志撰写阐述中央政策和策略的文章，帮助大家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比如《创刊号》上在发表《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同时，还发表了王稼祥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的文章；第三期在发表《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的同时，还发表了赵毅敏的《反对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艾思奇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文章。在发表《关于开除刘振球党籍的决定》的同时，还发表了胡耀邦的《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文章等。我自己也写过一些。后来党中央还以《共产党人》为阵地，开展党的政策的讨论，如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载第十五期）和劳动政策（载第十六期）的讨论。可见，《共产党人》在学习、宣传、研究和贯彻党的政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四，指导干部教育。《共产党人》是在干部教育部，后来在中宣部编辑出版的，同干部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关于干

部教育的问题在《共产党人》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先后发表过许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如一九四〇年一月三日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载第五期）、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载第六期）、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载第十期）、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日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载第十二期）等。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为干部教育提供教材、各种参考材料以及各种具体的经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首先就是在《共产党人》上发表的（载第四、五期）。刊登在第六期上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书目，第七、八两期连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初稿）》（王学文编写，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会名义发表）都是为配合当时延安干部教育服务的。洛甫写过《提高干部学习质量》（载第十七期）、陆定一写过《军队中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章夷白、孙力余等也写过关于干部教育的专门文章，都在《共产党人》发表。所有这一切，都对当时的干部教育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

有一次我同毛泽东谈话时，我说：我的工作太多，恐怕一事无成。毛泽东说，办好《共产党人》就是一事有成。这是毛泽东对《共产党人》编辑工作的重视和对我的勉励。至于我们的编辑工作，在整风前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但现在我已无力重新审查。

## （六）小 结

延安大办干部教育，包括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已经过去四十多个年头了。实践证明，四十多年前在延安大办干部教育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是为当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



养了成千成万的革命战士，二是为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成千成万的骨干力量。这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创举。

1. 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两个决定，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如前所述，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发挥过重大指导作用。现在历史条件已经有了根本性变化，党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就是说必须实现“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必须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党在干部教育上的任务也更大了。但是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这两个决定的基本精神和延安干部教育实践的基本经验，我觉得还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

2. 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一是计划性强，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不是随心所欲盲目进行的。二是组织性好，它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而不是各自为政自发进行的。因之，它的学习效果是好的，成绩是显著的。这方面的经验，仍有指导意义。

3. 关于干部学校教育。抗日战争时期，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尤其是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参加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但我们的党和军队刚从残酷的内战前线撤下来，严重缺乏知识分子干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奋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进行民族救亡斗争，正是此时，大批知识青年纷纷来到延安，投向共产党，参加革命，探求真理。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创办了各种专业性的干部学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的指导下，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教育。他们学习后，绝大多数开赴前线参加战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并曾发布《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党历史上大量吸收和培养知识分子，第

一次是大革命时期，这是第二次。

延安大办干部学校教育起了样板作用。它推动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也克服一切困难，相继办起了各种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成为革命战士。这些知识青年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以后有些同志在抗战和内战前线或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牺牲了，绝大多数同志经过长期斗争锻炼，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级领导骨干。因此，延安干部学校教育是有重大成绩和意义的。



#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 少数民族工作

## (一)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 的成立及其任务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必须并且可能团结国内一切少数民族共同奋斗。西北（包括内蒙古）是蒙、回、藏、维吾尔等许多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党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为了阻止敌寇进入西北，并在西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极其注意争取和团结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工作，初到陕北即成立以争取蒙族和回族为目标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一九三七年七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高岗任书记，赵通儒为秘书长。定边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的蒙古工作委员会随即撤销，改为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回民工作部和蒙古工作部。

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治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策。我根据定边工委在蒙古民族和回回民族中工作的初步经验，也在会上就少数民

族工作问题作了发言，分别讲了在这两个民族工作中需要注意和掌握的若干政策界限。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决定成立几个中央工作委员会分担党中央的部分工作，其中有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主持西北地区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工委）成立于一九三九年初，书记由洛甫兼，我是秘书长。委员中我现在记得的有洛甫、李富春、王若飞、邓发、高岗、贾拓夫、陈铁铮（孔原）和我，共十几个人。洛甫不管具体事，实际工作是我从陕北公学分校返回延安后开始的，日常事务由我和贾拓夫负责处理，重要的问题向洛甫报告请示。西工委的工作人员有：刘春、牙含章（马尔撒）、张光天、刘庚、何承华、何长庆、周仁山、王铎、朱侠夫（塞农）、孔飞、谷敬、秦毅、陈洪、郑义、沈遐熙、谢华等。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说：“为着统一整个西北工作的领导，特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以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陈正人、肖劲光等七同志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二同志为候补委员，高岗同志为书记。”从此，西工委撤销，原有工作人员基本上合并到了西北中央局。

## （二）西工委的少数民族研究工作

我们党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历史已经很久，但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并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则是从西工委开始的。

## 一、设立研究机构

为了加强对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西工委专门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对少数民族，重点是对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有直接影响的蒙古和回回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调查，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为党中央制订民族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民族问题研究室由刘春负责，下设两个研究组：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牙含章、秦毅、朱侠夫等参加；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王铎、孔飞、周仁山等参加。

当时研究工作的条件是十分困难的。手头只有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几乎没有什么资料或参考书，连笔墨纸张也十分缺乏。参加工作的同志，多数未接触过民族问题。开始研究时，请何干之拟了一个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大纲。为了搜集资料，特派刘春去西安。刘春在西安跑遍了所有书店，只要是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书刊和资料，都买。我们还把毛泽东有关民族问题的几本藏书也借来了，虽然为数仍然很少，但在延安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资料室了。

除了搜集文字资料以外，我们还组织实地考察，进行调查。一九三九年五、六月间，派王铎等去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的七个旗考察，同年十月回延安。一九四〇年五月，派孔飞等去绥远土默特旗（敌占区）考察，于一九四一年四月，招收了近三十名蒙、汉学员（其中汉族三至五名）回延安。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初，西工委和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联合组成“蒙古文化考察团”，由王铎、焦心河率领，赴绥蒙一带考察蒙民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又组成三个回民巡视团，由金浪白、马文良等率领，分别去关中、陇东、三边等地考察。这些

对了解抗战实际，搜集资料，招收少数民族学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都是很重要的。马文良领导的去三边的一路，由于接近国民党统治区，马文良等不幸被马鸿逵部捕去。马文良忠贞不屈，惨遭杀害。

## 二、取得研究成果

民族问题研究室的工作，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一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其中《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两本书是大家集体研究，由刘春执笔编写的。前一本当时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后一本直至抗战胜利后在张家口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这两本小册子系统地研究了回回和蒙古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党团结回回、蒙古民族共同抗日建国的政策。贾拓夫等编写的《抗战中的陕西》、何承华等编写的《抗战中的甘宁青》（上、下册）、《抗战中的绥远》等小册子，介绍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和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都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出版。这些小册子，对于我们现在研究抗日战争和民族问题仍有参考价值。

二是为中央起草了两个有关少数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即一九四〇年四月拟定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七月拟定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这两个文件是西工委的同志在研究了蒙古、回回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以后起草的。其中关于团结蒙、回民族抗日，共求解放，共同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政策，是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结合这两个民族的实际情况提出的。西工委的大多数委员都参加了讨论，洛甫、李富春、王若飞、高岗等在讨论中讲了话。这两

个提纲在中央讨论时，毛泽东指出，不仅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而且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提纲在正式发表时，增加了也要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内容（“狭隘民族主义”这个词，在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后改用“地方民族主义”）。

这两个文件最初分别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第五期和第九期。发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时，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说：“这是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提纲，特发表于此，作为对回回民族问题的原则指示。”另一个提纲在发表时，也有类似的按语。按语表达了党中央批示的精神。这两个提纲后来收入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汇编（上册），作为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之一。

两个提纲的基本内容如下：

1. 分析了回回民族和蒙古民族的特征，对于回回，肯定它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少数民族”。揭露国民党政府认为回族已经汉化，回回就是回教徒，否认回族是一个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谬论和政策。在西工委内部，个别同志开始对此也存在模糊认识，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很快取得了一致。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这是我们做回回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对于蒙古族，指出它“在政治上现在是非独立和不统一的，是帝国主义或异民族的附庸”。“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必须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才有可能”。

2. 分析了民族问题中的三个基本矛盾：第一是回、蒙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裂活动”，妄图建立“回回国”。日本帝国主义还提出“日蒙联合”、“共同防共”等口号，建立傀儡政权——伪“蒙疆自治政府”，策动“以蒙治蒙”。其目的是要灭亡回、蒙民族，进而灭亡整个中华民族。第二是回、蒙民族和汉族的矛盾。



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造成了回、蒙民族对汉族上层统治者的深刻仇恨，反过来又滋长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日本帝国主义把利用回、蒙民族同汉族的矛盾作为它灭亡回、蒙民族的主要政策。第三是回、蒙民族内部的民主力量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回、蒙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必须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争取回、蒙民族，包括其一部分上层，共同团结一致地进行抗日战争。

3. 分析了争取和团结回、蒙民族参加抗日的可能条件，规定了党对回、蒙民族的具体政策。在提纲中，对回回民族提出了十一条政策，对蒙古民族提出了九条政策，归纳起来就是：唤醒和提高回、蒙民族坚决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在政治上与汉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开放民主，保障回、蒙民族人民（包括抗日的上层贵族）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语言、文字，保护清真寺、喇嘛庙；帮助改善和提高回、蒙民族人民的生活；帮助建立回、蒙民族自己的武装和组织抗日军队；实施抗战教育，培养回、蒙民族自己的抗战建国人才；帮助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回、蒙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之间的抗日团结。这些政策是党对少数民族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实践证明，以后我们党就是根据这些政策争取和团结了回、蒙民族人民，包括一部分上层王公贵族，参加了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国各民族在抗战中的团结。

### 三、我对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特点作了一些研究

到陕北以后，由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我开始注意研究少数民

族问题。但是比较有系统的研究，则是在西工委工作期间开始的。一九四〇年初，作为我对回回民族研究的初步成果，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一篇叫《回回问题研究》。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回族的历史和特点，我们党的民族平等、联合的政策和回族的出路。

《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原载《解放》第一〇五期和第一〇六、七合期），研究了三个问题：

1. 追溯了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元时回回进入中国，开始形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中国的回回，主要的就是蒙古军征服西域时被蒙古军俘虏或跟随蒙古军进入中国的回回氏”。“他们散至中国各地”，以“居甘肃者为最多”，逐渐形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其发展有以下特征：（1）“回回在元朝，已经大部分脱离了行伍的生活，定居在一定的地域，从事耕种，发展了农业以及手工业与小商业，成为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在明末，回族中已开始地主和农民间的对立。”（2）“由于回回在更广泛的地区与汉族长期杂居，并且已经有上层分子参加统治民族的政权。”（3）“回族在开始进入中国时，就已经是被压迫的。但是由于对元、明两朝开国建国有功，他们在一个时期中，还能保有经济上、文化上和宗教上比较顺利发展的条件。”

2. “明清——最黑暗的民族牢狱时代的回族”。“在整个明清时代，回族因为不堪于统治者压迫，曾举行过多次的起义和‘反叛’。但每次起义和‘反叛’，都被明清统治者用武力‘剿平’了。回族每一次失败，便遭受一次严重的屠杀和摧残。但是，无论怎样的摧残和屠杀，都不能消灭回族的反抗”。“回回是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顺治四年，米刺印、丁国栋的起义，坚持达两年之久。最后“军民五千余全被清军杀光。开始了明清血洗回族的第一页”。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事件和田五事件，由新老教的斗争（“具有深

刻的社会斗争的意义”)发展为反满斗争。满清统治者对起义的回民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进行了又一次的血腥镇压。同治年间的回族革命运动，地区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各省，时间从咸丰末年至同治十一年，延续达十一年之久。太平天国的胜利推动了回族革命的胜利，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影响了回族革命的失败，成千成万的回民死于左宗棠清兵的刀下（当时的研究还不知道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云南回族领袖杜文秀为首的主张和实行回汉联合的起义事件）。所有这些义举，虽因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都失败了，但其在回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在这些斗争中，满清统治者不止一次地制造回汉矛盾，挑动相互屠杀，造成回汉之间的长期仇恨，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3. “辛亥革命以后的回族”。指出辛亥革命并未消除回汉对立和解放回回民族。重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并实行民族平等、根绝大汉族主义的原则。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要求全国各民族进一步团结抗战，“只有坚持抗战，才能给中华民族和回族的解放事业开辟出一条广阔的道路”。

此文后来收入《回回民族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的第二章。我还为该书写了序言。

《回回问题研究》（原载《解放》第一〇九期）写了八个问题：一、回回的来源。二、回回的社会经济状况。三、回教。四、回回的革命传统。五、空前的民族危机与回族当前的出路。六、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七、实行民族平等的办法。八、肃清大汉族主义的传统，纠正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最后作了如下“简短的结论”：（1）“回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一个在汉族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弱小民族”。（2）“回族内部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显明，但这种矛盾没有超过回族同汉族统治阶级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常把社会矛盾推在后面。”（3）“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政策在某些点上促进了回

族的汉化”，也积累了民族的仇恨。(4)“回教在一定意义上是回人结合而为民族的‘绳索’，是回族团结奋斗的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进步、民族觉醒与社会觉醒的障碍，且成为内部和外部野心家利用的工具”。(5)“半殖民地中国的境遇，使回族遭受着两重民族压迫：帝国主义的和汉族统治阶级的。在目前，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东北、华北的沦陷区已成为殖民地，把回日矛盾提到第一位上来。回回民族斗争的锋芒，首先要针对着日本侵略者。回回人民应该坚决反对自己民族内部的投降主义与分裂危险。”(6)“为了巩固回汉的联合，为了坚持抗战，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再不应该继续下去了。应该立即终止民族压迫，具体的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7)“回族解放同中华民族解放不可分离，只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回族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与真正的自由。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里，回族同其他各民族一样，有自由的发展道路与光明的发展前途。所以，回回人民需要积极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8)“在回回问题上，应该根绝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应当纠正狭隘民族主义倾向。”

当时西工委除研究民族问题外，还研究青红帮问题，由刘庚负责。这对争取国民党地区青红帮成员拥护党的抗日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 (三)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

培养民族工作干部，主要是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也培养有志于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干部，这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为此目的，一九三七年我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办过一个少数民族班，有藏族天宝(桑吉悦希)、扎喜旺徐、孟特尔、罗德干、

沙拉(姑姑)，彝族王占青、王占有、潘占云、田雨清、李木林，苗族徐忠义等参加学习。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除在中央党校办过一个回民班(第三十七班，负责人是马青年)外，在西工委还集中了天宝、扎喜旺徐、孟特尔、沙特等一些藏族青年骨干分子，由何承华等给补习汉族的古文和现代语言。一九三九年陕北公学成立了蒙古青年队(即五十五队)。一九四〇年八月七日，后期陕北公学专门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队，有学员三十人，全是少数民族的同志，设有政治理论课(占百分之四十)、艺术课(各民族自己的艺术，占百分之四十)和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占百分之二十)，学习期限一年。在此基础上，一九四一年六月三十日又成立了民族部，主任王铎。第一次招生一百八十五人，除了蒙、回、藏、彝、苗、满六个民族的学员以外，还有少数汉族同志。在民族部举行开学典礼时，我应邀参加，并讲了话。我说，创办民族部，团结如此众多的各族同志于一处，借此沟通与交流民族文化，学习解放本民族的科学道理，不仅在边区，即使在全国也属创举。

随着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来延安的民族青年越来越多。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培养更多的民族干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民族学院，院长高岗兼，副院长高克林。内设教育处，管理教育工作；民族问题研究处，分设蒙、回、藏三个民族问题研究室；以及总务处和干部处。第一次招收蒙、回、藏、苗、彝、满、汉等各族青年三百多人，其中蒙族占百分之四十、回族占百分之二十、藏、彝各占百分之四，并有女学员三十二人。按民族和文化程度的高低，编为四个班。学程三期，每期二年，共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上半年，有六个班和一个研究生班，共七个班。学制在实践中也不固定，有三年半的，也有学完六年的。一九四四年民族学院迁到定边。一九四五年有一

部分迁到伊克昭盟的城川，至一九四八年春结束。它是我党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场所，为党培养了许多民族干部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者。

#### (四)组织少数民族的抗日救国团体

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回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战工作，促进边区回民文化，一九四〇年一月，由西工委组织八路军政治部金浪白，马列学院马文良，中央党校马青年、王占魁、王谦、苏汝智，西工委牙含章，以及女大的苏冰等，共同发起“延安回民救国协会”。二月二十六日，举行“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在延安的全体回民，以及邓发、李卓然、徐以新和边区政府的代表等。这次成立大会是边区少数民族建立自己抗日组织的一大盛举。回族同胞和汉族同志的讲话一致强调回汉之间的抗日团结。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全国回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最后公推金浪白、马文良、马寅(陕公)、马青年、苏冰五人为理事，正式宣告“延安回民救国协会”成立。这是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发表了《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强调“加强回汉两族的抗日团结，粉碎敌人的欺骗诱惑阴谋，成为目前极端重要的任务”。为促进全国回民的抗日运动，巩固全国的抗日团结，粉碎日寇对回回民族的挑拨，以及争取回回民族与中华民族的解放，特发起组织“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这一名称是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的，是为了同国民党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发生关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扩大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斗争的影响。因国民党不承认回族，称为回教，我们也用了这一名称。边区独自的回民组织，则统称回

民)。

一九四〇年十月七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同时举行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分会、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暨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边区各分区的回民代表和在延安的全体回民。朱德、王明、洛甫、高自立、谢觉哉以及各机关的代表一千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由定边马阿訇主持，按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大会讨论了争取回族在全国的平等权利与抗日团结、边区回民的任务和对保卫边区和发展边区经济以及边区回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提高等问题。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干事，干事长鲜维峻，副干事长金浪白，宣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一九四一年春，关中、陇东、三边各分区也相继成立回协支会。分会和支会在边区回民中进行了许多工作，对推动西北地区的回民群众进行抗日战争，揭露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回回国”的阴谋；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对于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增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推动边区回民发展生产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 (五) 交流和促进民族文化

一九四〇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的议案。此后，边区就开始筹备成立蒙、回民族文化促进会。

一、关于蒙古文化促进会。先是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有：吴玉章、林伯渠、高自立、王若飞、李卓然、艾思奇、杨松、冼星海、柯仲平、罗迈、贾拓夫、柯敬史（柯庆施）、许光达、冯文彬、张琴秋、李富春、丁玲、刘春、白如冰、周扬、曹

力如、肖三、肖劲光、肖向荣、蔡若虹、莫文骅、赵通儒、张庚、张目、师田手、高阳、乌勒图那素图、杜矢甲、巴彦图、巴布尔多计、阿拉腾扎布、李初黎等三十九人。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蒙古文化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有蒙、汉、藏、回各民族同胞和各机关学校的代表千余人出席。会上，艾思奇作了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意义和筹备经过的报告。我在会上讲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任务，提出四点：一、对蒙、汉两民族之间历史上遗留的误会和仇恨，要进行多方面的解释工作；二、在蒙古同胞及全国人民面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拨挑离间、企图分裂蒙汉团结的阴谋；三、要严厉批判大汉族主义的错误；四、根据蒙古民族通俗的文化形式进行启蒙运动。

这次大会推举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沙克都尔扎布（即沙王、伊克昭盟盟长）等为蒙古文化促进会名誉理事，推举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罗迈、乌勒图那素图、阿拉腾扎布、巴彦图等三十五人为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主任吴玉章。

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以后，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决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

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有一座成吉思汗墓，是衣冠冢，地点在依金霍洛。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绥远后，妄图抢走成吉思汗的灵柩（长方形的银棺，长约三尺余）。一九三九年五月，为保护成吉思汗灵柩的安全，免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蒙族同胞决定将灵柩移到后方（甘肃的兴隆山）。灵柩在迁移过程中途经延安，延安党政等机关为了加强蒙汉团结，联合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成吉思汗祭典。六月十八日，在十里铺设迎灵办公处。二十一日，成吉思汗灵柩到达十里铺，谢觉哉（代表中共中央）、柯敬施（柯庆施）（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滕代远（代表八路军总部）、王若飞（代表八路军联络部）、莫文骅（代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高自立（代表



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及国民党肤施(延安)县党部、县政府高仲谦等和各族群众近万人在十里铺迎灵、祭典,主祭谢觉哉,曹力如(边区政府秘书长)读祭文。摘录如下,“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嚚然反共,实则残民,满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蜂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营,抗战到底,大义是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磨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

从此以后,每年春季(旧历三月二十一日)、夏季(旧历六月二十日)就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以此来提高蒙族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蒙族人民的抗战热忱。一九四〇年夏季,由毛泽东、朱德亲自发起公祭,朱德、吴玉章、董必武、高自立和我都参加了。这次祭典在成吉思汗纪念堂举行。祭典同时也是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的落成典礼。“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字是毛泽东的手书。此后,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室就成了边区蒙族同胞的主要活动场所。

**二、关于回民文化促进会。**与蒙古文化促进会同时进行筹备。筹备委员有:谢觉哉、罗迈、张仲实、艾思奇、莫文晔、马阿訇、马青年、贾拓夫、刘春、马文良、鲜维峻、金浪白、马寅、牙含章、吴玉章、邓发、林伯渠、高岗、李富春、肖劲光、周扬、丁玲、王若飞、吕骥、张邦英、曹轶欧、曹力如、刘景范、胡乔木、柯敬施、赵毅敏、金茂岳、杜矢甲、习仲勋、马文瑞、白志民、王维舟、马海德、苏冰等。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大

会与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同时召开，选举林伯渠、高岗、谢觉哉、周扬、张仲实和延安的马阿訇、定边的马阿訇、三岔的马阿訇、关中的马阿訇等三十余人为理事。

创建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的目的，都是为了沟通蒙、回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帮助发扬蒙、回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创造与发展蒙、回民族的新文化，促进蒙、回、汉各族人民的进一步团结，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事业。这是当时西工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九四四年十月，边区文教大会前后，蒙、回文化促进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组织人员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部分著作翻译成蒙古文、阿文，并出版发行。

## (六)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 建立自己的武装

在由西工委起草经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分别规定了“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帮助蒙古民族的抗日军队，组织与强大抗日的武装”和对蒙、回民族的军队实行与其他军队享有同等的待遇，提高他们抗日救国的政治认识，扶助其民众的抗日武装等方针政策。

一九三八年农历十一月、一九三九年农历四月和一九四一年农历四月，宁夏海固地区的回族农民因不堪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先后在马国瑞、马国磷、马银贵、马喜春、马思义(马喜春的大儿子)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马国瑞等领导人也先后惨遭杀害。在第三次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马思义决定投奔陕甘宁边区。一九四一

年农历六月初六，起义军二百多人在马思义等人的率领下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庙儿掌。当起义军进入边区以后，得到了边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代表党组织首先接待了他们。但国民党对进入边区的起义军仍不放过，竟入侵边区来消灭这支起义军。在我八路军环县保安大队的援救下，起义军才免遭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保护这支起义军队伍，党把他们安置到离国民党统治区较远的合水柳树沟，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和照顾。

一九四一年七月，党为了教育这支回族农民起义队伍并培养其干部，特意安排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思义、马智宽等到延安参观。同时派鲜维峻代表边区回协去陇东慰问起义部队。参观期间，毛泽东接见了马思义、马智宽等，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共产党一定要支持和帮助回族人民争得自由和解放。并向他们保证不编散起义军队伍。朱德总司令、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等也接见了马思义，各次接见都由杨静仁陪同。马思义等人在延安参观期间，经边区联防司令部同他们协商，将该起义部队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以马思义为团长，直属联防司令部，由驻陇东的三八五旅代管。同时，西北局决定杨静仁任该团党代表，对外名义为政治教官。马克也去做政治工作，对外名义为文化教员。

但是，由于起义军成份复杂，马思义等领导人也想回海固地区接应当时还留在那里的起义军的零散成分和逃难家属，以图再次扩大势力，举行起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中旬，这支起义军在得到边区同意并留下我军派进的人，先后离开了边区。当起义军一离开边区，国民党军队立即对他们实行“围剿”。马思义等再次决定重返边区。在返回边区时，起义军内部又发生苏山等人的哗变，使起义军险遭覆灭，最后只剩马思义等一百多人回到边区。

起义军回到边区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和尊重这支少数民族的队伍，对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培养教育：调马思义、周尚义、马希杰等十余人到抗大和民族学院学习；在起义军中向战士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民族政策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以及宗教政策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党的关怀和教育使这支队伍的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开始接受党的领导。以后，马思义、周尚义、冶富荣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四二年八月，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肖劲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联防司令部任命杨静仁为该团参谋长（实际仍是党代表）、马克为政治指导员、卫一吾为副官。自此，回民抗日骑兵团在党中央和边区联防司令部的领导下，同边区的其他部队一样，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而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除了回民抗日骑兵团以外，在边区的关中分区，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有回民自卫军连。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了回民支队，党派郑义任这个支队的指导员。关中地委书记习仲勋很重视回民工作，亲自发给回民支队十六支钢枪。回民支队在反摩擦、保卫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七）陕甘宁边区是全国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

在西工委撤销以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继续开展少数民族工作，于一九四一年七月设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贾拓夫，委员有：贾拓夫、李卓然、杨易木、刘春、朱侠夫、鲜维峻、刘瑞森、赵通儒、刘英勇等九人。同年八月十一日，陕甘宁边区政府

委员会通过决议，成立少数民族事务工作委员会，主任赵通儒，委员有：那素滴勒盖（蒙族）、马生福（回民）、谢觉哉、刘景范等。九月，边区政府指示各分区和部分县、市设立民族事务科或民族事务科员，负责管理各分区、县、市境内的少数民族工作。从此，在边区政府及其分区、县、市政府中，就有了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极大地加强了少数民族工作，主要表现在：

**一、民族平等。**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体现了民族平等原则。在这一次选举中，边区回民七名代表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当选为县、乡参议员的就更多了。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蒙族同胞那素滴勒盖和回族同胞马生福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边区政府委员共十八名）。这表明边区境内的少数民族同汉族干部一样，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

**二、民族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称为“民族区域自治”）。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进一步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边区回族同胞较多，主要在三边和陇东分区。一九四二年四月，边区政府划定了定边的四、五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为回民自治区（这是一个城市的回民自治乡）。九月，又划定曲子县的三岔镇为回民自治区。以后，边区政府又在有回民聚居的农村（如关中某些农村）陆续划定了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区、乡。在少数民族自治区内，由少数民族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

**三、尊重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公布的

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回民有句谚语：“没有清真寺，就没有定居的回民。”清真寺是回民定居生活的象征。边区政府尊重回民的这种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回民聚居区修建了清真寺。一九四〇年二月成立的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倡议在延安建立一个清真寺和创办一个清真食堂。这两件事都办到了。延安清真寺是边区修建的第一个清真寺，是由金浪白、马占元负责筹建的，于一九四〇年十月七日正式落成，地点在文化沟内，寺院石碑坊上镂刻的“清真寺”三个字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落成那天，仪式隆重，边区回民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团体的代表二百多人，包括朱德、高自立、曹力如、谢觉哉、李卓然、吴亮平、艾思奇等和我都参加了。落成典礼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仪式进行，所有回民赤足跪伏于清真寺内，由延安马阿訇主持。他身着灰色长衣，头戴白色德司塔勒（阿文译音），率全体回民领拜。定边马阿訇身着黑色长衣，头戴门拉帽，朗诵古兰经。礼拜毕，由回民鲜维峻致开会词。朱德、高自立、谢觉哉和我都讲了话。有了清真寺还得有阿訇，延安清真寺特地到关中请了马生福教长来延安清真寺接任阿訇。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正式举行了阿訇接任典礼，延安全体回族同胞和西北局、边区政府等党政机关的代表都参加了。回协边区分会干事长鲜维峻主持仪式。马生福教长当时六十岁了，在接任阿訇的典礼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在关中开学的阿訇，早就想来延安。我知道延安建立清真寺完全是为了回民自己，所以我抱着很大的热情，不怕天气炎热，路途遥远，年迈苍老，坚决前来。我来这里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在边区政府英明的领导下，使各民族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为回民自己的解放而奋斗。”

延安清真寺有了阿訇以后，便成了延安回民的活动中心，凡

属伊斯兰教的教俗活动都在清真寺举行。民族学院的回族、东乡族的师生，每逢星期五或节日，都到清真寺做“主麻”和进行节日活动。截至一九四一年春，在边区境内共修建了十四所清真寺。以后在盐池、定边盐业区也陆续修建了清真寺。

**四、帮助办学。**边区政府为了提高和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除成立蒙、回民族文化促进会外，还为少数民族办学，到一九四四年，为回民一共办了八所伊斯兰小学，在定边办了伊斯兰公学，在边区境内有二百余家蒙民的聚居区巴勒葛素和哈拉西里蒙两地办了两所蒙族学校，还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创办了一个独立的民族学院。

**五、帮助发展生产，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凡由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迁来边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初来时经济上都很难。边区政府积极帮助他们安家，给予救济或借贷口粮，调配土地和生产工具，供给种子，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并免除他们的负担，三年内不交公粮。所以，大多数少数民族移民到边区后，生产上很快得到发展，生活逐步提高。举几个例子：在定边的一个回民自治乡定居了几年的周尚仁，来时一家六口，只有两元钱的路费。到边区后，先是给人家挑工，后来自己开饭店，雇工二人，有流动资金十一万元（边币），一九四三年就盖房十一间，还有两头驴。闵占林（一家七口）一九三九年来边区，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至一九四三年已盖房十间，有客栈和磨坊各一处，雇工五人，流动资金五、六万（边币），另有驴五头。一九四三年有二十多个贫苦回民来到边区，在边区政府和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回民打盐合作社，几个月打盐一千九百多驮，加上其他札工收入，总收入达十二万元（边币）。这样的事例很多。

一九四三年定边市的二百多回民庆祝“古鲁巴尼”节（旧历十一月十二日），在清真寺做礼拜，按惯例给孩子们散了钱。礼拜

以后，阿訇就到每家帮助宰牲。这一次共宰羊四十只，宰牛六头，过了一个十分丰盛的“古鲁巴尼”节。

陕甘宁边区境内的蒙民不多，但境外蒙民与边区的交往不少。每年定边、靖边、盐池的骡马大会都有绥远伊克昭盟等地的蒙民和宁夏的回民赶着马、牛、羊群来边区出卖。由于边区人民生活安定，生产不断发展，需要牛、马、羊，又由于边区政府实行照顾蒙民的政策：招待热情周到；牲口作价公道，只收取正当的佣金，不敲榨勒索；兑换货币手续简便；友区蒙胞自吃的粮食允许出境（边区为了对付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禁止粮食出境）等等，很受友区蒙胞和回民的欢迎。许多蒙胞说，边区好，不欺骗蒙人，给蒙人很多便利。因此，到边区来出售牛、马、羊的蒙胞越来越多。仅一九四四年八月五日至十三日那次定边骡马大会，蒙民前来出售大小牲口即达六百余头（羊群不计在内），以牛最多。这是一项经济活动，也体现了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威力。

**六、民族解放的灯塔。**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曾说：“多年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陕甘宁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地说，陕甘宁边区是他们自由生活、自由发展的家乡，是民族解放的灯塔。



#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和整风运动

## (一)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也就是马克思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这是我们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院长由洛甫兼任；副院长王学文。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张启龙、邓力群、朱光、章夷白、柯柏年、汪涛江等。教学组织是班，最多时设六个班和相应的一些研究室，共三、四百人。一般学员入学都要经过考试。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又经抗大、陕公、党校等学校的初步训练，具有学习和研究理论的条件。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教员多为兼职的，主要有王学文、陈昌浩、艾思奇、吴亮平、杨松等。洛甫等中央负责人也兼课。毛泽东、周恩来作过报告。刘少奇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过党的建设。他们作报告，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思想修养起了很大启蒙作用。

那时的教学工作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中有教条主义，不懂得如何使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出现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学用脱

节的现象。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一九四一年七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曾经亲临指导，在成立会上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这是毛泽东向马列研究院提出的任务，也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同年八月一日，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为了贯彻决定精神，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原马列学院的一部分骨干和有可能培养成为理论工作干部的学员，留了下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院长仍由洛甫兼任，副院长范文澜，党政主要工作人员有徐健生（秘书长）、李言（院党委书记）、李清（研究指导处秘书、党委宣传委员）、毛平（党委组织委员）、杜雷（总务处长）等同志。

## （二）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一、概况。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原则。全院共设九个研究室，室主任多由各该学科的党内专家担任，直接指导研究工作。比如，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兼）；

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我当时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干部教育工作，经部决定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和中国新闻研究室主任。

各个研究室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执行计划，具体规定了各室的研究目的、任务、人员分工、时间安排、方法、步骤、组织和会议制度等。每个研究课题有分工，有讨论，有总结。室主任参加指导，也参加研究。

**二、例一：历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室的目的是，是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中国历史学者。分三个组进行工作：1.近代史组；2.农民土地组；3.民族组。主要任务是编写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通史》，编出了第一、第二两编，整风期间中断。全国解放以后出版的由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此基础上修订并继续编写而成的。

**三、例二：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室的目的是，是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工作重点是在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想、各种哲学流派和国民党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就是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下，由文化思想研究室同中央政治研究室<sup>①</sup>合作编辑的，艾思奇、温济泽等参加了这一编辑工作。这本书在整风中是学习参考书，以后被规定为十二本“干部必读”书之一。

**四、例三：教育研究室的研究工作。**建立这一研究室的目

---

<sup>①</sup> 中央政治研究室为一九四一年七月设立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的一个下属单位，主任毛泽东，副主任陈伯达，与中央研究院的政治研究室不是一个机构。——编者注

的，是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并在研究工作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和政策的干部。分三个小组进行工作：抗日根据地教育研究小组，国民党统治下的教育研究小组，敌伪教育研究小组。规定的研究内容为：第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第二，学习和研究一般社会历史知识，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知识；第三，学习外国文与经常注意研究时事动向及策略；第四，补习心理学的一般知识；第五，研究批评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包括教育史，我、友、敌的教育现状，现代教育思潮等。规定研究期限三年。在研究室成立以后，订了一个半年计划。计划规定：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同时为了提高自己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首要的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三个地区（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和敌占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法和实践等问题。我在中央宣传部同李心清合作编辑过宣传教育方面的敌友我三本资料书，是供各级宣传教育工作者参考的，同时也作为教育研究室的研究资料，毛泽东称赞了这本资料书。调查则以学校教育为中心，以期在半年内对于新民主主义的中、小学教育的建设能够提出初步的具体的建议，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前夕取得了初步成绩。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看了一些有关教育流派的材料，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等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等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等，并作了笔记。其中主要研究了两个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即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室讨论结果，对前者是肯定的，对后者是否定的。董纯才、张健、华子扬等曾经写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教育研究室召开陶行知教育思想讨

论会，我作了总结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从教育看政治，陶行知在政治上经历过的路程；（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三）关于生活教育理论和方法中若干问题的商榷；（四）我们怎样研究和学习陶行知。当时，我认为陶行知在政治上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教育家；“五四”以后逐渐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在教育上是沿着杜威主义——生活教育——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道路发展的。他的生活教育有三个基本思想，一是主张生活教育，反对与生活脱离的洋化教育和封建传统教育；二是主张普及教育、大众教育和大众文化，反对教育和文化为少数人独占；三是主张教、学、做合一，反对为读书而读书。这些思想基本上是进步的。我的上述观点，在三月五日新教育学会纪念生活教育十五周年大会上，也作过论述。

同年三月十九日教育研究室召开乡村建设派问题讨论会，我对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对梁漱溟的思想）也提出了几点意见。当时，我认为：（一）梁漱溟的言论、著作和乡村建设实践证明，他是没落地主阶级、即是半封建制度的维护者；（二）他说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对立，而只有职业分工，中国社会关系是伦理关系，及“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等思想，同蒋介石、陈立夫有共同点；（三）但他企图用“软”的办法即乡学、村学的教育办法来维护陷于死亡的半封建制度，驯服农民，因之又同蒋、陈有区别；（四）他是唯心论者，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际已经破产。农民并不拥护他们。他现在参加民主同盟，要求民主，说明地主阶级中的抗日派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也是不满的；（五）乡村建设派在教育上的某些实际办法，还应参考与研究；（六）要把乡村建设派中的青年和梁漱溟区别开来。许多青年已经从梁漱溟思想中解放出来，有的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教育研究室工作的材料，是从我当时的笔记中摘引出来的。我简要摘引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不是想继续宣传上述具体的观点，而是想举例说明：第一，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虽然时间短，成果不多，但其基本方向和方法是符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的报告中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的。第二，当时包括院长、副院长和室主任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亲自参加研究工作的。

### (三)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

一、伟大创造。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求最终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我们党清算王明的错误用了很长时间，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解决军事路线和瓦窑堡会议解决政治路线以后，毛泽东鉴于改造世界观的迫切需要，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经典性的哲学著作，还写了许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政治、军事著作，同样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实际都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及其给中国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的。这种批判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最后，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用全党整风这样一个方法，即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给长期以来的党内思想教育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宣告彻底破产。

由此可见，整风的对象，主要是老干部（当时是中年干部）。但整风刚开始时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出来刮了一阵小资产阶级歪风，影响很广，如果不首先加以端正，就不可能把整风运动纳入正路。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这股歪风。但过后不久，毛泽东还是把整风矛头拨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方面，组织大家学习和清算“六大”以前、“六大”以来的路线斗争历史，终于在“七大”前夕，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地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在思想上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这样就为胜利召开“七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明称病未参加会议，写了一封信承认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但无自我批评。

当时，有同志提议要对王明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予批判，毛泽东说，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谁是谁非还不能作结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思想是和陈独秀投降主义相类似的思想。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但毛泽东在七届、八届两次代表大会上仍提名选他当中央委员。

我参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季，毛泽东邀集陈云、博古、凯丰、康生和我以及其他等人谈话，毛泽东说：老干部也要整风，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主要靠自学；成立一个小组，也开小组会，互相交换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大家都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又说：我们整风的方法是

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向前奋斗。小组会约一个月开一次或二次，大家都讲了话。周恩来讲过党的历次路线变迁，其他同志插了些话。前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结束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

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主要是从两方面学习，即同群众一道学习和同中央同志一道学习得来的。

所以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等“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没有老年一代，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

**二、整风前夕。**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的基本情况是这样：从未做过任何工作的占百分之六十八，来延安后受过短期学校培训的占百分之八十四，抗战以后入党的占百分之七十四，二十至三十岁的占百分之七十九，知识分子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二。可以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有救亡爱国的精神，一般信仰马列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自觉自愿地不远千里、不怕艰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在学习上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影响。

整风开始前，延安已经存在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墙报上存在这种思潮（《轻骑队》编委会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是



有错误的。”)。院内以王实味(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种思潮。尤其是王实味,他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二十六日和三月七日,连续公开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攻击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号召青年向党发“牢骚”,就是说,向党开火。这种错误观点,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所以,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我向徐健生、李清说,中央研究院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作风问题,还是怎样接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精神而把党性具体运用到研究、学习、工作中去的问题。整顿三风,对中央研究院来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三、开始阶段。一九四二年一月,洛甫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一些农村、市镇作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走时对我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我曾三次要求凯丰自己管,未成。因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很快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参加领导了这个运动的主要阶段。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一八”动员大会后至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是开始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普遍发生偏向,全面展开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斗争。

1. “三·一八”动员大会。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一些同志发言

后，我也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  
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  
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原来多数人认为  
只着重检查领导）；（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  
书长及各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简称“检委会”）的当  
然委员（这是院务会议决定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并正好考  
验他们；（六）关于出墙报和匿名问题，我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  
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那天我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以后得悉，我的发言引起了王  
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  
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问题，王实味反对院务会  
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全部检委  
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  
主张墙报文章可以匿名。关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  
不下，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民选者占四分之三，同意院  
务会议决定者只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二十一  
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在四月一日  
第二次检委会上，我再次提出未当选的王思华、张如心，仍应参  
加检委会，共同工作。多数无异议，以后也参加了检委会的工  
作）。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轰  
动了整个延安，影响了各个机关学校。

2. 检委会会议。动员大会后的第一天，三月十九日，检委会  
召开第一次会议，又展开了检委会领导关系问题的争论。柯柏年  
曾经在动员会上提过，检委会应在行政领导人领导之下工作，这  
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在这次检委会上，却有人提出了反对意  
见，主张检委会由动员大会产生，应向动员大会负责。我发言支  
持柯柏年的意见，首先说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应该由行政负责人

领导的理由，至于检委会对谁负责，我主张对中央负责，又对全校负责。多数同志无异议，争论结束。四月一日，检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又在四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其中一个思想检查要不要注重方法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彻底民主”，不必注重方法。我发表意见，说：“批评应该是彻底的，无保留的，不讲情面的，但同时应该注意实事求是，讲究方法，遵循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检委多数是群众，领导干部只占少数。此后几乎有会必争，很难工作。为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我和张如心、艾思奇、徐健生等人（还有其他负责同志记不清楚了）临时组成一个小组，方针是：我们几个人在检委会内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要多作群众工作；但对多数人做出的决议，又必须服从，不搞分裂，同时声明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正是依靠这个小组，贯彻这一方针，终于团结了多数群众，引导大家走上了正确轨道。范文澜未参加此小组，但此小组的每次会议情况和决定，都是由徐健生负责向他报告的。一直到按照“四三”决定精神成立高级学习组，由它行使检委会的职责后，我们这个小组才随之停止活动。

3. 《矢与的》墙报上的论战。三月二十三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墙报取名《矢与的》，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这个发刊词强调发扬民主是正确的，把民主绝对化，根本不提集中，是片面的。少数人就利用这个弱点，在《矢与的》上再次挑起了动员大会上的争论。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就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零感两则》，说：“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

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求“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名《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对不同意见他的观点的同志说：“用流言中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可以看出，王实味确实是在煽动人进行攻击了，他的矛头不仅限于院内，主要是我，也不仅限于我一个人，而且到了院外，影射向上了。除王实味的文章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拖“尾巴”的人是指我，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这些文章和漫画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整风就是单纯整领导，整“名流大师”，对民主与纪律的关系问题存在模糊认识，片面要求民主，忽视集中。也有认识比较正确的同志，如李宇超、王志匀、何定华、翟定一等，但属少数，比较“孤立”。这样，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墙报《矢与的》更以“民主”获胜的面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王震看了墙报的文章，很不满意，说：“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在一个晚上也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一部分人因此得意忘形，说是“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泽东看后，召集了高干会议。我在会上声明自己要转到运动中去，同群众结合在一起。后来的实践证明，同群众一道，并帮助群众前进，成了我的世界观获得根本转变的主要途径。

4. 三种情况。以上事实说明了三种情况：第一，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在动员大会、在检委会、在《矢与的》墙报上的斗争，

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第二，这种反映和表现，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如何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这个问题上，我当时的态度是不错的，但有两个缺点：一是在动员大会上听了几个同志的发言有不妥之处，就急着讲话，时机早了点。二是讲话内容和方式过于简单，这和当时生病身体发烧有关。第三，王实味等，尤其是王实味，把《矢与的》这张墙报当作攻击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攻击我的工具。

鉴于当时大多数学员的思想和倾向情况，不适于负责干部特别是我自己出面在墙报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所以一直到五月十日，《矢与的》出版七期后，我才正式向检委会常委提出改进墙报工作的建议。

我在向检委会提建议时说，中央研究院的墙报《矢与的》已出至第七期，过去做到了鼓励大家在墙报上进行批评、辩论，说错了不加抑制，这是好的，但是领导上多少采取了放任主义的态度。各期文章有许多是带有相当严重的偏向的，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到结论，没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得到表扬，没有一种偏向得到纠正，一任其自流发展，检委会的领导应当负责。在检委会里，大多数同志在中宣部决定公布以前是偏重民主而看轻领导，决定公布后又害怕纠正。我没有能采取更多的办法。我自己从动员大会后，由于客观的困难，只能正面地、适可而止地提出意见，艾思奇与柯柏年亦是如此。在第二期墙报上，我对墙报的希望只提出了“墙报是批评、辩论和建议的机关，……说错了也不要紧……但须力求有的放矢，射得准确”。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宣布后，在中央研究院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但领导上由于自我批评精神的不足，害怕正视过去的缺点和偏向，未能完全根据中宣部决定精

神处理问题，对墙报的方针没有积极的改进就是一个主要的例子，我有责任把见到的问题从原则上加以说清。因此，提出六点建议，其要点是：第一，要贯彻中宣部指示，“善于把错误引导到正确方面”。第二，鼓励投稿，号召稿子内容力求正确。第三，编委有责任帮助投稿人改正错误观点。第四，组织稿件，负责同志也要写稿。第五，对争论问题要作结论。第六，墙报应配合学习，起领导作用。检委会常委接受了这些建议。时间虽然晚了一些，仍有亡羊补牢意义。

五月二十日，我在《矢与的》上发表了《动机与立场》的文章（此文转载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编者注）。

5. 三个问题。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整风是有偏向的，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整风方针问题。不懂整风目的，把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看成了只是整几个领导人的活动。第二，检委会组成问题。不懂组织原则，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有否认和摆脱党的领导倾向，在下表现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在上表现为放任主义。第三，思想方法问题。“大胆”第一，“揭露”就是一切，不讲实事求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其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充分暴露了教条主义教育的根本弱点。

在开始阶段，在中宣部“四三”决定前，我确有不小的困难。第一，我在历史上犯过路线性质的错误，王实味等得以利用这一点来挑动自由主义和“绝对民主”。第二，中央研究院主要负责人洛甫去作农村调查了。第三，副院长范文澜是一个学者，为人老实正派，但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大熟悉。他主张整风需要采取民主方法也是对的，但他在墙报上写文章也说要“彻底民主”，“绝对民主”，“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谁阻碍民主，谁就会

在民主前面碰出血来”的话。现在看来，我在开始阶段采取慎重的态度，是适当的。

**四、深入阶段。**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四月三日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健康发展的开始，也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各种问题。四月六日，毛泽东又召开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我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不懂组织原则，不懂思想方法，这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四月七日，中宣部又专门邀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时，有人仍然认为中央研究院的争论多是个人成见之事，即宗派之争，而不是原则之事，不同意说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有偏向。凯丰批评了把中央研究院的争论看成是“宗派斗争”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存在偏向，主要是组织原则上的偏向，并暗示一些同志的自发性的偏向与王实味的挑拨性言论的区别。这样，中宣部的“四三”决定和“四七”座谈会，就终于把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引上了正确的轨道，开始了整风的深入阶段。

1. 自我学习。我既然参加了整风领导，除了坚持原则立场外，一个重要责任，就是从我开始，带头学好文件，掌握精神，改造自己。为此，我自己首先做了两件事：第一，精读文件。在

四、五月个人学习文件期间，我同大家一起也学习了有关文件，并联系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作了学习笔记，现在有本本可查的，如《读中宣部四三决定》、《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和毛泽东论绝对平均主义》、《学习杂记之一：“矢与的”的方针》、《学习杂记之二：动机与立场》，以及《谈学习态度》等。其中《谈学习态度》是学习二十二个整风文件的笔记，记下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如这次学习的重要性，全部粗读和重点精读的关系，搞通文件、总结经验 and 反省自己问题上的两个极端偏向，贯彻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必要性，个人学习和集体研究的结合，写学习笔记、记录学习心得的重要性，以及学习中领导干部的态度等。当时，我是比较注意写学习笔记的，我认为“写学习笔记不但对自己的学习是不断的将军，又同样能对自己的思考起着启发和明辨的作用。但是，笔记只是学习心得的记录，而心得深浅，归根结蒂决定于学习态度。所以，我们必须不疲倦地致力于学习态度的改造”。“领导干部在学习中有双重任务：自我学习，又帮助别人学习。因之领导干部的学习态度关系特别重大，他常常自然而然地成了别人的榜样。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能够以身作则地影响别人，积极帮助别人，又能从别人那里学习许多东西，真正收到教学相长之效”。坚持地克服教条主义态度，为培植马列主义态度而斗争，这就是我在整风中的学习态度。第二，检查自己。三月二日我参加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sup>①</sup>的会议，毛泽东谈了党的产生至六次大会以来的简单经过，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

---

<sup>①</sup> 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成立，任务是总结党的白区工作的历史经验，中央负责同志和有关的老干部参加，会议由毛泽东主持。——编者注



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我们做启蒙工作。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使我很受启发和教育。三月四日，又读了《六大以来》第二集刘少奇检讨“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文章及其给中央的信，也使我对总结白区工作和检讨自己得到很大的帮助。在此基础上，四月二日，我利用中央研究院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开会讨论整顿三风的机会，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的检讨发言，回顾了盲动主义、立三路线、“九一八”到遵义会议时期党领导上的错误，检查了我在这些错误中的地位和责任。重点是批评自己，分析自己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检查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对今后如何谦虚谨慎地进行工作，有极大帮助。有同志告诉我，他们听了我的检查，也很为感动，很受教育。说明一个领导人要帮助别人整风，首先要督促自己整风。以身作则，从我开始，这也是领导。

2. 纠偏。整风开始阶段暴露了问题，发生了偏向。对多数群众说，这种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属自发性质，和王实味的蓄意煽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煽动对偏向确实又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两者本质不同，形式相似。这样就使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带着相当的复杂性，势必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循序渐进。首先需要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王实味问题。

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的方法，一是个人学习整顿党风文件，二是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

在延安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四月十八日联合举行学习动员大会，四月二十日起开始学习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文件。他们学习整风文件，一般是按总论、学风、党风、文风的次序进行的。中央研究院针对运动初期发生的偏向，改变了这一次

序，五月上旬开始，首先学习“四三”决定和有关整顿党风的文件。学习“四三”决定使大家初步懂得了整风运动的方针、立场、方法和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大家初步端正了学习的态度；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使大家对党的组织原则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使大家初步清算了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所有这些文件的学习，都是结合各人的思想实际和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经验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个人领会精神，自觉检查，相互启发诱导，和风细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普遍获得提高。

在此基础上，从五月十七日起至五月三十日，又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性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对此，有的说有，有的说无。有的说是偏向，有的说不是。发言踊跃，争论极大。范文澜对自己在开始阶段“放任自流的领导”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我在开始阶段的领导方式，缺点大于优点。因为我那时不懂民主集中制究竟是什么，平时教条主义的学习，遇到实践，就不自觉地与所谓理论完全脱节。主观地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这是我不能不认为衷心抱愧、难以忘怀的一次痛苦经验”。他的自我批评受到群众欢迎。五月三十日，我也作了题为《民主集中制座谈会上的几个争论问题》的发言，对三个方面的问题的争论，提出了我自己的意见。一、关于民主集中制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民主集中制的意义；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应“强调民主还是应强调集中”；“民主扩大是否集中也扩大了”；“集中是领导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被领导者的权利和义务”；“民主是启发党员群众的

积极性，集中是把已经启发起来的积极性加以正确的使用”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的集中，必须是民主的集中即必须是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它与专制和独裁根本不同；我们的民主必须是集中主义的民主，即必须是正确集中的民主，它与绝对民主根本不同。”决不能因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而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我们要正确地了解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需要采取唯物辩证法的态度和方法，辩证地考察它，以免流于机械；尤其需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考察它，以免流于抽象的名词的游戏。”二、关于民主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什么是党内民主的实质；能否“把党的民主分成组织的、政治的和思想的三个领域”；能否实行“彻底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极端民主化（当时我们用这个概念，意指极端自由化或自由主义）的来源”；民主精神和作风；中央研究院如何运用民主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斯大林所说的“行动的民主主义”，就是在党的组织内，党员有权参加解决党的和一般实际的问题，制定决议，并督促自己的组织实行这些决议，就是议决权和执行决议的统一，这是党的民主的特点。党的民主永远同集中制联结在一起。同集中制分离，就会产生绝对民主，绝对民主就是绝对自由，而绝对自由是违反党的统一和团结，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三、关于纪律方面的问题。争论问题有：为什么服从纪律是自觉的；执行纪律有无条件；灵活执行决议在什么限度内才不致违反纪律等。我对这些问题或观点，说了下面的话：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只有自觉执行，才能达到目的；只有无条件执行，才能获得保证。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但决不能违反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我现在复述这些争论问题和我的意见，是表明当时青年同志们思想情况，他们的某些绝对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是自发的；同时也表明我当时对争论问题的

发言还有局限性，还不够完整、明确。例如还没有认识人民民主，没有充分认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等。至此，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带有群众性自发性的偏向基本纠正。

3. 批判和斗争王实味。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由于，第一，当时我们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经历着抗战中的空前困难，又面对着新的反共高潮，特别需要全党团结一致，战胜困难。此时此地，王实味却借党内整风机会，诬蔑党和咒骂党，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不给予坚决回击，就不能团结内部，一致对敌。第二，王实味惯于使用“左”的词句掩盖反动实质，利用和迎合青年中未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封为青年的“代表”，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个别缺点错误，加以曲解、夸大，造谣中伤，耍两面派，钻空子，被揭露后又抵赖顽抗等。对他这一切，不给予彻底批判，就不能肃清影响，教育青年。经过前一段的讨论，大家也发觉了王实味的思想不对头。所以，在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告一段落后，紧接着就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这是一场有着重大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斗争。

早在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就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矢与的》墙报上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胡乔木也写信给王实味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并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容许的。

六月一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

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很多，主要的有（按发言次序）李言、李又常、潘芳、雪苇、艾思奇、柯柏年、李伯钊、张如心、丁玲、艾青、范文澜等同志。首先是针对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开始讨论过这样一些问题，如《野百合花》的错误是方式的错误，还是立场的错误；如果立场错了，是否他的动机也错了等。很快又有同志揭发王实味在历史上和托派有联系。此事他在一九四〇年向中央组织部交代过。在批判过程中，他也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还说，至今对某些托派分子仍然念念不忘，认为他们的“人性”是好的。很多同志又揭发了他的种种反党行为。这样，大家对他的认识逐步加深，由他的反党立场，到他的反党动机；由他的反动思想，到他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党行为。从思想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籍。我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受检委常委会的委托，对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发表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的《解放日报》上），回顾了中央研究院从三月十八日动员大会以来八十天的整风学习和论战过程，总结了几个星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的收获，分析了自发性偏向和王实味问题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意义和必要性。具体谈了四个问题：一，肯定座谈会的巨大收获：对偏向作了一般的清算，对王实味作了彻底的揭发；大家在政治上、思想斗争的原则和方法上、自己的思想改造上，一般都提高了一步。二，王实味是什么人？支配着王实味的思想的是托洛茨基分子的思想。他的言行已为反革命所赞扬和欢迎。大家抱着“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来挽救他，实际上他拒绝了大家的帮助。“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

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三，斗争王实味的必要性和意义。为什么要斗争王实味？第一，因为王实味有反党言行。他坚持和传播托派思想；利用抗战困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制造谣言，破坏团结；利用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加以渲染和夸大，公开诬蔑党和咒骂党，为敌人提供反共材料；故意曲解整风运动为派别斗争，造谣诬蔑党的领导，进行挑拨离间等。“对王实味这类反党的反动的行为能够不允许我们激起高度的义愤和进行严正的斗争吗？”第二，因为王实味进行反党活动“有他的一套阴险的狠毒的手法”，比如：使用一些“左”的名词掩盖反动实质，吓唬缺乏政治经验的人；利用青年弱点，装作青年的代言人，进行诱骗；挑拨离间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党员和党的关系；两面派和钻空子；耍流氓等。“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不对王实味的言论行动，实行具体的揭发，进行严正的论战，能够暴露他的实质，肃清他的影响，提高党内的政治警惕性吗？”说明这场斗争和论战“是完全必要的”，是“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四，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的经验。第一，这是一个思想论战过程或阶段。一般地说，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特殊地说，又是同王实味反党思想及其影响的斗争。曾经发生过的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同王实味的反党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反党煽动对偏向发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又使一般的偏向同王实味的思想有了某种关系，使思想论战带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关键是要搞清一般偏向的性质和王实味思想的实质。第二，经过整风文件的学习和反省，我们终于克服和清算了自己在整风初期犯过的偏向，揭发了王实味的反动思想和活动。因此，我们比以前更了解了党的文件的力量和学习的重要性。第三，从反王实味的斗争中应该得出一个严重的结论，就是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和反对自由主义。第四，应使学习

和思想论战进入一个新的更具体更深入的阶段。“希望把我们这次座谈会的精神，反映到各个研究室去，反映到各个同志的内心里去。我们整个研究院和每一个同志应该从已经达到的阵地出发，继续努力，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整风运动的方针。”

4. 整风学习总结。中央研究院整顿党风的学习，到七月下旬告一段落，总结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批判王实味，关于思想意识的检讨，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这次总结有三个特点，一是坚持学习。整风文件的学习贯彻了整风的全过程，也贯彻了总结工作的全过程。学习笔记一般不是写了一、二篇，而是写了一、二本，真正做到了学文件，写心得，照镜子，理论和实际挂上了钩。二是要求作全面、历史的检讨。入党以后要检讨，入党以前也要检讨。尤其要全面检讨整风以来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过程，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影响、性质、危害、根源、克服办法和今后努力方向。三是贯彻民主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互相批评和帮助，主要依靠个人觉悟，自觉自愿地解剖自己，对照文件精神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个人进行全面的、历史的检讨的基础上，写出思想自传。这种自觉的思想革命，创造了团结互助、携手前进的热烈气氛，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同志们的心情普遍是舒畅的。正是在这种民主基础上，每个人都严肃地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从而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加强了团结，确实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个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是有规律性地前进的，收获是很大的。普遍反映，整风教育了每一个人，端正了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方向，使他们在今后漫长的征途中有可能少犯错误，多作贡献。事实正是如此，他们后来奔赴各条战线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气节。其中如胡南、刘亚生、黄子文、张炳南等同志，就在特务屠刀面前或在自卫战场

上，顽强不屈，壮烈牺牲。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更多同志经受住了林彪、江青、康生等反革命的迫害，今天虽已年老体弱，仍然奋战不息，保持了延安整风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

#### 五、主要收获。教育了两代人，两层干部。

1. 教育了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央研究院根据自己的特点，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改造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引导他们走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实事求是地对待了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弱点，扶正祛邪，帮助改造。他们的优点是有强烈的革命性，愿意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和领导，要热情帮助他们发扬这一优点。他们的弱点是存在某种程度的摇摆性和软弱性，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要热情帮助他们克服这一弱点。中央研究院的整风的主要成绩，就在这里。具体说，第一，他们的思想要害是世界观基本未改造，整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初步改造了他们的世界观，从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到了无产阶级立场。第二，他们的思想方法习惯于纸上谈兵，理论脱离实际，搞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整风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初步端正了学风，在理论联系实际迈出了一大步。第三，他们的组织观念薄弱，纪律性差，容易搞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用党性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教育他们，加强了他们的组织观念、纪律修养和党性锻炼。现在有些同志把延安的这段时间称为“黄金时代”，说整风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确实力量大，效果好。这是由衷之言，是完全正确的。

2. 延安整风，整个说来，教育了青年一代，更教育了中年一代(即现在的老年一代)。中年一代是各条战线上的负责干部。当时中央研究院从自己的具体情况出发，把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新党员的世界观当作首要任务，而直接帮助青年整风的都是中年干部。他们都在同青年一道的学习中受到整顿三风的教育，但是从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则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的学习《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两本书，即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受到了更深刻的教育。这是对负责干部一项空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实现了六届六中全会的号召。延安如此，全党也如此。

**六、基本经验。**毛泽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把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作为整个革命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说它们“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历史条件不同了，但整风和生产，建设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仍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链条中的两个重要环子，因之，我们今天重温中央研究院整风的成绩和经验，有现实意义。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获得成绩的原因何在呢？有些什么带根本性的经验呢？

1. 首先，有一条完全正确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一条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错误方针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们执行了这一条方针，使党的生活和党内教育走上了完全崭新的道路。

2. 其次，坚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偏向，我们仍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民主方法，即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启发自觉，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思想统一。

3. 领导干部和群众紧密结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一方面，领导接受群众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并引导群众前进。就是说，领导确实既做了学生，也做了先生。这种领导和群众亲如手足的关系，是十分值得发扬光大的。

4. 高度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点，整风中是自始至终自觉执行的，没有人认为做了自我批评，就是丢了人。也没有人听了别人的批评，就脸红。这是多好的同志关系！现在，一般说，自我批评的武器举得不高，仍然有些干部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批评，也不作自我批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给穿小鞋的事，也时有所闻。这是既不正派，又十分危险的坏现象，应该大力纠正。

一九四二年九月，我离开中宣部和中央研究院，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中央研究院的下一段学风、文风学习和全部总结，未曾亲身经历，就无从回忆了。

# 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

## (一)毛泽东的嘱咐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但存在两方面的情况，一是国民党顽固派方面，他们把陕甘宁边区看作眼中钉，时刻妄图拔掉它。一九四〇年前，尚有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和电报局、邮政局等通讯机关设在边区，还设有榆林地方部队常驻机关，从事反共反边区间谍破坏工作。这些机关因其破坏活动被我揭露撤离后，国民党又不断向边区秘密派遣特务，并在洛川、西峰镇、榆林三处设立反共据点，伺机进袭，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封锁边区。二是我们自己方面，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化闭塞，人畜死亡率很高。全区共辖二十七个县、市，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延安（县、市）、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定（子长）、安塞、保安（志丹）、固临、绥德、清涧、米脂、葭县、吴堡、新宁（宁县）、新正（正宁）、赤水（枸邑）、淳耀（淳化、耀县各一部分）、庆阳、合水、环县、华池、靖边、定边、盐池、吴旗等地。人口仅一百五十万。因此，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我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学习告一段落，确定调往陕甘宁边区

政府工作时，枣园打来一个电话，说毛泽东找我谈话。我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主要谈边区政府的工作。他说：今后边区政府的工作，第一，要讲团结，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边区政府内部要团结在以林伯渠为首的政府党组周围；第二，要精兵简政，做到五句话：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第三，要发展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也要搞好工业生产（他知道边区已经有火柴、毛织等工业和七百个工人，沈鸿还带进一些机器来，很高兴）；第四，要搞好文化教育工作，边区文化教育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迷信多，文化教育要抓紧发展；第五，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我离开时，他送到窑洞外，特别叮咛说：“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期望殷切，鼓舞极大。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我向西北局报告过，也在边区政府党组传达讨论过。

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到职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离开，我在边区政府一共工作了三年零七个月。我的职务是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景林是副秘书长兼审判委员会秘书长，以后常黎夫来了，他先是秘书处长，以后是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主要协助以林伯渠为首的党组做一些会议组织工作和政策研究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就使我有可能会花更多的力量去做上述的工作，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们在协助组织大会和研究政策工作中，经常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总结经验，也付出了辛勤

劳动。这几年边区政府的工作安排及其方针政策，就是根据毛泽东的上述原则要求和指导思想，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下进行的。

政府工作的面很广，这里着重回忆毛泽东嘱咐的四个方面工作，即：精兵简政，政权建设，经济工作，文教工作，另外再谈谈土地改革、接待中外记者团和一个政治运动：审干和“抢救”。

## (二) 精 兵 简 政

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我在同年同月临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他找我谈话嘱咐我转达边区政府的第一件事，也是精兵简政。我回忆在边区政府的工作，就从精兵简政开始。

### 一、严 重 困 难

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是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空前物质困难的时期，正如毛泽东说过的：“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支由于下列三个原因，也发生了很大问题：第一，脱产人员猛增。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仅一万六千人。一九三九年后，主要是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一九三九年起直线上升，计：一九三九年四万九千人，一九四〇年六万一千人，一九四一年七万三千人。人员

猛增，支出随之大幅度增长。第二，财政收入锐减。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存在一个很大弱点，就是依赖外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一九三八年为百分之五十一·六，一九三九年为百分之八十五·七九，一九四〇年为百分之七十四·七。一九四〇年十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第三，人民负担加重。中央曾经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但当时实际已达百分之五·四，势必增加人民负担。以人民的公粮负担为例：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万石，一九四〇年十万石，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这个二十万石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八，比一九三七年只占百分之一·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它说明每人平均负担已达一斗四升，比一九三七年只负担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人民负担确实重了，党内外反应强烈，党中央、西北局极为关怀。一九四一年九月至十一月，西北局曾派宣传部长李卓然率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遯等，在固临县调查了三个区，写了一个《固临调查》材料，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正是由于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就使我们的财政发生了严重困难。这是一个物质方面的困难，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 二、采用建议

精兵简政，是李鼎铭等人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二月间，

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等十一人提出一个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个提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交政府速办”。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普遍推行。以后毛泽东还说过，“‘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 三、第一、第二次精简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执行第二届参议会关于精兵简政的“速办”决议，在参议会闭会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就发出了《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同年十二月中旬就拟定了整编方案，开始了第一次精简。三个月后，至一九四二年四月，整编工作基本结束，裁减了骈枝机构百余处，缩减了工作人员数千名，这是收获。但由于缺乏经验，对精简工作的必要性的认识也不足，所以思想提高不多，工作改进不大。

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开始了第二次精简。这次精简的重点是建立边区政府本身的工作制度，如实行合署办公制度；政务与事务适当分工，使领导人有可能多抓政务；加强下级，提高县政府职权等。边区政府各个单位根据这一重点分别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调整机构，精简人员，改革制度。八月初实行合署办公。这次精简工作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制度。上级机关也精简了一些人员，但又都充实了基层组织，实际精简不多。

## 四、第三次精简

一九四二年九月，第二次精简已经结束，正在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进行第三次精简的准备工作。我参加了第三次精简。

1. 准备工作。第三次精简酝酿很久，准备充分。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总结经验。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对前两次精简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内容包括：经过精简后，机构设置是否合适，人员配备有无余缺，职责分工是否明确，行政、用人和总务工作有无制度、是否完整，干部使用、领导作风、目前工作存在什么问题等。这次检查实际是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动员第三次精简工作。我虽然未曾参加第一、二次精简工作，但从这一检查中大体了解了它们的业绩、经验和问题，为参加第三次精简工作做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第二，统一认识。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我们专门召集分区专员，延安、安塞、甘泉等县县长，以及其他一部分县、区、乡干部，举行简政座谈会，研究专员公署<sup>①</sup>以下各级政府的简政问题。这次座谈会以整风精神进行讨论，使大家对于各级政府的职能有了一致的认识，普遍认为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关键在于加强乡政权，简政工作必须以加强乡政权为重点。通过这次座谈会，明确了第三次精简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为深入进行精简打下了思想基础。

第三，准备文件。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西北局召开高干会，简政整政问题是重点讨论问题之

<sup>①</sup> 陕甘宁边区的政制为边区、县、乡三级。专员公署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区公署为县政府的派出机关。——编者注



一。根据政府党组的指示，在多次集体酝酿的基础上，我负责起草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和林伯渠准备在高干会上作的关于《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四日林伯渠在高干会上作了《简政整政问题》的报告，并把《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交大会讨论，获得通过。

第四，听取指示。准备工作的最重要一步，是直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也提出了“精兵简政”工作。他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是对过去精简工作的批评，也是对今后精简工作的期望。我直接听到了这些指示，极大地提高了对精简工作的意义、目的和要求的认识，在自己的头脑里完成了一次重大的思想武装。

2. 贯彻执行。第一、第二次的精兵简政只在政府系统进行。第三次精兵简政根据毛泽东提出必须是“普遍的”而不是“局部的”的要求，在党中央系统、西北局系统和军队系统也进行了。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精兵简政，对中央机构的人员也进行了精简，为延安其他党政军机关的精简工作，做出了榜样。

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第三次精简工作的基本纲领，就是《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它经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明令公布，下达执行。其主要内容和贯彻执行情况如下：

第一，主要内容。这个《纲要》根据边区整风中揭露的问题和

总结第一、二次精简工作的经验，本着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从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十一个问题。其中主要是：一、指出了这次精兵简政的目的，是要使政权工作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要减去一些不急需的机构和人员，把政府系统人员由现有的一万一千五百人减至七千五百人，即减去百分之三十五弱。二、重新划分和审定边区政府及其各个工作部门、各分区代表机关、各县、乡政权机关的职权和业务。规定“边区政府是边区政权的首脑部”，基本任务是“掌握政策，掌握干部”；“县政府是边区各级政权的枢纽”，基本任务是“组织人民经济和健全乡政权”；“乡政权是边区政权的基层组织”，“第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三、要求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要善于掌握政策，即会出主意，会指导实行。《纲要》强调指出：“这次简政工作涉及了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业务问题，机构问题，干部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以及拥军问题，三三制问题等等”，就是说，“简政工作是一序列的组织问题，又是一序列的思想问题”，“必须从组织上贯彻，又从思想上贯彻”。因之，一方面，要同整风学习结合，用整风精神进行简政；又方面，要同检查工作结合，政务人员要作思想检查，政府系统要作工作检查，用思想指导行动，用行动贯彻思想。要求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完成这次精简任务。

第二，组织实施。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组织工作，首先是一项十分细致的思想工作。工作人员担心列入编外，不光荣；领导人员担心减少人，难办事。思想问题一大堆。因此决定召开一些干部会议，我和民政厅长刘景范一道，先是召开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负责人会议，做领导机关的思想工作；再是召开各专员、县

长联席会议，做中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在这些会议中，先组织学习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所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讨论《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研究实施简政的措施和加强生产、教育工作的途径。经过这样的学习、讨论和研究，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决心和信心也就大了。

在此基础上，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组织措施和条例，如《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乡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约》、《简编方案》等，为简政规定了具体目标、任务和要求。

这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又做了一些组织工作。

第三，效果。第三次简政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到一九四四年初检查，已经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即基本上达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

精简。业务上，做到了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具体情况将在本篇的《自力更生，建设边区》和《文化教育》两章介绍）。边区政府各部门和下级政府一般已能抓住业务中心，开展业务工作。机构上，全部按简编方案执行。各厅处院的内部机构，裁减了四分之一，边区政府直属机关从三十五个减至二十二个，专署及县府的内部机构从八、九个减至四、五个等，消除了头重脚轻的积弊。人员上，边府各厅处院及县附属机关的人员，都已按计划精简，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和物资局等六个单位从原有四百六十九人减至二百七十九人，精简百分之四十强。干部调配上，从下级提拔了一部分干部到专署和边府工作，如边府就调入了五个县长当处长。也选派了一些得力干部去加强区乡政权，如延安县就有十个县级干部调区，二十个区级干部调乡，选送一百五十多

个高、中级干部去干部学校培养提高。初步实现了精简上级，加强下级和生产单位的方针。

统一。政治上，政策、法令、命令、指示已基本统一，“政出多门”的现象少了。组织上，加强了“一元化”。各厅、处、院、局在具体业务上可与下级相应业务机构直接联系，重大任务的部署则一律通过各专署、县政府负责人进行。人事任免上，基本上已统一于民政机构，改正了各自为政、自由任免的现象。

效能。由于坚持了统一领导，反对了“各自为政”的现象，精简了机构和人员，加强了下级，使工作效能有很大提高。尤其一些行政和企业机构，工作有明确指标，效能的提高更为显著，如文书科三个人做了过去十三个人的工作。边区通讯站一至四月每日平均投递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一件，五至十一月激增至每日平均投递三万零七十八件，提高效率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政府经营的工业中，效能提高的程度更为惊人。

节约。民力的动员减少了，如延安一九四一年动员民力六万多个，一九四二年只动员二万八千多个，减少一倍多。绥德一九四一年动员民力七万五千多个，一九四二年只九百个，简直说不上什么比例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自力更生，自运粮草，不再动员民力，这样就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机关、部队、学校节约粮食、燃料、日用品的成绩也很突出。三五九旅用洋芋和南瓜部分代替粮食，做到了粮食全部自给。被服厂、纺织厂、振华造纸厂等工厂由于精打细算，节省了大量布匹、棉纱、木材等生产用原材料，对经济建设贡献很大。

反对官僚主义。在过去一年中，在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上，也有进步。我们许多领导干部为贯彻《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在精简机构和人员、建立统一领导的制度和纪律、调整干部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如一九四二年工厂会议开

得好，转变了对工业的领导；具体帮助农业劳动英雄订一年生产计划，对边区按户计划及生产竞赛起了号召和推动作用；边区政府对于专员公署的日常指导，也减少了命令方式，增加了民主协商。边区政府以下各级政府的领导作风，也有改进，主要表现在对生产的领导具体了，大家能够自己动手去组织变工队、订农户计划、修水利、组织运输队、改造二流子、改造合作社、改良植棉等。总之，从上到下“官僚”少了，人民勤务员多了。这是最得人心的转变。

从以上简单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次精简工作是有成绩的。说明从边区政府到各专署、县、乡政权确实做到了从思想上贯彻，从组织上贯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都是做得很好的。

### 3. 第三次精简工作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有不足，也有过头。这是指第三次精简工作本身说的。有不足，如家属等未妥善处理，使不属正式编制而继续吃公粮的，仅边区一级还有一千余人。浪费现象也还比较严重。也有过头，即有过分集中的倾向，如对小学，部分地采取合并的办法，助长了不适合农村环境的“集中办小学”的缺点，对社会教育也如此，强调社会教育集中办，有的一个区才办一个冬学。机械地执行政府系统新定七千五百人的编制，削弱了某些必要的正常的业务活动。

第二，走回头路。精简后好了一阵，随后又恢复了老样子。这是指第三次精简工作过后的变化说的。第三次精简工作以后，有些单位在组织、机构、制度、人员、作风等各个方面，始终坚持精简成果，甚至续有提高。但也有些单位时过境迁，又走回头路，比如，机构又有增设，人员又有膨胀，制度又有废弛，统一又有削弱，效能又有下降，浪费又有抬头。尤其严重的是，在领导作风方面，官僚主义的残余显然大量存在，并有滋长趋势。

## 五、经 验

经过三次精简，至少获得三条经验。

1. 只有精兵简政，才能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任务。当时的急要和首要任务，第一是生产，第二是教育。由于多次进行精简，才终于集中力量发展了生产和加强了教育。可见，凡事要有中心，工作要分缓急。如果缓急不分，百端俱举，必然急也变缓，一事无成，一端也举不起来。

2. 精兵简政是临时工作，又是经常工作。所谓临时工作，就是按照一定的精简计划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有时间性。所谓经常工作，就是要把精简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始终，无时间性。我们必须不使一次精简后，时过境迁，死灰复燃。如果一次精简后就一曝十寒，肯定会把精简成果丧失殆尽的。过去的精简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全国解放后的多次精简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

3. 精兵简政是组织工作，又是思想工作。要改革体制、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健全制度等，一句话，要在组织上贯彻，首先要思想上贯彻。要做好思想工作，打通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认识，引导人们不是被动应付，而是自觉执行。如果组织工作没有思想工作做保证，组织工作就会失去灵魂，不能持久，也无法巩固。

### (三)审干和“抢救”

我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的整风运动，但已近尾声。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根据西北局决定，我组织总结了这一运动，大体上没有毛病，从略。这里着重谈审干和“抢救”。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夸大敌情，批判干部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并提出了开展反奸细斗争的任务。此后不久，边区政府就有少数单位（如边区银行等）开始审干。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夜，康生亲自圈定名单，指令边区政府保安处开始逮捕所谓“特务”、“叛徒”、“反革命”嫌疑分子。四月三日，党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整风的目标除“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边区政府机关的审干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四月中旬全面展开的。

## 一、“之”字路

边区政府系统的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都是由边区政府系统总学习委员会领导的。总学委的负责人是林伯渠、谢觉哉，我是总学委委员，主持日常工作，实际负主要责任。运动的安排同延安地区总的步调基本一致。我个人参加领导这一运动走了一段“之”字路：谨慎——急躁——复谨慎。最初是谨慎的，我知道苏区搞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在最后一次“抢救”大会后，才又恢复理智，退了下来。

我走“之”字路的大致情况如下：

1. 比较谨慎。从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全面展开审干工作至五月二十二日在边府大礼堂召开坦白大会。在这一个多月时间内，我是比较谨慎的，步骤也是比较稳妥的，从学习文件、检查工作、思想反省到历史审查，循序渐进，未发生大的偏差。在审干过程中，始终强调多调查研究、个别座谈和漫谈以了解情况，明辨是非。如对保育院的“车轮战”和银行、法院等个别机关的过火现象，都及时做了纠正。在我直接指导的单位中，有同志被揭发参

加过国民党的学生军训并加入了三青团，有同志被揭发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等，我都亲自过问了他们的问题，要求做到一条：注意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查证结果，前一揭发是张冠李戴，把她姐姐的同学的事放在她身上了，后一揭发是小题大作，把一个集体参加国民党的普通国民党员说成了国民党骨干。这样的事例可能还有，说明此时头脑是比较冷静的。

2. 逐渐急躁。早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康生就用“逼、供、信”办法，强迫原甘肃地下党员、西北公学（中央社会部办的）学员张克勤承认是“特务”，进而制造了甘肃地下党是“红旗党”（这是康生对白区地下党的诬陷，意指地下党外红内白，表面是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的假案。一九四三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康生亲自在大砭沟八路军大礼堂主持召开以各单位审干核心小组成员为主的干部大会，令张克勤以“坦白典型”面目，作“坦白”动员报告。此后，康生令张克勤到处作报告，以“感召失足者坦白”。在这种“坦白”气氛中，五月二十二日，边府大礼堂也召开了坦白大会。形式上，个人自觉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似乎是审干的一种好办法，容易取得“成绩”。事实上，“逼、供、信”开始抬头，调查研究退居次要地位，是一种摇摆的表现。七月十五日康生进一步加大压力，作了《抢救失足者》的煽动性报告，宣布经过三个月“抢救”，已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号召未坦白的人赶快坦白，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要在此地就下决心，在这里或者回去立即坦白自己的问题”。警告“不愿坦白的人们，宽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点要严重注意”。剑拔弩张，形势咄咄逼人。在此以前，七月一日，毛泽东已经写信给康生，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即审干九条方针）；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康生所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是阳奉阴违，直接对抗毛泽东指示的。但由于康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使他的报告带上了极大的权威性。此后，延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就纷纷召开“抢救”大会，出现“抢救”高潮。

边区政府系统也同样，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七月十六日召开“抢救”大会，就不要实事求是，不要调查研究了。在短短十多天中，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同中央机关和军队系统一样，边区政府也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报告，要他现身说法，劝说别人“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大会以后的若干日日夜夜里，我自己也头脑发热，参加了几次具体的“抢救”工作。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研究室有一个同志，×校领导人打来电话，说他是“CC分子”，“抢救”了一个晚上，形式是和平的，实际也是“逼、供、信”。教育厅有一个同志，因档案内有“CC”嫌疑材料，也“抢救”了他。财政厅有一个同志，是中央社会部通知我，说他是“叛徒”，要我把他送到保安处。我说保安处要找你谈话，他老老实实地去了。后来的甄别证明，他们都是一条心为党工作的好党员，但却把他们当作“两条心”<sup>①</sup>“抢救”了。这时“逼、供、信”已十分明显和突出，我开始有所怀疑，有所警惕，但还没有决心停止。第三次，控告。这次是我当主席，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我一看形势不对，只好立即宣

---

<sup>①</sup> “一条心”、“两条心”是审干期间的用语。“一条心”意指一心为党工作的好党员。“两条心”意指特务、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同时，还有“半条心”的说法，意指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编者注

布逮捕送保安处了事。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这样一来，我清醒了。原来还有五个被控告的，我与主席团商量，停了。会后，我请各厅负责人留下商量，我说，“抢救”大会已经搞得黑白难分，人人自危，不能再搞了。大家同意，就决定再也不搞“抢救”大会了。

3. 复归谨慎。那时，康生等在中央机关许多单位搞出了所谓“红旗党”，说甘肃、四川、河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等十多个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边区个别机关也开始在搞，高等法院就追王怀安是四川“红旗党”派来的。适值周恩来回延安，这些党组织都是他领导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正在清理，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就没有追下去。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党中央鉴于“抢救”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和恶果，正式做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审干工作包括“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九条方针，尖锐地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方针。并发出一系列关于甄别工作的指示，甄别所有案子。

根据中央的指示，边区政府机关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帅孟奇任主任，周扬、王子宜参加，工作人员有刘泽西（民政厅）、李育英（高等法院）、华子扬（政策研究室）等。此时，不少地区和单位还在召开“坦白大会”、“全县人民控诉国特和日特罪行大会”、“各界民众控诉国特罪行大会”等，因之，我再三交代帅孟奇、刘泽西说：“你们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原则，不采取任何逼迫性的方式，不开任何斗争性的大会，不要受外来影响，调查研究是驳不倒的。”以后他们正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帅孟奇，她严格掌握政策，赤诚对待同志，坚持一个人只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因之，一般说，甄别工作是做得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令人满意的。

边区政府机关共有工作人员三、四百人，受“抢救”的百余人，比例是很大的，其中约二、三十人嫌疑较大，送往保安处；五十余人有一般嫌疑，送往行政学院（临时审查机关），个别送中央党校第三部。甄别工作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始，到了一九四四年四、五月，机关和行政学院的甄别工作就都基本结束了，多数是无问题错“抢”的，有些是党内问题，有些是一般党派问题。也有少数人的政治性问题因受当时条件限制，无从查证，拖到一九四五年初仍然做不出否定或肯定结论，经逐级请示，最后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一来，受过“抢救”的人就全部甄别解放了。

## 二、摘帽道歉

康生夸大敌情，诬报军情，对毛泽东提出的审干九条方针和严禁“逼、供、信”指示，又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一手制造了“抢救”运动和大量的冤、假、错案。康生的这个责任是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的。但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在何时何地作过何种检查。真正在全党承担责任作出检查的，还是毛泽东。他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当着大家的面，公开承认“抢救”运动搞错了，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他又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夕，在中央大礼堂的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的，要在原场合取下来。

遵照毛泽东对全党的指示，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我也召集边区政府干部大会，在会上揭露了自己在审干工作中走“之”字路

的全部过程，检讨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赔不是，当场取下了错误戴上的帽子，说明“抢救”错误下面同志无责任，由上面负责，由我负责。我也提出彼此不要背包袱，我说：“象毛主席所说的，让我们共同当作经验教训来学吧！”

以后，我还个别地向有关同志赔礼道歉。一九四六年我去晋西北时，曾经请参加土改的同志带口信给一个同志：在一九四三年“抢救大会”上把他逮捕送保安处是错误的，我对他不住，向他道歉。一九八一年初，我又曾经托人征求一个同志对我在一九四三年错误地“抢救”他这件事的意见，并表示了歉意。

### 三、经验教训

唯一重要的教训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康生窃取了党的保卫机关的领导权。一九三七年，康生把苏联错误的肃反经验带回国来，用他的两面派手法，窃取了中央社会部的领导权，把它变成可以生杀予夺的权威机关，并且变成披着层层面纱的神秘机关，以掩盖他的真面目。在平时，他任意指定某一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经我手的前后就有三个同志，一个去后杳无音信，两个是释放了。但三个同志的所谓“问题”和审查情况从来没有同我谈过。

延安审干是整风的继续，但实际上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阶段。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审干则是康生企图制造一场错误肃反，肆行“逼、供、信”的“抢救”运动，并准备杀人。在党校曾召开公审大会，判决一个护士长的死刑，在延安市曾召开群众大会，要处决四个人，都被毛泽东知道制止了，并立即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免除了一次严重的错误。康生行为的性质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严重的罪恶。但由于他所窃据的权位，人们把“抢救运动”当作中央的指令，普

遍推行。这笔罪恶帐只能记在康生等人的身上。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一、一定要注意防奸除奸。延安有特务，现在也还会有特务，混进来的，变过去的；二、一定要保持领导班子的纯洁，防止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窃取领导权；三、一定要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实事求是，避免迷信和盲从，正确地执行肃反政策。

#### (四)政 权 建 设

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对于我们党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抗战三项要求，被迫接受了和平、抗战两项，却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我们党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推进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加速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主动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团结一切抗日阶层的民主政权。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提出了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任务，明确规定：“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陕甘宁边区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光荣任务。

##### 一、普 选

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政权。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都是人民直接无记名选举产生，三级政府由参议会选举产生。定期普选，是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首要特点。从一九三七年以来进行了三次普选：第一次是一九三七

年，第二次是一九四一年，这两次选举时我还没有调到边区政府，没有参加；第三次是一九四五年，这一次我参加了。主要谈谈这一次普选。

1. 学习和实践。一九四五年边区第三次普选，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边区政府党组讨论过多次，作了充分的准备。在七月二十五日党组会上，我对这次选举的环境、目的、方法、重点以及亟待进行的准备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接着，为了弄懂马列主义在代议制或代表制问题上的理论，我专门学习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列宁引用的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的论点，和列宁自己的论点，对我都有很大启发。此时各分区都已选择个别乡进行试点，以便积累经验，逐步推广。我也在八月六日至九月九日共花三十四天时间，参加了一个乡的选举试点，这就是延安市新市乡的选举试点。我亲自参加了实践，接触了群众，取得了第一手材料，增加了感性知识，发言权就多了。我在这次试点中有两条突出体会：第一，“三三制”的作用主要反映在边区、县两级政权机构上，边区、县两级政权机构要强调实行“三三制”，乡级则不必机械地实行“三三制”，只照顾党和非党联盟就可以了。因为乡参议会实质就是乡人民代表会（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边区参议会常驻会、边区政府正式联合通知：乡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乡村的人民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农民由地主代表，于理不通，于情不合。当时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说：“‘三三制’就是党和非党联盟，罗迈把‘三三制’同‘党和非党联盟’两者对立起来了。”我说：这话不对，“三三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党和非党联盟，而是在我党占优势的情况下各革命阶级包括中间派在内的抗日联盟；解放区主要在农村，这就是包括开明绅士，即一部分拥护抗日和民主的地主在内的联盟；但在乡政权不宜吸收许多地主阶级的代表参加，而应由农民自己选择他们所信

任的能不损害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人参加，防止硬拉“开明绅士”凑数，脱离农民群众，束缚他们的手足，这就是实事求是。第二，选举运动也包含着阶级斗争，在新市乡具体表现为店员、学徒和老板的斗争，小商人和大商人的斗争，农村中则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这观点现在已经过时，当时则是正确的。以上两点体会，未公开宣传，我曾建议给各级党组织发一指示，供他们参考。

新市乡试点回来，我写了一个试点笔记，题名《新市乡乡选工作初步经验》。一九四五年十月，选举工作全面铺开，新市乡试点经验基本上为选举委员会所接受，在全边区获得推广。

2. 三个特点。这次普选，是在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普天同庆的情况下进行的，群众的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从一九四五年十月半开始至一九四六年三月结束，历时四月余，既检查了工作，又选举了代表，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普选有三个特点：

第一，实现了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普遍：根据全边区三十八个选举单位的统计，参加选举的人数占全部选民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有的则达百分之九十六。除汉奸和刑事犯外，凡是年满十八岁以上的各族人民，都享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采用选民所能接受的各种选举办法，如识字的用选票，识字不多和不识字的用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等方法，按选民各自的具体情况，直接参加了选举。平等：一人一票，没有所谓财产多少、文化高低和民族差别等的限制。自由：谁要选谁就选谁，谁也不能控制谁。

第二，彻底的“三三制”。共产党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并为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提出候选人。自己选多了，就主动退出。李鼎铭说：“所有这些情形，都是我亲自见到的，也是大家亲自见到的。所以国内外有个别人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

第三，在选举中检查政府工作。这次选举，我们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目的是发现问题，以便改进；识别人才，以便改选。检查工作 是改选人员的基础。在选举中，人民放手检查政府工作，揭发了大量有关兴利除弊的实际问题，大部分获得了解决；又自由选择 and 认真讨论了候选人，选举了数千个为人民信任的各级代表。

## 二、政 权 结 构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就是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和战争环境。因之，和现代的政权结构比较，不免有缺点，但在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1. 三个组成部分。当时的全部政权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民意机关(人民代表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边区参议会根据一九四五年第三次选举结果，共有议员一百七十人。其阶级成分，包括边区社会的广泛阶层，计有工人六，贫农十八，中农六十九，富农二十六，商人九，地主三十四等。其党派关系，有共产党员六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九；国民党员十九人，占百分之十一.二；无党派人士八十九人，占百分之五十一。有回族三人，蒙古族三人，天主教徒三人，妇女七人。它是边区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有通过《施政纲领》、确定施政方针，选举、罢免政府人员，创制及复决边区的单行法规，监督政府工作及决定一切重要问题的权力。边区参议会闭会期间，设常驻会，由议员中选出常驻议员十二人组成。这十二人是：议长高岗，副议长谢觉哉、安文钦，常驻议员习仲勋、刘培基、曹力如、高榆庭、房文礼、霍仲年、蔡丰、谷莲舫、杜洪源，其中共产党员四人，占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八人，



占三分之二。这就是说，在人民代表机关中，我们党忠实地执行了自己的“三三制”政策。

第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政府委员会。边区政府委员会在一九四六年第三届边区参议会上选举十九人组成。这十九人是：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刘景范，政府委员贺连城、马济川、毕光斗、王世泰、霍维德、王子宜、霍祝三、唐洪澄、霍子乐、刘文卿、阿拉并巴音(蒙)、杨正甲、蔡登霄(回)、李仲仁、魏民选、靳体元。其中共产党员六人，占三分之一弱；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十三人，占三分之二强。这就是说，在政府机关中，党同样忠实地执行了自己的“三三制”政策。

第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分区设高等法院分庭，县设审判员，后改为县法院。根据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司法机关为政权工作的一部分，应受政府统一领导，边区审判委员会及高等法院，受边区政府领导。各下级司法机关，受各该级政府领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第二届边区参议会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一九四六年四月第三届边区参议会选举马锡五为高等法院院长。

2. 三个争论问题。在这一政权结构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社会各阶级在“三三制”政权中的地位问题，或叫“国体”问题。有的同志主张“三民”主义：民有(人民的政权)、民治(人民管理的政权)、民享(为人民的政权)，实质即所谓“纯粹的无阶级差别的民权”。这实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为“纯粹的无阶级差别的民权”在世界上是从来未曾有过的。而我则坚持毛泽东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政权。边区的“三三制”在阶级关系上是工、农、贫苦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边区为数极少)和开明地主的合作，在政治

上则主要是革命民主派和中间分子的合作。因为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和贫苦小资产阶级，所以关键在于共产党怎样领导中间分子。把“三三制”看作各阶级的制约关系，也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或叫“政体”问题。有的同志主张议、行并列，“县与边区两级参议会与政府并列，与一般民主制度国家相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也不能说是多元论”。我则主张边区的政权构成应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议、行并列的参议会制应改为符合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只有这样才能适用于边区，便于于人民。立法、司法、行政是政权的三种职能，但决不能三权鼎立。三权鼎立就是三元论，在我们边区是完全不适用的。

还有第三个问题，“最高权力机关”问题。我曾经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并把它反映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中。这就是所谓“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在边区参议会闭会期间，边区政府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的说法。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有同志在个别谈话中批评这种观点“为世界各国所没有，满清末年的宪法才如此，国民党才企图如此，莫索里尼、希特勒才如此。”我当时就承认我的上述看法“有毛病”，并把它改为“在边区参议会闭会期间，边区政府委员会是边区最高行政机关”。

### 三、领导权

在“三三制”政权中，我们必须不是以党员数量和强制办法，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党员的模范工作，去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尤其中间分子，既要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保证党的领导权，又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二者是不可分离的。一般说，三分之一的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容易接受党的政策

领导，主要是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其代表人物有李鼎铭（边区政府副主席）、贺连城（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教育厅副厅长）、霍子乐（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建设厅副厅长）、安文钦（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等。由于一，阶级利益和历史关系，他们和党存在一定距离；二，汉奸、特务、反革命按其“利用三三制，破坏三三制”的方针，经常挑拨离间，如造谣说“安副议长被罚款五十万元，李副主席被撤职”等。我们用两方面事实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表达了我们的诚意，巩固和发展了“三三制”政权。第一，政治上，我们坚决贯彻了“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的政治基础即《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边区政府几年来的工作完全说明了这一点。第二，组织上，我们坚决保证了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的职权，务使他们有职有权，有充分机会行使他们的法定职权。在这个问题上，林伯渠做了许多工作，我和李景林、常黎夫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做法是：

1. 民主合作。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上说过：“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我们执行了这个指示。

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和这些中间人士的关系，一度搞得不十分好，把李鼎铭当客人待，形式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而他对是否有职有权，则非常重视。我在任秘书长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就在若干情况上发现了他的消极和不满态度。其一，他在政务会议上，不论是否当会议主席，总是很少发言。有时林伯渠问：“李鼎老有什么意见？”他总答复：“俺没意见。”其二，有时政府行文，他不划行。其三，他同柳湜、贺连城、霍子乐等非党人士之间，和同共产党员负责人之间，亲疏不同。这三种情况，都表示党内外关系不好。我将这些情况同林伯渠讲了，林伯

渠也有所感觉。经商量之后，林伯渠同意我采取下述方式去同李鼎铭开门见山、开诚布公地谈谈。某个晚上，我就专去会见李鼎铭，我说：“鼎老，我这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好多事情，副主席不吭气，我这秘书长怎么当？！”我这样一说，把他头脑里积蓄已久的意见挑动了。他打起精神，与我谈了很久很久。他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跟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我完全意识到，他确实把心里话说了。回来我就和林伯渠商量，也报告了党组。我说，党组当今应该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设法打破这种不正常局面。党组随即商定了几个改进措施：一、要各厅、处、院轮流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参议会副议长汇报工作，我也参加；二、每次政务会议前，由有关单位的党员领导人向他汇报会议内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取得他的同意才开会，不同意便缓期开会，进行协商；三、某些不需要经过政务会议通过，而要由副主席副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先向他说明内容，取得同意，然后办理划行手续；四、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一句话，要同党外人士民主相处。这样做，李鼎铭很高兴，态度完全变了。不作客人，而作主人了。不讲“你们党上”，而讲“我们团体”了。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他马上以主人翁的姿态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也知道。”多大的变化呀！以后中外记者团来延安，一个英国记者要求同李鼎铭副主席谈话，我们给他配备了翻译，就让他自己找去了。他在谈话间问李鼎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

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有职有权。”这位英国记者事后对我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安文钦本来是比较右的，但他在外国记者面前，也为边区说话，痛骂国民党。后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我说这些党外人士同中外记者谈话，都有一个“边区立场”，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延安的“三三制”搞得很好。

一九四五年一月，边区政府动员检查工作。我采取个别谈心或二、三人座谈方式，征求和听取几个主要党外人士的意见。在此期间，我和李鼎铭有过多谈心，和贺连城、霍子乐等也有过多谈心。他们的意见，有正确的，确属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不正确的，有的是成见，有的是误会。当时我感到他们提的意见有两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其一，认为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李鼎铭曾经有过这种意见，已如前述。霍子乐、柳湜也有这种意见。霍说：“高厅长未病时，计划、指示由他自己搞好，就可拿出来。他病了，我们搞的就得酝酿酝酿。我们难说话，说话就可能对立起来。”柳说：“我的命令，下面总是推延不执行，大概是要等支部内商量。”其二，认为非党员受歧视。柳湜说：“共产党员对党外人士歧视，看不起他们。”贺连城说：“主客之分不对，党外人士以客人自居，视党人为主人，不对。党人以主人自居，视党外人士为客人，也不对。这鸿沟之存在，共产党人要负主要责任。”“绥米来的知识分子，民政厅分配工作要他们填志愿表，但填教育的，派去工厂；填工厂的，派去搞教育。有个青年跑去质问：‘你们党员提要求，都解决了，非党员为什么不解决？’回答的同志说：‘你为啥不加入组织？’”其他还有对保安工作的意见。林伯渠知道了对他们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争论，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以后希望常谈心，可以会上谈，更可以个别

谈。大家表示同意。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林伯渠和我先是向西北局，然后向毛泽东、朱德和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的意见。西北局同意李鼎铭等所提意见是好意的估计，同意他们提出的很多意见是很好的。毛泽东赞成我们和人谈心的方法，他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对的意見，我们都要研究解决。”

2. 生活照顾。党外人士、尤其中间人士，有不同的生活习惯，我们给了适当照顾。李鼎铭最初住在山沟的一个土窑洞里（防空），进出不便，没有引起注意。记得是常黎夫发现了这一情况，我们就注意了。以后在林伯渠和我住的那排土窑洞下面，为他新砌了石窑洞，这是陕北的“钢筋混凝土大厦”，请他搬到新居，他表示满意。李鼎铭有些特殊的生活嗜好，但与政治无关，我们一概不加干涉，对此他是感激的。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我们也在可能范围内给了必要的照顾。

3. 适当让步。开明绅士毕竟是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不可能不关心地主阶级的利益，为他们说话。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在有些问题上就需要作适当的让步，我们正是这样做的。记得我到职不久，一次开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讨论西北局提出的土地条例，我在会上作了说明，但李鼎铭对其中的一条不同意，因之不签发有关文件。最后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亲自到他家里，听了意见，让了步，才解决问题，同意签发。

当时绥德警备区包括绥德、葭县等地未经土改，经常发生农民和地主的土地纠纷事件。边区政府有一个审判委员会，林主席、李副主席分任正、副委员长，李景林为秘书长。审判委员会除按边区司法三级三审裁判制度担任第三级终审职责外，还专门研究和裁决绥、葭地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纠纷问题。有些案件裁

决结果，有农民吃亏的。我见到毛泽东谈起此事，他说：和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合作，有些事情让点步是难免的。你们可以这样做：如果农民吃了亏，可由边区政府给农民作相应的补偿，使农民不吃亏。就是说，这吃亏由政府承担，地主和农民双方就都照顾了。

4. 必要的斗争。我们对党外人士主要是对中间派需要作适当让步，让步是为了团结；又需要作必要的斗争，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一九四五年三月五日，李鼎铭副主席主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为“土地所有权”，即改为“其土地所有权属于投资者”。说不如此人家就不来。我说开荒有两种，一种是耕者有其田，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种是大量投资开垦，须预防土地过分集中。因土地私有是允许的，但是过分集中则是违反新民主主义的。贺连城同意防止过分集中，但主张有限制地承认所有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和民政厅长刘景范商量，原则要坚持，但方式要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林伯渠同意，李鼎铭也同意，就取消了这一条。这是一次小小的斗争。

我们对边区“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中的中间分子，经常注意了这些问题，进行了团结工作，主要团结了如李鼎铭、安文钦、霍子乐、贺连城、刘绍庭、刘文卿、王得菴、张喆卿、霍仲年、刘杰三、蔡幼轩、李元桢、张敬斋、丁志文、高寿凯（高瑜亭）、李建侯、马新民、马阁臣、姬佺雄、艾秉卿、高承斋、马润之、赵亚农、霍敬堂、白宝珊、乔松山、杜嗣尧、曹旋夫、周志其、任逢华、毕光斗等人，确实极大地巩固了党的领导权，也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对国民党统治区，尤其对边区周围的榆林、

陇东、西安等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他们的爱国心、正义感和主人翁感情，也大大地激发出来了。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第三届边区参议会开幕会上，他们的表现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次会议上，安文钦、刘文卿、高瑜亭等地主出身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莫不怀着热爱边区和痛恨国民党顽固派的心情，慷慨陈词，感人肺腑。我当时深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们党的联合政府政策的大成功！

#### 四、作风问题

作风问题是党的建设，也是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多年来在延安培育出来的优良传统。但这一传统的形成是经过了一个艰苦的过程的。全党是这样，边区政权系统也是这样。

一九四二年冬边区高干会提出了转变作风的任务，要求从适合于战争环境的动员作风转变到适合于建设环境的新的创造性的作风。经过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两年的实践，有所改进，仍有问题。

1. 问题在区乡，责任在上级。政权机关作风的好坏，直接地从业区乡干部同群众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群众要求区乡干部的标准，大致有四条：公道、腿勤（积极）、平和、有办法。我们大多数区乡干部是从苏维埃红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前两条无问题，老实、朴素、肯干；问题在后两条，缺平和、少办法。在执行上级任务的时候，容易发生“生硬”、“瞪眼睛”、“耍态度”的毛病，也就是命令主义的毛病。在接受群众的要求的时候，容易发生“拖拉”、“不顶事”的毛病，也就是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遇事大多依靠命令、摊派。不仅上级要东西依靠强迫命令、摊派要上来，



甚至上级给东西也依靠命令、摊派给下去，以至有时把好事也办成了不得人心的事。因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群众对他们不满，一些党外人士也认为“上面都好，下面走了样”，“下面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把一切工作的缺陷和错误统统推在区乡干部身上。事实上，问题在区乡，责任在上级。据我当时分析，上级本身存在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毛病。这种毛病的表现是：第一，布置工作倾盆大雨。只知道往下交任务，不讲政策，不问情况，不看对象，不给措施，不教办法。而且求之很高，操之很急。这种命令主义的领导，怎能要求下级不搞命令主义呢？区乡干部对此是很有意见的，他们说：“乡下工作多，生产任务重，上面笔杆子摇一摇，我们就得一阵跑。跑一天回来，还得自己做饭。”“误工，得罪人，上下批评，左右为难。”这是实情。第二，对待下级的困难麻木不仁。不知道农村特点，不倾听群众呼声，不照顾干部困难。区乡干部的困难是很多的，一是山村环境，交通十分不便。二是干部农民出身，文化低，能力弱，很难独立掌握政策法规。部分地区还不适当地要求他们生产自给，生活负担很大。三是内战时期的战争动员作风一般未作必要改变。在这种主观客观都有困难的情况下，亟需上级加以支持和帮助，要多作典型调查，开会推广。要多到地方开会，就地面对面的解决问题，少发文件。要想方设法帮助区乡干部，训练和提高他们。但上级对此体会不深，支持不够，帮助不力。这也是作风问题。这说明区乡干部的作风问题，实质上反映了我们上级机关的作风问题，反映了我们整个政权机关的作风问题。

2. 党直接领导解决作风问题。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区乡干部的作风问题上，同各种片面的指责进行了多年的争论，为绝大多数区乡干部的本质辩护。党中央和西北局也极为关怀，并直接过问和领导了这个问题的解决。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我在向刘少奇汇报党外人士对区乡干部的意见时，他说：“下面同志拉稀，说明上级领导有问题。”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高岗、林伯渠、贾拓夫、刘景范和我在毛泽东处谈劳模大会总结问题，刘少奇也在座。毛泽东说：热过头了（意指冲昏头脑），要泼点冷水（头脑冷下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上级指示不可生硬。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还说过，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农村环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工作效果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毛泽东、刘少奇的这些指示，对我们解决边区政权作风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策指导。

一九四五年一月五日至八日，西北局高干会也专门讨论了作风问题，认为区乡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缺乏文化也是一个原因。主要责任在上级，上级的关键问题在于不了解农村和农民：地广人稀、个体经济、劳动力不足、文化落后。不善于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组织起来；发展群众教育文化卫生事业；要特别强调自愿原则，不能性急等。这个问题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包括我自己在内，一直没有完全解决。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及其变化缺乏了解，二是由于对一九四二年高干会后的工作成绩产生了骄傲情绪。所以，要解决区乡干部的作风问题，首先要解决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西北局高干会深入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在会上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就为边区一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解决作风问题打下了思想基础。边区一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正了自己作风上的毛病，就会给下级作出榜样，启发和帮助下级改变作风。

上级作风要改，下级作风也要改。一九四四年七月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时，霍祝三参议员（党外进步分子）等提出了一个训练区乡干部的建议。毛泽东知道了，很高兴，打来电话说，可以一年训练一次。西北局在作风问题座谈会后，就根据霍祝三参议员的提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一九四四年冬至一九四五年初办了一期区乡干部训练班，对多数区乡干部进行了一次如何正确地为人民服务，从立场、观点、方法上改进服务工作的训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林伯渠在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每年进行一次与乡选结合起来的乡村干部冬训。乡村干部训练从此成了制度。

一九四五年冬至一九四六年初第三次普选，群众检查政府工作，实际又是对区乡干部的一次群众性的冬训，使区乡干部受到比头一年冬训更为深刻的教育。他们经过群众的批评和帮助，多数有很大提高，开始学习和群众商量办事，命令主义少了，民主作风多了。

3. 边区政府的工作和作风检查。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西北局高干会讨论作风问题后，边区政府也多次讨论作风问题，并立即进行了一次工作和作风检查。检查的内容，一是业务，二是作风。从业务检查到作风，又从作风检查到业务。作风检查包括：实事求是还是主观主义；群众路线还是官僚主义；五湖四海还是宗派主义；民主集中制还是自由主义等。我进行了自我检查，也参加了办公厅的检查和整个政府机关的检查。

第一，自我检查。自从认识到区乡干部的作风问题上级要负主要责任以来，在一九四四年末的一些日子里，我详细反省了自己一九四二年九月调来边区政府到一九四四年末这两年多时间内的工作。在这段时间内，我主要是帮助政府研究了一些政策问题，我认识到：《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虽无大错误，但有过

分集中的倾向，执行中也同样；“抢救运动”中犯了“左”倾毛病；一九四四年一月《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写得不够好；在根据毛泽东提议搞一个长期建设规划时，犯了机械执行、脱离实际的毛病；在开文教大会期间，我尤其深刻地感到对下面实际了解太少，以及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的严重性和上面责任的重大等。对这些工作虽属初步检查，已经充分说明我们边区政府（我自己在内）的领导作风是存在问题的。因此，在一九四五年元旦的日记中，我作了如下的记载：“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造作风，立下下面几条：一、严格地实事求是，从人民、从实际、从农村出发考虑问题。二、多作酝酿，善于等待。三、冷静的头脑，热情的态度。四、从坏处着想，从好处争取。五、正确的坚持下去，错误的立刻改正，关键在于检查，自我批评，时刻防止背包袱。”

第二，办公厅检查。在一月十七日办公厅全体人员大会上，我讲了这次检查的必要性、目的、内容等，并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我认为主要缺点是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主观主义，民主不足，急躁，生硬。要求大家批评。一月二十五日前后，我多次参加研究室检查作风的座谈会。研究室的同志普遍进行了自我批评，也有相互的批评。对我，同意我的检查，也补充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对他们关心、指导、帮助少。研究室的作风，肯钻研，有朝气，有干劲，反映了青年的优点。缺点是一部分同志经验不足，有骄气，需要帮助。过去我对他们确实既少表扬，也少批评，帮助不够，以后开始注意。二月二十八日，我同常黎夫交换意见，他认为：一、政府作风各有各的一套，需要分别谈通，才好工作；二、各厅领导互不商量问题，对工作十分不利，须设法解决。我同林伯渠商量后，遂于三月一日邀请刘景范、南汉宸、李景林、常黎夫、王恩惠诸同志座谈机关作风和制度问

题，确定：一、各厅分科集体办公，主席、厅长每日办公第一小时碰头，商办紧要事项；二、成立行政处，实际即政治处，以利机关政治工作。对加强政府内部的集体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改进机关作风，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整个政府工作作风检查。二月二十八日政务会议决定要我总结这次检查，因此我用了不少时间，作调查，听汇报，看材料，对这次检查作了小结。经过这次检查，以后又经过第三次普选中的群众大检查，在政权作风上明确了很多问题，也提出了改进措施。（1）问题的实质是群众观点问题。我们现在处在相对和平的建设环境，我们的作风问题，基本上就是怎样领导建设问题。我们的建设工作主要是为农村为农民的建设工作，这主要的是要靠农民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因之我们的作风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同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实现“组织起来”的建设道路，就需要帮助农民将习惯势力得到改造。如何帮助农民改造自己的习惯势力？是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按群众的需要与自愿，逐步引导他们前进，还是强求速成，要群众超速前进？这就是我们作风中存在的实质问题。（2）主要毛病是犯了急性病。在执行政策的方式方法上，或不按自愿原则办事，交替出现命令主义和自由主义，忽“左”忽右。或不按实际情况办事，搞大而全，如提过高口号“耕三余一，两年完成”<sup>①</sup>；要求组织大变工队，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劳动力组织到变工队；组织大运输队；强求一揽子合作社，一揽子英雄，一揽子学校等。这些都与边区政府的贪大、求全、急躁的领导思想有关。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中提出的

---

<sup>①</sup> “耕三余一”是当时边区的劳动模范提出的口号，意思是种三年庄稼，要存下够吃一年的余粮，即种三年，可以吃四年。提出“耕三余一，两年完成”实际上变成了“耕二余一”，要求过高了，脱离了当时边区农村的实际。——编者注

新任务，不少就有贪大、求全、急躁的缺点。这些新任务不是少数人匆促定的，不是少数人的缺点，而是经过十多天的酝酿讨论集体定的，是胜利声中产生的一股社会思潮，犯了急性病。（8）改进办法：领导人员“下乡挖根子”。就是说，加强调查研究。过去也谈调查研究，也派出过多次调查小组或调查人员，但主要领导人员很少参加，以致领导体会不深，调查收效不大。上述观点林伯渠在向第三届边区参议会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今后三年的建设任务》中，又作了详细的论述。林伯渠说：“为胜利地实现建设任务，政府人员应该经常努力加强作为人民勤务员的民主作风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伯渠还说：“我请求各级人民的代表经常密切地督促行政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督促和帮助我们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勤务员。”

## 五、司法工作

雷经天担任高等法院院长七年，一九四五年三月他要调到南方去，林伯渠约他谈话，我也参加了。林伯渠说，过去政府对法院关心不够，每年讨论司法工作最多一次，法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头，做好做坏凭自己；这两年抓得紧，有方向，帮助很大，但缺少经常检查。他还说自觉性差的人容易产生自流现象。我说，经常检查少，这是事实，我是秘书长，有责任。我对司法工作缺乏研究，经验也不足，因职务关系，有时也过问，时断时续，有正确的，有糊涂的。作为历史经验，我在这里也记上一笔，这只能代表边区司法工作的一斑，不能代表边区司法工作的全貌。但从一斑看全貌，在一些领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中，是可以看出边区司法工作的基本趋向的。

1. 任务。司法工作，是边区“三三制”政权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一是保护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

权、财权，这是大量的；二是打击一切汉奸、反革命和破坏分子，这类人为数不多。因之，对一般犯罪分子采取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的方针。他们除自由受到限制外，同样看书、读报、开会、劳动、学文化、练技能。因之，许多服刑期满的罪犯，以后都变成了有一定觉悟、有一技之长的公民。

2. 领导体制。由于当时处在战时和极端分散的农村环境，司法工作不是很正规的，也可以说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法官判案的根据是政策、法律、民情，事实上主要是政策和民情，法律很不完备。与此相适应，司法工作的领导体制存在两个特点：第一，由高等法院全面负责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三种职能。本来，高等法院仅行使审判职能，兼管司法行政。一九四四年，李鼎铭副主席多次提出建立检察制度，这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曾经设想由边区参议会常驻会代行检察职能，行不通。最后决定在高等法院内设检察处（专区分庭和县司法处设检察员），作为公诉机关。司法工作的三种职能就全部集中到了高等法院。第二，高等法院对边区参议会负责，日常工作则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实质就是置司法于行政领导之下。这同现在实行的制度是不同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西北局讨论司法工作，同意了这种司法体制。这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是适合边区的战时和农村环境的，但是也确实遇到了不少困难。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林伯渠、李鼎铭、习仲勋集会讨论召开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的准备工作时，我提出一些意见，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加强司法工作问题，我说：“今后应该适当强调并逐步实行法治。为此，立制施令，必须慎重，以期制立令行；又必须培养守法观念，辅以赏罚。因我们长期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非法斗争，许多人缺乏守法观念，因此缺乏守法习惯，对此必须有所转变。”同年四月，林伯渠在第三届边区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把“健全法律

与制度”作为今后的第二个重要任务提出来，加强了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3. “调解”问题。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第三届边区参议会上被选举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马锡五在其司法工作实践中，创造了一种审判方式，即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解纠纷，教育群众，受到群众普遍欢迎。以后群众就把这种方式称之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把马锡五本人称之为“马青天”。我赞成这种做法，也到高等法院亲自实验过，效果很好。因此提出一个“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审判方针，经过党中央和西北局同意，也经边区政府委员会讨论同意，推广施行。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一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事件调解条例》贯彻了这一精神，规定“凡民事一切纠纷均应力行调解，凡刑事除了下列各罪(列举了内乱、外患、汉奸、故意杀人、盗匪、破坏社会秩序、贪污渎职、妨碍选举等二十三种罪行)不许调解外，其他各罪均得调解。”林伯渠在一九四四年一月六日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一年政府工作总结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提倡并普及依双方自愿为原则的民间调解，以减少人民诉讼到极小限度。民事一般进行调解，刑事除汉奸反革命破坏罪行外，大部分也可适用调解。”有同志不同意这个方针，认为它不符合司法正规化的要求。但经过一九四四、一九四五两年的反复实践结果，民事纠纷调解十分成功。各个地区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司法会议上汇报，民间纠纷处理办法有三种：民间调解，区乡处理，法庭审判。多数是区乡处理。区乡处理是调解和审判兼而有之，也就是“调解为主，审判为辅”。因此，司法会议作出结论，今后民间纠纷(包括一般性刑事案件)应实行民主审判(调查研究，陪审，联系群众，保证被告有充分辩护的机会等)，改善区乡处理(不打骂，不强迫)，提倡民间调解。我认为，这是当时环境中边区司法工作的一个创



造。

4. 捕人问题。在抗战时期，由于抗战环境和工作上的缺点，除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外，其他机关、部队、学校等也有任意捕人行为，这是违反人权、侵犯司法机关职权的严重问题。我受边区政府委员会委托，曾于一九四六年二月草拟政府指令，责成各专员按级口头传达至所属政府（尤其区乡政府）、机关、学校，也咨请联防司令部政治部：第一，要求党政军民学各界切实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包括工人、农民，也包括地主、资本家等）的人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逮捕、审问或处罚任何人。而人民则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的权利。第二，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捕人，需有充分证据。民事不得捕人。第三，公安机关除违警事件得依违警条例自行处理外，其他人犯必须于被拘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司法机关审理。第四，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以外的人员逮捕现行犯时，须于捕获后立即移送司法机关或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第五，军民间的纠纷或诉讼，必须经由司法机关审理，部队可派员陪审，不得自行处理。这些规定下达执行后，情况有好转，滥捕问题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 六、小 结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三三制”政权建设，是我们党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权建设的一个创造，也是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个试点。“三三制”是联合政府的一种形式，实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形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对于一切愿

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建国以后党中央一再强调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道理就在这里。从这一点说，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统一战线政权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 (五)自力更生，建设边区

### 一、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著名报告，号召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行生产自给，同时号召“精兵简政”。我们正是实行这些政策，终于克服了当时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坚持了抗日战争和自卫战争到最后胜利。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是《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回顾了五年以来党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的情况和经验。我是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带着毛泽东“要发展生产”的嘱咐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的，十二月又直接聆听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受益很大。此后边区政府领导边区人民的生产和机关、学校、部队自给生产，就是按此方针进行的。因此，我现在回忆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就按毛泽东在上述报告中曾经提出的历史总结，对边区几年来的经济困难和生产情况作一回顾。

一、一九三九年困难露头，党中央号召“自己动手”、“自力

更生”。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党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以及各机关代表七百多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他说，“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

当时，抗战中的严重经济困难，在陕甘宁边区刚刚露头。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明显地看出，依靠国民政府的财政支援和国内外友好人士的资助越来越不行了。因为在财政供应上存在着严重的威胁，所以，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科学的预见。这个思想同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的领导权是一致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实施。

在这个动员会上，李富春代表总生产委员会作报告，就开展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生产计划及其实施办法，作了详细的说明，提出一九三九年生产运动的具体目标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如纺纱织布，整理和发展群众合作事业，并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要求全边区实现增产粮食百分之二十，主要措施是开荒六十万亩和改良耕作技术。规定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具体任务是：边区政府系统（包括保安部队）生产粮食一万五千石（每石三百斤），军事系统（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以及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二万五千石，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央所属学校）生产粮食一千石，并动员所有机关部队学校大量种菜，从七月份起自给一部分，适当减少菜金。

在这次生产动员大会以后，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迅速开展起来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等也都参加了生产劳动。

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发出关于生

产突击的通知，规定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五日，各机关、学校、部队每天下午一律停止学习和工作，发动全体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荒种地突击。这次生产突击，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五万四千多亩。许多单位还在延安市区以外建立了生产基地——农场。

在党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下，到八月底，全边区共开荒一百零五万五千八百三十四亩，其中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开荒二万七千二百二十八亩、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二万三千三百一十四亩、陕甘宁边区一级（包括延安市政府及所属学校）二万一千七百九十七亩、边区各县县级机关及县以下机关六万四千四百零九亩、边区各县群众九十一万九千零八十六亩。开荒总数超过原定六十万亩的百分之七十五。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

一九三九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秋后，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一万四千石，细粮九千五百七十二石（每石以三百五十斤计。尚有部分县未统计在内），改善了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其中，尤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最好。他们不仅实现了蔬菜自给、肉食自给，而且还有能力为战士每人增发一套单衣，又发了毛衣、毛袜、毛鞋等用品。

这一年的生产运动，促进了大家对生产运动的认识，改善了大家的生活，得到了“自己动手”的好处。

二、一九四〇年劳动力减少，农业生产缩小。一九四〇年的生产任务，是要求中央和边区一级的机关、学校自给两个月粮食；边区一级以下的机关自给三个月粮食；留守部队因为战斗任务紧张，自给一个半月粮食，保安部队则自给两个半月。除保证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以外，发展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各机关自己的生活。

这一年生产劳动的组织有所改善。一九三九年规定人人参加生产劳动，从党中央毛泽东、朱德起到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进行

生产。一九四〇年规定女同志和体弱的同志不参加重体力劳动；五十岁以上的老同志和十五岁以下的小同志免除生产劳动；工业部门、医院、休养所、保育院、小学教员不参加粮食生产，主要从事蔬菜生产；较远地区的生产，组织专业生产队伍进行。

劳动组织上的改变，使生产运动能持续地进行，并把生产技术水平提到更高的程度，这是很好的。但是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劳动力减少很多，许多开垦出来的荒地无法下种，一些单位就采取与群众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耕地给了老百姓。所以，一九四〇年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发展，而且缩小了，结果，全年只收获细粮三千石。除部队以外，机关学校的粮食自给比例没有达到。

粮食生产虽然进展不大，合作社、商业活动却有发展，喂猪养羊数也有增加。一些单位的生活改善很快，出现了某些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活动的偏向。

三、一九四二年是边区最困难的一年。机关、部队、学校的物质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个别单位因为粮食一时供应不上，一天只能喝两顿稀的。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这一年实征公粮二十万零一千六百七十石，比一九四〇年增加一倍以上，平均每人负担一斗四升（合四十二斤）。部分群众因此产生了不满情绪，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负担过重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致发生了所谓“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这一年的八月间，边区政府在小礼堂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减轻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那天正值雷阵雨天气，雷击礼堂，一根柱子折了，坐在柱旁的一个县政府干部不幸触电致死。有一个对负担不满的农民便

说，老天爷不开眼，雷打死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就是当时在延安盛传的“雷公打死毛泽东”的故事。有的主张清查那个农民，有的认为是气头上的话，不必追究。毛泽东知道以后，说：“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一九四〇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是拥护共产党的，但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这件事反映了毛泽东的高度的民主精神，也转变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和作风，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下决心去解决边区一百五十万群众的“救民私粮”问题。

四、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为了克服困难，采取一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从一九四一年起，党中央在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边区群众的生产运动，把重点转到群众生产上来，并且提出了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为此，陕甘宁边区党委曾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召开了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等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同志，以及群众一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林伯渠作了动员报告，阐明了边区经济自给的意义和实现边区经济自给的条件，提出了一九四一年边区经济自给的计划。会上，毛泽东、朱德等讲了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的任务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我们今天进行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朱德的讲话提出了建立革命家务的主张。他说：“我们的家今天要自己来当了。要把家当得好，我们就不能把这个责任单单放在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身上。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要大家都来注意自己家里的事情。”后来朱德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署名文章，题目就叫《建设革命家务》，发表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的延安《解放

日报》上。

在这次动员大会以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以促进生产，克服困难。这些措施，主要的有：

第一，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邓洁负责，后改为中央事务管理局）、军委系统后勤经济建设处（叶季壮负责）、边区财政经济处（曹力如负责），各分区县亦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对于生产运动的领导。

第二，进行思想教育，纠正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阐明了党对经济和技术工作的根本观点。那个决定说，“各种经济工作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在这个决定以前，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对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存在着不正确的看法，认为只有党务、军队和政府的工作才是革命工作，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不是革命工作。少数党员甚至不愿做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这个决定扭转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的这种错误看法。决定还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他们的责任是诚心诚意的学习和熟练于自己的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同时并使每个党员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决定还要求党的组织“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

第三，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吴满有是横山人，一九二

八年逃难到延安柳林区二乡，难以为生。一九三五年五月遇上革命，分得六十垧荒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连年开荒，改良农作，把六十垧荒地变成了熟地，获得好收成。由于他的辛勤劳动，成了劳动致富的富农。所以他说：“我是受过革命好处的人。”他带头交公粮，出负担。自己是抗属，不但不要优待，而且担任优抗主任，优待别的抗属。延安《解放日报》记者发现了她，报道了他的模范事迹。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的农民向他看齐。随即，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他们“广为宣传，号召每个农民，向吴满有学习，向吴满有看齐，抓紧雨后开荒播种的好机会，利用最近一个月的春耕时间，以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开荒突击、生产竞赛，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创造更多的吴满有！”后来，学习吴满有成了边区农民的一个运动，对于提高边区农民的觉悟，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吴满有本人，以后入了党，当了干部，一九四七年三月被胡宗南部俘虏后丧失了立场，那是另一回事。——编者注）

第四，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山西定襄县人，先后在太原、同蒲路做工二十多年，一九三八年九月由安吴青训班转道到延安，入抗大职工队学习，同年十二月入党，一九三九年七月入农具工厂当翻砂工人，不久调任翻砂股股长。他在平凡的工作中，犹如水滴石一般地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成为边区工人中的模范。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发表了《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的社论，号召边区工人向赵占魁学习。随后边区总工会发出通知，号召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通知要求通过这一运动达到提高工人政治觉悟，稳定生产情绪，激发劳动热忱，提高生产质量的目的。通知还指出，在这一运动中必然会



涌现出大批象赵占魁一样的模范工人，要求各厂应详细订出评判标准和奖励办法，发扬好的，批评坏的，以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赵占魁运动就是边区工人个个争当模范工人的运动。边区总工会根据赵占魁的工作作风提出的模范工人的标准，现在看来仍有现实意义。这些标准就是：一、爱护工厂，严守纪律；二、积极工作，始终如一；三、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四、爱惜工具，节省资料；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六、努力学习，帮助别人；七、克己奉公，团结群众。

赵占魁运动的总目的是推动生产，教育工人。后来成了改造工人劳动态度，推动生产发展的群众运动，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的工业生产。

第五，发展盐业。盐是边区的一个极大的富源。盐对于边区物价的稳定，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有重要的作用。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时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的严重困难时期，盐是用以交换外货、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边区政府对发展盐业，一直十分注意。一九四〇年秋季开始，采取了督运政策，发动群众制盐、运盐，外销换取边区所需要的货物。计划一九四一年产盐和运盐七十万驮（每驮一百五十斤），实际外销就有二十九万九千余驮，创造了边区历史上外销盐的最高纪录，对边区的财政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日、十五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就是反映当时发展盐业的一个具体记录。毛泽东当时十分重视，亲自为《鲁忠才长征记》作了序，说，“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

高克林同志的这篇调查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毛泽东的这个序表扬了高克林的调查研究作风，把它作为发展盐业的一个范例，以后又收入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

第六，实行优待移民、难民政策。边区政府实行接纳安置移民、难民的政策，为边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区在开展生产运动以来，增加了一百三十五万亩耕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多人少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难民，增加了劳动力。

就整个边区来说，除绥德分区的绥德、米脂，陇东分区的庆阳等少数地区人多地少外，多数地区都是人少地多，如延属分区的延安、鄜(富)县、甘泉，陇东分区的华池、合水等县，土地荒芜很多，需要开发，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

边区政府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就公布了关于优待移民、难民的决定，一九四一年连续两次发出布告，一九四二年又颁布了优待移民、难民的条例。在这些决定和条例中规定优待移民、难民的内容有：1、移民、难民开公荒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垦私荒则三年不交租；2、移民、难民三年不交公粮，并减轻其他负担，第一年完全免去义务劳动；3、政府尽力帮助移民、难民解决吃住困难，借贷或调剂耕牛、农具、种子等；4、移民有选举权，可以自己建立移民聚居处，自选乡长、行政村主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边区以外的难民纷纷到边区来安家；边区内绥德、米脂等地的群众也不断南下到延属地区来安置。据统计：一九四一年边区安置移民、难民七千八百五十五户(移民占绝大部分)，共二万零七百四十人；一九四二

年安置五千零五十六户(绝大部分为移民),共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人。这些移民、难民是大生产运动中一支劳动大军,在边区的开荒运动中作用很大。在移民、难民中劳动力占三分之一。如果以每人开荒二十亩计,上万个劳动力可开荒二十多万亩。

由于边区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帮助和边区生产运动的发展,所以来边区的移民、难民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生活得到改善。一般在一年以后就解决了吃粮问题,两、三年以后就可以自己种庄稼独立经营了。

第七,军队实行屯田政策。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一九四一年春,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并且决定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实行屯田。一是为了防止胡宗南的进攻,南泥湾是保卫延安的南大门,军事上的地位重要,在那里屯田对战备有利;二是因为南泥湾土地肥沃,还有较为充足的水源,适宜于农作,是实行屯田的理想地方。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开到南泥湾后,就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运动,口号是“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三五九旅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第一年开荒一万一千多亩,第二年又开荒二万六千多亩,第三年种地十万亩。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做到完全自给,而且交公粮一万石。在一九四二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王震受到了大会的表扬。毛泽东在发给王震的奖状上题词:“有创造性”。

三五九旅在生产上除屯田外,还发展多种经营,如创办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产品自用有余,还在市场上出售;搞运输,陕北交通不便,三五九旅建立了一支拥有六百头驮骡的运输

队，运盐运货，在绥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设立了十多个骡马店；以及开设商店等。

在南泥湾政策(即屯田政策)的影响下，边区的部队基本上采取了屯田政策，先后出现了槐树庄、金盆湾、大风川、小凤川、二家川、豹子川、清泉镇、郭家湾、关门子、田家湾、柳林、葫芦河等地的屯垦区。三八五旅在合水、东华池开荒，也很有成绩。

第八，提倡和推广植棉。棉花和棉布是边区自给自足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边区生产棉花很少，棉布都是从边区以外输入的。边区一百五十万人口，按每人每年需要二斤棉花(包括织布)计，就需要三百万斤。一九三九年起各方面都感到了棉花的需要，边区政府开始提倡植棉，但只种三千七百六十七亩。一九四〇年增至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七亩，产量低，收获量不大。经政府大力提倡，推广植棉技术，解决棉籽等的具体困难，以及奖励政策(例如植棉三年不交公粮，奖励植棉劳动英雄等)，一九四一年植棉有了较大的发展，棉田达三万九千零八十七亩。一九四二年又发展到九万四千四百零五亩，棉花的收获量达到边区需要量的一半。

第九，实行减租减息，发动了未土改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边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况：一是已经分配了土地的地区，如延属分区的大部分，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土地九百余万亩。二是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如绥德、三边、陇东、关中分区的大部分，延属分区的小部分，共计地主土地五十余万亩。这两种地区的阶级状况也完全不同。减租减息只在未经分配土地的地区进行。

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主要是宣传时期，一般的都未实行。原因有两方面：从客观上讲，这些地区如延安、甘泉、鄜县、庆阳、合

水、绥德、米脂等，还存在着双重政权，有国民党的县政府，也有我们的“县政府”（公开名义是抗敌后援会或农会），是所谓“统战区”。当时国民党绥德警备区的何绍南就公开反对减租，所以不利于我们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从主观上讲，部分同志的右倾思想，怕因减租得罪了地主，妨碍统一战线，不敢实行减租减息。第二阶段是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因为国民党委派的县政府经常制造磨擦，派遣特务，刺探军情，破坏边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九四〇年我们赶跑了顽固派，结束了边区部分地区的双重政权局面，边区在行政上得到了完全的统一。减租运动客观上的困难消除了。但是，在根据“三三制”政策精神进行边区参议会选举的情况下，有些人又忘记了减租减息这一中心工作。虽然部分地区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但是没有发动群众，而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或者用恩赐的办法，同时，地主则采取各种手段和办法进行抵抗，结果成效不大。第三阶段是一九四三年以后。减租减息真正开始，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和一九四三年春。

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减租减息政策。十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指示说，“减租必须普遍地达到各地减租法令的规定的程度，必须用政府权力，特别是群众坚决的态度打破地主对抗减租所实行的一切投机取巧的办法，在政府统一的租佃条例未颁行前，各地可临时制定保护农民佃权及禁止地主一切投机取巧的行为的办法，严申政府减租法令，并使这些法令成为农民进行减租斗争的合法武器。”中央西北局并为此特制定了一个《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作为附件下发，参照实行。西北局的指示还强调：“要保证减租的彻底实行，不能单凭政府减租法令的公布，还必须采取发动群众的方针”，并且“由群众组织的力量来保证之”。这时，减租采取了群众斗争的方式，有

的组织了农会，有的组织了减租会，来领导群众进行减租斗争。在群众斗争的同时，在地主中还推动开明分子出面倡导减租，以维护政府法令，推动减租的进行。在这方面，李鼎铭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这一阶段中，党要求农民在地主按照法令减租之后，也按照法定额（即实行二五减租）交租。

在减租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保障佃权。在减租斗争中，一部分不明大义的地主，借故以撤佃来威胁农民减租，同时，一部分佃农也担心地主撤佃。他们说，“今年减租，明年没地种。”“减租倒好，没地种事大。”有的干脆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叫咱种地了。”为此，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以确保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在这个土地租佃条例公布后，李鼎铭发表了很好的谈话。他说：“我以为这个条例的颁布，对于政府解决土地问题及贯彻减租交租政策，将有很大作用，希望全边区的先进士绅与开明地主能够竭诚拥护这个条例，尊重政府法令，认真实行减租并尊重农民佃权；各地广大农民亦应于减租之后依法交租并尊重地主地权，造成边区内各阶层的亲密团结，以发展生产，准备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因为减租减息政策的顺利进行，极大地调动了未土改地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 二、建设边区，丰衣足食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和公私关系上的“公私兼顾”的原则，阐明了今后在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中的基本政策，规定了生产和教育为今后两大中心任务。他说：“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和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者所谓第

一位的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毛泽东的这一指导思想，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中把它完整地反映了出来，规定了“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在西北局高干会和毛泽东的伟大号召下蓬勃开展起来了。

1. 进行生产总动员，号召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共中央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直属各机关学校生产负责同志的会上，李富春代表中央作了题为《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达到“丰衣足食”的号召，说，“毛主席号召全边区在今年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这次会议讨论了一九四三年生产的方针问题。会议认为，在全边区要实现“丰衣足食”，对机关学校来说当然更要做到“丰衣足食”。会议要求各机关把生产作为中心任务之一，立即组织临时生产委员会，总结一九四二年生产工作的经验，并根据各该机关人数及劳动力的比例，制订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及生产的各种措施。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机关学校开始制订“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随后，边区系统各单位也开始总结一九四二年的生产经验，制订一九四三年“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

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和边区系统制订生产计划的基础上，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了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贺龙、林伯渠、徐向前等和劳动英雄，以及各机关单位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李富春作动员报告，阐明了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方

针，规定了一九四三年机关生产的总任务。一九四三年中央、军委、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和边区等系统（不包括部队）生产的总任务为：一亿六千二百四十二万一千元（边币），其中计划种地三万零二百亩，预计收获粮食三千八百七十四石，蔬菜九百万零二千斤；喂猪三千七百四十三头，养羊三千六百五十四头，鸡鸭八千五百只；办煤矿、纺织厂、木工厂、铁工厂、纸厂、豆腐坊、粉坊、马掌铺、酱园、榨油坊、酒坊等九十五个。计划要求机关生产的自给程度比去年增加一倍。李富春在报告中还谈到了一九四三年机关生产与以往不同的六个特点：第一，生产的计划性加强了。各单位都制订了详细的生产计划，并经逐级慎重审查批准。第二，一九四三年的生产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性的基础上，实行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的结合。第三，掌握了以农业为主的方针，靠自己的劳动，建立生产的基础和积累财富，逐步建立起集体的家务。第四，有了以往的生产经验，开始掌握了生产的规律，改进了生产技术。第五，不只是一般地补助经费上的不足，而是更积极的为“丰衣足食”而斗争。第六，思想上对生产有了新的认识，自觉性提高了，大家起来动手，一定能够实现“丰衣足食”。

朱德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贪污、腐化、浪费是生产运动的敌人。在生产中不许有一个败家子、二流子。”他继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提出建立革命家务以来，第二次提出建立革命家务。他说，“我们一方面艰苦的劳动，一方面改善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革命的家务是一定可以发展起来的。”林伯渠在讲话中针对一度曾把商业作为机关自给运动主要方向的偏向，着重指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会上，还奖励了六十六位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

这次生产总动员标志着边区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的生产运动的新阶段。



配合生产运动的新阶段，文艺、报纸等宣传工作搞得很生动活泼，十分出色。《生产大合唱》、《南泥湾》等歌曲，《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二流子变英雄》等戏剧，在延安和全边区巡回演出，激励着千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鼓舞和教育的作用。

2. 开展生产大竞赛。生产大竞赛是一九四三年全边区为实现“丰衣足食”而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事物，是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动起来的。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说：“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且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第一，今年开荒五垧，要把草、树连根拔掉，并且要掏一尺多深。第二，粪要沤得好，翻两三次，每垧地上粪十袋。第三，锄草四次，培土要好到苗秆不倒。第四，牲口保证不生病，菜要种得好，粮食要比去年每垧多收一斗。第五，和民众关系一定要好，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第六，我是受移民优待的，三年不交公粮，但我能够做的公益事，要热心参加。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八路军的退伍军人，你是边区农民的劳动英雄，我很赞成你的光荣，所以咱们就竞赛吧，挑战吧！”

吴满有在收到杨朝臣的挑战书以后，积极赞同，于二月二十八日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吴满有在信中除完全同意杨朝臣提出的六个竞赛条件，并给以补充以外，特别提出开展庄与庄之间的劳动竞赛，建设“劳动英雄庄”。吴满有在复信中说：“我想，只是在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运动，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现在我庄已成立生产互助小组，我已被选做组长，我们已经商量好，一定要使全庄子里的男

女老少，都把他们的力量用在生产上，并且用互相帮助、互相调剂的方法，组织变工，给贫苦村民调剂口粮、籽种和农具，发挥大家的生产力量，也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所以，我也向你提出两条：第一，就是不仅你和我两人要竞赛，而且要首先把你我两个庄子的生产搞好，我提议根据两庄的劳动力和牛根来竞赛，看谁个庄子打的粮食多？争取‘劳动英雄庄’的光荣名号。第二，边区的劳动英雄不止你和我两个人，各县都有，还有我们的军队这两年的生产成绩特别大，他们一定有更多的劳动英雄。所以，我主张把这个生产竞赛运动，扩大到全边区的军队、群众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赞成的。”

朱德在得到杨朝臣、吴满有开展生产竞赛的消息以后，非常重视。他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号召。朱德在电令中特别强调，要认真发现部队中的劳动英雄，以作竞赛运动中的骨干力量，并由此而广泛地展开群众性的劳动竞赛。电文说，“八路健儿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来自工厂，来自农村，对于生产和劳动，都是最积极的，象吴满有这样的劳动英雄一定很多。”电令还强调生产竞赛，增加粮食的重大意义，说，“这个道理很明显，多产一粒粮食，就是多增加一份抗日的力量。”贺龙也连夜打电话给南泥湾驻军，令他们迅速接受吴满有的友谊挑战。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向各地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去切实推广和领导这一生产大竞赛。通知说，“这是从党员发动的群众中的创作，各地党应特别注意这一运动，把它推广起来，切实的去组织和领导，提高和巩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仿照延安刘秉温变工队办法组织劳动互助，发扬群众生产的组织性。生产竞赛，劳动互助，是推动春耕、增产粮食、组织群众、教育

群众最重要的事情。”

接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发出指示。指示要求各分区县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

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的各个角落。

这个生产竞赛开展是健康的，推动了边区群众劳动互助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运动的发展。正是这个生产大竞赛促使边区劳动英雄大批地出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

3. 一九四三年边区的两大盛会。为了检阅一九四三年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表彰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边区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安同时举行了两大盛会：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这两大盛会是在西北局直接领导之下，由党、政、军三结合组织实行具体领导：贾拓夫代表西北局，高自立和我代表边区政府，邓发代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这次生产展览会是空前的，规模是很大的。大会展览品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总展：陈列边区各种生产事业总的情景，其中有各种极为详尽的统计图表，最能说明问题也最有教育意义。一为分展：其中有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机关、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和边区系统的机关生产展览部，有绥德、延属、关中、陇东、三边分区等的展览部。展览会有近百个展室，长约半里地，共有展品六千五百九十六件，图表和照片一千九百八十七张。整个展览会是边区“丰衣足食”的缩影。它表明，经过边区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一九四三年大生产运动的飞跃发展，边区人民初步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丰衣足食”的号召。

展览会告诉我们：第一，由于全边区一九四三年开荒九十七

万六千二百二十四亩，使边区的耕地面积达到一千三百三十八万余亩，粮食总产量达到一百八十四万余石，比一九四二年增产十六万石（细粮），其中因开荒增产的粮食十四万五千石，因改良耕作技术而增产一万五千石。全边区年消耗粮食约为一百六十二万石，出现了有二十二万石余粮的局面。这就是说，边区广大群众基本上做到了“足食”，而部分群众开始有了余粮。

第二，由于一九四三年植棉十五万零二百八十七亩（比一九四〇年的一万五千一百七十七亩，扩大近十倍），收棉花一百七十三万斤，达到边区棉花需要量的一半以上。一九四三年一至九月已产布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大匹（比一九四〇年产布三千零八大匹，增长近五倍），棉布的自给率已达百分之七十三。

第三，一九四三年一至九月产盐四十七万驮（每驮一百五十斤），估计年产盐可达六十万驮，比一九四二年的二十七万驮增产一倍以上。盐是边区用来进行外贸的主要物资，对边区说，盐就是粮和布。

第四，六畜兴旺，也是“丰衣足食”的一个侧面。据统计，牛由一九四〇年的十九万三千二百八十三头增加到一九四三年的二十二万零七百八十一头；驴由一九四〇年的十二万五千零五十四头增加到十六万七千六百九十一头；羊由一九四〇年的一百七十二万五千零三十七头增加到二百零三万三千二百七十一头。

第五，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合作社事业也迅速提高，一九四三年边区有合作社二百五十五处，股金约一亿五千万元。

第六，展览会还充分体现了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群众性，生产领导上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劳动组织上的由分散到互助合作的方向，以及公私兼顾、军民合作的特点。展览会表明，一九四三年是边区生产大发展的一年。为数年后进行的自卫战争，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它以充分的事实说明，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

济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一经济的辉煌成就，是边区千百万劳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这里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召开劳动英雄大会，就是为了表彰他们对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巨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有著名的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张振财、贺保元、杨步浩、郝树才，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劳动英雄李位，机关劳动英雄黄立德，合作社劳动英雄刘建章，劳动英雄、模范党员申长林，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张芝兰等一百八十五名劳动英雄出席。

这样的劳动英雄大会在边区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旧社会被认为是“下等人”的劳动人民，现在成了新社会的“状元”，受人尊敬。大会会场的布置说明了这一点，有十几位劳动英雄的肖像，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的肖像挂在主席台上。

两大盛会揭幕时，有近三万人参加。延安附近三十里内外来的群众也在千人以上。朱德、贺龙、高岗、林伯渠、李鼎铭以及晋绥行署主任续范亭等参加了大会。会上，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作了报告，详述了一九四三年边区“丰衣足食”的情况。他说，在边区“这样一个战争环境又是比较穷困的地区，人民和军队今年居然能做到丰衣足食，这是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力量的表现”。

会上，朱德、贺龙、续范亭等讲了话。续范亭说：“我五十岁了，第一次才看见这样的事情。”接着他对劳动英雄表示衷心的祝贺，并且以幽默的语言，严正驳斥了把共产党人描绘成“三头六臂”的怪物。他说：“是的，共产党人是有三头六臂的。三头就是‘枪’头、‘锄’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

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能学习，能抓汉奸特务分子。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他的这种说法，是当时我们在延安一面打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一个生动的写照。

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两大盛会的开幕式，但他非常关心这两大盛会。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他把全体劳动英雄请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接见并宴请了劳动英雄，作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参观了生产展览会，又专门找了吴满有、申长林、刘生海、孙万福、冯云鹏、高仲和、张振财、石明德、李位、刘玉厚等十七位劳动英雄座谈了生产经验。毛泽东与冯云鹏、安兆甲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李长清、梁显荣、刘玉厚谈变工札工的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社问题，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等，一直从下午谈到深夜才结束。

大会期间，劳动英雄们互相交流了经验；热烈地讨论了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制订了“组织起来”搞互助合作的计划；提出了一九四四年进一步“丰衣足食”的生产任务和具体计划。

大会给予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以优厚的奖励，有二十五名劳动英雄获特等奖，各得奖金三万元；三十四名劳动英雄获甲等奖，各得奖金两万元；八名获乙等奖，各得奖金一万元。所有参加大会的劳动英雄由边区政府发给奖状及由毛泽东、朱德、高岗、贺龙、林伯渠、李鼎铭等的亲笔提词。在大会上，还奖励了五个模范村：淳耀的白塬村（劳动英雄石明德所在村）、延安的吴家枣园（劳动英雄吴满有所在村）、绥德的郝家桥（劳动英雄刘玉厚所在村）、华池的城壕村（劳动英雄张振财所在村）、定边的贺家园（劳动英雄贺保元所在村），各奖耕牛一头。

大会最后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

言》，总结了大会的盛况，要求全边区农民、工人、战士、机关干部、学校学生进一步发展生产，以便充实物质力量，准备消灭日寇和对付反动派的袭击，取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宣言最后要求实行毛泽东“组织起来”的号召，做到：

第一，普遍发展变工、札工。向淳耀的白塬村、延安的吴家枣园和安塞的马家沟学习。

第二，实行移民政策，增加新的劳动力。全边区要向赤水的冯云鹏、延安的马丕恩学习。

第三，一九四四年要把边区的全部二流子改造好，一面由政府督促，一面由群众劝说。全边区的二流子都要向吴旗的刘生海学习。他过去是个二流子，没吃没穿，婆姨也离开了他。自从一九四一年转变以后，努力生产，到现在有九个牲口，打粮二十多石，成了边区的劳动英雄出席了这次大会。

第四，发动能劳动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全边区的劳动妇女都要向米脂的郭凤英学习。她和男人一样，既能种庄稼，又会纺纱。

第五，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全边区的老百姓都要向延安的吴满有学习。他一九四三年一家开荒三十二垧（每垧三亩），多打四十石粮。

第六，多种棉花，发动妇女纺织。多种棉花要向吴堡的刘秉仁学习。他种的一亩棉花产净花四十四斤，并推动全村每户种一亩棉花。纺纱要向刘（桂英）老太婆学习。她除了自己纺纱，还组织了一百八十个妇女纺纱。

第七，办好合作社。全边区的合作社都要向延安的刘建章学习。他办的南区合作社，发展成为消费、生产、运输、信用的综合合作社，给老百姓谋了几千万元钱的利益。

第八，组织运输队，多运盐出口。全边区的运输队都要向延

安的刘永祥学习。他在南区合作社的帮助下，利用公盐代金，组织了七百多头牲口的公私合作的运输，运盐一万八千驮。不但方便了群众运盐，而且凡出公盐代金的还可以有许多红利。

第九，一面努力发展生产，一面还要节约粮食，储存粮食，多种洋芋。

第十，号召部队、机关、学校，加紧生产。部队要向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学习，从半自给做到全自给。工厂要向赵占魁、袁生华、李凤莲学习。机关学校要向黄立德、佟玉新学习。

4. 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初边区的两大盛会。一九四三年底召开的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充分显示了劳动英雄运动在大生产运动中的重大作用。为了进一步推动生产运动，边区政府在一九四四年把劳动英雄运动推广到一切部门，边区的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人人都可以争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一九四四年劳模运动的特点，第一，运动全面开展。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运动，从农村、工厂、机关、部队的生产运动推广到了文化、政治、军事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第二，英雄大量产生。七十二行，行行有英雄、有模范。第三，由个人到集体。劳动英雄带动了一个村、一个单位，出现模范村，模范班、排、连，以及机关团体中的模范单位。第四，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选举产生的，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受到更多的群众的尊敬和拥护，在群众中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更大。第五，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标准更高了。第六，领导更加自觉了。经过几年劳模运动的实践，领导干部领导劳模运动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自觉性。

为了总结劳模运动和边区生产运动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召开了“劳



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当时，大家都叫它“群英会”。有四百七十六位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出席了大会。

在群英会开幕那天，延安十分热闹。开幕式在参议会大礼堂举行。会场上，张灯结彩，劳动英雄披红戴花。林伯渠致开幕词，他首先指出一年来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运动的新发展，以及他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林伯渠强调劳动英雄要时时抑制自满，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力求进步，以期完成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朱德出席了开幕式，讲了话。他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举世的称道。对于这一奇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群英会的重点是交流经验。会议以农业、工业、运输合作、纺织、部队、机关学校、财政、金融贸易、司法、保安、文教及其他等十一个组，分别进行经验交流和典型介绍。在分组交流经验的基础上，选举和评比产生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等第，共评选了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七十四名，甲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二百名，乙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一百八十九名，以及模范村、模范连队和模范单位团体十四个，并给予奖励。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向全体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作了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称赞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起了三种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这三大作用是在群英会中反映出来的，我们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他称许这些提法很好），鼓励他们戒骄戒躁，争取更大的进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在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任务，强调“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

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大会最后由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作总结：《更加推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运动》。说明边区劳模运动的历史和现状，劳模运动的作用，以及今后的方针等问题。

大会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闭幕。在闭幕式上，李鼎铭致闭幕词。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吴玉章等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强调了边区劳模运动对全国，尤其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彭德怀说：“你们和全体人民把陕甘宁边区贫穷的山谷建设成富庶的边区，创造了许多模范的事迹。八路军和新四军有这样边区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所以能够在敌后坚持抗战，愈战愈强，在华北开辟了三十倍于边区的人口及在全国开辟了六十倍于边区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由于边区的带头作用，我们在敌后开展了生产和战斗结合的劳模运动，军民吃饱穿暖，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战斗力。”聂荣臻也说，陕甘宁边区不仅是抗日的出发点，并且是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出发点。

在群英会召开的同时，“陕甘宁边区建设展览会”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开幕。这次展览会与以前的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不同，增加了边区军事、政治建设的内容。展览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军事，包括练兵习武、民兵训练、军队文教工作、医药卫生、官兵关系、拥政爱民、军事工业、生产、供给和战利品等，在八路军大礼堂展出。第二部分：经济建设，包括农业、公营工业、民间纺织和工业、运输业、合作事业、机关生产、财政、贸易、金融等。第三部分：民主建设，包括民政、吴满有模范乡、保安工作、司法工作等。第四部分：文化教育，包括医药卫生、反对巫神运动、民办小学、国民教育、文艺、报纸

等。展览会反映了一年來边区财政经济、民政司法、文化教育、保安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闭幕，参观展览会群众达三万余人次。

5. 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经过全边区群众的努力和机关部队学校大生产运动的继续开展，边区一九四四年的自给自足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丰衣足食”的程度又有提高。总计全边区增产细粮二十余万石，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细粮十万石。因此，除了边区群众和机关部队学校的消费，尚可节余二十八万石，连同以前几年的结余，边区积存的余粮在七十万石以上（实际不止此数）。这一年边区植棉三十万亩，收棉花三百万斤，可以织布一百五十万匹（三八布），自给率达到三分之二。工业方面，生产的日用品如毛巾、肥皂、火柴、纸张、陶瓷、纸烟等已经自给或者大部分自给。延长石油生产也有恢复和长进。军事工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生产步枪、子弹以外，又陆续生产出掷弹筒、炮弹等武器。对于边区的工业发展，边区劳动英雄、模范工程师沈鸿起了极大的作用。沈鸿是学徒出身，经过自己的刻苦钻研，终于成了一个工业家。一九三八年自带十台机床到延安参加革命。他到延安以前，边区除延长的煤油厂有少数几台机器以外，其他地区没有现代化的机器。他到延安以后，又亲自设计、制造了许多设备，配备了边区的许多工厂，帮助了边区工业的发展。延安中央印刷厂的油墨机、造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以及边区其他工厂的许多机器，主要都是经过他的设计，直接或间接地从他带来的十台机床上生产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他还帮助了八路军后方修械所，并亲自设计、制造了掷弹筒、炮弹等前方急需的武器、装备。

具体说，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机关部队学校的供给标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

议的报告中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他说：“坚持从经济到财政的发展路线之结果，人民的收入大大增加了，部队和机关学校也逐渐建立了家务，但政府取之于民的部分，却相对地减少了，以至绝对地减少了。例如公粮，去年十八万石，今年减至十六万石，其他税收也有减轻。因此，军民生活一年一年地更加改善了。

“农民方面，以清涧辛家沟村为例，全村共二十六户，一九四一年收获量为二百零九石六斗二升；消费量为一百四十二石四斗二升；负担为二十四石七斗，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十一·七六；收支相抵，盈余四十二石五斗。一九四三年收获量为二百八十五石六斗九升；消费量为一百八十四石三斗，较一九四一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二，生活上升；负担为十九石九斗八升，占收获量的百分之六·九九，负担下降；收支相抵，盈余八十一石八斗一升。

“工人方面，城市手工业工人实际工资比战前提高百分之一百四十九·八至四百；国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则提高百分之五十八·七至八十四，但国营企业工人的医药、文化和娱乐等费，劳动保险和社会保险统由公家负责。

“部队方面，战士的衣食两项供给标准，如以一九三九年为一百，则一九四三年已提高至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五。一九四四年当续有提高。

“一般公务人员和学生方面，以今年（一九四四年）为例，单就衣食两项实物供给标准，平均为小米六石以上，其他如办公、文娱、书报、医药等费，概由公家供给，病员、产妇、婴孩等更有特殊待遇。公务人员家庭有土地而无劳动力者，为之代耕；全无产业者，帮助其家属从事生产或给以适当工作，其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亦由公家供给。

“值得指出的，去年以来，工厂人员合作社，部队人员合作

社，机关和学校人员合作社，普遍成立，便利个人储蓄，并为个人建立了家务，已有相当成绩。

“可以说，边区军民生活已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

一九四五年边区受了特大旱灾，农业歉收，粮食作物减产。为了照顾部分地区的歉收，一九四五年的公粮又从一九四四年的十六万石减到十二万石。因此，人民的生活仍然有所改善。

这时，边区农村的情景已经大变样了。不仅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且农村的阶级状况也有了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前雇农和贫农是农村的主要群众，这时变成了以中农和富裕中农为主要群众；从前乞丐到处可见，这时已经绝迹。这种情况反映了边区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更新的阶段——全面建设边区。

## 6. 小结。

以上事实说明，在边区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抓“两点论”抓得好。第一，抓“两个环子”。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他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我们党抓住了整风运动，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踏步地稳步地前进了。同样，我们党抓住了生产运动，达到了“丰衣足食”，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可见，同时抓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精神和物质两个领域，这在历史上是极端重要的，在现在也是极端重要的。第二，抓统一战线。在政治上要抓统一战线，在经济工作上也要抓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在政治上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是有成绩的，在经济工作上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也是有成绩的。劳动英雄中间，就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如工业方面的沈鸿，他现在已

经是革命干部了，但他在未来边区以前曾经是一个拥有生产工具的工业家；农业方面的吴满有，是劳动致富的富农；延安市商会会长王克温就是一个商业资本家，在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以后，我们的对外贸易，有许多是通过他办的。又如，我们在发展公营商业的同时，私营商业的发展也很快，延安市一九三六年仅有各种私营商店一百二十三家，到一九四三年即达四百七十三家。第三，抓两股力量。一是抓民也抓军，军民齐奋战。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打破了当兵“吃粮”，“脱产”革命的旧习惯，使机关、部队、学校的“脱产”人员一律变成不脱产人员，又工作（打仗），又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组成劳动大军。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有助于改善军民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加强纪律性，对人民群众的生产也起了促进作用。二是抓兵也抓“官”，官兵一致。司令员和战斗员，领导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同样不仅有利于生产，而且有助于改善官兵和上下级关系。三是抓公也抓私，公私兼顾。参加机关生产，这是为公；进行个人副业生产，这是为私。个人副业生产发展了，个人自给比例增大了，需要公家供给的比例就缩小了。这是符合当时实际需要的。

## （六）文 化 教 育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一九四二年九月毛泽东当面嘱咐要求边区政府抓紧进行的四项任务之一。边区政府一九四三年确定：“目前政府工作必须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的任务，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教育”，把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边区政府的教育工作由教育厅主管，我因在来边区政府工作之前曾经作过几年教育工作（主要是干部教育），并且教育厅厅长柳湜当时是以救国会代表的身份参加边区工作的，副厅长贺连城也是

党外人士，边区政府党组便要我多帮助他们工作。我主要是协助他们做了一些政策研究工作和某些会议的组织协调工作，因此对教育工作接触较多，感受也较深，现将我对边区文化教育发展概况和各项方针实施情况简要记述如下。

## 一、历史发展概况

要了解陕甘宁边区政府执行文化教育政策的情况，首先必须了解陕甘宁边区在旧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状况。陕甘宁边区在旧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分散的落后的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都很不发达，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交通不便，农民终日劳动难得温饱。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二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一九三九年九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在扫除文盲、破除迷信、改变不卫生情况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很有成绩。但从数字增长和社会效果对比看，还是很不够的。小学数量有增加，但失学儿童仍在四分之三以上。文盲数量有减少，但仍高达百分之九十三至九十五。人畜死亡率也很高。客观原因是经济发展不足，群众的物质生活问题未解决，文化生活问题也很难解决。但主观上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表现在：

第一，政治上有某种程度的右倾，这是抗战初期统一战线工作中右倾错误的一种表现。在教育内容上强调抗日，这是对的，但忽视了民主；强调团结，这也是对的，但忽视了必要的斗争。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教育厅口试鲁迅师范的毕业生：“顽固分子来了怎么办？”问了几个，都答“退让”。又问“他们再进攻怎么办？”答：“还是退让。”问到第三次，他们无法回答了。只有一个长征过来的毕业生挥拳高呼：“打！”这件事曾引起边区党组织的注意，并在一九三九年边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指出过。但在以后的教育领导工作中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如绥德分区的教育在一九四〇年新政权建立后，政府与一些开明教育家作了许多工作，但直到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对何绍南反动统治时期的旧教育，仍然未能有计划地进行改造，许多地区的小学教育仍被顽固分子把持，他们仍以各种敌视人民、敌视边区、敌视共产党的反动思想继续毒化青年。

第二，学校教育搞旧型正规化，对边区落后的经济、文化状况和地广人稀的特点注意不够，未能及时解决教育和实际结合、适应分散的农村、为边区服务的问题。当时干部教育（培养边区的知识分子）是提高边区一切工作包括教育工作的决定因素，长期未被重视。国民教育也不顾边区具体情况，先是不切实际地普遍推行普及教育、义务教育，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所谓“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口号。边区人民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生活还很困难，首要任务是恢复民力，发展生产，推广义务教育则为时过早。但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反而把要求又提高了一步，提出要逐步普及义务教育，学龄儿童（八岁到十四岁）都要按规定入学，否则予以处罚。这是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规定，当然行不通。后来在边区召开的教育科长会议上，又决定重质不重量，精简和合并学校，每县



宁可取消十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每个学校不满二、三十人不能开办；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小学由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三百四十一所减至一九四二年的七百二十三所，减少百分之五十四，学生也减少了一万余人，将近减少三分之一。这是忽视了边区生产落后、村庄分散、交通不便、劳动力缺乏等特点，抄袭旧的一套教育体制所造成的恶果。

此外，社会教育、文艺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社会教育流于形式，文艺工作侈谈提高，忽视普及，以外边进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忽视人民群众需要。民间文艺仍是封建的旧的东西占统治地位。特别严重的是，对大批人畜死亡现象，迄未给予应有的重视。

上述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到边区政府后，全党正在开展整风运动，西北局又召开了高干会，为我们纠正教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指明了方向。我们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仔细分析了边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型正规化问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缺点错误，进行了教育改革，整掉了旧型正规化，实质就是整掉了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步做到了与群众需要相结合，与边区实际相结合，真正为边区人民大众服务，边区教育出现了向着新的方向改革的大好局面，这是整风的重大成果。一九四四年十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总结了边区教育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一九四三年整风以来教育改革的新鲜经验，提出了今后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明确了文化教育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收获是很大的。尤其是毛泽东在会上的讲演，对边区文教工作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以上是历史发展概况。下面想就边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文艺工作等方面分别作些具体说明，也对边区文教大会作一专门介绍。

## 二、小 学 教 育

边区政府成立后，即注意了教育建设，历年均有发展。一九三七年春全边区仅有小学校三百二十所，学生五千六百人（不包括绥德警备区）。一九四〇年春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一所，学生四万一千多人，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增长了三倍多和六倍多。整风运动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促进了教育事业朝着按照群众需要的方向改革。一九四四年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一种新事物，即民办学校，发展到五百余处，这是教育改革的良好开端。民办学校形式多样，各有特色，创造了很多的好经验。主要有：

延安市杨家湾小学。这种类型的小学，特点是民办公助，是在农民积极分子倡议下，由政府领导和帮助办起来的。陶端予是这所小学的教师，是当时杨家岭中央机关到北郊乡做居民工作，应农民之请派下去的。教师到了村里，便帮助群众修理纺车，与群众建立感情；学校办起来后，经常进行家访，家长、教师、学生连成一片，群众的意见成了教师工作的依据，群众的反映就是教师检查自己工作的尺度；在与群众密切联系中，吸取了人民丰富的语言和生活的滋润，编成教材，进行教学。学校设有语文、算术、卫生、常识、习字等课程，教语文，学写便条；教算术，学心算、珠算和记账；教生产知识，同时培养劳动观念，紧密结合家庭和生产实际。教学中，不光学文化，还要养成儿童民主与遵守纪律的习惯；提倡讲礼貌、团结友爱，讲究卫生，尊重父母、家庭和睦的道德风尚；教育儿童懂道理，服从道理而不是服从个人。学校还开展成人教育，推动全村卫生运动，使杨家湾成

为全边区最好的模范村。

米脂高家沟民众学校。这种类型学校的特点，是农民自动起来办学校。高家沟的农民说：“咱们这辈子不识字，是睁眼瞎子，可不能再让子孙受害了。”于是便立下这个学校，推举全村唯一识字较多的高怀山当教员，自办，自管，自教。经过群众讨论，课目有识字、算术、读报、写仿(习字)、唱歌或游戏等，按新编课本教，教员也自编一些辅助教材，注重应用文和珠算的教学。农忙放假，平时鼓励学生参加家庭劳动，做到学习、生产两不误。学制分全日班、半日班，还有拦羊娃的早班，无固定年限，能写会算就毕业。学校同时也是本村文化建设的中心，成立了变工队员读报识字组，妇女纺织识字组，并与村、乡政府配合，开展卫生运动和文化活动。

米脂杨家沟学校。这是一种穷人翻了身，迫切要求文化的“一揽子”形式的村学，特点是以成人教育为主，和生产密切结合。教育对象主要是成年男女，也包括儿童。教学内容按群众和生产需要规定，全体学生都不脱离生产，教学时间也根据生产时间不同，分为早、中、晚三班进行。

巡回学校。在教育改革中，志丹县七区一乡，从改造旧轮学(即轮回教学)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创办了一所巡回学校。这个乡共六个小村，比较大的如红石峁等四个村子，每村才六七户人家，最大的也只十二户，相隔都在三五里路，地区分散，农民生产负担很重，每个儿童也要拦羊三四十只。要办学，一个村办“供不起”(经费)，一个乡集中办又“误不起”(时间)。他们就共同请了一个教员，选定这四个较大村子作为基本巡回教学范围，定名为巡回学校，每天轮教两个村子，每隔一天就可轮到一次。每村都有简易的校舍，有桌凳、黑板等校具。学校有校董会，每村选一人任校董，协助教员管理学生，教员轮到哪个村子时，他就

把学生集合在一起，平时则督促儿童复习。儿童不离本村，就地上学，不误生产。“误不起”、“供不起”的问题解决了。志丹其他乡及靖边、吴旗一些较偏僻的乡村，也创办了这样的巡回学校或轮学，同样得到群众的拥护。

教育改革，民办小学带了头，做出了榜样。一九四三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以后，公办小学和完全小学，也在逐步地进行改革。我们一方面号召各地继续试办民办小学，一方面推广了吴旗县赵老沟小学教员刘保堂结合实际和群众需要办学的经验。许多小学教员经过整风，批评了旧型正规化的思想，开始认识到，不结合边区实际，不懂得农民的要求，办教育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向民办小学学习，向刘保堂学习，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农村迫切需要的教材，增教应用文和珠算，增教生产知识和卫生知识，向着新的方向转变，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我们还抓了私塾的改造。边区文化落后，私塾仍占相当数量，陇东分区就有一百五十处，他们多半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改造是必要的。我们推广了陇东贾其昌私塾改造的经验，促进私塾按照政府的教育方针办，向着新式的村学转变。农民对小学的改革是欢迎的，有的要求办得好的中心小学、普通小学继续公办，有的因为需要或有的小学办得不好，则改为民办，使学校更能按照群众的意愿办。但是小学教育的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部分小学教员习惯于过去旧的一套，只知道政府办，不知道根据群众意志由群众决定学校的形式与内容；在另一部分学校中，则又过分强调生产劳动，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忽视了知识的教学。这两种倾向，在继续改革的过程中，都是要注意解决的。

小学教育改革的情况说明，群众本来蕴藏着办学的积极性，但被旧型正规化束缚住了。经过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这种积极性迸发出来了，他们要求创办学校，改革学校。这种改革，也只是

开始，它将随着边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当时的情况下，小学教育的改革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读书与抗日、建设相结合，教育和政治、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抗战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原则。边区小学是传授儿童文化科学知识的阵地，同时又是宣传抗日和党的政策，推动农村建设的重要环节，教员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边区多数教员工作勤奋，生活刻苦，政治觉悟较高，他们不仅教儿童读书，开展成人教育，开展卫生运动，使乡村小学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中心；而且还指导学生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和生产建设活动，发挥了教育为抗战为生产服务的作用。

第二，学校的设置和组织形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贯彻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原则。既有适应农村分散的特点和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的各种形式的民办小学，又有适合县城和集镇的中心、普小和完全小学。经济文化的落后和发展不平衡，不仅偏僻的乡村与城镇有差异，就是县城的完全小学，因地区不同，要求也各异。绥德、米脂的完小毕业生多希望升学，而延长和环县的毕业生则多参加工作，所以课程设置和毕业年限也不必强求一律，而应因地因人有所侧重。

第三，坚持群众路线，学校与群众配合。边区政府重视教育事业，教育经费占支出的七分之一。但由于实施免费教育，学生入学不交学费和杂费，而且要创办更多的新学校，所以经费仍有困难。这就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因陋就简，发动群众自己维持学校用费，来解决这个困难。群众了解儿童教育，社会教育和救亡活动的重要，自愿担负起维持学校经费的任务。政府则着重在政策、教材、培养教员等问题上加强领导。这样我们在边区经济落后，物资困难的条件下，仍然把教育事业扩大到穷乡僻壤，使教育事业得到发展。民办公助方针为人民所拥护，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保小（保育院小学、即过去的干部子弟学校、是唯一直属教育厅的小学）、抗小、延属干小、完小等四校的教员训练班上，曾经根据了解的情况，讲过以下四个问题，这是我个人对当时边区小学教育的意见：

（1）干部子弟学校教育方针应该是健康、文化与人生观三者并重。前一代人的弱点是文化落后，身体不强，后一代人将是建设人才，应把身体搞好，文化搞好。前一代人有为人民当勤务员的传统，后一代人必须继承与发扬这种传统，切不可沾染新贵族思想。

（2）教育态度应该是一切为了学生——未来的人民勤务员。用作人民勤务员的精神去教育他们，先作学生，后作先生。要坚持真理，又要善于说服。以说服方法和集体生活，培养孩子们的纪律观点。要从正确方面启发学生，也要从错误方面教育学生。要在教育方面培养一种纯正的实事求是与联系群众的作风。

（3）加强教员的修养和学习。一是思想作风修养，要放下包袱，打开脑筋，用民主方法争取别人的帮助，从实践中破旧立新。二是政治和政策学习，上级要给予帮助。三是业务学习，要从实践到理论，做什么，学什么。此外，教员的政治待遇与物质待遇，应该适当解决。

（4）要克服学校教育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作风问题，即官僚主义问题。领导部门要了解下面的意见和要求，解决实际问题。

在训练班上，学员们对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意见比较多，为此，我曾给教育厅的负责同志写过信，又同他们谈过话，建议他们亲自去教育训练班主持些日子，以便提高学员的信心，建立领导的威信，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 三、中等教育

边区的中等教育，是一个从无到有，探索前进、逐步成熟的

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边区在一九三七年前，没有一所中等学校。一九三七年三月成立鲁迅师范，一九三八年成立边区中学，这是边区中等学校的初创时期。时间虽短，但在教育实施上却带有初创时期的许多特点和创造。教学内容为了适应当时抗战的需要，一般是政治重于文化或政治文化并重。学制也是按实际需要，灵活掌握，有的半年毕业，也有的一、二个月毕业。学生随到随考随编班，如果工作急需，也可以随时调出。学生入学不受严格限制，初期很多是部队机关的勤务人员、退伍红军、红军家属、残废军人等。文化程度高的设中学班或师范班，低的设预备班，都属训练班性质。学生要参加社会活动，作群众工作，并适当参加生产劳动。

这个时期的中等教育，虽然在教学组织、内容、制度、方法上还有很多缺点，但它打破了过去只有富人子弟才能入学的阶级界限，的确是一种新教育的雏型。由于当时具体条件的限制（国民教育刚刚开始发展，完全小学只有一、二个），还不可能把培养边区知识分子当作主要目的，但是因为接受了内战时期革命队伍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当时边区文教工作中依然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是边区中等学校在数量上大发展的一年，学校由两所增加到了七所，就是：边区师范（一九三九年八月由鲁迅师范和边区中学合并而成）、三边师范、关中师范、陇东中学、绥德师范、米脂中学、边区医药学校；一九四一年后又发展为十所，即增加了郿县师范、新文字干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一九四〇年创办边区农校，一九四一年创办边区职业学校，一九四二年将两校合并成职校）。这十所中等学校，有普通中学二所，占百分之二十；师范中学五所，占百分之五十；中等专业学校三所，占百分之三十。中等教育这个结构的比例，在文教建设的初期，是大体

上符合边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需要的。师范学校占的比例最大，这反映了边区对培养知识分子和发展文教事业的迫切需要。当时中等学校的学制，确定为两年到四年。后来边区的青年学生逐渐占了多数，开始提出了为边区培养小学教师和新知识分子的任务。文化教育内容的比重大大增加了。边区师范、三边师范、绥德师范还附设了行政人员训练班(地干班)，这是一个新的发展和改革，正符合边区要提高现任干部文化水平的需要。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发生了两种偏向：有些学校对旧学校遗留的教学内容、方法、作风的改造不够，存在着不切合边区实际需要的所谓“正规化”倾向，学了一些不急需或用处不多的东西。又有些学校提出抽象的政治和思想要求，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方法盲目地给学生讲许多政治和社会科学概念，学生学不了，也减少了文化教育的时间。这同样是脱离边区实际需要的。

一九四三年的整风，针对上述偏向，即旧的教育思想和新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检查和批判，实现了重大的改革。首先，明确规定了中等学校带有干部学校的性质，并增设地干班，使边区中等教育与边区建设实际需要进一步结合。其次，为此目的，削减了不急需的课程，增加了当时有实际需要的课程。再次，确定了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的原则，是在学生的实际活动中培养他们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与劳动观点，而不是只讲抽象的理论。通过这些改革，边区中等教育出现了新气象，不再把自己的任务限制在只是培养小学教师与一般中学生的圈子里，而是扩大到了同时培养边区建设所需的各种干部和人才。因此在中学班、师范班以外，增设了地干班或其他实际需要的班次。这样一来，进校学生增加了，学生热爱边区及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大大提高了，不愿去偏僻的农村工作的愿意去了。

中等教育的这一次重大改革，也有缺点。规定课程教学大纲



是好事，但有些规定得太广泛、太复杂，以致教员教不了，学生学不了。注意教学与边区实际相结合也是好事，但有些把实际理解得太狭隘，忽视了一些必需的知识的的学习。还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残余。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月十二日，在边区政府领导下，在延安召开了边区中学教育会议，对从一九四三年以来的整风和改革的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总结。这次会议在边区中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除三所中等专业学校未参加外，七个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地干班主任及教员代表等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主要讨论了中等教育的方针、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地干班、思想教育、组织与领导等问题。

边区中等学校教育的总任务，是有计划地培养边区知识分子，提高现任区、乡干部的文化水平。根据这一总任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等学校的方针，应是与边区实际结合，学以致用，培养未来干部和提高现有干部（包括小学教师），即具有为人民服务精神并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教学内容必须以文化教育为主，文化教育又必须以语文为主。

二月七日，我受边区政府主席的委托，听取了教育厅长柳湜的汇报，并看了边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同志的书面汇报，经过共同商议，获得了如下一致的意见：

“今后中等教育需要有点计划。边区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知识化，否则边区建设很难前进。

“‘地干班’，应成为工农干部取得语文工具的场所，因此应予扩大，并确定轮训计划，强制执行。

“‘普通班’，应照顾临时、一般和将来的需要，而以一般需要为主。所谓临时需要，指目前过渡期间的紧急需要（接替外来干部），可指定若干班次为之。一般需要，是指初级知识分子和小

学师资，保证三年毕业。这两种，均以搞好语文，达到清顺为主。将来需要，是开办若干高级中学班，不仅语文要流畅，并须掌握普通科学知识。”

边区的中等教育，一向重视思想教育，但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是简单化，企图用“斗争会”、“反省”、群众压力和组织手段等办法，解决细致、复杂的思想问题。二是急性病，企图入校一年就克服学生的家庭观念，并完全做到大公无私。会议批评和纠正了这些偏向，认为思想教育中的简单化和急性病，不符合青年思想的发展规律，也不符合对青年应以启发、诱导与培养为主的训导原则，因之是错误的。会议明确了思想教育应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大众的，确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指导，应该通过民主、自由讨论的方式，坚决纠正强迫、斗争等方式。

关于政治课设置，政治课小组曾发生过激烈争论，以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各学校的政治课教学各有长短，今后应当取长补短，根据实际需要，决定课程设置。并研究了课程的具体内容为：社会科学一般常识、边区史地、国民党与共产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边区政策、工作方法、时事教育等。

#### 四、社 会 教 育

边区社会教育主要对象是农民，是成年农民(包括失学儿童)不脱产的教育。边区农民不但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日战争，而且是边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直接承担者。社会教育是国民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一环。抗日战争和发展生产不但要求办好小学和中学，培养知识分子，而且要求农民群众逐步消灭文盲，破除迷信，讲究卫生，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抗日民主的

模范根据地。

经过教育改革，边区的社会教育，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基本方针是民办公助，主要靠群众觉悟，自己动手，政府除加强领导外，并在干部、课本、部分经费等方面，予以必要帮助。

边区的社会教育，从边区实际出发，创造了适合边区情况的成人和失学儿童教育的多种形式，主要有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和民教馆。其中又以各种类型的识字组和冬学最受群众欢迎。

读报识字组是扫盲运动中最经常最普遍的一种群众教育形式，它最能发挥“民教民”的作用，又识字，又学时事政治，又可结合生产。当时边区还没有广播的条件，通过读报识字，“农民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扩大了农民的眼界。这对提高农民文化和政治觉悟，移风易俗，促进生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听了《边区群众报》批评有的变工队管理不善，有名无实，就联系自己的情况检查；听了报上植棉技术、防治病虫害，就在自己的地里照着做；报上登载了医治牲畜疾病，讲究卫生，反对巫神，破除迷信等，各地读报识字组就进行讨论和实行等。当时的读报识字组最受群众欢迎的有四种类型：一种是以生产组织建立起来的读报识字组，它主要依靠劳动英雄或变工队负责人领导，组织村学教员、学生、政府干部当教员，实行民教民的办法，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子教母，夫妻互教，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象淳耀县白塬村识字组就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一种是以小学校为中心的读报识字组，这种类型的识字组主要是靠“小先生”开展工作，它也是民教民的一种形式。在边区经过一九四四年的教育改革，各种类型的民办小学和公办小学，“小先生制”得到较普遍的推广。“小先生制”既适用于分散的农村，也适用于小城镇，既可按小组活

动，也可深入到家庭对妇女儿童进行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不误生产，送上门去。当时绥德实验小学执行的“小先生制”，在扫除文盲中发挥了作用。还有一种是民教馆领导的识字职业教育，定边民教馆办的七个妇女职业学校，学生不脱离生产。一面识字，一面学编织等手艺，很受群众欢迎。第四种是任逢华识字班。任逢华是中师毕业生，在旧社会当了二十年小学教员，退職回家后，先在吴堡创办了一个识字班，五年内从二十一人发展到一千七百零一人，从一个村庄发展到八十五个村庄，从吴堡发展到绥德。他给农民送字，经常一天跑几十里，风雨无阻。有一次他要给二十里路远的一个村庄送字，天下了三寸厚的大雪，当时老百姓以为他不会来了，但他天不明就从家里动身，到得村来，大家还没有起床，他就站在大门口等着，学生打开大门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感动不已。“雪里送字”，传为美谈。所以，他在边区文教大会上受到奖励，被誉为“民间教育家”。

各种类型的读报识字组，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发展较快，最高时达五、六万人，但在部分识字组中仍有强迫命令的事情发生。一九四四年总结了经验，指出了这种缺点，又出现了放任自流的现象。尽管如此，农民的识字教育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路子来了，成绩是很大的。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冬学。冬学是群众创造的有历史传统的一种成人和失学儿童教育的组织形式，陕北地方党组织曾利用冬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和文化活动。边区政府及时总结了经验，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就得到推广。一九四三年以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一九四四年共办了三千四百七十所冬学，入学的农民达五万余人。延安各单位派下去支援办冬学的就有一千余人，数量和质量都比往年提高了。这一年举办的冬学，在边区政府发出的卫生第一，消灭婴儿百分之六十的死

亡率的号召下，各地创办了一批以妇婴卫生为主要内容的妇女卫生冬学。延安大学派了一批学生到陇东分区帮助办冬学，在镇源刘家城办了一所妇女卫生冬学，教员从调查入手，弄清楚了妇女临产，习惯用破瓷片断脐带，婴儿得破伤风死亡的情况。教员就抓住群众这个最迫切的问题，进行卫生教育，用新旧对比的办法，使群众接受了新法接生，为民造了福。各地举办的卫生冬学，也收到同样的效果。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新创造，把扫盲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结合起来。这一年的冬学，从读、写、算，到群众迫切需要的卫生知识都成了教学的主要内容。一冬三个月的学习，有的学会了写信，能读《边区群众报》；有的学会了珠算，能记账；特别是在冬学里进行妇婴卫生的教育，使冬学的发展往前推进了一步，成绩是显著的。这些成绩的获得，首先是坚持了自愿与需要的原则。群众眼看人畜死亡的严重，迫切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发展医药卫生，发展文化教育，做到人财两旺。边区文教工作者抓住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启发群众起来向愚昧作斗争。其次是认真贯彻了民办公助的原则。群众自己办，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必要的帮助。把过去以乡为单位改为以村为单位办。但发展不平衡，还有一部分冬学重复了过去命令主义的错误，强迫招生，集中办学，这一部分冬学，群众反对，教学效果也差。

一九四五年十月上旬，我受命修改当年办冬学的指示信，研究了前一年办冬学的经验和问题。我们分析了群众对冬学的思想顾虑，是男怕误工，女怕误活，妨碍生产；怕当公家人，减少劳动力；怕老婆离婚；怕天冷、路远、孩子往返不便；怕心杂、意乱，识不下；觉得一辈子不识字也过来了，识字顶啥用等。在指示信中，第一，要求针对不同思想，具体进行工作。第二，重申了需要与自愿原则。要具体发动，不搞命令主义；要分散经营，

不搞集中办学；要因人施教，不搞硬性灌输。第三，强调了民办公助方针。主要靠群众自己动手，政府予以适当帮助。“形式是民办公助，精神是需要与自愿”。第四，肯定了前一年冬学的一个好经验，即以妇婴卫生为主的妇女冬学，要求卫生机关参加，积极推广。第五，阐述了争取和团结农村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要求尊重和争取他们参加办冬学。这一指示信对当年冬学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 五、文 艺 工 作

1. 中国文艺协会。旧社会边区的教育事业落后，文化事业更落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才由丁玲等主持成立陕北根据地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毛泽东誉为“苏维埃运动的创举”。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后，就沿着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方向，积极开展活动。曾经发起“苏区一日”、“长征记”等征文，收获不小。先后创办《红色中华副刊》、《苏区文艺》、《解放周刊》、《新中华副刊》等刊物，发表过不少文艺作品。“人民抗日剧社”、“锄头剧社”演出过《亡国恨》、《放下你的鞭子》等十四、五个剧目。“平凡”、“中央”和“战号”三个剧团还联合演出了《阿Q正传》，文化活动开始活跃。

2.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丁玲等又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山西前线参加战斗，上海各地一些文艺界骨干力量来到延安，文艺队伍又扩大了。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新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先后由艾思奇、周扬、丁玲、柯仲平等主持工作。一九四〇年春，举行了第一次文化协会代表大会，选举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文化协会成立后，开展过街头诗运动和诗歌朗诵等活动，组织过文学顾问委员会、民众剧团、文艺小组、世界语小组等，为群众文艺提供了活

跃的阵地。其中一九三八年夏成立的先后由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几年内足迹遍及二十四县（边区共辖二十九县。边区的行政区划时有变动，所辖县市亦因此而有变动），观众达二百万人次，成绩卓著。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共同组织过五个抗战文艺工作组，各组组长有卞之琳、吴伯箫、鲁藜、刘白羽、周而复等，先后派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抗战文艺宣传工作，收获很大。

边区文协还创办了大众读物社，由周文、胡绩伟、胡来、赵守一、林今朋等负责。该社出版了《边区群众报》，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一直出版到全国解放后。还出版了大众读物丛书，出版物《大众习作》，很受中小学校的欢迎。

3.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一九四〇年，在我党的影响和支持下，重庆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相应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相继组织过文学顾问委员会和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创办过文艺学园，出版过“谷雨”和《文艺月报》，又成立了文化俱乐部，萧三任主任，创办了“作家之家”。在学术研究方面，成立了鲁迅研究会，青年文艺习作会。各种街头黑板报不断兴起，成立了诗刊社并出版了《诗刊》，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如秧歌等更是遍地开花，搞得热火朝天。

延安整风之前，在知识分子中关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并不明确，思想比较混乱，存在着侈谈提高、忽视普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需要的现象。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工作的两个根本问题即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与此同

时，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文化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得到克服。接着，一九四三年发动了全区大生产运动，大大地改善了工农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的战士、干部、学生的生活，达到了“丰衣足食”。这样就为文化运动的大规模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边区的文艺工作就空前活跃起来了。我们亲眼看到群众性秧歌活动和戏剧活动的极大发展，文艺工作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在创作方面，产生了许多新的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等，在演出方面，“鲁艺”和中央党校等组织的秧歌队，由于结合了抗战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群众称之为“斗争秧歌”，文协、民众剧团和延安各文艺团体纷纷下乡，到群众中生活、工作和演出，为贯彻党的革命文艺路线贡献力量，博得广大群众的普遍拥护和热情欢迎。这是毛泽东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的可喜实践。

## 六、文 教 大 会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十六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总结了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 and 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了各条战线群众创造的文教工作的典型，奖励了一批文教工作的模范，明确了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今后五至七年内文教工作的目标。这是边区文教工作的一次检阅、评比和总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文教大会是十分重视的。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上旬，毛泽东就召集中央宣传部、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的负责同志和陕甘宁边区五个分区的地委书记的座谈会。我和李卓然、董纯才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反复阐明了文教工作的重大意义。他说，一九四三年一年把经济搞好了，但



文化问题还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些宣传部门不知如何干法，只会搞军事、政治，不会搞经济、文化，这不行。接着毛泽东又进一步就文化教育与政治、军事、生产的关系作了论述。他说，过去军事政治第一是对的，要打垮阻碍经济文化发展的东西，才能搞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是推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在发展经济文化。他又说，文化反映政治经济，反过来又影响政治经济。孔夫子办学校，目的是宣传封建秩序。资本主义没有文化建设不成。我们建设抗日根据地，没有文化也不行。军队需要文化，才能战胜旧军队。战士没有文化，不可能提高战斗力。如果不发展文化，经济发展会受阻碍，最后，毛泽东说，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今年冬天要展开讨论文化教育问题。文化教育中有四个问题，就是：报纸，学校，艺术，卫生。

毛泽东的讲话成了边区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是召开文教大会的指导思想。

西北局为了具体实现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四月十五日约集五个分区的地委书记及延安各有关负责同志开座谈会，讨论边区文教建设，并就报纸、教育、卫生、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决定。四月二十三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对试办民办小学和小学改革作出了具体的安排。这样，在党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下，边区文教大会的准备工作就全面展开了。

在毛泽东召开座谈会以后，我受边区政府委托，参加了文教大会的筹备工作和组织工作。六月十七日，西北局宣传部，边区政府教育厅，边区文协举行联席会议，推选罗迈、徐特立、乔木、李卓然、柳湜、周扬、萧向荣、赵伯平、赵毅敏、柯仲平、蒋南翔、吴文遴等二十五人组成大会筹备委员会，并选我为筹委会主任。二十五日召开第一次筹委会，推选罗迈、李卓然、柳

澍、萧向荣、赵伯平五人为筹委会常委，处理筹备大会的日常工作。二十八日召开了第二次筹委会，组成了五个文教工作组，分别到延安、绥德、关中、陇东、三边等五个分区调查研究文教工作的典型范例。各组负责人是：陇东组蒋南翔，关中组柯仲平，绥德组柳澍，三边组吴文遄，延属组赵毅敏。当时边区政府常黎夫、李之钦、张健、孙伟、翟定一，鲁迅艺术学院刘安波，《边区群众报》胡绩伟等参加了各组的工作。七月六日赵毅敏率领中宣部文教工作组到达延属专署，十二日分别下到安塞、子长、延川、志丹等县，其他各组也于七月中旬以前到达分区，调查历时两个月，于九月上中旬先后返回延安。这次调查，为大会准备了各类典型和总结经验的材料，是整风后文教工作纠正教条主义，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的实际行动。

大会于十月十一日开幕，会场两边贴着两张巨大的条幅。右边一幅写着：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武装部队与文化部队的结合；左边一幅写着：文教工作与生产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教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的战略思想。这次大会，出席代表共四百五十余人，有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文教工作者，有知名学者、诗人、作家、画家、医生，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旧知识界人士、热心文化建设的绅商，还有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等。

毛泽东、朱德对大会十分重视，在会议期间，先后作了重要讲话，在政治上、政策上指导了大会的胜利进行。

朱德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文化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积极成果。文教工作对于争取抗战胜利有极大作用，希望大家时刻要求进步。朱德的讲话鼓舞了到会代表，增强了大家的荣誉感和责任心。

毛泽东在十月三十日向大会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演，第一，明确了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第二，阐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说：要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第三，强调了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毛泽东的讲演，解决了边区文教工作中的几个要害问题，为边区文教工作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正确的方法。

会议期间，吴玉章、徐特立等也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大会对教育、卫生、文艺、报纸等工作进行了讨论，作出了结论，并拟定了各项决议草案。

关于教育工作。大会回顾了边区教育发展的历史，讨论了当前及今后的教育工作。十月三十日我在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谈了我对于边区教育发展三个时期的看法：第一个时期是内战时期，比较粗糙和简单，但把教育的权力从敌人转到人民手中，人民在教育上翻了身，教育的内容和当时人民政治上和生活上的需要相结合，所以方针是正确的。第二个时期是抗战初期，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有发展，但受旧型正规化指导思想的影响，存在一些严

重缺点，实际效果受到限制。第三个时期是一九四三年以后，这是贯彻新教育方针时期，教育工作开始了新局面。这个发言获得大会教育组的一致同意。

十一月十五日，教育厅长柳提作教育工作总结，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认真培养边区知识分子，同时提高现任干部的文化水平。第二，开展群众教育，要适应农村环境和当前群众的迫切需要。第三，要加强对民办公助学校的领导。

关于医药卫生工作。大会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尤其对中西医合作问题讨论得很好。会前，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中西医合作的组织“医药研究会”，会上，中西医双方互相学习，态度诚恳，很多中医当场公开秘方，介绍经验，体现了中西医合作的良好气氛。十一月一日中央财政部长李富春作了一次发言，强调指出：第一，边区当前存在“财旺（已做到“丰衣足食”）人不旺（疫病流行、人畜死亡率仍高）”的严重情况，群众医疗卫生问题亟待解决。第二，边区医生应为工农兵服务，成为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救星”，批评了某些医务人员的所谓“自由职业者”的态度。第三，新民主主义卫生事业应针对两个方面进行，一是群众方面，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改造他们的不卫生习惯；二是医药卫生工作和医务人员方面，要普及和提高结合，中医和西医合作。十一月十二日民政厅长刘景范向大会提出了发展医药卫生抢救人畜的四项任务：第一，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第二，贯彻文教统一战线；第三，改造巫神；第四，改进牲畜管理。这次文教大会对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艺术工作。大会经过讨论，对群众文艺运动的方针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十一月十二日周扬向大会作了总结，明确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普及群众新文艺运动，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群众，也发动工农兵群众自己动手，

创造表现群众生活的新艺术，各尽所能，自由发展。第二，要发展文艺统一战线，改造旧秧歌、旧戏，改造和团结旧艺人。第三，党政机关要加强领导，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发挥他们的创作积极性。

关于报纸工作。大会讨论了大众黑板报、读报组和工农通讯等问题。十一月十五日，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对讨论情况作了总结。他在充分肯定了前段的工作成绩后，要求各级党组织普遍在识字组、变工队、合作社、运输队、妇纺组和夜校组织读报，在市镇及人口较为集中的大村庄创办黑板报和大力发展工农通讯，使每一个读报组，每块黑板报，每一篇工农通讯，均能起教育干部、群众与推动各种工作的作用。

十一月十六日，大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上，大会筹委会委员胡乔木主持通过了各项决议，包括：教育、卫生、艺术、报纸工作决议，部队及工厂、机关、学校文教工作各项决议，加强荣誉军人学校的文教工作决议，并通过了确认邹韬奋为模范革命出版工作者的提议。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这个决议指出了由于战争形势与边区建设的发展，在边区培养知识分子和扫除文盲的极大重要性。决议指出，培养大量的边区知识分子，是边区的头等任务之一。要达到这个目的，须经过提高在职工农干部的文化和培养与工农相结合的新的知识分子两个方法。教育内容应从边区实际需要出发，继续纠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恶习。我们所要培养的知识分子，应该不仅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满腔热忱与实际技能，并且具有一定水平的现代科学知识。决议接着提出在目前边区情况下群众教育的中心任务是扫除广大成人与失学儿童的文盲，提高其文化与政治觉悟。群众迫切要求学会读、写、算能力，应以成为群众生活中最大问题的生产与卫生两项知识，构成群众学习读、写、算的主

要内容。群众教育的形式，应适合边区环境。小学应以民办公助的村学为主要形式，推行“小先生制”，要组织校外识字组，在冬季组织冬学。决议并对实现上述任务所需教育干部和教材问题的解决作了切实的规定。这个决议，总结了边区教育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问题集中，方向明确，指导意义是很大的。

我受边区政府委托，作了大会总结，题目是《发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其中关于文化统一战线问题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结合边区实际谈的。此外，还谈了两个问题。第一，边区群众文教工作当前的任务，是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继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要求在十年之内，消灭原来占成人百分之三、婴儿百分之六十的不正常的死亡率，消灭男子四十岁与女子三十五岁以下的文盲，使大家能读能写，健康愉快，享有文化生活，从而有充分能力向前发展政治经济，因此应该重视文教工作，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一致奋斗。第二，要为边区培养大量的足够的本地知识分子，这是边区今后一切工作的关键，更是开展文教工作的关键。我们的干部教育除学习必要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专门技能外，应该着重学习边区建设，学习边区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尤其注意新的人生观的培养，使每个干部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限热情和向人民大众学习的真正决心。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决定关键，又是业务成功的决定关键。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信任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边区的宝贵财产。党和政府对他们应给予政治上的指导、照顾和学习的机会，应关心其物质生活，家庭生活，解决其工作上的需要，鼓励他们努力前进。

最后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闭幕词。他刚从重庆赶回来，兴奋地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教大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件重大工作。在全国来说，这样的大会，从来没有开

过，现在也只能在边区开，有这样一个边区，中国便有前途。他勉励全体代表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继续努力，做出更大成绩！

边区文教大会以后，各分区也都召开了文教大会。

一九四六年四月我离开边区政府，在此以前，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我在习仲勋、林伯渠和李鼎铭座谈边区参议会的准备工作时，对今后边区文教工作提出过如下建议：“边区建设前进的速度，文化将有决定影响，今后应当适当地强调国民教育，尤其要认真解决培养知识分子及消灭干部文盲的中学教育的建设”。这是我在边区文教工作中长期坚持的主张，也是我在离开边区前向负责同志提出的建议。

## (七) 土 地 改 革

彻底改变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必须完成。采取什么政策解决这一问题，则因时而异，几经变化。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解决土地问题，经历了三个时期，采取过三种政策。这就是十年内战时期，采取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采取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采取多种方式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此问题当时是一个中外瞩目、影响深远的大问题。由于我党策略运用灵活，既坚持原则，又因时制宜，不仅得到了亿万农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多数民主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进行得十分顺利。现根据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对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解决过程作一综合回忆。三个时期，三种政策都谈，重点谈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多种方式的土地改革政策。

## 一、十年内战时期

进行土地革命，实行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叛变革命，血腥镇压工农群众之后采取的。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把没收地主土地作为尔后革命总方针之一规定下来，并在赤色根据地开始实行。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六大”正式确定了这一政策，即“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同样执行了这一政策。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共辖二十七个县，其中就有十几个县，即延安直属分区的大部分，三边、陇东、绥德和关中分区的一部分，已经进行过土地革命，打倒了封建势力，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剥夺了地主在农村中的政治经济特权，基本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在这部分地区，农民土地问题获得基本解决。

## 二、抗日战争时期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我党即于一九三七年二月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向他们提出了四项保证，其中一项就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政策，即“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



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陕甘宁边区经过土地革命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十几个县不复存在减租减息问题。但还有十来个县如延安直属分区的小部分，陇东、绥德分区的大部分，三边、关中分区的一部分，约占边区一半人口的地区，没有进行过土地革命，封建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地主在农村中的政治经济特权未经触动，他们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仍然是农村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因之，在这些地区，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农民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现将历史情况和执行过程简述如下。

1. 残酷剥削。这些地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以同宜耀县为例，全县仅有耕地六万余亩，地主即占四万二千九百余亩，达百分之七十强。土地的这种高度集中充分说明了农民受地租剥削的普遍性和残酷性。绥德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租额更高，最高达全部收获量的百分之四、五十，即劳和不劳，各得其半。由于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旱，自然灾害多，歉收荒年多，佃户经常交不足租子。一旦出现欠租现象，就会背上几辈子还不清的欠租重担，农民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在租佃关系上，还有一种极不正常的状况，即许多佃户租种的土地，实际是他们自己的土地。过去因为生活困难，出卖或典给了地主。虽说“典地千年活”，随时都可以赎回来，但多数农民无此力量，典地实际也成了卖地，只好向地主租种原属于自己的土地，祖祖辈辈挨穷受剥削。说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残酷的，要发动农民的生产 and 抗战积极性，减租减息，势在必行。

2. 顾虑重重。但是，要彻底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并非易事。边区的减租减息是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整整搞了五、六年，进行了宣传，公布了条例，动用了一切行政手段，结果或明减暗不减，或减也很不彻底。强制推行，收效甚

微。其中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主要是政治原因。当时这些地区叫“统战区”，存在双重政权，国民党委派县长，主持政务，我们只有驻军和群众团体，因之群众有顾虑。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主要是经济原因。当时国民党县长已经撤走，结束了双重政权的局面，许多农民迫切要求减租，但仍裹足不前，顾虑重重，一个重要问题是佃权无保障。他们说：“今年减租是好事，但如果明年没地种咋办？”明明想减而出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大都就是在地主威胁抽地、倒佃的情况下发生的。

3. 减租高潮。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三年，终于出现了群众减租运动的高潮。党和政府为此做了一系列工作，制订政策，组织群众。一九四二年二月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随即作出了贯彻执行的办法，并且成立了由刘景范负责、崔田夫、张邦英、高长久、李景林等参加组成的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集中研究边区土地问题，处理边区土地纠纷。同年十月，召开西北局高干会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地主只讲团结不敢斗争的倾向，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思想。十二月，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均应按本条例所规定的减租率和减租额收租和交租，不得多收，不得少交。尤其明确规定了出租人不得任意收回租地。除此之外，有些地区还创造了一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斗争的方法。这就是说，佃权有了保障，斗争有了方向，佃农敢于面对面地同地主进行减租斗争，减租高潮起来了。

减租高潮的主要标志是：第一，有了群众基础。广大群众，主要是佃户真正发动起来了，他们成了开展减租斗争的主力军。第二，有了领导组织。佃户组成了减租会或减租小组或农会，由这些组织具体领导减租工作。第三，有了周密部署。斗争包括三个步骤：清账、退租、换约。首先是清账，就是清算一九三九、四

○年以前减租条例已公布，未执行，从而多交了租额的账目，然后是退租，就是根据清算结果，确定应退数量，由地主将多收租子如数退回佃户；最后是换约保佃，巩固减租成果。有条不紊，成绩显著。

4. 农民获益。经过减租斗争，用佃户自己的话说，他们获得了“半翻身”。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很大提高。经济上，一是当年不仅少交大量租子，而且收回大量退租，获得实际收益。据陇东地区庆阳、合水、镇原三个县十七个乡在一九四二年七、八两月减租统计：共有佃户四百三十二户，承租土地二万二千五百余亩。经过减租，免去一九三九年以前欠租四百零五石，退回一九四二年以前多收租子七十一石，本年减租二百八十二石，合计纯收益达七百数十石。在当时对一般佃户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这不是个别事例，而是减租后的普遍现象。二是土地所有权发生部分转移，有一部分土地逐步从地主手里转移到了农民手里。如庆阳高迎区就有六户佃农靠减租等收入，从地主那里换得了二百亩土地，其中有四户成了自耕农；米脂民权区也有一些佃农在一九四一至四四年期间，同样用减租等收入买地一百三十三亩，使七户贫农上升为中农。这样的事例也是很多的。政治上，经过减租斗争，不仅削弱了地主经济，而且打垮了地主对乡村的政治统治。减租会和农会获得了实际统治权，农民确实扬眉吐气了。

5. 地主动向。在减租减息中和减租减息后，地主有各种不同表现。在减租减息中，有三类地主，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好，积极拥护政府减租政策，自动实行减租。如李鼎铭副主席的兄弟李风雄，他是米脂桃镇区地主，表现很好，就邀请他参加减租检查会，对减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又如绥德辛店区地主王随合，过去也是苦出身，减租法令下达后，积极响应，说：“我知道穷人的困苦。

八路军在前方拿命在拚，我们为啥不出公粮，不好好执行减租法令？”当时我们对这类地主的言行，在报上予以公布表扬，称之为“自动”减租，给了充分的肯定。第二种，表现坏，公开或不公开抵制减租政策，破坏减租运动。抵制和破坏的手段很多，如抽地“自种”（“自种”是借口，实际是改租），假典假卖，改变租佃形式，丈地加租，变相加租，明减暗不减等等。对这类地主，一般采用群众开会斗争方式。在群众会上，选定一、二个表现特坏的地主，进行有效的斗争。这样一来，“杀一儆百”，局面就打开了。第三种，表现不好不坏，一般对减租不公开抵制，也不积极响应，抱观望态度。这类地主居多数。对这类地主，我们大多采取主佃双方座谈，进行说理斗争的方式。经过这样的斗争，一般都能按条例规定进行减租。

在减租减息后，地主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有一部分地主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向。他们出典或出卖土地，改营工商业和合作事业。如米脂、绥德等县就有十八家地主，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三年中共出典或出卖土地八百六十八晌，占他们原占有土地数的百分之二十，将全部所得作为资本投入了工商业或合作事业。他们经营工商业或合作事业的收益，占了他们经济总收入的一半。这种经营方向的改变，使地主经济逐步发展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因此，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向我们提出土地政策问题时，我就是这样回答他们的：“我们现在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我们执行这个政策已经得到很好效果。地主在减租以后，有的已经开始自己劳动，有的雇人劳动，有的转办工厂、合作社，改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政府鼓励这种改变。这些经验说明，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土地问题是完全可以和平解决的”。

### 三、解放战争时期

进行土地改革，实行用各种方式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这样一种情况：“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

为此目的，党和边区政府根据不同情况，先后采取过三种不同方式的土地改革，帮助农民获得土地。

1. 进一步减租查租，部分地达到“耕者有其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强调指出：“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全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的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方法是：“（甲）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乙）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丙）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的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的土地自耕。（丁）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农民用以上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而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

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于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减租和查租的指示》，要求“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和关中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阳）、合（水）、镇（原）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

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同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非法倒动的土地，仍应退还农民耕种，假典假卖，抬高租额，骗取陈租等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并补偿农民的损失，消灭明减暗不减现象，揭露招摇撞骗，愚弄农民的手段。贯彻减租政策并研究妥善办法，逐步达到耕者有其田。”随后，边区政府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分赴陇东、绥德、三边分区的各县进行查租保佃工作。

在减租查租中，群众起来斗争并清算了一些大恶霸，如庆阳“八大家”地主之一的王铨，经过清算斗争，应退租一千四百五十三石，折地五百十九亩，分给了农民。镇原县孟坝区在清算大恶霸李某时，也索回土地千余亩。总计庆阳、镇原、合水三县二千二百四十家佃户，几年来从地主手里收回过去多交的租子折合土地共五万五千九百余亩。

在减租查租高潮中，也有一些开明士绅自动提出向政府献地，如安旗庭先生代表其母及弟安子文、安志文（都是我党干部）自动献出山地十垧，水地三垧，窑三孔。安文钦（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献地三百垧。刘文卿（抗战胜利后新解放的安边县县长）是一个小地主，也把多余的土地献给了政府，并号召全县地主献地。在他的号召下，全县的地主献地达两万余亩。

经过上述清算恶霸、减租减息、退租退息和开明士绅的自愿献地等活动，边区未经分配土地的一些县，平均已有约百分之五十的土地转入了农民手中。说明彻底解决边区土地问题的条件已经接近成熟。

2. 征购地主土地给农民。一九四六年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届边区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征购地主超额土地问题并作出了决定，接着边区政府土地委员会制订

了《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公布试行。条例规定:“在未经土地改革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应留数量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之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富农耕种之土地,不得征购”。这是一种“和平土改”的尝试。

为了取得经验,普遍推广,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一、二月,组织了三个征购土地工作团,分赴绥德新店区一乡、庆阳高迎区王家塬乡,米脂杨家沟进行试点。

绥德新店区一乡征购土地试点工作,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进行了十天左右。首先是宣传解释土地公债条例,然后组织征购委员会,以乡农会为主,村代表和公正人(非征购户和非承购户)参加组成,弄清土地情况,评定土地等级和地价;评议成分,确定征购户和承购户及征购和承购数量。征购结果,以该乡贺家石村为例,全村六十一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用十九石八斗米买了四百二十四垧地(内有典地一百四十一垧半)。七户地主共五十七人留地二百七十二垧半,每人留地四点八垧,多是近地好地,照顾多了。

庆阳高迎区王家塬乡的试点工作,是由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率领工作团进行的。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历时十七天结束。其步骤是:第一,调查研究,宣传政策;第二,召开大会,发动群众,讨论征购,控诉恶霸;第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征地和分地原则;第四,换约,丈地,定界,给地主发公债,给农民发土地证;第五,在此基础上,健全村政权,推行乡自治。

米脂杨家沟的试点工作,在政府工作团的帮助下,从一九四七年一月开始,二月结束,起步比较晚些,但同样获得很好效果。杨家沟是陕北有名的“地主窝”,全乡七十七户地主,占有土地四万四千

八百五十四垧。经过几年来的减租运动和开明地主的自动献地，已有百分之四十一的土地转入农民手中，但是全乡还有二百九十二户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征购结果，全乡从六十三户地主手中征购了二万零八百八十一亩土地，全部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杨家沟附近七个区的二千余农民还在杨家沟联合召开了诉苦斗争大会，控诉杨家沟地主集团的罪行，推倒了他们的“功名碑”，建立了自己的“翻身碑”，上书：“二月十五日，八路军领导人民翻身纪念碑”。会上一致通过二月十五日为“翻身节”，并写信给毛主席，报告他们的翻身经过，感谢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他们翻了身。

根据绥德新店区一乡、庆阳高迎区王家塬乡的试点经验，边区政府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召开了专员、县长联席会议，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总结了这些经验。他强调：第一，要完成征购土地的任务，必须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第二，在承购土地中，必须使贫苦农民能够普遍获得土地，并做到在数量和质量上大体平均；第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关键。

试点证明，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向地主征购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样一种用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土地问题，是可能的。但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要有可能实行和平改革的环境。

3. 彻底改革土地制度。一九四七年初征购土地试点工作尚未完全结束，陕甘宁边区的和平环境就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了。他们集中了二十三万多兵力，大举进犯边区，并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悍然占领了延安。和平环境变成了战争环境，“和平土改”的道路也就被堵死了。为了广泛动员群众，最后战胜敌人，彻底改革土地制度就成了当务之急。所以，毛泽东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杨家沟会议的报告中向全党明确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



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我们就开始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各个解放区进行了普遍的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规模十分巨大，真正发动了农民群众，打击了地主阶级。但在有些地区，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

我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因蒋介石已经发动全国性内战，国共和谈破裂，乃奉命随周恩来从南京回延安。我在延安干部会上听过康生的报告，总结他们在晋西北某地进行土改工作的经验，这个经验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对地主实行扫地出门”。这是毛泽东曾经严厉批评过的过左政策。一九四七年三月撤出延安，我直接到了晋西北。在路上，见到某些圩场的商店全都关了门。我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来的干部派去参加土改，我自己没有参加土改，但参观了驻地的土改。我看到土改工作队把地主仰放在地上推磨，逼供“地财”所在，强迫挖“浮财”。后来知道，晋西北土改有“左”倾，主要是：一，错划阶级成分，把某些并无封建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划入地富圈子，扩大了打击面；二是侵犯了地富所有的工商业和打击了一般工商业；三是发生了一些过火做法如挖“浮财”、“扫地出门”等。但这些“左”倾做法，党中央很快发现并切实纠正了。主要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央杨家沟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随即派任弼时召集西北中央局和晋绥分局负责同志在晋西北三交镇召开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对土改政策作了检查并作出了正确的决议。当时政策上的“左”倾在各解放区或多或少都有发生。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和以后陆续发出的好些党内指示，反复阐明了党的正确的土改政策，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照顾开明绅士，区

别地主和富农，区别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地主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严禁乱杀，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等，这样就对各解放区在实践中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和防止。

这时，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等也到了晋西北三交以西地区暂住，我专程看望了他。以后李鼎铭从临县（晋西北党政领导机关驻地）看望刘少白回来，路过三交，我也专程看望了他。他表示赞成中国土地法大纲和土地改革。他后来回到边区政府，主持会议通过了土地法令。不幸在杨家沟会议期间逝世，中央决定隆重举行追悼，并电唁他的家属。这位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绅士的代表，对边区的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是有相当贡献的。

### （八）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

一九四四年五月至十月，陕甘宁边区接待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这是我国土地革命时期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同国际友好人士交往中，继斯诺、斯沫特莱等来访之后的第一个规模最大的中外记者参观团。

一九四四年二月，在重庆的十名外国记者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参观、访问。四月十日，在国共两党谈判前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被迫表示同意，同时批准了一部分中国记者的要求，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实际上是解放区参观团。

这个参观团有六名外国记者：史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夏南汗神

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普金科(塔斯社),和九名中国记者: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焄(《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另有两名正副领队:谢保樵、邓友德,四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人员:魏景蒙、陶启湘、张湖生、杨西岷。

中外记者参观团于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先在固临、延长参观访问,后到南泥湾,在王震陪同下参观了三五九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六月九日抵达延安,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秘书长杨尚昆、边区政府民政厅长刘景范等设宴洗尘。第二天,叶剑英代表第二战区副司令朱德在王家坪设宴欢迎。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并设宴招待。席间,毛泽东畅谈了国内外局势,对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表示庆祝,重申了我党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中的一贯政策,批评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各党派和人民的不民主制度。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毛泽东又强调了民主与统一的关系,指出:“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

毛泽东在同记者的交谈中,解释了我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关系。他说:“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的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当美联社记者史坦因问毛泽东:“你以什么权

利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时，毛泽东答：“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

以后，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应中外记者的要求，在王家坪向他们介绍了敌后战场的抗战概况。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了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业绩，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的所谓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诬蔑。

延安文化界也举行过招待中外记者的集会，出席的有吴玉章、周扬、范文澜、丁玲、艾青、柯仲平、周立波、吴伯箫、陈家康等数十人，介绍了延安文化协会的一般情况。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起至七月上旬，陕甘宁边区政府接待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去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我作为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了接待工作。接待的原则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访问，并由有关部门分别介绍情况，讲解政策，回答问题。记者们在延安参观访问了很多工厂、机关、学校，如《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央印刷厂，并就新闻业务问题进行了座谈。又参观了被服厂、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等。为了使中外记者能够更自由地提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语言上的方便，接待工作是分别进行的。方法是首先由他们书面提出问题，然后由有关部门按问题作情况介绍，并发给书面材料，同时回答记者们临时提出的问题。

六月二十六日，第一次接谈是进行综合介绍。首先由我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情况。说明红军时代开创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改变为陕甘宁特区，以后又改变为陕甘宁边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三三次会议通

过，予以正式承认，但后来他们违背诺言，不断封锁和侵袭边区。也简单地介绍了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现状。并当场发给他们《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书面材料(附件一)。这个材料是我起草，并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同意的。最后，我就记者们临时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附件二)。

会上，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向记者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他说：我们总的政策只有一个，就是抗战，一切都是为了抗战。在这个总政策下面，边区做了四件事：第一，抗战。尽管中央政府对边区施加种种压力，进行骚扰和破坏，但并不因此放弃抗战；第二，团结。在抗战中间，边区政府一贯坚持团结；第三，民主。主张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第四，生产。由于中央政府停发军饷，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抗战，边区党政军自己动手，开荒织布，发展生产。外国记者对李鼎铭的讲话很感兴趣，并提出要同他就党外人士在政府工作中是否有职有权的问题进行座谈。通过他们与李鼎铭进行自由座谈后，说李鼎铭是“有职有权的”，“他对我们的谈话是真心实意的，皮笑肉也笑了”。

以后的接谈，是由各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向中外记者介绍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情况。主要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介绍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即边区的选举制度和选举方式；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介绍了边区的行政机构；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介绍了边区的财政收支、税收、人民负担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度等问题；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介绍了边区的劳动政策和合作政策；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介绍了边区的工业、农业和私营工业的政策；教育厅厅长柳湜介绍了边区的教育制度和施教方针；边区贸易局经理叶季壮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介绍了边区的贸易活动和边币的发行、银行的金融等问题。他们的情况介绍以及回

答各种问题，基本上满足了记者们的要求。

七月十二日，参观团的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汗神甫离开延安返重庆。八月中旬，外国记者史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普金科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张潮生离开延安，到边区的绥德等地参观访问。八月二十二日在绥德由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主持，专门同绥德的士绅安文钦、刘绍庭、刘述三、张喆卿、王德安、丁子文、张敬斋、王文卿，以及霍子乐等进行座谈。有记者问过去的一个国民党员，他是否国民党员，他答：过去是，现在没有关系，对国民党印象不好。问过去的一个国民党军官，他对国民党的看法，他答：国民党不民主，政策不转变，前途暗淡。问过去国民党的又一个军官，对原驻扎在绥德地区国民党部队的看法，他答：天天找八路军磨擦，暗杀八路军公务人员等。这些回答，说明这些开明士绅明辨是非，有正义感。晚间文艺晚会上为记者们演出《打碉堡》等节目，反映演得好。

八月三十日，记者团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通过敌马坊驻点封锁线时，适值我八路军攻克该地，遂参观了作战现场，并询问了敌伪俘虏。九月中旬，进入晋西北军区八分区，参观了分区医院和兵工厂等，实地观察了我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敌战略据点——汾阳。这次夜袭中，炸毁了汾阳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了汾阳火车站、飞机场和火柴公司，火光冲天。战斗后，爱泼斯坦向指战员要了一面缴获的日本战旗，并请指战员在旗帜上题词。福尔曼到处给指战员拍照留念。在祝捷大会上，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他们离开时，用汉语向欢送的群众齐声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十月下旬，中外记者由晋西北回到延安后不久，就相率离开

延安返回重庆。爱泼斯坦在晋西北军区八分区的欢迎会上曾经说过：“我们在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地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是将所知道的告诉全世界人民。”他们回去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说了公道话，延安及解放区的许多消息很快地就传播了出去。比如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在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之后不到二十天，英国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八月三日，美国旧金山电台在《美国之呼声》的广播中，广播了美国著名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上由驻延安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自己生产自给，在中国军队中给养最好；八路军办的医院效率高，能克服各种困难，但是由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八路军很难从外面得到药品；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已经广泛地实行了民主等。八月三十一日，旧金山电台，再次广播驻延安记者的通讯，报道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情况，并说：“在延安的人们是愉快的，他们深信他们的事业是正确的。”他们在返回重庆以后，写了更多的文章和小册子，如史坦因等的《毛泽东印象记》。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如爱泼斯坦、史坦因等，后来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外国记者对解放区的友好访问及其报道，使国民党当局大为恼火，把进入解放区的大门再次堵上了。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

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但实际上，“堵门”政策已经不行了，以后解放区日益扩大，“堵门”政策遭到了完全的失败。



## 附件一：

# 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

(一九四四年六月)

一九三〇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这地方发动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创立工农抗日军。至今，已经是十五个年头了。

十五年前，这地方的景况是：军阀争夺，土匪横行，苛政如虎，烟毒遍地，民不聊生，荒凉满目。十五年来改革了多少，只要问问上了些年纪的老百姓，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的。

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率各个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会师于此，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内和平，中经西安事变，经中共斡旋，内战予以停止，和平因以告成。

一九三七年，苏区自动改为特区，旋改名陕甘宁边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积极作抗日准备，请求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直接领导。

此时，边区所辖地区为：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吴堡、神府（即神木、府谷两县各大部）、子长（即安定）、安塞、靖边、定边、志丹（即保安）、甘泉、鄜县、淳化、枸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豫旺、盐池等二十六县，面积十二万九千余平方公里，人口二百万。经蒋委员长指定与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为边区政府辖治及八路军募补区。

不幸，抗战一年后，边区即被数十万大军及西起豫旺东至黄河之重重封锁线所包围。不时遭受军事袭击，先后占去豫旺全县，镇原、宁县、正宁、梅县、淳化等五个县城，及东西南北边境大小村镇数千处，共计土地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万。

边区现只人口一百四十八万，面积九万九千平方公里。为行政实施便利计，划为一市三十县，五个分区。

延属分区，辖：延安市、延安县、甘泉县、鄜县、志丹县、安塞县、子长县、延川县、延长县、固临县，人口约三十八万。主要出产：小米、小麦、棉花、枣子、梨子、杏子、煤、铁、煤油、石膏、牛、驴。

绥德分区，辖：清涧、绥德、米脂、葭县、子洲、吴堡、神府，人口约五十六万二千。主要出产：小米、小麦、高粱、黑豆、小盐、枣子、土布、煤、大黑驴。

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人口约十二万一千。主要出产：小麦、蜂蜜、药材、木耳、铁、煤、木材。

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等六个县，人口约二十六万二千。主要出产：小麦、蜂蜜、烟叶、牛、羊、皮毛。

三边分区，辖：定边、盐池、靖边、吴起等四个县。人口约十五万五千。主要出产：糜子、荞麦、盐、皮毛、甘草、麻子、清油、牛、羊。

以上老百姓人口一百四十八万（加上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十万，则为一百五十八万）。一百四十八万人口中，分配过土地的占半数，各个分区都有部分地区未分配土地。

一九三八年，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

(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一九三九年，第一届参议会召集。

一九四〇年，准备实行三三制。一九四一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五一施政纲领，并举行三三制普选。各级参议会，常驻委员会与政府委员会，即边区政权的权力机关，共产党人约束自己只占三分之一，让其他三分之二，属于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中赞成抗日与民主的非共产党人士。共产党责成自己的党员选举他们，并宣传群众选举他们；选举结果，遇有共产党人超过三分之一时，大多以辞职办法退至三分之一(边区参议会会议中，共产党人仍超过三分之一)。

一九四一年冬，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集，通过边区施政纲领，保障人权财权条例，选举议长和常驻议员，选举边区政府主席和委员。

共产党的原则，是让非共产党人士在政权机关中有职有权，共产党人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许包办和一意孤行。

但政府机关的一般职员中，共产党人尚占多数，主要原则在于战争环境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经过相当时间，可以逐渐改变过来。

边区民主制度是由下而上，少数服从多数与下级服从上级的人民大众的民主集中制。参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闭幕期间则所选出之政府为最高行政机关，对参议会负责以行使其职权；县、乡两级政府则同时对同级参议会与上级政府负责。边区司法机关，亦在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行使其职务。所以边区政制是立法、司法、行政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请参看政纪总则)，但某些具体制度未臻完善，尚在实验和研究中。

去年(一九四三年)，边区、县两级只开了议会常驻会与政府

委员会。上半年生产忙，下半年边区环境吃紧，参议会大会未能召开，开了劳动英雄大会。今年，边区、县两级参议会大会都要开。至于乡参议会，去年开了多次，比前年更为活跃，多采“一揽子”形式。“一揽子”会是适合三三制民主的最好形式，不但乡级要普及，县以上也要适当的采用。

边区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是新民主主义，亦即革命的三民主义，其政纲是在此最高原则下的边区施政纲领。它的基本原则与抗战建国纲领也是相符合的。在此纲领基础上，边区为适应环境与人民的需要，制定了许多地方现行法令，均经边区参议会或其常驻委员会通过。民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包括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三三制与民主集中制；民族平等与男女平等；直接民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信仰之自由，武装抗日之自由，民众团体在组织上之独立性；“一揽子”会形式；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模范家庭与模范村、乡；批评与自我批评，下级人员对上级有控告与越级控告之权，等等。我们的口号是一切为人民，依靠人民；我们的方法是从人民从实际中集中起来，又回到人民与实际中去。

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同时，又处于河防前线。边区建设的首要目的和边区人民的第一个口号，是一切为了抗战，为了前线的胜利。十四万五千三百余壮丁组织在人民自卫军之内，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有各种形式的武装；百分之十五为基于自卫军。普通自卫军一般担任后方勤务，基于自卫军则用以配合正规军作战（东线一部分多次参加过保卫河防的战斗），必要时动员他们补充正规军（前后动员了七千以上）。除此，则为前线部队安置了一万一千五百余个伤病退伍人员，优待抗属七万九千七百七十七人，其中为之代耕者一万七千五百六十九人，代耕土地五万一千七百九十六亩。其次则为粮草动员，保证了军队供给；归

队运动，以巩固部队。

增强与提高抗战武装力量方面，我们的努力放在：第一，整训正规部队，准备反攻；第二，整训民兵，巩固后方；第三，动员人民拥护军队（帮助部队发展生产、后方勤务与动员归队），军队则实行拥政爱民，以巩固军民团结；第四，优待军人家属，今年更提出为他们建立家业的方针；第五，优待残废军人和退伍军人，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去年以来，所有这些工作都大有进步。

社会政策方面，在土地未分配区域，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土地已经分配区域，欢迎土地革命时期逃亡的地主回乡，分给以耕种必需的土地与窑房；改善工人生活，实行劳动保险、社会保险，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发展工商业；实行十小时工作制，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使贫苦人民免粮免税，实行地方救济，推广义仓运动；提倡男耕女织，做到丰衣足食。

司法方面，近年来确定以调解为主（民事全可调解。刑事除汉奸反革命罪外，亦可调解；民间调解，区乡政府与县府一科调解，司法机关先调解后审判）、审判为辅的方针；提倡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马锡五方式）；废止肉刑与无期徒刑，死刑取慎重态度（须经边区政府主席批准）；人民检查与保安机关检查并行；监狱政策教育与生产并重；监狱感化与民间改造（假释、保释、缓刑）结合。

防奸方面，采取宽大政策，不杀一个，争取大多数，不轻易送法庭判罪。总路线是：领导与群众结合、保安机关与其他机关配合；总方法是群众性坦白运动与领导机关分别是非轻重相结合；甄别原则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不重口供。

民主政治的当前中心任务，是抗战、生产与教育；而生产与教育，又首先是为了坚持抗战与准备反攻。

前年以来，我们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以适应抗战需要与战时环境。政权方面，曾三度实行简政，其目的在求精简（克服机关庞大，业务不集中的现象）、统一（克服命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现象）、效能（提高工作效能）、节约（克服浪费现象）与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于发展生产，为抗日战争增加物质力量，为文化教育奠定经济基础。

发展经济是支持抗战与普及文化教育的关键。我们接受下来的历史遗产，是地广人稀，落后的经济与贫困的人民。而我们的遭遇，是文钱颗弹，样样不发，军事经济，重重封锁。我们要生存，要抗战，就不得不自力更生，集中力量于发展生产。我们设立银行，发行边币，也就是在饷源断绝后，为了生存，为了发展生产以支持抗战而被迫采取的措施。

农业第一，首先解决吃的问题。去年有大进步，收获细粮一百八十四万石，部分农民已有余粮，个别部队已能大部自给。今年提出“耕三余一，两年完成”的方针。我们的办法是：奖励开荒（公荒地权为开荒人所有，去年已开百万亩，今年再开百万亩），提倡深耕细作（这方面还差）；军队实行屯垦政策，以建立革命家务（今年计划产细粮十万石）；农民实行变工政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去年百分之二十七的劳动力已组织起来，今年计划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优待移民难民（政府与人民的帮助，三年不交公粮，去年争取劳动力八千八百多个）；改造二流子（去年改造四千五百多个）；鼓励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以增加劳动力；发放农贷（去年二千七百万，今年一千万），以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等困难；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生产的热忱，技术与组织性。

主要农业副业有三：一为植棉，东三县（延长、延川、固临）原为植棉区，曾经中断，七年之间已恢复并扩大到其他县份，至去年已有十五万亩。估计收花二百万斤，今年继续推广，并在其

他分区试种，面积将近三十万亩。如天气好，收到四百五十万斤，就够自给；但幼苗已冻死四分之一，今年很难全部自给。推广植棉的办法，是贷款，免税(三年)，技术指导。二为食盐产运，逐年有增加。去年产五十三万驮，内外运销约三十五万驮(北大池入口盐在内)。在我们手工业与毛驴运输的条件下，这是一件很困难的组织工作。盐池附近，要及时组织男女老幼抢打盐，长脚运输需要二万七千头牲口(平均年运十三次)，而后者是靠运输合作与放青时大量动员解决的。三为畜牧业，也逐年有发展，去年有牛二十一万四千多头，羊一百九十二万三千多只，骡、驴十六万九千多头。但牛羊死亡率甚大，我们还没有使农户都学会牲畜的饲养，防疫与治疗。

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不只有一大块荒地，而且是遍地童山。开荒容易植树难，既无经验，又缺水利，故成绩小。但我们决心改造，务使每家都能植树，并将成为今年参议会的议题。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自愿为原则，培养大批劳动英雄为骨干的多种多样的合作方式，用它来将个体的、分散的、落后的农村经济逐渐组织起来，这是去年以来农业及其副业生产大踏步发展的关键。十万农业劳动力组织在变工队和札工队里，将近二十万人组织在消费的、运输的、生产的和信用的合作社里，十三万七千多妇女组织在纺线组里，这就是边区农村生活的新面貌、新样式。由此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率，发展了生产，出现了丰衣足食，出现了模范家庭、模范村以至于模范乡。

我们的部队是战斗军又是生产劳动军，我们的机关、学校也普遍的从事生产，以农业为主的公家生产，以手工业为主的个人生产。去年，个别部队已做到连粮食在内大部自给，其他部队除粮食外大部自给，今年粮食部分自给，明年将全部自给。这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军队。去年，机关学校除粮食外，自给小部分，今

年将半自给或大部自给，明年粮食也可能部分自给。这样，就减轻了人民负担。农业税，去年征公粮十八万石，与同年产量总额比，为百分之十，单就纳税人计算，则为百分之十二（因百分之二十的贫苦人民免税），加上公盐及地方教育、救济等附加，亦不过百分之十四。今年产量增高，征粮减少二万石，征税与产量的比例，将降低至百分之十。至于商业税，则平均只占纯利百分之十三。另一方面，又建立了抗战家务，公私兼顾，先公后私的原则，使每个部队每个机关有一个家务，而每个战斗员和每个工作人员也有一份由合作社组织起来的家务。

农业生产，我们已能自给，就全边区说，还有剩余。为了备荒，为了准备反攻，要争取储一年粮。但工业品，迄今为止，大部分靠输入，靠用土产换入（食盐为大宗，其次为油类，粮食、牲畜、皮毛、药材等）。由于封锁严，土产不能大量出口，军工器材根本不能入口，药品医具也不能入口，必需品和优质成品难以入口，非必需品和劣质成品却大量入口。另一方面，就是土产出口品价格低，进口品价格高，造成严重不等价交换（食盐利润率，延安盐业公司百分之九，洛川官盐店百分之十七点二。柳林与耀县相距五十里，去年十二月，入口棉花，耀县每百斤法币六千九百六十元，柳林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元，相差五千二百二十元。出口食盐，柳林每百斤二千八百元，耀县三千零三十元，相差二百三十元）。这就是边区外来货物高涨、贸易入超（去年几达百分之二十，计法币一万五千多万元），从而发生财政赤字、金融不稳的根本原因（特别是去年秋冬之季）。其次，就是我们还不会经营。因此。今天边区经济自给的关键问题在于发展工业。

一九三五年我们仅有一个四十余个工人的修械所。抗战前，加上被服、印刷等工厂，也不过二百七十余职工。一九三九年已有七百多人。一九四二年冬，增长至七千。现在公私企业和生产



合作社一起计算，已有一万二千职工（小手工业工人及零工雇农不在内）。可见边区工业是在发展中。发展的特征是：大家动手，自给为主；分散经营（集中领导），手工业为主（落后条件）；公私兼顾，军民结合（政府对私营企业和生产合作社，同样用投资、订货等办法予以支持）。

政府和机关部队经营的工业，一般是为了自给目的。现有纺织、被服、陶瓷、玻璃、肥皂、火柴、造纸、印刷、制革、煤矿、煤油、炼铁、化学、机器制造与兵工等业。中心环节是纺纱与织布，铁炼与制造。前者，解决最大量需要；后者为工业发展的基础。今年工厂代表会议提出为全面自给奋斗的方针。

公营工厂的管理原则是公私兼顾，先公后私，一方面要求工人以新的态度从事生产，又方面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去年平均工资为八石（每石三百斤）小米，今年新工资标准将续有提高；此外，部分的实行正业合作，一般地实行副业合作，以解决劳动保险与社会保险，为工人建立家务。

我们的缺点，是质量差，成本贵，不会经营。我们的困难是原料分散，交通不便，资金不足，技术与技术人员缺乏。

最后谈谈文化教育。革命前，除绥德分区外，大都是文化十分落后地区。内战时期，我们就已经注意文化教育工作，办学校，搞识字班，但受战争环境所限制。抗战后，学校数量有相当发展，小学校曾一度增至一千三百四十一所，学生四万一千四百五十六人，中等学校五所。前年冬季以来，鉴于各级学校教育内容多脱离实际与人民之需要，小学校又因此多采强迫动员办法，人民不满意，学校极不稳定，乃一面实行精简合并，一面进行整顿改造。现在有大学一（延大），是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高级干部学校。中等学校五，以为边区建设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为主要目的。大学和中等学校制度、课程、教材均在改造

中。现有普小七百五十二所，完小五十五所。普通小学教育，开始为农民办形式，教育内容从人民今天的需要出发，学制、课程按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决定，不求一律。如此办法，甚受人民欢迎。完小毕业生，拟定小部分直接升学，大部分进入经济、卫生战线，经过一时期工作再升学。因为边区人民还是文盲占绝大多数，除学校教育外，还采取各种方式进行识字运动，今年冬季拟举行全边区有传统性的为人民欢迎的冬学运动，每乡至少一个冬学，已在准备中。消灭文盲，人识千字，将为下届参议会的议程。

文化教育的另一方面，就是人民的文化娱乐与卫生习惯。前者，如秧歌之类，已大为普及，但仍是季节性的。后者则迄今还是个严重问题。民间疾病甚多，婴儿死亡率极大，多的至百分之五十以上。现动员一部分医务人员下乡工作，并在延市、延县试办中西医合璧的卫生合作社，取得经验，以资推广。正着手大批训练助产人员与民间卫生工作人员，准备在区、乡建立医务所。严重的困难是药品医具缺乏。

现在，边区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提高，文化教育已有物质基础。拟于三年至五年之内，做到消灭文盲，人人能读群众报，消灭不卫生现象，每个乡每个市镇有一个医务所的设备。那时，边区人民不但是政治上觉悟的，经济上丰衣足食的，同时也是享有文化生活的。

上面这些，就是边区建设的轮廓，我们确有成绩，还会继续发展与进步。但由于知识不足与经验不足，也由于内部与外部条件限制，工作中难免有缺点，甚至有错误。欢迎记者参观团诸位实地考察，给以指教和帮助。

## 附件二：

### 罗迈秘书长的谈话

今天时间已不早，还有一点钟工夫，只谈几个一般的问题。属于各厅的具体问题，分别交谈，如何？（外国记者：就这样办。）我要答复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今天口头提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书面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原则上在我交给各位的《简述》上都已提到了，现在再来解释一下。

边区这地方，原来由军委会划给二十六个县，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同时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当时没有明文公布。到以后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骗局，以便不实行诺言。详细情形周恩来同志清楚，都是他经手的。因为是一个骗局，虽然承认了，但不实行诺言，以后我们屡次提出，他们都不能否认。

这件事及其他许多事实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对国民党的许多诺言再也不敢随便相信了。

这件事是很痛心的，我们是很愤慨的。不仅如此，他们还要军事袭击。这种材料很多，诸位想要可以给。（回答：想要！）

中国记者提出，边区制度是永久的还是临时的；如果是临时的，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取消，以便符合政令之统一？我们正式答复他们：边区的民主制度，人民创造的制度，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是永久的，不能改变的。如果说“边区”这个名称将来是不是可以改变，那末我们答复：如果全国将来都真正实行了民主，“边区”

的名义还要不要，是可以由全国人民来决定的。今天，在全国还未实行民主以前，边区的行政区不允许有任何的改变。为什么？因为第一，国民党当局承认过；第二，边区人民不允许失去既得的权利，不允许边区有这样的改变。不仅边区人民不允许，边区附近的人民也不允许。我手边有这样的材料，边区附近的人民自己取下他们的门牌，要求加入到边区来（外国记者要材料），材料可以给，但有一点声明，假使随便公开，这些老百姓就会没有生命了（史坦因：只要乡村的名称，不要人名）。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如果弄清了，很多问题就可由此得到答复。

国民党当局有人说，因为边区自己发行了票子，所以停发了军饷。事实怎样呢？是国民政府停发军饷，为了生存，为了抗战，我们才发行边币（史坦因：当我们没有离开重庆前，有人说：边区三八、三九年就有票子的）。那时发的是光华代价券，面额最大七毛五分（问：上面说的是停发军饷，政府经费什么时候停发的呢？答：从来没有发过政府经费）。总之，国民党当局为要反对边区，什么谣都可以造出来，各位先生既到边区，很多事情都可以调查清楚（史坦因：外面政府是这样说的：“八路军在政府停发军饷前就发行了边币，四〇年以前就发行的。八路军自己用边币，将政府给的钱用到外面去做宣传工作。”并且还拿出边币来，票额有一元到十元的，后来还有五十元票）。边币发出后，总要在群众中流通的，说四〇年前就发边币，假使能找得出来，他的话是对的；否则，又是一个骗局。

（南汉宸：当时发的是光华代价券，因为一毛、五毛的辅币不够。原来我们边区通用的都是法币，但法币的票额至少一元，又没有辅币。最初是用邮票当辅币来补辅币的不足，但邮票不是辅币，数量也少，后来只能出一种代替物，就叫代价券。这种过去曾经用过的代价券三八、三九年就有，陈列室内都有，明天可

以看一下。**高自立**：当时林伯渠主席在西安，请调零票，调不到；好几次请发，不发。只得自己印代价券。**问**：一九三八年代价券发多少？**高答**：一千元。**夏神甫问**：当时要求国民政府，如何要求？）

我们要求国民政府承认边区民主政府，而他们认为边区政府是奸政府、伪政府。所有问题都要从这一问题出发了解，这个问题不明白，什么问题都谈不到。我想国民党当局有一个权利问我们：边区是不是执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如果我们执行了三民主义，那么我们也有权利问他们：为什么不承认？我们执行了三民主义他又不承认边区，请问我们如何办？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还要抗战，要生存，我们要不要想些合理的办法？

**（南汉宸**：说我们在停发军饷前就有边币，请看事实：我们发行是在四一年皖南事变后，这是有案可查的，停用法币是一月二十八日，我们二月十八日才发出布告与发出边币。他们的停发军饷实际上在四〇年九月间就开始，十、十一、十二各月都没有发。十二月后半月我到西安去交涉，程潜〔当时是蒋介石的西安行营主任〕说：“以后还发。”一月间皖南事变发生，就正式不发了。一切事实俱在，完全可以证明国民党这话是造谣。**史坦因**：不发八路军军饷的确实日子？**答**：可以调查一下。）

边区政府边区人民所做的事情都是合乎三民主义，合乎抗战建国纲领的，国民党却相反。我们要继续抗战，继续生存，因之我们不能承认他们的许多反民主、反人民的办法，如果照他们的意旨办事，就要亡国。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再一问题：如果今天在边区恢复国民党，要什么条件？国民党过去在边区本来有的，本来没有什么条件。但三九年后，他们抢去了我们的好几个县城，所以四〇年留守兵团才致电西安行

营，要求撤退，因为这些党部里应外合。今天如要恢复，就是一个条件：我们在西安、重庆等地也可建立共产党党部，象他们在这里也可建立党部一样。（问：留守兵团请他们撤退的日期？答：可以查一查。）由此可见，我们总是愿意同国民党搞好的。一向总想团结抗日。但当它做坏事的时候，就不允许照它的办，因为那样就会亡国。（问：国民党说，“国民党允许《新华日报》在重庆出版，但边区不允许有国民党的报纸。”答：《新华日报》存在于重庆，前两天一位外国朋友说得很对。……《新华日报》在那边有多少自由，你们都是知道的。过去我没有听说过国民党想在这里办报；今后如何，是整个边区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但就是过去，国民党党部还在时，虽然没有铅印报，油印报是有过的，可以自由贴出去。高自立：报名《新肤施》，记得还登过一篇叫《日本天皇被杀了》的文章。）

再一问题：我们教科书中有没有批评国民党的地方？去年下半年国民党要进攻边区，教科书内有了批评国民党的地方，以前没有。批评是批评它的反动政策，而不是一般的批评国民党。这种批评是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的，是暂时的。

关于宗教问题：对宗教信仰，我们这里是自由的。信仰或不信仰，在我们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作为一个宗教的团体，宗教的财产，可以享受人权、财权的保障。

关于土地政策：我们现在的土地政策就是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过去进行过没收土地的政策。这中间有没有矛盾呢？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土地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可以用两种方式解决：一是和平的，一是暴力的。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一九二六、二七年时，国共合作，那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都一致主张用减租办法解决土地问题，所以有二五减租的决定。如果那时真正实行了二五减租，那么土地问题

的解决就会与今天边区所解决的办法一样。因为今天我们所实行的减租还是和二五减租一样。可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当局对人民的减租要求，采取了用刀枪残杀的政策，因此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采取暴力的方法没收土地。历史走的道路是违反我们的愿望的。抗战后我们又有了这样一个可能：在广大地区实行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我们现在的减租政策，已经收到了大的效果。照我们经验看，只要在民主的政府下，是可以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拿边区说，有些地主在减租以后，已经开始自己劳动，有的雇用雇农来经营农业，有的转向于办合作社，有的转向于办工厂。这次合作社会议中就有一个数百垧土地的大地主，现在转办合作社了。诸位如果愿意同他谈话，我们可以介绍。我们相信在民主政权下可以帮助地主改变他的经济地位，政府帮助鼓励他向这方向转变。（问：李鼎铭是不是大地主？答：地主在政府委员、在参议员中都有。）我们相信，在民主政权下和平解决土地问题是可能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减租政策抗战后还是要执行下去的。

关于边区公私经济的关系：我想只讲一讲原则，具体情形将来各位可找建设厅长谈。边区经济大致可分三种形式，就是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这三种形式无论在工业、农业、商业上都有。公营经济是公家经营的，是为了解决自己需要；私营经济是个人经营的经济；合作经济，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人民联合起来经营。三种经济在边区都是自由发展的。私营经济与合作经济是人民自愿来办的，都没有任何限制，同时政府对这两种经济都是扶持的。

关于宽大政策：宽大政策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因为敌人深入国土，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方，搞了许多汉奸、敌探、伪组织；同时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政治不良，也训练了很多特务来破坏进步力量，所以汉奸、敌探、特务在中国特别多。这已经是

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采取的政策，主要是感化、争取。这种感化争取政策，和对俘虏同样。我们对汉奸、特务，破获后不杀，目的在于感化、争取他，化反革命为革命。各位可以问：假使他顽固到底，不感化，怎么办？我们的办法就是八个字：自己动手，生产自给。我们实行这个政策有效果没有？我们不杀他，他们解除了武装，现在都在很好工作了。所以许多汉奸、特务被破获后，如经改悔，就不再送法院了。假使他顽固，送法院，我们还是不杀。这一办法使国民党当局很失望，因为严重的瓦解了他的特务政策。

关于什么是群众观点？群众观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群众路线。所谓群众路线，或群众观点，在我们这里是一种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因为是一种工作方法，所以大家都要有。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自主席到乡长，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先做学生，后做教师。因为群众中有很多创造，只要我们将他的进步方面拿起来，就变成了我们的领导方法了。例如现在有两种很重要的政策，一种是变工队，一种是民办小学，原来都是老百姓中有的，我们将它发扬就是了。另一方面，我们领导上要做个什么决定时，都必须首先根据群众的需要及其意志，因为我们是老百姓的政府。根据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决定下来，然后拿到老百姓中去执行。所谓群众观点，用另外一句话来说，就是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中去。

还有一个问题：老百姓向政府提意见，要不要写请愿书？没有任何形式。老百姓有意见，随便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口头、书面都可以提出来。政府纪律上有一条：如果老百姓要告县长，可以将状子交给县长转到边区政府来。不转的话，县长要受严厉处罚。此外，老百姓还可越级控告。

再一问题：厅长是怎样产生的？厅长不是直接由参议会选举



的，是由政府委员会选举的。现有的四个正厅长、二个副厅长，都是参议会选举出来的政府委员。政务会议即政府的例会，是按时开的，每礼拜一次。

我们对盟国在延安设立常驻通讯社、常驻记者是非常欢迎的。因为象爱泼斯坦先生在长官部所说的：“边区的门曾经被长期关闭着。”自然不是我们这方面愿意关闭。如果你们能常驻此地，门就会关不住了。那时边区许多问题，大家就可以亲自看到，大家就可知道我们是如何说如何做的。大家还可帮助我们做，这样多好。

你们要自带翻译，只要你们信任的，我们当然是尊重的。

关于检查制度，因为过去还不曾有过这种事实，所以还没有具体地考虑过。

关于金元与边币兑率问题：过去不曾有过这种事实，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绝不使大家吃亏。（大笑）

## 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在晋西北黑茶山飞机失事遇难。“四八”惨案发生后的某一天，接到中央秘书长任弼时通知：中央决定要我即赴重庆，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我于四月十八日到了重庆，参加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直至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返回延安，历时七个月。国共谈判虽因蒋介石决意召开非法国大而破裂，但这样便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人民意志、妄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反动面目；同时，共产党坚持和平、坚持民主的正义立场也更加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而争取了朋友，争取了人心，取得了重大的政治胜利。时隔三十七年，重温这一段历史，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和我党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矛盾得以解决。国内阶级矛盾，即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的矛盾，突出为主要矛盾。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其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立场，丧失了大片国土，龟缩在西

南、西北。在其统治下的大后方，政治腐败，民生凋敝。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建立了许多敌后解放区和根据地。日本投降时，解放区共有一亿人口，一百万八路军、新四军，二百万民兵。

抗战结束，蒋介石为了抢夺应该属于人民的胜利果实，“下山摘桃”。他一面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和武器装备，急于抢占东北、华北；一面勾结敌伪，命其继续抗拒八路军、新四军，积极准备发动内战。

经历了八年抗战流离困苦的广大人民，强烈反对内战，迫切希望和平建设，重整家园。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国际舆论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当时的美国，虽然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反对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一致立场，但鉴于国民党的腐败和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怕打下去国民党会垮台，失去美国在华利益，并使美国在国际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便以调解为幌子，插手中国内政。它企图以政治手法，即促使蒋介石实行吸收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力量，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政府的政策，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进步力量如宋庆龄、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德全、柳亚子、谭平山、王昆仑以及主和人士如于右任、张治中、邵力子等，赞成同我党实行和平谈判。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运兵部署需要时间，这些因素使得蒋介石采取了假和谈、真备战的两面手法。

至于我党的方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即指出：在打败日本以后，中国仍有两个命运、两个前途，“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我们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力争第一个前途，反对后一个前途。”抗战胜利后，我党

又发表了《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是早有高度警惕的。毛泽东同志曾及时指出：“虽然我党坚持反对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蒋介石对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 (二)重 庆 谈 判

一九四五年八月蒋介石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想通过谈判达到三个目的：一是欺骗人民；二是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三是签定一个有利于他的条文，套住我们。他还开动宣传机器，造谣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民主，澄清蒋介石对我党的谣言诽谤，揭露他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通知中估计：国民党“在国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争取好的，准备坏的，这是毛泽东历来的思想。我们的谈判方针是：“在谈判中准备作出某些不损害人民利益为前提的让步。以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及和平局面。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陷入被动，我们就有理由反击。”通知中并告诫全党，绝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去重庆，中央是经过反复考虑才作出这一重大决策

的。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去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我当时也是担心他安全的。但是周恩来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主张毛泽东去，因为这样可以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成果，并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我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打破蒋介石的谰言。关于安全问题，周恩来估计了在我们有强大的力量作后盾和美方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不敢随便动手，同时也作了必要的部署。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期间，他一直伴随在毛泽东身边，亲自掌握保卫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在张治中、赫尔利（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的陪同下，毛泽东到了重庆。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然而，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即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编纂的《剿匪手册》。九月十七日，蒋介石又亲自密令送发《手册》，要他的部下“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其迟滞贻误者必当执法以罪。”谈判期间，双方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九月间，国民党阎锡山部纠集了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进攻晋东南解放区，但在十月间被我英勇的军民击退了。

在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终于签定了。在协定中，国民党不得不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承认中共及一切党派平等合法地位的主张。我党也主动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承认为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并让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协定中还规定了“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按：我党原来提出的是召开各党

派政治会议。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名称，是根据国民党王世杰的拟议商定的。)

没有达成协议的有：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旧代表重选问题，双方军队整编问题。前二者留待政治协商会议解决。第三个问题，双方同意组织包括美方代表在内的三人小组解决。

《双十协定》，受到了各方面的欢迎。它在政治上使我党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为遵守协定，我驻江南新四军，包括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部队，开始撤往长江以北。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和平诚意，仍然加紧内战部署，向我进攻。战火日烈，我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人士频频呼吁，反对内战的呼声弥漫全国。国际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处”。十二月二十七日，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也发表声明，认为：“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而且必须停止内战。”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指出：“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战问题”，“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团再次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声明。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定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停战令要求双方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保持双方在一月十三日以前的军事位置。同时成立了国共及美方代表参加的三人军事小组，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在毛泽东签署的停战令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我党明确提出：“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经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

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平、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问题，这是党中央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提出的一种估计。我党当时同国民党的斗争，在当时阶级力量对比的条件下，确是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上策，同时对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妄图用武力消灭我们，我们也是有准备的。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结果，是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彻底崩溃。我认为，这不能反证说上述估计是错误的，更不能说这是刘少奇的个人杜撰。

### (三) 旧政治协商会议

旧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旧政协)，于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的同一天开幕。参加会议的，共有五个方面的代表：

一、中国国民党(名为政府代表)：

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三、中国民主同盟：

张澜，罗隆基、张君勱、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四、中国青年党：

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惠。

五、社会贤达：

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

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分设五个小组：（一）改组政府组；（二）施政纲领组；（三）军事组；（四）国民大会组；（五）宪法草案组。

旧政协会议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斗争的焦点主要是两个：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我党的主张是：（1）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但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2）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制定和平建国纲领，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联合政府成立后，重新制定宪法草案，重选国大代表，召开国民大会；（4）实行地方自治；（5）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扩大政府”、“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等几个方案。他们对和平建国纲领实际上持反对态度，主张用他们原来的抗战建国方案。“扩大政府”的意图是吸收几个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来装点门面，并非改组为联合政府；“五·五宪草”是国民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公布的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旧宪草；国民大会的代表则是十年前人民处于毫无权利、极不自由的情况下由国民党一党包办产生的，其中不少人已经投敌当了汉奸。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国民党强调“军令政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目的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化”掉，从而消灭共产党。我党的主张是：实行军队国家化，首先必须实行国家民主化，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且必须实行军队民主化，即军队一致、官兵一致。如果成立了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解放区军队就应交给它，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这一主张无疑是公正的，合理的。

从一月十日到三十一日，经过激烈的斗争，参加会议的各方共同签署了五项决议，即（一）政府组织案；（二）国民大会案；



(三)和平建国纲领；(四)军事问题案；(五)宪法草案案，统称为政协决议。

在达成这五项决议的过程中，我方是作了很大的让步的。比如在改组政府问题上，我方同意国民党在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中占一半即二十个名额，只要求中共加民盟有三分之一名额以保证在必要时的否决权，这是国民党口头上同意了。我党并说服民盟，承认旧国大代表有效，另增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台湾省和东北几省代表一百五十名，要求中共和民盟的代表占总名额数的四分之一，这也是国民党同意了。特别是整编军队问题，我方同意了三人小组拟定的整军方案，即国民党与我方按五比一的比例整编，这将使人民武装力量受到限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也使我军在政治上得到美蒋的承认，同时在和平建国纲领中规定了地方自治权。实行地方自治则可保有人民的地方武装，如果国民党不按政协决议办事，我们仍然可以保存实力和他们抗争。

一个停战协定，一个政协决议，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总的看来对人民是有利的。两个协议的墨迹未干，就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撕毁，这当然是件坏事，但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在政治上输了理，广大群众就看清了它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败其进攻。因此，以后的斗争就是破坏协议与反破坏协议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我们则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

#### (四)第三方面的表现

旧政协会议，在国共两大力量外，还有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统称为“第三方面”。他们当中少数人是左派，多数人代表

着中国中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是中间派，他们要求和平、民主、自由，反独裁，反内战，在这个重要方面同我们是一致的，是主流。至于青年党、社会贤达的一部分和民社党（组成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则是倾向或依附于国民党的，是右派。

政协会议期间，我方对第三方面，特别是民盟，做了许多工作，双方合作得很好。民盟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是我党提出来的。政协开会前，国民党唆使青年党（原为民盟中的三党三派之一）无理要求在民盟的九个代表名额中占五名，给民盟制造困难，也是我党提出方案即让青年党单独作为一个方面参加政协占五个名额，民盟占九个名额不变，而由我党减少两名，国民党减少一名，在总名额中增加两名，使问题得以解决。以后在国府委员、国大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我们也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会议期间，我方同民盟曾有君子协定，即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以便互相配合。罗隆基在他关于旧政协的回忆文章中就专门谈到他同王若飞在政治小组中的合作情况，他对此是很感动的。后来在王若飞的追悼会上，他又表示了为争取一部民主的宪法决不让步的决心。虽然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斗争中对美国一直抱有幻想，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以壮大第三方面的力量，但总的说表现是好的。对其他第三方面的人士，我方也做了许多工作，往往是白天开会，晚上再到特园（民盟发起人之一鲜英的公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一九四一年起成为我党对外召开会议、与民主人士会见的场所之一。）碰头，互相交换情况和意见。即使对青年党，我党也不采取排斥的态度，仍把它作为第三方面的一部分与之交往，一方面对其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心中有数，一方面又采取积极争取的方针，直到它最后宣布参加伪国大，公开暴露其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真实面目为止。这是我们对青年党以及同青年党具有相同立场的人们十分灵活的政治斗争策略。

还有几个代表中间势力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当时未能参加政协会议。他们都很关心会议的召开，在会外积极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国民党内部的民主进步力量也以个人或组织（如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积极配合，做了许多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 （五）中央派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

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王若飞、秦邦宪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在飞返延安途中不幸遇难，即“四八惨案”。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邓发是出席国际工会会议刚回国，准备回延安的。黄齐生是党外人士，他原先在延安，因为认识一些国民党人，想到重庆做点工作，一看没什么可干的事又回来了。叶挺是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接到毛泽东贺电，带着夫人和孩子到延安来的。四月八日那天，阴云密布，边区参议会正在开会，休息时，我和一些同志在会场外散步，听到上空有飞机盘旋的声音，不见下来。次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县查问飞机下落，不得。过两天，知道飞机因不能降落，飞往北平，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失事。“四·八”烈士遇难，延安、重庆都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写了一幅挽联：“惨剧何来，把血债记在反动派身上；民主必胜，愿英灵安息人民大众中”。

当时旧政协谈判正紧张，中央决定我去补代若飞、邦宪的工作。四月十八日，烈士遗骸运至延安机场，我去一一致敬，十九日即乘送李培之等回延的飞机去重庆了。到重庆后，环境、工作、生活都是突变。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都有丰富的同国民党谈判的经验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对我来说，这既是一次严肃的任

务，又是一个很好的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我到重庆时，正值宪草“起草小组”开会期间。其实并非起草，只是将国民党一九三六年订的“五·五宪草”与张君勱在政协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草案比照研究，提出问题与意见而已。这之前，是由秦邦宪和齐燕铭参加这项工作的。我参加了“起草小组”的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云五、邵力子、张君勱等人。我方对宪草修改问题，原先有一个草稿，是秦邦宪起草的，因为他牺牲了，我也刚去，未暇多加研究，因此，我即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凡对于宪草修改小组会上的一切意见，我方均予保留。

还在政协会议期间，政协各方代表就达成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决议》，同意保持原“五·五宪草”中的“五院制”，并一致决议：（一）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其职权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二）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立法院可以否决行政院的措施；（三）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与监察权；（四）省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得制定省宪。政协会后，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竟整个地推翻了以上决议。国民党反动派胡说上述协议违反了孙中山的遗教，提出：（一）必须坚持以“五·五宪草”为宪草修改蓝本；（二）立法院不应对行政院有同意和不信任权；（三）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与弹劾权；（四）省不能制定省宪。这就是说仍然要原封不动地保留“五·五宪草”。“五·五宪草”的实质是：中央集权、总统独裁，人民自由权利被剥夺，民族自治权利被取消，是一部保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御用宪法。

综观宪草一案的斗争，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这个问题由于国民党一方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一项，坚持不让，一开始即成僵局。二是地方有无自治权问题，

国民党要中央集权，我们要地方分权。中央集权实际上是要否定我们的解放区，这是关系到保护我们根据地的大问题，是不能让步的。到了四月二十一日，孙科又召集了一次宪草小组会，我被邀参加，争执一场仍无结果。我在重庆二十七天，有十天工夫花在研究宪草问题上，到南京后，也用了不少时间研究宪法，但是，由于国民党整个地破坏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宪草修改一事终成泡影。

我在重庆期间，董必武陪我到各处进行礼节性的走访，因为我刚从边区来，需要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圣地、民主堡垒，许多人很向往，很关心，很想知道边区的情况。当时陶行知等办了一所社会大学，对象有中小学教员，小公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工商从业人员，失业青年，在校学生。邓发、张友渔、章汉夫、潘梓年、华岗、许涤新、孙起孟、于刚等许多同志都在那里讲过课。这所学校的学生，后来有不少成为西南地区的干部。社会大学要我去讲讲边区的情况，我去讲了两次，内容是介绍边区抗战、土改、“三三制”政权建设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听了很感兴趣。此外，我还参观了育才学校（陶行知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创办的一所学校，曾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战士）。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党“还都”南京。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于五月三日先行到了南京，我和董必武后走，包了一架飞机，机上有我们一批干部刘宁一、张晓梅、陈家康等二三十人，民盟派往南京打前站的叶笃义也搭机同行。飞机起落两次都没有飞成，一检查，发现飞机有严重故障。我们曾登报声明，向国民政府表示抗议，后来分乘班机到达南京。这次飞机事故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只有邵力子一个人来看我们。邵力子先生对我们的态度较好，每当谈判遇到危机的时候，他都要来和我们谈一谈。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分别负责外事、军事、新闻、统战、妇女运动等工作。齐燕铭是代表团的秘书长，钱之光是代表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是副主任。梅园新村三十号楼上，是代表团的机要科。这是三间低矮、狭窄的小阁楼，平时就气闷难受，到了盛夏，简直象个大蒸笼。机要人员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不分昼夜地紧张工作。平时，在我住的办公室，经常有许多客人，每当一来人，对面三十一号楼住的国民党特务就出来监视，我们不管，照样谈我们的。

到南京，我们就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第一件事是与国民党交涉给我们出版报纸的合法权利。我们找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彭学沛，彭便推给内务部长张厉生，找到张厉生，他又推给彭，他们互相推诿，表面上恭恭敬敬，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实际上就是要扼杀我们报纸的出版。我们连印刷机器都已买好放在上海了，可就是不让出版。这样，新闻组的同志便根据谈判斗争情况，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稿，以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编写和油印出版《新华社通讯稿》，分送到各党派、各报社和文化新闻机构。我在代表团，起初主要研究宪法，以备国民党倘能停战，则可将宪草一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陆定一于六月初随恩来回延安后（恩来三天后就回来了，定一留在延安），我又代管宣传工作。廖承志也是搞宣传工作的，还有范长江、梅益等同志。这时期我曾主编《群众》杂志，杂志的稿子是在南京编好，送到上海由章汉夫、潘梓年、乔冠华等同志负责印刷和出版的。

## （六）蒋介石蓄意发动内战， 破坏政协决议

蒋介石本无实行和平民主的诚意，政协决议刚刚签定，国民

党反动派就着手破坏。在重庆，他们指使特务制造了捣乱会场、殴打民主人士的“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纠集暴徒和诱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举行反共示威；捣毁重庆《新华日报》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在北平，他们唆使一伙流亡地主和地痞流氓，组织“还乡请愿团”，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三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表示要“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意在政治上公开撕毁政协决议。及至三月二十日，国民党又召开了它一手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公然说：“政协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果政协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是决不会承认的。”这充分暴露蒋介石出尔反尔，毫无信义可言。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从政治上，主要的还是从军事上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首先是东北，这是美蒋急于占领的地区。早在一月十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时，我方就主张停战应是包括东北在内的全面停战，但是国民党不同意，以“恢复主权”为名，坚持将东北除外。我方让步，协定中保留了“国民党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这一项，这是为了达成停战协定。但是，在美帝的大力支持下，蒋军连续向东北增兵达七个军之多，不断向我发动进攻，三月中悍然攻占沈阳。在我方及其他各方的不断呼吁下，三月二十七日军事三人小组曾经达成一个东北停战协定。国民党一手签订协定，一手又加以撕毁，继续扩大东北内战，开始向长春进攻。五月二十二日民盟代表发表了致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电文，吁请即刻停战，并提出三点建议：（1）中共军队撤出长春；（2）中央不再进兵长春；（3）东北政务委员会驻长春，主持政务，就地组织警察行使职权；所有委员人选由各方协商而中央简命之。毛泽东于同日电复民盟，表示“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五月二

十三日我方主动撤离长春。蒋介石在占领长春后，气焰更加嚣张，于我军撤出长春之日飞到沈阳，经马歇尔向我方提出有关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1）必须竭尽全力促成交通的恢复；（2）必须规定在一定日期之内实行军队复员和整编方案；（3）当意见不一致时，应由美方作出最后决定。一句话，要我们屈服。至于赋予美方最后决定权，则完全是丧权辱国的行径，对此，我们当然进行坚决的抗争。在关内，五月间，蒋介石调集了三十余万兵力，将我中原军区六万多人层层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部队。据当时统计，自一月十日至五月二十日，国民党向我之大小进攻达三千六百七十五次之多，先后用兵二百五十八万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二千零七十七座，县城三十六座。

### （七）六月停战谈判

国民党占领沈阳、长春以后，为了进行新的军事部署，再次玩弄假和平花招，于六月六日下了一道期限为十五天的停战令，要求我方在十五天内提出“完全停止东北冲突的详细办法”、“完全恢复国内交通之详细办法及进度”，并迅即实施“有关全国军队复员统编整编”。说这是给中共“一个最后反省机会”，并一再强调“中共必须接受美方最后的决定权”。

十五天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我方为不放弃任何机会争取和平，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蓄意内战的真面目，除“美方最后决定权”一项决不承认外，仍同意与国民党商谈。

在十余天的休战与谈判期间，围绕着“美方最后决定权”、“恢复交通办法”、“东北整军”等问题，又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坚持要我方撤出察哈尔、热河两省，威海卫，烟台两市和苏北，想把我们赶出铁路线和大城市，形成对我方的包围圈。他们



昼夜运兵运粮械，部署对鲁南、苏北大进攻；发动舆论工具，妄图将谈判破裂的罪名强加于我。他们还封闭了北平《解放》三日刊。对我方的宣传工作施加压力。在谈判中，我方提出逐案解决问题的办法，即达成一个协议就签订一个协议，而国民党却要求一起解决才肯签字，这就暴露了他们本无丝毫和平诚意，不过是为了争取时间进行军事部署和欺骗人民罢了。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又下令将休战有效时间延长八天，接着又提出新的条件，要我方退出苏北、皖南、胶东半岛、张家口、承德、哈尔滨、安东及一切铁路线，而所有撤出的地区均由国民党进驻。他们想用军事上的优势压我方屈服的狂妄企图，使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本着凡有一线和平希望我们都努力争取，同时用事实来教育人民的精神，我方以极大的容忍承认了《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所提出的关于整军方案修正及其执行之初步协定》，同意在军队的驻地与数量上予以考虑。但为保证人民已经取得的民主权利、自由权利和土地改革的成果，决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驻我方退出的驻地。停战谈判未得结果，关内大战迅即展开。当时的主要战场在中原、山东、苏北、晋南四个地区。国民党用于内战的正规军达一百九十三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人，占其全部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蒋介石、陈诚吹嘘说：两个月消灭苏北中共军队，五个月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

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整个解决中共”的一片叫嚣下，于七月三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上通过了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这种片面宣布国大召开日期的行径，是他们彻底破坏政协决议的又一次大暴露。此时，中共中央发布了著名的《七·七宣言》，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的独立与民主，坚持和平的决心，并提出四点紧急呼吁：（1）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停战令；（2）重开政治协商会议，以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

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3）迅速复员裁兵，彻底废止军队只属于少数人的军阀制度；（4）美国必须重申忠实执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取消对华租借法案，立即撤走一切在华海陆空军及军事顾问团。

到了八月，在美国的默许和援助下，蒋介石为进一步大打作准备，通过司徒雷登向我方提出了更加苛刻的五项条件，要我方退出苏北、胶济线、承德以东，东北退至兴安、龙江两省及嫩江之北部及延吉，山东及山西退出六月七日以后的占地。

在这种形势下，谈判已不可能，为了表示抗议，周恩来于九月十六日离开南京到了上海。

## （八）美帝国主义者积极支持

### 蒋介石打内战

蒋介石所以敢一意孤行，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主要是仗恃着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撑。如果说马歇尔从一到三月份的调解还多少保持了一点“公正”的外貌（如促成了停战协定、整军方案及恢复交通的决议，并促使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决议），到四月他由美国返回中国后，就狰狞面目毕露，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我方。四月间美国驻华海军增运国民党两个军到东北，六月又运三个军到青岛及秦皇岛。在马歇尔来华五个月内，经美国国务院及海军系统供给国民党的物资，据杜鲁门声明，即达十三亿美元之多。美国还将对华租借法案延长十年，将八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美军剩余物资转让给国民党政府。除了在物质上大量援助国民党外，美国海军公然以避暑为名，将舰队开到秦皇岛、青岛，其陆战队则多次向我军挑衅。七月二十九日还侵入香河安平镇，制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配合国民党进攻我驻当地八路军的“安平事件”。待到

蒋介石关内大打的战略部署已经就绪，司徒雷登、马歇尔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妄图推脱美方的责任，放手让蒋介石大打。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的目的是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独占中国，变中国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庸，并以中国作为反苏堡垒和跳板。它的策略手法，前后则是有变化的。我党对美国的策略方针，是利用其客观上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国民党的一面，而对其支持国民党的实质及其种种行为则严肃地加以揭露和反对，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这一斗争方针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 (九)反内战运动风起云涌，

#### 蒋介石残酷镇压

随着内战的不断扩大，群众性的反内战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六月初，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起，联合各界知名人士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吴耀宗、罗叔章、包达三、许广平、周建人、闵刚侯、阎宝航、胡子婴、雷洁琼、沙千里、盛丕华、胡绳、林汉达、张纲伯、郑振铎、巴金、徐伯昕、宦乡、唐弢、秦怡等一百六十四人联名上书蒋介石、马歇尔、中共代表团和各党派，吁请和平。六月十四日杭州市十八所院校数千名师生集会，提出反对内战的口号，马寅初先生等在游行队伍中领头前进。六月二十三日在我地下党的推动下，上海各界人士又组织了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他们是：马叙伦、阎宝航、盛丕华、胡厥文（因事中途在镇江下车）、包达三、箕延芳、张纲伯、雷洁琼、吴耀宗、陈振中、陈立复。代表团秘书是罗叔章、胡子婴。请愿前，先在上海火车站广场集会，然后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有十多万群众参加。高呼“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

对分裂，要求统一”、“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万岁”等口号。代表团到了南京下关车站，竟遭国民党特务、暴徒凶蛮的殴打，造成了震惊中国、轰动世界的“下关惨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滕代远和我，都先后到医院去慰问受伤的代表。我们还在梅园新村宴请了请愿代表，恩来同志向他们介绍了形势，指出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并听取了他们对和平的要求和愿望。代表中盛丕华、包达三都曾是蒋介石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朋友。还有一位笄延芳，是资本家，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是蒋介石的知交。他到南京后就有人给他通风报信，没有挨打，蒋介石还单独召见了她。笄并不倾向共产党，我们同样地同她交朋友，对她进行工作。我曾邀他来开过座谈会，让他提问题，我们回答，谈了两个半天。此后他的政治态度有了改变，一九四九年还参加了新政协。

这次上海和平请愿运动和“下关惨案”，是大革命以来上海的乃至全国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影响极大，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因为在沦陷八年以后，人们渴望和平，有些人对蒋介石假和平的手法认识不清，仍有幻想，通过这次事件，由蒋介石这个反面教员自己教育了人民，打破了人们对他的幻想，特别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人们，有着重大的教育作用。

“下关惨案”后，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更加疯狂了。七月中旬，在昆明采用了卑鄙的暗杀手段，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但人民群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正义呼声是镇压不住的。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周恩来于七月十七日发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民盟代表多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郭沫若、茅盾等十三人也致电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吁请调查。七月二十二日宋庆龄以她的高风亮节，发表了《对目前时

局的主张》，要求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停止向蒋介石提供军事援助。

## (十) 在上海的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我同董必武、齐燕铭到了上海。董老是去参加黄河堵口复堤会议。我和燕铭主要是向各党派人士征求对宪法草案和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意见。邓颖超也在上海，那时世界妇女民主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要在巴黎举行，来函请她参加，国民党拒不发放护照，所以她没有走成。我到上海住在郭沫若家里，郭沫若同我是在大革命时期认识的，久别重逢，十分高兴。他写了一幅对联送我：“路遥知马力，岁寒见后凋。”

上海的马斯南路 107 号周公馆，原来是筹办新华日报的办公地点，后中共代表团拟在上海建立办事处，遂将 107 号改为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代表团是严加限制的，不让成立上海办事处，董老知道后就说：“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因此办事处便称周公馆。周公馆有代表团派去的华岗、章汉夫、许涤新、陈家康、乔冠华、龚澎等同志，主要是搞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作疏散、转移我党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此外还筹集经费等等。我曾在办事处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内容是分析美国的对华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假公正、真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反动面目。我在上海的活动是同齐燕铭、许涤新一起进行的，主要是对第三方面人士作些调查、访问和交换意见，了解他们的看法和动向。

关于宪法问题。在南京时，我曾同燕铭拟了一个对“五·五宪草”修正案的未定稿，作为同各方面交换意见的准备。当时我

们假定有两种可能：一是如果按照政协决议，召开各派力量合作的国大，即提出我们的未定稿作为修改研讨的根据；二是如果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召开分裂的国大，则在我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以此作为人民自己的宪草。从当时战火纷飞的实际看，这些当然仅仅是一种设想。而在宪法问题上主要的是设法多听第三方面人士的意见。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比较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和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均赞成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但一部分中间乃至偏右、带有封建性的人士，则不满于对地主的清算，甚至不赞成耕者有其田。经过我们的解释，他们大部分人还是同意土改的。比如黄炎培，在土改问题上与我们的看法有分歧，我和燕铭、涤新找他谈，整整谈了两天，他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观点。

我们也调查了上海中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据了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逐渐不满意美国，其原因主要是美货在我国大量倾销。但他们又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好，且又需要美国的技术帮助，因此，寄希望于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对马歇尔存有幻想。对国内问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国民党深怀不满，认为理在中共方面，但又存在苟安心理及怀疑中共的力量，希望中共在军事方面让些步，国民党在政治方面让些步，以求取和平。另外，他们对解放区的情况不了解，有疑惧心理。有些人则企图形成“中间派”，要“在国共之外造第三条船”（章乃器、施复亮语）。这些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了解和分析第三方面人士的政治态度，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和确定党的有关政策，更好地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我和燕铭原计划做完以上调查分析工作，便返回南京，后恩来为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到了上海，我们便留了下来，一直到十月二十一日才返回南京。

## (十一)十月谈判，争取教育第三方面

九月二十日国民党进攻张家口，周恩来在上海以备忘录致马歇尔转国民党政府代表，称“如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周围一切军事行动，我方则认为政府公然宣告全面破裂。”但国民党竟悍然置我方声明于不顾，于十月十一日占领了张家口。当晚国民党政府又下令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召开。

十月十六日蒋介石发表文告，提出要中共接受八项条件。其第八条为：在共产党同意以上各条后，即下停止冲突令，在下令之同时，共产党应宣布参加国民大会，并提出代表名单。这是八条的中心内容，即逼迫我方交名单；我方交了，国大便合法化了。按政协决议，应当首先改组政府，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来召开国民大会。对于这种破坏政协决议的做法，我们当然予以拒绝。

这时第三方面的大多数人也在上海。作为中间势力的第三方面，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大批人，谁争取了他们，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们当中一部分人怕国共分裂，对美蒋有幻想，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因而想避重就轻，甚至要我方作出不能容忍的让步。这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并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第三方面人士中有一部分人对参加国大问题又有动摇，蒋介石就利用这一部分人士的矛盾心理，向他们施以恐吓、利诱等手段，企图达到拉拢、分化第三方面人士的目的。

蒋介石提出八条的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到上海同第三方面与我方正式接触。一见面吴铁城就说：“我们是肉请帖。”周恩来当即指斥道：你们是拿袁的美教书来请的。他们假惺惺地反复解释说八条里没有新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恢复

谈判的两个条件：（1）军事方面应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守的位置；（2）政治方面按政协决议办。他们申辩说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已不可能，至于政协决议，可能的话当然照办。由于“八条”和“两条”争执不下，第三方面乃建议先不谈实质，而谈谈判程序问题，即所谓先停战后谈判或是先谈判后停战的问题。

对于继续谈判，我方已清楚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鉴于第三方面某些人士仍有幻想，十分积极，为了争取教育他们，并向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谈真打的阴谋，我们决定把谈判斗争进行下去。对于我们同意继续谈判，第三方面是欢迎的。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和第三方面人士到达南京，孙科等人到飞机场迎接，说委员长在等候大家见面。于是就从飞机场直接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接见后，就马上飞往台湾，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们要求谈判是虚伪的。当天下午，政府代表约我们与第三方面代表在国际联欢社举行餐会。会上梁漱溟说：中共代表此来是抱着不妥协方针的，回京可能是回延安的第一步，现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周恩来接着说：不可讳言，由于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未能实施，反被破坏，情形已非常严重和恶化。现在政协同人又聚首一堂，只有按政协决议办，才有希望。

二十五日晚间，梁漱溟、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来我方住处，谈他们分头与政府各代表谈话的情况。黄炎培说，陈诚催促快些谈好停战问题。周恩来即问：安东如何？章伯钧答，陈诚说安东已于昨天拿到手了。听他一说，我们一致表示愤慨。周恩来放下手中的茶杯，厉声说：还有什么可谈的！并立即要人去把梅益和记者找来，告诉他们安东被攻占的消息。黄炎培当时竭力请求我们暂时不要发表声明，并说这几天如有什么行动，彼此先打



个招呼，请我们转告延安加以考虑。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谈判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却背着我们搞了一个所谓的折衷方案，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国共）双方下令全国军队一律就地停战，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由军调部及执行小组依三人小组已有协议处理，双方军队依整编方案整编，驻军地点之分配由三人小组商定（东北军队驻地须在停战前获得谅解，中共军队拟驻（1）齐齐哈尔，（2）北安，（3）佳木斯）；（二）全国地方政权应依照政协决议及和平建国纲领，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发生争议地区应尽先依照军民分治原则解决。长春铁路沿线各县政权除中共已经接收者外，应由中央派县长和警察一律接收之；（三）依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召开综合小组商定改组政府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商定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尽速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商定宪草修正案。梁漱溟、莫德惠等人还商定：这个方案，如果一方接受，一方不接受，他们就站到接受方面去。

以上三条中，诸如一律就地停战，片面规定我军驻地，由国民党派县长和警察接收等，均无视我方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个条件，明显地是迎合蒋介石八项无理条件的，即要使我方在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方案是第三方面集会后，推黄炎培、梁漱溟、莫德惠起草的，他们签了字以后，派代表分途送往国民党政府、美方代表及我方。我方是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三个人送来的，由梁漱溟读给我们听，旋又加以解释。对于这个方案和第三方面的这种表现，我们感到十分气愤。周恩来以非常沉重的语气痛斥梁漱溟等不守信义，落井下石。并说：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多一块地方，少一块地方的问题，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下，你们还要踩上一只脚！董必武说这是政府凭以摧残人民的根据，问

他们何以交待国人。我对梁说，这个方案是关系千百万人生命的大事。在我方的严正指斥下，他们都觉得错了，便赶快找来黄炎培、罗隆基、章伯钧。黄等来后，周恩来、董必武又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他们经过商量后，由黄炎培、莫德惠、罗隆基、李璜跑到国民党政府代表孙科那里，佯称方案里还漏抄了一条，要拿回去补上，收回了这一方案。随后又到马歇尔处收回了这一方案。事后，恩来对我说，对中间分子，平日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决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十月二十八日蒋介石飞返南京，在听取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报告后，派孙科和邵力子去通知民盟，说交出参加国大代表名单是最重要的事，交了就停战。在这种情势下，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又在交名单以换取停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幻想。

十月三十号那天，我方参加了第三方面的会议，周恩来再次阐明了我方的态度：对于政府要我方交名单才停战，这种哀的美敦书的方式，我们坚决不接受，但可以把三人小组会议和综合小组会议先开起来。董必武说，军事与政治不可分割，政协五项决议也不能分割。我补充说，如政府答应开这两个会，其程序不能片面规定，须经我方同意。

十月的最后一天，李璜、胡政之、章伯钧来谈第三方面人士昨夜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话经过。告知，孙科表示长春路各县仍须如第三方面的方案（即那个收回的方案）接收，八项条件主要的还是交名单，行政院改组应在国大召开之后。黄炎培和罗隆基当即向孙科声明那个方案已经收回，拒绝他引用。他们还说，第三方面人士一致向孙科表示，中共不交名单则他们也不能交。周恩来再次向他们指出，蒋介石是拿停战作为交换名单的诱饵，是假

停战，我们要的是真和平、真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会有机会，要他们保持自己的立场和信誉。

到了十一月上旬，情况已经很明白了。蒋介石拒绝任何方式的商谈，要谈就要我们接受八条。他知道我们是不会屈服的，为了欺骗和诱惑第三方面人士，故意让第三方面人士两头跑，疲于奔命。同时蒋介石又耍了一个花招，单方面宣布停战。我方的态度也很明确：宣布停战系片面行动，对此我方持保留态度；国大不能开，如十二日照样开，则一切无从谈起。而第三方面仍在积极寻求实际上不可能的调解办法。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是认识不清，某些人的用心则在于“名正言顺”地参加国大。同时，蒋介石也加紧了对第三方面人士的逼迫。如莫德惠、胡政之说，蒋介石曾对他们说，中共不出席国大，现在看你们社会贤达，是为国家还是为中共？他们都不吱声。当胡政之劝蒋介石找个办法延期开国大，并说这于政府威信也不妨碍时，当场遭到蒋的训斥。胡政之还向我们谈了他的难处，说他有一个事业团体要照顾，意即要参加国大。

十一月十一日，第三方面人士又背着我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大延至十二月一日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为建议之第一条。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经过张君勱和李璜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字。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把信的原稿给我们看，经过我方向其指出这种自投火坑的错误作法之后，他们三人才去交通银行（这是当时第三方面人士的聚会地）把他们三人的签名涂掉了。十二号中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我又出席了一次第三方面人士的会议。张申府说出内情，左舜生火了，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启天也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表面上说的是张申府等人，矛头实则指向中共。当时周恩来、董必武和我都在场，恩来立刻驳斥道：牛吃的是

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至此，第三方面的分化已经渐趋明朗，青年党、民社党和所谓社会贤达的一部分人要参加国大，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尚在动摇。

于是恩来又对他们讲了一番很恳切的话，他说：二十多天追随诸位先生之后，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政协决议及停战协定。政协召开决定于双十会谈，有国共谈判才产生政协，有政协才有第三方面。现在国民党要我们交名单，就是要分化中共与第三方面。昨天有人答应交名单，事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事情牵涉全体，变成中间人避着我们去跳火坑，违背了政协决议。我们曾再三向诸位恳切说明，只有一切问题商量好，才能说到交名单。我们愿意谅解各位的苦衷，但我们必须坚持政协决议。国民党的用心很清楚，请大家进国大，为的是在脸上搽粉，而把中共踢开。我们共事了多年，现在临别了，我们对将继续挨打无所畏惧，我们党就是在围剿压迫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武装，可以同国民党周旋，而诸位将难免受压迫，希望有一天仍能在一起为和平民主奋斗。会后，我对罗隆基说：你们的建议（即十一日给蒋介石信中的建议），我们是反对的，你明知我们反对，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们？政治家做事应该光明磊落，我们决不强求别人和我们一致，但应该讲信誉。饭后，恩来又向第三方面人士表示：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与共同决议，对这个独裁者，我们是要同他斗争到底的。

## （十二）谈判破裂，胜利返回延安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片面召集的非法国大匆匆开幕。青年党、民社党和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伪国大，臭了。民盟总部秘书处则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紧急通告，民盟主席张澜于同日向

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表明不参加国大的立场。这样，民盟便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政治声誉。李烛尘先生参加国大，是我们同意的，是为了照顾他的困难。于是，历时一年多的谈判斗争就此结束了。

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首先发表声明，指出“国大”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大，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坚决不承认。他历数了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罪行，庄严宣告：“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我于一月十九日随周恩来等返回延安，董必武暂留南京，继续领导中共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一天的日记上我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这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最大胜利。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又进一步逼迫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工作人员全部撤走。三月七日董必武率领驻南京、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撤离南京。董必武在告别南京人民时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从重庆到南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卓越地进行了对美蒋的政治斗争，卓越地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还是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他不搞一言堂，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到他的房里去开会，大家先汇报情况，议一下，再由他作结论。会议完了，他还要拟电文，向中央报告，每天都工作得很晚。这场斗争是十分艰巨复杂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色地进行了这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从政治上孤立了美蒋反动派，争取了朋友，争取了人心，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周恩来回到延安后，除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外，还兼任中央城工部部长，蒋管区的斗争，仍由他继续领导。

# 真假和谈的斗争

## ——记北平和谈

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央指派我参加以周恩来为首的我党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了二十天的和平谈判。围绕着北平和谈所进行的近四个月的和谈斗争，是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我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即真和谈与假和谈的斗争。现将此次和谈的前后经过回顾于后。

### (一)美蒋策划假和谈阴谋

#### 我党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的内战。战争的头一年，我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一九四七年夏，我军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从一九四八年秋至一九四九年初，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精锐部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至此，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

伴随着国民党军事上的惨败，其经济、政治也陷入全面危机。

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物价连续飞涨，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人民苦难深重，民不聊生。

在政治方面，虽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但在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爱国民主运动继续高涨，一浪高一浪。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美帝侵略中国为主要内容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反对横征暴敛为主要内容的农民抗粮抗捐抗税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间阶级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也更加不满。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形成了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震撼和动摇着反动统治的根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愈演愈烈。

凡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为了挽救行将崩溃的命运，美蒋反动派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谈的阴谋。他们企图利用和谈，欺骗全国人民，阻止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争取军事上的喘息时间，以便重整旗鼓，伺机反攻。

美帝国主义除了同国民党反动派积极策划假和谈的阴谋外，又积极拉拢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有联系，又同我党有联系的中间派右翼，准备在其无法阻止的人民革命胜利后的联合政府中，形成反对派，从而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在国民党内部，以桂系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则企图利用对蒋介石的不利形势，取蒋而代之。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和三十日，白崇禧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举行和谈，实质是逼蒋下野。与此同时，程潜、张轸及河南、湖北、湖南的参政会都致电蒋介石，表达了同样的主张。以后，白崇禧还一度策划湘鄂赣豫黔“五省联盟”，促蒋下野，以李宗仁出面，代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我“和谈”。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发出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保障，……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

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对美蒋反动派的假和谈阴谋有着不同的反应。广大民众饱受剥削压迫，迫切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翻身作主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虽已有较清醒的认识，但仍有一部分人对美帝和李宗仁有幻想，支持李宗仁的和谈活动。如有一个包含了一部分较有名望的工商界和工程技术界人士的中国工程师学会曾写信给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民主党派中也有少数人持中间道路思想，有的幻想通过和谈，保留国民党的一部分力量，以巩固自己的中间派地位；有的幻想吸收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壮大自己；有人并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多给李宗仁、白崇禧保留一些东西。

我党对这一和谈阴谋以及各阶级、阶层的政治动向是密切注意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要不要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九四九年元旦，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分析了形势，指出虽然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的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



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文章尖锐地指出：“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文章还以“农夫与蛇”的故事，寓意深刻而生动地告诫人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新年献词的发表，对于揭露美蒋的阴谋，争取教育各阶层人士，起了重大的作用。此时，已有一部分民主人士为了筹备召开新政协，应我党邀请陆续来到解放区的哈尔滨市和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两地。新年献词发表后，他们进行了多次热烈的讨论。我参加了李家庄的讨论并作了报告。一月七日，在李家庄的符定一、周建人、韩兆鹗、翦伯赞、刘清扬、楚图南、田汉、胡愈之等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沙千里等人，认为民主人士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痍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群策群力，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提议：“倘荷赞许，尚祈诸公率

先发起，联衔向国外发表严正声明。”

一月五日，新华社发表《评战犯求和》，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一月一日文告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蒋介石要确保其宪法、法统、国体和军队“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同时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残余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行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我们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八条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声明说：“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声明》的发表，使我们无论是谈是打，都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声明》一出，立即得到广泛的拥护。一月十五日，在李家庄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讨论会。大家说：和平有两种，一种是维护反动势力和战犯利益的“南北朝”式的假和平；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维护人民利益的真和平。因此，只有将八条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才能实现人民所要求的真正的、民主的、彻底的、永久的和平。与会者一致同意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联系，共同起草一个支持毛泽东八项条件的声明。翌日，周建人、胡愈之、楚图南、

符定一、田汉、吴晗等联名致电哈尔滨方面，略谓：（一）“毛主席所提的八条实为完成中国革命之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二）“中国人民正注视着所谓国际干涉阴谋之酝酿，并坚决反对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借调停为名而干涉中国内政”；再次提议“以上两点倘蒙赞许，请连同前电所陈意见，由诸公发起，联衔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同日，在哈尔滨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就符定一、周建人等一月七日电复电云：“顷奉来电，对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提出宝贵意见三点，高瞻远瞩，谋国情深，业经详细讨论，一致决议发表告国人文件，严正表示吾人对革命进行到底之态度。”一月二十二日，抵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五十五人联合发表声明，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声明说：“八项条件，正是对于蒋介石所提的无耻要求的无情反击，我们是彻底支持的。毫无疑问，全国人民的公意是在这儿反映出来了。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全民主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务须一致团结，采取必要的行动，坚决执行人民的公意，而使这八项和平条件迅速地全部实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民主救国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团体，香港、海外各界民主人士以及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教授们，也纷纷发表声明，热烈响应。

蒋介石在其内外矛盾和我党八项条件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一月二十一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实际上他退居幕后操纵，冀以玩弄其假和谈、真备战的手法。

## (二) 李宗仁的“谋和”活动 我党的斗争策略

李宗仁代总统后，便积极进行“谋和”活动。首先是争取第三方面。他摆出开明姿态，一方面下令“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另一方面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去南京，又派邵力子、甘介侯去上海访晤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罗隆基、张澜等。（李宗仁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这些人对我还友好，似乎不怀恶感。我若得到他们的支持，定能造成第三种力量，以制造反共之舆论。这样共产党就不得不放弃毫无意义的把内战打到底的目的。”）对李宗仁的“谋和”活动，我党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一月二十五日即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指出：“对国民党的伪善，人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日，中央发电指示上海、香港党组织，要求“迅即将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的声明及我党上述谈话，连同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向国民党各大城市广为启（散）发，使广大群众不受美帝及国民党的欺骗。尤其要注意争取中间分子。”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又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交换意见。电文谓：“如果南京反动政府及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群）等接受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并即逮捕各主要战犯（如蒋介石、陈立夫一大批等），以便实现真和平真民主，那就是好的；如果只提出要南京反动政府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恢复民主同盟活动及容许被封的报纸、杂志复刊等等，那就是很危险的。因为对前项要求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不一定肯提出，而对后项要求既易为张、黄、罗等赞同，又易为南京在形式上接受，结果转使民主人士陷入被动，且

有承认反动统治之嫌。”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声明的立场。

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张澜、黄炎培、史良、陈铭枢、罗隆基等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也致电香港的民主人士，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上海等地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这一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工会、学生会等团体可公开活动，被启封的报纸可自动复刊，并注意使中间阶层人士的民主运动和群众运动相配合，以揭露李宗仁和平谈判的欺骗性。实际上，李宗仁虽然想采取一些旨在争取中间力量的做法，但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抵制下，所谓“释放政治犯”，“恢复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启封停刊报纸”等命令，多未兑现。这样，就在广大人民面前暴露了国民党并无和平诚意，反使李宗仁处于政治上更加被动的地位。在上海、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亦未受其蒙骗，李宗仁争取第三方面的企图基本失败。

李宗仁这时仍未放弃假和谈的基本立场，但迫于形势，于一月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在此前后，为了试探我方的反应，李宗仁还安排了一些人士直接与我接洽。

一月十二日，白崇禧派黄绍竑飞抵香港，想托李济深帮忙，促成桂系方面单独与我和谈。但此时李济深已来解放区了，黄即通过我在港负责干部，致电李济深，表示为促蒋下野，“尤宜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方为有利”。李宗仁代总统后，一月底派黄启汉、刘仲华为代表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黄、刘转达李宗仁的话说：李宗仁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具体办法

是：（一）实现局部和平；（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之上内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叶剑英答应将其谈话内容转陈中央。二月一日，中央致电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指出：黄启汉、刘仲华的谈话“是有政治内容的，且有文章可做”，“如刘仲华尚在北平，望令其迅速返宁，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如李、白托黄、刘转告之言，纯系骗局，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

二月七、二日，刘伯承、陈毅在河南信阳接见了白崇禧派来的私人代表李书城。李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受托了解我方对白崇禧及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张笃伦、河南省主席张轸的态度。刘伯承、陈毅向他说明我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立场，并以傅作义为例，反复说明了如果白崇禧能以实际行动作出贡献，我们将欢迎和优待，对张轸、张笃伦也是这样。

李宗仁还直接、间接地安排了一些人士组成“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来洽谈，我方都采取了积极接待的态度。“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邱致中、吴裕后等于二月六日抵平。叶剑英接待了他们，并说明了和平必须是在八条基础之上的真正的和平。经过交谈，他们表示认识到共产党是要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二月十四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对于这个代表团，我党采取积极热情、诚恳坦白的方针，由叶剑英负责接谈。还邀请傅作义、邓宝珊等同他们接触。翌日，叶剑英与颜、邵、章、江会晤，并于当晚设宴招待代表团一行，傅作义、邓宝珊也应邀赴宴。初晤结果表明，颜、邵、章、江对我们是友好的，向我们表示敬佩之意，也提出了今后工作的某些建议。但他们此次的目的，是想国共两党以对等身份实行南北议和。叶剑英坦率地指出：实现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伟大

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和北平方式。从我们的愿望讲希望北平方式，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希望李宗仁认清形势，按照八条，同蒋介石真正决裂。二月十七日，我方召开欢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大会，北平市副市长徐冰讲了话。会后，叶剑英又分别与代表团成员晤谈。翌日，董必武、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宴请颜惠庆一行，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二月二十日，还邀请他们参加招待民主人士的四百人的大宴会。二十二日，他们飞抵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我去石家庄迎接他们，陪同他们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商谈了有关和谈及通邮、通航事宜。这样就为正式和谈铺平了道路。他们也比较充分地了解解放区的情况和我党的主张。这对他们回去后向李宗仁做工作以及后来参加新政协，是有重要作用的。叶剑英曾按照中央的指示挽留邵力子，邵力子答道：此次恐怕仍须回去，不过，下次可以再来。二月十七日，他们带了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离平返南京。

### (三) 北 平 谈 判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政府，以毛泽东八项条件为基础，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和谈。四月一日，南京政府派出由张治中(首席代表)、邵力子、刘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组成的和谈代表团抵平。我方首席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

李宗仁虽然公开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但这是假的，实际上是想保存国民党的政府与军队，占有江南数省，以期东山再起。李宗仁在台上进行和谈活动，蒋介石在台下则加

紧实施在三至六个月内完成大规模扩军的计划。其备战计划包括：重建四百个师；征募二百五十万新兵；重新召集退役军官；编制新的装甲兵团；扩充空军。这是我和广大人民完全不能同意的。因此，谈判的焦点是：南京政府是真接受八条还是假接受八条。

谈判前夕，张治中曾去溪口<sup>①</sup>见蒋介石。对此，我党是有警惕的。张治中抵平后，周恩来即当面质问他，指出这显然是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并质询南京“四一惨案”<sup>②</sup>事件真象。张治中作了一些解释。四月六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尖锐地指出：虽然李宗仁政府“表示希望参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但是他们和继续主战的蒋介石及其死党一样，反对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反对接受中共的八项条件”，“他们要把反动势力‘平等’地‘光荣’地保存下来，以为卷土重来的资本”。社论指出这是一种极荒谬、极反动的态度，是与立功赎罪的态度完全不相容的。社论严肃地表明了我方的态度，打破了南京代表团的幻想。

为了充分交换意见，四月二日至十二日，双方代表先进行了个别商谈。南京代表们一方面与我方代表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一方面还与李济深、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等多方面交谈。

四月八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张治中，就谈判中有关事宜，长谈了四个小时。毛泽东谈到，为了减少南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也表示谅解。并说，和谈方案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

---

①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辞去总统后，一度住在他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

②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京反动政府指使军警特务前往机场为南京谈判代表团送行并要求实现真正和平的六千余名爱国学生行凶，造成流血事件。



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毛泽东还邀请张治中吃午饭，张得知毛、周通宵一夜未眠，便辞谢而归。

四月十三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方提出了在八项条件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周恩来对草案的各条作了说明，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的态度是：如南京政府真正接受八项条件，那一切都好商量，而是否接受八条，又主要集中在两个根本问题上，周恩来说：“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

(1)关于我军渡江接收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方面企图划江而治(何应钦曾在十二日电示南京代表团说：“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防地”，“渡江问题要严加拒绝。”)。我方则指明，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国民党政权。周恩来说，今天的革命，再不能象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因此，要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南京代表团虽然不能反对渡江，但总希望慢一点。我方指出：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之获得喘息之机。同时我方也向他们表示，在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

(2)关于改编国民党军队问题。南京代表团希望双方军队分期分批各就驻在区域内自行改编，这实质上是要保留其军队。我方则坚决主张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的反动军队。至于改编方法，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的出路，提出先依照原编制集中整理，然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来，南京代表团同意改编，但希望将改编划分为两个时期，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国民党所统辖的部队由他们自己处理；联合政府成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方不同意这样办。

以上两条是关系到人民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让步的。但是为了尽量争取以和平方法解决问题，我党在其他问题上作了许多让步。在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草案提

出了四十余条意见，我方接受了二十余条。例如战犯问题，南京方面是很关心的。毛泽东在四月八日致李宗仁电中就谈到：“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讨论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团对战犯问题争得很厉害，主张不要将战犯问题写入协定。我方照顾他们的意见，将战犯分为两类，对其中怙恶不悛者，应予从严惩办；而“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除战犯外，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工作人员，决议修正案也表示了予以宽大处理的精神，其它各项问题也在认真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后，作了适当的解决。

谈判中，我方代表团还主动向他们保证，若李宗仁政府接受和平协定，我党将负责同各民主党派协商，接受他们以及南京政府方面若干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参加联合政府。

四月十四日，我受周恩来之托向在平的部分民主人士报告第一次谈判的经过以及南京代表团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意见，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谭平山、彭泽民、蔡廷锴等人先后发了言。他们的意见很集中，认为我方已作出了不小的让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宽大已出乎意料之外，在渡江接收国民党反动政权、改编其军队及战犯这些根本问题上，不应该再让步。最后，我将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二十余条意见后修改过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修正案向大家宣读，大家均表同意，并认为不需要逐条讨论了。

四月十五日，召开第二次正式会议。会上宣布了协定的修正

案。周恩来来说：这是定稿了。我们总是尽量求取原则上的同意和实施技术上的合理，以便南京代表团说服南京政府，使协定很快签字，从而推动和平事业的进行。最后他郑重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须在二十日以前表态。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屈武于四月十六日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飞南京请示，希望南京政府能接受这一协定。

四月二十日晚，我方得到李宗仁、何应钦的复电，不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并反对渡江。二十一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命令，谓：“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命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全面渡江。

谈判破裂后，我陪同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集各党派、团体和民主人士代表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南京政府拒绝和谈及时局的发展》的报告。与会的冯友兰等一批教授会后向我们表示：“中共所提和平方案，条件非常宽大，南方人民将更清楚地看到谁是谁非。”并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全中国，相信我党今后能与各民主党派真诚合作。

#### (四) 争取南京代表团的工作

南京代表团大多数人同我党是熟悉的。他们当中有的人同情我党(如章士钊)，有的人长时间同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有的人属于地方派系，

在国民党政府中并不得势(如刘斐、黄绍竑)，他们一般是有和平愿望的。我党既把他们作为谈判的对手，同时又把他们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并通过他们争取李宗仁真正同蒋介石决裂，按照八条达成协议。因此他们来平后，我方除热情接待外，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正式谈判前，我方代表多次与他们个别谈话，交换意见。特别是毛泽东，从四月八日起，分别邀请张治中、邵力子和章士钊、黄绍竑和刘斐、李蒸和卢郁文(南京代表团秘书长)谈话，使他们思想有了转变。见了毛泽东后，张治中很兴奋，吃饭时，他谈到了共产党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自我批评和虚心学习种种美德，感慨万端地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应该的，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这一期间里，他们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新气象，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形及我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很为感动。四月七日晚，我们为南京代表们安排了晚会，演出了秧歌剧。演出完后，张治中对我方人员说：“真好！站在代表的立场，我不能鼓掌。但站在领会一种新艺术的观点，我始终是在笑着。我衷心地喜悦，这是我们民族的活力，一种青春的质素在里面。”南京代表中有人还与三轮车夫、饭店茶馆店员、大学生中学生谈话，深切地感到共产党的领导是大有前途的。他们承认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承认今后的国家工作应由共产党来领导，同意了《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并表示愿意说服李宗仁接受这一协定。在谈判桌上，张治中坦然地表示：“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告一结束”，“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把胸襟开扩些，重新合作”。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积极配合做南京代表的工作。和谈开始前，毛泽东接见李济深、沈钧儒等多人，并将我方的具体方案、文件先与民主人士商量。会议开始后，也将情况向他们通报。李济深、谭平山、王昆仑、陈此生、陈邵先、朱学范、许宝

驹等也多次与南京代表谈话。如四月二日，张治中等六人去见李济深，李向他们说：“孙总理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始终未能实现，而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都做到了。他们与孙总理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做错了，我们要承认。”张治中等就“中共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等问题提出询问，李一一作了解释。这些谈话，对南京代表团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李济深还派私人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同刘仲容一起去南京，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

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方面曾派飞机来接代表团返宁。我们考虑他们回去后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们。周恩来曾于二十日夜打电话给张治中、邵力子，说他代表中共中央、代表毛主席和他本人，请南京和谈代表团同人全部留下；对已协议的《国内和平协定》，日后还会起作用；代表团各位，今后还会有贡献，请他们考虑。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对张治中说：“西安事变，我们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于是，在平的南京谈判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及其随从人员开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留下。张治中在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说：“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出新的希望。……我以国民党党员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又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转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我多年来内心所累积的苦闷，为之一扫而空。”黄绍竑因携《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赴宁，解放军渡江后，他即辗转到了香港。为了尽最后的努力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刘斐于六月抵达香港，并曾秘密去过广州。八月十三日，黄、刘联合在港国民党军政人员龙云等四十四人共同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坚决拥护中共的

领导，同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九月，张治中致电新疆的陶峙岳等，对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起到一定的作用。后来，南京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都应政协筹备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都参加了政府工作，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南京代表团转向人民，意义是很大的，这在谈判史上确属少见，它充分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已丧尽人心，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是众望所归，也反映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极大成功。

### (五)和谈斗争的成果

自一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渡江，和谈斗争历时近四个月。虽然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但这场斗争却有着重大的政治影响。

首先，和谈斗争揭穿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的阴谋，宣传了我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基本立场及为此而制定的实现真正和平的八条主张，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包括一部分曾经幻想走中间道路的同盟者，从政治上提高和加强了统一战线。

其次，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对于分化瓦解敌人，争取局部和平解放，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动统治行将崩溃之时，其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士气沮丧，充满了失败的情绪，许多人急于找出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向他们指明了出路。这样，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力，另一方面是《八条》及《国内和平协定》强大的政治威力，这就加速了反动营垒的崩溃。当《八条》发表时，党中央即指示将《八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广泛宣传。谈判破裂后，毛泽东、朱德又在渡江命令中指示：“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

停止战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协定。”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受和平条件和率部起义者极多，最著名的有傅作义率部二十万在北平接受改编；程潜、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率部在湖南起义；陶峙岳、包尔汉率新疆十万军政人员归向人民，等等。这些，与《八条》和《国内和平协定》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记得当年有个说法：《八条》抵得上百万军队。这样说是合理的。

最后谈谈李宗仁。他由于当时的立场所限，未能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走错了一步棋，后来不得不远去异国，这确实是个遗憾。值得欣慰的是，出于爱国热忱，并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九六五年七月，他毅然排除险阻，远渡重洋，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叶剑英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起义人士以及当年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等多人去机场迎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李宗仁，与他亲切握手，笑谈契阔。他参观、访问了祖国各地，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接待。在回国声明中，他说：“一九四九年我未能接受和平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李宗仁先生最后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光明道路，是令人敬佩的。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只要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做了贡献，人民都是欢迎的，人民优待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

# 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 的回顾与再认识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实现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联合广大同盟军，以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大战略和策略。它从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民族的最大多数人民都有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奴役压迫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和斗志。由于旧中国经济发展落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因而争取联合广泛同盟军，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更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把统一战线提高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战略地位。他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统一战线的规律和根本原则，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同盟军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在每个历史阶段，统一战线都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势力、集团和个人，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和建设大军，把敌对势力和困难缩小到最小限度，从而把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经验生动地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三大法



宝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是一个重要法宝。没有一个包括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成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成就，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前的七年，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都是正确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反对国内外敌人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在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各项社会改革，在推进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并把这个阶级的人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等各方面的伟大斗争中，我国统一战线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统一战线工作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但是由于这期间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统战工作也经历了曲折。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产生了严重的扩大化，把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以及党的干部等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伤害了许多朋友和同志。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开始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在当时严重困难的形势下，促进了国内团结，稳定了这条战线，为顺利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迅速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同志“左”的错误指导思想重新抬头，提出了“阶级斗

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并在党内开展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在中央统战部开展了对统战、民族、宗教工作中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造成了理论和政策是非的严重颠倒，统战工作重新受到“左”的错误的严重干扰和损害。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左”的错误，并且把它推向极端，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政策和工作，疯狂迫害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使我国统一战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统战工作清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从理论政策到各项统战工作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狠抓落实政策，努力恢复和发扬统战工作上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充分调动了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党外人士为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服务的积极性，统一战线重新出现了生气勃勃的新局面，党的统战工作重新走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进入了建国以来统战工作的最好时期之一。

现在，我国正处在为实现社会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奋斗的新时期。我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经过建国以来长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早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它们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

者的政治联盟，实际上已成为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在内的广泛政治联盟。它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到一九六四年一直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九六二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底，由于受到错误批判停止工作。我实际主持中央统战部工作十三年。在这期间，中央统战部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提出和制定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各项指导性文件，进行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成为党在实现总路线总斗争中的一个方面的参谋和助手。这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在实际工作和研究政策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过一些失误，在某些问题上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差。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偏差和错误属于次要的和非基本的方面。现在，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和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对建国后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历程，进行回顾和再认识，找出经验教训，以期有助于今后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叙述的方便，下面分为九章进行回顾和说明。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任务和 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地诞生了。从此，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有步骤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党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开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全国的规模，包括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其他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的工作，并且正式形成了自己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的政治基础已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和特点的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它的基本任务已从配合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完成民主革命，发展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然后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变化，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光辉胜利。

## 一、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党的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没收了足以控制整个国民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并改造成为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决定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条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开始即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开端。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揭开了伟大光辉的篇章。

但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党所面临的阶级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是错综复杂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政权已被推翻，但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尚未完全消灭，仅西南地区就有土匪百万、特务八万，还有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反动党团骨干、恶霸分子以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他们到处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威胁社会治安和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在广大农村，尚有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约计二

亿六千四百万人)的地区还没有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那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党在建国初期不能不用很大力量去彻底完成这些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着手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并要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实行利用和限制的政策,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统筹兼顾的总方针下,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对外,还要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与安全。

建国初期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了革命胜利后继续巩固加强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

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建国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适应当时复杂的形势和任务，在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

建国初期，因为革命的胜利，党内一部分同志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在对待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安排他们的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有些同志甚至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早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对统战工作和统战干部瞧不起，甚至说什么“统战路线，地主路线；民族观点，糊涂观点”。这种“左”的关门主义思想和倾向，严重障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少数同志中也存在着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倾向，对有明显的错误观点不进行必要的批评教育，而是一味迁就。这些错误倾向不克服，就不利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为着统一和提高党内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研究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经中央批准，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前，经过部里集体讨论研究，我起草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纲，经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阅同意，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提纲对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的阐述，主要内容是：

(1) 指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现《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党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2)说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和党对中间阶级、中间力量的基本政策。特别强调提出，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在当时特别要注意同民族资产阶级搞好经济上的合作，以巩固政治上的合作。

(3)说明在民主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的民族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是民族间的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为使各民族人民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互相团结起来，为各民族的共同幸福和发展而奋斗，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逐步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间的仇恨、隔阂、猜忌、歧视和不信任的心理。要在各民族中反对大民族主义，在少数民族中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目前尤应着重反对汉族中的大民族主义倾向。要有计划地逐步帮助各少数民族提高和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做到这一切的关键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让各少数民族人民按照他们大多数人的意志和经过他们自己乐意的形式，去管理各民族的内部事务。

(4)说明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党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策。指出各民主党派均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代表性，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过去，民主党派对于争取中间力量，扩大人民革命阵营，孤立革命的敌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在肃清国内残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我们党仍要继续巩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我们党

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它们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适当尊重它们的独立性。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惟愿它们团结和进步，我们的方法是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

(5)说明各种人民团体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形式各有不同，但都负有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都要认真做好统战政策的教育。工商业联合会是我们党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要充分发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同时必须承认工商联是工商界自己的组织，有权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不能把它当成简单的办差机关。对那些有一定群众、享有合法地位和有一定政治影响的旧的社会团体如某些宗教团体等，也要到里面去做工作，逐步改变它们的政治面貌。

(6)关于各级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中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政权机关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一要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二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各级协商机关是统一战线组织，应该更多地通过它们进行一般统战工作。

(7)提出要在全党加强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克服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倾向；统战部门的主要职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

这个报告提纲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后，争论较多的主要是两个问题，集中地反映出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左”的思想倾向。

第一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问题，是“团结为主”还是“斗争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搞垮资本？有的同志在会上发言提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资本家要求划分国营和私



营的经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要“无限制地发展”。国营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例如火柴工业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国营生产很多，对私营即可不必扶持，甚至禁止”。对于资本家提出不要与民（即民族资产阶级）争利的问题，说我们就是要“与民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等等。按照这一种思想搞下去，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不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确定的利用和限制的政策，而是要排挤掉，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是采取统一战线政策，继续团结它们，而是要立即消灭资产阶级。

第二是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问题。有的同志说，“民主党派应是我党的外围，应是一个进步分子的团体，应由大到小，由多到少，由政治上的复杂到统一，由与我党有距离到无差别，不应在政治上去抬高他们，在组织上去扩大他们，为我们找下麻烦”。有的同志认为，革命已经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民主党派。

周恩来同志到会作了报告，对上述“左”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和教育。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有领导有计划的经济。要领导和计划，就得全盘规划，适当划分经营范围”。在讲到民主党派问题时，恩来同志说，“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来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各民主党派中都有而且必须有进步分子，这样才能与我们很好合作。但不能把民主党派搞成纯粹进步分子的组织。若都是进步分子，还有什么意义呢？里面必须包括广大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右翼分子”。“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民主

党派，把上层政治活动分子组织起来，“便于他们学习，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民主党派的成员在我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毛泽东同志听取了会议的汇报，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对于挤垮资产阶级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批示：第一，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当然是团结为主。第三，对私营工商业中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第四，国营经济无限制地发展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因此，应当划分公私阵地，即公私经营范围。“要与民争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说法是错误的，“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是不对的。我们建立百货公司也不是代替全部私营商业。我们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一定的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除此之外，应当划定经营范围，不要垄断一切。

对于民主党派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去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的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其实，他们起的作用很

大，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对民主党派的经费问题，干部学习和失业问题，都要帮助解决，要把他们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要搞好同党外人士工作的关系，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该是“团结、建设、进步”。

毛泽东同志还针对党内严重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强调要在党内广泛开展对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中说，“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就是：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只要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对地主也要改造他们，否则，工人阶级自己就不能得到解放。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把统战工作提高到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战略需要的高度，这样就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给彻底说透了。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开国以后的第一次，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和学习中央的指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明确了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着重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也指出了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危害，为统战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报送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指导全国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对于推动各项统战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 二、巩固发展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

我国各民主党派原来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在全国解放以前，我们党对这些阶级、阶层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多是经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这些阶级、阶层建立了多方面的直接联系，可以从多方面直接向它们进行工作。但是，在团结、教育和改造这些阶级、阶层，并且充分发挥它们积极作用的工作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同各民主党派坚持团结合作，吸收它们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政府，同他们进行政治协商，推动和帮助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形成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个重大特点。为着巩固和加强我们党领导的这种多党派合作，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作用，我们在建国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的和大量的的是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我国共有十二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从新政协筹备开始，我们就把无党派民主人士列入党派单位，是因为他们长期参加民主革命斗争，虽然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际上是有党派性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发展形成的。同年十一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

促进会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十二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解散。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现有的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九个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成员的多数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同时都包含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人。这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广泛性，是我国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具体的政治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解放前的旧中国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头是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另一头是反革命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它们的人数也很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从封建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其他爱国民主分子，都属于中间阶级和阶层。这些阶级、阶层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有要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的一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他们曾经领导过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过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历史性胜利。但是生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很软弱，不仅有革命性一面，还有妥协性一面，小资产阶级则有着动摇性和散漫性的特点。这些，就决定了无论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达到彻底胜利。辛亥革命就是终于以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妥协而告结束的。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开始以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并且勇敢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从此，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上述这些阶级和阶层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发展成为我国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同盟军。

在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中间阶级和阶层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他们曾经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所形成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和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人一度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是受到当政的国民党反动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排挤和打击。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全中国的严重威胁，这些中间阶级和阶层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要求抗日，并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逐步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参加了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和民主的要求上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妥协投降阴谋和独裁专制的反动政策。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们遭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我们党的进一步争取团结和教育下，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逐步转到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方面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各民主党派就是这些中间阶级、阶层的人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基于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分化与组合，终于先后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们在政治上主要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动向和要求，是这些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成立，主要由国民党内各爱国民主的反蒋派和爱国民主分子联合组成。民革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它的创始人和成员中，许多人如李济深、蔡廷锴、冯玉祥等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以

前，就同蒋介石集团在抗日和民主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和斗争；有些人如何香凝、柳亚子等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国民党左派，一贯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蒋介石集团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在国民党内。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更加暴露，抗日阵营面临分裂、妥协、投降的严重威胁。这时，国民党内一贯坚持孙中山革命三大政策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联名发表通电，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反共投降政策。国民党内一部分民主分子即有组织国民党民主派的酝酿。国民党内另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如王昆仑、许宝驹等同我党合作，秘密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在国民党内进行爱国民主活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间，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派在重庆有民主座谈会的组织。这个座谈会在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发展成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宣布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最高纲领。一九四五年九月，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另一些国民党民主派发起组织民主促进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在香港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在人民革命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某些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在香港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深化了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和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更加陷于孤立。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要是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集团。它的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一九四一年三月。

当时的组成成份是：中华全国各界人民救国联合会（一九四六年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九四七年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一九四六年同伍宪子的民主宪政党合并改名民主社会党），和某些无党派的爱国民士。这些小的党派、组织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先后成立了。由于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阶层不同，其政治倾向也不同。但是基本上是爱国的，并有不同程度的民主要求，所以能够在抗日战争时期联合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中国人民救国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形成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上海各界爱国知识分子相继组织座谈会，响应我们党的号召，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中蓬勃地开展起来，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一九三六年五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召集全国各抗日救亡团体的代表及个人开会，在上海成立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负责人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章乃器、陶行知、刘清扬、王造时等。成员中有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政治上倾向共产党。在抗日民主运动中曾作出重要贡献。

（2）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是一九三〇年由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和一些脱离共产党的人们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会成立时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也不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一九三一年邓演达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章伯钧、黄琪翔、彭泽民等在香港重整组织，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发表《告



同志书》，响应我们党“八一”宣言提出的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从此采取同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在抗日民主运动中同我们党相配合，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3)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于一九一七年，主要领导人有黄炎培、冷遹、江恒源、杨卫玉等。职教社成立后的主要活动是倡导和从事职业教育，以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技术、管理人才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于从事职业教育之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创办《救国通讯》、《展望》等刊物，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运动。

(4) 乡村建设派，主要代表人物为梁漱溟等，形成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时期。当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连年军阀混战，造成农村破产，不仅贫雇农无法生活，就是富农和中小地主也遭到损害，因而产生资产阶级乃至地主阶级的乡村改良运动。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抗日战争前主要在山东省邹平和荷泽二县的一些地方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抗战开始后，梁漱溟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即是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参加政府的各党派的成员一律要退出党派，使政府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政府”。这是一种根本行不通的空想。此后开始参加民主运动。

(5) 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四年成立，主要领导人有曾琦、左舜生、李璜等，成员多是地主、资本家和政客。政治上鼓吹国家主义，一贯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提出“政党休战”，“共赴国难”的口号，抗战期间曾参加某些爱国民主活动。

(6) 国家社会党，即民社党。一九三四年成立，前身是张君勱、张东荪、罗隆基等于一九三一年组织的再生社。政治上反对共产主义，也不满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倡导国家社会主义以对

抗共产主义。其领导层中一部分是参加过梁启超的进步党或研究系的分子，如张君勱、张东荪等；一部分是依附过直系军阀的失意政客，如汤芑铭、徐傅霖、罗文干等；还有一部分是上海的一些大学的教授，如诸青来、潘光旦、罗隆基（一九四二年宣布退出）等。该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也提出抗日救国的要求，表示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但坚持反共。民社党同青年党基本上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野的官僚政客集团，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受国民党的排挤和打击，逐步参加了一些民主运动。

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上述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三党三派的主要负责人和不属于这些团体的某些民主人士如张澜等，就在重庆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并订有信约十二条。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嚣张，不但对共产党实行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对各小党派也加紧实行消灭异己的政策。这时，各小党派为促进国内团结和坚持抗战，也为着有力量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感到有进一步联合的必要，经过酝酿，于当年三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制定了十条纲领，以贯彻抗日、实践民主、加强团结相号召。一九四四年九月，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打破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并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它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反映了中间阶级、阶层在爱国民主要求基础上的团结和发展，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对于我们党加强同中间阶级、阶层的团结，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重大意义和影响。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政治团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当时它的主要成员有五个方面：（1）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包括迁川工厂联合会和重庆中小工厂联合会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京、津、宁、沪等地吸收的

某些工商业资本家。(2)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代表人物。(3)川康金融资本家。(4)和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5)部分工商业的从业人员。民建的成立也经历了一个酝酿过程。在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工商业受到官僚资本的兼并和排挤，大批中小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抗日战争后期，大后方的部分民族资本家即有聚餐会和座谈会的活动，对时局和共同有关的问题交换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感到有加强联系，成立组织的必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重庆正式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推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十五人为常务理事。这是一个主要反映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团结，并且鼓舞和推动他们参加反美蒋的爱国民主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它几个民主党派的情况，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各民主党派由于其所联系和代表的阶级、阶层都有爱国民主的共同要求，这同我们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这些民主党派中，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和极少数共产党人参加和发挥作用。在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争取团结下，它们早就同我们党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它们都有爱国的革命光荣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同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投降、倒退而努力。在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他们主要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其中，民盟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作为“第三方面”，参加了旧政协。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他们同我们党合作得很好。民盟同我们党的代表团还曾有君子协定，对重大问题事先交换意见，互相配合。其他几个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筹备会等，没有参加旧政协，他们在会外积极提出建议和

主张，在政治上和社会舆论上对我们党在政协会内的斗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国民党内部的民主进步力量，也以个人或组织的活动，积极配合，发挥了很好作用。在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要求，悍然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召开伪国大，发动全国内战的重要历史时刻，民盟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共产党一道，拒绝参加伪国大和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反动政府，并且先后把投靠国民党反动派、参加伪国大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从民盟中开除出去。各民主党派都严正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和由这个伪国大制定的伪宪法。他们都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各民主党派的这些重大政治行动，鼓舞和配合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蓬勃兴起的广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运动，成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第二条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效地支持了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

在这期间，民主党派的领导层中曾有少数人，主要是某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出来鼓吹中间路线。宣称既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道路，又反对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要走一条在国共两党的道路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们又对国民党反动派，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很大幻想，害怕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散布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这些是中间路线的消极方面，对人民革命是不利的。这条中间路线的实质，就是要在我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它从来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幻想，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仅残酷镇压我们党所领导的各项革命运动，同时对各民主党派也进行打击和迫害，不容许中间路线存在；由于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一方面积极争取团结他们共同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另一方面对中间路线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反复耐心的教育，帮助人们包括中间路线的鼓吹者提高认识，缩小中间路线的影响；还由于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力量的反对，他们团结广大成员对中间路线的鼓吹者形成制约力量，这样一些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使中间路线在民主党派中未能形成主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在这段时间的主要方面，是同我们党继续合作共同奋斗，并在共同奋斗的实践中受到锻炼和教育，不断进步。

正是由于各民主党派坚持同共产党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而斗争，它们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一批著名的领导人和成员被殴打、监视甚至逮捕，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等惨遭杀害，为革命流了血，献出了生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等党派被诬为“中共操纵指使之工具”。一九四七年十月，民盟甚至被国民党反动政权宣布为非法组织，被迫宣告解散。在这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各民主党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斗争。

一九四八年一月，在人民革命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提出了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和平、民主的奋斗任务。民盟的一部分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先后从上海秘密到达香港，同在香港的领导人会合，召开了民盟一届三中全会，重组民盟总部，正式宣布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而斗争。对此，民盟留沪的领导人张澜、黄炎培、史良、罗隆基等也表示同意和支持。在此以后，民盟实行“一面倒”，就是倒在新民主主义方面。其他几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也先后秘密到达香港，继续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活动。一九四八年五月，各民主党派

在香港发表通电、决议，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随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并且经过协商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宣布“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并宣布“全国真正为人民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一九四九年九月，各民主党派同我们党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我们党和其他各界代表人物一道参与讨论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参加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分别参加了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一些部、委的部长、主任和许多部的副部长，以及省、市人民政府的重要领导职务。所有这些，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它们不再是旧中国反动政权下的在野党，而成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参加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民主党派的总的方针是，帮助他们团结、进步和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党对民主党派采取这样方针的依据主要是：（1）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主要的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些阶级、阶层不仅合法存在，而且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联系和代表这些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应当继续存在。(2)有合作的历史。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同我们党合作多年，并且对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因此，更有条件和必要继续合作下去。(3)有作用。在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工作中，民主党派可以因其固有的联系和影响，发挥重要作用。(4)有人才。各民主党派中有许多知识分子，有不少专家、学者，是开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所不可缺少的知识力量。(5)有国际影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有利于国际统一战线的发展。

为着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和发展，我们在开国初期对民主党派进行了以下一些工作。

第一，帮助各民主党派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纲领和组织方针。一九四九年底和一九五〇年，各民主党派相继召开了各自的全国性会议。在这些会议的会前或会议过程中，恩来同志和我（有时是我一人）分别会见他们会议的代表，向他们作了报告，表达了我们党同民主党派继续保持政治联盟和实行长期合作的根本方针，帮助他们回顾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确定今后的方向和任务。经过会议的讨论，各民主党派作出决议，进一步明确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放弃他们原来制定的旧政治纲领，以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作为各自的政治纲领，同时确定在组织上进行清理、整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员。

在各民主党派的全国性会议上都是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不要以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为政治纲领？发展成员要不要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右翼分子虽然已经宣

布放弃他们过去鼓吹的中间路线，但在思想深处仍然怀着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思想，想在人民民主专政下搞反对派，在组织上则力图排斥进步分子，把民主党派搞成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民革有人甚至主张发展成员可以不问政治面貌，要求登报号召国民党员归队。对极少数右翼分子的这些错误主张，我们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采取“政治严肃、组织宽大”的原则，支持进步分子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使这些右翼分子在成员中陷于孤立，同时在组织上团结他们，仍给他们以一定的政治安排和实际工作。做到既坚持了原则，又坚持了团结，从而使这些民主党派中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清理整顿组织。解放初期，民主党派存在着组织不纯和领导机构不够健全的问题，有的地方组织严重不纯，甚至组织系统也不统一。例如南京解放的时候，民革就出现九个市级组织，各不相属。其中有个叫民革特别小组的，它的领导人王龙为南京著名的土豪，一直为国民党军统工作。这个小组在社会上公开招收党徒，滥发党证，吸收国民党国防部军闻社的全部职员（都是特务）参加，影响很坏。农工民主党在南京也出现两个市级组织，其成员包括各色复杂分子。这种情况同民主党派在新中国的地位和所担负的政治任务很不相称。为此，各民主党派的全国性会议都作了清理整顿组织的决议。要求把那些混进民主党派组织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清洗出去，把领导机构健全起来，在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尽可能做到：左派加中间偏左的分子占优势，同时包括一批中间分子和少数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右翼分子。当时，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确定的清洗对象主要是五种人：（1）过去和现在的特务分子，（2）反苏、反共、反人民者（包括反土改的在内），（3）过去在反动党、团、军、警、宪及日伪机关服务，罪恶昭著而无主动赎罪表现者，（4）过去作恶多端为人



民所痛恨者，(5)贪污腐化者。各民主党派经过清理整顿，健全了各级领导班子，为在新中国发挥应有作用，在组织上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明确指导思想。各民主党派内部都有左中右的政治分野，包含了不同阶级的人们，因此，不可能要求民主党派以工人阶级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当时有些进步分子脱离实际，要求规定以马列主义作为民主党的指导思想。按照这种意见去做，就会把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相混淆，脱离广大中间群众的思想水平，只能造成混乱。我们及时地向民主党派提出这个问题，帮助各民主党派明确以“承认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思想为指导思想，而不是以工人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

第四，帮助各民主党派协商确定各自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重点：民革的对象是原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民盟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和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农工民主党是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台盟是在祖国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

第五，为避免引起有关国家的疑虑和外交纠纷，经协商确定各民主党派原在国外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建立的分、支组织，停止活动。

第六，帮助发展成员。各民主党派在解放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处在国共两个阵营的尖锐斗争环境中，很少有活动余地；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不允许它们公开活动，等等)和自身的弱点(软弱性、活动圈子小，更多局限于上层人士范围等)，其成员人数在解放初期都很少。最多的是民盟，只有七千余人，有几个党派只有一、二百人。为着使各民主党派能够担负起它们在新

中国的政治任务，在它们的组织经过清理整顿之后，很需要适当发展一批新的成员。一九五〇年十月各民主党派举行中央会议时，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提出了发展成员的建议。我向他们的这次中央会议作了题为《更加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讲话，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讲民主党派的发展与巩固问题。一九五一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把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同志在听取这次统战会议的汇报时说，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民主党派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该写出几条指示发到各地去。我们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九五一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要求各地在一九五一年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一至二倍；发展地区主要是大中城市和省会；发展成员的条件应该是拥护《共同纲领》并愿为其实现而奋斗。经过各民主党派的努力，加上我党有关组织和统战部门的积极帮助，到一九五三年初，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共发展了两倍，可以说是初具规模。

第七，推动帮助各民主党派进行学习改造。主要是学习《共同纲领》，学习时事政策，学习毛泽东思想。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成立学习座谈会，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学习工作。对于各民主党派中在文教、科技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则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以适应他们所担负的工作任务的要求。

经过上述工作，为各民主党派在建国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打下了较好

的基础。

### 三、开展政权机关、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当时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各级协商机关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协的第一届代表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中国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

在县以上各级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中，都有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参加。因此，做为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党对这两方面的统战工作都非常重视。当时，我兼任政务院和全国政协的秘书长。一九五〇年政务院各部、委成立之后不久，我们即推动各有关部、委党组，进行统战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改善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一九五一年四月，在中央领导下，以政务院的名义召开了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同时以全国政协的名义召开了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分别讨论政权、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问题。我在政务院召开的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了题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经会议讨论同意，报请中央批准，下达各地执行。

这次政务院第一次全国秘书长会议，在政权机关统战工作方面主要明确了以下几个问题：（1）一个基本原则。一方面要使政

府机关每个工作人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有职有权，有与自己职务相称的权力，以便履行其职责；另一方面又要使每个工作人员不仅口头上而且行动上，对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的实施，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与纪律性。（2）必须把沟通政策思想的工作，视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团结进步、统一行动的基本工作。（3）必须有职有权有责。一份职务，一份权力，一份责任，三者不可分离。有职无权是不对的，有职有权而不尽其应尽的责任也是不对的。（4）共产党员要主动团结非共产党员。（5）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6）大家学习毛主席，学习他的思想、理论和作风，使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7）政府机关的统战工作由有关部门的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掌管，要定期检查和总结。

在全国政协召开的省、市协商委员会秘书长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各级协商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会上反映，各地对协商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各方面的关系在认识上存在原则性分歧。有的认为协商委员会是一种政权性质的机关，是行政或立法机关。有的认为协商委员会对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应该是领导关系。也有的将协商委员会看成政府的隶属机关，政府对它可以命令行事。还有的认为协商委员会可有可无、是无足轻重的机关。我在会上就这些问题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问题作了报告。经过会议讨论，获得以下共同认识：各级协商委员会的性质是统一战线组织，它不是政权性质的机关，更不是政府的上级机关，也不是政府的隶属机关。它同政府的关系是协商、建议和协助政府联系人民推动工作的关系。它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也不是领导关系，而是它们协商和团结合作的机关，靠协商办事。协商委员会与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关系，也是协商和团结合作的关系，统战部应协助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这次会议根据协商

机关的这种性质，制定了《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组织通则》和《关于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协商委员会如下的工作任务。

(1) 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并了解决议执行情况。

(2) 协助人民政府联系人民，征求并反映人民意见。

(3) 审议政府交议的文件和议案。

(4) 系统地搜集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教卫生、市政建设、宗教事务及其他方面材料，进行研究，提出意见，供政府选择。

(5) 召集各界人士座谈会，协助政府解释政策法规，并征求对政策法规的意见。

(6) 接受人民的建议、询问、要求、申诉与批评，并负责加以处理。

(7) 协助与推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各种人民革命运动和建设工作。

(8) 组织时事座谈会和学习会，协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进行时事、政策和理论学习。

(9) 协助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解决相互有关的问题，加强团结合作。

(10) 对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及训练干部等工作予以可能的协助。

(11) 协同人民政府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这两个秘书长会议的召开，对于全国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的统战工作的开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明确了方向和任务，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 四、筹备建立全国工商联开，展 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工作

工商业联合会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其成员中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以及合作社等也参加在内。它的基本任务一方面是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建议和要求；另一方面以《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并指导他们积极从事合法的生产和经营，进行思想改造，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我国的私营工商业者在旧中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工商业联合会的组织。他们曾经组织过商会和同业公会，大都是地区性的，并且带有封建行会的性质，根本不能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形势和任务，需要加以整顿和改造。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我公营企业的主持人员亦应参加进去一些，以便教育和团结私人工商业家”。“工商业联合会的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的比重应逐步增加”。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过程中，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曾协商过筹建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问题，但由于时机不成熟，未能开始筹建。

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帮助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自我改造，对各地原有的同业公会等组织进行整顿改组，并在大中城市逐步建立市级工商业联合会，为筹建全国工商联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中再次指出，“必须加强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公营企业必须积极参加工商业联合会的活动。党和人民政府则经过统战部门和财经部门，去

实现对工商业联合会的业务的和政治的领导”。一九五一年十月，各地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工商界代表人物，普遍要求成立工商界的全国性组织，并且为此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和酝酿。上海等地的一些工商界大户还表现了企图控制全国工商联和排斥中、小户的苗头。十月六日，中央统战部邀请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工商界代表座谈，我在会上提出工商界应当有他们自己的从地方到中央的组织，以便有效地搞好工商界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工作，用民主的方法进行工商业者的自我教育，以利于更好地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同时提出目前各地工商联还都存在对中、小工商业者照顾不够的缺点，并强调说明新民主主义的工商联应当成为代表全体工商业者的机构，不但应当广泛地吸收中、小工商业者为会员，工商联的领导机构也必须有适当数量的中、小工商业者的代表。我还讲了工商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问题，肯定工商界两年来在这方面已经取得较大成绩，但是目前还有部分工商业者存在暴利思想，因此工商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工作还要进一步普及和深入。

这次座谈会后，我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指定一个筹备全国工商联的小组，负责进行准备工作。中央同意这个建议。随后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成立全国工商联筹备处，指定由陈叔通、李维汉、章乃器三人负责。陈叔通任筹备处主任，他很热心很积极，受到各地工商界代表人物的欢迎。筹备处成立后，在十一月份先后同各地参加一届政协三次会议的工商界代表座谈协商两次，确定全国工商联的筹建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成立筹备处，进行准备工作。第二步召开筹备代表会议，产生全国工商联的筹备委员会及其常委会。第三步，经过必要的准备，召开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筹备处成立后，积极进行了以下几项准备工作：（1）起草了《中华全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组织条例》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地区代表产生办法》，经政协全委会常委会批准实行。(2)提出了筹备代表会议代表的分配办法，确定了国营和私营企业代表的人数比例。经协商全部筹备代表会议的代表为三百七十三人。其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代表六十三人，约占百分之十七。私营企业代表三百一十人，约占百分之八十三。大户和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一百二十四人，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小户代表五十五人，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介于大户和小户之间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另有三名为台湾保留。这样做到大中小户各得其所。(3)推动各地工商界积极做好筹备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包括推选好代表等。原计划全国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召开，因“五反”运动尚未结束，推迟举行。

为着开好全国工商联筹备代表会议，中央统战部和中财委在会前分别进行了调查研究，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措施。我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带调查组到华东等一些地方调查研究了“五反”中及“五反”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情况，以及如何分别领导大中小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问题，草拟了改组各地工商联的方案，修改了原草拟的工商联组织通则稿。一九五二年六月，召开了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审慎地学习研究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通过了《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草案)，报经中央修改批准。这个指示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工商联是工商业者联合组织起来的人民团体，其成员中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及合作社也要有代表参加，它既有代表私营工商业者合法利益，以至为此进行合法斗争的权利，又有以《共同纲领》及有关政策法规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并指导他们积极从事合法的生产和经营的义务。只有结合这



两个方面，才能发挥私人资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性，才能使工商联成为党和人民政府团结、教育和改造私营工商业者，并在广大工商业者中享有适当信仰的团体。

(2)改组工商联，是要使工商联的各种组织经过适当调整后，既能实现大、中、小户各得其所，又便于党和人民政府向他们分别地、直接地进行工作，实现领导。

(3)为适应大、中、小各得其所的方针，大城市的工商联应有市、区两级组织。市工商联是全市工商界的统一组织，其常务委员会应以大户和上层为主体，个别吸收中、小户代表参加，使之成为大户和上层日常活动的场所。区工商联则应成为中、小工商业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活动阵地。

(4)同业公会是工商界历久相沿的组织，在处理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和今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具有重要作用。要改变过去少数上层把持操纵、压迫中小工商业者的情况，使之成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

(5)在大、中城市，摊贩、手工业者一般可不建立全市性的联合组织。摊贩可按市场建立委员会，手工业者可按行业分编小组。

(6)加强各级党委对工商联的领导。要加强国营企业代表和合作社代表在工商联的工作，以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并应在大、中、小户中，特别是在大、中资本家中培养政治上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积极执行《共同纲领》的有代表性的进步分子。

中财委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一九五二年五月间，他们在大区财委主任会议上研究了“五反”后的市场情况，定出了活跃市场的各种具体措施。随后，接连公布了政务院关于胜利结束“五反”运动的指示，花纱布公司提高了棉纱工缴，人民银行降低了存放款的利息，贸易部门指示有关专业公司扩大推销工业品。这些措

施，使私营工商业者喜出望外，对政府的照顾表示感激，为开好筹备代表会议作了重要的政治和思想准备。

一九五二年六月下旬，全国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以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会议，也是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集中进行统战工作的一次会议。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明确地提出对这次会议的方针是要在消除“五毒”的基础上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指定由薄一波、李维汉、叶季壮、程子华、李立三、王首道、南汉宸、薛暮桥、孟用潜、赖若愚、许涤新、吴雪之、曾传六、李哲人、黄达、李维新、王廷弼组成党组干事会，负责具体领导这次会议。周恩来同志到会作了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陈云同志亲自指导会议的召开并到会讲话。毛泽东同志亲自接受他们献旗，使参加会议的代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次全国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是在“五反”运动胜利结束的时候召开的，参加会议的私营工商业者代表大多数在“五反”运动中受到批评教育，对我们党和人民政府有疑虑、有牢骚。有些代表不敢讲话，有些代表则想抓住某些地方人民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点泄愤。他们对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或多或少地丧失信心。针对这种思想情况，筹备处主任陈叔通在开幕词中说明“五反”的必要和重大意义，并且说明了私营工商业者在消除“五毒”以后仍有光明前途，鼓励工商界发挥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我们遵照中央的方针，在会议中既引导他们检讨过去的缺点错误，又鼓励他们就目前私营工商业所存在的困难和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各种措施大胆发表意见，有意识地让他们诉诉苦。在这样的基础上，陈云同志到会讲话，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在会上所提出的和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1）关于加工订货的合理利润问题，（2）关于加工订货的规格问题，（3）如何活跃城乡交流和内外交流，（4）银行

利息问题，（5）税收问题，（6）劳资关系问题，（7）关于防止“三害”、“五毒”问题等，一一作了明确解答，使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大体上得到适当解决。陈云同志讲话中还指出了开国三年来国家建设的巨大发展和今后的光明前途。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听了陈云同志的讲话和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后都感到满意和兴奋，普遍认为不但解决了经济问题，而且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问题，不但解除了当前的困难，而且解除了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顾虑，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增加了信心。会议最后经过协商选出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陈叔通，副主任李烛尘、南汉宸、章乃器、孟用潜、盛丕华、许涤新、荣毅仁、傅华亭、陈经畲、黄长水、胡子昂、巩天民、李象九。

这次全国工商联的筹备代表会议取得完全成功。通过这次会议，贯彻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直接向他们做了大量统战工作，既巩固了“五反”运动的胜利，又缓和了“五反”运动后紧张的阶级关系，安定了资产阶级的情绪，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参加会议的全体党员同志经过会议，对于党对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和策略的运用方面，有了进一步体会和了解，为今后开展对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实际上，筹建全国工商联的过程，就是我们逐步开展工商方面统战工作的过程。这次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使我们把工商方面的统战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 （二）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努力

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总的说，是为完满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集中地体现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和特点，是我们党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开国初期的共同奋斗纲领和共同政治准则。共同纲领的基本任务是要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为社会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为着实现这些繁重艰巨的任务，我们党在建国初期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五大运动，或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都是为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推进五大运动的顺利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在斗争的实践中受到了锻炼和考验，更加巩固和扩大，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显示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一、为三大运动的胜利而努力，在 三大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建国初期，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政治运动。这三大运动的矛头都是针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他们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都是为着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夺取三大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可以团结的人们都团结起来，使革命的敌人彻底陷于孤立的境地，以便战而胜之。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在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

主人士中还有一定的社会联系和影响，因而三大运动的开展，对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又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经过这种锻炼和考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然更加巩固与扩大。

### 1. 土地改革运动

土改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消灭地主阶级，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解放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建立工业化的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个历史任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全国解放以前，已在约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业人口的老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尚有二亿四千六百万农业人口的新解放地区没有进行土改。在那里，封建土地制度仍然存在，广大农民仍然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完成这些地区的土改，是开国初期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革命任务。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在对待土改的问题上，总的说是一致的。不仅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坚决要求土改，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对土改的基本态度也是大体上拥护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在成立时制定的政治纲领中，也提出了改变土地制度的某些主张和要求。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不少人同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土地有着密切关系，有些人自身就是工商业者兼地主或者地主兼工商业者，还有少数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同土地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自身的利益同土地改革又是相矛盾的，加以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对土改的长期造谣、诬蔑的影响，因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

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对土改还有着不同程度的疑虑，有些人甚至有很大保留。他们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不断的争论。

一九四六年，我参加中共和平代表团在南京同一些民主人士的接触中，就曾直接同他们中的某些人进行过争论和说服工作。当时，一些民主人士对解放区的土改提出了许多批评，黄炎培为此给毛主席写了信，同时抄一份给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国民党得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派陶希圣、陈立夫先后去找黄谈话，要他把这封信公开发表。黄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是做得对的。事后，陈立夫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给黄打电话说，“我接到一个材料，说共产党要暗杀你。”黄想，共产党是不会要暗杀他的，但为提防国民党借口共产党来暗杀，他就在电话上说，“那请你保护。”结果国民党立即派了一个武装特务来把门，黄要见任何人都得通过这个特务，把黄气病了一场。这件事给他很大教育。有一次我去向他和冷御秋、杨卫玉等说明土改问题，黄向我说，“民主要武装，我们没有武装的民主就成了这样！”他们对土改的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怕地主没有出路。另一条是怕地主挨斗争，不赞成发动群众。我向他们解释土改的必要性，指出这是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和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先生早就主张“耕者有其田”。我们党的政策是也给地主分一份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他们在土改后只要好好劳动改造是有出路的。对此，他们表示同意。至于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我向他们说明，没有群众路线，不把群众发动起来，靠官办土改是搞不好的。他们听了也觉得有道理，黄炎培还举了国民党的例子，说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要在十二个县实行减租就是官办的，结果十一个县都没有办，说明靠官办不行。但是他们对发动群众同地主进行斗争，在思想上感情上总觉得使地主丢面子，有些接受不了。特别是对我

们的基层干部有意见，说“你们那个苏北，党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但坏就坏在政府，下边有很多干部是流氓”。这是反映地主的观点。我举出苏北的材料，向他们解释，同时说明我们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他们说他们也是有理之争。这次接触，虽然没有能够取得完全的一致，但是总的说，还是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要在广大新解放地区进行土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的一些人在土改问题上同我们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再一次表现出来。这集中表现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

这次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土改问题。中共中央向会议提出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说明了土改的必要性，正义性和各项有关方针政策。他指出：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的存在，使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惨遭剥削，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他提出，在土改时期，“应该在工人中，学生中，职员中，工商业者中，在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中，解释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法规，使他们了解，并同情农民，帮助农民，而不要去同情地主，帮助地主，更不要去庇护地主，庇护自己亲戚朋友中的地主分子”。

对于我们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少奇同志的报告，大部分民主人士在讨论中表示赞同，但是其中有不少人表露出“和平土改”的幻想，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

争”。一些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和爱国起义将领，则对土改表示怀疑、不满以至抵触。他们说“地主养活农民”。“地主和佃农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地主的好处不可一笔抹杀”。“土改偏差很大”，“斗争过火”。党和国家的干部“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地方的农会常常被土匪流氓所把持”，等等。有的人则散布“江南无封建”的错误言论，对土改进行抵制。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有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一度表现附和和共鸣。这是在土改问题上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我们党在会议过程中对各种怀疑、反对土改的错误言论和幻想“和平土改”的错误思想，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分别约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一些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座谈，沟通思想，交换意见。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我们党的一些参加会议的同志，对攻击基层干部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有力批驳。明确指出：广大基层干部特别是南下干部是在敌我生死斗争中久经考验过，忠心耿耿，艰苦朴素，在敌人面前奋不顾身，在解放西南、剿匪与稳定物价等工作中，成绩是主要的。他们的缺点，要帮助改正，但要实事求是，夸大他们的缺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党外的朋友也进行了批驳。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程潜说，土改中所传的偏差和错误，“有的是事实，而大部则是匪特的造谣和顽固地主的叫嚣，决不可一概而论。据我的考察，广大的新老干部，在生活上及其服务情绪上，都是能够忍苦耐劳，充分发挥了公而忘私的奋斗精神，表现了纯正的作风。就是留用的旧军政人员，很多正积极自求改造，亦在工作中有了好的表现。假使没有这些干部的艰苦奋斗，我们几个月来的成就，是不会有这样伟大的”。爱国起义将领傅作义说，“根据我耳闻目睹的事实，这些同



志们的功绩，是应该无愧的受到人民的表扬。……他们常常是下铺地，上盖天和蚊虫一块儿睡觉。但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执行政策，时刻在怀念的是完成任务。执行政策，完成任务，无保留的为为人民服务，就是他们所有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全新的基层工作干部的作风和风貌”。还有些党外朋友提出，对基层干部要从正反两方面的反映去分析问题，不能盲目听信无根据的谣言。

经过大会、小会以及各种形式的会议的协商讨论和辩论，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分清了是非，统一了认识，这次政协会议通过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分别在大会上发言，宣布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并且号召它们的成员为土改的圆满完成任务而努力奋斗。民革主席李济深说，“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碍了人民的国家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前程，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每一个参加单位，都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并号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全体同志为全会决议的实现而奋斗到底”。民盟主席张澜代表中国民主同盟表示完全拥护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所谓“人民负担过重无法生存”的叫喊进行了批驳，说“这种叫喊的来源，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挑拨离间的阴谋。其次，这种叫喊是大部分来自地主阶级。对这种反动恶意的叫喊，应该加以警惕，并且不要轻于置信”。民建常委会召集人黄炎培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认为依据国家的政策和法令，“今后的土改工作，可以做得比过去更加好，而且可以收得更大的效果”。民进主席马叙伦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全体会员向大会郑重宣布：“为保证这些报告所提出的历史任务的全部彻底实现而奋斗”。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说：“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二十二年前，创党的时候，虽然提出耕地农有的土改政策，……因

为没有采取依靠贫雇农的路线，不是站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立场，所以只提出发行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的办法，结果，对于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实际的贡献。这不是偶然的”。“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等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

有些爱国起义将领也在大会上表明了支持和拥护土改的立场。爱国起义将领刘文辉坦率地说，“我就是一个大地主，拿四川话来说就是‘大绅粮’。我将无条件无保留的献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在没有实行土改以前，当然还要照章缴纳粮税。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绅粮’应该觉悟的时候了！”爱国起义将领卢汉说，土改“关系今后建国的根本”。“自己原是一个地主，回到家乡，一定要多方解说，劝导，为实现土改而斗争，自己首先放弃过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权益”。爱国起义将领邓锡侯说，“这样一个土地制度的改革，在我个人，我可以坦白的说，是和我本阶级（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我愿诚挚的拥护这样的一个土地改革，我要坚决的放弃本阶级的利益，来服从全国人民的利益，服从整个革命的利益”。“我抱定决心，不仅做到军事上的‘起义’，而且更要做到阶级上的‘起义’”。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起义将领的这些发言、讲话、现身表示态度，批驳了各种怀疑、反对土改、以及庇护地主阶级的错误言论，打击了地主阶级攻击诬蔑土改的反动叫嚣，支持了广大农民的土改运动，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顺利进行土改有重要积极意义。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出色的成功。

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致了闭幕词。他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过好土改关，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他说，“战争和

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都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他重申了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指出，“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毛泽东同志最后强调提出，一定要巩固和扩大我国的广泛统一战线。他说“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方法，提出了党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光明前景，对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一切爱国的人们是极大鼓舞，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上有着长期的指导意义。

这次人民政协的会议之后，各民主党派都发布了拥护、支持

土改运动的指示和决议，号召和动员它们的成员认真学习和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积极支持和参加土改运动，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 2. 抗美援朝运动

抗美援朝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场伟大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爱国主义的一致和热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遣它的第七舰队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省。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国政府于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侵略行为。九月十五日，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港登陆，占领汉城，越过三八线，迅速把侵朝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派飞机不断轰炸扫射鸭绿江边我国的城市和乡村，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和安全。九月三十日，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国政府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纷纷要求以志愿的行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表现了爱国的热忱，拥护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国政府表示的不能“置之不理”的声明，一部分人并且主张以武力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中不少人也暴露了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把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认为它不是纸老虎，怕打仗，怕“引火烧身”，担心美帝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尤其怕原子弹，幻想“关门建设”。极少数人则主张“隔岸观火”，主张在忍耐退让中求生存。

我们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先在党内进行讨

论，征求意见。有一次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在场。毛泽东同志问我的意见，我本着列宁关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要援助尚未胜利的国家的道理，主张出兵援助朝鲜。中央决定后，又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少数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座谈，征求他们的意见。主要由恩来同志和我出面，分别约他们座谈三次。他们也都是同意出兵援朝的，有的一开始座谈就很坚决，主张出兵。个别人有点疑虑，经过座谈，很快取得了一致。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名发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严正宣布，“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各民主党派还分别在各自党派内部发出指示，动员他们的成员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光辉胜利，根本扭转了朝鲜的战局，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受到巨大鼓舞，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团结，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昂。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界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毛泽东同志复电表示赞许，号召“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正是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和九三学社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分别召开了中央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集中力量实行抗美援朝的问题，并讨论发展组织的问题。在他们的会议开幕之前，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了招待会。周恩来同志到会作了形势报告，并向各民主党派建议巩固发展组织。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更加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报告，针对统一战线内部一些人存在着崇美、恐美甚至亲美的情绪和错误言论，作了分析批评和解释，说明需要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普遍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并对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共产党人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说明，向他们表示，我们一定本着诚恳坦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有建议，有批评，希望彼此成为诤友、益友。

各民主党派的会议都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且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大多数人为中朝人民在朝鲜前线的胜利所鼓舞，提高了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爱国主义热情大为高涨。但是不少人也流露了害怕大打、长打的情绪，希望朝鲜战争不致扩大，能够出现适可而止的局面。少数人暴露出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但在会议中没有市场，立即受到反驳。经过认真讨论，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会议都作出了政治决议，表示支持《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分别号召成员和他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人们，团结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为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 3. 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为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保卫革命成果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场伟大斗争。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

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在共同纲领的这个规定指导下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支持和保证了土改和抗美援朝运动的胜利进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初期，残留在祖国大陆特别是广大新解放地区的政治土匪、国民党特务以及各种反动会道门头子，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以后，以为他们日夜梦想的“三次大战，反攻大陆”的时机来到了，纷纷从阴暗角落出来，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工厂矿山，烧毁仓库资财，公开进行抢劫，残酷杀害干部、乃至发动骚扰暴乱事件。有些新解放区的农会干部一次被杀十余人，仅广西一省的干部被杀的就有三千余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极为猖狂，而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在校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又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偏向，更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要求坚决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个条例贯彻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对各种反革命首要分子、解放后怙恶不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间谍分子，采取从重处理；对于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而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协从分子，解放前虽曾参加反革命活动，但罪行并不重

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的分子，特别是为人民立了功的分子，则实行从宽处理。这个条例的颁布和实行，支持了广大人民群众同各种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的嚣张气焰，促进了各种反革命势力的分化瓦解，从法律上保证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

对于这场同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的严重斗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是一致拥护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表现了积极性，在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民革中央和北京市级组织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举行了“拥护镇压反革命运动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大会”。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会上讲话号召民革成员以实际行动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分子，并向群众广为宣传。民盟在运动中发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学习提纲》和有关指示。民建发出了《关于积极进行镇压反革命的通告》。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台盟和青年团的上海市级组织联名发表了《拥护政府逮捕反革命罪犯》的声明，号召全上海各界人民动员起来，“控诉反革命的罪恶，检举与监视反革命分子，认识反革命的危害，使人人看清反革命分子是我们人民的公敌”。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时，党外人士中有些人曾经暴露出一些错误思想，表现为划不清敌我界限，主张对反革命分子“施仁政”，特别是有些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历史联系的人们，思想上有较大震动。为着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物进行充分协商。许多省、市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协商确定对反革命案件的处理原则，并对错误思想进行批评教育，帮助划清界限，消除疑虑。不少省、市还注意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处理。他们参加工作后看到人民政府处理反革命案件的严肃谨慎精神，看到反革命分子的罪恶



事实，都深受启发和感动。各地在镇压反革命分子时，还注意吸收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对反革命分子控诉大会，帮助他们更加增强对反革命分子的认识和仇恨。

经过对党和政府有关镇压反革命文件的学习和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实践，统一战线内部普遍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镇压反革命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民主党派的许多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积极组织成员学习和宣传有关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控诉反革命分子；有的号召成员利用社会关系，规劝特务和反动党团分子进行自新登记；有的协助当地政府监视和防止特务的活动、等等。这些，壮大了革命声势，灭了反革命分子的气焰，使他们更加孤立，从而支援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

#### 4. 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和三大运动的扩大与深入

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土改、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的高潮中，我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是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周恩来、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到会作了报告。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1) 抗美援朝运动的巩固、扩大和深入。他提出，必须进一步掀起抗美援朝运动的高潮，并把它同土地改革、肃清土匪、镇压反革命等结合起来。在运动中孤立打击极少数敌对分子，团结大多数，包括对天主教、基督教都要进行工作，扩大统一战线。

(2) 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他说，中国除了无产阶级以外，还有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教育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组织起来进行，总比不组织更容易收效。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正是便于这种组织工作，而不是自找麻烦。有了民主党派，我们就可以经过他们去影响这些没有

组织的人们，并且经过这些党派的政治活动，也可以锻炼和考验这批人。我国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合作，是有贡献的。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

(3)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问题。他说，对党外民主人士要采取坦白的态度。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情况，土改政策也好，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也好，都要真诚的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有的同志怕这样做会泄露了机密，其实所谓机密，是指当时泄露出去会有利于反革命的东西。至于我们的政策，我们已经做了的事情，广大群众都知道的，为什么不能给民主人士知道呢？

彭真同志的报告着重讲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问题。他说，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都与统战工作有密切关系。这三个工作搞好了，统战工作也会搞好，三大运动不但不会妨害统战工作，而且是需要统战工作来推动，同时在运动中也推动与扩大了统一战线。他还提出，抗美援朝要从城市推广到广大农村中去，要注意到各个落后阶层。对工商界要大力开展工作。对教会的教徒与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职员也要着重展开工作。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统战工作，把落后阶层团结起来了，进步的也就能提高了。

陆定一同志的报告是讲在反帝爱国运动中争取团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问题。他说，如果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除了开展一般的群众反帝运动以外，还要把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争取过来。由于他们长期受美帝国主义影响，要动员他们参加反美斗争是一个艰苦工作。要看到宗教的长期性，恐怕要到共产主义才可能消失，因此要有耐心。要能和他们谈心。政府要出面支持他们的革新运动。目前我们所要求的中心目的，是使教会在政治上、组织上脱离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把广大教徒从帝国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

来。除反革命分子外，把所有的教徒都团结过来。

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总结报告。说明统一战线是全体人民的统一战线。工人阶级争取自己阶级的解放是与统一战线不可分离的。目前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三大运动相结合，应进一步动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参加全体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国防，巩固财经阵地，发展和巩固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同时，对民主党派问题、无党派民主人士工作以及统战部门的任务等作了说明，强调统战部门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政策水平，克服“左”的和右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和团结。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过程中同参加会议的各中央局、大城市党委统战部的同志谈了话。他指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是当前的三大运动。在讲到抗美援朝运动时，他说这个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在谈到土地改革运动时，毛主席强调指出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前去参观视察。他说，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他说，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作。我们作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他指出，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

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谈到统战部门的工作时，毛主席说，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你们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你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之后，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提出一九五一年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继续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务使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积极争取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土改、镇反等人民革命斗争和适当工作。

在这次统战工作会议和中央指示以后，我们会同全国政协，组织大批各界人士参加和参观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仅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份，北京和天津两市参加、参观土改的各界人士即达八百二十四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有六百八十九人，约占百分之八十。各界人士的参加，不仅直接支援了农民，壮大了反封建统一战线的阵容和声势，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对各界人士，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改造的机会。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物通过土改中阶级斗争的实践和实际教育，一般都有不少收获和进步。

(1) 进一步认识土改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对土改由怀疑转为支持与拥护。司徒美堂到广东，两次下乡参观土改，认识和态度有很大转变。他在群众大会上讲演，赞扬农村土改的新气象，号召各界人士支持土改。恰在这时，美洲反动报纸造谣说：司徒美堂在家乡被清算斗争，游街示众枪毙后装入猪笼，暴尸三日。这

个谣言在美洲曾哄动一时。司徒美堂针对这些谣言，在民主人士土改队下乡的欢送会上发表演讲说，“反动派造谣说我被斗争死了，但我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教育之下，更健康，更加年青了。我每餐二碗饭，不能缺少，反动派又奈我何？！”对反动派在海外的造谣、诬蔑，给了有力的回击。黄炎培在参观苏南土改后说，“群众的意见是民主的，我从钱桥乡农民的谈话中，知道农民并非过份。如果我黄某为农民，一旦翻身，也许要做出过份的事来。”又说，“苏南地方首长对于政策法规掌握得很好，已尽地方之能事。不管政策是从宽从严，苏南地方当局对土改的掌握恰到好处，我看了以后，确实觉得不差。”

(2) 他们通过亲身参加土改的阶级斗争，听到农民一字一泪的诉苦，亲眼看到地主的顽抗和破坏土改的种种反动活动，认识到地主阶级的凶恶面目和采取激烈的群众斗争的必要。

(3) 对农村干部表示钦佩和赞扬，“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的言论不攻自破。有些民主人士过去误信地主的叫喊，说什么“干部偏差大”，“征粮太重”等等。参观和参加土改后，态度改变了。有的感慨说，“咱们以为农村干部很愚昧，但并不是这样，他们知道很多道理，很懂政策。”“所谓干部有偏差，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有的教授说，“参加一次土改，胜读十年书”。

(4) 认识了农民群众力量的伟大，看到了共产党在农民中的深厚基础。有的教授下乡原先准备去指导农民分地，看到农民团结互让，公平合理的分配，觉得出乎自己的预料。民主人士在参加或参观土改中，看到农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共产党的拥护，感到“共产党是生了根的”。看到土改后农村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农民参军的热烈，生产热情的高涨，对新中国的前途更增加了信心。

我们在大力推动和组织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知

识分子、工商业者以及宗教界代表人物参加参观土改的同时，还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民主人士投入抗美援朝运动的实践中去，为抗美援朝运动作出实际贡献。

在三大运动中，对于涉及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问题，我们党注意给予适当照顾。中央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发出了《关于在镇压反革命中处理涉及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爱国分子问题的指示》，一九五一年六月又发出了《关于在土改和镇反中对高级民主人士家属照顾和宽大处理的规定》。指出“对于解放前已开始参加反蒋斗争，已经与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特别是高级民主人士，对于真正起义的军官在土改和镇反中，必须有意地予以特殊的照顾或宽大处理，这对于统一战线和革命胜利的巩固是十分必要的，决不可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与一般反动地主和反动军官一样对待”。文件中还规定了具体的照顾办法。这些指示和规定的贯彻实施，对于保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稳定团结，争取团结更多的人支持和参加三大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的看，在三大运动中，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充分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完全成功，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爱国分子，最大限度地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和全社会上形成政治上和舆论上的强大优势，对于比较顺利地完成三大运动的任务，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经过三大运动的锻炼和考验，清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限，统一战线内部的一致性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团结面也更加广泛了。这就为彻底完成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各项任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一年，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土改的完成和抗美援朝军事订货的增加，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相当的发展，私营企业利润剧增，达到了解放后的高峰。资产阶级欢呼是“黄金时代”、“难忘的一九五一年”。也就在这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从其唯利是图的本质出发，见利忘义，施放糖衣炮弹，腐蚀国家干部，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罪恶活动，向国家和工人阶级发动猖狂进攻。面对这种形势，中央决定开展全国性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斗争，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这场斗争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对资产阶级一次集中的改造运动。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允许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和发展，但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任其泛滥，而是要从活动范围、市场价格、税收政策、劳动条件等各个方面加以限制。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多种方式上的反抗。毛泽东同志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五反”运动就是这种限制和反限制斗争的集中表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不然的话，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将会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发生演变，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就难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将难以确保。我国的前途将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回复

到帝国主义附属国或者殖民地的绝境。

这场运动，并不是要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而是为着打击资产阶级的非法行为，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打击的重点是极少数五毒俱全、完全违法的反动资本家，使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内部完全陷于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并引导他们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我们党和政府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群众，同不法资本家进行面对面的激烈斗争，并对资产阶级实行利用矛盾，进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争取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形成广泛的“五反”统一战线，狠狠地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不法行为，使他们的威风扫地以尽。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中央指示各地，不要乱抓资本家进行审讯，不许肉刑逼供，要严防自杀。在运动后期进行处理时，中央确定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对私人工商户按五类划分，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实行区别对待，把打击面限制在极少数完全违法户。据华东等五个大区六十七个城市和西南全区统计，受到刑事处分的只占千分之一点五，斗争的策略是慎重的也是比较稳妥的。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违法资产阶级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也巩固了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经过运动，在大的私营企业里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建立了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从此，资本家的“三权”（人事调配权、经营管理权、利润分配权）受到了限制，变成了“三靠”，即资金靠银行，原料靠国营，生产靠工人。这场斗



争的伟大胜利，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和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运动过程中，不少地方和基层单位曾发生简单粗暴的做法，出现了乱抓资本家进行审讯和逼供的情况。这些缺点，同运动初期毛泽东同志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限期推开运动、要求各地都作出一个“打老虎”预算的做法是分不开的。我在指导民建和工商联的运动中，曾经提出过“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经毛泽东同志发现指出后，作了改正。总的说，这些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三反”、“五反”是完全必要的，成绩是巨大的。

一九五二年三月，毛泽东同志约黄炎培谈话。对于“三反”“五反”运动后民建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同志谈话中着重强调大资本家的重要性，他说，从全国看来，有些大工业家，他们掌握着的工厂，经济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业还要大。用经济观点，向远的大的方面看，这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他指出，民建会对资本家五毒俱全的，完全违法的，一定不要；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争取，半守法半违法的也要争取。要教育改造他们，还要特别重视工业，劝导大家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依据国家经济需要，有步骤地把商业资本转向工业，于国家是有利的。商业中间特别是投机商，于国家人民全无益处，绝对不要。最后，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说，是好的。毛泽东同志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

“五反”运动后期，部分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为活跃城乡市场，政府决定大力调整工商业。经过“五反”斗争和调整工商业，进一步团结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促进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并为全面推进国家资本主义准备了有利条件。

### 三、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重要时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问题。周恩来、陈云同志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我在会议的开始和结束时，分别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制定了四个文件：（1）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2）关于民主建国会工作的要点。（3）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4）关于继续加强各界民主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意见。通过会议，明确了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间阶级。我们在会前起草《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等文件时，对这个变化在思想上不够明确，报送中央审批的文件稿中，仍把民族资产阶级说成中间阶级。毛泽东同志在文件稿上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我在会上讲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指出应当把这个指示在今后统战工作中从指导思想中牢固地确立起来。

（2）在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间阶级以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学习》杂志发表了一些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性一面，认为斗争是为了打倒的“左”的文章，违反党的政策，中央及时作了纠正。

（3）对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改造的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改

造，在当时主要是把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改造成不带“五毒”的资产阶级，把违法改造成守法，而不是把资产阶级改造成工人阶级，他们学习的内容应该是共同纲领、“五反”原则和政府的政策法规。对民主党派，是要他们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们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他们内部共同的准则只能是共同纲领。对于他们成员中一部分从事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因工作岗位的需要，则有所不同，应要求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逐步具备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

(4) 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应以其所联系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代表人物为主要对象。毛泽东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初期指出，民主党派尤其是民建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中上层代表人物，因为大工商业资本家及代表人物的代表性大，作用大，影响大。他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五日同黄炎培的谈话中，也强调民建会要做大工商业资本家的工作。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着重改写了《关于民主建国会工作的要点》。这个改写后的《要点》说，“民建会的主要发展对象应当是对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作用的大的工商业资本家，尤其是大的工业资本家及其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我们曾提出民建会以中小为基础的组织方针，是由于我们对大资本家的情况和作用调查研究不足和认识不足，因而忽视了大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和地位，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不适当的，应加改正”。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也作了相应修改，指出中小为基础的方针“对于其他党派也不完全适当”。“下层应是对象之一，但不是主要对象”。

(5) 应支持民主党派依照共同纲领从事合法活动。各民主党

派都负有协助我党团结、教育和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政治任务，就应支持他们并且推动和帮助他们向这些阶级、阶层进行活动，与之发生密切联系，了解反映其要求，并代表其合法利益。我们应在领导他们从事合法活动中，团结教育和改造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

(6) 各级统战部应和民主党派中的骨干分子一起，检查和克服关门主义与宗派情绪，加强对中间分子和右翼分子的联系与工作。切实发挥骨干分子的骨干作用。

经过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根本指导思想明确了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统战工作的重心逐步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来了。

### (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和基本经验

经过建国后的头三年的努力，我国完成了各项社会改革任务，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在全国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将要逐步被消灭的阶级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引导我国有步骤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中心问题。

一九五二年底，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时，毛泽东

同志在几次讲话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轮廓设想，在中央政治局少数人范围内酝酿，未向党的高级干部传达。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肯定了我提出的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经过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的方针之后，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对总路线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表述，指出：“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规定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采取合作化的道路进行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道路，逐步实现国有化。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结束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

为了贯彻实现党的总路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了紧张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和斗争。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改造了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度，全面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我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胜利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和发展。

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一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遵照总路线的精神，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各界人士中深入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过渡形式，有计划地全面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民族资产阶级人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

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完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一、我国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以科学的理论预见，论证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必然要经历一个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指出：“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结合苏联的实际，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4卷，第85页）列宁又说：“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就是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我们党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是一致的。但是，我国的历史条件和苏联不同，因此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步骤和做法，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并且独创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 **第一、过渡时期的起点不同**

解放前的旧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必然包括和区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一九四九年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因此，我国的过渡时期不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一个具有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九一三年俄国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百分之四十二，而我国在一九四九年现代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七。两国的国情不同。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我们不能照搬它们的公式。

## **第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方针步骤不同**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并没有立即消灭资产阶级和剥夺全部私人资本，列宁设想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只把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交通运输、邮电、银行收归国有，而允许中小资本主义在国家的控制和监督下存在和发展。一九一八年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战争的发生，俄国资产阶级采取敌视苏维埃的态度，迫使列宁放弃原来的设想，转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把全部企业收归国有，取缔私人贸易，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商品、货币流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政策对于支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白匪军的战争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经济上遭到了失败，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到一九二一年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列宁总结这一失败教训，承认“我

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选集》第4卷，第661页）一九二一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自己的战略，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新经济政策，重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把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采取租让制、租借制等形式，租给本国和国外的私人资本，利用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重新建立工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种退却，是由直接进攻改用迂回进攻，逐步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列宁阐述这一退却的意义说：“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列宁选集》第4卷，第620—621页）在当时国内外条件下，苏联向社会主义过渡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我国过渡时期的情况和当时的苏联不同。建国后不久，我国虽然同样处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威胁之下，并且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但党中央采取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使国民经济不但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在三年中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由于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条件，由于我国原来经济上的落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同情并参加中国革命，建国以后我国并没有剥夺私人资本主义，而是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共同纲领的规定，坚持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使它们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在一定时期内，允许有利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采取突然的、直接过渡的步骤，而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总结实践经验，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经过灵活多样的形式，逐步地实现私有制的变革。对农



业、手工业，遵照国家帮助、典型示范、自愿互助的原则，经过互助合作的多种形式，逐步实现集体化。我国对私人资本主义并没有没收，因此不是采取租借、租让的形式，而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过渡形式，使社会主义成分逐步地、自外而内地插进资本主义企业，逐步改变其生产关系，逐步地实现私人企业的国有化。

### **第三，国家政权的阶级构成不同**

在我国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不但有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在旧中国，一方面它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具有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革命性的一面，但是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缺乏彻底革命的勇气，又具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接受工人阶级领导、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国家政权，不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在外的工农民主专政或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中国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权。这个政权所压迫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以及其他敌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势力。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选举权和宪法范围内的其他民主权利，参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在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国统一战线对于顺利实现生产资料

私有制的变革、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消灭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重大特点和优点。

#### **第四，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

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它们在十月革命后同帝国主义内外勾结、实行反革命叛乱，苏联无产阶级只能以武装平叛、暴力镇压的方式来回答它们的反抗。

我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已经建立起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民族资产阶级不但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合作，而且同它所代表的私人资本主义建立经济上的联盟，对它们采取正确的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这些条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不采取激烈的步骤和暴力的方式，而能够依靠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领导和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配合，通过和平的赎买的道路，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赎买方针的制定过程**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根本任务。但是采取什么方式和步骤来实现这个任务，马列主义著作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必须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反动的官僚

资产阶级采取政治上打倒、经济上剥夺的方针，对具有两面性的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运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的思想，制定了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实质，就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统一战线工作，经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达到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把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的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它是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指引下，总结了过渡时期头几年的实践经验，在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才进一步明确起来的。

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并且指出，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五种经济形态之一。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更规定了：“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这些规定是我们在建国以后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指针。一九五〇年上半年制止通货膨胀、打击市场投机、稳定物价的斗争，下半年调整工商业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年底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一九五二年十月实行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等等，都是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这一方针的具体实施和必要步骤。在这一期间，国家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忙于经济恢复工作和抗美援朝期间其他迫切任务，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总结。

因此，当时在指导思想还没有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和国有化的途径。

### 1.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调查

一九五三年春，遵照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注意调查研究的精神，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有中央统战部的郑新如、黄铸等同志和国家计委私营计划处的勇龙桂同志参加），由我率领去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调查。这次调查始终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也研究了民主党派工作和工商联等问题。沿途调查中，我们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深入考察了建国后头三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工业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通过调查研究，使我们对建国后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地位、作用等重大问题，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经过前三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组，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已日益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相对削弱，但它仍然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对国计民生仍然有相当大的作用。工业方面，私营工业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一九四九年为百分之六十三点三，一九五二年虽有下降，但仍占百分之三十九，在华东地区，其比例则高达百分之六十。商业方面，一九五二年私商在全国零售总额中，占到百分之六十四，华东地区私商的比重更高，占到百分之七十三点一。在整个私营企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占百分之二十五，生活资料的生产占百分之七十五。这些说明，当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为国家生产产品，帮助物资交流，而且可以维持工人就业，为国家积累资金，训练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干部，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二，尤其重要的是，三年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有

显著发展，包括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九五二年，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收购等占当地大型私营工业的比重，上海为五十九点五，天津为七十，武汉为六十五点五，西安为七十，沈阳为五十五点九，广州为三十二点八。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形式，国家掌握了私营产品的主要部分，对稳定物价、发展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公私合营企业在当时发展还较微弱，其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五点七，但在若干行业中其比重则较大，如：精盐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纯碱占百分之四十八点四，火柴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七，平板玻璃占百分之四十一·八，硫酸胺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此外，航运业中的民生轮船公司等重要企业已实行合营；私营金融业除个别外已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调查指明：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在各种不同方式下的联系和合作，而公私合营则是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合作，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属半社会主义性质。在过渡时期的头三年，通过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控制力量日益增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地受到控制和削弱；这些私营企业已经不再是纯粹私人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的、并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了。其中的公私合营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虽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它是社会主义成份直接领导、同私股代表共同经营的企业，是最有利于领导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因此最值得我们重视。

第三，由于头三年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认识，不论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中级形式或高级形式，在政策思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生产经营、利润分配等方

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加工订货缺乏计划性，资本家反映“来时涨死、去时饿死”，“来时急如星火，去时却如清风”；工缴利润偏高偏低，产品检验偏宽偏严，公私之间争议矛盾很多。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我们的工作更为薄弱，问题更多，对资产如何估价，公股代表如何领导，公私双方如何改善合作共事、搞好企业生产，企业利润如何合理分配等等，都缺乏共同遵循的明确章程。不少同志对私人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估计不足，从而对如何领导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缺乏明确的方针和积极的态度。

经过深入的考察和总结，我们明确地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我在武汉、上海党内几次讲话中，都大力宣传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指出：私人资本主义在今天还是相当大量、相当普遍的客观存在，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还有生命力；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私营经济的主要形式，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我们的方针，不应当盲目挤垮，而要采取积极的态度，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地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并把它逐步地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教育改造带到社会主义；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关键在于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把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提高到工人阶级实现领导权、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高度加以重视和解决。

## 2.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和决策

调查结束后，当年五月，我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报送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指出：建国后三年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深刻的改组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呈现从统购、包销、加工、订货至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形式，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凌驾于纯

粹资本主义经济之上，仅次于国营经济，居于现代工业的第二位；指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其中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是最有利于将私营企业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在价值分配上，其大部分已为国家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企业新生产的价值，首先分为工人的工资、企业的利润和国营企业利润三个部分，三分天下工人阶级有其二；而后企业利润又分为国家的税收、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工人的奖金和福利、企业的公积金，四马分肥，工人阶级得其大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已经不是单纯为资本家生产，同时是为国家生产。《报告》在详尽分析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之后，明确建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六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次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十大城市的书记（当时直辖市京、津、沪外，还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会议编印了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论新经济政策的材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就是在六月十五日第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同志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

路线。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决定对私营商业亦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改造前途，我在《报告》中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讨论时有同志表示怀疑，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的意见，说：改造成什么呢？变农民、手工业者？不分土地，农民也当不成，前途只有改造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后，根据中央讨论的精神，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明确地写进我向全国统战会议的报告《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草稿）》。这样，经过六月政治局两次扩大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明确为利用、限制、改造，这是全党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终于明确化和具体化了。以后，又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总结，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丰富的、独特的实践经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贡献。

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方针和政策，不是任何个人主观臆想的产物，归根到底是来源于实践，是千百万群众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并且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地得到补充、修正，而日臻成熟完善。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我们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社



会主义改造的方政策和步骤，之所以是正确的，之所以能够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成功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党严格地遵循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不断地科学总结实践经验，上升为正确的理论方针，又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缘故。我们说一九五三年六月中央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和赎买的方针，当然不是说它已经尽善尽美不再发展了。不是的。党的这一方针还将在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总结而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但是，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作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经过六月政治局会议以及以后七、八月中央召开的财经会议的讨论，应该说在党中央已经明确地肯定下来了。

这里，附带指出当时高岗是反对这一方针的。高岗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反对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那时已知道他的一些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特别问高岗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意见。但在散会时，他却向我提出：“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我表示知道布哈林的观点，并问他这同政治局的讨论有何关连？他不正面回答，要我找洛甫（张闻天）同志去谈。洛甫的态度与高岗截然不同。他向我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并在政治局讨论时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

为了学习和贯彻党的总路线，明确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统一党内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中央统战部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四个文件：一、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以后统一战线的组织问题的意见；二、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三、关于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经验的总结；四、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会议的讨论，以后两个文件为重点。我在会上以三个半天的时间作了题

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的报告，详尽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指出：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整个过渡时期的根本问题之一。它是关系到在过渡时期如何正确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关系到成百万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群众和广大的城市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关系到如何密切城乡联系、巩固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问题；总之，关系到我们国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大计。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结合起来，积极参加这一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七月十六日政治局专门讨论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认为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四个文件基本上是好的，并作了重要指示。在此期间，为了总结建国三年来的财经工作，纠正商业和税收工作中的右的偏差，讨论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遵照中央的指定，我向全国财经会议作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恩来同志作了财经工作的总结。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问题，又进一步作了重要指示。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邀约李济深、陈叔通、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党外人士座谈，发表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的重要讲话。

综合六月至九月这一期间毛泽东同志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多次讲话，其基本要点如下：

一、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有三：一是公私合营；二是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三是私营商业向国营进货按牌价出售。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

二、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应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三、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不受限制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变成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进攻。在进攻中要有必要的让步，要承认资本家的“三权”（指企业所有权、用人权、经营管理权），否则，就无从搞国家资本主义。现在是进攻太猛，天津资本家只分得很少一点利润，这样他们就不会很好地搞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唯利是图，现在要使它从唯利是图变成两利是图和四利是图。企业的利润分配，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分给资本家的股息红利可占企业利润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四、三年之内，要把资本主义工业的大部分差不多包括一百万工人的工业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件大事。我们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希望能在两年半三年之间或者三年到五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公私合营企业，要给资本家提供一个榜样。过去是“西向让三，南向让再”<sup>①</sup>，今后每年都要发展。

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六、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是要被消灭的，但资产阶级分子则可能逐步分化。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要相信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宗教界上层人物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其中一部分人可能要坚决反抗，但大部分人是可能不反抗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前途，不是变成地主、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而是变成为工人。要消灭资产阶级，把人改造过来。

七、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每个城市都要有这样一批工商界的核心分子。

八、中国工人阶级有两个联盟，两种合作。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中，头一个联盟为后一个联盟的基础。没有头一个联盟，我们就没有力量。必须依靠工农联盟，才有力量去联合和改造那些剥削分子，那些人才会来。

九、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法逐步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一种比较巧妙、比较温和、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要消灭资产阶级，但可以采取比较文明的办法改造，可以开协商会，用协商的方法来消灭它。

---

① 见《史记》《孝文本纪第十》。吕后死后，诸吕欲为乱，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遂即天子位。借喻过去对公私合营的发展过于慎重。

十、不要忘记我们握有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政治方面，国家政权在工人阶级手里，资本主义企业中又有工会和共产党支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占优势，企业公私合营后生产力即不断发展，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公私合营）远远优胜于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榜样。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保障。

十一、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是为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而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手工业者等等。要用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的战略思想教育全党。

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完全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六月政治局讨论时，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看了我送中央的报告后说“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少奇同志也认为中央统战部的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七月十八日，少奇同志向全国统战会议作重要讲话，他根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的依据，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在我国具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他说：“从消灭我国现存的剥削阶级来讲，这种统一战线的方法，即和平过渡的方法，可能是主要的方法。”他指出统一战线的根本立场是服务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党内存在的怕麻烦、图清静的错误思想进行说服，说搞统一战线“是找麻烦，但又是省麻烦。经过这种统一战线工作，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不造社会主义的反，相反地他们服从社会主义，为社会

主义服务，这就省了大麻烦。说做这种统一战线工作是找麻烦，只有一部分真理，没有全部真理。”

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的重要讲话，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思想，武装了广大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鼓舞并坚定了他们从事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伟大事业的信心。

### 三、全面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 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有计划推进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中央决定各级党委要加强统一领导，并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这项工作。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央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我先后担任中财委副主任、国务院八办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这方面的工作。从这时起，中央统战部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担负着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任务。这是一项极其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我们从一九五三年起，协同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1. 在全国工商界普遍深入地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  
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引起资产阶级人们的各种疑虑和抵触，少数人必然要以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党中央深刻地分析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决定自上而下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亲自邀约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一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时，已经深刻阐述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

主义过渡的必要性，指明了我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九月八日到十一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报告和总结讲话。他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疑虑，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前途等问题，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所有制，……工商业者只要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不投机不垄断，以企业产品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企业利润有四分之三满足国家、工人福利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他们的任务就是光荣的。”“资本家只要尽职尽责，不是一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就应使资本家有职有权、有利可得。”对于资本家提出的前途问题和如何实现国有化的问题，指出：“只要引导上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因势利导，水到渠成。将来在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地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当然少数人反抗会有的，如果我们工作做得越好，反抗的人就会越少。总之，人们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尽了力，将来就会得到应有的报酬。这种过渡，会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的”。经过这些会议，大大减少了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的疑虑，他们表示拥护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盛丕华对资本家现在有利润可得、将来有工作可做，表示满意。黄炎培形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是“同登彼岸、花团锦簇”。这种态度，代表了一些靠近我党、顺应历史潮流的工商界代表人物的进步倾向。

当时，广大工商业者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发展，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出于阶级本能的抵触，惊呼“上了贼船”。有的大财团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

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根据中央的指示,经过筹备,一九五三年十月到十一月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我在向大会的讲话中,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全国解放以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与国家有计划建设之间的矛盾,已经日益发展和突出起来。不少企业生产下降,有的企业则陷于瘫痪。因此,把资本主义推向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无论从哪方面说来都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接受这一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他们在国家的伟大建设中的一个进步。我在讲话中还对国家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一切比较发展了的国家资本主义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企业的生产关系,因而有利于企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有利于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有利于发展生产,资本家有利可得,也有利于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充分贡献自己生产经营的技能,并在和社会主义成分的合作中逐步受到教育,为最后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指出:政府将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按照资本家的自愿,有步骤、有计划、有区别地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加工订货、包销收购等具体政策问题,作了说明,要求资本家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努力改善生产经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对总路线的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认识,基本上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当然接受的程度是不同的)。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则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谈了学习总路



线的体会，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博得了许多代表的赞赏。对于个人前途问题，代表们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可以“过文昭关”，“象剃头一样，只要不乱动，不会流血”，不但将来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从而大大解除了他们的最大顾虑。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会场情绪高涨。这表明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接受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道路等根本问题上，同我们达到了基本的一致。

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讨论学习，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且在以后几年中数量日益增多。他们在工商界中间现身说法，带头合营，努力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成为协助我们党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次会议的经验指明：党的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的事物。需要大喊大叫，才能为它开辟道路。会议期间，我向毛泽东同志谈了开会的情况，他肯定会议是成功的，并说要使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懂得，半年之内是大喊大叫的半年。根据这一意见，会后我们又在全国工商界中间有领导、有准备地、大张旗鼓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过半年多全国规模的教育和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家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过渡时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尤其是这样。

## 2. 全国第一次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

一九五四年，是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和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工业的第一年。

一九五三年底，私营工业总数为十五万户，产值一百三十一万亿元，其基本特点是大型厂少，但产值大（职工在一百人以上工厂不及户数的百分之二，但其产值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小型厂多，但产值小（十个工人以下的小型工业计十万多户，其产值只占百分之二十）；轻工业多，重工业少。在私营和公私合营的总产值中，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上升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六，自产自销部分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三。公私合营企业虽然发展迅速，由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九十三户发展到一九五三年的一千零三十六户，但其产值比重很小，只占百分之十三点三。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财委（资）召开了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前，我草拟了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的意见》。提出在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对雇佣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完成公私合营的初步设想，并对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问题提出意见。说明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是：（1）初步改变企业的生产关系；（2）逐步改造资本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3）改造企业，积累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4）培养干部；（5）赎买。总之，经过一定时间的赎买和改造，为国有化准备好条件。设想国有化的时机一般可能在一九六二年前成熟。在这十年内，国家只需投入少量而必要的资金和干部（新建和较大扩建除外），公股不必多，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以至再少些都可以，有了赎买和教育，又有大势所趋，实行国有化时，不需从股权比重上做文章。中央批准了这个提纲设想。毛泽东同志表示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说：十年内搞掉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没什么急躁冒进。已过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将天下大变。十人以上的企业改造，可能不要十年，也许七年就可以了。明年一定

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泡秋(意指游泳)，淹不死人”。

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会议经过讨论最后形成了《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步骤作了明确的规定。文件指出：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条件正在成熟，国家的任务是要在今后若干年内“积极而又稳步地将国家需要的、有改造条件的，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基本上(不是一切)纳入公私合营的轨道，……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将公私合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企业”。确定一九五四年的工作方针是：巩固阵地，重点扩展，做出榜样，加强准备。(1)对私营工商业者继续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普遍深入地进行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教育；(2)继续整理原有的公私合营工业，巩固阵地，造成榜样，培养骨干，总结经验，制定若干必要的章程和办法；(3)稳步前进，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一批较重要的和较大的企业，并把它们办好；(4)通力合作，制订将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纳入公私合营的计划大纲，定出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的三年计划；(5)加强对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的私营工业的领导，以利于更有效地利用这些企业，进一步为公私合营准备条件。文件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和把企业改造同人的改造相结合等重要指导思想，作了阐述，指出：在过渡时期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国内关系上的重要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是“谁战胜谁”的斗争。国家资本主义是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另一种形式的继续，而决不是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列宁：《论粮食税》)。斗争的性质是十分激烈和十分尖锐的，因为要在这个斗争中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

阶级。而任何没落的剥削阶级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斗争的方式方法则是复杂的、多样的、灵活的，并且是稳步前进的，因为要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企业尽可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将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地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我们的工作必须把对企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结合起来。忽视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就会离开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精神。

一九五四年三月，中央批发了这个文件，认为文件对扩展公私合营工业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及一九五四年扩展公私合营的方针是正确的和适当的。这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工业有计划地实行公私合营的一个重要文件，对于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和步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3. 制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扩展公私合营，涉及公私、劳资、各地各业各方面的复杂关系，涉及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需要妥善地慎重地加以处理。一九五四年七月，中财委(资)总结几年来公私合营工作中的政策和经验，制定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九月二日报经政务院会议审议公布，我对《条例》作了说明。

《条例》和《说明》的基本精神是确立社会主义成分对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地位，同时保护资本家的合法权益。规定：(1)公私合营企业不是普通的合股企业，它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本主义成分直接合作的半社会主义企业。在企业中公方居于领导地位，私方接受公方的领导。(2)私方代表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并负责参加企业的经营管理。私方代表应在公方领导下合理地行使其职权，守职尽责，公方代表应重视私方代表的职责，积极地耐心地帮助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并使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逐步获得改造。私方代表如有合

公营私和其他违法行为，应进行必要的斗争，并依法处理。（3）对企业原有的实职人员，应量才使用，使之各得其所。对于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应充分加以爱护，发挥其专长，并通过他们的生产和技术的实践，耐心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教育。对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弱人员，参照劳保条例或其他办法，给予适当照顾。（4）合营企业吸收工人代表参加管理，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要稳步进行，逐步代以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5）私股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的酬劳金，共可占企业全年利润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私股所得，由个人自行支配。（6）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是公私双方的协商议事机关，应定期举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盈余分配及有关公私关系等主要事项进行协商。这个《条例》的公布和实行，表明我国公私合营的政策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了，有力地促进了资本家接受公私合营的积极性，从而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

#### 4. 全国第二次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

经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一九五四年的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这一年，采取吃“苹果”即逐个企业合营的方式，合营了七百九十三户规模较大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当年产值达二十五点六亿元，超过了过去几年全部公私合营企业的总产值，从而加强了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一九五四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和公私合营企业产值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点一。私营工业只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九。在扩展合营工作中，多数注意贯彻党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清产定股、人事安排、利润分配等方面适当照顾了私股的合法权益，加以国家派遣公股干部，投资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使合营企业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发挥了明显的优越性，进一步促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

有利的形势。

但在另一方面，个别企业的合营方式，也产生了新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分散性、落后性。大的“苹果”吃掉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部联系打乱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生产上发生了严重困难。加以国营部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各种类型经济未切实贯彻统筹安排的方针，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只管国营和公私合营，不顾私营企业，更加深了这种矛盾。从一九五四年下半年起，若干私营行业即陷于困难，部分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失业，国务院八办事先对这一情况缺乏了解。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国务院八办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一开始，就集中暴露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如果不首先安排好私营企业的生产，不但工人不满、资本家惶惶不安，连扩展公私合营也无法进行。会议被迫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一九五四年十月起，我因患耳癌，赴苏联治疗，这次会议没有参加。八办副主任许涤新同志向周恩来、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当时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同志也向周恩来同志写信批评国营主管部门缺乏统一安排的“左”的倾向，指出：“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不与各方打招呼”。恩来同志指示，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生产，一定要统筹兼顾，要“统一领导、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全面规划”。陈云同志向会议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确定统筹兼顾、调整公私关系的方针，指出对私营工业应在保证社会主义成份稳步增长和国营经济领导下，采取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反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盲目发展，克服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逐步将各种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只顾国营、不顾私营，只看到有所不同、不看到一视同仁，是不对的。指出：私营工

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将来也要变成国营，私营工业的工人和国营工人都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同等看待。如果听任私营工业停工关厂，工人失业，必然造成社会动乱，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根据这一方针，中央确定国营让出一部分原料、生产任务以维持私营，加强加工订货的计划性，按私营工业产品类别归口管理、一条鞭管到底。陈云同志指出，如果不这样，“国营多缴了利润，国家还要付出救济费，这是出了钱还要挨骂。采取维持私营生产的政策，就是为大量纳入公私合营创造条件”。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原则。当时毛泽东同志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少奇同志针对党内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倾错误思想，特别指出党与非党联盟、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联盟的重要性，不要重复瑞金时代盲目排挤私营企业的错误。

这次调整的经验指明：国民经济是有机整体。在过渡时期，各种类型的经济随时都处在剧烈变动、互相斗争之中。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要受到限制和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在前进中国家必须对各类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否则，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就要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这次调整经验还指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不合营一批大型的私营企业作为骨干，就不能造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巩固阵地。但是这种方式有它的局限性，在它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合营企业同大量未合营的中小企业在生产安排、企业改造等方面的种种矛盾。因此，必须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同全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按行业归口管理，统筹安排。这次会议后，中央除原设的地方工业部专管私营轻工业的改造外，还新设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归口管理私营重工业的安排和改造。

这样，就把全部私营工业置于国家计划统一领导之下，为以后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遵照中央的指示，这次计划会议之后，陈毅同志邀请当时参加全国政协的工商界委员六十三人举行私营工业座谈会。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统筹安排、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曾山、吴波、许涤新同志分别就加工订货、税收、公私合营等具体政策问题作了解答。很多资本家开始时认为私营工业关门、倒闭，是实行总路线无可避免的结果，埋怨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了，感到前途渺茫，情绪消沉。及至听了陈云同志讲话并经我们诚恳协商和耐心工作之后，他们的情绪由沉闷而开朗，缓和了紧张的阶级关系，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

### 5. 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有计划地安排、改造私营工业的同时，改造私营商业的任务也提到日益紧迫的日程上来了。

我国私营商业行业复杂、人员众多、遍布城乡僻壤，沟通产销需要，是活跃城乡经济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特点是：户数多，人数多，资金少，规模小。一九五二年全国私营商业约四百万户，从业人员约七百多万人，其中雇佣职工二人以上的户数仅占百分之二，绝大多数是不雇佣职工的家庭商业和小商小贩。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从批发环节开始。私营批发商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确保对市场的领导权，国家对它们采取排除代替的方针。至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大批发商已基本上被国营商业所代替了。对剩下的中小批发商，则指导其转业或将其人员、资金吸收进国营加以安排，给予出路。



对广大城乡零售商主要采取经销、代销的形式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国家扩大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范围、对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之后，我国整个市场关系起了根本变化，国营、合作社商业掌握了大量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不论在批发和零售环节上都占了压倒优势，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直接进货，而必须依靠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有计划地安排改造私营商业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国家因势利导，首先把经营粮、油、棉的私商在全国范围内整个行业地转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在其他行业也发展了经销、代销、批销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过这些形式，国家将掌握的商品委托私商按国营规定的牌价或其他条件销售，私商取得一定的差价或手续费。这就使广大私商的经营活动围绕着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而旋转，“如各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60页）

但是，一九五四年入秋以来，国营、合作社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前进太快，也发生了盲目排挤私商的偏差。城市私商营业萧条，亏蚀赔累，一九五四年全年私营商业的总营业额比一九五三年降低了一半、赔累户占私商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农村私商一年来被排挤的达六十九万户、一百万人左右，城乡渠道受阻，许多农产品无人收购，引起农民不满，指责：“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闲死”，不少地方农民杀牛、杀母猪、小猪的现象相当普遍，造成了城乡公私关系、工农关系的普遍紧张。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纠正这种错误，指出：“这种情况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将不仅严重影响城乡经济的活跃，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由于农民滋长着对我不满情绪，也将会影响工农联盟，以至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

义改造的正常进行”。中央决定：（1）在城市零售的阵地上，国营商业前进过多的，适当退让，以维持私商经营，尔后逐行逐业地加以安排和改造；（2）对农村小商小贩，引导其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转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社商业；（3）对农民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统购任务完成后的多余产品，允许农民自由买卖，以缓和农村对统购统销的不满情绪。中央特别指出：应该懂得，工人阶级当了政，必须负责对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出路进行适当安排，这样做，是适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还要看到，目前零售商已经受到若干限制，特别是为国家经济代销的部分，性质上已有很大改变。因此对公私比重的概念，不能不作新的了解。社会主义商业有无前进，是要看对整个商业的计划领导程度，对私营商业改造的进展程度，而不应仅计算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本身的营业额。中央这个指示，从根本上批判和扭转了商业工作中的单纯业务观点，使改造私商的工作摆脱“左”的错误，比较健全地向前发展。

## 6.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前的形势和工作

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个形势，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经过六年来的工作和斗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资本主义阵地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了。在工业方面，到一九五五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厂达三千一百九十三户，其产值占合营户和非合营户总产值的一半（百分之四十九点七），剩下的一半产值是十二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的轨道。在商业方面，三十二个大中城市的国营、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销、代销企业已占全国零售总额的四分之三，纯粹私营商业只占四分之一。特别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起，全国一些城市取得了结合合并、淘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

经验。上海市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八个行业，北京市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合营，天津市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店。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最后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条件，整个阶级已经分崩离析、空前孤立。加以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私营企业的工人群众再也不愿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了。整个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原来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和个别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全面规划，向党内外大力进行宣传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和推进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变革。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志邀约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堂举行座谈。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心理，作了两次重要讲话，系统阐明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希望资产阶级人们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中国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私有制要变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了解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针对资产阶级分子惧怕社会主义的心理，指出应当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说：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要讲开，好象怕鬼一样，大家一说就不怕了。我看共产是好事，没什么可

怕。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共产了，而是讲要准备共产，要广泛宣传。重申我们党将坚持和平转变和赎买政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赎买政策，是“善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赎买的时间，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可以拖到十五年、十八年，经过许多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安排人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把这两个统统都安排好。究竟哪一年国有化，不会是一个原子弹扑通下地，总要同你们商量的。大家要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同志还着重提出培养和扩大工商界核心分子的任务，说：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这些人比较其他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工商界的人。他还对李烛尘等人提出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的主张进行说服，说：不要搞一阵风。我们需要有充分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有力地稳定了资产阶级人们动荡不安的情绪，并鼓舞了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全国工商联会议期间，经过深入学习和讨论，许多人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服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坚定爱国守法的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同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陈云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上述毛泽东同志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两次重要讲话，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全面改造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六点规划，即：（1）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2）各行各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3）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4）实行定息；（5）组织专业公司；（6）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全面实行这六点规划，就将使剩下来未合营的大量分散、落后的私营企业纳入全行业合营的轨道，完全集中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控制之下。《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种情况下的公私合营，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为了在战略上确保这一改造事业的胜利，在策略上必须有所让步、有所妥协。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的任务，说“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

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平转变等问题作了系统发言。他针对上海一个自称是工人的来信中否认资产阶级的积极性、攻击党的赎买政策的言论进行批驳，指出这封信“反映了托派特点”。他充分肯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爱国、和平建设、增加生产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指出：“对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充分加以利用，同时也要限制它黑暗的方面。这边利用的越多，那边限制的越大，就越利于改造，把它从资本主义轨道扭过来，转入社会主义轨道”。“把

所有权拿过来，最后实现全民所有制，这个阶级就消灭了，但这些人还是要改造他。消灭阶级，个人改造，最后都要变成工人，得到一个愉快的前途”。

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深刻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对国家和工人阶级是有巨大利益的。他特别指出：在资产阶级中培养核心分子很重要，需要资产阶级方面有一些人起来赞成共产。他强调说：消灭资产阶级决定的一着，就是这个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应该很有计划、很有步骤地进行，各方面配合，党委抓紧领导。

我在会上着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作了发言。指出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互相影响而又不可分离的双重改造。实现和平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键在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要认真加强对人的改造，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提出要进一步促进资产阶级内部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分化趋势，要大力争取中间分子，扩大核心分子队伍，缩小落后分子，孤立和分化反动分子。在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要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宽紧得当，四面不透风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逐步抓紧予以消灭，而对资产阶级分子要给以宽大待遇，对他们要实行赎买，包下来，给以工作，给以出路。我在发言中还着重批判了在阶级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政策问题上的“左”的观点，指出：和平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一场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但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和工作，我国阶级斗争的趋势将不会沿着越来越激烈、越复杂的公式发展下去，说服教育和批评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认为对付资产阶级的办法就是斗争为主，斗争、斗争、再斗争，而且越斗越厉害的看法，同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和党的政策，都是不符合的。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资产阶级人们在社会主义改造

中取得的显著进步，批判自称为上海工人来信中否定资产阶级两面性、反对赎买政策的主张，是以“左”的面貌来反对我们党的路线，是一个挑战，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工人阶级的。指出现在资本家已经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应当在党内进行广泛的解释和教育，使广大党员提高认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

会议期间，中央提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全面总结了六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成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我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和赎买这一根本方针的重大意义，批判了党内在改造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出全党要加强领导、全面规划，争取在一九五七年底在一切主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战斗任务。这个《决议》是党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资本主义所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变革的重要文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决议》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一致拥护。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党内思想，有秩序地迅速推进我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伟大变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四、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 和党的方针政策

进入一九五六年，全国政治形势起了根本变化。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巨大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全国。一九五六年一月，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面对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新形势，中央只好改变原来制定的在今后两年内分期分批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先收编、后改组的做法。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他们要求的很厉害，天天敲锣

鼓，迎接公私合营，就只好倒个头，先承认公私合营，再来进行清产核资、生产安排、企业改组、人事安排”。这种政策步骤的调整，在当时是被迫的，但又是必要的、适当的。据统计，到一九五六年底，私营工业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九，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六，私营商业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二，资金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三，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制度以后，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1）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已经全部转归国家使用和管理，他们除了领取固定的定息而外，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这就使国家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管理和改造企业，更好地发展生产、满足人民的需要。（2）资本家开始处于从剥削者到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之中。他们参加企业的工作和生产，但已不再是企业的统治者和支配者，而是以公职人员的身份在国家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更便于以企业为基地，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3）实行定息后，严格限制了资本主义剥削，他们的定息收入，只取决于股金数量的大小，同企业盈余的多寡割断了联系。这就更能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有利于国家资金的积累。因此，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这种公私合营企业，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了。

为了正确引导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一伟大的变革，在高潮到来一年间，我们进行了紧张的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政策文件，妥善处理私股财产、定息、生产安排和人事安排等问题，有力地推进了对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发展和提高。

**1. 提出“从宽从了”的方针，妥善处理合营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



对于清产核资中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都从宽处理，对企业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敌伪财产，对公欠款、抽走资金、呆滞物资在内）根据从宽处理的方针和有关规定，尽可能地予以了结。一九五六年清产核资的结果，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投资总额为二十四点二亿元，其中工业为十六点九亿元，商业和饮食业为五点九亿元，服务业为零点三六亿元，交通运输业为一点零二亿元。全国拥有定息的私方人员共有一百一十四万二千人，其中在职人员为七十一万人。

## **2. 继续贯彻赎买政策，定息五厘，高薪不动**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原规定全国对私股年息的总幅度定为一厘至六厘，根据不同地区、行业的具体情况，起码定为一厘，最高不超过六厘。以后，根据国务院八办的建议，陈云同志决定定息原则从简从宽。息率一律五厘，并决定七、八月间发一次定息。大中资本家原来对定息是“求三（厘）、望四（厘）”。这个决定在六月全国人代会宣布后，他们表示“喜出望外”。当年十二月，在全国工商联召开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又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从一九五六年起，定息七年不变，如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个尾巴。资本家原有的高薪，一律不动。这也是一种赎买，实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工商业者的生活，使他们更加安心地接受改造，为国家建设服务。

## **3. 根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安排在职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

中国民族资本家和私营工商业者，不少人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长，这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财富。应当充分地加以使用，为社会主义服务。据一九五五年统计，全国私营十人以上工业在职私方人员七万一千二百八十四人中，熟悉工程技术的人员有七千五百五十一人，占百分之

十点六。上海第三轻工业局所属私方人员五千零三十人中，有技术经验且能掌握全厂生产关键的有一百三十二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三。企业合营后，我们及时提出“量才使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企业合营时候在职的私方人员全部包下来，在工作上进行合理安排，条件具备的，还安排为正职。把他们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知识中一切有用的部分，当作民族遗产，切实地继承下来为社会主义所用。一九五六年内，全国私方人员中，安排参加企业管理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直接参加生产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对老弱病残的私方人员也作了适当安置。

#### 4. 调整公私共事关系

企业合营后，国家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由原来在企业外部的联系转变为企业内部的公私共事关系。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完全处于公方代表的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监督之下为企业工作。这种公私共事关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资产阶级落后的经营管理作风和旧的思想习惯势力还经常在工作中反映出来，因而具有阶级关系的性质；另一方面，他们享有国家赋予的职权和责任，公私双方又是一种工作关系。正确处理这种新型的合作共事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而且是能否有效地帮助资产阶级分子积极发挥所长、转变为劳动者的关键问题。我在六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发言中，批判了在部分公方人员和工人群众中存在的把资本家看成“包袱”、不愿放手使用、把他们冷在一边、予以排斥歧视等等“左”的错误，强调安排、使用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是合营企业公方人员和工人群众应当肩负双重改造的光荣历史使命，不能只要企业、不要人。公方代表应当积极领导，放手使用，尊重私方人员的合法权益和合理意见，帮助他们履行国家公务人员应有的职权，按照他们的职务，参加应当参加的会议，阅读应当阅读的文件，为企业作出贡

献。私方人员应当主动接受公方领导和工人监督，积极工作，守职尽责，过去有严重劣迹为工人所不满的，应在适当的场合作恰当的自我批评，取得群众的谅解。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我在发言中还着重强调公方代表应当学习私方人员一切有用的管理专长和经验的问题。

这一年间，陈云同志、国务院八办和中央有关部门还分别召开了公方人员、工人代表、私方人员以及工商界家属等的各种会议，深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制定了改进公私合作共事关系的政策文件，逐步改变了企业合营初期公私双方“三相”（相对无言、相敬如宾、相安无事）的阶级戒备心理，促进了公私共事关系的改进。

#### **5. 普遍开展政治理论教育**

根据中央指示，一九五六年初，我们同中央宣传部合作编写《工商界政治常识读本》，向私方人员通俗讲解社会发展规律，普遍进行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据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私方人员参加各种学习共达一百二十八万人次，其中参加工商界短期讲习班的有十万二千人。这次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同志说：“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

#### **6. 逐步解决私方人员的福利待遇问题**

这次全面合营高潮期间，也带进了一大批没有雇佣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这部分人约占全部私方人员百分之八十。他们普遍工资低，定息少，最关心合营后的生活福利待遇问题。我们为国务院制定文件，规定：私方人员的疾病医疗和病假工资，凡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工作，一律按干部或职工同等待遇。凡在合营企业工作，股金在二千元

以下的，疾病医疗按所在企业职工待遇办理，股金在二千元以上的，如确有困难，也可按照职工待遇办理。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不论股金多少，一律给予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这些规定，体现了国家对私方人员的关怀和照顾，安定了他们的情绪。

### **7. 企业原有的经营管理制度，半年不动**

在合营高潮期间，私营工商业一下子进入公私合营。业务部门由于缺乏经验，曾将许多工厂、商店盲目合并，改变了它们原来的生产和运销规律和经营管理制度，形成了一时供、产、销脱节和产品质量下降的现象。国务院于二月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倾向，规定：所有私营企业批准合营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企业原有的供销关系、服务制度、协作关系，也不要轻易改变，企业原有的经营特色和优质产品，应当予以保留并发扬。以后中央又多次重申：对经济改组、企业改造和网点调整等工作，一定要经过周密的考虑研究、统筹规划，慎重对待，不要盲目进行。这些规定，使我们在这样一场广泛、迅速而又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尽量减少混乱，及时纠正错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基本上有秩序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六年六月，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这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全国人民应当“热烈地庆祝这个胜利”。

## **五、我国和平改造的基本经验 和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所以能够取得和平改造和赎买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

战略上考察，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决定的。

### 第一，无产阶级有强大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并且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农民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同工人阶级结成了巩固的联盟。在经济上，由于没收了占现代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建立起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导地位。这一切说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除了接受工人阶级的和平改造，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和道路外，别无其他的出路。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社会主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是我国实现和平改造的根本前提和保证。没有这些条件，就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和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很软弱，具有两面性。这使我国的和平改造具有客观的可能。

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俄国和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极端敌视革命，是革命的凶恶敌人。希特勒侵占东欧以后，东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大都投降了希特勒，组织傀儡政权。东欧各国解放后，一部分资产阶级逃跑了，一部分则留在国内破坏捣乱。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敌视苏维埃政权，以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和破坏回答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针。因此，在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取得显著的进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同它们有矛盾，因此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在抗日战争中一般没有同敌伪政权合作，许多爱国资本家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除一九二七年以后许多人一度附和蒋介石反革命外，在大部分时期内，同我们党有合作的历史。全国解放后，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它们又拥护共同纲领、拥护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在恢复国民经济，参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以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采取敌视的态度，即使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我国的和平改造仍然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三，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建国以来我们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针对它们的两面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以必要的工作安排，并且对他们的代表性人物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使他们在大势所趋不能不接受改造的形势下，感到有出路、有好处，从而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有了强大的政治、经济的优势，有了对方的条件，如果我们党的政策不对，不是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仍然不可能顺利实现。

历史上我们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建党之初到遵义会议之前，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政策都没有解决好，都犯了错误。陈独秀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革命性的一面，鼓吹“二次革命论”，主张中国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就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充当“抬轿子”的角色，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讲斗争。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遭到失败的主观原因。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是它的历史功绩。但它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对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白区工作的战略方针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一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打倒一切，主张整个地反对民族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实行了许多极端的“左”的政策，如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打击中间阶级，从“左”的方面取消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使工农孤军奋斗，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以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走上胜利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历史上两种极端的政策倾向，制定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既反对从右的方面、也反对从“左”的方面取消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成功地争取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我们党不但继续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且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又同它们建立了经济联盟，照顾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造

中的合法权益，对他们实行赎买。这样，就使阶级本性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有可能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国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以上三条，即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我们党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政策，是缺一不可的。主要依靠这三个条件，我国得以胜利实现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消灭资产阶级并改造这个阶级成员的伟大事业。

### 1. 我国和平改造的主要经验

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践中，我们党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成功地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方面的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八条。

第一、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途径，而公私合营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和主要环节。实践证明，我们抓住这一主要环节，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由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最后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成功的。

第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和分散性，大型的现代化企业很少，大量的落后的中小企业。因此，在扩展公私合营的



方式上，必须采取个别公私合营与按行业公私合营相结合的办法，不能只吃“苹果”，不要“葡萄”，只要大的，不要小的，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按行业统筹安排，逐步改造。

### 第三、要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国民经济是有机的整体，不论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或私营企业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必须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在国营、公私合营与私营之间，工商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全面规划，统筹安排，逐步前进，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协调地有计划地向前发展。反对只要国营，不要私营，只要大户，不要中小户，嫌落后、怕麻烦的片面观点和甩包袱的做法，反对急躁冒进、四面出击、挤垮了事的“左”的错误。这些错误做法，只能造成社会失业，增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困难，对国家、对工人阶级都是不利的。

第四、必须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互相促进。

资本主义企业和掌握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两份遗产，我们应当充分地加以利用。不能只要企业、不要人。我们党历来坚持双重改造的方针，即不但要使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而且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这两方面的改造是互相促进、不可分离的。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更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和平转变的关键，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根本问题。轻视这方面的改造，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对企业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

第五、必须贯彻赎买政策，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才能减少阻力，促进自愿，增添助力，调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我们对资产阶级的赎买，不是由于国家拿出一笔钱一下子购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采取“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逐步地加以赎买。从建国起到一九六六年采取定息的十七年间，国家以“四马分肥”和定息的方式，付给资本家的利润共达三十多亿元，作为赎买的代价，超过了他们原有的企业资产。显然，这不是什么半赎买，而是十足的、完全意义的赎买。此外，对企业原有的人员，国家采取包下来、包到底的方针，在人事安排上，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在工资福利方面，原有的高薪不动，生老病死予以照顾。所有这些，也是一种赎买。党的这些政策，有力地推进了对企业和对人的改造。

第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两种联盟，互相促进。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又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和优点。我们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克服农民对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有利于促进和发展工农联盟。同时，我们依靠工农联盟，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和工业原料，断绝资本主义经济的原料来源，促使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工农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第七、要发挥民建会、工商联和工商界进步骨干的积极作用。

民建会、工商联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深厚的历史联系，并且拥有一批拥护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骨干。它们是联系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又是在我们党领导下向资产阶级人们进行团结

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纽带和渠道。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举凡重大的方针政策，我们党都经过各种会议或个别座谈的方式，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取得他们的密切配合，通过他们向工商界和家属进行宣传教育，发挥了有益的积极作用。

第八、向广大的工人群众、干部反复深入地进行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既要反对不经过过渡阶段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左”的观点，又要防止和克服对资产阶级丧失必要警惕、无原则迁就以至被资产阶级拉拢腐蚀的右的倾向。建国以来，我们党正确地开展了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完整地坚持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政策，坚持了国家资本主义一整套的方针和措施，使广大工人和干部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方针和政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以高度的革命热情，比较自觉地投入了这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实践。

## 2. 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近年来，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提出相反的认识和看法。这要求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研究和回答。

第一、如何正确认识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和缺点。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完整地执行了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一系列过渡形式，全面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国有化。一九二一年，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全部问题，无论是理论上的或是实践上的问题，

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即应当怎样把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期限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靠什么条件来做成这件事，怎样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19页）列宁当年提出的这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需要进行探讨和摸索的问题，在我国很好地得到解决。在苏联，到一九二二年底，私人租借了三千八百七十四个中小企业，其中三分之一是磨坊。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苏联同外资签订的租让合同只有一百三十五个。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全部租赁企业职工只三万五千人，租让企业职工只五万人，比重很小，在国民经济中无足轻重。而在我国，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这个成就，是苏联无法比拟的。

二、我们党根据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战略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完整地贯彻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成功地消灭了这个阶级，并把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改造过程中不但没有遇到强烈的反抗，许多人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三、在这场极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不但避免了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和破坏，而且充分利用资本家的企业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积累资金、培训干部，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以上海为例，全市私股清产核资为十二亿元。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合营前，私营企业共缴纳所得税十二亿元。合营后，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间接私股核资部分估算（按一九七〇年不变价格）上交国家利润、所得税约六十亿元。两项合计为七十二亿元。十七年增加的

财产为私人资产的六倍，为上海付出的定息总额（六亿四千五百万元）的十一倍多，为全国付出定息总额（十二亿元）的五倍多。正如马克思所说，这对工人阶级来说，“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

这些事实说明，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为马列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和贡献。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的光辉胜利，而决不是什么“吹牛”。

另一方面，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固然是建国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基本上成熟的结果，但当时在指导思想上也带有急于求成的因素。首先，改造的步子急了一些。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央会议提出的设想是要在一九五七年前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地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表示不赞成搞高潮。但是毛泽东同志在这年七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农业合作社问题的会议上和十月召开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不切实际地批评“右倾”，“小脚女人”，十二月二十七日进而主张“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二），这对当时全面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直接的影响。公私合营高潮期间，几百万私营工商业一下子拥进来了。这样，必然手忙脚乱，工作粗糙。其次，在高潮中，把大量并无雇佣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带进了公私合营企业，后来长期没有把他们区别出去，而是同资本家一道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界限，挫伤了这部分劳动者的积极性。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把这些劳动者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去。再次，在所有制改造以后，对企业改组、商业网点未经充分调查研究，大

併大裁，使合营企业失去原有特色，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使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还有，公私合营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有些原工商业者有职无权，不能充分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有这些缺点和偏差，我们应当认真纠正，吸取教训。但它毕竟是第二位的。我们应当区别主流和支流，决不能本末倒置，以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失误来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诅咒这个革命。

第二，如何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党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认为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过份强调了限制和改造，将私人资本主义消灭得太早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诚然，列宁曾经强调说：“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25页）但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决不是只讲利用资本主义来提高生产力，同时还指出要限制资本主义，并且在条件具备时要把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国家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一种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33卷，第244页）还说，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因此，要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应该把握三条：一、他强调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二、他还强调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他提出要在不久的将来使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有把这三点结合起来，才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完整思想。片面地只讲利用资本主义而不讲限制资本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恰恰是曲解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完整政策。决不能离开限制改造，孤立地讲利用资本主义，那样只能导致资本主义的自由泛滥。事实上，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充分地利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私营工商业缴纳的各种税收，在各年国家财政收入中分别占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九、二十八点七、二十一点二、十六点九、十三点三、七点七（以后几年比重下降，是由于国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私营工业和公私合营工业提供的总产值在一九四九年约为七十亿元，一九五六年为一百九十一亿元，增长超过一倍半。怎么能说没有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呢？但是，在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是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总的说来，在我国全行业公私合营或迟或早地到来，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的。

第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那末同他们建立联盟就是假的。

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战略上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又同他们建立联盟，这两者并不是互不相容和互相排斥的。我们是在联合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消灭这个阶级，在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程中来消灭资本主义。这就是战略与策略的统一，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辩证法。要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是真的，同他们建立联盟也是真的。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但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范围内的各种权利。它们的成员和代表人物还参加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工作，即使是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也是通过民主协商、和平赎买，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的。建国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就

参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一千二百六十六人中，工商界代表六十九人，占百分之五点六；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七百二十九人中，工商界委员七十四人，占百分之十。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各级政府部门中，还安排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担任了各级领导工作，如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省市及厅局的负责人。在企业、事业单位也吸收大量的工商业者参加管理工作。即使在这个阶级消灭之后，它的许多成员作为劳动者，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的成员，仍然在各种领导岗位上，从事各种工作和政治活动，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所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怎么能说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假的呢？不仅如此，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同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联盟的时候，就明确地宣布我们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要消灭资产阶级。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也是经过同他们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进行的，不是背着他们干的，不存在什么真假的问题。认为讲联盟就不能讲消灭，要消灭这个阶级，联盟就是假的，这种看法，既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 第四、和平改造是否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没有斗争呢？

当然不是。和平改造并不是取消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继续。事实上，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每前进一步，都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比较突出的如一九五〇年打击投机资本、掌握市场领导权的斗争，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有计划的扩展公私合营，都是经过激烈的斗争。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就是在逐步削弱和克服资产阶级的消极抵触的一面，逐步分化资产阶级，逐步提高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性一面的斗争中取得



的。斗争的性质是激烈的——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斗争的方式是缓和的——因为我们是采取了赎买和改造的政策。这就是我国和平改造的一个重要特点。

列宁曾经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我国和平改造的成功，证实了列宁的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这是由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某些重要特点有可能在别的国家重新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国际的意义。

#### (四) 过渡时期的政权建设 和统一战线组织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计划地大规模进行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逐步展开，要求在集中统一的基础上，更加发扬人民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健全国家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更加巩固和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普选基础上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体现了这一历史要求。这次会议，集中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共同愿望，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法律形式，确认我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规定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方针和具体步骤，确定了新的国家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领导人，结束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由共同纲领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过渡

状态。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领导体制更加完备，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这次会议，是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发展的新阶段。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形式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建国以来，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但成功地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而且发展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和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权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产物，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一切爱国力量在内的新型的国家政权。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则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本质在政权形式上的体现。这种政治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就已具雏形。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抗日战争时期的参议会，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是这种人民民主制度在局部范围的实践。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总结民主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建国五年来，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向人民代表大会过渡，为一九五四年召开普选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良好的

准备。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也有所不同。它不但具有一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共同本质，而且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

第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构成具有极大的广泛性。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本质都是阶级的专政。所不同的是什么阶级对什么阶级的专政。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国家实质上都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则完全相反，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政权，是广大人民对少数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的专政。在过渡时期，我国人民的范畴，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不但享有选举权和其他政治权利，它们的代表人物还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资本家阶级消灭以后，他们原有的成员作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仍然同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同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一道参加国家政权，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有利的。

第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

这种民主集中制是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而高度的集中是以高度民主为基础的。我国人民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人民代表大会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它的一切活动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

权力机关实行议行合一的原则，统一行使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国家执行机关，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一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并可以由它决定罢免。我国这种以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原则的议行合一的政治制度，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有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原则，是在反封建斗争中产生的，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其进步性，而在资产阶级实行独占统治以后，它就不再同其他阶级分权，更不同劳动人民分权，议会制实际成为便于调节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欺骗劳动人民，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第三、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统一的国家范围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又一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建立了国内各民族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我国已经成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我国宪法根据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宣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参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同时，又确定必须让各少数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自己当家做主，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我国这种在统一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既有力地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略和分离阴谋，保障整个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也有利于促进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在这一点上，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联邦制有明显的区别。这是我国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在处理国内各民族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卓越贡献和发展。

第四、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与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并存的，还有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等方面组成的。一九四九年，它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它作为中国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仍然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统一战线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全国人民革命大团结的坚强体现，是我国人民发扬人民民主的重要渠道。它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反对国内外敌人，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特点，是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所不具备或不显著的。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上述特点，是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政治制度，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便于人民行使当家做主权力的政治形式，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保证。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筹备和国家领导人员的安排

为了筹备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以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和对民主人士安排的意见。一九五四年三月，又召开关于人事安排的专业会议，制定了关于省、市人

民代表大会和省、市人民委员会中对民主人士安排的意见。这三个文件，均经中央先后批准下达。

在这两次统战会议期间，我们都坚持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党内一部分同志中间存在的忽视以至取消统一战线的错误倾向。他们认为在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建立统一战线是个“包袱”，主张“干脆取消”，认为在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中再安排民主人士是不必要的。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听取会议的汇报时，及时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指出丢包袱、干脆取消是不对的。在我国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需要保持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中需要吸收一定数量的民主人士，这不是取决于任何党派、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建设的需要所决定的。

第一，我国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建国初期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但仍然十分落后，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国内反革命残余仍然存在。为了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反对国内外敌人，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继续保持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决不是无产阶级或共产党包办一切，而是靠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靠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靠党同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我们党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证明，坚持同民族资产阶级和非党人士的统一战线，恰恰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反之，拒绝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的联合，搞“清一色”，只能招致革命的严重挫折以至失败。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以瑞金时代的“左”倾错误教训，说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说，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

但还要懂得运用在这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情特别困难，结果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于清一色。

第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其他党外人士，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建国以后，他们又同全国人民一道过了战争关、土改关，并且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作出了贡献。在我们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政治上没有理由抛弃他们。由于我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不可能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继续吸收一定数量的资产阶级和非党的代表人物参加国家政权，坚持同非党人士的长期合作，仍然是党的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政策。

当然，我们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并不是无原则的。我们的安排原则是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同时将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政府人员的选任、统一战线组织和其他方面的人事安排结合起来，通盘筹划。提名为人民代表条件是：一、在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或在社会上有相当的代表性；二、历史清楚，政治上进步；三、有积极作用；四、民主人士中的左、中、右都应有其代表人物。对某些代表性较大的右翼分子，还要有意识地适当吸收，以便人民代表大会广泛反映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

民主人士对实行普选和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本政治态度是拥护的。但也有一些人担心普选的结果会使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代表占压倒多数，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针对这种思想疑虑，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实行普选和人民代表

大会制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民主人士的方针政策作了详细的解释，指出：党的政策，“不是人多称王”，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他们可能多数会被人民选举，甚至是大多数，绝大多数会被选举。总之，凡是爱国者（只要有这个资格），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没有理由不跟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大大地鼓舞了民主人士爱国主义和接受社会主义的信念。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在全国人民代表一千二百二十六人中，共产党员共六百六十八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八，非党人士共五百五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五二。这个比例，既保证了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坚强领导，又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我国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方面的代表名额，大体上保持了这个阵容。

这次会议的后期，中央政治局集中各代表组联合提名的意见，提出了一批包括党内外领导人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员名单。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进行协商，经过周恩来同志同主席团成员及各代表组组长、副组长再协商，又经过我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个别地恳切征求意见，酝酿成熟后，正式提交大会讨论。由于事前充分发扬了民主，反复进行了协商，吸收了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大会以热烈气氛选举通过。这批国家领导人名单，生动体现了党对国家政权的坚强领导和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一、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副主席朱德同志。**

**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共七十九人。比过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六十三人有了扩大，因为国家大，需要包括各方面的代



表人物。常委七十九人中，中共党员四十人，比党外多一人。委员长由刘少奇同志担任，副委员长十三人，其中党外人士八人，除原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李济琛、张澜外，新增沈钧儒（原最高法院院长）、黄炎培、郭沫若（原副总理），以及陈叔通（原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共产党员五人为：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李维汉、赛福鼎。常委会包括了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阶层以及工、青、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政治局经过多次讨论，认为这个名单代表性很充分，能表现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作用。

**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十人，秘书长习仲勋。都是共产党员。国务院三十五个部长、主任中，中共党员二十二名，党外人士十三人，占三分之一。国务院的全体会议由总理、副总理、秘书长、各部长、主任组成。

**四、国防委员会。**委员七十九人，其中党外二十九人。由毛泽东同志任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实际上是军事上的统一战线机构，包括原国民党将领郑洞国、鹿钟麟等人。

实践证明，中央对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原则、比例、以及对国家领导人员的安排，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体现了党与非党人士的团结合作，加强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使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更加健全和完备。

### 三、我国第一部宪法的基本特点

这次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形式把国家的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步骤、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重大问题明确地规定下来，指明了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动员和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纲领。

提交大会的宪法草案，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参加下，经过一年多郑重的起草工作写成的。我参加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宪法，必须充分反映我国人民革命和建国以来社会关系的伟大变革，总结这些变革的主要斗争经验，必须坚持我国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指明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以及采取的方针和步骤。一九五四年三月，党中央提出了宪法初稿，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所接受。接着，在全国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代表人物八千人，用两个月的时间，对宪草进行认真的讨论和修改。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正式公布修改以后的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宪法草案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同时提出了许多补充修改的意见。这次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不仅使我国的宪法内容更臻完备，而且使宪法深入人心，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国制宪史上的一项革命。

我国第一部宪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历史上空前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清朝末年以来，各派政治势力提出过形形色色的宪法，就其阶级要求而言，不外三种类型。一种是从清朝的“十九信条”、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一直到蒋介石政府制造的伪宪。这些宪法的本质都是欺骗人民、企图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的一种骗局。这些反动宪法，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和反对。第二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属之。这个《约法》在当时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始终只是一种幻想。《临时约法》墨迹未干，就被

袁世凯所撕毁。在这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再也提不出任何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了。第三种，就是一九五四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第一部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宪法的产生，是中国工人阶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长期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是我国人民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我们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广大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是国家的真正主人。我们国家的这个根本性质，较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是引导我国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而决不会引向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

第二、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同时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

一九四九年制订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建国五年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对外已经结束了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国的地位，对内已经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从战争破坏的废墟上迅速地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并且正在大踏步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宏伟目标前进。宪法明确肯定了我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一伟大变革。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并且明确地规定了经过灵活多样的各种过渡形式，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步骤。宪法序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和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规定，是共同纲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在国家领导体制方面，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是它的常设机关。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这就改变了过去共同纲领规定的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辖属政务院的两级政府的过渡体制，明确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这对于发展人民民主，加强国家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必要的。

第三、它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

宪法深刻总结了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肯定在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还存在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宪法序言提出：“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还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宪法有关条文在肯定要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还明确规定资本家作为公民，享受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以及在联合中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家阶级的伟大战略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刘少奇同志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于我国继续保持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不只是对我国人民民主革命是需要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也同样是需要的。……在继续巩固工人阶级领导和工农联盟的前提下，在可能的范围内，人民中间的团结越广，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就越有好处。”

由于宪法草案集中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适当

照顾到民族资产阶级人们、民主党派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拥护，也为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所接受。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讲述了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过去中国人民革命一幕又一幕，失败又失败，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哪会有今天！解放后的中国，通过了新民主主义，望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是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又哪会有明天！”张治中称颂宪法“结构谨严而明确”、“措词简炼而通俗”，“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宪法，是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繁荣的远景的宪法，是符合全国人民希望和要求、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创造幸福的生活的宪法。”张澜回顾自己六十多年参加中国宪政运动的亲身经历说：“过去反动统治者所谓宪政，从制宪的过程到‘宪法’的内容，都是骗人的，因而都是为人民所蔑视和反对的”，而今天这个宪法是“真正的宪法”，“是符合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为全国人民所一致赞成和热烈拥护的。”章乃器说：“宪法公布以后，资产阶级吃了三颗定心丸：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所有权；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实行利用、限制、改造。”

当然，这不是说资产阶级对宪草的具体条款没有任何分歧和争议。有些人强烈要求明确保护资本家个人财产的继承权。有些人担心剥削得来的生活资料没有保障，要求将宪草规定的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改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有些人出于阶级本能，对资本主义被消灭的前途表示疑虑不满，说：“宪草仔细看来，味道是苦的”，哀叹“我们只有投降了”。在国家性质、主席职权问题上，也是种种猜测，认为国家性质已经在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被统治阶级；主席职权过大，实质上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等等。刘少奇同志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对国家性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步骤、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和人民

的权利义务等原则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和回答，同时也采纳了他们的某些合理要求，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私人财产的“继承权”和“合法收入”。经过这些工作，大大减少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疑虑，使右翼分子也找不到任何站得住的理由加以反对。

我国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各阶层人民的广泛拥护，毛泽东同志指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对后一条，他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为例作了说明：他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全国范围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灵活了”。他进一步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事实果然是这样。我国宪法的公布，大大激发了全国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 四、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 全国委员会的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实行，决不是要削弱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我国正式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后，即已结束了它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它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仍要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九五四年十

二月召开的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标志着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后人民政协职能的变化，也标志着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和加强。

在二届政协会议召开前，中央讨论了今后人民政协的工作，明确了以下几点。

1. 关于今后人民政协的性质。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今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将成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它既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也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

2. 今后人民政协的任务，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主要有五：第一、协商国际问题；第二、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组织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第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联系人民群众向国家有关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第四、协商和处理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第五、在自愿基础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进行思想改造。

3. 今后人民政协的组织原则。第一，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包括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必要时可吸收个人参加。区域代表和人民解放军，不再作为参加政协的单位。第二、政协不再设立全体会议，将原来的政协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两层。这样减少层次，便于工作，又可适当扩大名额，保持广泛的代表性。第三、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之间，是指导关系，上下之间有指导和被指导、指示和接受指示、报告和接受报告的关系，但又要因地制宜，便于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当地的

统一战线工作。

4. 全国委员会的名单由各党派协商提名，要扩大团结，要有代表性，要照顾到各个方面，注意各方面的带头人物，以充分体现统一战线的广大规模。

经过我们的协商和工作，经过全国政协的讨论，上述精神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作了明确规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对政协审理的总纲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进一步统一了认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同志向会议作了政治报告。这次会议的全体委员共五百五十九人，较上届全国委员会名额一百九十八人，增加了将近两倍。委员名额中，有意识少摆党员，只一百五十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党外人士达四百零七人，占百分之七十三，许多旧军人、旧政协代表人物、旧知识分子以至翁文灏、张之江、鹿钟麟等人也吸收进来了。它的代表性和团结面的广泛，表明我们党对统一战线组织的高度重视，表明我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这次政协会议的召开，在一部分党外人士中引起相当强烈的反映。围绕着政协的地位、作用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或明或暗的争论。有些人对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后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等变化认识不清，留恋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开会盛况，怀疑我党对二届政协不重视，表现出不满、不安的情绪，说：“真正的权力在人大常委，最高权力在中共中央，政协没什么权了。”有的人慨叹全国人大召开以后，政协将退处于“太上皇”的地位。有些人则竭力抬高政协的政治地位，鼓吹政协是“权力机关”或“半权力机关”，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



毛泽东同志在政协开会前两天，召集了党内外几十人举行座谈，指出今后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人大是权力机关，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他说人大已经包括了各方面，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必要，而不是多余的。并说蒋介石也搞过参政会，但他不敢也不愿意要这些机关起作用，他要的是扼杀民主。我们是人民政府，我们一定要把一切机关都活跃起来。有人说，政协既然这样重要，是否可以把它搞成国家机关？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不能把它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岂不成了二元论了吗？这样就重复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讲不通了。要实事求是，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不等于不重视它，而恰好是重视它。共产党就是党派，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所降低。毛泽东同志这篇重要讲话，不仅教育提高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外人士，消除了他们的不安情绪，而且对当前和今后的统战工作和政协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下，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依据宪法原则，确定了参加政协单位和个人共同遵守的七项准则。这就是：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力贯彻实施宪法；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成份的领导地位；三、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四、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提出建议；五、加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提高革命警惕性，坚持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六、加强中国人民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友谊，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七、在自愿基

础上学习马列主义和国家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这七条准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其他爱国人士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许多党外人士从切身经验中深刻体会到党中央对政协工作的重视，普遍表示兴奋和满意。有些人在会议中反映，“地方政协是一座冰山，冷得很”，要求地方党委予以重视。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切实检查和纠正党内存在的严重关门主义倾向，认真加强党与非党的联盟。

从政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以后，中国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存在和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形成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色。长时期以来，有些党外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对于人民政协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区别，往往认识模糊，产生许多不适当的观念和要求。这对于巩固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是不利的，需要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从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从长期的实践经验看，人民政协同国家权力机关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政协是我国统一战线的协商机关，人大和政府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国家权力机关颁布的宪法和其他法令，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都必须无例外地遵守执行。统一战线的协商机关则无此权力。这是两者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

第二、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可以而且应该代表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意见和要求，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但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机关那种监督、检查、质询、弹劾的权力。人民政协的作用，在于广泛联系各方面的人民群众，充分反映他们

的意见和批评、建议，以利于党和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人民政协的这种民主监督，虽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同样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和重视，对于健全国家政治生活、促进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同样是重要的、不可代替的。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政协却不是这样。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人选，不是经过选举而是由协商产生。人民政协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协商，它的决议是经协商取得，内部关系是由协商确定。参加政协的单位和个人，对人民政协的决议，有执行的义务，也有保留意见的权利。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恰当地认识和运用人民政协和政权机关这两种不同组织的职能，对发展我国的人民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 (五) 过渡时期的民主党派 和知识分子工作

在我国，过渡时期是伟大的社会变革的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经历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和代表这些阶级、阶层的民主党派，同样经历着深刻的社会主义变化。

在过渡时期的前三年，各民主党派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拥护共同纲领，对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参与了协商和决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国际上也发生了重要影响。

一九五三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来，各民主党派进入了新

的阶段。第一、它们从拥护共同纲领发展到拥护总路线和国家宪法，接受政协章程的总纲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采取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第二、它们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工作上获得了广阔的园地，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第三、它们在组织上贯彻了中上层为主的方针，并有适当的发展。到一九五五年，各民主党派成员总数已达三万九千人，较建国初期的一万一千人，增加了两倍多，并且吸收了一大批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中的中上层代表人物，这就使各民主党派比过去有了较多的群众联系和影响；第四、它们的工作，逐步深入到国家机关、学校等部门，围绕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为国家建设服务。所有这些，标志着各民主党派遵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不断前进的新的起点。

从一九五三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这一期间，在我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继续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参加了国家事务的管理，对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参加了协商决定和执行，为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主要作用可以归结为“参”、“代”、“监”、“改”四个方面。

1. 要求和帮助它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参加国家建设，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贡献力量。

早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国即将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转入大规模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就提出要协助民主党派找出参加和配合国家各项建设工作的办法。毛泽东同志肯定这一方针，并且指出，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于人事纠纷中。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包括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据一九五五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七

千四百九十九人中，其中民主党派成员共二千一百一十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更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因此，加强党对政府机关、学校中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领导，调动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决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而是迅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一九五三年以来，民盟、民进、九三、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都先后确定以参加国家建设为其中心的任务，协助我党在从事文教科技工作的中上层知识分子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督促和推动其成员积极贡献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九五三年九月，民盟举行七中全会，总结和交流参加国家建设的经验。当时，有的右翼分子以盟内拥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为政治资本，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党搞政治、盟搞教学”。恩来同志和我批判了这种错误思想，指出：民主党派的责任，就是要推动自己的成员积极地参加各自岗位上的建设工作，而不是由每个党派都直接领导建设。如果那样，我们的国家建设就成为多头领导了，就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经过政府机关，经过经济领导机关去进行，不能以党代政。学校也是如此。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只能经过校务委员会或它的上级领导机关教育部，这就叫做民主集中制。党、政、工会和民主党派等组织都应统一于所在部门的方针政策之下进行工作，不能各自为政。

在我们党的帮助下，民主党派经过讨论和正确总结经验，明确了基层组织的政治方向和工作任务：（1）在所在单位党政的领导下，密切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活动，而不是脱离中心，另搞一套；（2）密切结合业务实践、结合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既要防止单纯业务观点，也要克服脱离业务

实践、空谈说教的偏向；（3）组织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联系实际，敞开思想，民主讨论，辨明是非，逐步提高成员的政治思想水平；（4）深入了解成员的思想政治情况，协助党组织协调关系，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民主党派的深入工作，各民主党派成员的绝大多数在文教、科技、医药各个战线的建设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2. 在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代表和反映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

既然过渡时期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民主党派反映和代表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忽视民主党派这方面的作用，势必使民主党派脱离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从而也不利于推动和引导它们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又教育、又代表，又联系、又改造，这是民主党派发挥其作用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在民主党派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怕麻烦、嫌落后，不愿或不屑于代表和反映他们的合理要求，结果使自己陷于孤立和被动。一些右翼分子则企图把民主党派变成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一味迎合落后群众的无理要求，同我党进行较量。这是一种旧民主主义政党思想的反映，是从右的方面削弱和反对党对这些阶级、阶层的领导。我们对上述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必要的批评和教育，引导民主党派积极地反映和代表它们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这样做，活跃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内容，也便于我们党及时地了解这些阶级、阶层的动向，正确决定和灵活运用党的政策，适时地调整阶级关系。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我们积极支持民主建国会、工商业联合会密切联系资产阶级，充分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同它们进行诚恳的协商，采纳它们的合理建议，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增加了助力，减少了阻力。在高

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改造和参加国家建设工作方面，我们同样推动民主党派积极反映他们的政治思想情况和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协助予以解决。一九五五年底，在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前，我们推动民盟通过个别串连、谈心、交朋友等方式，深入了解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归纳为“六不”，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安排不妥、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对于我党及时地合理解决高级知识分子的困难，调整党同高级知识分子的关系，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向科学文化进军，产生了良好效果。这是民主党派工作中的一项成功经验。

### 3.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党同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

党同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事实上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存在。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主要政策的决定，都经过各种会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双周座谈会等），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认真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使各项政策和法令更加完善，有助于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党在领导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这是我党在过渡时期主动调整阶级关系、健全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成功的政策，使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代表人物的合法权益有所保障，各得其所。这种政策，对于团结、稳定和改造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是完全必要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利的。

### 4. 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它们的成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思想改造，培养和提高拥护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和核心分子。

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各民主党派在协助党实现这一方面任务中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一九五三年以

来，民建会、工商联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在工商界中培养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核心分子，对于协助国家顺利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伟大变革，起了积极作用。

以文教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也积极推动其成员结合本门业务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运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思想改造。一九五四年以来开展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对推动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运动中也产生了简单粗暴的现象，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视为“思想敌人”，混淆了政治问题与学术性质问题的界限，造成一些知识分子惶恐不安的疑惧情绪。民主党派一方面积极地向党组织反映情况，同时对其成员讲明政策，帮助他们解除顾虑，端正态度，正确对待。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开展批判后，俞平伯受到直接冲击。当时他思想抵触很大，顾虑把自己与胡适相提并论，担心政治上完全被否定，学术地位从此丧失。对此，九三学社组织了一批俞平伯的多年老友对他热情帮助，肯定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说明运动只是批判他错误的学术思想，而不是要在政治上打倒他，也不会全盘否定他学术研究的成果。经过多次谈心帮助，使俞平伯逐步减少顾虑、转变态度，作了自我批评。由于民主党派成员地位相当，经历相似，感情相投，彼此了解，使思想工作容易做到深入细致，取得较好的效果。

以上四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民主党派的主流和基本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民主党派同我党和工人阶级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和分歧。有些人在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和参加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仍然有着摇摆和抵触，一些右翼分子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甚至同我党进行过斗争。一九五三年九月党宣布总路线以后，有的人以“农民代表”自居，叫喊农民生活苦，攻击总路线。在发展社会主



义工业化问题上，有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曾提出“国营搞重工业、私营搞轻工业”的错误主张，企图保持和发展资本主义阵地。在肃反问题上，有些民主人士指责政府“镇反过火，出了偏向”，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大赦，等等。这些矛盾和分歧，固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但它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过程中局部性的争论。在我们党坚持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指引下，经过说服教育和协商，民主党派接受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没有形成对抗和分裂，其主导趋势是同党更加靠拢，密切合作，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在中央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期间，中央统战部检查和讨论了对民主党派的工作。在中央会议后，我们又召开统战部长座谈会，进行讨论和总结。大家肯定，几年来民主党派采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实践，它们的领导和成员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确有很大进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已经跨进了一大步。如果说，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有一只半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门槛，那么，可以说民主党派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了。民主党派作为整体来看，已经选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它们将跟随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了。另一方面，民主党派的成员还处在逐步改造之中，在民主党派内部，虽然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日益增强，资本主义思想已日益削弱，但总的说还处于过渡状态。因此，民主党派还不是已经完全具备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应当继续采取积极领导的方针，帮助各民主党派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断获得进步、发展和提高。

当时，党内不少同志认识落后于实际，对民主党派已经取得的上述进步和变化认识不清，估计不足；对民主党派的存在和作用有种种怀疑和抵触。他们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终结，

说：“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主张要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在工作关系上，对民主党派实行消极防范和控制代替；不敢放手让它们独立地开展活动，只喜欢同他们中的进步分子来往，不愿同中间落后的人接触。肃反运动开始以后，有些地方甚至企图借机排斥本单位的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人士。

我们在座谈会期间批判和纠正这种关门主义倾向，指出：一、民主党派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同我们党合作，共同参加民主革命斗争；建国以后又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在政治上没有理由抛弃它们，必须积极地帮助和率领它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骄傲自满，瞧不起民主党派，老子天下第一，不许别人革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二、应当相信，经过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锻炼和教育，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将会变成工人，非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将变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人将成为共产党员，民主党派也将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这是在我国历史条件下这些阶级、党派和知识分子必经的历史道路。怀疑这种变化的可能性，就是怀疑共产党坚强的领导能力、工人阶级的强大优势和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三、我们应当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全面规划，积极领导，推动这些阶级、阶层和民主党派继续参加社会主义的实践，使进步分子日益增多，使中间落后分子向进步方向转化，使顽固的反动分子陷于孤立。四、统战部门应当切实改变同民主党派的关系，政治上信任它们，关心它们，组织上尊重它们，克服包办代替、干涉它们内部事务的错误做法，放手让它们独立地开展活动；要改变过去只同进步分子来往的狭隘作风，直接同中间、落后的人建立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政治思想情况。五、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

策，要根据新形势的发展，重新审议。正确的予以保留，过时的予以废除，同时要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对民主党派的根本政策，同它们建立起真正的同志式友谊。上述政策观点，为以后贯彻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在这次座谈会期间，我们还讨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底，我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五个方面知识分子共三百八十四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只十万人，其中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七，非党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虽然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接受资产阶级的教育，不同程度地受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但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是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的重要骨干，不少人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富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政治敏感，有为祖国效力的理想和愿望。因此，团结使用改造高级知识分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建国以来，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入了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五四年批判唯心主义思想以后，他们又进一步受到教育和改造，大部分人的旧观点、旧习惯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是，党内不少同志不认识现代科学文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作用，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对他们存在着歧视、排斥以至惧怕心理，在学术思想批判中，对有些人简单粗暴，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这种错误倾向，妨碍了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深入贯彻。

我在座谈会期间指出：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来源，同资产阶级有根本的区别。应当同志式地帮助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他们的思想改造，需要经过长期耐心细致的工作，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强制的办法。人们认识的转变，不可能直线上升，而是曲

线的螺旋式地发展的。思想改造过程中出现一些反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准备一些人思想有反复，要允许人家多一点时间考虑思想认识问题。人们在几十年形成的世界观和学术观点，不可能通过一次运动或几次批判讨论就能加以解决。在学术思想批判中，要鼓励自由辩论，允许批评反批评，允许保留个人的意见，不要急于作结论。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必然的、经常发生的。但是不能把具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学者作为“思想敌人”对待。敌我问题是政治概念，决不能把政治问题同思想问题混淆起来。学术领域批判的对象，即使是坚持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也不是政治上宣判他的死刑，而是要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学术讨论，争取他们向进步方向转变。其中一些人可能至死不变，一些人则可能由唯心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要看到在我国条件下，多数人的总趋势是会向着好的、进步方向转变的。知识分子、专门家接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要经过他们本门业务的实践。我们应当把组织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同他们的业务实践结合起来。对他们工作上、思想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采取切实负责的态度，协助解决。统战部门要积极支持和帮助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开展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同时，也要直接同高级知识分子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接触，了解他们，帮助他们，促使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这次座谈会的意见，对于纠正高级知识分子工作中“左”的偏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九五五年底，章伯钧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农工民主党拟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得到我党的支持。一九五六年一月，农工民主党中央提出了《关于知识分子团结改造问题的几点建议》。这一期间，我们还将民盟中央了解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六不”的问题，及时向中央反映，为中央筹备召开

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作了一方面的工作准备。

## (六) 一九五六年统一战线面临 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九五六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国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使我国开始进入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召开最高国务会议，高度评价我国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指出：“在我国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所有制为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且提出向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进军，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同志这一号召，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后我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也指明了我国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中央在一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总结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为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指出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六

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国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报告》批判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倾向，提出应当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给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给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同时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才能最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在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力量，贡献其业务能力和专长。毛泽东同志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强调指出我国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也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次会议坚持从社会地位来考察知识分子的根本变化，肯定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解决了党内长期争论的一个大问题，纠正了对待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改善了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方针。在党与非党关系方面，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要把民主党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我国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

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这就是后来概括的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九月，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对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作了深刻的阐述。

八大的路线和毛泽东同志的多次讲话，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发展和巩固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规定了方针。

中央统战部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遵照中央的路线和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研究了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任务，制定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的政策和措施。现在看来，这些方针政策和措施仍然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

这一年的统战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召开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制定《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二 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使我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

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一月间，中央统战部经过集体研究，由我主持起草《一九五六——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一月二十八日向中央送审稿中，曾提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二月初，恩来同志审阅时指出这些提法不妥。我们当即取消这些提法，并对文件重新作了修改，经中央审核同意，提交第五次全国统战会议讨论。修改后的《七年方针》对统一战线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应采取的新方针，作了明确分析和规定。

1. 指出工人阶级已经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1)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工农联盟被推进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成为牢不可破的联盟；(2)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被消灭，但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大多数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成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而且不能不在公方直接领导和工人群众直接监督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而共同工作。他们中间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日益增多，有从少数发展成为多数的趋势；(3)知识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来说，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5)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且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这些变化指明，统一战线内部的社会主义一致性正在发展和加强。

2. 教育工作已经成为今后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统一战线内部虽仍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今后将更多地从机关、学校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表现为对待这些问题的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情



况更有利于我们在阶级斗争中使用教育的方法（无论在政治上、工作上和思想上），更要求我们把教育工作当作统战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使极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对于最后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获得思想上的准备，而且能够改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使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并且做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从思想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

3. 要充分估计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几年来的进步，在机关、学校、企业同他们普遍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要分别不同情况，给以应有的信任，分配以适当的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对合营企业的资方人员，应当领导他们积极参加生产、经营和企业改革，受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教育。

我在会上对《七年方针》的基本精神、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教育工作问题、民族工作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从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来说，资产阶级分子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知识分子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大多数少数民族也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民主党派也走过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此，大大缩短了过渡时期的时间。原来设想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现在可以两个五年计划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发展和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要求我们在工作方针上应有新的提法。制定《七年方针》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在今后七年内把教育工作提到首要地位，经过工作实践的教育，经过政治理论的学习，帮助资产阶级分子、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思想改造，逐步做到同他们已经变化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最后实现国有化获得思想上的准备。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七年方针》作为这次全国统战会议的决议，三月三十一日经中央批发各地执行。现在看来，《七年方针》对当时形势的基本分析和强调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但对调动党外人士为建设服务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则是一个缺点。

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草案》、《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干部管理工作的规划》、《关于在省、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关干部中进行肃反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会后，均报经中央批发各地。

## 二、普遍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 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

为贯彻《七年方针》，在我们建议和帮助下，全国政协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并在三月发布了全国政协《关于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决定》，规定教学方针是：（1）参加学习与否，必须按照自愿的原则；（2）必须贯彻自由思考、自由辩论的教学方法；（3）不查历史，不查思想；（4）在学习条件上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员一视同仁。

为了满足广大党外人士的学习要求，经中央同意，在北京举办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党外人士的“高级党校”，吸收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分期分批进行短期离职学习。在全国各地，普遍举办政治学校和工商界讲习班，系统学习三门课程：（1）社会发展规律；（2）企业改革的基本知识；（3）时事和政策。经过这些有计划的学习和教育，使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步解决了“破

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为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起了积极作用。

### 三、处理好两种类型的合作共事关系， 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一九五六年六月，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我根据《七年方针》和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作了题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对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方针作了系统的说明。指出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以后城乡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使我国广大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一致性日益扩大和增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教育和学习成了统一战线的中心工作。指出目前有两种类型的合作共事关系，一种是机关、学校和国营企业中共产党员同一般党外人士间的共同工作关系，这种关系基本上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另一种是公私合营企业和一部分国营企业中职工和共产党员同资产阶级分子的共同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同时又是一种阶级关系。正确处理这两类合作共事关系，是帮助人们进行自我教育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关键。这一发言还将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概括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的方针”。指出我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彼此间在政治上有互相协商、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的传统，我们应当继续发扬这个传统，应当严格地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利加以干涉。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提出党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重大方针，就是再一次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

“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这篇发言，事先经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审阅同意，对促进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对调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政治积极性，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 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战政策的检查，大力改进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

第五次全国统战会议期间，反映出统战部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会议决定切实检查一次统战部门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认真发扬民主，克服缺点，改进关系。这次检查，实际上进行了一年多，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三月至五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秘书处党组首先从内部进行检查。以后又把自内和自外的检查结合起来，号召和发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召开各种座谈会，广泛征求和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这段检查，确实揭露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和缺点，主要是：（1）党外人士安排后，不少人无事可做，或有职无权，坐冷板凳；（2）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联系不够，同进步分子往来多、同中间落后的人接触少，有时偏听偏信，助长了党内和进步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3）对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尊重不够，往往以多数压少数，堵塞言路；（4）以领导者自居，只教育别人，不注意向党外人士学习；（5）同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差，尊重组织独立差。这些缺点，确实妨碍了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积极性的发挥，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利的。我们诚恳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五月二十一日，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组织和推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检查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统战部门，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进一步开展检查，广泛地揭露缺点，改进工作，教育我们自己，增进党和非党的团结。

第二阶段，从六月至年底。这一期间，由于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国际反动派掀起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在党内外一部分群众中引起了思想动荡；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讲话在党外人士中间广泛传达后，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民主活跃的局面；下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资本家交出了企业，自觉“衣冠齐整、精神抖擞”，有些人表露出向我们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倾向。在这些国际、国内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在七月、十月的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我们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

### 1. 关于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党外人士对党提出这一方针普遍表示满意和拥护。认为是“思想上的大解放”、“民主党派新生命的开始”，明确了民主党派的任务和前途。有些人顾虑这个方针在党内不能贯彻到底。有些人则认为这个方针只是一种策略，用以对外宣传、安定民主党派人心而已。

关于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问题，章伯钧等人提出：第一，监督应有法律的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第二，民主党派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党派的“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第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应付。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一九五二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我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

勋”。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 2. 关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

章乃器尖锐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说：“现在工商界只抬了半个头”，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章乃器的这些观点，当时受到一部分民主人士、资本家的欢迎和同情。

## 3. 关于党与非党的关系

罗隆基、章乃器等人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

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不少人对某些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的甚至说：“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

## 4. 关于人民政协工作

对几年来政协扩大安排、工作内容有所充实，表示满意。有些人则感到安排政协委员只是政治待遇，平时无事可做，批评“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章伯钧主张中国应实行两院制，使政协变成建议、监督、审核的机关，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议院。他还提议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成立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针的建议。他这一主张，因高级民主人士反映冷淡而作罢。

为使这次检查搞深搞透，我们于七月二日发出补充指示，要

求各级统战部门严格检查自己的工作，做到一面检查，一面解决问题，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出的批评，不论是否正确，都应及时向党委反映，认真改进党与非党的关系。对错误的意见，不要迎头反击，而要广开言路，具体分析，在适当时机正面说理解释。

这次检查，广泛发扬了民主，使党外朋友无保留地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些意见是错误的，但总的说，确实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及时纠正自己的缺点，进一步加强党的统战工作。

## 五、进一步贯彻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根据党外人士在检查中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我们汇集综合为七款四十八条。除推动民主党派分别讨论外，十月间又召开统战部长会议，对改进党同民主党派关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会议经过讨论，明确解决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 1.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依据

大家认为，党提出这一方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

第一、民主党派虽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派别，但它们与欧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而是革命的、爱国的、同共产党合作的政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它们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成员将变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民主党派作为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仍然需要在很长时间内继续联系和代表这部分劳动者，推动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进一步实行自我教育。这是我国民主党派能够同我党长期共存的

客观依据。周恩来同志在阐明这一方针时曾说：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些讲话充分表达了我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战略思想。

第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派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党共存的可能性。特别是我党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在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首先依靠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同时也需要重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它们今天和将来都联系和代表一定的社会基础，“能对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我们的经验证明，实行这个方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主义都是有利的。

## 2. 关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同时又是平等的友党关系。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应当经过我们的宣传工作和政治协商，使它们自愿接受党的政治主张，从而确定自己的政治行动，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可以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附属团体，任意地去命令、干涉和控制它们。一定要尊重民主党派在宪法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地位，放手地让它们独立地处理自己内部的事务和开展活动。应当彻底纠正那种通过少数进步分子把持包办民主党派内部事务、修改它们的文件、干涉人事安排等的错误做法。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它们内部的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保持经常联系，同它们建立起诚恳的、友谊的、互助合作的关系。

## 3.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组织问题



会议认为历史上形成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和各自的发展对象，基本上符合社会客观的需要，但这不等于机械地划分范围，各党派经过协商，可以按照新情况作必要的调整。

根据会议讨论结果，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发各地征求意见试行。这个草案阐明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措施是正确的、积极的，以后，由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未能形成正式文件而搁置下来了。

## 六、继续贯彻对民族资产阶级 和平改造的方针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国务院八办在中央领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妥善解决了清产核资、定息、人事安排等问题，本文第三章已经论及。下半年在检查统战工作中，以章乃器为代表提出的某些言论和批评，实质上反映了为资产阶级争取更多政治利益的动向。到十一月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期间，章乃器转而在该会内部掀起了一场原则性争论。第一，他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把资产阶级美化为“红色资产阶级”，宣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产阶级消极性一面已经没有了，“再提两面性，就要动摇工商界的信心”。第二，他宣扬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自发性，冲淡以至否定工人阶级和党的正确领导。第三、他批评过去对资产阶级的实际教育是“残酷斗争”，主张今后对资产阶级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只要鼓励，不要批评。围绕这些原则问题，民建会内部运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一场热烈的争论，争取教育多数，批判章的错误思想。我们当时指出，章乃器的这些言论和批评，本身具有消极与积极的两面性。他的言论和批评的主要部分带有原则性错误，但他也确实指出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偏差，特别是他敢于代表资产阶级公开地提出尖锐的批评，对

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缺点和及时察觉资产阶级的动向是有利的。因此，在批评他的错误时，又要保护他敢于同我们唱对台戏的积极性。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对民建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以高度评价；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各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多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敌我之间的（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在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公开作了详尽的阐述。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八日，毛泽东同志分别接见了在京开会的各地工商联、民建会负责人，对时局问题，对资产阶级的看法以及党的政策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一、关于时局问题。他指出，国际国内的事情是充满矛盾的。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又批判了斯大林错误，中国出了高岗、香港出了九龙事件，现在又出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苏伊士问题，世界问题多得很。出了这么多问题，社会主义还搞得成搞不成？会不会崩溃？我看崩溃不了。二、

对资产阶级的看法，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爱国的资产阶级，但是不要讲红色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中，有进步、中间、落后，思想状态不一，颜色不一，要承认有两面性，才合事实。阶级历史这么长，不能说没有两面性，如果说只有一面性，那就不利于改造和进步，就用不着学习了。整个阶级是爱国的，但还有落后因素，所以还有学习任务。承认缺点是有好处的。三、定息和“摘帽子”问题，指出：赎买政策是要真正的赎买，不要半赎买半没收，因为资产阶级搞革命，同我们合作。定息时间七年为期，如果没解决问题，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一点尾巴。天理人情，讲得过去。共产党不在这上面省几个钱，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中小资本家要摘帽子，再过一、二年可分批进行，但必须一不提倡，二不搞高潮。四、工商联、民建会问题，指出：工商联可以长期存在。定息取消后，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可以做为一部分劳动者的工会，但名称要保存不要改。民建会应当代表大资本家，事实上是大中路线。要认识统战主要对象和定息对象是大的。认清这一点，共产党、民建会、工商联都好做工作。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明确回答了党外人士对国内外时局的种种疑虑，指明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和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团结和稳定了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对于巩固加强党的统战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起来说，一九五六年的统战工作，在中央指示下，我们制定了《七年方针》，深入开展了统战政策的检查，及时地处理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调整了关系，活跃了统一战线内部的民主生活，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和工商业者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促进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成绩是巨大的。

## (七)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路线的体现。但是，从一九五七年夏季开始，由于党内为指导思想上产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打断了全国转向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

从一九五七年夏季以后，党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同样有过严重失误，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

### 一、整风运动的开展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立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不再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成为我们党团结各族人民胜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认真总结了苏联和我国的经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他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在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经济工作中对城乡各阶层人民要采取“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利益的方针；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方面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精辟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于我们党团结全国人民，胜利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 1. 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四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结合讨论统战工作。我在会上发言中分析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几个同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的矛盾，提出了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意见。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其趋势是要逐步地转化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由于思想的转化总是落后于社会地位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真正改造过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统一战线的第二个联盟（即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联盟），正处在向劳动人民联盟的过渡状态中，这些对象自身正处在分化的过程中。指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统战工作范围的矛盾的发展有以下的特点：（1）新事物、新问题、新矛盾拥挤而来。旧的排了队，提上了日程的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新的又接连着发生。（2）在第二个联盟内部，在民族地区，在宗教问题上，特别在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的

地区，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情况的可能较多，甚至是自发的。（3）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但是阶级斗争还存在。对于如何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我根据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话的精神，提出三点意见：第一，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战略方针；第二，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学习马列主义；第三，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这三条意见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承认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必须运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把对同盟者的政治教育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正确地加以解决。在这个方针和原则下，对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一个根本性的安排，各民主党派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之内，享有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和法律面前平等的地位，不仅是党的政策要求，而且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对民族资本家，主要问题是搞好合作共事关系，这是进一步改造资本家、最后消灭这个阶级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起辅助作用的办法（如讲习班）都要减色以至落空。同时，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去年，国内国际都是大变动的一年。在国内，锣鼓喧天的后面，进行着深刻、激烈的阶级斗争。到了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股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右派是这股风的主帅、军师。个别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从中挑拨和煽动。右派之外，还有调和的人，还有受影响的人。我当时认为，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并且指出：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我们一要保持政

治嗅觉，二要进行具体分析。平常睡觉，一旦听到有贼，就拿起棍子乱挥，这就不好。指出：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

这次全国统战会议，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为指导，深入研究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矛盾，提出了处理各种矛盾的方针和原则，是一次发扬民主、思想解放的重要会议。现在看来，这些意见是符合党的“八大”决议的精神的。可惜以后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指导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使这些正确的方针原则未能坚持贯彻下去。

## **2. 中央发布整风指示，召开两个座谈会，极少数右派乘机进攻**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纠正党内日益滋长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对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士兵群众、学生

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团结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各民族、各党派和广大的党外群众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那些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指示》还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四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我党整风。马寅初等都到会了。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也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他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

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中央统战部于五月初和五月中旬，在全国政协和国务院礼堂分别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前者开了十三次，七十余人次发言；后者开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次发言。在这期间，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党委，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党外人士对党都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正确的、很好的意见，有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如张奚若五月十五日发言，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作），鄙



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陈叔通五月十六日发言，提出，“矫枉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刘斐、杨明轩提出，党政应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熊克武等提出，要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抓紧制订民法、刑法和各种单行法规。还有的人提出，应重视和发挥党外人士、工商界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办大学要依靠专家学者，建立规章制度，使党外人士、私方人员有职有权；要健全人事制度，改进人事工作，任人唯贤，在提拔奖惩上，党内外干部要一视同仁；要加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宣传，广泛联系统战对象，虚心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主动“拆墙填沟”；要为民主党派创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条件，让他们了解有关的政策和情况，帮助他们发展成员，解决干部、经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但是，在座谈会的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大肆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猖狂进攻，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

一、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胡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二、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我国国内“一团糟”。三、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绩，否定历次政治运动。攻击“两点论是教条”，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肃反的偏差和错误很大很大”，叫嚷要为反革命“平反”，煽动社会上的反动分子起来，“由各方面造成舆论”。四、他们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粮食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政策。攻

击“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路线，提出让私人办报、办新闻社。五、他们不但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攻击讲优点和成绩的人是歌功颂德，造成一种只许讲缺点错误，不许讲优点成绩的空气，而且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宗派主义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六、他们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否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不承认资产阶级分子有继续改造的必要性。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右派分子人数虽然极少，但能量不小。在他们所煽动的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影响下，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的中间分子中一部分人一时思想动摇，有的迷失方向。一些地方发生少数人罢工、罢课、闹事，而且有蔓延之势。如果坐视这极少数右派分子掀起来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泛滥下去，刚刚建立起来的尚不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秩序，势必导致某种程度的混乱。

为了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争取教育中间派，中央决定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

### 3. 反右派斗争的酝酿发展过程及其严重扩大化

中央当时发动这一场斗争，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会反映出来的意见，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五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

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毛泽东同志长期生活于尖锐的敌我斗争环境中，政治上很敏感。早在这年一月十八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着重考察分析了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他说：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复辟？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五月中旬。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

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会被划为右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两个座谈会分别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六月八日结束，我在会上都作了总结性的发言。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少奇、恩来同志看过。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六月八日工商座谈会结束时，反右的形势已经明朗，我在讲话中指出：“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并且批驳了反对思想改造，宣扬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没有剥削、拿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阶级的两面性，他们同工人之间已经没有阶级区别，资产阶级分子不经过改造也能爱社会主义，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本质的改造等等言论，指出：“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两篇发言虽然没有明确说要反右派，但实际都是准备反击的。

反击右派的斗争，从六月八日正式发动。当天，中央发出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七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又为《人民日报》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运动。在“六·

八”指示中，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在“七·一”社论中，批判又进一步升级，不但点名批判了所谓“章罗同盟”，并且把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错误地说成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党派，说：“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宣称右派分子就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在这些指示和社论的部署、号召下，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七月，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同志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但是不叫反革命，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有可能转变过来”。当时对右派的策略是一打一拉，先打后拉。这篇文章还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

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并说：“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对于正在全国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文章提出“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青岛会议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就以狂风暴雨之势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发生了严重扩大化。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文件虽未指出前一段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扩大化的倾向，但提出“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无论划多了或者划少了，都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可惜，这个《通知》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一些地方和单位又错划了一批右派分子。

在青岛会议期间，我草拟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经毛泽东同志审阅批发各地执行。文中提到，从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现在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的整风运动可以促使他们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加的。后来，我在有些文章、讲话中说“资产阶级分子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大弯子”，就是从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演化而来的。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

思想同样是“左”的。因此，在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我在这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讲话，缺乏全面、历史的分析，对同我党长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阶级联盟性的民主党派，简单地宣称为“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把在一九五六年初已经宣布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已经交出生产资料、处于由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过程中的工商业者，断言“他们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的反动立场”。这些估计，否定了一九五六年以来我们党和我个人对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深刻变化的正确评价，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在对划为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处理上，打击面过大，处理也过严过重。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第九次全国统战会议提出对一百多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绝大部分人是撤职或降低职务，只有个别人免于处分。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统战部会同中宣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选择了比较知名的九十六名右派分子作为标兵，提出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报中央转发各地参考。九十六人中，绝大多数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或实行监督劳动，只有二人，免于处分。

对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某些负责人在一开始就表示不满，提出不同意见。黄炎培六月十五日表示不要树敌过多，要把可能拉过来的人拉过来，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推到反党这一派那里去。陈叔通六月中旬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党的某些领导人没有掌握好这一点，现在问题很严重。邵力子说，现在有许多问题处理的方法太硬，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要来个沉默抵抗。史良表示不赞成把揭发右派分子的材料登在报上，担心这样做运动搞得很大。六月下旬，李济深表示他要在人代大会上发言提出不要

骄傲自满，困难还很多，还要努力。对党外人士的这些意见，中央统战部虽向中央作过反映，但在当时“左”倾思想影响下，不可能对这些正确的意见引起重视和认真研究，而是简单地反映了之。

我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反右是积极的，错误多大，我都有份重要责任。对于一切被误伤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对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我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有所觉察。在这之前，一九五九年八月，毛泽东同志给少奇同志写信，提出要给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予以宽大处理。一九六二年，我们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十六年。一九七八年四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55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为右



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的建议。当年九月十七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中，已改正的五十四万余人（其中有些是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对于目前还能工作的，都已重新安排了工作，基本上做到量才使用，各得其所。对所谓的“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受株连的家属也基本上落实了政策。应该说，这场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经历漫长的二十一年之后，终于在现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平反纠正过来了。这方面的改正和善后工作也是做得好的，深得人心。这是贯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指导方针的巨大成果，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和发展国内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4. 这场斗争扩大化的教训**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认真总结。

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八大，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正确的路线，在短短七年多的时间内，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这一段，我们党的路线、方针一直是正确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二年，就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呢？我认为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原因。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消灭阶级，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使人类社会摆脱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逐步地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新社会区别于过渡时期的根本标志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基本建立;剥削制度已经废除;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生产资料而处于消灭过程之中;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应当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努力。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党的八大决议指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国内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由剥削者变成了半公家人、半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也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朝着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劳动者政党方面转化。不论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及各民主党派,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政治上获得空前的解放,他们没有什么“包袱”而一身轻了。这时候,他们要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工作发议论,作批评,提建议,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性的表现,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成果,符合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之后的新的形势任务的要求。同时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转到了历史舞台的主要方面的必然的和正常的现象。但是,当时我们党对他们的这种进步性和积极性估计不足。当党外人士在整风期间向党和政府工作提出大量意见以至尖锐批评的时候,当人

民内部各种矛盾突出表现出来的时候，党在指导思想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阶段，因而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产生了错觉，把人民内部的各种批评和意见误认为敌我斗争，并且对极少数右派的进攻估计得过于严重，匆忙决定发动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斗争加以反击，这就难以避免地导致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我们党长期生活在农村。毛泽东同志和许多领导干部熟悉农业、手工业小生产，不熟悉现代化的大生产；熟悉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缺乏深刻认识。因此，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时，往往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从而把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多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毛泽东同志这篇讲话，是直接针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经济建设工作中违背客观规律造成的严重失误而言的。我以为这对于一九五七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失误，同样是适用的。

第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这是有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一九五六年初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大反斯大林，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严重的思想混乱，并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利用，一再掀起世界范围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恶浪，不能不唤起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警觉。在国内，这股反动风浪也影响了一些人，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

二月所说的“吹皱一池春水”，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确实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有些地方，由于这股思潮的影响，也由于那里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不到很好解决，出现了少数人罢工、罢课等闹事事件。鉴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恶浪的发展和国内某些动乱的苗头，因而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是“惊涛骇浪”，“十级台风”，“黑云压城”。其实，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予以反击是必要的，这是为着澄清大是大非，为着教育广大的中间派和维护社会的安定，而决不是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有被颠覆的危险。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我们的人民是团结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党的领导的，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巩固的。因此，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必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对右派的进攻进行批判反击，完全可以制止事态的蔓延发展。

从历史根源说，我们党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从秋收起义起一直到他的晚年，从没犯过右的错误。对于战争，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几百万敌军都听他调动。对军事这门科学，他在理论上的杰出贡献超过了马恩列斯。政治上同反动派斗争，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和策略同样非常英明，可以说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不行的，对敌人就是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错误在于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因而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把朋友当成敌人，当成“蛇”引出来，这就混淆了敌我。

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缺乏科学分析，提出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需要有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是没有客观根据的。政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这在一九四九年我国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时就已经解决了。七年来，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是空前巩固的，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即使有极少数右派真正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只是蚍蜉撼大树的妄想，并没有现实的危险性。夸大右派进攻的危险性，实际上是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对我们党的领导力量、对党外人士的进步和变化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的胜利成果，估计过低。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达到了高峰。在这一新的艰巨任务面前，全党应当更加谦虚谨慎，发扬民主，团结全国人民一道奋斗。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却逐渐骄傲起来，发展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党内民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受到了损害。历史地考察，这种个人专断和党内对他的个人崇拜是逐渐形成的。直到一九五六年，党中央还基本上保持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说了算。中央统战部在一九五六年二月报送中央的《七年方针》，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事先都已审改同意，后来恩来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又对文件作了修改，说明当时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还是好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也提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些都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到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判了反冒进是“促退委员会”之后，

正确的意见受到抑制，党内民主生活逐渐受到损害，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几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虽然多次讲不要搞奴隶主义、不要骄傲、不要迷信个人、不要个人专断等等，但在这期间和以后他却滋长了“一言堂”的作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于个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正确地指出：“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全面地历史地加以考察，对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这一失误，毛泽东同志从主张到部署都负有主要责任，但当时中央认识上是一致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他的主张得到了中央的确认。因此，又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 二、党外人士的整风运动和全国 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

一九五八年，党内在反右派斗争中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想不但没有得到纠正，而且继续有所发展。这在统战工作中同样表现出来。

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在指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同时，还指出社会革命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各民主党派也要整风，要整得适合人民的要求。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国人民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此后，在全国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的错误。在政治生活方面，否定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错误地肯定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不仅将已经退居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重新推到主要矛盾的地位，而且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这一时期，中央统战部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部署，领导和推动党外人士开展整风运动，强调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要实现由资本主义立场到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改造，这主要是针对广大中间分子在右派进攻中表现动摇的情况提出来的，是必要的。但是要求过高过急，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并且在一个时期内，还将当时对建设工作的“大跃进”、“高速度”、“高指标”挑战应战、评比竞赛等一套“左”的口号和做法，机械地搬用到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改造工作中来，出现了形式主义的、浮夸的东西，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对于这些作法，我和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当时是支持鼓励的，是负有责任的。

### 1. 整风交心和自我改造“大跃进”

二月二十七日，我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三月四日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改造问题的通知》，说当前在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全面进行自我改造的大跃进的形势，在制订和实现自我改造规划的过程中，在个人或集体之间可以进行挑战、竞赛和评比。三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又发出《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把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掀起制定集体和个人的改造规划、进行挑战、评比、竞赛的群众性运动说成“这是一种社会主义

的自我改造的先进形式”。这样，就不断加温，搞起了“加速改造”的运动，竞赛的条件越来越高，改造的速度越来越“快”，有的提出“一年改造成左派，二年加入共产党”，甚至提出“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产党”，出现了大量虚假浮夸的现象。与此同时，天津资本家用大字报的形式，提出“向党交心”的口号。三月十六日，北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表示要“把心交出来”。其他地区也纷纷响应。四月中旬，中央统战部在天津召开向党交心运动的现场会。这样，党外人士“向党交心”的运动，在全国普遍开展起来，影响很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少地方在交心运动中又把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

在这期间，工商界还提出要放弃定息、放弃高薪和下放参加体力劳动等要求，其主要方面反映了广大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要求摘掉“资本家”帽子的愿望，大、中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内心是不愿意的，思想很紧张，但迫于形势也表示同意。我们及时将这个情况向中央反映。三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示，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交心可以，不要交钱。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资本家工资很高的，也以不动为好。资本家劳动可以。随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央发出了《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的贯彻执行，使全国工商业者，特别是大、中资本家稳定了下来。有的地区、有的行业不适当地将一部分有技术专长或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下放车间、柜台，甚至下放到农村，长期转入工农业体力劳动，是个损失。

## 2. 主持起草两个改造纲要

我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深切感到对民主党派、工商界和知识分子加强改造工作的迫切必要。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开始，我



带领中央统战部的几位同志，组成调查组，到天津、上海、湖南、广州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着手主持起草《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草稿)》和《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改造民主党派工作纲要(草稿)》。一九五八年六月，写出了两个改造纲要的草稿。

《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草稿)》提出：“从一九五八年起，争取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使原来大约一百一十四万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改造和思想改造，主要是政治改造，达到实际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一）绝大多数人能够自食其力，养成劳动习惯。（二）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按六条标准，在政治上抛弃或者基本上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转到社会主义立场。（三）多数人在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面有显著进展。”“苦战三年，争取在一九六〇年内，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人达到上述三项要求。”“争取在五年之内，在原来资产阶级分子中，使左派分子增加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并提出对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期间带进公私合营企业的个体劳动者和有轻微剥削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可以从一九五九年起，让具备条件的人分期分批摘去帽子，加入工会”。

《改造民主党派工作纲要(草稿)》中提出：“争取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时间内，使民主党派基本上完成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根本改造，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第一，使他们成员的基本队伍，在政治上按六条标准，基本上抛弃资本主义立场，转到社会主义立场；第二，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机关，巩固地树立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第三，克服资产阶级政党作风。”“争取在五年内，使民主党派成员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成为左派分子和中左分子。在最近三年内要争取民

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中央统战部将上述两个改造工作纲要（草稿）作为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审批。中央领导同志在书记处讨论时指出：（一）文件对形势和任务的估计急了一些，对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够，对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假现象应予估计。（二）消灭阶级不那么简单。作到与否，一半在我们，一半还在资产阶级方面，即使作到，也不要定出年限。（三）规定百分比不妥，五年内左和中左分子达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不可能。（四）资产阶级的帽子久留一些好，定息也不动。（五）五年内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成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提得是否高了一些？

我们根据书记处的意见，对两个改造工作纲要（草稿）进行了修改。（一）删掉了“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达到实际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的提法。（二）任务和时间放长放宽，改为（1）在今后五年到十年，即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七年，就全国范围说，争取资产阶级分子的多数人以致大多数人改造得好一点快一点，能够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自食其力；大体上符合六条标准。（2）民主党派作到：确立和贯彻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建立起巩固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核心；成员的多数人，基本上符合六条标准的要求。（三）将有关工商业者摘掉帽子的内容全部删去。（四）对五年内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等，不规定数字。

《纲要》没有写五年消灭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我思想上是有保留的。我曾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份，富农三年改变成份，为什么资本家五年不能改变成份？消灭资产阶级同取消定息相适应的道理是很难驳倒的。不写消灭资产

阶级，但是指导思想就是消灭资产阶级。

我认为，把取消定息作为资产阶级消灭的标志，是没有错的。提出以实践和体力劳动为基础、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作为改造的基本措施，以说服教育的方法作为根本方法，也是对的。问题是，提出五年内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政党，左派加中左分子要达到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确是要求过高过急了；对人的改造定出百分比作为指标，用“四大”、评比竞赛和搞运动的方法来改造人的思想，也是不符合实际和思想改造客观规律的。这些都是当时“左”倾错误思想的表现。

### 3. 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

一九五八年七月，中央统战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草案)》、《改造民主党派工作纲要(草案)》和徐冰同志《关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问题》的报告，还讨论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改进工作方法的试行方案(初稿)》。

这次统战工作会议是在反右斗争、整风交心的高潮之后和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召开的。许多同志斗了一年多，头脑发热，强调阶级斗争，对党外人士的改造急于求成，认为两个改造纲要(草案)提出的标准太低，五年时间太长，太消极，等等。

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邓小平同志到会就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报告，并对统战工作作了指示。彭真同志到会作了题为《一张大字报》的讲话，批评当时某些“左”的错误，着重讲了当前统战工作的方针。他指出，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不要总是斗下去，把弦绷得那么紧，现在整风应该告一段落，转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实践，从以斗争为主转入以团结为主，让他们到实践中去，以实际行动来表现思想改造的决心和成果。

我在会议近结束时，到会作了两个半天的讲话。讲了改造、团结、学习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团结问题上，主要讲了六点：（1）现阶段的统一战线，是以六条标准为基础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今后的关系，仍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应当加强团结，搞好合作，调动他们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3）适当安排，是团结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4）团结和斗争。不能主观任意地说团结为主或者斗争为主，强调团结或者强调斗争，一切决定于具体的情况和条件。阶级斗争是波浪起伏形势。浪头大小，决定于阶级斗争的具体发展形势。一般地说，随着向左转化的人数日渐增多，他们的左转角度日渐扩大，阶级斗争的浪头也会越来越小，而不是越来越大。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出现大的浪头也是可能的。（5）党内反右为主，还是反“左”为主，也要看情况说话。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右倾突出，反右为主。“左”倾突出，反“左”为主。（6）破除迷信。认为统战工作只是少数人或者统战部的事，就是迷信，应当破除。要在党领导下，让广大群众广大干部都参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斗争，使统战工作形成全党动手、同群众结合的局面。这种局面要尽可能坚持下去，不再回到少数派时代。

在学习问题上，主要讲了七点：（1）把工作、学习和党性锻炼凝成一体。（2）党的立场一定要站稳。（3）政治方向一定要把稳。（4）要抓工作中的主要环节。（5）要作好调查研究工作。（6）尽可能使工作和学习互相结合起来。（7）依靠中央和党委的领导，坚持请示报告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

会后，中央统战部起草了《关于全国统战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报告》，经中央批转各地研究执行。《报告》指出，下一步统战工作的方针应该是：领导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到实践中去，同全国人民一起，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从工作和劳动的实践中，调动和发展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检验他们的整风成果。同时，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按照毛主席指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继续进行自我改造，使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密切结合，相互促进。

这次会议，是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和党外整风运动基本结束，确定下一步统战工作要转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上来，着重领导和推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界转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同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继续进行自我改造。这个方针，虽然只是斗争策略的调整，还不是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但它毕竟缓和了一年多紧张的阶级斗争，纠正了某些“左”的错误，在当时形势下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 三、贯彻缓和阶级关系的方针。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

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七中全会，采取许多措施，积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察觉的“左”的错误，同时在对资产阶级人们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提出一张一弛，强调要把紧张的关系弛下来，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对知识分子工作上，提出要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七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但是在对待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了慎重的和比较稳妥的方

针。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分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和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同时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比如世界观的问题，洗脑子不容易一下子洗得那么干净，慢慢来。他正式宣布，在党外人士中现在不搞运动。实践表明，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统战工作的这些方针政策和指示，是适合当时形势发展的要求的。在这期间，我因病休养，由徐冰同志代理中央统战部部长。他和部的其他领导同志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这些方针政策和指示，做了不少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一，宣布“五不变”的政策。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召开中执委联席会议。会上反映出工商界担心党改变赎买政策和安排政策的思想顾虑。同时也反映出厌倦改造的情绪。徐冰同志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在招待民建、工商联与会人员的元旦宴会的祝酒词中，宣布了“五不变”的政策，即：定息政策不变，领不领听便；高薪不变；政治上适当安排的方针不变；学衔制不变；根本改造的政策不变。这对工商界和知识界、民主党派都起到了团结稳定作用。

第二，进一步贯彻“弛”的方针。

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和八日，徐冰同志在讨论民族、宗教工作的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着重讲了对阶级关系“一张一弛”的体会和当前贯彻缓和阶级关系的“弛”的方针的必要。他说：“现在的情况是资产阶级厌倦改造，厌倦批评；厌倦是不对的，但厌倦的情况应加以分析。对资产阶级改造的方针不能改变，但顶牛也不好。因此，目前应改变斗争的方法、改造的方法，由批判斗争改变为正面的说服教育的方针。”“弛下来并不是没有阶级斗争了，而是进行说服教育，说理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

形式，总的是阶级斗争，改造政策必须根据情况应紧就紧，应松就松。”今天对资产阶级人们的“工作重点不应放在整风上，不应该放在不断斗争上。”“要让他们多做工作，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在工作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在服务中进行改造。”

五月上旬，中央统战部召开各省、市委统战部长座谈会，继续贯彻弛的方针。经过座谈，思想逐步取得一致，认为阶级斗争总的形势是逐步趋于缓和。提出当前统战部门的工作是：继续深入地贯彻去年两次统战会议的方针，充分调动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服务中进行改造，使服务与改造密切结合起来。概括地说，就是：“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继续改造。”对党外人士的政治思想工作应当是更加和风细雨地进行正面教育，一般地不进行群众性的批判和斗争。会议还针对当时有的省、市对民主人士安排的人数减少过多，比例下降过大的情况，强调继续贯彻政治安排不变的方针。会议还认为，应该让资产阶级分子、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同职工一道参加评选先进生产(工作)者，符合条件的，应和职工一样出席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全国选举了六十二名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十一月召开的全国群英会。这对于调动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第三，在党外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运动。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已经宣布，现在不是一九五七年那样的形势，也不是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那样的形势，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在党外不搞运动。然而当时中央统战部的某些领导同志在这些问题上认识并不一致，一度发生摇摆。

九、十月间，中央统战部连续召开多次部务会议，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在讨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资产阶级动向时，还邀请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省市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廖沫沙、冯国柱、王笑一、罗范群等同志参加。由于庐山会议后错误地在党内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强调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又进一步滋长。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当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出现了小波浪。有的同志认为出现了小浪头，主张对资产阶级分子不应再贯彻“弛”的方针，应是弛中有张，还是要强调改造，以改造为主。我认为，应遵照毛泽东同志九月十五日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所宣布的，在党外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运动。

十一月十三日，部里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起草了一个文件，报送中央。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现在不同于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那种形势。根据毛主席九月十五日在党派座谈会上提出的对党外不搞运动的指示，在各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中间不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群众性的斗争，不进行反右派运动，不进行重点批判，不搞交心运动。还提出，在组织党外人士学习八中全会决议和有关文件时，要贯彻自我教育的精神，着重正面教育。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批转了中央统战部上述文件，并加了一个很长的批语。指出：这次反右整风运动，不要在民主人士中进行，即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工商界和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进行。此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九月十五日召开的党派会议上已经宣布过，望各地遵照执行（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单位，应该采用适当方式加以结束）。中央这个批示，纠正了“左”的思想，稳定了党外这条战线，是适时的和正确的。



#### 第四，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特赦第一批战犯。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出：“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百分之十左右为好。今后，根据右派分子的表现，对那些确实改好了的人，还准备分批、分期摘掉他们的帽子。”《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开始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中央统战部和地方各级统战部门在贯彻中央指示，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中，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十二月四日，经中央批准，第一批特赦了王耀武、爱新觉罗·溥仪等三十三名战犯，并对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作了妥善安置。这些人改造成了新人，充分说明党的政策的威力和对人的改造工作的巨大成绩，对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 (八)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的三年

(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

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在国际上，我们党同苏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发展，大论战日趋激烈和公开；美帝国主义和印度政府也一再掀起反华合唱。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为克服暂时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在国际上坚决顶住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打退了美帝和印

度政府的进攻。

为着克服暂时困难，党中央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强调发扬人民民主，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切实贯彻政策，克服和纠正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在中央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许多具体工作条例，如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九十五条，教育六十条，科技十四条，等等。中央统战部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起草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文件。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会议前后，又为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到一九六二年，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在为克服暂时困难而进行艰巨斗争的三年中，我们和各级统战部门在中央和有关党委领导下，适应暂时困难时期国内外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等方面，贯彻政策，调整关系，调动服务，促进改造，对于保持和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使全党能够集中力量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迅速克服暂时困难，作出了贡献。

从一九五九年进入暂时困难的开头一段时间，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反右倾”运动正在党内开展，由于连年“大跃进”和掀起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加上教育革命、学术思想批判、拔白旗、破权威等等“左”的错误做法的连续不断的冲击，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思想上相当紧张，怕批判斗

争，不敢讲真话，心情不舒畅。他们对于国内形势和当时称作“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许多怀疑、不满以至抵触；对国际形势和中苏两党大论战有很多疑虑和担忧。在生活上由于供应紧张，也有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看待当时的阶级关系，如何看待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多数人的紧张？成为当时统战工作中一个重要的方针性问题。我们经过调查研究，注意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多数和少数、主流和支流；区分落后和反动、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等等，判明了多数人的基本动向，提出要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紧张：一种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向工人阶级进攻引起的紧张，属于敌我矛盾的性质，另一种是由于我们革命和建设工作中急躁前进的“左”的错误而引起的紧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大多数人的紧张，是属于后一种性质。他们是跟而不是反。现在看来，他们的紧张，固然有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的一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的某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无法跟上，不可能不感到紧张。但在当时，我们主要是强调了他们世界观上的原因。针对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这种基本动态，我们在统战工作中一般地实行了主要方面抓紧，次要方面放松的方针，主动缓和同他们的关系。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的前提下，政治上予以信任，工作上使他们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在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为了帮助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向党外人士提出了改造世界观的任务，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同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切实纠正过去由于“左”的错误所造成的不得人心的事，认真贯彻政策，增强团结，尽可能地把最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领导周围，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同努力；使极少数坚决反抗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陷于孤立。由于判明了形势（是跟不是反），提出了

任务(改造世界观、进行形势教育),采用了新方法(神仙会),因而逐步出现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不仅为保持这条战线的稳定作出了贡献,而且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克服暂时困难增加了助力。实践证明,我们在暂时困难时期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正确的,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

## 一、采用神仙会方式,大抓 形势教育和思想教育

神仙会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一次会议上讲的,是对党内而言。我们在暂时困难时期把神仙会的方式运用到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并且经过党内外的共同努力推广到全国,获得完全成功。

神仙会的基本特征就是在党领导下的“三自”和“三不”。“三自”即: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用“三不”来保证“三自”,用“三自”来达到敞开思想,讲心里话,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三自”的“自”是个集体。实行“三自”就是主要依靠一定的集体自己的努力,来解决他们政治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

神仙会首先从工商界开始。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〇年二月,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将近二千名工商界人士参加。当时党内正在开展“反右倾”运动,有的地方把运动推到党外,在党外人士中搞了重点批判。因此,会议开头的时候,与会人员思想很紧张,怕在会上搞批判斗争,有些人来开会前就准备好了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进步分子则准备在会上大批大斗一场。这种形势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形成乱批乱斗,而且势必在全国范围造成阶级关系新的紧张。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利的,也是违反中央不在党外人士中开展“反右倾”运动的指示的。当时两会

领导人准备的会议开法，仍然是谁致开幕词，谁作报告，小组讨论，大会通过等一套程式化的方法。这样开下去，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势必出现乱批乱斗和被迫检查过关的情况，结果将是很不好的。为了帮助开好这次会议，我在他们的会前和会议过程中，多次同两会领导人陈叔通、黄炎培等谈话和举行座谈，建议并且帮助他们改变那套程式化的开会方法，采取和风细雨、神仙会的方法。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坚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引导大家通过自由交谈、讨论和辩论，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对与会的进步分子，也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放下棍子和帽子。这样，与会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顾虑，敞开了思想，展开热烈的争论，小组会漫谈，会后自由结合漫谈，走廊里，饭桌上到处都在交谈、争辩，相互间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心情舒畅。

会议集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是：（1）对工商界的估计问题。多数人可否说已经基本站到社会主义立场？还是基本站在资本主义立场？（2）当前的任务问题。今后应着重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着重改造？服务与改造的关系如何？今后应着重改造政治立场还是着重思想改造？（3）工商界的前途问题。主要是一九六二年定息到期以后有关的生活待遇如高薪、定息、政治安排、生活福利等如何处理？

针对会议讨论的问题，我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十八、十九两日在大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靠拢共产党，努力自我改造，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讲话。内容共有五个部分：（1）大有进步，（2）努力改造，（3）改造的任务，（4）改造的途径和方法，（5）坚决靠拢共产党。这个讲话根据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在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关于工商界、知识界和

民主党派都“大有进步”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工商界的进步，指出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是基本上社会主义立场，一部分人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立场，一部分人还是基本上资本主义立场”。同时，针对他们中高估进步的倾向，指出工商界还有消极一面，提出需要进行世界观改造的任务。我还针对他们在接受党的领导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疑虑，如认为“寄人篱下”、怕“过河拆桥”、担心“党是不是信任”，等等，进行了解释，鼓励他们坚决靠拢共产党，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两会的神仙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二日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同两会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向他们重申了党的“包一头，包到底”的根本政策，号召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对于定息问题，他说“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一九六二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尾巴”。对于高薪问题，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谈到退职退休问题时，他说，“将来要拟个办法”，“目前临时怎么处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一定去上班，请个假，薪水照发”。谈到病假期间工资的问题时，他说，“国务院曾有个规定，就照那样办好了。”“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会后，中央统战部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商界应当顾一头，一边倒》的社论，同时，对工商界的病假、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分别起草了文件，报经中央批转各地执行。这样，就使工商界的主要问题，获得圆满解决。

一九六〇年夏季，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和致公党分别召开中央会议。参加这些党派会议的共有一千八百多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知识分子的会议。我们

建议和帮助各民主党派这些会议同样采用神仙会的方法。

各党派举行这次会议的时候，国内困难还在发展，国际上我们党同苏共的分歧和斗争扩大到国家关系，更加尖锐，激烈。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多数人忧心忡忡，亟需进行一次形势教育，以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稳定情绪。我们在会前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对于帮助民盟、民进、农工和九三等党派开好中央会议扩大会议的一些带方针性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在北戴河起草的，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进步作了充分肯定，指出“从政治上说，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基本上已经转过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大弯子，这是他们的主要的一面。”文件对帮助开好这次会议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 通过这次会议对他们进行一次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面教育，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在将来的政治形势的演变中，力求使他们中的多数人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更多的精神准备。

(2) 为了使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应该帮助他们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但这是一件长期的、复杂的、细致的工作，绝不能简单急躁。只要他们同我们在大的政治方向上一致，对他们就应该在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至于参加体力劳动，不要勉强，年高和身体衰弱的人，可以少参加或者不参加，使他们能够安下心来，进行工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3) 他们反映当前知识分子对合作共事的关系问题的意见比较突出，如在机关、学校和厂矿中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新老关系问题，在三结合中如何发挥他们的力量问题等，我们打算通过这次会议进一步调查研究，再提出具体措施报中央请示。

(4) 今后仍应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重申民主党派在协助我党推动其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和进行自我改造方面的作用。

(5)这次民主党派会议采用开“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敞开思想，提出问题，辨明是非，提高认识，进一步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加强自我改造。

在各党派会议过程中，周恩来同志应邀到会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向他们讲了我们党同苏共的分歧和争论的性质、党的基本方针等，进行了形势教育。恩来同志在报告中还回答了民主党派“后继无人”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不是偶然的。中国的人口很多，共产党要以无产阶级面貌改造社会，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只要继续前进，社会上会有人继续参加进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无后继的人，而决定于你们愿不愿意前进，愿不愿意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周围有各民主党派，共同进行政治教育、思想教育，这就是民主党派的作用。

我应邀到会作了题为《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内容有五个部分：(1)大有进步，(2)阶级斗争，(3)改造世界观，(4)学习毛主席著作，(5)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提出了今后各民主党派的几项主要工作：(1)团结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继续反对国内外敌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2)团结和推动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工农群众一道，参加劳动和实践，为社会主义服务。(3)推动所代表和联系的人们结合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践，发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4)协助党和国家调整阶级关系。(5)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6)互相监督。

各民主党派的这次中央会议开得很成功。与会广大知识分子讲了心里话，摆出了疑虑、苦闷和担心，互相帮助，互相启发，提高了认识 and 信心。对于会上反映出的大量合作共事关系方面的



问题，他们提出要反求诸己，而不是着重责备党员和青年。会议开出了两个积极性，即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和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各党派会议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同他们照了像。毛泽东同志在同各民主党派见面的谈话中，称赞了神仙会，给了很大支持和鼓舞。

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知识界两个全国性的会议表明，神仙会是贯彻和风细雨、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好形式，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推进自我改造的好方法。神仙会决不是无风无雨，更不是什么“自由化”，而是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过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在“三不”的条件下进行的，比较自然，能够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党外人士反映神仙会是“有斗争，无压力”，因此，可以把话说得比较深透，增强了团结。这两个全国性神仙会的召开及其在全国范围的广泛传达和层层召开，缓和了党同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增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使党外人士在国内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困难和国外的压力面前，能够经受考验，紧紧地团结在党的领导下，为克服暂时困难贡献力量。这是统战工作的一项成功的经验，也是统战工作的新发展。

## 二、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关系

“大跃进”以来，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党内滋长了包打天下和宁“左”勿右的思想倾向。统战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严重干扰，或者擅自修改，任意违反，或者搁在一旁，或者乱出点子。许多机关、学校、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排斥党外人士，不信任他们，不尊重他们的职权，不给必要的工作条件，甚至任意批斗的现象，严重损害党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关系。

在一九六〇年各民主党派中央的神仙会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映相当突出。因此，我们确定在一九六一年把检查政策执行情况、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同大抓形势教育，列为全年必须集中力量抓好的两件大事。《中央统战部关于一九六〇年工作的总结和一九六一年工作的安排》中说，“努力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有可能稳定和团结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为当前中心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更有利于全党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的中心工作，在国家建设的各个战线上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就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服务于全党中心工作的最基本的任务。”

一九六一年，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强调调查研究要与解决问题相结合，发现违反政策的问题，要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许多地方党内存在的把统一战线同阶级路线对立起来，借口贯彻阶级路线而在人事安排上挤掉党外人士的清一色倾向，起草并经中央批发了关于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人们安排政策的意见，提出了以下的措施：一、已经安排了的，只要工作上，政治上表现一般没有违法和严重的错误，一律不应降低和撤掉他们的职务。二、几年来表现较好、工作上有一定能力的，应该酌情提拔。三、对上面两种人，如果过去把他们换下来了或者挤掉了，应该安排其他相应的职务或恢复原来的职务。四、对于他们中下放劳动的，必须明确期限，下放期满的，应由原单位负责安排他们的工作，原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恢复原职或分配相应的职务。这些规定，对于纠正当时盲目排挤党外人士的“左”的错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九六一年夏季，我从东北回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所了解的东北地区统战工作中的问题和“拔白旗”的影响。邓小平同志说，中央已决定对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的问

题，县以下一风吹，县以上的逐个甄别。“拔白旗”的问题也可以参照这个指示办理。小平同志又说，现在各部都在制定工作条例，统战部也可以搞一个。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是中央既定的政策，可以作些规定。这次汇报之后，经我提议，部里成立以金城、于刚同志为首的小组，进行调查研究，起草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文件。我当时提出，这个文件要对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与任务作出明确的分析和规定，对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要敢于批评、揭露，提出有力的改进措施，决不要遇到问题和困难就绕着走；要使之成为管一个时期的指导性文件。

这个文件稿经过起草小组和部务会议的反复讨论、修改，一九六二年四月形成《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的意见》提交全国统战部长会议讨论。文件着重反对几年来统战工作中“左”的错误倾向，重新肯定一九五六年以来统一战线内部的深刻变化，提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政治面貌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已经转变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大部分跨进了重大的一步，有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文件稿提出当前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主动改善合作共事关系，对于一切愿意跟着党走的人，都要加强团结，积极使用，逐步改造。”还针对几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总结统战工作的十条基本经验：

(1) 必须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加以正确处理。

(2) 处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3) 必须全面地贯彻阶级路线，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两个联

盟的关系。

(4) 必须充分地实事求是地估计党外人士的政治进步和业务作用。

(5) 必须充分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充分使用一切有用的力量，把使用和改造结合起来。

(6) 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改造，必须区别一般要求和更高要求。

(7) 调动党外人士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促进他们的改造，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

(8) 必须把提高同盟者的政治水平和照顾同盟者的合法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

(9) 必须坚持扩大提高左派、争取团结中间派、孤立分化和改造右派的工作路线。

(10) 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反对一切“左”的或者右的倾向。

文件稿的第二部分，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合作共事关系的七条主要措施。文件稿的第三部分，专章论述进一步活跃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切实贯彻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整个文件抓住了当时合作共事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破有立，提出具体有力的改进措施。但在统战会议讨论时，有些同志认为广州会议已经解决了问题，这个文件，作用不大了，因此未被会议采纳。现在看来，这个文件对当时统一战线形势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方针和措施，基本上是正确的，如经修改报请中央批准下达，对于党的统战政策的落实和统战工作的推进，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在这次统战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对这个文件稿的看法：“文件今天我又看了一下，从一条一条来看，许多东西是不能推

翻的。……因此，不能统统报废。比如‘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原则，如果不搞清楚是不行的，这次是写得比较充分的。又如把政协、民主党派放在合作共事关系中，对于我们很有好处，非常重要，是完全对的，就是要整我们自己，要坚持把这个问题放在里面。这个文件是不成熟的，通过则太早了，但是全部推翻是不行的。我们要继续搞。”会后不久，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了，这个文件就没有再搞下去。

在一九六一年起草上述文件的同时，我在上海还请平杰三同志出面，帮助上海市委统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改善合作共事关系的文件，曾提到市委常委会议上汇报。陈丕显同志主持的会议，同意了这个文件稿，后来送到当时的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那里，被他推翻了。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许涤新、孙起孟同志还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企业方面合作共事关系问题的意见，同样由于不成熟，未形成正式文件。

在这次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我起草了《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其中对于正确处理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讲了如下八条：（1）必须用其所长。（2）要放手使用，使他们真正有事可做，并且尊重他们的职权，供给他们以必需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履行职责。（3）必须商量办事，民主合作。（4）要交待政策，交换意见。（5）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6）工作条件、相互批评、功过赏罚、培养提拔等，应当一视同仁。（7）交朋友、交畏友，有谈心的机会和习惯。（8）定期举行神仙会。

这些意见后来纳入了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 三、在精简、下放和副食品 供应方面适当照顾

精简、下放主要涉及工商业者。一九六四年有些地区在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支援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时，精简、下放了一批原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在工商界中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多数人心情非常紧张，怕被精简，更怕下放农村，最怕到农村安家落户。针对这个情况，同时考虑到下放农村不利于对他们的改造，我们提出，对于有定息的私方人员和资方代理人不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已经下放的应明确期限，定期调回。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且进一步指示：这些人原则上一律不要下放农村，而在必需精简的单位，在完全自愿条件下，可以下放一些人到城市企业。一九六二年中央决定压缩两千万城市人口下乡时，有些地区又在工商业者和党外人士身上打主意，把他们下放农村或者精简回家，引起他们很大震动。我们提出了在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中对工商业者和党外人士做好安置工作的意见，重申了中央关于他们不下放农村的指示，纠正了某些地区的错误作法，使工商界和党外人士逐步稳定下来，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下放了一批工商业者，长期在农村劳动，成为粉碎“四人帮”后需要抓紧处理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对知识分子，中央书记处于一九六〇年八月批准了齐燕铭同志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北京市委关于在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负责干部副食品供应问题的请示，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也可以参照这一办法执行。我们贯彻了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副食品供应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给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以特殊照顾，送去了党的温暖，

产生了良好影响。

#### 四、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各地在历次运动中错误地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如在整风交心运动中把一部分党外人士自己交心的材料作为根据，给他们处分或者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在“拔白旗”运动中，把一些知识分子当作“白旗”拔了。在“反右倾”运动中，有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外人士中进行了重点批判，斗争了一批党外人士。这些都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增加了同党的隔阂，很不得人心。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以后，我们提出了在党外人士中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意见，确定凡是在交心运动中受了处分或者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一律平反；在“拔白旗”、“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批判、斗争、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凡是批判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都予平反。凡是平反的，都摘掉帽子，恢复原来的工作或者安排其他相当的职务。对一般非党人员，采取召开会议宣布平反的简便办法。对中上层人士，则逐个甄别，逐个处理。对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其他运动中受过重点批判、处分或者戴了帽子的党外人士，经过甄别，凡是完全错了或者基本错了的，也坚决予以平反，不留尾巴。由于这项工作的进行，解开了不少人的思想疙瘩，更好地增强了团结。

#### 五、为被划成“右派分子”的 大多数人摘掉帽子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多数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和影响，是一支不小的社会力量。做好他们的工作，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建设是非

常必要的。这项工作在内部分工由平杰三同志主管，他抓得很紧。我们从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开始，根据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了摘帽子工作，到一九六二年共摘了四批。在全国五十五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们中，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为了做好这一大批人的工作，我们还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和一九六二年九月，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集中地向中央反映了当时不少单位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们宁“左”勿右的问题，并在对他们的生活、劳动、政治学习、工作安排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改进措施，经中央批准在各地贯彻执行。在当时的形势下，尽管还未能为他们进行甄别和改正，但这样做也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团结工商界、知识界、民主党派，调动他们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有很好的影响。

## 六、一九六二年四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从二月到四月，周恩来同志在国家科委于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上、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三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和估量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新发展和新任务。他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同时，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



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过程中是有成绩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关于统一战线的任务，他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更重了，就要负起新的任务（当然，同时还有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要有新的发展。就是说，它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果的基础上，现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的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新任务。”周恩来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为当时的统战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们于四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二十一日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恩来同志的讲话为指导，研究当时统战工作的形势与任务。

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部领导商定由徐冰同志主持。为了帮助徐冰同志准备会议的总结报告，我在五月七日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这个书面意见根据恩来同志的上述讲话精神提出“我国统一战线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具体分析了知识界的根本变化和工商界的重大变化。讲到民主党派问题时，指出，“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都起了根本性变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同时指出现在还不能说各民主党派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政党。理由是：“各民主党派历来就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并且包括一批共产主义者，这不仅没有妨碍，而是恰好有助于他们做好团结、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的工作。现在有更多的成员转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来，这就更有利于他们联系、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相反的，如果我们现在宣布各民主党派或者某几个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并且按这样去要求他们，那倒

把他们的工作弄得狭小了，同时也不完全符合各民主党派的实际情况。”

这个书面意见在分析了知识界、工商界、民主党派、宗教界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之后提出，经过十二年来尤其是近年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理由说，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质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根据是：第一，“阶级关系已经起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深刻变化，第二个联盟已经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为第一个联盟，并且必然会继续转化；第二，社会主义，即六条标准，已经成为统一战线中各方面公认的政治基础；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任务；第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统一战线，它和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关系上是同一的；第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各方面的领导权已经普遍建立，并且日益巩固。”同时又指出，“我们说，现在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已经大体形成，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统一战线内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长期的，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则已经起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深刻重大的变化。由于两条道路决战取得了基本胜利，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过去，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将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即在六条标准的范围内，关于方针、政策、工作方法、学术见解的批评和争论，则日渐增多和活跃起来。这种争论和批评，正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是我们国家繁荣兴盛的必要条件。毛主席早就提出，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应当用民主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处理。在现在

的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广泛更充分地运用这个根本方法，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把它们贯彻到人民内部关系的一切方面。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指南。”这个书面意见还对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提出以下意见。

(1)调整关系，加强团结。

(2)发扬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方针。

(3)认真改善合作共事关系。

(4)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更加活跃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工作。

(5)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实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内容。

(6)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7)继续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和时事政策的学习，逐步改造世界观。

(8)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第一，全党尤其是各级党委都抓统战工作。第二，重新教育干部。第三，中央统战部和各级统战部门，应当发扬成绩，认真纠正缺点和错误，改进工作方法，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团结全党同志，努力做好工作。

这个书面意见提交我主持的，有徐冰、平杰三、许涤新、孙起孟、于刚、黄铸同志参加的小会进行讨论。由于有不同意见，这个书面意见没有提交统战部长会议讨论，其中有关今后统战工作的任务的意见，由徐冰同志在这次统战会议的总结报告中采用了。

这次统战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了当前统一战线的形势、任务和主要工作，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报告，对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

务，已经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明确的规定，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内工作的指针。会议确定以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作为当时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会议过程中还对民主党派的性质、统一战线新阶段的内容以及知识分子工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会后继续进行研究。

五月十七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中央书记处对这次会上提出的具体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如精简涉及资产阶级分子的处理原则问题、党外人士的甄别平反问题、对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政治学校问题等，给了明确指示。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对当时统一战线工作作了高度评价，指出：还是讲老话，统一战线是长期的，五十年以后再说。统战工作是得到益处的，是三大法宝之一。现在讲政治形势好，也就是说统一战线的形势好。要重申统战工作的长期性。这是对为克服暂时困难而斗争的三年中统战工作的最好总结。

## (九) 两场错误的批判

(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两年多的努力，认真贯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逐步得到克服，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这时，党内“左”的思想重新抬头。毛泽东同志在当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

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十中全会错误地批判了所谓的“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错误地批判了邓子恢同志和习仲勋同志等。也有同志在会上批评中央统战部，说“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是一个误会。徐冰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作了解释。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到一九六四年期间，在毛泽东同志“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中央统战部对我开展了两场批判，给我强加了种种“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名，颠倒了理论政策的是非，使统战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更加发展。

第一场批判从一九六二年十月开始，在所谓政策思想检查的名义下，在部务会议范围内进行。对一九五六年以来我在政策研究过程中提出过的一些理论政策性意见，如争取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和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建立起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简称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我国各民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民族等，不点名地提出了批评。会议开了四十多次，历时半年多。作为这场批判的结果，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将《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简称专题报告）报送中央，而告一段落。毛泽东同志审阅了这个《专题报告》，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作了具体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说得更长了，把几

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这就使理论上“左”的失误更加发展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中旬到六月十七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会不会出赫鲁晓夫和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八月间，中央统战部召开部务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由此又开始了对我的第二次批判，给我扣上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罪名，是非更加颠倒。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撤掉我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随后在三届人大和四届政协的会议上，撤掉了我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的职务。

在第二次批判期间，我在部务会议上作过两次检查。最后被迫承认犯了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严重错误。当时我觉得自己已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如果硬顶着不检查，被开除党籍，再为党做工的机会就没有了。自己作了三天思想斗争，才下决心上这个纲，并且用主席讲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来为自己的违心检查作解释。当时的决心是一句也不声辩，希望中央处理能够宽一点。我在党内几十年，对党是很有感情的，总想留在党里边为党做些工作。

这两场批判，都是“左”倾错误在统战工作方面的集中表现。两场批判把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在主持起草文件过程中对统战工作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和新见解，统统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批判涉及的问题很多，集中起来就是所谓“五社一短”，即：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所谓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这“五社一短”，就是当时批判中强加给我的所谓“修正主义纲领”。究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是非问

题，必须在理论政策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下面，对这些问题加以说明和探讨。

## 一、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这是在一九五五年底和一九五六年初三大改造高潮形势下提出来的，是讲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统一战线的性质。提出这个看法的依据是：第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人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更加巩固和加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从个体农民转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废除，这个阶级已经接受工人阶级的和平改造，并在趋于消灭的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从统一战线本身来说，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同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联盟；政治准则是六条标准，主要是两条：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务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些都是统一战线中起决定作用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在统一战线中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矛盾论》）。根据这两条，当时提出我国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现在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变化。

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问题，周恩来同志总是肯定的，同时也指出这个提法有缺点。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恩来同志在二届政协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讲话中，首先肯定我国统一战线从开国起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同时指出不要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他说：我们的政权也好，我们的统一战线也好，从开国以后就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三大改造和国家工业化。有时，我们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还没有建成就

是了。所以我们的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从大家同意以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性质，统一战线性质就定了。这种性质一天一天更加强化起来了，最后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国家就成了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又说：也有人说可以改一下名字，是不是把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成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第一、从性质上说不完全。同时，还有另一种不完全，好象我国过去是一种性质，现在才是社会主义性质，这样不对。我们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就是逐步完成和逐步实现，特点就是过渡。过渡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最本质的东西。今天我们不能说已经变了性质。第二、我们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员也不能说今天以前是人民民主的，今天以后就够社会主义成员的条件了。我们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嘛，怎么能说都是社会主义成份了呢？还要有一个过程。人民团体里头还有工商联，民主党派里还有代表资产阶级的党派，海外华侨里头有很多是资本家，各民族现在还有贵族，毛主席说，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都包括进去，使我们的统一战线一天天更广泛更巩固。现在改变名称不太好。否则，既不都是社会主义成员，一改名，就把统战范围弄窄了，弄混了。恩来同志这个讲话精神，我当时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以后我国统一战线性质的变化，而不是主张改名。在恩来同志讲话后，我就在《七年方针》稿中删掉了这个提法，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坚持这个观点，对实际工作没有产生不良影响。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两次批判，把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提法说成是抹煞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投降主义。这种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第一，当时所讲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是讲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就是在统一



战线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一对主要矛盾哪一方处于主导地位 and 起决定作用的问题，而不是讲统一战线内部有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完全混为一谈。我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的书面意见》，对于统一战线内部还有阶级斗争，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怎么能说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呢。第二，当时所讲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是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的统一战线的性质。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上和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它已不再是主要矛盾。过去批判时，把阶级矛盾说成始终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把民族资产阶级的消灭说成遥遥无期，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的，也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观点的。第三，从中央统战部的实际工作来说，从来是讲阶级斗争的，从来是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从来坚持对资产阶级人们的教育和改造，根本不存在抹煞阶级矛盾和取消阶级斗争的问题，如果有错误的话，是有时把阶级斗争讲多了，讲过头了，而不是什么不讲阶级斗争。第四，全国解放以来，在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依靠巩固的工农联盟和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经过统一战线，对民族资产阶级实现了和平改造，消灭了这个阶级，怎能说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呢？！如果说有投降的话，只能说是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屈服投降，这正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要求和目的。

## 二、关于社会主义政党

这个提法最早是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提出来的。当时我在部务会议上的发言说：“要把民主党派改变成为搞社会主义的政党，就是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政党。”一九五六年初起草《七年方针》时，曾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团体”。经周恩来同志

指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提法有缺点后，我们随即也删去社会主义政党的提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我在北戴河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经毛泽东同志审阅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把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民主党派根本改造的前途。我们当时设想，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准有三条：第一、确立和贯彻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第二、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第三、成员的多数人，基本上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要求。这三条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因素。民主党派的改造达到这三条标准，就表明社会主义因素在民主党派内部已经居于优势和主导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民主党派根本改造的前途提出来，并没有错。刘少奇同志一九五六年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就说过，“中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我所讲的社会主义政党，就是少奇同志在“八大”所讲的“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一九六〇年八月我在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上作《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讲话，会前送讲话稿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恩来同志提出，怎么没有讲民主党派根本改造的前途？我就把少奇同志“八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加上去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总是由不断量变、部分质变达到根本的质变。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主党派的发展变化同样反映这一客观规律。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包含两个联盟在内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尚可以发展变化为社会主义性质，而由不同阶级的人们所组成的民主党派怎么就不能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呢？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就在向社会主义性质

发展变化了。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以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总任务作为它们的政治纲领，它们的政治实践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不正是我国民主党派向社会主义性质方面发展和变化是什么呢？！

过去批判时有的同志把我提出的使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组织，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说成要使民主党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我的话讲得很清楚：第一，是讲在民主党派内部建立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而不是说使民主党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第二，这个领导核心是由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进步分子组成，而不包含民主党派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三，把这样的领导核心称作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是指这个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性质。很显然，这个提法根本不涉及民主党派在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 三、关于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

这个提法最早是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起草的《七年方针》稿中提出的，具体讲法是：“目前对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关系，主要表现为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党与非党的关系，”我们党的干部应同他们“逐步地建立起互相信任、互相接近、互相帮助和互相学习的社会主义合作关系”。这个讲法缺乏具体分析，比较笼统。同年三月，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的这个文件的稿子，即改为“对于那些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人，应当同他们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相合作关系。”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还具体指出，“对资本家现在还不能这样”，“现在对他们还不是完全的同志关系”。同年六月，我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进一步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合作共

事关系。一种是机关、学校和国营企业中共产党员同一般党外人士间的工作关系，指出，由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方面的关系基本上就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另一种是公私合营企业和一部分国营企业中，职工和共产党员同资产阶级分子间的共同工作关系。指出，“这种关系的建立，反映着企业原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反映着资产阶级分子向着劳动者的逐步过渡。但是，这种改变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个过渡，就大多数人说，现在还只是开始走了第一步。因此，这种共同工作的关系同时又是阶级关系。”应该说当时的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没有什么错误。过去批判我说过“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成了社会主义同志式的合作共事关系”，不符合我的原意。

#### 四、关于社会主义民族

社会主义民族的提法，是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我国各少数民族除西藏外大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提出来的，是正确的。一九六一年九月，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干部会上作的《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政策”、“少数民族中的革命和战争问题”、“社会主义民族”、“民族融合问题”、“当前阶段民族问题的任务”、“必须坚持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大量培养民族干部”等十二个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对民族工作的基本观点（详见《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第520—581页）。这篇讲话当时送中央审阅时，得到恩来同志的赞同，这里不再赘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民族工作问题上实行了拨乱反正，批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观点，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民族的

提法。一九七九年九月，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五十多个兄弟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正在为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努力。”这是符合我国实际的科学论断。

## 五、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宗教”

我在一九六二年民族工作会议上说过宗教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说法含义是不够明确的。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宗教界人士、宗教工作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宗教和它的教义，则是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同马列主义、唯物论是根本对立的。过去批判时说我有过“社会主义宗教”的主张，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从来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宗教”的主张。

我对宗教问题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观点，曾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作了简要概括。主要是：（1）宗教的根源是对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无知和无能为力。（2）宗教信仰是历史产物，它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由于它的发生的根源，它只能随着根源的消灭而消灭，只能自然消亡。菩萨是人民自己造成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去丢掉。行政办法只能助长宗教感情，决不能消灭宗教。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宗教。（3）宗教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宗教活动场所。（4）宗教有五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5）宗教在历史上曾经是被压迫人民团结奋斗的纽带、旗帜。要历史地看待，不能简单否定。（6）宗教矛盾在民主改革和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将逐渐演变成为劳动人民间信仰不信仰的矛盾。（7）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改革自由的政策。批判

包办子女信仰宗教。要把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帜抓在我们手里。(8)实行政教分离，宗教和教育分离。(9)用和平改革方法，改革宗教制度，废除封建剥削和特权。(10)在党内进行无神论教育，在信教群众中有步骤地进行科普教育。(11)团结、教育、改造宗教界人士，镇压和肃清反革命。(12)培养红色神职人员，培养政治上靠拢我们、有丰富宗教学识的学者。(13)宗教不是科学，但宗教问题要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 六、关于短期消灭资产阶级

这是指一九五七年底起草《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工作纲要》过程中提出的提法，即：“在五年或者五年多一点时间，实际上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到一九六二年能够同取消定息的要求相适应。这个意见并没有错。

什么是阶级？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按照列宁的定义，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就基本消灭了，但是，他们还有定息，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残余和变相形态，因而这个阶级并未完全消灭。中央于一九五六年决定，定息七年，在一九六二年结束。这就是说，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任务到一九六二年就将完成。我当时就是根据中央这个决定提出要使资产阶级分子的

改造能与中央决定相适应，到一九六二年实际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显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和目标是必要的。否则，届时定息取消了，人的改造跟不上，将会出问题。

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两场批判时，把消灭资产阶级同在整个社会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混为一谈，而且把消灭资产阶级说成不单是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还包括整个社会上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影响，还要在世界上消灭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因而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说得越来越长，要一百年以至几百年。显然，这些“左”的理论观点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是不相符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理论，是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

实际上，毛泽东同志对于消灭资产阶级年限的说法，是逐步放长的。一九五六年一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大约再有三年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当时，部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工作，也是按照三年完成来考虑的。不久，中央决定定息七年，我主持起草了统战工作的七年方针。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提出争取五年或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际达到消灭资产阶级的水平，当时中央书记处没有同意，我就删掉了这个提法。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把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反右倾运动中又说，“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更进而把消灭阶级说成要一百年到几百年。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说法，我当时还是尽量跟的，并且感到自己跟不上。我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部的常务会议上作的关于学习十中全会的发言中，曾作自我批评说，“过去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认

识不足，中央逐步指示，我们逐步放长，仍然认识不足，总是有被动。”这个说法，在两场批判中却被说成是把错误的责任推给中央，实际上这确是我当时发自内心的自我批评。

总之，所谓“五社一短”，都是在研究政策过程中提出来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有的提法内容或有不够准确，或缺乏严格的理论根据，这在研究政策、讨论问题的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在中央指出不妥之后，都是按照中央的指示修改文件和进行工作的。两场批判中，把这样一些基本是正确的意见和看法错误地加以批判，毫无根据地说成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投降主义”，扣上“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严重罪名，并且把这种错误批判推向全国，从而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政策、理论上的混乱，使统战和民族、宗教工作系统的一批干部受到株连，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受到损失，也损害了党内民主和对政策工作问题的正常讨论、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已批准为全国统战系统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又批准了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个复查报告的结论中明确指出，中央统战部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这两场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中央批准将两场错误批判中送中央的有关批判我的几个报告，连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撤销我担任的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的通知，一并撤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各条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巨大工作，在统战工作方面同样实行了拨乱反正，使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并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毫无疑问，在现在的党中央正确



路线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将不断地取得胜利，在建设具有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必将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附件：**

## **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 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意见**

（经过有关同志研究提出，但很无把握）

### **一、大势所趋**

- （一） 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着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
- （二）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日益缩小，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发展，困难日益增加，只有走这条路。
- （三） 有了四年的基础和经验（国家资本主义）。
- （四） 出现了一批进步资本家及其代理人。
- （五） 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宣传。

### **二、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

- （一） 初步改善生产关系。
- （二） 逐步改造资本家、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 （三） 改造企业，积累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力。
- （四） 培养干部。
- （五） 购买。

总的说，经过一定时间的购买和改造，为国有化准备好条件。

### 三、基本上经过公私合营方式

(一) 基本情况(已合营的五百六十八户未计入,可能有交叉):

(1) 一九五二年,约共二十七万户,职工约二百一十万人,生产总值约一百一十四万亿元,其中,大型一万七千户,职工一百一十万人,生产总值六十八万亿元。大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约占百分之二十二。

按职工人数分类:

五十人以上(接受加工订货的)大型约二千九百三十户(包括手工工场六百一十七户),生产总值约四十二万亿。其中一百人以上的约一千二百二十七户(手工工场一百九十二户),产值约三十五万亿。又其中五百人以上一百一十四户;一千人以上五十户。

(2) 资产总值:除已合营的外,全部大型约共三十七万余亿,小型十一万余亿,合共四十八万余亿,即接近五十万亿左右。

(二) 十人以上,凡是有用并能改造的,基本上逐步经过公私合营。有利于实现前述国家资本主义的目的。

主要利用资企改造资企,国家只需投入少量而必须的资金和干部(新建和较大扩建在外)。分股不必多,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二十以至再少些都可以,开始要多一点。有了购买一条,又有教育一条,前途一条,又有大势所趋一条,实行国有化,不需从股权比重做文章——这样政治经济都有利。

(三) 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相当于一九五二年产值六十八万亿元的企业进行合营,基本上包括大型全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再对相当于五二年产值二十二万亿元的企业进行合营,基本上包括十人以上全部。(上海第一个五年的计划与这个

方案大体相合。)

第二个方案——第一个五年，合营五十万亿，包括五十人以上全部，五十人以下一部；第二个五年，再合营四十万亿，包括五十人以下大型其余部分及基本上十人以上全部。

两个方案的结果基本相同：基本上十人以上；五〇年至六二年购买付出五十五万亿左右；积累资金约一百四十万亿。不同的，是前后两个五年工作量不同。采取哪个，明年摸一年再定，上海第一个五年的方案，也可这样处理。

(四)一九五四年工作方针：

(1)整理、巩固现有阵地，造成榜样和骨干，总结经验。

(2)以稳为原则，依据需要、可能和自愿，合营一批重要的和大的。上海是重点，可多搞一些。

召集一个专门的会议(办法另订送核)。

(3)搞出一套必要的章程和办法。

(4)结合各方各地，调查研究，制定后三年计划，并为五五年做好准备工作。

(五)合营方式：多种，尚待研究，同志们谈到的有：

(1)国家投资，

(2)国营企业吸收私营厂，

(3)地方国营小厂与私营厂合营，

(4)私营中、小厂经过组合再合营，

(5)葡萄形式，

(6)合营厂投资，

(7)其他可能的形式。

#### 四、几个问题

(一)资金：

(1) 国家第一个五年投资，公私合营银行股份（约七千亿，六折计四千二百亿，其中部分是公股），“五反”退补余额，合营上缴利润，部分私企中敌伪财产。此外估计需要财政投五万亿元（新建和较大扩建在外）。

(2) 投资公司吸收游资（有关大城市）。

(3) 提议合营会计统一于交通银行，设相应机构。财政部预算亦设单独科目。

(二) 资产清理为资本家极关心的问题，焦点在逾龄机器。拟予估值。

还有职工股问题，应当承认，拟请总工会研究处理办法。

(三) 搭配问题：拟承认合理的搭配。

(四) 供产销平衡问题：服从国家计划，统筹兼顾。

(五) 干部问题：

(1) 投入——主要靠地方。

(2) 利用改造原有人员——主要靠地方。

(3) 有计划地向国营输送技术干部，并培养新的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

(六) 管理问题：

中央有关部门与地方之间在管理职责、权限上的分工。因数量很大，拟以地方为主，中央部门管必需管的几项。拟由地方和有关部门作准备，这次召集的会议出若干条条。

提议：中央有关部门设相应的机构，并有负责同志主管。

## 五、复杂的阶级斗争

(一) 很大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

(二) 向公、私、劳、资三方面普遍深入地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方针。

(三) 经过各种关系和各种方式，向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教育和鼓励。进行批评和斗争。

(四) 贯彻党的政策，搞好合营企业。

(五) 经过加工订货、增产节约等，逐步改组和改革私营工业，为合营准备条件。

(六) 主要靠地方。

## 六、国有化时机

一般可能在一九六二年前成熟。会有先后，可能大的在先，看发展。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向中央口头报告要点)

## 编 者 的 话

今年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统一战线理论家李维汉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将他晚年陆续写成的回忆录汇编成《回忆与研究》出版，以志纪念。

李维汉同志回忆录的撰写工作是在他年过八旬，身体多病的情况下进行的。工作程序一般是：先由李维汉同志口述史实，并提供调查线索，然后由协助整理的同志根据他谈话的基本内容和搜集到的有关资料，包括历史资料和向知情人访问的材料，整理成文，再由李维汉同志亲自审阅，反复修改，然后广泛征求意见，再作修改后定稿。

收入本书的二十篇回忆录，绝大部分是经过这样的程序定稿的。有四篇文稿，即《回忆江苏省委》、《回忆长征》、《真假和谈的斗争——记北平和谈》和《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李维汉同志看过初稿，并提出过修改意见。其中，《建国以来十五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一文，李维汉同志主持过多次讨论。讨论结束时，他基本肯定这个初稿，同时提出了进一步修改的重要意见，要求这篇回忆录修改后，内容和观点更加丰满和成熟。协助整理这篇回忆录的同志遵照李维汉同志对初稿的批语和修改意见，并参照讨论会上其他同志的意见，对初稿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修改，有些章节重新写过，有些理论观点根据同李维汉同志交谈的意见加以充实，力求体现他的观点和要求。可惜的是，正当这四篇文稿进一步修改过程中，李维汉同志病情发

展，一九八四年八月去世了。他未能来得及最后修改定稿。这是要向广大读者说明的。还有两篇，即《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和《在中央苏区》，则是根据李维汉同志的口述记录整理的，未经他亲自审改。鉴于这两篇谈话记录有重要史料价值，也一并编入，以供参考。

李维汉同志生前多次说过，协助他整理回忆录的同志都付出了辛勤劳动，应该深切地感谢他们，回忆录发表时要把他们的名字列上。借此《回忆与研究》出版的机会，我们把他的这一心愿转达给所有参加李维汉回忆录整理工作的同志。下面是参加各时期回忆录整理工作的同志名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沈庆林、夏立平、李俊丞、季国平、王健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刘经宇、叶心瑜、颜广林、倪玉英、陈淑珍；抗日战争时期 王 琪、吴良珂、宋金寿、李良志、罗谦芳、唐曼珍、郝宴华；解放战争时期 尹华、袁廷华、杨建新、石光树；建国后十五年 李青、余鉴则。

《回忆与研究》编辑组

一九八六年一月